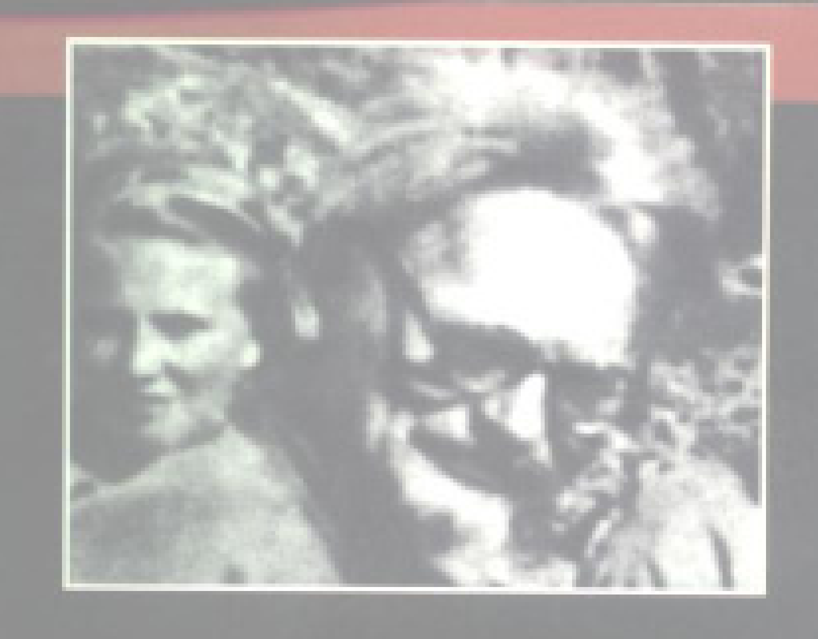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流亡的先知

TROTSKY 1929-1940

托洛茨基

先知三部曲

[波] 伊萨克·多伊彻 / 著



先知三部曲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

〔波〕伊萨克·多伊彻 著
施用勤
张 冰 译
刘 虎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1998 年·北京

前　言

在我著的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叙述了托洛茨基人生悲剧的悲惨结局。在悲剧的结局中，主角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但是，托洛茨基始终与斯大林进行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他是后者唯一公开的敌人。在1929—1940年这12年中，在苏联听不到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抗议，除了许多斯大林的反对者被迫屈辱地承认自己有罪之外，甚至连昔日紧张激烈的斗争的余音也已经沉寂。于是，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中只能孤军作战。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巨大的历史冲突似乎集中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中。传记作者应该指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并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关系的巧合，

正是这些情况和相互关系使斯大林成为“冒牌英雄”,使托洛茨基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唯一代言人。

因此,除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之外,我还应该叙述这一时期震撼人心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苏联狂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大清洗、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在纳粹主义的猛攻下溃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有这些事件都影响到托洛茨基的命运,他在所有这些事件上的立场都与斯大林针锋相对。我不得不回顾当时的主要争论,因为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意识形态的辩论所起的作用与莎士比亚悲剧中战斗的场面同样重要:在通往悲惨结局的途中,这些场面展现出主角的性格。

在本卷中,有关托洛茨基的私生活,特别是托洛茨基一家命运的叙述比重比前两卷要大。读者应不时地把注意力从政治叙述转到通常所谓的“个人故事”(似乎社会事件不是由所有我们的私事构成的,好像政治本身不是个人的杰出活动似的)。在这一阶段中,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与其政治命运是不可分离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他的家庭生活使人们认识这一悲剧,使它变得更为深刻。这一不同寻常、感人至深的故事由本书首次披露,它以托洛茨基与其妻子及子女的私人书信为依据。由于已作古的娜塔利娅·谢多娃的好意,我能自由阅读、使用这些信件。娜塔利娅·谢多娃在其逝世前两年曾请求哈佛大学图书馆对我开放其夫档案的保密部分,即据托洛茨基遗嘱应保密到1980年的那部分档案。

※ ※ ※ ※ ※

我想扼要介绍一下我撰写这部传记时的政治背景。我于1949年底着手这项工作时,正值莫斯科官方庆祝斯大林70寿辰,庆典上人们对斯大林的奴颜婢膝,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

托洛茨基的姓名似乎已被重重的诬蔑和遗忘永远埋葬了。1956年底,我已经出版了《武装的先知》,在准备修改《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的初稿时,苏共二十大的后果、波兰的十月动荡和匈牙利的斗争迫使我中断了这一工作,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事件上去。在布达佩斯,狂怒的人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但在莫斯科,亵渎这一偶像的事仍是秘密地进行,统治集团把它当做不可外扬的家丑。赫鲁晓夫警告二十大上的听众:"我们不能让此事传到党外,绝对不能让它传到新闻界。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洗我们的脏内衣。"我那时评论道:"很难长久地背着苏联人民洗脏内衣。现在就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无论如何,这件'脏内衣'是用他们的血汗浸泡出来的。洗脏内衣将需要很长时间,能把它彻底洗干净的,大概是更年轻、更干净的人的手,而不是那些开始做此事的人的手。"

《流亡的先知》问世时,某些"洗脏内衣"的行动早已公开,斯大林的遗体也已被迁出红场陵墓。一位敏感的西方漫画家对后一事件的反应是想到,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里搬出来,可能是要把托洛茨基的遗体放到刚刚腾出来的紧挨着列宁的墓穴里。这位漫画家所表达的想法可能有不少苏联人也想到了(虽然人们希望给托洛茨基平反将以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的方式进行)。但是,赫鲁晓夫及其朋友仍竭尽全力保持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的诅咒。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他们都指责对方为托派分子,好像他们两人全力提供的至少是托洛茨基及其思想提出的那些有生命力的问题的消极结果似的。

所有这些事使我更加坚信我的研究题目的现实意义和历史重要性。但是,我对我的某些批评家表示歉意,他们未能有效地影响我撰写这套书的方法及构思。诚然,这部传记在规模上超过了我最初的设想,我原计划只写一卷或两卷,结果却写了三卷。不过,

在这么做时我只是服从——最初是勉强服从——这项工作的写作逻辑和我这项研究本身的逻辑，它们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手中的传记材料为其成形及各自的比例而斗争，并向我提出了它们的要求（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辩解，我都不能在我的一位批评者的眼中开脱自己，他是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说，他“一直认为俄国革命从未发生过”，他想知道我怎么能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就我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态度来说，它始终如一，没有改变。1952年，三部曲的第一卷脱稿，它的最后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在这一章中，我描绘了处于权力巅峰时的托洛茨基。在该卷的前言中我写道，为了更完整地叙述他的生平，我要考虑“一个问题，他的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我在《流亡的先知》的最后几页，即题为《失败中的胜利》的跋中，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资料来源及致谢

本卷的叙述比前两卷更多地依据托洛茨基档案，特别是他与其家庭成员的通信。当我在注释中只写“托洛茨基档案”时，我指的是它的开放部分，它们存放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中，大学生都可以借阅。当我利用档案的“封闭”部分时，我加上“保密部分”这几个字。托洛茨基档案的公开部分的总目录附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参考书目索引中，保密部分的目录附在本卷的参考书目索引中。

在保密部分的两万多份文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与其追随者、朋友之间的政治通信，他要求把这部分封存是由于，他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哈佛大学时（1940年夏），整个欧洲几乎都被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占领，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前途难卜，因此，他

觉得他必须保护与他通信的人。但在这些信函的政治内容中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严格来说是机密或隐私的东西。其中许多我在30年代就已看到过(我马上就会解释通过什么途径),因此,在1959年重读它们时,我发现其中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感到惊讶。另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家人之间的通信,甚至有关家务的通信也放在保密部分之中,这些信件为我揭示了他的纯个人的经历和感情,大大地丰富了他在我心目中的人格形象。

前两卷的某些评论家抱怨我对档案的注释不够详细。我只能指出,我所引用的任何一份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文件均在正文或脚注中注明它出自谁的手笔、写于何时、寄给何人。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已经足够了。过于详尽的注解固然可以大大增强我这部著作的"旁征博引",但对那些接触不到托洛茨基档案的一般读者及那些很难得到我提到的任何一份文件的学者来说,则没有丝毫用处。此外,在我撰写了前两卷之后,托洛茨基档案已被重新整理,因而,即便我作了更为详尽的注释,现在也都毫无价值(例如,某份文件原在B部分17号文件夹中,但现在A、B、C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文件完全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我一般都标出了所引文件的日期,在霍顿图书馆提供的编印极好的两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索引》中,学者据此能迅速找到该文件。

个别批评家想知道托洛茨基档案的可信程度有多大,托洛茨基或其追随者是否"篡改过文件"。我认为,内在证据和其他消息来源相互映证,都证明托洛茨基档案是可信的,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能从这个档案中找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它的可信性。托洛茨基不屑于干伪造或销毁文件的事。他的追随者们或是没有兴趣,或是忙于其他事情,未必会去窥视其导师的档案。1950年我夫人和我开始接触托洛茨基档案,我们是最早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

有关本世纪30年代的思想状况和对卷人当时党内斗争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描述，我特别着重利用我作为反对斯大林派的波兰共产主义代言人的亲身经历。我参加的那个团体后来与托洛茨基联系密切。他的国际书记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其中部分是机密的，还有供传阅的托洛茨基书信的拷贝，等等。作为一个作家和争论参与者，我深深地卷入了本卷所描述的所有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大量的政治文献，其中有斯大林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派的，布兰德勒派的，还有各国出版的其他小册子、书籍、期刊和传单。当然，在撰写此书时我能利用的只是这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我验证我的印象与记忆的准确程度、核实日期及引文来说，它们足够了。我的参考书目和脚注并没有穷尽该题材所有文献的奢望。

我十分幸运，能从下述诸位那里得到信息以补充从托洛茨基档案(其他印刷资料)中得到的材料，他们是托洛茨基的遗孀、托洛茨基流亡岁月中最亲密的朋友罗斯默夫妇和让娜·马尔金·德·帕莱尔，后者把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的文件和通信交给我；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时期的秘书皮埃尔·弗兰克；科约坎普的秘书兼贴身警卫约瑟夫·汉森，他是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天和最后时刻的见证人；还有许多在某一阶段追随过托洛茨基的其他人(在上述这些人中，娜塔利娅·谢多娃、玛格丽特·罗斯默和让娜·马尔金在本卷脱稿之前就已不幸去世)。

在托洛茨基的家庭和追随者圈子之外的人中，我要感谢康拉德·克努德森和他的夫人，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时曾住在他们家中；还的赫尔杰·克罗格先生和戴尔夫妇，感谢他们提供这么多有关托洛茨基被拘留和驱逐出挪威的事件的信息和生动回忆。我采访了特利格威·赖伊，当年的司法大臣，允许托洛茨基入境以及将他拘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赖伊先生与我进行了详细的长谈，而且不乏

自我曝光,事后他请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一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衰退,二是他与一位美国出版商签定了协议,协议规定他只能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披露有关信息。赖伊先生好意地将他于1937年提交挪威议会的政府有关托洛茨基案件的报告寄给我。我还有幸采访了H.库特教授,托洛茨基逗留挪威期间,他任挪威外交大臣,他特别渴望能详尽无遗地揭示此案的真相。

在调查研究托洛茨基生平中的另一重要章节时,我曾请教过新近去世的约翰·杜威,他对我阐明了墨西哥反审判的缘由,畅谈了托洛茨基留给他的印象,我感谢S.拉特纳博士,他是杜威的朋友兼秘书,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位老教授决定主持这次反审判的背景材料。在许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中,我还应提及约瑟夫·贝格尔先生,他曾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成员,后来被投入斯大林的集中营关押了25年,贝格尔先生对我讲述了他于1937年在莫斯科布提尔基监狱中与托洛茨基的次子谢尔盖·谢多夫相遇的情况。

我还应感谢俄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特别是M.劳索德和M.D.舒尔曼教授,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方便;还有亚当斯馆馆长R.A.布劳尔博士及其夫人,当我在1959年研究托洛茨基档案的保密部分时,曾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我十分感谢霍顿图书馆的威廉·杰克逊教授和C.E.杰克曼小姐,感谢他们极其耐心的帮助;我还应感谢叶莲娜·扎鲁德娜娅-列文女士帮我阅读了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某些文件。

约翰·贝尔先生,丹先生.M.达文先生及唐纳·泰尔曼先生阅读了我的手稿及校样,提出了批评和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夫人不仅作为一位可靠的助手及批评者对本卷作出了她的贡献,从1950年我们开始一起研究托洛茨基档案以来的许多年中,她全身心地进入这出悲剧的气氛之中,她对这出悲剧的人物极

为同情,因而在描绘他们的性格和叙述他们的命运时,她的帮助是不可取代的。

伊·多·

目　录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将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的局面预先决定了他的未来岁月。人们用不可思议、粗暴无礼的方式将他驱逐出国。当托洛茨基用无数抗议信轰炸政治局、宣称驱逐他的决议是非法的之时，斯大林将驱逐之事延缓了一个星期。似乎是斯大林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或者仍在与政治局商议。最后，猫和老鼠的游戏突然结束：1929 年 2 月 10 日深夜，托洛茨基及其夫人、长子被押送到敖德萨码头，被带上了“伊里奇号”客轮，之后，客轮立即启航。负责押送托洛茨基的人员和港口当局接到了最严厉的命令，尽管时间已晚、海上风暴猖狂、海面封冻，该命令也必须立即执行。现在，斯大林容不得半点儿拖延。“伊里奇号”客轮和业已启动的破冰船是专门派来执行这

一任务的。在这艘客轮之上,只有托洛茨基、他的家属以及两位格别乌的官员,此外没有其他乘客,也没有货物。这样,斯大林最终使政治局面对即成事实,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一切动摇,也避免了他第一次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托洛茨基时发生的场面重演。那时,布哈林提出抗议,朝他挥动双拳,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并和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投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①]

驱逐一事在极度保密中进行。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后,驱逐的决议才予以公布。斯大林惧怕发生骚动。军队调到码头是为了防止示威和大规模的群众性告别场面,一年前,当托洛茨基被流放而离开莫斯科时,反对派曾组织过这种活动。[②] 这次一个见证人也不能有,也不能有任何一个目击者的证词。不能让托洛茨基和大群乘客一起出海,因为那样,他会在乘客的睽睽众目之下进行消极反抗;甚至命令船上的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禁止他们与他接触。整个旅途都处在令人不安的保密之中。斯大林不愿承担此举的全部责任,他还想等待、观望:外国共产党是否会对此事感到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今后事态的发展是否会迫使他把对手请回来。他一心想把这次驱逐安排得模棱两可,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作出体面的解释或彻底否认。在此事发生了几天之后,国外一家共产党报刊作出推测,托洛茨基前往土耳其是为了执行官方或半官方的使命,他自愿来到这里,并带着大批随从。

就这样,托洛茨基突然来到阴暗、空荡荡的客轮上,这艘船将在惊涛骇浪中驶向浩渺无际的天边。甚至在阿拉木图度过了一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周围的空旷仍使他惶恐不安,而格别乌的两名军

①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六章。李可夫当时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继列宁之后担当苏联总理之职。

② 同上,第五章。

宫使它变得更具威胁。它意味着什么？其中隐藏着什么？他身边只有娜达莎和廖瓦，他在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为了躲避狂风和空旷，他们下到了船舱之中，在整个旅途中一直没再离开那里。空旷似乎在追逐着他们。它意味着什么？旅途将如何结束？

托洛茨基作了最坏的准备。他认为，斯大林不会满足于仅仅把他赶到黑海对岸就这么放过他。他怀疑，斯大林与土耳其独裁者基马尔－帕沙合谋反对他，或是基马尔的警察会在轮船上逮捕他、拘留他，或是会秘密地把他交给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白俄侨民，让他听凭他们的报复。格别乌背信弃义的做法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捕风捉影：他曾多次请求格别乌释放他的两个秘书兼警卫——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并允许他们随他一起乘船出国。格别乌不止一次地允诺，但没有兑现。看来，格别乌决定让他独自上路，不让任何一个朋友陪伴他、充当他的警卫。H. 谢多娃写道，最后，在一个车站上，格别乌的全权代表布兰诺夫"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专线传来的答复：格别乌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冷笑着对他说：'反正你们在骗我……斯大林在骗我。'"[1]

在慌乱和绝望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回忆起他们的最后一次海上旅行，那时他们刚刚从一个位于加拿大的英国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乘一艘挪威客轮返回俄国。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家也是这么多人（尽管他的次子谢尔盖当年和他在一起，而现在却不在'伊里奇号'上），但我们都比现在年轻 12 岁。"比年龄差别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反差，可他却对此未置一词。1917年，革命召唤他返回俄国进行伟大的斗争；现在，他被一个以革命

[1]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致格别乌全权代表——公民布金书》1929 年 2 月 7－12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2 卷第 318 页。

的名义统治的政府驱逐出俄国。1917年,在英国集中营度过的那一个月,他天天都要在铁丝网包围的集中营内对大批德国水兵演讲,告诉他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监狱及在战壕中所进行的反对德国皇帝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激起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当他被释放时,水兵们把他扛在肩上抬到集中营大门口,高唱《国际歌》欢送他。[①] 现在,周围是一片空旷和呼啸的风暴。"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已过了10年,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结局莫非注定要像李卜克内西一样。一件无意义的小事描绘出这一反差的荒诞。当"伊里奇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一位格别乌军官交给他1500美元,这是苏联政府送给前国防人民委员的礼物,以便"他能在国外生活"。托洛茨基似乎看到了斯大林嘲弄的冷笑,但他一文不名,只能忍辱把钱收下。这是国家最后一次付给这位共和国之父、它的缔造者的工资。

如果托洛茨基沉湎在对这些悲惨事件的思索之中的话,他就不成其为托洛茨基了。无论环境将会如何,他都毅然面对未来,坚定不移,搏击不已。他不允许自己在虚空中消失。在虚空之后就是尚不知晓的斗争和希望的地平线。过去进入到现在之中,未来中含有过去和现在。黑格尔说过:历史人物一旦完成其"历史使命",他们将精疲力尽,像空壳般地倒下。[②] 托洛茨基与这类历史人物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及事件把他囚禁在真空之中,他将为挣脱这一真空而搏斗。但目前,托洛茨基只能写下他反对驱逐的最后一封抗议信。在旅途结束之前,他把他写给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的信件交给押送人员。他在这封信中谴责斯大林与基马尔-帕沙以及基马尔的"法西斯国家"警察的"阴谋",

① 《武装的先知》第八章。

②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第78页。

并警告迫害者，他们迟早要为他们的“叛卖和无耻勾当”负责。当“伊里奇号”抛锚后土耳其海关人员登上船舷时，他将一封致基马尔的正式抗议信交给他们。仇恨与嘲讽从该文件克制的公函语调中流露出来：“我有幸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敬请总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1]

托洛茨基根本没有指望基马尔会对这一抗议有所反应，他明白，莫斯科那些迫害他的人始终担心有朝一日不得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便那时表明为公正而求助于历史是徒劳的，他也仍将这样做。托洛茨基坚信，他不仅在代表他本人，而且还代表那些被关押或遭流放而被迫沉默的朋友和战友大声疾呼，坚信那个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暴政会使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及革命本身也遭到损害。托洛茨基深知，不论他个人命运如何，他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并在整个20世纪中引起反响。如果斯大林力图压制所有可能的抗议或见证人的话，那么被驱逐的托洛茨基就会挺身出来抗议，并声明他就是见证人。

※　※　※　※　※

下船后，几乎发生了一场闹剧。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径直从码头送到苏联驻君士坦丁堡领事馆中。尽管托洛茨基背着政治犯和反革命的罪名，人们仍怀着对十月革命领袖与红军缔造者的敬意迎接他。领事馆腾出一侧的房屋供托洛茨基居住。领事馆的官员中有不少人在内战时期曾在他麾下作战，他们显然力图使他有宾至如归之感。格别乌工作人员表现得似乎他们把保卫他的生命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7页。

安全视为自己的光荣一样。他们满足托洛茨基的一切愿望,完成他的所有委托。当他留在领事馆中时,他们陪伴娜塔利娅和廖瓦进城。他们关心从阿拉木图运来的托洛茨基的大量档案材料,监督它的装卸并运到领事馆的事宜,根本就没想到检查一下它的内容。殊不知这些文件和材料就是托洛茨基日后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弹药。显然,莫斯科仍试图掩盖驱逐的真相,以减轻其在共产党人眼中的后果。布哈林曾提起斯大林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的天才能力,这绝非偶然。以厘米为单位的缓慢行动达到目的,是斯大林独有的天赋,它甚至也表现在刚刚提到的那类细枝末节中。

在斯大林如何得到基马尔－帕沙的配合上,也能看到这一特点。托洛茨基抵达这里后不久,土耳其政府通知他说,当初并不知道他被驱逐之事,苏联政府只请求出于"健康考虑"为托洛茨基签发入境签证,而出于重视与北方邻邦的友好关系,土耳其政府在不能细究申请动机的情况下发了签证。尽管如此,基马尔－帕沙仍感到难堪,因为人们把他看成斯大林的同谋,他急忙向托洛茨基保证,"在土耳其境内,他永远不会被拘留,也不会成为任何暴力的牺牲品"。他随时可以离开土耳其,愿意留在这里的话,想逗留多久就逗留多久,土耳其政府将尽东道主之职责并保证他的安全。[①]虽然基马尔对托洛茨基如此尊重并怀有好感,但托洛茨基仍坚信,基马尔与斯大林之间有协议,至少,在斯大林提出新要求时基马尔将如何表现是个未知数。他会为一个政治流亡者而冒与强大的"北方邻邦"闹翻的危险吗?

托洛茨基住在苏联领事馆这一微妙的局面也不会长久,斯大林只等一有借口就将它结束。这种状况对托洛茨基来说也是无法

---

① 摘自1929年2月18日君士坦丁堡省长奉基马尔之命致托洛茨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忍受的。在格别乌的"保护"下,托洛茨基实际上仍是囚犯,他不知道应该更怕谁:是领事馆外面的白俄侨民还是领事馆内的警卫。他失去了流亡能给政治斗士带来的唯一好处:活动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他想要阐述他的事业、揭示导致他被驱逐的事件,与他的各国支持者建立联系并为今后的活动制定计划。但在领事馆中他不能做任何这类事情。此外,托洛茨基与其妻子都在患病,他应该挣钱谋生,而他只能靠写作谋生。他应该住到别的地方,以便能与出版商和报界建立联系并开始工作。托洛茨基一到这里便给他的西欧的——主要是法国的朋友和同情者写信,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托洛茨基在抵达君士坦丁堡3天之后便收到了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玛格丽塔·罗斯默夫妇二人的回信,[①] 他们写道:"我们无须对您说,您完全可以指望我们。忠于您、热爱您的罗斯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默夫妇就与托洛茨基一家人成了朋友,他们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运动。20年代初,罗斯默曾任法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后因与托洛茨基观点一致而被法共开除。罗斯默夫妇信中的"忠于您的罗斯默"之语,并非泛泛之谈。在托洛茨基的流亡岁月中,他们始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尽管后来在他们之间也一度有过分歧和争论。鲍里斯·苏瓦林是法国共产党理论报刊的前主编,1924年5月,在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中他是唯一一个为托洛茨基辩护的人,现在,他也给托洛茨基回信,表示愿意帮助他、与他合作。[②] 其他同情者还有莫里斯·帕兹(Maurice Paz)夫妇,丈夫是法学家,妻子是记者,他们二人都被法共开除,后来,他们成了著名的社会党议员。他们在信中称他为"伟大的朋友",并对他在土耳其的复杂处境深感不安,他们千方

① 罗斯默夫妇与托洛茨基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苏瓦林致托洛茨基,1929年2月15日;同上。

百计为他争取其他国家的入境签证,并答应马上前往君士坦丁堡。[1]

通过罗斯默夫妇和帕兹夫妇,托洛茨基与西方报界建立起联系。2月下半月,当时他还住在领事馆,他的系列文章就已在《纽约时报》、《每日快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该系列文章是首次公开发表的托洛茨基有关近年来及近几个月来党内斗争的论述。论述简洁有力,充满进攻精神。托洛茨基对其新老敌人和对手毫不留情,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斯大林,现在他像以前在政治局那样在世人面前指责后者,称其为"革命的掘墓人"。[2] 在这些文章问世之前,领事馆的头头们找托洛茨基的麻烦,逼他离开领事馆的办公用房,搬到领事馆工作人员居住的地区,在那里他仍将处于格别乌的"保护"之下。托洛茨基拒绝搬出,这一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文章发表。此事引起了冲突。现在,斯大林有了公开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国的必要借口。苏联报刊纷纷指责托洛茨基"投靠国际资产阶级、策划反苏阴谋"。苏联漫画家们丑化、嘲讽他为"托洛茨基先生",画他抱着一个内装25000美元的口袋。格别乌宣布,不再负责他的安全,并准备把他赶出领事馆。[3]

娜塔利娅和廖瓦连续几天在格别乌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四处奔走,以便在君士坦丁堡郊区找一处较为安全的单独住宅。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栋房子,但不是在城内,也不是在郊区,而是在位于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上。客轮从君士坦丁堡驶到这里要用一个半小时。匆忙中恰恰在这里选定住宅带有几分可笑的色彩,因为王子群岛当年曾是拜占庭皇帝流放有皇族血统的竞争对

① 莫里斯·帕兹致托洛茨基,1929年2月18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原文所标日期为1929年2月25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托洛茨基与格别乌驻君士坦丁堡代表之间的通信,3月5日和8日;同上。

手的地方。托洛茨基于3月7日来到这里。当他登上王子群岛最大的村庄——比尤克·阿达村的海岸时,他认为他不会久居此地。谁知在充满了种种事件的漫长的4年多的时间内,王子群岛一直是他的家。

※　※　※　※　※

托洛茨基经常把他一生中的这一时期称为第三次侨居。这一不很确切的界定很能说明他来到王子群岛时的情绪。他是第三次被政府驱逐并不得不侨居国外,这是事实。但在1902年和1907年时,他是从西伯利亚和靠近北极圈的流放地区潜逃到西方避难的。那时,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属于一个巨大、积极、富有生命力的团体,它是处于流亡中的革命俄国的代表。这次,他被迫侨居国外,而在国外没有俄国流亡团体把他当做自己的一员来迎接他和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提供经费,创造条件。也有许多新的政治侨民聚居点,但它们构成了处于流亡中的反革命俄国。内战的鲜血把托洛茨基与他们隔开。而在那场战争中曾在他麾下英勇奋战的人中,却没有一个人能与他联合起来。

因此,托洛茨基的第三次侨居与前两次有明显的不同。这次侨居可谓史无前例,因为在漫长广阔的政治侨居史中,难得有人注定要陷于孤军奋战的状况之中,只有拿破仑除外,但他是战俘。托洛茨基把这次流亡与战前那两次流亡相提并论,是下意识地为自己和家人减轻它的严酷性。有关的回忆使他感到安慰。托洛茨基侨居的第一阶段延续了不到3年,它被创造奇迹的1905年打断,第二阶段要长得多,它长达10年之久,但接踵而来的是1917年的盛大凯旋。每次,历史都对革命者在国外不安的期待给予慷慨的奖赏。期待历史的重演难道不对吗?但他深知,这次的前景可能

不那么光明,他可能永远不能返回俄国。但是,比这种认识更强烈的是他对鼓舞人心的清晰前景的需要和战士的乐观主义,他甚至在失败或注定失败的斗争中仍期待着胜利。

这种乐观主义始终未离开过托洛茨基。如果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仍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虽然他可能活不到那一天,那么在流亡的头几年中他的乐观主义更具富有个性特征的色彩。他确实期望很快就会宣告他无罪并请他返回俄国。他不认为那里的政治局面是稳定的,他在那摧毁一切的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激变中期待国家的剧变会引起执政党中的重大变动。他不相信斯大林主义会坚如磐石。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各种互不相容的思想的大杂烩、官僚主义的夸夸其谈,它并不敢解决它所面临的课题。他深信,斯大林上升的"间奏曲"必将结束,其结果不是革命精神或布尔什维主义复苏,就是反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如此刻板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宰着托洛茨基的思想,尽管有时他也考虑过其他可能性。他认为他自己及其志同道合者是斯大林的唯一严肃的反对派,它植根于十月革命的土壤之中,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并组成另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他没有料到斯大林能够消灭反对派或迫使它长期沉默。在这方面,革命前的经验支持着他的希望。虽然沙皇政府将革命者投入监狱、流放、处决,但它未能将反对派扼杀。斯大林毕竟还没有处决他的对手,那么他怎么能在沙皇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呢?当然,反对派在斗争中有得有失,但是,由于它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所以它是消灭不了的。身为公认的反对派领袖,他有责任在国外指导它的活动,就像当初列宁和他本人在流亡中领导俄国国内的同志们一样。现在,只有他一人能够相对自由地以反对派的名义讲话,只有通过他,它的声音才能传到人们的耳中。

但在其他方面,托洛茨基的处境与革命之前迥然不同。那时,

他还默默无闻，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俄国革命者。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次，他不是从隐蔽幽暗的地下活动中再露峥嵘。他是举世公认的十月起义的领袖、红军的缔造者、其胜利的设计师，是共产国际的鼓舞者。他蹬上了顶峰而且不该再从那里下来。他在历史照明灯光中的国际舞台上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但他不能下台。他的过去支配着他的现在。他不能重温革命前的侨居生活，那时，他因尚未出名而没有危险。如今，托洛茨基的事业震撼了整个世界，无论他本人还是这个世界都将对此永志不忘。

同样，托洛茨基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俄国的事务之中。他牢记自己的“共产国际义务”。前几年的大部分斗争都与德国、中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相关，与莫斯科使用的方法相关，斯大林一伙为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些方法阉割共产国际。很难设想他会停止这一斗争。乍看起来，被驱逐出国有利于他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和斯大林派、布哈林派的“狭隘民族性”的批评者而在俄国不得人心，那他有充分理由指望这会引起外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响，因为他们最关心他能否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们赞成国际主义世界观，反对在一国之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构想。在莫斯科和阿拉木图，托洛茨基都不能直接与外国共产党员接触，斯大林千方百计地使他们对他的观点一无所知或让他们得到的是经曲解的他的观点。现在，强行把他驱逐出国，使他有可能直接对他们阐述自己的立场。

托洛茨基仍像以前一样认为先进的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在这方面，他始终忠于自己和高纯度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事实上，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流派，甚至连斯大林派也不敢公开地拒绝这一传统。无论对于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西欧始终都是主要活动区域。德国共产

党和法国共产党拥有大量支持者,而苏联的工业还很落后、弱小,中国革命离胜利还有20年之遥。按照斯大林的观念,即便处在衰落阶段的资本主义欧洲仍是国际政治中心,西欧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仅次于苏联的最重要的力量。而在托洛茨基的概念中,它却起着重要得多的潜在作用。

当然,托洛茨基不相信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当他来到王子群岛时,西方20年代末的"繁荣"已接近尾声。但是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仍在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阶级合作的阳光下悠然自得,仿佛永无止境的繁荣已有了充分保障似的。看来,议会制政府已经站稳了脚跟,而笼罩着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欧洲政治中的例外。但是,在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头几天,托洛茨基就声称这种虚幻的和平已接近尾声,在谈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落和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强大时,他说:"在欧洲政治发展中的上述战后趋势不是偶然的,它们是通向新时代的血腥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我们推进到极其紧张和伟大的斗争的时代。新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投下了阴影。……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用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19世纪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断扩展的典型的时期。20世纪与19世纪大相径庭,其差异程度较之我们这个时代与中世纪的差别更甚。"[①] 他意识到,他在历史重大转折的前夕回到了欧洲,这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为西欧人民提供一个可以与法西斯主义抗衡的积极选择。托洛茨基相信,西方的革命同样也能使苏联摆脱孤立,并能强有力地对抗压抑着俄国革命的落后的重负。这个希望并非纯属幻想。西方工人运动保存了它的群众组织,虽然它的士气低落,但并未丧失斗志,而且仍可以进行战斗。欧洲各国共产党尽管有种种失误和缺点,但在它们的队伍中仍不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47页。

乏工人阶级的先锋。托洛茨基总结说,必须使先锋擦亮眼睛,让他们看到危险和机会,激励他们勇于承担责任,震撼他们的良心,推动他们参加革命工作。

这种观点既针对现实,也针对他本人的过去,它决定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的特殊角色。他扮演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的中介角色,斯大林把这二者降低为教条堆砌和官僚集团的神话。托洛茨基给自己制订任务:恢复马克思主义,用它的批判精神鼓舞党员群众,以此作为有效的革命活动的基本先决条件。除列宁之外,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都不具有托洛茨基讲话的道义权威,他是作为理论家和战无不胜的革命统帅获得这种权威的。目前,托洛茨基陷入不可调和的敌意的重围之中,又与由革命诞生的国家处于冲突之中,他的活动条件的艰苦卓绝是无以伦比的。

托洛茨基有足够的,甚至是绰绰有余的勇气和精力,而这些是他扮演这个角色和与这样的困难作斗争所不可少的。他所遭受的所有惨重失败不仅没有压抑他那战士的天性,反而使它发展到顶点。他那巨大的理性和心灵的激情总是那么强烈,现在变成了悲剧性的精力,它与米开朗琪罗作品中鼓舞先知和立法者的精力同样强大、同样崇高。这种道德精神保护着他,使他不至于沉湎于个人悲剧之中。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有自怜的暗示。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年中,他在其自传的结尾处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悲剧",他说的是实话。他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的只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潮起潮落,至于他是在权力的巅峰抑或作为流亡者战斗,对他并不起作用,这一差别不能摧毁他对其事业和对他本人的信心。某位批评家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昔日的军事人民委员仍保持其思维的清晰和全部力量,听到这种说法,托洛茨基只是对在"判断力和政府职务之间建立联系"

的庸俗企图加以嘲笑而已。[1] 只要他能集中自己的力量,用它们为自己的思想服务,他就能感到生活的充实。现在,虽然身处逆境,他仍准备这样做。他对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比对其后遭到的失败记得更清楚,这有助于他保持自信心。他深知这些胜利是永恒的,他的生活使他升华到如此的高度,他的衰败也不能使它失去光彩,任何人间的力量也不能使他离开这个高度。尽管如此,悲剧还是冷酷地、一步步地向他逼来。

※　※　※　※　※

古时候,被流放到王子群岛的历代拜占庭皇帝们的兄弟或表兄弟们在群岛的沿岸区域过着悲惨的生活。30 年代初,这里可能仍像古代那样荒凉。它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囚禁王公的场所。群岛由清一色的红色岩石构成,它俯在暗蓝色的海面上。“比尤克·阿达村紧挨着大海,像一只正在饮水的史前野兽”。[2] 在夕阳的余辉中,岛屿的红颜色愉快地闪烁,好像在宁静的天空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后来,颜色变了,变成了愤怒的深红色,这种色彩是抛向遥远、看不见的世界的孤独的挑战,直到岛屿最后悄然地沉浸在黑暗之中。岛上的居民不多,都是渔民和牧人,他们像他们千年前的祖先一样,生活在红色土地和蓝天之间,“村中的墓地似乎比村庄本身更有活力”。[3] 岛上的宁静从未受到过汽车喇叭声的惊扰。只有驴叫声从岩石和田间传到主要的街道上。群岛每年中只有几个星期遭到喧闹凡俗的人群的践踏,到这里来消夏的君士坦丁堡商人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2 卷第 336 页。

② 马·伊斯特曼:《伟大的同事》第 117 页。

③ 摘自 1933 年 7 月的托洛茨基日记(未发表),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及他们的家属布满了海滩和陋室。然后，宁静重返这里，只有驴叫声欢迎着美好秋天的悄然来临。

在比尤克·阿达村外，坐落着托洛茨基的新避难所，它被围在高高的栅栏与海洋之间，与村庄完全隔绝，与之没有任何往来，正如该村与外部世界不相往来一样。这是从一位破产的帕夏（土耳其高级官衔）手里租来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大别墅。当新房客来到别墅中时，里面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许多年之后，托洛茨基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娜塔利娅挽着袖子，兴致勃勃、起劲地打扫卫生，并迫使丈夫、儿子和她一起干。他们清除了垃圾，把墙刷白，然后用一种价格低廉的涂料刷了地板，几个月之内，鞋底总往地板上粘。房子中央是一个大厅，穿过大厅的门可以走上对着大海的凉台。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在二楼，很快，办公室的四壁都摆满了从欧美来的书籍和报刊。在一楼有廖瓦领导的秘书处。一位来访的英国人这样描写这栋房子："熏黑的大理石、可怜的青铜孔雀、黯然失色的镏金暴露了那位土耳其房主的社会追求，也揭示了他的没落。"这些旨在保持退休帕夏的舒适和体面的褪色装饰与现在主宰这栋建筑物的斯巴达精神形成喜剧性的对比。[①] 马克斯·伊斯特曼来到这里时，别墅中已满是秘书、警卫和来访者。他因它缺少舒适的家具和装饰而把它比做一无所有的军营。"在几间巨大的房屋里和阳台上，没有任何家具，甚至连把椅子也没有，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过道，房门都是内外加锁。在每个房间中或是摆着办公桌，或是摆着床，或是二者都有，但人进去时都要带着椅子。一楼有一间四方的屋子，四壁刷得雪白，里面勉强能放下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是饭厅。"这位有享乐主义倾向的美国访问者暗想，"只有对审美

---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31 年 3 月 17 日，另见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巴黎 1953 年版）撰写的前言和附录。

完全无动于衷的男女"才能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生活，"虽然花不了几个美元他们就能把这栋别墅变成赏心悦目的住宅"。[①] 当然，在这所住宅中没有美国中产阶层住宅中的舒适。即便在正常情况下，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也未必会想到"花几个美元"买几张画来使他们的住宅变得"赏心悦目"，而他们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从来就不正常。他们滞留在这里的那几年，似乎一直是在码头上的旅客休息室中寻找将载他们离开此地的轮船。别墅周围的花园杂草丛生，一派荒芜景象；无人管理侍弄它，这是为了"节省开支"，娜塔利娅对一位来访者这样解释说。而后者似乎期望托洛茨基会着手开垦他那块小小的土地。为了进行殊死斗争，人力和资金都应该节省，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比尤克·阿达村的住宅是临时司令部，宅邸的整洁和极端严肃的气氛正符合它的使命。

※　※　※　※　※

托洛茨基从抵达海岛之日起就一直不能容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他担心成为格别乌和白俄侨民的囊中之物。别墅大门口有两位土耳其警察站岗。但他未必能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他们。他几乎一到这里就开始为获得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而忙碌，在其自传的最后几页中，对这些活动作了部分描写。[②]

在离开敖德萨之前，托洛茨基请求政治局帮他申请去德国的签证。政治局答复说，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绝签证。托洛茨基几乎认定这是斯大林在欺骗他，因此，在得知德国国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罗·赖柏(Paul

---

① 马·伊斯特曼：《伟大的同事》第117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8－333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Loebe)宣布德国将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权后，他立即申请签证。“社会民主党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这一情况，即拥护革命专政的人被迫在民主国家中寻找避难所”，这也不能使他放弃在欧洲寻找避难所的尝试。报刊纷纷写道，这一课将教会他“更高地评价民主制”。但这一课没上成。德国政府先是问他是否同意接受某些行动限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打算“完全与世隔绝”，住在柏林之外，不参加任何群众活动，只从事写作。然后又问他是否能满足于只在德国接受短期治疗。托洛茨基回答说，由于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时，德方又通知他，政府认为他尚未病到非要德国医生治疗不可的地步。“请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人墓权？……在几个星期内，民主原则打了 3 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居留权，后来变成就医权，最后变成人墓权。但这意味着，我只有在死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的优越性。”

1929 年 2 月，英国下院就允许托洛茨基入境一事进行了辩论。政府指示不允许他入境。英国大选在即，工党可望重新执政。4 月底，费边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先生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人来到君士坦丁堡，毕恭毕敬地求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尽管过去与他们在政治上敌对，但仍客气地接见了他们，并如饥似渴地向他们了解英国的经济政治状况。韦伯夫妇坚信，工党将在选举中获胜。托洛茨基指出，届时他将申请赴英国的签证。西德尼·韦伯表示遗憾说，工党政府在下院尚有赖于自由党的支持，而自由党人是不会同意托洛茨基入境的。几星期后，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果然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内阁，西德尼·韦伯作为大臣入阁，此后改称帕斯菲尔德勋爵。

6 月初，托洛茨基致函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领事馆，正式申请麦克唐纳内阁的签证。他还给比阿特丽斯·韦伯夫人写了信，该信文

风优雅,风趣地提到了他们在王子群岛上有关英国,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如何使他着迷的谈话。托洛茨基还致函财政大臣菲利浦·斯诺登(Philip Snowden),声明说,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他访英,就如当年他在台上时它们未曾妨碍斯诺登访俄一样。托洛茨基还致电乔治·兰伯里(George Lansbury):"我希望很快能对您在基斯洛沃斯克对我的拜会进行回访。"[①]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不过,反对他入境的根本不是自由党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对工党内阁大臣们的立场,劳合·乔治和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曾多次亲自为托洛茨基斡旋。[②] 托洛茨基评论说:"韦伯先生未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几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这一问题经常在上下两院中和报刊上提起。威尔斯和萧伯纳分别发表声明,反对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J.M.凯恩斯(J.M.Keynes)、C.P.斯科特(C.P.Scott)、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D.L.哈文(D.L.Garvin)、伯明翰主教,还有许多其他人都呼吁政府重新审查其决定。但政府对这些抗议和呼吁都置之不理。托洛茨基指出:"这次以民主制及其原则为题的独幕喜剧……可能是萧伯纳写的,如果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费边社血液中注入哪怕是5%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血液。"

这次,萧伯纳虽然没有极尽其讽刺之能事,但也是尽力而为了。他向内务大臣克莱因(Clynes)指出,"工党的社会主义政府拒

① 申请、电报和信件的拷贝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的保密部分中。他致韦伯夫人的信是在"罗斯默的帮助下"用法文写的,信中谈到:"我常满意地回忆起你们的来访,它使我惊喜,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观点不同,但与韦伯夫妇的交谈告诉我,即便研究过工联主义经典历史的人,在与它的作者会晤中仍能受益匪浅。"

② 在谈及英国对他的魅力时,托洛茨基提到"他昔日对大英博物馆之恋"。托洛茨基的英国通讯员使他对这些事件了如指掌,后者是赫伯特·塞缪尔的堂兄弟,他直接从塞缪尔那里得到消息,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英国卷宗。

绝为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提供避难权，拱手把他送到最反动的对手手中，使自己沦为笑柄……如果政府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那么，它最好也能迫使他沉默。……但谁也不能迫使托洛茨基先生沉默。他那杰出的文学才能和由其非凡的人生道路奠定的他在当今世界公众想象中的地位使他有可能利用任何一个迫害他的企图。……他会成为任何一国极左翼好斗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那些"对他像对关在笼子里的狮子那样怀有不理智的恐惧"的人，应允许他来英国，"哪怕只是为了把笼子钥匙拿在手里"。萧伯纳把基马尔－帕沙的行为与麦克唐纳的行为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土耳其政府给英国政府做出自由的榜样，这一事实令人难堪。"[①]

欧洲其他政府对把"关他的笼子的钥匙拿到手中"也没有更大的热情。法国政府翻出了 1916 年驱逐托洛茨基出境的命令，声称它至今仍然有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开始时表示准备接待托洛茨基，在马萨里克(Masaryk)政府中担任部长的社会主义者路德维格·捷赫博士称托洛茨基为"尊敬的同志"，他通知托洛茨基，贝奈斯(Benes)同意发放签证。但通信以冷淡的拒绝签证告终，也没有解释拒绝的原因，"同志"一词也换成了"先生"。[②] 荷兰当时正为威廉二世提供避难权，却拒绝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致玛德莱纳·帕兹(Magdeleine Paz)的信中嘲讽道，因为他对荷兰语一无所知，荷兰政府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卷入荷兰内政，他愿意隐姓埋名住到最偏僻的村庄。[③] 奥地利政府也不愿为其他政府"树立自由主义的榜样"。挪威政府宣布，它不允许托洛茨基入境是因为不能保证他

---

① 摘自萧伯纳致内务大臣克莱因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萧伯纳还与外交大臣汉森谈话，但后者"拒绝介入此事"。

② 托洛茨基与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长捷赫博士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③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的安全。托洛茨基的朋友们甚至还向卢森堡大公国政府提出申请。托洛茨基发现,“欧洲是没有签证的大陆”。他甚至没想向美国政府申请,因为“它不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胆怯的国家”。他得出结论,“欧洲和美洲都没有签证”,“但这两个大陆主宰着其他大陆,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签证的星球”。“人们从各个方面对我解释,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我的主要罪孽。但当我提出申请,要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实物教学课时,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课的人。”①

此事的底蕴在于,托洛茨基即便在流亡中仍使人感到恐惧。各国政府及各执政党要让他明白,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向各现存政府挑战、怀疑神圣的私有财产权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欧洲资产阶级惊喜地观看这场戏,自从拿破仑失败后,它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从那时起,还没有这么多政府共同排斥一个人,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引起如此巨大的敌意或恐惧。② 保守主义者不能饶恕托洛茨基,因为他粉碎了“14 个国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远征”。这次十字军远征的鼓动者温斯顿·丘吉尔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达了这种感情,他在其一篇题为《欧洲的食人恶魔》的文章中幸灾乐祸地写道:“托洛茨基那张眉头紧锁的脸曾使数千人惨遭横死,现在,他像一堆破抹布一样被抛到了黑海岸边。”经过思考之后,当他把这篇文章收入《当代伟人》一书时,用“歹毒的托洛茨基”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2 卷第 333 页。

② 托洛茨基写道:“据报纸报道,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表示,只要把托洛茨基枪毙,第二天就可以(在英国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关系。这一简洁的公式不久就会给这位保守党大臣带来荣誉……但我斗胆劝他别坚持这一条件。斯大林将我驱逐出苏联,已充分表明他是多么愿意迎合张伯伦。如果他没有走得更远,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么做。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而惩罚苏联经济和英国工业,确实不大理智。”《托洛茨基文集》第 1 卷第 27 页。

代替“一堆破抹布”这几个字。托洛茨基在黑海岸边发表的头几个政治声明表明，他仍是现存制度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仍像当年指挥红军冲锋陷阵或在共产国际讲坛上向全世界演讲那样具有挑战性，那样自信。他当然不是“一堆破抹布”，他是个“歹毒的人”。[1]

对使布尔什维克分裂的有争议问题的无知加剧了仇恨和恐惧。那些有影响的报刊迷惑不解，它们怀疑驱逐托洛茨基是苦肉计，认为他与斯大林达成秘密协议，出国搞革命。《泰晤士报》据“可靠消息”证明事情确实如此，它发现托洛茨基插手德国共产党人的示威游行。[2]《晨报》报导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进行过旨在使后者重任红军首脑的秘密谈判，还罗列出许多细节；并说该报得知，托洛茨基的姐姐为此在莫斯科、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往来穿梭。[3]《每日快报》谈到“这只栖息在英国社会主义树杈上大乌鸦时”说：“尽管它已爪断翅折，它也不是那类我们指望能在英国驯养的鸟。”[4]《曼彻斯特卫报》和《观察家报》带有几分同情地支持托洛茨基要求政治避难的申请，但它们势单力薄。美国报刊认为，托洛茨基是“煽动革命的人”，而斯大林则是美国可以与之搞贸易的“温和的国务活动家”。[5] 德国右派和民族主义报刊由于狂怒而声嘶力竭，《柏林交易

---

① 丘吉尔：《当代伟人》第197页。丘吉尔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为了答复托洛茨基为《伦敦周报》所写的文章。托洛茨基在评论丘吉尔的一篇描写列宁的传记性随笔时指出，丘吉尔把大部分日期都搞错了，这表明他对列宁的性格一无所知，因为丘吉尔与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列宁用时代和大陆的术语思考问题，丘吉尔则用议会激情和小品文的词汇思考问题。”

② 《泰晤士报》1929年5月10日。

③ 《晨报》1929年7月6－8日，许多欧洲报刊转载了这篇报导。

④ 《每日快报》1929年6月19日。

⑤ 《纽约美洲报》和《纽约世界报》1929年7月27日。《纽约世界报》写道：“斯大林是个明智的俄国人，他懂得政权没有金钱就一无所能，因此他看重金钱”；“保守的美国政府应对这点感兴趣”。

所报》声称:"德国的灾难够多的了……我们认为无须为接待这位布尔什维主义最得力的鼓吹者而增加我们的灾难。"[①] 希特勒的报纸《观察家报》写道:"托洛茨基是苏联犹太人的密探,他想定居柏林,我们应密切注视这个犹太杀人犯的动向。"[②]

各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从其民主良心的角度虽都有几分不安,但恐惧更厉害。当乔治·兰伯里在内阁会议上就政府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提出抗议时,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让他呆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偏僻的地方吧,他要是到了其他地方,对谁都没好处,我们都怕他。"[③] 比阿特丽斯·韦伯对托洛茨基的智力和"英雄性格"赞叹不已,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丈夫和我都因不允许您进入大不列颠而感到十分惋惜。但我担心,任何一个宣传不断革命的人,即把革命战争带入其他国家政治中的人,永远不能进入这些国家。"[④] 从历史上看,并非完全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侨居英国,"宣传不断革命论"。但时代不同了,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默默无闻的政治侨民一跃成为革命领袖、然后再被驱逐,这是他们的有幸和不幸之处。托洛茨基对于他所激起的这种感情并不十分惊讶。他再也不想像帕兹夫妇建议的那样通过外交途径得到签证了。但他也不愿意拐弯抹角或克制自己

① 《柏林交易所报》1929年2月1日。

② 1929年2月9日。更有影响的《汉堡新闻》于1929年1月25日声称:"斯大林没有把托洛茨基及托派匪帮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他将为这一错误吃尽苦头。"

③ 这一消息来自兰伯里本人。他把此事告诉托洛茨基的英国通讯员,并对后者保证说,他将反对内阁决议,"我将把我在幕后所做的一切都通知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④ 比阿特丽斯·韦伯于1930年4月30日写下这封信,感谢托洛茨基赠她《我的生平》一书,在此信的结尾处,她表示愿意为这位"富有爆炸性的鼓动家"提供书籍、杂志和文件。

不发表公开声明。[1] 托洛茨基甚至在寻找避难所期间也仍继续进行思想斗争。他深知，各国政府和各执政阶级以其惧怕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能把他当做普通的请求者，而把他看成战斗的革命法典及其体现。

※　※　※　※　※

托洛茨基没有坐等无数次签证申请的结果就着手工作了。在他来到王子群岛后的头几个星期，这里就变得热闹非凡：各大洲的记者蜂拥而至，对他进行采访，许多朋友专程前来看望。仅 5 月一个月中，从法国来了至少 7 人，他们之中有人在这里住了几周，有人住了几个月。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到这里担当警卫和秘书。德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也来了，他们来签订出版合同并预付稿酬。各国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纷纷来信，就政治思想问题向他求教。托洛茨基系统详尽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用了无数的信纸。很快，他的通信就达到了极大的规模，此后，不论情况如何，他都坚持这一工作，直到生命结束。托洛茨基筹备出版第一期《反对派通报》。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期刊，它于 6 月份问世。《反对派通报》成了托洛茨基评论党内事件的最主要的讲坛，也是他与苏联境内反对派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在比尤克·阿达村搞出版是件难事，就连在巴黎和柏林找一个《反对派通报》的俄国发行人也不容易。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着手进行把各国支持者组织起来的工作。

此外，托洛茨基在来到王子群岛后的头几个月中就开始准备几本书的出版事宜。他想让世界了解 1927 年联合反对派的纲领，这本书以《俄国真相》为名出版。托洛茨基收集了在苏联被禁的文

① 玛德莱娜·帕兹致托洛茨基，1929 年 6 月 14 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件,把它们编成《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收入了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文,还有他从阿拉木图寄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那封信。上述材料的删节本当时已在国外问世,其中有不少歪曲之处;这也是托洛茨基急切要出版完整、准确的文献的另一个原因。《不断革命论》这本小册子也是在阿拉木图写成的,该书旨在与拉狄克的争论中肯定并捍卫这一理论。

但这一时期写作工作的主要成就是回忆录《我的生平》。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请求他写自传的朋友的坚持下,他在阿拉木图时就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前几章,叙述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而在王子群岛上,这项工作飞速进行,他把写好的章节寄给德国、法国、英国的译者。托洛茨基写作如此神速,以至令人怀疑他在阿拉木图是否仅仅写了几章。在抵达比尤克·阿达村将近3个月时,托洛茨基给住在维也纳的俄国老革命家克利亚奇科夫(Клячков)一家写了封信,他们的友好关系始于1914年。他在信中写道:"我仍沉浸在撰写自传之中,不知如何摆脱它。我早就能把它写完,但讨厌的学究气使我无法结束这一工作。我反复修改,核对日期,这儿删去一些,那儿增加一些。我不止一次想把手稿付之一炬,以便着手进行更严肃的工作,可惜现在正值夏季,炉子里没有火,更何况这栋房子里根本就没有炉子。"[①] 5月,托洛茨基给德文译者亚历山德拉·拉姆(Александра Рамм)[②] 寄去了该书的大部分手稿,几个星期后,她就收到了记述内战的章节。但在7月,

---

① 此信写于1929年6月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亚历山德拉·拉姆是俄国人,嫁给德国人弗兰茨·普菲姆菲尔特,后者是激进的《行动日报》的发行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普菲姆菲尔特作为"极端激进分子"被开除出党。当时托洛茨基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尽管普菲姆菲尔特夫妇与托洛茨基有政治分歧,但仍是他终身不渝的挚友。

"讨厌的学究气"再度支配了托洛茨基，他又动手重写回忆录的头几页。该书于初秋时脱稿，它的部分章节已在多家报刊上连载。当托洛茨基还在勤勉地修改德文和法文译文时，他已着手准备撰写《俄国革命史》一书了，11月底，亚历山德拉·拉姆就已收到了该书的前几章。

甚至在写作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托洛茨基仍挂念着留在"国外"的子女、外孙及朋友们。当他对尼娜的弥留和死亡还记忆犹新时，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长女季娜的病又使他焦虑不安。托洛茨基通过巴黎打听季娜的情况，帕兹夫妇在那里通过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中的同情者与托洛茨基留在莫斯科的亲人保持着联系。季娜身受肺结核病的折磨，妹妹之死，父亲遭迫害，丈夫普拉东·沃尔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养活自己及两个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损害了她的神经。她请求当局允许她出国与父亲团聚，但无结果。托洛茨基在经济上帮助她，他的同情者也为苏联政府批准她出国一事斡旋。季娜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住在列宁格勒，还允许她在那里居住多久都无法预料。她照料着尼娜留下的几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曼－涅维尔松也遭流放，现在被关押在监狱之中。这还不是全部。廖瓦的妻子和孩子仍留在莫斯科听凭命运的摆布。如此算来，托洛茨基的亲人中至少有4家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家破人亡。每周都传来消息：朋友们遭迫害、闻所未闻的残酷折磨、监狱中的疾病、半饥半饱的生活、与看守的冲突、绝食、自杀和死亡时有所闻。托洛茨基全力以赴地对此提抗议，他特别反对对拉柯夫斯基的迫害，后者不久前还是在西方知名度最高、最受尊敬的苏联大使。拉柯夫斯基被从一个流放地转到另一个流放地，他患着严重的心脏病，托洛茨基已经好几个月没得到他的消息了。

托洛茨基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他的担忧、痛苦和疲劳。他以顽强的工作、与朋友和支持者的交往消除忧愁，用划船和在洒满阳

光的马尔马拉海中捕鱼来缓解紧张的工作。即便休息时他也不能无所事事。他需要不断地消耗他的精力。像在阿拉木图时一样，托洛茨基每次出海打鱼时都兴师动众。他们驾驶几条大船出海，带着许多渔网和充当锚的石块。托洛茨基在两个土耳其渔民的陪伴下在海上漂流很久，这两人逐渐成为托洛茨基一家的朋友。他和他们一起干活：拉网、拉石块、提装鱼的篮子。(伊斯特曼对托洛茨基的"休息观"不以为然，他惊讶地说："当他出海打鱼时，也是那么紧张、敏捷、有条不紊，为获得成功而运筹帷幄，正如同他当年前往喀山粉碎白军一样，这是否有点儿小题大做了。"[①])托洛茨基不会节约他的体力和智力。显然，慢性病也不能摧毁他的生命力。有时他独自一人出海，久久不归，引起家人和秘书的不安。他的一个忠实信徒有一次来到这里时正值这种时刻，他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怕格别乌，它可能在海上设下陷阱。托洛茨基以十足的宿命论的口吻回答说，格别乌如此强大，如果它想干掉他，那他在劫难逃，只能束手待毙。因此，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自我囚禁、剥夺自己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自由和生活的色彩及情趣。[②]

① 马·伊斯特曼：《伟大的同事》第117页。

② M.巴黎冉宁生动地描绘了他在小亚细亚水域中与托洛茨基一起捕鱼的经历："他力求捕到更多的鱼……可以感到他内心的满意……他对自然了如指掌。"深夜，他们遇到了猛烈的风暴，小船几乎沉没，陪伴他的土耳其宪兵吓得直哭。但托洛茨基镇定地划桨，精神抖擞地与海浪搏斗。他异常平静，对同伴关心备至而且十分幽默，巴黎冉宁不由得想到："别害怕……凯撒与你在一起，他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他们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找到一间匾室，躲了进去。第二天早晨，他们没有食物，打了两只野兔充饥。巴黎冉宁第一枪打伤了一只野兔，又补射一枪把它打死。托洛茨基说："猎人是不会这么干的，不能打死受伤的动物。"这时，土耳其当局开始寻找他们，几个农民救了他们。托洛茨基接受了帮助，回忆起谢德林的故事来解嘲，故事讲的是两位俄国将军来到无人居住的荒岛上，连食物都不会找，其中一个叹了口气说："唉，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农夫就好了！"真是太巧了，很快就来了一个农夫，眨眼间就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好了。(巴黎冉宁：《托洛茨基或被驱逐

托洛茨基初来土耳其时的担忧已部分消除。土耳其人彬彬有礼,乐于帮忙。基马尔-帕沙信守诺言,尽管托洛茨基目前仍不信任他。站在别墅大门口担任警卫的警察对它的主人也十分友善,完成托付给他们的事情,还帮助做家务,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似的。白俄侨民并未企图潜入到高高的栅栏之内。就连格别乌都似乎远在天边,对托洛茨基毫无兴趣。但是,这些表面现象都是欺骗性的。格别乌近在咫尺。格别乌的特务经常以托洛茨基的热忱支持者的面貌出现,以秘书或警卫的身份潜藏在他的身边。娜塔利娅写道:"拉脱维亚人弗朗克(Франк)在王子群岛上住了5个月,后来我们得知,他和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索博列维丘斯(Соболевичус)一样,都是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索博列维丘斯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弟弟罗曼·威尔〔Roman Well〕是在巴黎和中欧反对派圈子里活动的奸细)。"[①] 灾难在于,被揭穿的奸细事实上并不总是真正的奸细,同时,最危险的特务却未被识破。例如,30年后,索博列维丘斯被指控为苏联特务,在美国受审,他供认当年曾在王子群岛对托洛茨基搞过特务活动。[②] 然而,他与托洛茨基的书信往来及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情况给他这份供词上投下可疑的阴影。索博列维丘斯屡次公然表明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之后主动与后者决裂,而奸细是不会这么做的。托洛茨基指责他为斯大林分子,但始终不相信他是奸细。不

的革命》,载《谦虚人杂志》1934年5-6月合刊。

① V.塞尔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01-202页。

② 《美国参议院调查国内安全机构的小组听证会》华盛顿1958年版,第4875-4876页。索博列维丘斯以"杰克·索博尔"这个化名在听证会上作证。他在与托洛茨基通信时用笔名谢宁。其弟索博尔医生也受到指控,他于1962年从美国逃往以色列,但那里拒绝为他提供避难权,于是被遣返美国,途经英国时,他两次自杀,在伦敦去世。

论事实真相如何,在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3年中,他对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无限信任。他们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不是新人。索博列维丘斯在俄国时曾是一家左倾马克思主义报纸的记者,并于1927年在报社中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他们兄弟两人不仅在法国、德国积极活动,还为托洛茨基提供重要情报和写书的参考资料。他们协助出版《反对派通报》,托洛茨基与苏联境内的秘密通讯大部分是经他们之手传递的,密码、用化学墨水写的信件及秘密通信处等等都在他们手中。[1]

不让奸细混入地下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地下组织都是特务的目标,如果过于疑神疑鬼是不行的,它与警惕性不高一样能使整个组织瘫痪。托洛茨基的工作在这方面特别糟糕。因为在他的西方支持者中,懂俄语并了解俄国风俗的人屈指可数,因此他对这些人格外倚重。托洛茨基的工作如果没有廖瓦的帮助就几乎无法进行。不过,托洛茨基极不情愿接受儿子的自我牺牲,因为对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自愿在王子群岛上过这种与监狱生活相差无几的日子,确实是自我牺牲。因此,托洛茨基经常寻找俄国秘书,这为特务接近他提供了机会。朋友们的及时警告曾多次防止了灾难的发生。如在30年代初有个名叫瓦连廷·奥尔伯格(Валентин Ольберг)的人,他出生于俄国孟什维克家庭,装成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力图到王子群岛为托洛茨基当秘书。但是,弗兰茨·普菲姆菲尔特(Franz Pfemfert)和亚历山德拉·拉姆对他有怀疑,他们从柏林给托洛茨基写信,把他们的担心告诉他,于是奥尔伯格的秘书人选被否决了。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审时,他作为被告出庭,为法庭提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

[1] 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托洛茨基与索博列维丘斯及其弟弟索博尔医生的往来信件有满满两个文件夹之多。

罪证。[①] 但这样及时的警告极为罕见，在后来的几年中，奸细的阴影像灾难一样对托洛茨基紧追不舍。

※ ※ ※ ※ ※

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他得到巨额稿酬，岛上的生活十分便宜，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生活又极其简朴。随着工作的展开和秘书人数的增长，又总有客人长期居住，加之通信达到中等政府部门的规模，支出增至每年12000至15000美元。[②] 全世界大量读者保证了托洛茨基的丰厚稿酬。他在君士坦丁堡写的头几篇文章给他带来10000美元的收入，他把其中的6000美元用来出版《反对派通报》及法国，甚至还有美国的托派报纸。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收到了各国出版《我的生平》的预付款，数额十分可观。仅美国出版此书的预付款就达7000美元。1932年，《星期六晚报》为连载《俄国革命史》支付45000美元。[③] 当托洛茨基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苏联领事馆时，他向莫里斯·帕兹借了20000法郎。一年后，他还清了债务，而且没有必要再借钱了。1929年5月，当帕兹询问他生活是否困难时，他

① 普菲姆菲尔特致托洛茨基，1930年4月，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奥尔伯格曾是德国反对派的领导人，他因经常询问托洛茨基与其苏联支持者的联系而被怀疑（参见奥尔伯格与廖瓦的通信）。至于在1930年时他是否是奸细或在后来变成奸细，如同索博列维丘斯的情况一样，没有彻底搞清。1933－1934年纳粹上台后，奥尔伯格作为政治侨民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穷困潦倒。当然，他可能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偿为斯大林当密探。在1936年季诺维也夫审判案中他是被告，同时又是指控的主要证人之一，也被判处死刑。

② 马·伊斯特曼：《伟大的同事》。

③ 数据来自托洛茨基的收据及他与出版商及出版代理人之间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回答说,他不仅不困难,而且能够为西方朋友们提供帮助。托洛茨基的书信和保留下来的文件表明,他帮助别人相当慷慨,某些受惠者相当无耻地依赖他的帮助。

※　※　※　※　※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甚至还有施略普尼柯夫早在失败前就力图把外国共产党中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开始时,尽管支持者受到开除出党和流放的威胁,这一努力仍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①] 但是,俄国反对派的策略和退却使外国共产党员茫然若失,斯大林的镇压又把他们吓破了胆。季诺维也夫派的彻底投降影响了反对派在外国支持者中的声誉,但托洛茨基的失败和他被流亡国外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部分外国共产党人尚未完全听任斯大林的操纵,在这些人的眼中,托洛茨基的道义声望仍像以前一样高,环绕着这个名字的传说是不可遏制的战斗力与胜利的传说,如今,它又增添了殉道的新音调。但是,共产国际已经如此猛烈诋毁托洛茨基主义,不遗余力地将它从各国组织中驱逐,因此,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别指望能从相信这一异端邪说中得到什么好处。甘愿在这条殉难道路上追随他的人屈指可数。

在王子群岛上,托洛茨基着手把他的新、老支持者团结起来。在他看来,他不能和他们分享权力这一事实并不表明这一活动是没有希望的,正因如此,它对他更有诱惑力。他深知沽名钓誉之徒、官僚主义者是不会响应他的呼吁的,他把目光转向那些有思

① 1929年11月4日,托洛茨基在其致索博列维丘斯兄弟的信中证实,德国"列宁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经费是其领导人从皮达可夫那里领来的,直到后者投降为止。该组织活动规模极小,只要少量经费就能维持。

想、不计利害的人。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力量难道不是在于其成员的信念和他们对事业的忠诚而是在于其数量吗？20年代末，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统治徒有其表。从那几年过来的任何一国的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亲身经历来证明，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在开始追随莫斯科加冕的新正统路线时是多么迷惑和勉强啊。在那并不深刻的调和主义之下隐藏着不信任和不安。昔日马克思主义思维习惯依然存在，托洛茨基的命运经常触动他们的良心。但由于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认为宣布与俄国革命生死与共是其最神圣的职责，因而他们不能与如今的莫斯科当权者发生冲突，而后者以革命的名义坚持要求外国共产党员在中央和基层组织赞同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共产党员遵照旨意投了赞成票，但是"整个战役"对他们来说仍是可悲的谜。战役中的狠毒刺伤了他们，他们不了解其动机，有时暗自思量，来自远不可及之处的诅咒已够骇人听闻的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为它增加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指责呢？在工人党员中，年轻人和不知情者除外，都还记得托洛茨基如日中天的日子，记得他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有力抨击，记得他那些言词犀利、慷慨激昂的宣言，就是这些宣言使其中的一些人挺起了腰板，甚至还把一些人带进了党的队伍之中。这个人在他们的记忆中是列宁的最亲密的同志。如今，党却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这使他们匪夷所思，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在各国共产党中，时而有少数人因看不惯"党的路线"中的种种花招而愤然退党，但大多数人认为不应过于关心领袖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俄国远在天边，很难理解它，而本国的阶级敌人近在身旁，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进行着反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他们仍然支持党，但这不是遵循斯大林主义而是违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当他们听到党的上层官员诬蔑托洛茨基是"叛徒、反革命分子"时，他们陷入困境。

托洛茨基对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萧伯纳曾这样描

述他,说他重新成为"世界各国极左翼好斗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那时萧伯纳与事实真相的距离并不像后来人们认为的那样远。[①]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著名英国激进活动家为捍卫托洛茨基而反对本国政府。当然,英国共产党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党都小,但仍应该指出,在托洛茨基流亡王子群岛的那段时期的通信中可以找到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其中装着他与一位英国共产党作家的十分友好坦诚的往来信件,后来,此人因成为正统斯大林主义者而臭名远扬。在著名的或即将成名的欧美诗人、作家、画家当中,安德烈·勃勒东(Andre Bredon)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派的诗人,如荷兰女诗人亨利耶塔·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a Roland Holst)、[②]其昙花一现的可悲文学生涯当时正值巅峰的伯纳伊特·伊斯特拉蒂(Panait Istrati)、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和年轻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以及许多人都为托洛茨基所倾倒。一位美国共产党史学家写道:"托洛茨基继续引导着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为了证实这一论断,他援引了一位知名共产党员作家兼出版家米歇尔·戈尔德(Michael Gold)的话,后者甚至在托洛茨基已遭到头几次攻击诅咒之后仍"不能不赞美托洛茨基(该文发表在《新群众》上),'他几乎是一位达·芬奇那

---

① 萧伯纳曾多次异常热烈地表述他对托洛茨基的赞叹之情。在其一封致莫利·汤普金斯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昨天……我收到一堆我们伟大的党的领袖们的工作报告和一本托洛茨基的廉价小册子。在粗暴、野蛮和迟钝方面,很难超越伯肯黑德、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但是,如果我需要健全的思想,直率和有教养的精神时,就请给我托洛茨基的作品,看完贵国的总统选举和我们这里的大选,再读他的分析,简直像是飞到了另一个星球。"(《萧伯纳致一位年轻女演员的书简》第28页)。萧伯纳是第一个把托洛茨基与莱辛加以比较的人(术语是从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借来的)。

② 罗兰·霍尔斯特(1869－1952),荷兰女作家、政治活动家。1918年加入荷兰共产党,1927年退党加入托派。代表作有《英雄的故事》。——译注

样的全才!'"甚至在1930年,戈尔德在说了几句一般性的指责之后,指出"'托洛茨基在伟大的俄国革命史中万古流芳……他像萨伏那洛拉[①](Savonarola)或丹东一样,是永恒的人类神话之一'。"[②]"对托洛茨基赞叹不已的不仅是米歇尔·戈尔德",另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也指出,"这是美国关注俄国事件的极端激进派的共同特点……。"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许多被开除的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的小组都在积极活动,领导他们的是几个共产国际创始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独自抗议莫斯科反托洛茨基的斗争,其后的5年中,即从1924至1929年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鲍里斯·苏瓦林和其他人仍继续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③] 比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革命工团主义小组对托洛茨基也依然同情,该小组本来是法共中央建立起来的组织,但它后来脱离了法共。季诺维也夫派也有其支持者。在德国有"列宁主义者同盟",还有维金格反对派(该组织以柏林最大工人区的名字命名),但那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以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路特·费

---

① 萨伏那洛拉(1452-1519),佛罗伦萨多明我会隐修院院长,反对美第奇的暴政,揭露教廷,号召教会实行苦行主义,为建立共和制作出了贡献,1497年被革除教籍,后被隐修院院方判处死刑。——译注

② 西·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第358页;《美国共产主义的道路》第129页,另见J.弗里曼:《美国圣约书》第383-384页。

③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1926年,皮达可夫在苏联驻法使馆工作,他试图把被法国共产党开除的形形色色的反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合反对派。皮达可夫的任务是在法国建立它的分支,他与罗斯默、A.丢努瓦、洛里奥、苏瓦林、莫纳特、帕兹和其他人协商后,开始出版杂志《反潮流》,但是罗斯默和莫纳特对任何有关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结盟"的想法一概敌视,所以拒绝合作,因此杂志作为法国联合反对派的机关刊物,由帕兹夫妇、洛里奥拉担任主编,罗斯默与莫纳特继续独立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

舍为代表的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两位被墨索里尼囚禁在监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阿马杰奥·博尔迪加[①](Amadeo Bordiga)也反对斯大林。葛兰西从牢房中把一份反斯大林的声明寄往莫斯科,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陶里亚蒂(Togliatti)把它扣下了。[②] 安德列斯·尼恩(Andres Nin)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才干的人,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俄国反对派联系在一起,多年来他一直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③] 荷兰的马林·斯内夫利特(Maring Sneevliet)是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头号鼓舞者,他领导着一个相当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左倾工会工作者集团。比利时的范·奥维尔斯特莱泰恩(Van Overstraeten)和列索伊尔(Lesoil)是比利时共产党的前领导人,他们的支持者在沙尔列鲁瓦大型采矿区有牢固的阵地,他们也宣传托洛茨基主义。

党内争论甚至在亚洲也有反响。托洛茨基主义的只鳞片爪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传到上海、北京、广东和武汉,他们亲眼看

① 博尔迪加(1889－1970),意大利社会党人,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创建工作并成为领袖,1930年被开除。——译注

② 罗斯默致托洛茨基,1930年4月10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大致在这段时间内,3位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拉瓦佐利、列奥涅蒂和特利索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他们都是葛兰西的朋友和支持者,其中一个将陶里亚蒂扣压葛兰西信件的事告诉了罗斯默。我曾在意大利报刊上要求陶里亚蒂对我解释此事。他通过他的朋友答复我,1926年葛兰西确实曾要求他别把意大利共产党牵进俄国的党内斗争之中(陶里亚蒂支持布哈林、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陶里亚蒂断言,当葛兰西的信寄到莫斯科时,正值党内斗争停战之时,在与布哈林协商之后,他觉得此信无的放矢而将其扣压。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重新爆发之后,共产国际与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得到有关葛兰西立场的消息。这说明了为什么葛兰西在斯大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被人遗忘,只是到了50年代初他的功绩才被重新发现。陶里亚蒂在葛兰西去世后开始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搞对后者的个人崇拜。

③ 尼恩与托洛茨基之间通信早在后者流放阿拉木图时就已开始,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到了托洛茨基在1927年为中国革命所进行的斗争。1928年，他们召开了中国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某些人主张与毛泽东结盟；那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满，因为在1925—1927年间他的观点往往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还因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以游击战的形式与国民党斗争。1927年前，陈独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29年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揭露了莫斯科、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幕，声称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①]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锡兰也有影响。大约在这期间，托洛茨基在美洲赢得了支持者：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和马克斯·沙什曼（Max Shachtman），加拿大共产党主席莫里斯·斯佩克托尔（Mauric Spector）。甚至在遥远的墨西哥，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迭戈·里维拉的鼓舞下投入到在莫斯科已被粉碎的异教徒的事业之中。

托洛茨基与上述所有组织建立起联系，并力图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之后，它们靠他的只鳞片爪的思想为生，在小报和通讯上发表秘密从苏联带出来的托

① 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兴趣持久不衰，正如在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情况下他与其中国支持者的联系一样。1929年夏季或秋季，中国反对派分子林泽（即刘仁静——译注）在从莫斯科返回中国的途中前往王子群岛拜会托洛茨基，此后直到1940年，托洛茨基一直与几个具有不同色彩的中国反对派小组保持定期联系。1929－1931年间，托洛茨基的中国支持者向他汇报了当时中共正式领袖李立三、朱德与毛泽东的分歧，他们认为前二者是“机会主义者”不予考虑，但对毛泽东寄予巨大希望。托洛茨基的某些支持者并没有因为陈独秀“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他是“取消派”，断言他起不了任何作用。托洛茨基对毛泽东一无所知，对陈独秀寄予厚望，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力图使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他和解。1930年12月1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说，他于1929年首次看到托洛茨基对中国的观点，便对它们的正确性坚信不移。

洛茨基著作的片段。托洛茨基来到君士坦丁堡为他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托洛茨基的道义权威是他们的巨大财富,他们期待他能为国际范围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反对派注人活力。但托洛茨基的权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学生和追随者的有限角色。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把托洛茨基主义形容为扯着一张巨大风帆的小船。托洛茨基甚至在俄国反对派中也是主宰,但在俄国,他周围至少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以独立思考、刚毅的精神和丰富的经验在革命中脱颖而出。在俄国境外的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之中,这种类型的人寥若晨星。他希望反对派的这一弱点很快就能克服,在普通成员中会成长起新的领袖。他没有想到,他永远是唯一一个被驱逐的俄国反对派领袖。他期望斯大林在他之后还会把其他人,特别是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赶出俄国,只要他们一离开俄国,国际反对派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①] 这一期望落空了。斯大林根本不想以新的驱逐来巩固托洛茨基的阵地。

※　※　※　※　※

除了托洛茨基的个人魅力之外,这一阶段的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革命的国际主义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当年,第三国际曾把它从第二国际无力的手中夺过来,拯救了它,现在托洛茨基为捍卫它而反对第三国际,同时还要反对第二国际。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一原则不是一般的抽象原则,而是渗入到他的思维和政治

① 《反对派通报》1929年7月第1-2期。

本能之中的原则。无论处理什么政治问题，他都从国际远景出发，超越民族之上的共产主义利益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最高准则。因此，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是民族自大狂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傲慢。现在，这一学说不仅在苏联占统治地位，在完全不需要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成了官方典范。共产国际在已被神圣化的斯大林俄国的私利前顶礼膜拜，它丧失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共产国际依附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之上，这与它的名称是矛盾的。托洛茨基强调，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格格不人，它起源于19世纪德国修正主义的国家改良理论，而它在实践上意味着放弃国际革命，让共产国际的政策服从斯大林的需要。[①] 虽然托洛茨基认为国际利益比国家利益重要，但他对苏联本国的需要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没有忽略它的外交或军事利益。他坚持认为捍卫第一个工人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但他深信，斯大林的自给自足的概念削弱了苏联，因为苏联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其被孤立的状态并扩展革命。他

---

① 托洛茨基在其一封信中把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追溯到G. 福尔马尔这位著名的德国改良主义者那里，他在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运动的20年前就阐述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我们要补充一句，这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变种）。托洛茨基指出，福尔马尔的构想比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更加精密，因为他的孤立社会主义国家应是一个类似于德国的技术发达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福尔马尔认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邻国的技术的优势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和成功的保障，而布哈林和斯大林却深信，这样的国家即便工业落后，也能繁荣。福尔马尔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其技术优势和计划经济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可以胜过资本主义邻国，这样一来，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必要性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失。福尔马尔提出的思想不仅预示了20年代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构想，而且还预示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通过赫鲁晓夫有关“经济竞赛”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纲领。

据此得出结论: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阶段,工人国家应作好准备,宁可为了长远目标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也不能破坏这一斗争,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25—1927年破坏中国革命那样。30年代,这一争论变为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反纳粹的策略及人民阵线的争论,但其实质仍是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和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之间的冲突(如果与当代美国政治相类比的话),而后者是斯大林二三十年代政策的特征。

乍看起来,托洛茨基的立场比斯大林的立场更容易,或说应该更容易被苏联境外的共产党员接受。托洛茨基有理由期望它能得到热烈的反响,因为他强调在苏联境外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国际阶级斗争中独立作战的人,而斯大林让他们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工人国家"的被保护人。

托洛茨基捍卫"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把各国共产党人从极其狭窄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各国共产党中恢复"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同样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它白纸黑字地写在各国共产党党章上。民主集中制的使命是保证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后来的各国共产党在纪律中有自由、在自由中有纪律。它要求党在行动上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但允许党容忍与其党纲相容的各种不同观点。这一原则责成少数人执行多数人的决定,也责成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它赋予在任期内的每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效地领导普通党员的全权,但又使中央委员会取决于普通党员的意志和投票。因此,这一原则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和政治意义。背弃这条原则并用官僚集团的集中制来取代它,这种做法削弱了共产国际。如果说崇尚纪律和高度集中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布尔什维克垄断政权的有机演变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在共产国际的国外各支部中的推广则是彻头彻尾人为制造

的，因为它与各外国共产党在本国的生存环境与条件格格不入。

大多数西方共产党习惯于在多党制的框架中工作，在这种体制中，他们照例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批评自由和辩论自由。现在，党的领导处于荒诞不经的状况，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剥夺了其支持者在组织之外可以享有的这一权利。到1930年，德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不能发表与党的路线相左的意见。他们应把莫斯科发出的官方指示当成圣经来接受。这样一来，每个共产党在其本国内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岛屿，与人民群众彻底隔绝，但隔裂它们的并不是革命目的，而是与此目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法典。这一法典带有准宗教性质，它迫使党的成员在心理上严格划一，从反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任何一个修道团体都是这么做的。诚然，借助于划一手段，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在加强纪律性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这样的纪律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政治影响来说却是破坏性的。一个革命政党应立足于它在其中工作的人民之中，与人民同甘苦，不能为仅仅是知情者所了解的偶像的利益割断它与人民的联系。斯大林主义及其信仰者的忠诚、狂热的献身精神和对敌人的仇恨无疑会吸引某些探索信仰的知识分子，后来这些人又诅咒它，说它是“堕落的上帝”。但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很难赢得工人群众这些被假定为它最适宜的“天生的无产者”。此外，异常严格的纪律捆住了党的宣传鼓动人员的手脚，而他们本应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向那些他们准备召唤到自己旗帜下的人进行宣传。当欧洲共产党员在向工人听众论证自己的事业时，他总能遇到自己的对手——社会民主党人，他应驳倒后者的论据，他应以自己的口号与后者抗衡。但他现在做不到这点，因为他没有进行政治辩论的技巧，其原因是政治辩论在党内不受崇尚，因此，他的素养使他无法对尚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进行宣传。他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对手的论据，因为他不得不时时考虑

自己的正统性,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话是否有在无意中违背党的路线的地方。他只能盲目、机械地重复规定好的那些论据和口号。而意外的反抗、始料不及的批评意见会使他不知所措,因此,这样的宣传员在回答对苏联的批评时,极难说出令人信服的话来,他对工人阶级感恩般的祈祷和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在所有清醒的听众眼中成为笑柄。斯大林式宣传的低效是多年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宣传收效甚微,甚至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托洛茨基的目的是使各国共产党振作起来、赶走麻痹状态、建立起自信心、鼓起战斗的激情,自信心与激情本来他们都曾有过,但在没有党内民主的情况下他们恢复不了原来的状况。他反复陈述民主集中制对共产党员利益的意义,他们从未理解它的意义,或已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为他们本人的利益、以他们本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名义向他们呼吁,并希望他的呼吁不会无人理睬。当然,如果理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利益还有意义的话,那么托洛茨基的论据和号召应该能打动人心的。

托洛茨基主义除了其基本原则之外,也含有许多随机应变的策略概念。托洛茨基在流亡中撰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解释这些问题的,但它们很难对外行有所裨益,特别是在时过境迁之后。然而,托洛茨基的策略思想的内涵极广,直至今天,他的某些观点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仍很重要,其原因在于它们不仅仅具有史料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1923—1928年间共产国际推行"温和方针",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左的角度对它加以批判。[①] 1928年后,这一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自从斯大林在苏联开始推行"左倾路线",共产国际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它的方向,因为它的政策反映

①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五章。

着俄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并从后者那里得到推动力。在1928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它开始改变其口号和策略指令，一下子从右倾转变为极左。[1] 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新路线进一步发展，直至与旧路线完全对立。[2] 共产国际在几年前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现在，则断言稳定期已经结束，预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彻底崩溃。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阶段”的核心，取代布哈林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莫洛托夫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根据这一“理论”，战后史明确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高潮，它持续到1923年；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它于1928年结束；而现在开始的第三阶段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宣判了死刑。如果说以前国际共产主义一直在进行防御，现在转入进攻的时机到了，即把“局部斗争”和改良斗争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

共产国际断言，资本主义所有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因为资产阶级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尤其是甩掉了改良幻想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它一心盼望共产党率领它投入战斗。今天，阶级斗争中的任何事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潜能，它会引起“街垒战”或武装起义。1929年6月，半月刊《布尔什维克》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罢工浪潮汹涌澎湃……持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和内战因素与罢工交织在一起。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也卷入了斗争之中。……数百万农业工人和被压迫的农民的不满急剧增长，他们也在向左转。”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声明：“只有迟钝的机会主义者或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最宏伟的革命事件的区域

① 参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769－784页。

② 同上，第876－888、915－925、957－966页。

之中。"这几句话并不是对遥远的未来的预见,而是具体的预报和行动命令。几个欧洲共产党确实曾试图把1929年的五·一游行和8月4日的反战示威直接变成"街垒战",但在巴黎、柏林和其他城市中,它们均以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毫无意义的流血搏斗而告终。

根据这条"总战线",共产国际也改变了它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这种所谓真正的革命形势之下,这些党只能与反革命狼狈为奸,所以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理由寻求与它们合作或与它们达成局部协议。由于资产阶级试图借助法西斯主义来挽救自己的统治,所以议会制和自由民主时代行将就木,议会民主将变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将变成"社会法西斯党","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由于他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所以社会民主党员比公开的法西斯党徒更加危险。因此,共产党员应该集中全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它当做"最主要的敌人"。以此类推,那些有时口头上像共产党员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徒比右翼"社会法西斯党徒"更危险,因此,应加倍努力地与他们进行斗争。如果说在此之前曾要求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人"自上而下地"(即与它的领袖直到一般党员)建立统一战线,那么,现在共产国际宣布严厉禁止所有这类策略。现在,只能与下层建立统一战线,即只允许党员与"准备与其领袖决裂"的普通社会民主党党员建立统一战线。赞成与"上层"接触,则意味着帮助或鼓励"社会法西斯主义"。[①]

在其后的五六年内,各国共产党始终奉行上述指示,直到建立人民阵线为止。这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因为在那段时间内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纳粹主义抬头、西班牙君主体制垮台及其他许多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共产党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946页、957-966页。

托洛茨基断言，在过去的那个时期中，共产国际由于其怯懦的政策而坐失了许多革命良机，但他没有料到共产国际的路线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因此，托洛茨基批评这一变化，指责它为“180度大转弯”，“从机会主义一跃成为超激进主义”：新口号和策略指示无非是把旧的翻了个个儿，以便掩盖这些旧口号及指示的失败。在对莫洛托夫有关三个阶段原理的毁灭性批评中，托洛茨基指出，在第二阶段中发生了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如果错误地把这一阶段看成是稳定时期，那么，期望在“第三阶段”中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并由此得出只能采取进攻政策的结论就更不现实。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这些重新调整方向是机械的，因为它不想弄清其旧策略的错误，也未曾认真地讨论并重新评价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各国共产党没有讨论其政策的正确和错误之处，它们注定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并根据上面的命令用一系列错误来代替另一系列的错误。各国共产党的党内体制不是单纯的组织形式，它是事关共产国际全部政策的大事，因而把共产国际变成了一个既僵化又不稳定的组织。同样，“第三阶段”孟浪的超激进主义绝不能证明革命的国际主义在莫斯科当局中的复活。这种超激进主义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成长的妨碍并不亚于先前的机会主义，因为其基础同样是官僚集团对工人阶级国际利益的不负责任的冷漠。[①]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托洛茨基都不懈地宣传下述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开辟的整个时代是资本主义不断衰落的时代，因为它的基础已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大厦就要轰然倒塌。一个社会体制的没落不能在单一的经济崩溃

① 托洛茨基将1930年1月第8期《反对派通报》的全部版面用于批评“第三阶段”的政策，在其后的好几期中也不断对此进行抨击。

联系及其政治传统的分量，必然会受惩罚。更何况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它团结一致，把它视为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指出，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应让斯大林分子滥用他们的忠诚。因此，只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就不能期待或鼓动工人拒绝第三国际。

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这点上坚定不移。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工人阶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官僚集团，直到它能着手实施社会主义，而它除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别无它路，因此，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

这一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其中甚至还有托洛茨基的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从未妥协过，即便当他修正并改变了某些其他思想时，对此仍寸步不让。托洛茨基在其流亡生涯的前半个时期中一直宣传应在苏联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而在流亡生涯的后半个时期中，他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此后，当他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时，他也重新考虑了他本人有关反对派角色的构想。即便在那时，他仍毫不动摇，坚持苏联是工人国家。他声称："无条件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反对派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职责，他不止一次地与他那些不愿履行这一职责的朋友和支持者绝交。[①]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3、4期第4、5页及其他各处；《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213－274页；《战斗报》1929年12月。

联系及其政治传统的分量，必然会受惩罚。更何况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它团结一致，把它视为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指出，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应让斯大林分子滥用他们的忠诚。因此，只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就不能期待或鼓动工人拒绝第三国际。

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这点上坚定不移。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工人阶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官僚集团，直到它能着手实施社会主义，而它除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别无它路，因此，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

这一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其中甚至还有托洛茨基的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从未妥协过，即便当他修正并改变了某些其他思想时，对此仍寸步不让。托洛茨基在其流亡生涯的前半个时期中一直宣传应在苏联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而在流亡生涯的后半个时期中，他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此后，当他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时，他也重新考虑了他本人有关反对派角色的构想。即便在那时，他仍毫不动摇，坚持苏联是工人国家。他声称："无条件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反对派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职责，他不止一次地与他那些不愿履行这一职责的朋友和支持者绝交。[①]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3、4期第4、5页及其他各处；《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213－274页；《战斗报》1929年12月。

联系及其政治传统的分量，必然会受惩罚。更何况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它团结一致，把它视为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指出，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应让斯大林分子滥用他们的忠诚。因此，只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就不能期待或鼓动工人拒绝第三国际。

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这点上坚定不移。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工人阶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官僚集团，直到它能着手实施社会主义，而它除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别无它路，因此，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

这一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其中甚至还有托洛茨基的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从未妥协过，即便当他修正并改变了某些其他思想时，对此仍寸步不让。托洛茨基在其流亡生涯的前半个时期中一直宣传应在苏联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而在流亡生涯的后半个时期中，他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此后，当他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时，他也重新考虑了他本人有关反对派角色的构想。即便在那时，他仍毫不动摇，坚持苏联是工人国家。他声称：“无条件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反对派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职责，他不止一次地与他那些不愿履行这一职责的朋友和支持者绝交。[1]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3、4期第4、5页及其他各处；《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213－274页；《战斗报》1929年12月。

联系及其政治传统的分量，必然会受惩罚。更何况第三国际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与它团结一致，把它视为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指出，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应让斯大林分子滥用他们的忠诚。因此，只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就不能期待或鼓动工人拒绝第三国际。

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在这点上坚定不移。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这一最主要成果"未受侵害，苏联就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工人阶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官僚集团，直到它能着手实施社会主义，而它除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之外，别无它路，因此，只要公有制能保存下来，工人国家的存在即便不是现实的，起码也是潜在的。

这一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其中甚至还有托洛茨基的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从未妥协过，即便当他修正并改变了某些其他思想时，对此仍寸步不让。托洛茨基在其流亡生涯的前半个时期中一直宣传应在苏联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而在流亡生涯的后半个时期中，他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此后，当他宣布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时，他也重新考虑了他本人有关反对派角色的构想。即便在那时，他仍毫不动摇，坚持苏联是工人国家。他声称："无条件捍卫苏联"和反对资产阶级敌人，是反对派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职责，他不止一次地与他那些不愿履行这一职责的朋友和支持者绝交。①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3、4期第4、5页及其他各处；《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213－274页；《战斗报》1929年12月。

※　※　※　※　※

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西方支持者组织起来的头几次尝试结果令人失望。托洛茨基十分注重法国,因为在那里他的追随者的影响比在别处都大,他试图把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派和准托洛茨基派集团或组织团结起来,并使它们与季诺维也夫派及工团主义者小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以期在那里建立起强大的反对派基地。一开始罗斯默就警告过他,这些集团大都士气低落、精神沮丧。托洛茨基主义在法共中的影响达到巅峰之际算起,已过了5年,在这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恢复了它在那里的影响,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统统开除出党,并把他们与普通党员隔绝。孤立感和俄国反对派的失败摧垮了许多反斯大林者的精神,罗斯默发现在这些人中普遍存在着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使他们放弃斗争,并力图"永远与反对派划清界限"。甚至连那些反对这种情绪的人也不知所措,彼此之间立场互相矛盾。罗斯默继续说:"所有这些团体的最大不幸在于它们处于实际工作之外,这一情况注定会使它们的宗派性质更加突出。"[1]

当托洛茨基不听罗斯默的劝告而力图重新把苏瓦林和其他人争取到反对派一边来时,后者的正确性更是显而易见了。苏瓦林一度在莫斯科单枪匹马地捍卫托洛茨基,因此名噪一时。托洛茨基看重他的记者才干,期望他能成为反对派最有影响的法国喉舌。令托洛茨基惊讶不已的是,苏瓦林竟提出了无法接受的奢求。他要求托洛茨基在事先没有得到法国反对派同意,即苏瓦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托洛茨基力求避免争执,他回答说,他不会就法国事务公开演讲,迄今为止,他公开

① 罗斯默致托洛茨基,1929年4月16日。

讲的只有苏联和中国的事务，在这些事上他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无须征得法国人的同意。苏瓦林以长达130页的长信作答，其中充满了奇谈怪论、犀利的言词、零星的准确观察与分析，还有混乱不堪的论据，而且用的是激忿敌对的语调，这使决裂变得不可避免。苏瓦林断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境外遭到彻底的失败，而且永无东山再起之日"，因为"它对时代性质的理解是错误的"，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高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当它企图按自身的模式塑造外国共产党时便"犯了致命的错误"。尽管这一观点有其值得注意之处，但托洛茨基不希望任何一个自以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持这种观点或赞成这种观点。托洛茨基不同意布尔什维主义的过错在于苏瓦林归罪于它的"致命的错误"。他指责说，导致共产国际失败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尽管苏瓦林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但他的指责带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此了。例如他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毫无必要地"崇尚革命的不可调和性"，这使他们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关心"苏维埃国家显而易见的需要"。苏瓦林还说："对世界工人运动来说，最重要的是苏联的经济成就，国家资本主义无可争论地优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嘲弄"毫无必要的英雄主义"，正是它使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丧失了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机会，即便在党内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仍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革命的人，虽然不再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甚至被开除出党"。如果这些意见不是如此荒谬绝伦的话，倒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要托洛茨基向斯大林投降的过迟的劝告，因为他已不是党员，除了投降之外，他没有任何可能继续为"革命服务"，甚至他即便投降，也为时已晚。苏瓦林对托洛茨基忠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极尽揶揄之能事，并力劝他摆脱它们的束缚、"回到马克思那

里"。[①]

托洛茨基答复说:"我再也看不到几年前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之处。"在苏瓦林的信中,托洛茨基找不到"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论据和……恰当的事实"。"支配您、给您提示那些奇谈怪论的是气急败坏、失意的记者之笔"。"您认为党和共产国际已是僵尸。您认为俄国反对派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孜孜不倦地试图对党施加影响并回到党的行列之中。另一方面,您又把苏维埃的经济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您还要求反对派应满足于国家资本主义仆从的角色……您已转到了敌人的一边。"[②] 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到此结束,此后,苏瓦林始终站在托洛茨基反对者的行列之中。虽然在1929年他本人试图开导托洛茨基,教后者"如何成为有益于革命的人"、为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服务,但在此后的年代里,苏瓦林又以截然相反的罪名诅咒托洛茨基,那时他指责托洛茨基,恰恰是因为后者看到苏联的进步,声称那里仍有足够的革命遗产因而应该捍卫它。

"无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有名的是莫纳特和卢宗(Louzon)。但与该组织的工团主义者们达成协议的尝试也一无所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曾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克服了他们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在内的一切政治活动这一最有代表性的偏见。后来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又在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被开除出党。他们从个人角度来说十分眷恋托洛茨基,但是,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加强了他们昔日对政治的厌恶,使他们更加坚信,高潮为总罢工的工联活动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托洛茨基无论怎么努力,都未能使他们重新接受革命政党极为重要这一列

① 托洛茨基与苏瓦林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同上。

宁主义者的观点，未能使他们跟他一起为改革共产国际而斗争。

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之间的调解工作也不大成功。后者仅仅是人数微不足道的宗派，但其领袖是阿尔伯尔·特莱恩（Albert Treint），1924—1925年间他是法国共产党的正式领导人。当季诺维也夫领导“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并已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开除出党时，正是这个特莱恩对他们大加谴责、大肆诽谤。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仇恨特莱恩，甚至在此人被开除出党之后仍对他耿耿于怀，对与他和解的劝告连听都不想听。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于1929年5月邀请他前往王子群岛，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试图与他达成和解。但是，旧日的仇恨是如此强烈，特莱恩力图为自己在1924的所作所为辩解，没有为平息对方的怨恨采取任何措施。托洛茨基在自己支持者的压力下不得不与特莱恩分手，但他们之间的分手比与苏瓦林的分手要友好得多，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尽管不那么热情。

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工团主义派和特莱恩建立联系的企图失败了，没多久，他又不得不着手解决托洛茨基派内部的分歧。此事如果不是因为它在托洛茨基的生活中和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中的作用，根本就不值一提。在巴黎有几个彼此竞争的派别和小组：莫里斯·帕兹和玛格德莱娜·帕兹夫妇小组，它有一份版面不大的机关报——《反潮流报》；罗斯默；还有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也有自己的报纸《阶级斗争报》和《真理报》），在后者之中，彼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与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组成了两个敌对的宗派。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罗斯默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属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精英。纳维尔是个作家，他参加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文学骚动，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超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满怀好感地关注着1927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进行的斗

争,本人也被开除出党。他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缺乏政治经验,与工人运动几乎没有联系。莫利尼耶则相反,他曾是个"积极分子";他精力充沛,精明强干,在实践工作中如鱼得水,但在选择道路和手段方面都不十分在行,在理论知识方面几乎等于零。知识分子和实干家这两类不同的人在宏大组织的日常实践活动惯性的推动下往往能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而他们之间的对抗性却破坏着这些与运动主流隔绝、处于"实践活动之外"的小团体。

1929年早春,帕兹夫妇来到王子群岛,托洛茨基说服他们把他们的小组和其他派别统一起来,把他们的机关报《反潮流报》变成一份"进攻型的大型"周刊,使之成为反对派发表意见的阵地,并着手大张旗鼓地招募成员的工作。他与他们一起制定了招募工作的计划,允诺与他们紧密合作。他们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尽管有所保留。但他们在回到巴黎后经过反复考虑又拒绝出版周刊,他们看不到以托洛茨基提议的那种规模进行招募反对派的工作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首先,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决定把"罗斯默的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企图",对那些一心向往战斗活动的年轻托洛茨基主义者嗤之以鼻,说他们头脑简单、愚昧无知。类似的议论使托洛茨基确信,帕兹夫妇即便有革命家的素质也少得可怜,他们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人。事实上,他们是"沙龙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其资产阶级职业上十分成功。莫里斯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法学家,他从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纯属嗜好。当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时,他们十分愿意以其巴黎代表的身份活动、沐浴在他昔日光荣的辉煌之中。但是,当托洛茨基离开俄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到他们面前,并提出种种高标准的要求时,他们便没有丝毫愿望真正地与他结合在一起。此后是令人痛苦的通信。托洛茨基让他们感到他把他们看成庸人。他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革命者或是有教养的人,或是无知的人,或是知识分子,或是愚钝之人。但没有

无坚不摧的意志、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1]

帕兹夫妇以牙还牙，像托洛茨基羞辱他们一样把他挖苦了一番。他们大谈正统共产主义的强大、向心力和反对派的弱小，利用这一确实存在的反差为借口为自己缺乏热情辩解。他们解释说，不能把机关报《反潮流报》变成周刊是因为，"这份作为反对派机关报的周刊除了有托洛茨基同志优雅的文章和战斗的声望之外"，它还需要物质和道义基础，并能够与"它的读者和支持者息息相关"。但周刊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为虽然托洛茨基这一名字对老共产党员来说意味深长，但他们都已陷入麻木状态，而年轻人过于无知，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论据。"不要沉溺于对您的名望分量的幻想之中。经过历时5年的共产党官方报刊对您的造谣诬陷之后，在广大群众中对您曾是红军领导人的印象已经十分淡漠了"。仅几个月之前，帕兹夫妇还对托洛茨基毕恭毕敬，称他为"最亲爱的伟大朋友"，如今这种敬意已所剩无几。实际上，他们在暗示托洛茨基极端自私、极端虚荣。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都被与世隔绝，斯大林的喉舌已经败坏了他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的声誉，他们还试图让人们彻底忘掉他。对这些情况托洛茨基都了解。但这种局面对他来说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着手大规模反攻的又一理由，因为只有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才能打破普通党员的麻木状态。他得出结论，他与帕兹夫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于是继与苏瓦林决裂之后，紧接着又与他们决裂，虽然与后者分手更不愉快，因为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他们毕竟曾为他多方效力，对他十分关心。

其后的事情更加痛苦。罗斯默和纳维尔及莫利尼耶派现在仍支持托洛茨基，但他不得不与使这些人不和的彼此间的敌意作斗

[1] 托洛茨基与帕兹夫妇书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争。莫利尼耶十分乐观地来到王子群岛,他带来把托洛茨基主义变为伟大的政治力量的宏大计划。他深信,反对派在法国有种种良机,因为法国共产党内充满了不满情绪,它不可能对反对派的号召无动于衷,反对派只要信心十足地行动、表现出大无畏的首创精神就足够了。莫利尼耶提议托洛茨基主义者渗入到共产党之中,召集群众大会,出版发行量大的报刊等等。完成这些计划所需经费远远超过反对派在其成员中所能募捐到的钱数。不过,莫利尼耶还有虽然模糊但并非难以置信的财政计划。他准备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并已开始安排如何使用期待中的利润了。[①]

罗斯默和纳维尔展望前景时要慎重得多。他们根本不考虑莫利尼耶策划的"大规模行动",而倾向于在开始阶段仅满足于坚持不懈的小规模宣传工作,即在成熟的左派成员中宣传解释反对派的思想。他们担心莫利尼耶的冒险可能会有损于反对派的声誉,因而不信任他。罗斯默说:"他不是一个战斗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事务主义者。"诋毁莫利尼耶的流言开始在巴黎传播,其中之一是他当年服役时当过逃兵,后来他在法庭上辩护时说他反对服役是出于宗教原因,这有损于共产党人声誉;还断言、暗示他的商业活动的性质不可告人,但是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托洛茨基尽管承认莫利尼耶的某些缺点,但却由衷地信任他。莫利尼耶的精力、创造性和勇气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其支持者身上的这类品质总是分外看重。莫利尼耶是个冒险家,但他身上燃烧着真正的革命激情,还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托洛茨基说,正是这些品质招致庸人对莫利尼耶的不满和造谣诽谤,可他托洛茨基却深知,任何革命运动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他们的蓬勃精力、不可遏制的行动愿望、铤而走险的精神弥补了他们思想上的

① 莫利尼耶一家在巴黎共和国林荫道上有一家小银行。

某些粗陋之处。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中，他往往必须依靠的正是这类人！莫利尼耶心甘情愿地完成种种不大但却重要的托付：帮助托洛茨基安排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建立书记处，保护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著作的利益等等，这使托洛茨基对他产生好感。事实上，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了。莫利尼耶的家人：妻子让娜、弟弟亨利(一个谦虚的工程师，没有任何政治野心)都是有助于他的，因为他们都具有"莫利尼耶家族的精力"。他们穿梭往来于巴黎和王子群岛之间，在比尤克·阿达村度过了不少时光。他们与托洛茨基一家人的关系密切亲热。因此，托洛茨基力求委婉地打消罗斯默的怀疑。尽管他十分重视罗斯默正直的人品和健全的见解，但认为后者不适于从事组织工作，他在派别斗争中遇到小小的磨擦就不知所措，而莫利尼耶对付这些事却游刃有余。当纳维尔公然反对莫利尼耶时，托洛茨基失去了对前者的耐心，指责他的"知识分子的傲慢"、"公式化的思想"、政治上的懒惰和"不愿意在群众中做工作"。托洛茨基总算暂时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争斗，罗斯默、莫利尼耶和纳维尔接受了一个"解决方案"，答应超越个人情感携手共同工作，他们返回巴黎，试图建立不仅是全法国的，而且还有国际的反对派组织。[1]

托洛茨基满怀希望。诚然，在法国打下的"基础"比期望的要窄得多，但作为宏大组织的萌芽来说，也就够了。然而此时业已产生了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反对派是否应力求进行"群众工作"，即进行自己的宣传、提出自己的口号，或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过去所进行的缓慢却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小组耐心地宣传自己的理论，它们从事的是思想工作而不是鼓动工作。但这一非此即

---

[1] 这一结论基于托洛茨基、雷·莫利尼耶、纳维尔、维·塞尔日、列·谢多夫以及许多其他人在整个30年代中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彼的选择问题尚未明确尖锐地提出来,因此不必马上作出决定。反对派并不想建立新党,而仅仅作为一个力图对原有的党进行改革的派别这一事实表明,它应该集中力量宣传其理论思想。作为思想家的托洛茨基当然倾向于这种活动方式。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活动家,是反对派的伟大领袖和政委,他对这种活动方式的局限性十分不满,一心向往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1929年夏季,罗斯默乘火车前往德国、比利时,去了解这两国的反对派集团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他与意大利、荷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把自己的发现随时向托洛茨基详细地汇报。总的来说,他的汇报并不乐观;无所事事、派别间的勾心斗角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大大地削弱了法国反对派,也给其他地方的反对派造成损害。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德国是欧洲阶级斗争舞台上最重要的国家,德国共产党得到几百万选民的选票,是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罗斯默汇报说,他在柏林找到了几个承认托洛茨基权威的派别,但它们把力量消耗在相互斗争之中。所谓的魏金格派由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构成,但更有影响的是"列宁主义者同盟",它出版一份《共产主义旗帜报》,其领导人是雨果·乌尔班斯(Hugo Urbahns)。那里还有其他"极左"小团体,例如所谓的科尔什派,该派由1923年在图林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府中任部长的卡尔·科尔什(Karl Korsch)而得名。由马斯洛夫和费舍领导的季诺维也夫派更有力量。在他们的精神领袖投降之后,他们却持极端的反斯大林的立场,这确实有些古怪,正如同俄国工人反对派残余的立场一样,他们对官方共产主义的攻击比托洛茨基走得远得多。他们证明,俄国革命过程已经完结,在苏联,反革命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专政已荡然无存,执政的官僚作为新的剥削压迫者阶级登台,他们依靠的是国有化经济形成的国家资本,总而言之,俄国的热月政变已经获胜。他们还补充说,斯大林主义

的对外政策与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毫无区别。因此，任何改革都不能使工人阶级重新掌权，唯一的出路是再发动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改良第三国际的企图也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它已沦为"俄国热月政变分子手中的武器"，它利用十月革命的英雄主义传奇遮住工人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到事实真相，并利用他们的革命干劲为反革命利益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与苏联团结一致，更谈不上捍卫它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一事作为自己观点的铁证。他们写道："驱逐托洛茨基一事是分水岭，它表明俄国革命到此已经结束。"

托洛茨基为反对其捍卫者的过分热情而进行自卫。在与"列宁主义者同盟"和《无产阶级革命报》争论时，他磨砺了他昔日的论据，用以反驳苏联热月政变是既成事实的断言。托洛茨基再次把热月政变界定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时指出，这一政变只有经过内战才能成为现实，苏联没有再次经历内战，1917 年建立的体制尽管出现了蜕化，但仍保持了继承性，这点体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始终由布尔什维克掌权上。托洛茨基写道："20 世纪俄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是 18 世纪法国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十月革命所依靠的社会阶级远比当年法国城市贫民强大、纯洁、团结、果断。十月革命领导层的经验和水平远远超过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最后，雅各宾派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根本不能与布尔什维克专政所造成的变化相提并论。如果当年不经过使无套裤汉遭到失败的内战，就不能把权力从城市贫民手中夺过来，现在怎么能设想并相信平静的、不知不觉的官僚蜕变会使政权能够从俄国无产阶级手中和平地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呢？这样的热月政变概念恰恰是一种与改良主义截然对立的东西。"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从前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迄今仍掌握在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土地已经国有化。靠剥削劳动为生的社会成员仍不允

许进入苏维埃和军队之中。"热月政变的危险是相当现实的,但斗争尚未结束,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和对新耐普曼的进攻并没有消灭热月政变的危险,正如同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并未把革命化为乌有一样。在评价事实和推理时要有分寸感。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资本主义。如果讲此话的人是在谴责国家所有制,那他们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同样,官僚集团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新剥削阶级,而是"工人阶级躯体上的毒瘤"。新剥削阶级不可能在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情况下产生于普通的管理职能中。①

1929年夏天,当苏联和中国因中东铁路爆发冲突时,这场争论的意义变得十分明显。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索要租让给后者的铁路,于是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反对派应该站在哪一边?法国工团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同盟"和某些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者断言,苏联政府应该放弃这条铁路(它是在沙皇向满洲扩张时由俄国修建的),认为斯大林拒绝归还铁路是其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证明。使他们吃惊的是,托洛茨基竟声明斯大林不归还铁路是正确的,反对派的义务是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中国。② 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年中,这是托洛茨基与其支持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争论。我们看到,在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最后一年中,即1939—1940年间的苏芬战争时期,在他与支持者之间又发生了另一场重大争论,它仍是围绕着反对派对苏联的态度展开的;总的来说,在这场争论中,他阐述的仍是1929年的观点。

---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213-217页。

② 1926年,托洛茨基曾任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一职,当时,他除了其他工作外,力求保证苏联对满洲的影响。《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中叙述了他当时所起的作用。

托洛茨基声称,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工人政府把重要的经济与战略阵地拱手交给蒋介石政府(它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租赁)。托洛茨基尖锐地批评斯大林对待中国人的行为,批评他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愿意诉诸满洲人民,考虑更加周密的政策则完全可以防止冲突的发生。托洛茨基断言说,既然冲突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除了支持苏联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斯大林把铁路交给国民党,他不是对中国人民而是对他们的压迫者让步。蒋介石本人也不自由,即便他获得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他也掌管不了这条铁路,迟早会失掉它而让日本人得到,或是让美国资本控制满洲的经济。只有苏联有足够的力量保住满洲的这些阵地,不让它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有些批评者以这是中国国家主权为理由,但托洛茨基认为,此事与中国国家主权无关,因为这仅仅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工人国家之间复杂的全面对抗中的一个事件。托洛茨基总结说,在北京建立起革命政府之日,就是苏联政府履行其历史公正并把满洲铁路归还给中国之时(中国革命胜利后,他的这一预言实现了)。而目前,苏联政府还得充当中国革命的代理人,并为后者保存它在满洲的财富。[①]

不难想象托洛茨基在狂热的反对派中引起的混乱。他的"反复无常"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他放过了打击斯大林的大好时机。当然,托洛茨基不想单纯进行报复。他的所作所为与他对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整体看法是一致的。如今,他虽然成了流亡者,

① 1935年,斯大林为日益迫近的战争而担心,为了延缓日本对苏联的进攻,他把铁路卖给了满洲的傀儡政府。1945年,苏联恢复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直到1952年9月,斯大林几经犹豫后,才把它交还给毛泽东政府。这是斯大林最后几个重大的政治决策之一。此前他奉行向中国渗透的政策。放弃中东铁路预示着他的继承人将彻底放弃渗透政策。在这一决定及其他一些决定中,斯大林及其继承人成了托洛茨基大约在25年前阐述的政策的不情愿的执行人。

但他仍感到他对这个国家所负的责任,就像当初他是列宁的政治局和政府成员时一样。他认为,他的某些学生对苏联政策无可厚非的愤怒是错误的、廉价的,并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这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们不愿意坚定不移地支持工人政府,即使不是没有批评。

托洛茨基严格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不允许任何片面性来冲淡它们,这伤害了他的许多老的和潜在的支持者。此外,托洛茨基发起的这一运动陷入困境,一是由于托洛茨基一丝不苟的原则性,二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在广大的欧洲共产党员中,托洛茨基思想能在其心中引起反响者屈指可数,迫害又使这些人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敬而远之。在选择论据上仔细斟酌,使托洛茨基有别于他的支持者那虽然分散、但却不断壮大的反斯大林团体,它们由被开除的党员组成,都力图在本国领土上与斯大林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像后者那样无所不用其极、那样歹毒。这些人根本不会接受托洛茨基的克制的论据。

因此,经过一两年的劝说和招募,跟托洛茨基走上他这条艰难道路的人并不太多。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团体。某位意大利政治局委员或比利时中央委员,再不就是捷克甚至还有英国积极分子的小团体,突然看到光明,满怀希望地加入了反对派。但是,这样的联合丝毫不能改变反对派的整个处境。即使加入者中的某些人在此前不久在其各自的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工人阶级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但只要党一开除他们、对他们加以迫害、诋毁他们、像驱赶麻疯病人一样驱赶他们,他们的影响和联系就丧失殆尽。一切都对他们不利:莫斯科的权威,各国共产党的声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纪律,庄严的群众大会,无数宣传鼓动人员——其中某些人比暴徒好不了多少,但大多数是出于对事业的狂热、盲目的忠诚而变成了道德上的杀人犯,他们杀害的是不久前的同志。托洛茨

基主义者中的新人充满了信心，他们决心震撼他们所热爱的党，让它也看到他们在研究托洛茨基著作时看到的光明。但很快他们就被封闭在几个与世隔绝的小组之中，不得不习惯于像高尚的麻疯病人那样在政治沙漠中生活。那些不能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的小团体很快就丧失了信心。不论他们多么聪明、精力多么充沛，都无法在实践中施展他们的这些长处，而只能把力量消耗在不切实际的理论纠纷、个人间的深深的敌意上，这些又导致无休止的分裂和彼此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宗派主义的勾心斗角是任何一场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朝气蓬勃的运动和日益衰败的宗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及时找到摆脱勾心斗角和分裂的救命之路，开始真正的群众政治运动，而后者却不能。

托洛茨基主义者各团体中都不乏聪明正直、充满热情的人。但他们无法打破斯大林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流放命运，在那极其黯淡的处境中永远不能克服他们的内部分歧。因此，托洛茨基刚刚千方百计地使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和解，他们马上又大动干戈。罗斯默和纳维尔又开始抱怨莫利尼耶，指责他不负责任、鲁莽，后者也指责他们缺乏信心、破坏所有的行动计划。一个小小的组织居然赋予自己以庞大组织的结构和外貌，它有全法执委会和巴黎委员会两个机构。在全法执委会中，罗斯默和纳维尔占多数，他们以莫利尼耶的经济事务有损于反对派声望为由建议将他开除。但是，巴黎委员会支持莫利尼耶，它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罗斯默恳求托洛茨基帮助全法执委会摆脱这一困境并停止庇护莫利尼耶。[1] 但此时，托洛茨基与莫利尼耶的关系十分密切，

① 参见1930年6-7月间托洛茨基与罗斯默的通信，以及1930年8月18日托洛茨基致M.沙什曼的信；1931年1-2月间致莫利尼耶的信；1931年6月28日致沙勒罗瓦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他与罗斯默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写给后者的信也相当冷淡生硬。这一竞争波及到反对派建立的两个准国际机构：国际局和国际书记处，它们也彼此仇恨。[①] 1930 年夏天，托洛茨基再次邀请其法国支持者前往王子群岛，以便调解他们之间的争执。他们来到王子群岛，达成“和解”，托洛茨基将他们派回巴黎，并深信这次他们终于将同心同德地开始拖延已久的进攻，他对这次进攻寄予厚望。但还没过几个星期，冲突重新爆发，11 月里，罗斯默因托洛茨基偏袒莫利尼耶而感到委屈，递交了辞呈。这是对整个组织及托洛茨基本人的打击，他深知在其欧洲支持者中罗斯默的威信最高。但托洛茨基坚信，莫利尼耶很快就会使组织摆脱困境，那时罗斯默一定会回来的。甚至罗斯默在递交辞呈时仍向托洛茨基证明了他罕见的忠诚——他没有进行任何争辩，没有与托洛茨基公开冲突，便退出了一切派别活动。但托洛茨基的举止使他如此委屈，以至几年内他一直拒绝与托洛茨基会晤，甚至不与后者通信。

类似的分歧即便不是所有托派组织的也是其大多数组织的慢性病，在这些分歧中，个人因素与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仅仅因为巴黎现在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法国的榜样就具有更大的传染性。争论的人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一样，都无

① 国际局是在 1930 年 4 月召开的几个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大会上建立的，其成员是罗斯默（其副手是纳维尔）、美国的沙什曼、德国的兰道、西班牙的尼恩和俄国的马尔金。列夫·谢多夫（即廖瓦，他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化名为“马尔金”，代表俄国反对派。但国际局未能行使职权，因为沙什曼回到美国，尼恩很快被投入西班牙的监狱，而马尔金又无法离开王子群岛。当在巴黎成立书记处时，它的主要人物是纳维尔，其成员有意大利人苏佐、美国人米尔。米尔很快就被揭穿，他原来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书记处与国际局一样，未能发挥作用。后来，托洛茨基试图借助谢宁－索博列维丘斯和韦尔来加强它（参见 1931 年 12 月托洛茨基致韦尔的信）。

足轻重，而勾心斗角又是如此可憎，即便托洛茨基加以干预也不能加大它们的分量、使它们载入他的传记。随着岁月的推移，托洛茨基对这类冲突干预的方式令人怜悯，有时甚至十分荒诞。由于每次争论都震撼着整个组织，这些琐碎小事吞噬了托洛茨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时而支持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充当着仲裁人的角色。托洛茨基与全球各处的托派团体保持联系，他不得不处理多得不可思议的争执，由于他又鼓励反对派的各个团体要互相关心，于是他无休止地撰写通报，对比利时人解释法国人为什么争吵，告诉希腊人德国同志之间为什么不能协调一致，让波兰人了解比利时和美国反对派成员中各派之间的有争议的问题是什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①]

托洛茨基在从事所有这类工作时坚信他是在从事启蒙工作、训练新招募的共产党员和新的干部。反对派的人力资源的极端匮乏及其组织的软弱都不能令他却步。他认为，运动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其最终会赢得胜利的思想力量；因此主要任务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又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得到保障；而任何组织都应在现实环境及现有人力资源上进行其自身的建设。有时，托洛茨基支持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使他陷入绝望，使他考虑他是否在无谓地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一想到列宁在其侨居国外时的派别斗争岁月中常常谈到的托尔斯泰的一个主人公，便感到安慰。作家描写了一个人，他坐在路当中做着令人不解的狂躁动作，来往行人不由得认为他是疯子。但走近后看到，令人费解的躯体动作是有其理性目的的：此人正用磨刀石磨

① 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有300个卷宗，内装约两万封信，其中约9/10是托洛茨基与其支持者之间的通信。档案中相当一部分是他就各托派团体的政策、策略和组织问题所写的文章。

刀。因此，托洛茨基本人为其支持者所做的工作尽管有时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但他迫使自己相信，他是在磨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意志。当他不得不把伟大的原则和猥琐的争吵混在一起时，他强压下自己的厌恶，为其支持者耗尽自己的耐心和全部信念的力量。但他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在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革命的熊熊烈火就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点燃的。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是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在他们当中，激情和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些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托洛茨基认为，他们当然不是或“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与托洛茨基之间如此之大的心理距离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托洛茨基的本意，他更愿意与另一些朋友和学生交往，他们被关押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监狱和集中营中，饥寒交迫，仍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之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有时，他无意识地宣泄这种情绪，如 1931 年他为科捷·钦察泽（Коте Цинцадзе）的逝世撰写悼词时那样。钦察泽从 1903 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期间领导高加索的契卡工作，后来作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而遭流放、监禁、拷打。他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但他仍坚持斗争，在监狱中组织绝食，死于监狱之中。在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悼词中，托洛茨基摘录了钦察泽信中的一段预见性的话：“我们的许多朋友和与我们接近的人将……在监狱或某个流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其结果是丰富革命史，年轻的一代将接受这一教训。”此信是他寄给当时尚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

托洛茨基指出,"西方共产党尚未培育出钦察泽型的战士",[1]这是它们的致命弱点,同时也是反对派的弱点。他承认,在西方反对派成员中竟有如此严重的虚荣和自私自利,使他不胜惊讶。他并不否认,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往往是奋发努力和成功的动力。但是,"当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完全彻底地服从于为伟大的思想服务时,他才能成为革命者……。"遗憾的是,在西方只有少数人学会严肃地对待思想,"与思想调情"、浅薄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西方是极其普遍的现象。[2]

托洛茨基难得允许自己如此抱怨。他认为,因历史形成的人力资源素质低下而激动痛苦没有丝毫裨益,只能用这种材料造就"新的钦察泽型"的战士。

※ ※ ※ ※ ※

此时,苏联境内的反对派已经失败,钦察泽型的战士不是被从肉体上消灭,就是士气低落。他们处于双重的绝境中:一是斯大林的恐怖措施,二是自身问题。早在1928年初,当时托洛茨基还在阿拉木图支撑着他们的反抗精神,苗头就已出现了:反对派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据我们所知,当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的联盟破裂并开始推行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时,在反对派之中就产生了分歧。这些事件使反对派的某些基本要求和战斗口号过时了。反对派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逐步使农村经济集体化。他们指责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设置障碍,指责他保护富农的利益。1928年,当斯大林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反对农村私有经济时,反对派开始时为这些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1931年3月第19期。

② 同上。

变化而庆幸,把它们看成是自己正确的证明。但后来他们感到,他们的思想和口号被剽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存在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只允许最低限度的政治辩论的制度下,一个政党或派别眼看着对手剽窃了它的口号、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实现它的大纲,都是不幸的。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成员甚至不能暗示他们的思想被剽窃,也不能对全国指出:当初斯大林分子说他们是"超级工业化者",诬蔑他们是"农民的敌人",这些指责纯属诬谄、乱扣帽子。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本身虽然明确地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但却宣判了它的失败。现在,反对派已不清楚它是否应当、是否还有理由继续反对斯大林。在1929年年中之前,即在斯大林决定实现"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之前,他的政策完全符合反对派的要求。如果对任何一个政党或派别来说,看到它的纲领被抄袭和利用都十分痛苦的话,对托洛茨基派来说,则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因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成为迫害、诬陷的对象。其中某些人开始提出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受苦和让自己的亲人遭受最惨重的损失。他们自问,是否该放弃斗争,甚至与自己琢磨不透的迫害者和解呢?

陷人这种情绪中的人很容易接受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据,他们认为,妥协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反对派应该为它的思想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其思想的实现是由它的迫害者完成的。他们说,斯大林确实丝毫没有恢复反对派坚持的党内民主的打算。但是由于他实行了反对派纲领中的大部分,因此有理由期望他会最终实行剩余部分。如果反对派回到党的队伍中,至少它有更多的机会促进党内民主,如果他们继续留在集中营内,他们就无法对此施加任何实际影响。无论他们为什么而斗争,他们都应在党的行列中,托洛茨基曾指出,党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推动社会主义

进步的"唯一工具",反对派只有通过党或留在党内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目前,无论是拉狄克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并未提议投降,他们只是推荐更为妥协的立场,它能为恢复党籍的条件谈判提供机会。

由索斯诺夫斯基、丁格尔施泰德,有时还有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反对派成员否定了这种看法,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认真地进行工业化和反富农的斗争。他们把"左倾方针"看成"暂时性策略",此后将出现对农村资本主义、新耐普曼的重大让步和右派的胜利。他们否认事件超越了反对派的纲领,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对自己的立场稍加改变。最乐观的人还像以往一样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说,如果斯大林继续推行"左倾方针",它的逻辑将迫使斯大林放弃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如果他实施新耐普,"接踵而来的向右转"将破坏他本人的立场,为了恢复平衡,他不得不与托洛茨基派妥协。因此,反对派如果试图以放弃原则,特别是放弃发表意见和批评自由的要求来换取恢复党籍,那是不明智的。总之,这是"正统托洛茨基派"的观点。

说反对派的纲领已经过时这一断言不仅在妥协派中传播,坚决不妥协的一翼却更起劲地支持这种说法,但其理由与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截然相反。这些小组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党叛卖了革命,期望改革纯属徒劳,这已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反对派应筹建新党,宣传并准备一场新的革命。目前,这派中的某些人认为斯大林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更有甚者说他是"富农民主"的领导人,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他的执政表明社会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国家资本主义的抬头。

直到1928年底,这些对立倾向尚未激烈到破坏反对派表面统一的地步。在各流放地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托洛茨基凌驾于争论之上,保持各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平衡。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君

士坦丁堡之后，分歧加深了，对立的各派之间的距离也更远了。妥协派力求回到党内，逐渐“放宽”他们与斯大林谈判的条件，直到他们的妥协最后变得与投降别无二致。另一方面，不妥协派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如此敌视，以至不再注意他的政策以及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他们像狂人般地固执重复昔日对斯大林的谴责，不管它们与新事实相关与否。这两个极端派别都认为对方是叛徒、变节者。不妥协派早就痛斥他们的“妥协派”同志为“斯大林的仆人”，而后者认为，不妥协派是丧失理性的人，他们早已不再是布尔什维克，已沦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反革命。这两个极端派别的力量都在增长，只有中间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地盘越来越小。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还不到3个月，反对派表面上的一致便荡然无存。斯大林觉得，一旦把托洛茨基与其支持者隔离（恢复联系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恩威并用、轻而易举地使反对派分裂并摧垮它的士气。恐怖手段的使用对象是有选择的。格别乌对妥协派手下留情，但对流放地严加清理，把最坚定的不妥协者全部逮捕、投入监狱，在那里，他们受到最残酷的惩罚。看守他们的是军人，让他们挤在潮湿阴暗的牢房中，在西伯利亚的隆冬也不给他们生火供暖；只给他们少量腐烂的食物，不给书籍，不允许他们与家人联系。就这样，他们被剥夺了沙皇俄国的政治犯所能享受的以及在内战末期布尔什维克给予反布尔什维主义者的那种权利。大概是在那个时期，斯大林下令释放了一小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似乎是为了更无情地嘲弄昔日的同志。1929年初，托洛茨基主义者描述自己在托博尔斯克制度森严的监狱中的生活时，把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死屋手记》一书中对苦役犯生活惊心动魄的描写相比较。[①] 如果说恐怖的目的是恫吓“妥协分子”并把

① 参见1929年8月20日的报导，载《反对派通报》第1－2期合刊。

他们引诱过来的话，显然，它还有另一个企图，即迫使"不妥协分子"公开表明他们对现存制度怀有深仇大恨，于是更容易把他们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扩大他们与"妥协分子"之间的裂痕。

不过，斯大林单凭恐怖手段是不能搞垮反对派的，更有效的武器是他的"左倾方针"。拉柯夫斯基指出："如果没有残酷的镇压，'左倾方针'将把新的支持者带到反对派的队伍之中，因为它意味着斯大林早期政策的破产。但是，没有新方针，镇压也不会得到它所取得的效果。"[①] 在托洛茨基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几个月中，斯大林在相关政策上的摇摆已经结束。在2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与布哈林彻底破裂，当时托洛茨基尚在赴土耳其的途中。4月，冲突从政治局扩展到中央委员会，尔后又搬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会议向人民大声疾呼，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其中一部分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托洛茨基过去的呼吁。[②] 托洛茨基和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改变政策是"临时性策略"，现在，这一看法越来越站不住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反复断言，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并非儿戏（即便他想把它当儿戏，时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事实说明，他们的看法更接近事实。

很快，反对派的两难选择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对于反对派来说，现在再喋喋不休地重复过去的口号、要求大规模的工业化、抗议安抚农村资本主义和讲什么新耐普的威胁，那就会成为笑柄。反对派或是应当承认斯大林替它完成了它未竟的事业，或是为今后的斗争重新从政治上武装自己。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还有其

① 《反对派通报》1929年11－12月第7期。

② 参见《联共（布）论工会》第450页。在大会决议中把托洛茨基10年前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号召一字不差地抄了下来，当然没有标明出处。《苏共决议汇编》第2部分第495页；另见《苏联工会》第95－97页。

他一些人确实力图使反对派的思想赶上现实,但事件超越了最敏捷的理论家。

国家局势的变化给反对派造成的混乱并不亚于官方政策的改变。那是十分困难的时期,斯大林本人对此并不讳言。[①] 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这点上都有共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并不热衷于夸张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 1929 年春天的紧张局势与导致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紧张局面相提并论,布尔什维克认为那次叛乱比内战过程中的任何危机时刻都更加危险。[②] 拉狄克在提到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冲突时声称,"中央委员会好像热月 9 日前夜的雅各宾派的国民议会",雅各宾派的垮台就在那一天。拉柯夫斯基把这个时刻定性为"内战以来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点上,所有观察家都无异议。

在几年之内,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宽、更深,2500—2600 万户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养活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城市几乎总是生活在饥饿的威胁下。结论是,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来取代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才能解决这场危机。在这个习惯于粗放耕作、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只有通过对农村资本主义的有力扶持或将其集体化才能做到这点,舍此别无出路,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会充当农业资本主义的养父。一旦它走上这条路,它就放开了强大敌对力量的手脚,损害计划中的工业化的前景。[③]

① 《斯大林选集》第 12 卷第 118 页。

② E.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反对派全体成员的公开信》,托洛茨基档案。下面我还将摘引这个文件。还可以参见拉柯夫斯基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报导。

③ 大型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是英国和美国工业化的农业基础;在德国工业高涨时,容克和大庄园在德国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在所有国家中,工业化过程的开始都以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为基础。可是,20 年代的俄国没有这一基础。在农业生产中,以资本主义竞争的正常方式扩大规模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需要采用市场自由的法则。

这样，只剩下了唯一一条路——集体化，尽管诸如集体化的规模、方式和速度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几年来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只能导致它不得不在更恶劣的条件下解决集体化问题，如果早几年着手的话，条件要好得多。斯大林试图把截然对立的政策结合起来：安抚富农，然后征收他们的产品，这激怒了农民。他迟迟不愿发展工业也具有同样灾难性的后果。事到如今，农村不能也不愿意养活城市，城市也不能给农村提供工业产品。农民买不到鞋、服装和农业工具，因此他们对扩大生产毫无兴趣，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饥饿的城市和没有工业产品的农村都处于骚动之中。

在人力、物力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通过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及规模的决议，而这两种资源又是在这两条战线展开进攻时所不可或缺的。工人没有足够的面包，工业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和设备。机床由于没有燃料和原材料而停止转动，而原材料的供应又取决于农业经济。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它不能保障不断增长的工业货运的需要。所有的货物及服务都是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限定价格和非限定价格之间完全脱节，二者都不能反映真正的经济价值和价格。

除了贫穷和绝望之外，政治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环节都被切断了。不仅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交换再次中断，而且公民与国家之间所有的正常关系、甚至连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破裂。欺骗、暴力横行无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斗争中都无所不用其极。富农、许多中农、甚至还有贫农都极端仇恨“政委”。焚烧房屋、杀害党代表和宣传鼓动工作者的事件在农村每天都有发生。农民的情绪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在革命的第12个年头，人民的贫穷、政府的失误和滥用权力引起了如此强烈而普遍的震动，这意味着将发

生一场重大或可怕的事件,必须当机立断,或是压下或是释放这些积聚的感情。潜藏的力量在沸腾,它们会导致大爆炸。1956年的匈牙利暴乱与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被逼到角落,越来越冷酷地搏斗着。

"革命在危机中!"被流放和被监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高呼这个口号,无论是正统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还是"妥协派"都同样感到担忧,但前者看不到他们在当前条件下的出路,认为他们应该全副武装地迎接日益迫近的危机,"妥协分子"则相反,他们听到了"立即行动"的召唤,于是高呼着"革命在危机中"的口号开始投降。投降者中的优秀分子是由于坚信,当事关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时再抓住派别利益和个人野心不放就是犯罪。最差劲的就是那些心灰意懒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在"革命在危机中"看到放弃为已失败的事业而斗争的最好借口。处于优秀分子和恶劣分子之间的一般的"妥协派分子"也许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兼而有之。

1929年4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表了《致反对派全体同志的公开信》,用以号召妥协派分子团结起来。[1] 这是一份令人惊讶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这位妥协派分子在投降迫使他沉默之前最后一次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他回顾了反对派的迷误,展望了痛苦艰难的前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已被其思想胜利赶入绝境。他指出,许多同志宁愿否定胜利,也不愿承认绝境,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似乎他们有关新耐普和"向右转"的预言都已兑现,似乎"左倾方针"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当然,斯大林推行的"左倾方针"与他们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反对派期望的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灿烂阳光下进行,它们能得到群众的

① 托洛茨基档案。

赞同，而且有来自“下面”的无拘束的首创精神，而斯大林却动用了法律的力量和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尽管如此，反对派应该支持斯大林的工作，虽然他的行动方式令他们反感。如果反对派拒绝承认这点，那么它就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它为了自我辩解而背离自己的原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否定反对派的过去，他说："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时至今日，反对派的职责是与党靠拢、然后回到党的队伍中。这位发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家在此说道，"在农民国家中推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反对农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政策，必然会引起不满，所以应该共同抵制这种不满的压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谈到斯大林在阶级敌人，即土耳其政府的协助下驱逐托洛茨基，这件事甚至在妥协派中也引起了不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对此决不饶恕"，但他建议说不能让义愤遮住对共同特点的认识，他还补充说，托洛茨基利用资产阶级报刊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这也使反对派陷入困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妥协派未来的命运并不抱太大的幻想。他已预见到在未来几年的危机时刻中他们会遭到打击和侮辱，但即便是他也未必料到他们将面临的使其毁灭的全部恶毒攻击与血腥手段。但他也相当清醒地为他的同志们指出，他所号召他们走的路是一条充满不安和考验的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对真正体面的妥协还抱有希望，如今它已越来越小，现在他认为，重返党内实际上就是投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总结说："我们之中有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已经战斗了10到20年之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1904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他们返回党内时的感情与当年初次入党时的感情截然不同。"他们重新入党时已经没有昔日的热忱，而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他们甚至对中央委员会是否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都没有把握。"这次重返党内的形势就是这样。党内局势就是这样，在恢复

党籍的情况下,我们将对我们曾警告过、反对过的事情负责,并服从我们不同意的(方法)。……如果能恢复我们的党籍,我们将拿回如同十字架一样沉重的党证。"但对于那些希望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来说,除了背起这个十字架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5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获准返回莫斯科,以便"与党言归于好"。开始时,他试图为整个反对派争取更好的条件,他请求废止恐怖手段、流放,为据刑法第58条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党员平反,最后(按顺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是收回驱逐托洛茨基的成命。他与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及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谈判,这些人都在斯大林的监督下活动。

对斯大林来说,大部分反对派成员的投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会对党的士气和托洛茨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力求把妥协分子吸引过来,为了不让他们马上失望,他装出准备考虑他们的几条建议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一条也没有接受。首先他不允许反对派成员声明他们返回党内是因为党接受了他们的纲领。原因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仅是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辩护,还揭穿了镇压是非法的这一事实,而斯大林正是凭藉镇压才战胜了他们。他不允许任何人提到他剽窃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一页(是何等重要的一页),连暗示都不行。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打破他对永远正确与政权的奢望。投降者应该声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本人和托洛茨基。他们应该谴责并否定他们的过去。不允许他们作为一度遭人误解的人回到党内,而应作为"左倾方针"和逐步导向这一方针的全部政策的忏悔的怠工者回到党内。甚至不允许他们在党内引起浪子回头所能引起的感情。他们所能指望的只是得到对已被摧垮的道德上的罪人或罪犯的宽恕,他们应跪着走完归程。为了迫使他们就范,斯大林只需以拖延和坚持自己的条件消耗对方。他就这样粉碎了他们的理性防线,迫使他们一个接一个

地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直到无条件投降。斯大林的举止并不奇怪。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皮达可夫所接受的投降条件及迫使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自我欺骗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许多"妥协分子"从远处不安地注视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的谈判（他被允许与流放地的流放者们联系），还希望他们能避免前一批投降者所遭受的耻辱。

一个月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谈判"结果已反映在他最亲密的同志的行为之中。6月中旬，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在格别乌工作人员的押解下返回莫斯科，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同参加谈判。当火车停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火车站上时他们在那里与一批反对派成员不期而遇，后者在信中记述了这次巧遇，该信保存在托洛茨基的档案中。他们当时只与拉狄克进行了交谈，斯米尔加因病躺在包厢中。拉狄克对他们讲了此行的目的，并引证了当时已广为人知的有利于投降的论据：全国性的饥荒（甚至在莫斯科也能感到食品匮乏）、工人阶级的不满、农民暴动的威胁、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中央委员会中，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都想把对方逮捕），等等、等等。拉狄克说，局势同1919年一样严重——那时邓尼金兵临莫斯科城下，尤登尼奇进军彼得格勒，并说他们应当在党内团结起来。他们问他：有没有条件？他在莫斯科是否会要求取消刑法第58条这一打在反对派身上的烙印？拉狄克回答说，不，对坚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来说，这是罪有应得。他喊道："你们是自作自受，是你们自己把自己赶到流放地、赶进监狱的。"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声明反对派"不能宽恕"驱逐托洛茨基的行为至今只过了几个星期，距《胜利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这篇著名随笔的作者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也不过几个月。那时他在抗议信中反对它把"革命的战斗心脏"交付给"慢性死亡"，抗议信的最后一句是："这场拿托洛茨基的健康和生命所做的毫无人性的游戏应该收场了！"但在

近几个星期之中,向斯大林投降的逻辑起了自己的作用。因此,当拉狄克被问及他是否会要求让托洛茨基回国时,他答复说:"我与列夫·达维多维奇分道扬镳了。现在,我们是政治敌人,我与为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①]勋爵的报刊写作的作家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段话令他的听众不胜惊讶。(拉狄克本人以前经常为资产阶级报刊供稿,以后也这么做,但已是为斯大林效力了。)[②] 拉狄克狂怒的答复暴露了他的内疚。他继续恶毒地议论那些新近参加反对派的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断言他们没有一点儿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加入反对派纯粹是出于对苏维埃的仇恨。接着,他再次向交谈者呼吁:"最近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接受了我们的立场,这证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反党能有什么结果?"格别乌的押解人员给了拉狄克一个最好的回答,他们打断了他的话,吼叫说不允许他进行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宣传,推推搡搡地把他带回车厢。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我?我进行反对驱逐托洛茨基的宣传!"然后,他低三下四地辩解说:"我无非是想说服这些同志,让他们回到党内。"但押送人员连听都不听,把他拖进车厢。一年前,拉狄克还嘲笑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说"他们及他们的忏悔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式的令人厌恶的臭味"。如今他本人,这位抨击性文章之王,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西伯利亚小车站上向不久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讲话时,活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走下来的斯美尔佳科夫。

---

① 比弗布鲁克,威廉·马克斯韦尔(1879-1964)男爵,英国报业大王。——译注

② 托洛茨基不得不经常为反对这种指责而自卫,最早这样指责他的是其法国支持者,1929年2月24日,罗斯默在其信中将此事通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复信中说,马克思也不得不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稿谋生。托洛茨基在《反对派通报》第一辑的一则短讯中向苏联读者解释自己的处境,并强调,即使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稿,他仍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讲话,仍在捍卫革命。

又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及其他400名流放者终于在7月13日宣布投降。[1] 斯大林从中获益甚大。自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7年12月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投降以来，还没有一件事能如此抬高斯大林的声望。由于这时正值斯大林集中兵力进攻布哈林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垮台使他避免了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托洛茨基曾反复说过，在面临"来自右倾的严重危险"时，托洛茨基派将和斯大林派联合起来。当然，他们现在是这么做了，不过却是按照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不在的情况下，甚至是违背后者的意愿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投降者中的许多人才能出众，经验丰富，他们可以担任工业和行政职务，有助于他将布哈林派成员排挤出去。他知道，为了工业高涨，投降者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之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将在最早的投降者皮达可夫的领导下工作，后者领导着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是它的灵魂。对斯大林来说，作为宣传鼓动工作者的拉狄克一个人就比他所有的笔杆子加在一起更有价值。

托洛茨基马上攻击这"第三批投降者"(第一批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第二批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皮达可夫和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写道："他们声称，斯大林与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几乎全部消失。那么，他们如何解释疯狂的镇压呢？如果说在没有不可调和的深刻分歧的情况下斯大林分子发配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那就是单纯出于官僚集团的土匪行径，而不是为了达到任何政治目的。如果按照拉狄克的观点，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如此。那么，他与他的朋友们还敢公然拥护与政治土匪一致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的评价则完全不同。他断言，斯大林对反对派不

---

① 《真理报》1929年7月13日。

可调和的仇恨虽然没有规律可循,但却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所有的主要矛盾都依然存在。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不到或装作看不到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已被摧垮。革命是一架巨大的吞噬性格的机器,每个反动时期都把疲惫的一代战士作为自己的牺牲品。但是,年轻人迟早会取代老人和疲惫者,他们将朝气蓬勃、英勇地投入战斗,还会从老一代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长期不懈的斗争和繁重的启蒙工作。”[①]

事实上,托洛茨基刚开始听到拉狄克投降的消息时对之将信将疑。他把拉狄克的行为归结于他好冲动的性格和与世隔绝、得不到同志们道义上的支持这种处境。托洛茨基亲切地回忆说:“拉狄克具有25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的经验”,并怀疑拉狄克是否真会与斯大林主义和解:“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更重要的是他有国际主义的世界观。”但当刊登拉狄克悔过书的那份《真理报》出版后,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拉狄克的堕落比我预想的更严重。”即便到那时,这一堕落仍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至托洛茨基认为,拉狄克与斯大林的勾结是暂时的,由于拉狄克经常在党内左右两派之间摇摆不定,所以很快就会与布哈林分子联合。但是仍有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暧昧之处:“拉狄克及某些其他人都认为最合适的投降时机已经来临。为什么呢?难道你们看不到斯大林正在迫害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吗?原因就在于此。莫非我们的任务就是执政派的一个集团迫害另一个集团?莫非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莫非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不是依然如故?未来有什么保障?”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看成是激进的新开端。托洛茨基反驳说:“最关键的不是官僚主义五年计划本身的统计方面,而是党的问题”,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57-163页。

是党的指导精神，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党的政策，难道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完成可以从下面进行任何监督、批评和讨论吗？而五年计划的成果如何又恰恰取决于这点。“党内体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监督政治路线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这正是反对派的一贯思想。“但变节者总是健忘或认为别人也健忘。有充足理由说，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记忆的体现。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预见未来而学会不要忘记过去。”托洛茨基还认为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是反对派斗争和压力的副产品。他当时还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政策，虽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冲突很激烈，可实际上仅仅是“表面的”。

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直到秋天才得知托洛茨基的观点，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投降。苏联的转折进一步深化，它对反对派的影响远比托洛茨基预料的要强。在俄国境内的所有反对派成员（连最坚定的人都包括在内）的书信和文章中都能看到局势的严重性和警报，但在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对此连暗示都没有。当时，托洛茨基还是通过 1928 年的多棱镜看 1929 年的局势的，他未必明白国家已濒临于“内战的边缘”。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革命在危机中”这个口号的全部意义。托洛茨基同样没有看到“左倾方针”推进的速度和斯大林与布哈林分裂的深度。但反对派各个集团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

革命正受到最致命的威胁，反对派应该和斯大林一起防止这一危机，很快，这种感觉就推动那些属于“不妥协派”的人追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的榜样。在托洛茨基最亲密的同志当中，打败高尔察克的伊万·斯米尔加、传奇般英勇的战士姆拉奇科夫斯基、政委别洛博罗多夫（托洛茨基于 1927 年 11 月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曾在他家避难）、泰尔·瓦加尼扬（Тер – Ваганян）、鲍古斯拉夫斯基（Богуславский）以及其他许多人也请求恢复党籍。他们开始与

斯大林的司令部进行谈判,但情绪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阴沉,他们希望国家形势能使斯大林在恢复他们党籍的问题上放宽条件,少些凌辱性。[1] 这次,讨价还价持续了5个月之久,从6月一直谈到10月,在这期间,斯米尔加等人准备了4个不同的政治宣言,在8月撰写的初稿中(该稿保存在托洛茨基的文件中)说明他们迈出这一步是因为赞同五年计划和出于反对"右倾危险"。但他们同样旗帜鲜明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并指出,五年计划没有充分看到提高工人低下的生活水平的必要性,"干部的选拔"方式堵塞了批评的言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机会主义烟幕弹",官方对中农的纵容姑息与此同出一辙。对反对派立场的上述几点全部加以肯定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反对派曾认为中央委员会在寻找摆脱危机的道路中会向右转,并为热月政变开辟道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言中的只是布哈林少数派的行为。他们同意,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党的领导不应该允许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因为能从其中获益的只有右倾分子。因此,托洛茨基反对派应该解散自己的"已在种种名称下存在了数年之久"的组织及其领导核心,并停止一切地下活动。但他们要求停止镇压反对派,恳求允许托洛茨基回国,因为"他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都离不开他。[2]

斯米尔加和他的同志们捍卫自己的每一个条件,慢慢地才予以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困境的加剧,斯大林对这批人投降的兴趣确实比以往更浓。他没有像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要求他们作如此屈辱的忏悔。斯米尔加虽然缓和并取消了对斯大林的批评,放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但仍坚持允许他们在投降

---

① 参见拉柯夫斯基的报导,载《反对派通报》1929年第7期。

② 托洛茨基档案。

时提出让托洛茨基回国的要求，就是这个问题使谈判拖延了5个月之久。当他们最后让步时，仍拒绝谴责托洛茨基或与他划清界限，他们屈服的声明刊登在1929年11月3日的《真理报》上，该声明有几百人签名，它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个类似文件更持重、更体面。

现在，投降的情绪已波及到反对派的中坚，波及到最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身患重病、深受心脏病发作之苦的拉柯夫斯基虽然又被从阿斯特拉罕转而流放到巴尔瑙尔，居然有办法把他们团结起来。受他影响的那部分反对派在人数上与站在投降门坎上的斯米尔加的追随者不相上下。拉柯夫斯基声明，“我们为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那些人向斯大林妥协是因为后者完成了该纲领的经济部分，因而幻想他也会完成政治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老牌改良主义者别无二致，只满足于其要求的部分实现。反对派的政治思想与它的经济要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有落空的危险。”对拉柯夫斯基来说，更重要的是信仰的真挚和对对手的光明磊落。党的领导逼迫反对派承认所谓的错误，充其量是摹仿迫使无神论者在弥留时忏悔的天主教教会。这样的领导“因而丧失了所有让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而那些一夜之间改变自己信念的反对派只配得到蔑视”。①

拉柯夫斯基派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它的立场。他们那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直到8月底才写好。在大约90个流放地征集到500个签名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在这份文件中反映签名者见解的细微差别就更加困难。在形式上，此信同样是要求恢复党籍，其基调表明妥协情绪占了上风。拉柯夫斯基和追随他

① 《反对派通报》1929年第6期。

的索斯诺夫斯基、穆拉洛夫、姆季瓦尼、卡斯帕罗夫(Каспаров)以及其他人也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一样声明,是国家的危急形势及党决定实施五年计划促使他们与党中央妥协的。他们断言,计划的成功将会加强工人阶级、巩固社会主义,其失败则会重新打开热月政变和复辟之门。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冲突"面前,他们愿与党求同存异。对他们来说"来自右倾的危险"也同样是迫在眉睫和严重的;他们仍在批评的是党的政策中迟迟不去的安抚"中农"的要求。他们积极赞成加速工业化,甚至在集中营内还要求加强企业纪律、采取果断措施反对企图利用工人的不满达到反革命目的的人。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为了工业化的成功,它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人民对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兑现自己的许诺及官僚的傲慢感到不满。签署这份文件的人认为,今天党所采纳的行动方式,他们已为之进行了数年之久的宣传,因此恢复他们的党籍是理所当然的事,更何况他们也欢迎共产国际的"向左转",承认一切派别活动的危害。反对派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本来就不浅,驱逐托洛茨基对此更是火上浇油,他们对此表示遗憾。声明在结尾处写道:"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党促成恢复我们的党籍,释放在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撤销据刑法第 58 条的指控,并将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请回来。"

当这一声明于 9 月 22 日寄到王子群岛时,托洛茨基喜忧参半。他为最终能看到其支持者的声明而高兴,几个月来,这是有条件的投降的第一个证明。但他对它的基调不安。现在,托洛茨基通过柏林、巴黎、奥斯陆与苏联境内建立了联系,他着手向尚未收到这封信的流放地散发此信。但他还附上了他自己的声明,使这封信变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他赞成这封信是因为,它尽管是"温和的",但却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只有坚持认为苏联的热

月政变已是既成事实、党已灭亡、苏联需要的是一场新革命的人才会拒绝在这封信上签名。"尽管人们已经几十次把这些看法强加给我们，但我们与这些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受到镇压和迫害，我们仍声明，我们对列宁的党和对十月革命的赤胆忠心永不动摇。"托洛茨基也承认，由于"向左转"以及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而出现了新局面："如果以前斯大林用从布哈林那里抄袭来的论据与左翼反对派斗争的话，他现在则主要用从左翼那里抄袭来的论据攻击右派。"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导致中间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接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斯大林采纳反对派的政策仅仅是个幌子、策略而已。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仍处于对立的两极。斯大林是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框架中筹划五年计划的，而反对派却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放在国际革命的背景中来考察。其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尽管拉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声明与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一致，但托洛茨基言简意赅地坚决反对。不过，他仍赞同拉柯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后者准备"让我们的思想斗争服从于党章和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党内纪律"这点是正确的。当右派和中间派在党内联合执政时，他们准备在党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当右派不再控制的时候，他们更应该这样做。但为此放弃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是"有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

托洛茨基对拉柯夫斯基的正直和英勇深信不疑，但他也明白，后者这样做是迫于压力。他暗中指责拉柯夫斯基的妥协腔调，因为后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业已变化的政治局势下的"公开检验党内体制"，他说，"在最近的几次教训之后，这一体制能否至少是部分补偿它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呢？"斯大林的"机关"还有没有自我改革的可能性？拉柯夫斯基的"慎重、对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的错误只字不提、并强调不久前的向左转"都是为了促使它能进行这种自我改革。拉柯夫斯基再次表明，对反对派来说，有意义的

是实质而不是形式,是革命利益而不是个别人和个别团体的虚荣心。"反对派准备在党内担任最低的职务,但只能是在它能永远忠于自己的前提下……。"[1]

托洛茨基在写这几句话时甚至曾问过自己,在拉柯夫斯基声明上签字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实质上是背叛?他在密信中警告拉柯夫斯基,在寻求妥协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就在刊登拉柯夫斯基声明的那期《反对派通报》上,托洛茨基还发表了一封一位通讯员从俄国寄来的未署名信件,该信批评拉柯夫斯基纵容投降者。这位通讯员是所剩无几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斯大林很快就会跪倒在我们面前,就像1926年季诺维也夫曾跪倒在他面前一样"。

到年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批反对派成员仍在坚持。据一则报导提供的数据,仍在流放和监狱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超不过一千人,而在投降前共有数千人之多。托洛茨基应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自己说:"天啊,来投奔我的朋友们都死在风暴中!"11月末,他给苏联境内自己的一批学生的信中写道:[2]"即便只有350个忠于自己旗帜的人留在流放中,或许只有35人,哪怕仅剩下3人,但旗帜仍在,战略路线仍在,因而未来也仍然存在。"他甚至准备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斗争。也许,他此时回忆起阿道夫·越飞的遗书。越飞在自杀前夕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您缺少列宁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性格,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便只剩他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

---

① 《致友人书(不为发表)》1929年9月25日,托洛茨基档案;《反对派通报》1929年第7期。

② 信上标明的日期是1929年11月26日,写信的原因是一位反对派成员的来信,他显然倾向于加入投降分子的行列,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 ※ ※ ※ ※

虽然斯大林想从投降活动中获益，但当他注视投降者来到莫斯科时，却感到不安，这确实令人费解：现在，数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在党内，在党的周围形成特殊的背景。斯大林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人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但作为行政人员、经济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获得了各个级别的岗位，并能由此产生独特的影响。尽管斯大林并不怀疑他们对推行"左倾方针"，特别是对工业化的热忱，但他也知道从他们那里逼出的忏悔的价值。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仍是反对派成员。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冤屈的"左倾方针"的倡导者。他们仇恨斯大林不仅因为他迫害他们，还因为他在思想上掠夺他们。诚然，他已在政治上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但奴隶潜藏的仇恨比公开的敌意更加危险。他们可能悄悄地设下埋伏，数千双眼睛盯着他，一旦他站立不稳或有一步失足，他们马上就会扑上来。

现在，投降者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中的一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看到斯大林借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与口号时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当初曾真诚地相信后二者说出的这些思想和口号是毁灭性的。在战胜了所有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与自己的某些支持者发生了冲突，他在这些人之中发现了潜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这些人说："如果我们在1925—1927年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无疑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我们否定了反对派加速工业化和向富农进攻的要求，并指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工农联盟。如果我们今天是正确的话，只有'左倾方针'能拯救革命，那么我们是否应在反对派呼吁之时及早采取这一方针呢？"其中最敏感的还补充说："我们给反对派栽赃并把它粉碎了，我们这么做是否太卑鄙了？"答案形形色色、众说不

一。[1] 需要指出的是,1929 年夏秋之际,当投降者被恢复党籍之时,某些正派的老牌斯大林派成员却被开除出党,其中某些人还被流放到不久前反对派成员还在那里受罪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是乌格拉诺夫(Угланов)案,他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此案还涉及到其他几位被打成布哈林分子的中央委员以及沙茨金(Шацкин)、斯泰恩(Стен)和罗明纳兹这些著名的宣传鼓动工作者,"青年斯大林派的"领导人。这 3 个人都被打成半托派分子。

这类事件暴露了执政派内部的骚动因素,这表明,对斯大林来说,身边有这么多投降者这一优势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知道,他们仍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们的领袖、鼓舞者,更有甚者,认为他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每一批投降者在谈判投降条件时都请求允许托洛茨基回国,尽管他们在政治和纪律问题上都已作了让步,但在这一点上却毫不动摇。最后,在强迫他们谴责托洛茨基时,其中大多数人在做此违心之事时心情悲痛,眼含热泪。只有极少数人像拉狄克那样以反常的方式压抑自己的感情,甚至还抨击托洛茨基。但拉狄克的长篇大论甚至引起老牌斯大林派成员的反感。对大多数投降者来说,托洛茨基是他们在其最美好、最自豪的岁月中所捍卫的一切。如今,他们已被击垮,并且自作自践,这在政治上孤立了托洛茨基,但在道义上却抬高了他的声望。投降者、布哈林派成员和心存怀疑的斯大林派成员对传入苏联的托洛茨基的每句话都倍感兴趣。在紧要关头,每当要作出重大决议时,总有人低语:"列夫·达维多维奇是什么看法?"这句话甚至在斯大林的会客室中也常能听到。[2]《反对派通报》在莫斯科流传。从国外回来的党员,首先是使馆工作人员把它们偷偷带回国内,转交给自己的亲

① 当本书作者于 1931 年来到莫斯科时,还能听到这种议论。

② 在中央委员会的休息室中,本书作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低语,感到不胜惊讶。

朋好友。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传进来的《反对派通报》数量有限，其印数从未超过1000册，但托洛茨基的评论和预言、他那杰出的雄辩之作都能在此迅速流传。斯大林不能躺在胜利的桂冠上高枕无忧，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 ※ ※ ※ ※

布柳姆金（Блюмкин）案使他得到对此进行打击的机会。雅可夫·布柳姆金是格别乌外事部门的高级军官，他的人生道路可谓异乎寻常，他起的作用更不寻常。革命前夕他还是个年轻人，便已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诗人，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早熟，头脑单纯，无限忠于事业。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布柳姆金是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作为其党的代表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的契卡中工作。这样，这位20岁的年轻人成了革命为自己挑选的年轻的情人，契卡的创始人之一。当他的党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与布尔什维克决裂时，他和他的同志们一样深信，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是叛卖革命的行径。他的同志们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列宁政府以迫使苏维埃政府与德国开战，他们委派两个人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Mirbach）伯爵，布柳姆金就是这两人中的一个。他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一事件也是被托洛茨基镇压的起义的信号。布尔什维克逮捕了布柳姆金，把他押到托洛茨基面前。

有必要提醒一下，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也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因此，尽管布尔什维克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受法律保护，但许多布尔什维克对刺杀米尔巴赫一事却抱有好感，虽然他们也对此加以谴责。托洛茨基诉诸叛乱者的革命感情，力图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让他们转变信

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信仰。当布柳姆金被带到他面前时，他与这位年轻、敏感的恐怖分子进行了长久、严肃的辩论。在更强有力的信念的影响下，布柳姆金悔过了，他请求给他将功折罪的机会。但出于外交需要仍将他判处死刑，甚至还将处决他的情况通报德国政府。但事实上他得到了宽恕，并给他机会让他"证明他对革命的忠诚"。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屡次完成布尔什维克交给他的最危险的任务，并潜入白军后方为布尔什维克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认为他是叛徒，曾数次谋杀他。在一次谋杀中，他们把一枚手榴弹扔进了他在其中进行治疗的野战医院的病房，他竟在手榴弹爆炸前的瞬间把它从窗口扔了出去。在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平反之后，布柳姆金来到托洛茨基的司令部工作，又被送到军事科学院学习，他作为一名军人作家还小有名气，并在共产国际中积极工作。内战结束后，他重返契卡或格别乌工作，是反间谍部门的高级军官。布柳姆金无限信仰托洛茨基，他全身心地眷恋着军事人民委员。他与拉狄克关系密切，并"崇拜"后者，因为拉狄克比托洛茨基更平易近人、更随和。当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了反对派之后，布柳姆金并不隐瞒他支持他们。尽管因为工作性质，布柳姆金不可能参加反对派的活动，但他认为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通知格别乌的领导明仁斯基。但由于他在反间谍工作上业务精湛、深受好评，而且未曾参与反对派的活动，所以允许他保留自己的观点，也没有革除他的职务。这样，甚至在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仍留在党内并依旧在格别乌工作。

1929年夏天，布柳姆金去印度出差，在返回俄国的途中来到君士坦丁堡。如托洛茨基所说，他在街上碰巧遇上了廖瓦。当然，可以怀疑这次会面的偶然性。如果布柳姆金不打算与托洛茨基联系的话，他不可能前往土耳其。不管与廖瓦相遇是否偶然，他请求其父接见他。开始，托洛茨基考虑过于冒险而拒绝接见，但在布柳

姆金再三恳求下，他答应了。

11年前，布柳姆金作为刺杀米尔巴赫的凶犯站在托洛茨基面前，如今他来找后者是为了向其倾诉衷肠。像大多数反对派成员一样，他不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是忠诚引起的冲突的牺牲品。他认为他很难把自己在格别乌的工作与他对反对派的感情调和起来。他为投降的反对派成员和继续反抗的反对派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为他对托洛茨基的信仰和他与拉狄克之间的友谊而痛苦万分。他不相信他们之间已经彻底决裂，并天真地希望能使他们和好。他与托洛茨基闭门密谈了几个小时，他讲述了莫斯科的新闻，倾听托洛茨基阐述反对派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投降毫无意义这一观点。

布柳姆金对托洛茨基讲了他的疑虑，并说他打算离开格别乌。托洛茨基坚决劝他放弃这一想法。托洛茨基说，不论情况多么困难，他都应该继续忠诚地在格别乌工作。反对派有责任保卫国家，因此，任何一个反对派成员都不应离开官方的工作岗位，因为他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斯大林的利益工作的。在中东铁路冲突时，反对派不就站在苏联一边吗？布柳姆金的工作针对苏联的外部敌人，与反对派的观点毫无冲突，因此，他应该继续从事这一工作。

布柳姆金听从了托洛茨基的劝告，并请求后者把给国内反对派的指示信件交给他。他还表示愿意帮助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还想在土耳其渔民的帮助下把《反对派通报》偷运进苏联。

托洛茨基把信件交给他，该信的拷贝保存在档案中。无论有多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说在这份文件中有任何保密的东西。在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中，大部分都是泛泛之词，写的都是平常之事，因此他和布柳姆金未必能想到转交此信会有任何危险。托洛茨基预言说，秋天，斯大林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那时投降者就会明白他们的投降是毫无意义的。他当然要号召他的支持者们坚持下去，并表达了他对软弱者的轻蔑。他告诉他们，他准备撰文反对拉

狄克,并预先通报了这篇即将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人们指责托洛茨基力图筹建一个新党,现在,拉狄克也对此随声附和。托洛茨基不知多少次驳斥了这一指控,在这封信中,他再次重申反对派是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叙述了他为建立国际反对派组织所作的努力,并详细地说明了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争执,并请求他们不要为此而失望、而应保持信心。国际反对派最终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政治力量。流放者对此和托洛茨基为他们作出的保证寄予如此之大的希望,这是令人欣慰的。总的说来,信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不能公开或不打算公开的东西,特别是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①] 当然可以猜测,托洛茨基对布柳姆金口述了更确切的秘密指令。但奇怪的是,连格别乌也未曾断言确有此事,根据托洛茨基的一贯立场、活动及其书信往来的内在根据,他秘密通知其支持者的内容从未超出过他公开讲话的范围。布柳姆金带着这封信精神振奋地踏上归途,他深信,现在他能证明拉狄克及其他人对托洛茨基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托洛茨基仍是一位忠诚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恢复它的统一。

布柳姆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就被逮捕了,他被指控为叛徒并被判处极刑。很难弄清格别乌是如何得知他的行踪的。有人说,

① 该信文本(没有注明日期)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俄国卷宗中。我不能确定布柳姆金来访的确切日期。根据某些材料可以假定布柳姆金是在1929年7月或8月来到这里。托洛茨基的信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下述有关组织问题的"指令":他要求他的支持者不要通过德国"列宁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乌尔班斯给他寄信,因为他正与后者论战。并告诫他们要警惕苏联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哈林,说他是斯大林的奸细(显然,在托洛茨基刚刚被驱逐后,他与俄国人部分联系是通过哈林进行的)。这些"指令"并不保密,并且也没有任何保密性。在任何这类活动中,这类反奸细的警告都尽量宣扬,以便警告更多的人。

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他热恋的女人，那女人是秘密特务，是她出卖了他。另一些人则断言说，布柳姆金回到莫斯科后径直去见拉狄克，后者担心会引起对自己的怀疑并力图向斯大林证明自己忏悔的真诚，因而出卖了朋友。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引起了人们对拉狄克的轻蔑和仇恨。还有维克多·塞尔日散布的另一种说法，在这里，拉狄克的角色与其说是可恶的，不如说是可悲的。塞尔日说，布柳姆金一回到莫斯科就发觉，格别乌已经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并对他加以监视，以便搞清他与哪些反对派成员保持联系。拉狄克对布柳姆金的不幸深表同情，建议后者去向中央监委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老老实实地交待。拉狄克似乎说过这是布柳姆金唯一可能获救之路：奥尔忠尼启则虽然主张严格的纪律，但是个好人，而且宽宏大量，在党的上层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事严厉却有同情心的人。但不知道布柳姆金是在找奥尔忠尼启则之前还是之后被捕的。[①] 布柳姆金之谜的谜底可能再简单不过了：君士坦丁堡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警惕目光发现了乘轮船前往王子群岛的布柳姆金；或是潜伏在托洛茨基家中的奸细认出了这个与托洛茨基密谈了数小时之久的诡秘的来访者。

一个前格别乌军官说，布柳姆金在审讯中"表现不凡，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英勇无畏地走上刑场，高呼着'托洛茨基万岁！'慷慨就义"。[②] 在其后的几年中，在刽子手行刑的射击声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一口号声。

这是处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例。此前，已有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因绝食和衰竭而去世，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了生命，例如托洛茨基的秘书布托夫(Бутов)一年前在监狱中经过长期绝食而身亡。

---

① 塞尔日：《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第 277－279 页。

② 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 202 页。

除此之外,此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没有重犯雅各宾派的致命错误,对不在内部斗争中使用极刑这条规则,起码在形式上恪守不渝。如今,这一规则被破坏了。布柳姆金是由于破坏党内规定而被处死的第一个党员,他的违反纪律无非就是与托洛茨基联系而已。

斯大林担心投降者会抹去党与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布柳姆金案加深了他的担忧。他不能容忍在格别乌要害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官员竟能友好地拜会托洛茨基并充当托洛茨基与投降者之间的联系人。容忍这点就意味着把官方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指责都变为笑柄并鼓励新的类似接触。很可能,斯大林本人根本不相信布柳姆金的任务和托洛茨基致反对派的信件是无害的。也可能在他多疑的头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如果相信刺杀米尔巴赫的凶手,认为他那质朴但却强烈的政治激情永远不会在新的恐怖活动中表现出来,那将是危险的。无论如何,处死布柳姆金应是对其他人的警告,表明官方对反革命的指控绝非儿戏,刑法第 58 条就是刑法第 58 条,从此以后,与王子群岛上的流亡者进行同志式的联系将遭到被歪曲的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奇怪的是,到那时为止尚没有一个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处决,虽然他们在监狱和流放地与自己的领袖保持联系,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五·一"劳动节时,他们都联名给他拍致敬电,而他们的签名也出现在刊登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文章和提纲的下面。那时,警告对象仅仅是担任政府职务,特别是在格别乌任职的党员和被恢复党籍的党员。党与反对派之间的界限这次用鲜血重新划出。

托洛茨基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反对派成员那里得知布柳姆金已被处决一事的,此人当时仍在政府任职,前往巴黎执行公务。[①] 但

① 雷·莫利尼耶在 1929 年 12 月 10 日的信中将此事通知托洛茨基,该信还以相当阴沉的笔调叙述了反对派的解体,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莫斯科却十分平静，当某家德国刊物透露这一消息时，共产党的报刊一致否认。几个星期之内，托洛茨基一直期待着新消息，在他致其支持者的信中，对布柳姆金案只字未提。1930年1月底，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寄来的信澄清了一切疑团。托洛茨基立即叙述了与布柳姆金会晤的全部细节。他宣布，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处死布柳姆金的，亚戈达是执行者，甚至都未曾与有名无实的格别乌首脑明仁斯基商议过。《反对派通报》还刊登了几封莫斯科来信，写信人都断言是拉狄克出卖了布柳姆金。托洛茨基思考再三，他对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感到怀疑，他认为，拉狄克的做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愚蠢的，但却没有什么不正派之处。托洛茨基写道："布柳姆金的不幸在于他信任拉狄克，而拉狄克又轻信斯大林。"

托洛茨基鼓动其西方支持者掀起"抗议风暴"。1930年1月5日，他在致罗斯默的信中写道："布柳姆金事件应成为左翼反对派的萨柯(Sacco)和范齐蒂(Vanzetti)案。"不久前，在波士顿处死意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范齐蒂，引起一场各国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声势浩大的抗议。但托洛茨基的号召却没有得到响应。布柳姆金的命运唤醒的愤怒抵不上萨柯和范齐蒂所唤起的愤怒的一个零头。资产阶级国家司法机构滥用职权远比工人国家通过法庭完成的谋杀更容易引起左派团体的愤怒。几个星期之后，托洛茨基为新近被处死的两位反对派成员和拉柯夫斯基及其朋友遭受的残酷迫害提出抗议，同时还请求其他人对此进行抗议。但是，他仍不能打破他所希望唤醒的那些人的顽石般的冷漠。[①]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10期。托洛茨基指出这两名被处决者是西洛夫和拉比诺维奇，声称指控他们的罪名是"在铁路运输中怠工"。据奥尔洛夫的说法，格别乌工作人员拉比诺维奇的真正"罪行"是他把处决布柳姆金的消息通知了莫斯科的地下托派组织。

※ ※ ※ ※ ※

1929年底,暴力出乎预料地在苏联盛行起来。年初,斯大林的政策还处于摇摆不定之时,工业虽加快了步伐,但政府仍小心翼翼。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加速实现集体化,但同时声明,在农村经济中很长时期内仍是私人经济占主导地位,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将只有20%的农户实现集体化,富农应缴更高的税、提供更多的粮食,但根本就没想要"消灭"它。到年底,似乎有一场风暴掠过了这些计划,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把主导这些计划的谨慎吹得荡然无存。工业一味向前,打破了所有界限:为了争取4年零3个月甚至两年半完成五年计划,不断地号召,不断提高任务指标。在十月革命12周年时,斯大林遇到了托洛茨基预言的"困难":农民拒绝上交粮食。于是他对私人农业经济判处死刑,下达了"全面迅速集体化"的战斗命令。仅仅过了4个月斯大林就宣布,50%,即约1300万农户已经实现了集体化。党和国家以其全部威力猛烈打击富农。富农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而其他农民被迫交出自己的财产,接受了新的生产方式。

几乎每个村庄都变成了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的战场。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下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发动的,目的是占领俄国农村,粉碎它顽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并不大,但它有精良的武装,经过动员,并受一个意志的指挥。农村的个人主义具有极大的力量,但它极为涣散,而且是仓猝应战,它的武装仅仅是深深的绝望。像在所有的战争中一样,这次也少不了迂回前进、非决定性的小规模交锋、进攻和退却。但最终,胜利者得到了战利品,抓获了不计其数的俘虏,把它们驱赶到广漠无垠的西伯利亚或冰天雪地的北极旷野之中。但和其他战争不同的是,胜利者

既不能承认也不能描述战斗活动的全部规模；因为这些战争行动应被描述为在俄国农村进行的正常改造活动，而这种改造被说成是得到大多数农民赞成的。因此，甚至在几十年后，这场战争的牺牲者的确切数字仍不得而知，尽管它高达数百万之多。

这一转折的突然性、规模和力量是如此巨大，如今只有少数目击者才能理解并想象其宏伟。在这之前托洛茨基反对派还能断言斯大林推行"左倾方针"无非是在实施它的要求，如今，这一巨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要求，这使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都大惊失色，更不用说布哈林派了。托洛茨基派中的"妥协派"更清楚地理解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的规模和最终性质；反对者则仍抓住前几年的前提和论据不放，例如拉柯夫斯基就认为斯大林消灭富农的命令是"极左高调"，他断言说，尽管官方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与农业资本主义斗争，但富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十月革命 12 周年前夕，托洛茨基本人断言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及农村所遇到的困难都有助于富农力量的增长，并加强它的影响"。[①] 他无法想象能在有数的几年中一举用暴力消灭 2500 万户小农经济。

1930 年初，托洛茨基开始明白了所发生的事件，并写下了几篇批评五年计划的文章。新批评的特点是辩证的双重性：严格区分苏联的"社会进步"和"官僚集团的反动"倾向，说明了它们为什么总是彼此冲突。他动笔撰写《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害》，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 苏联工业发展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那些不能充分评价苏联经济所能达到的速度的社会民主党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 1 卷第 76 页。

人只配得到轻蔑。但这种速度既不稳定,也没有保障……但它们为孕育在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中的不可估量的潜能提供了实验证明。1918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能用革命赋予它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并不困难,当时,它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以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为根据,可以理解中欧、东欧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集团今天的经济力量将有多么强大。整个人类将会改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将使人类经历更多的战争与革命。①

在反复强调对苏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评价之后,托洛茨基开始对斯大林的内政加以抨击,用的是他给共产国际新路线定性的那些术语:斯大林集团"用极左曲线代替右倾曲线",这与托洛茨基以往的观点一致,即斯大林是"中间派",在交替来自左右两方的压力下行动。这一观点是对 20 年代斯大林在党内位置的确切描写,但却不符合后来的情况。总之,托洛茨基依然认为加速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无非是斯大林政策中的过渡阶段而已。他不明白,也从来没有彻底弄明白,1929—1930 年斯大林已改弦更张,从此再也不能遏止发展中的工业,已消灭了富农,就再也不能试图与它和解了。托洛茨基评价中的这一根本错误(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仍不能使他的具体批评失去价值,因为它预料到了 1953 年以后斯大林继承人推行的政策中的大部分变化。正如在 20 年代中,托洛茨基曾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先锋一样,30 年代初,他又成了几十年后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先驱。

他从一开始就猛烈抨击第一个五年计划审定稿中规定的增长

① 该随笔于 1930 年 2 月脱稿,刊登在《反对派通报》第 9 期上。

速度。[1]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从“乌龟爬行”一下子转到“纵马疾驰”。在五年计划头几稿中规定年增长率为8—9%，反对派建议将速度提高一倍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危险幻想，加以否定。而现在速度却翻了3番。托洛茨基指出，计划制订者和工业领导人得到的命令不是力求获得最佳效果，而是必须调动一切资源以便达到最大规模，甚至不惜为此打破国民经济的平衡、降低工业高涨的效益。计划中规定的任务大大超过了现有资源的负荷，因此造成了加工工业与提供原材料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失调。更严重的是工业发展与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这里无须再谈托洛茨基经常详加剖析的种种比例失调，这类失调确实使斯大林时代的整个工业化过程都黯然失色，现在它已是老生常谈了。但一代人的老生常谈往往对上一代人来说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在当时，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却义愤填膺，大加嘲讽。

然而，当你在事后分析托洛茨基的上述意见时，更让你吃惊的是他政治上的稳重，而不是论战的激情。在每条批评意见之后，他都格外强调苏联在其政敌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坚持认为进步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斯大林不仅利用而且滥用了这些苏联经济的优越性。他不相信行政的皮鞭真能加快或可能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这条皮鞭往往是停滞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国家所有制导致并要求统一计划。但官僚政治的高度集权导致浓缩并加剧当权者所犯的错误，导致社会首创精神的麻木和人

---

① 另见托洛茨基刊登在《反对派通报》1930年4月第10期上的致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他对党的十六次代表会议的评论发表在《反对派通报》1930年6－7月第12－13期上；及《社会主义的成就及鲁莽造成的损失》，载《反对派通报》1930年11－12月第17－18期上。

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不负责任、"永远正确"的领袖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一味吹嘘杰出的成就、空前绝后的记录和震撼人心的统计资料。斯大林的规划只注重工业化的数字方面,其余的一切都被排除。越是要求不惜代价地生产商品,商品的质量就越低下。合理的经济计划还需要一个有各种经济系数且包罗万象的检验体系,要检验衡量的不仅仅是生产的增长,还要考虑质量的变化、成本及货币的购买力、劳动生产力的相对增长等等。但对所有这些经济要素却一律保密,这样,斯大林"关闭了所有车灯"指引着工业前进,重要的信息一概不予以公布。

托洛茨基对集体化的批评更为彻底。早在伴随"消灭富农"而来的恐惧尚未为人所知之时,他就指责它是"骇人听闻的"。几年前,他鼓动政治局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建议把农业工人和贫农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由国家为集体农庄提供物资(农业机械、肥料、贷款和农艺方面的帮助),以便使它能与私人经济竞争,那时他被诬蔑为"农民的敌人"。这些建议详尽地表达了他的反富农政策,但他始终没有比这走得更远。他从未想过能够或应该下命令用暴力消灭为数众多的农业资产阶级——使几百万人丧失其财产并判定他们的社会性死亡,而且还有许多人的肉体的死亡。社会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农业资本家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必将灭亡,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小农将自愿地接受具有更高生产力的集体经营方式,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中手工业者和小农场主接受现代化工业及大规模农业的情况类似,但不像后者那样痛苦。不久前,所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是这样。

因此,在托洛茨基对消灭富农政策的愤怒谴责中没有任何蛊

惑人心的成分。在他看来，这一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捍卫的一切的居心险恶和血腥的破坏，不仅如此，他并不相信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会有生命力。他指出，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基础高于个体农业经济的基础。苏联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拖拉机尚未取代马匹。[①] 基于类似的看法（虽然对此可以说，比较并非就是证明），托洛茨基断言，没有现代技术同样不能把小农经济变成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就像不能把小船改造成远洋客轮一样。诚然，斯大林打算在12年之内为农业提供机械，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托洛茨基的结论是，集体化不能超越它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否则，集体农庄在经济关系上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生产力超不过个体农业经济，它也不能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弥补农民失掉的财产。[②] 与此同时，只要集体农庄在技

---

① 1930年1月15日的《真理报》指出，为了使苏联农业全部集体化，需要150万台拖拉机。苏联直到1956年才达到这么高的机械化水平，那时按每台15马力计算，拖拉机总数超过了150万台。实际上有不少30马力的拖拉机，因此，拖拉机的实际数量超不过87万台。1929年全年出产的拖拉机按每台15马力计算，总共只有3000多台，1932年也只有50000台。其他农业机械的数量更加可怜。1928年，在五年计划开始时，农业拥有的卡车少于1000辆，到1932年，也只有14000辆。《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243、487页。

② 托洛茨基写道，"木犁的集体化……是一场骗局"，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经济学家，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者纷纷驳斥托洛茨基的观点（参见 Д. 格烈夫：《农业集体化和随之而来的迁徙》，载《反对派通报》第11期），他们断言，即便集体农庄在技术上落后，也比原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力高。托洛茨基批评者依据的是与英国手工业作坊的类比（它是十足地道的手工作坊），它在工业革命前确实比个体工匠的生产力更高。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它的优势首先在于"简单的合作"，其次是分工。从抽象的理论上来说，托洛茨基的批评者是正确的：集体化甚至在没有它所必须的技术前提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正如50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样。但在具体涉及到1929－1930年的集体化时，托洛茨基是正确的：集体农庄能从合作和体力劳动分工中得到的所有好处都因为农民不愿干活和在开始时屠宰牲口、消灭储备、毁坏工具而化为乌有。

术上不能综合配套,农民的不满就将使农业生产衰退并造成混乱,这将形成集体农庄从内部瓦解的危险。托洛茨基对农民世界观的了解如此之深,因此能从王子群岛上向莫斯科发出警报,预言大规模屠宰牲口的灾难即将来临。而且,他的警报早于斯大林承认这一事实之前。[①] 甚至在很久之后,托洛茨基仍坚信,农业集体化结构总是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之中。

从回顾的角度看,可能会觉得托洛茨基描绘的图景过于暗淡:集体经济毕竟没有崩溃。不过,在整个30年代中,斯大林的农村政策将大规模的恐怖与微小的让步怪诞地结合起来,这正是他担心崩溃的产物:只有极其严厉的手段才能维持集体农庄不垮。后来,农业生产的衰退和不景气却是绝对真实的,在25—30年后,它成为官方政策的主要课题。

农村状况对全国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工业化是在受到剧烈震荡、萎缩到危险程度的农业的基础之上和在饥饿与长期缺粮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为争夺生活基本物资而进行的动物般野蛮疯狂的全面斗争,普遍的不满和劳动生产力的低下始终伴随着它。政府不得不经常压制不满,用恫吓和强迫来提高生产力。1929—1930年的剧烈震荡把俄国赶入物资匮乏和恐怖的险恶怪圈之中,并使它陷在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现在斯大林宣布,新经济政策业已结束,废除市场经济。回顾托洛茨基在更早一个阶段的观点,我们看到其中根本"没有突然取消新经济政策、用行政命令来禁止私人贸易的余地",不能大笔一挥就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日之内取代新经济政策,而应该让社会主义成分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直到它能用其不断增长的优势逐渐吃掉、改变或消灭私人成分,直到它超越了新经济政策

① 《反对派通报》1930年第9期。

的框架为止”。[①] 托洛茨基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即“废除新经济政策”是官僚头脑的产物，只有长期忽视工业化并错误地对待农民的官僚集团才无法应付市场经济的力量，使它失控，才企图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市场。托洛茨基写道，但是“从大门扔出去的市场经济会通过窗口返回来”。只要农业经济没有有机地、牢固地社会化，在商品普遍匮乏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消灭供求关系中的投机倒把并用计划分配商品来取代它。市场的自发压力首先在农村，然后再在工农业交合处，最后甚至在国营经济部门打开缺口，在这里，它将经常推翻或曲解规划。这类证据不可胜数，30年代初期尤甚。日用品的官价和非官方价格混乱不堪，黑市甚嚣尘上，卢布贬值，实际工资迅速下降。计划人员在工作中“失去了尺度”，他们无力确定真实的价格和成本，无法统计生产率。托洛茨基的反复劝告是：“掌握分寸”。计划工作者不应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市场压力已被克服，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应该对它让步并力求把它置于监督之下。甚至在几年后，当30年代初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已被克服时，托洛茨基的批评仍没有失去意义，斯大林去世后的头10年中，苏联学者正确评估价格与成本的有关论述中有许多不过是托洛茨基观点的回声而已。

由于斯大林封锁经济信息，因而也掩盖了许多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工业化付钱的是社会中的哪个阶级？付了多少？哪些阶级和集团从中获利？得了多少？20年代初，反对派的领袖们，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说，工业化所需投资将不得不主要由农民承担。斯大林希望通过集体化来保证资金到位，使农民确实作出这一奉献，让他们扩大生产、更多地供应粮食和原料。但农民欺骗了他。小农在告别自己的财产时高呼：“我们跟政委玩命

①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四章。

了!"尽管他们未能破坏集体主义国家的基础,但他们拒绝支付人们期待他们为工业化支付的大部分资源。在实践中,这就是大规模屠宰牲畜和农业产量下降。

因此,城市工人不得不挑起更沉重的担子。工业的巨额投资的主要部分实质上是从工资中扣下来的。从现实购买力的角度看,人数大大增加的工人阶级所能获得的日用品却大大减少,而它还要建设新的电站、钢厂和机械制造厂。[①] 托洛茨基10年前曾说过,工人阶级"只有承受巨大的牺牲、鼓足干劲、付出全部心血,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现在,斯大林要求心和血的牺牲。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可能停付你们的全部工资,或仅发一半工资,那时,你们应该把另一半工资借给国家,使它有可能重建国有化工业。"[②] 现在,斯大林把工人的"另一半工资"也拿走了。但当初托洛茨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后的经济崩溃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力求工人同意这种积累方式。斯大林这么做了,他却对工人说,他们的工资已经翻了一番,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乐土之中。开始时,通货膨胀使工人无法看到

---

① 苏联城市人口在30年代从3000万几乎增长到6000万,前5年的增长速度最快。农业总产量从1928年的124%(1913年为100%)下降到1933年的101%,1936年也只达到109%;牲畜存栏数从1928年的137%到1933年下降为65%,到1936年慢慢地恢复到96%。整个30年代,收成都未超过1913年的水平,甚至还差不少(《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60-352页)。1928年,剩余农产品仅占革命前总量的一半,靠1928-1932年间的征收,才使总量大约增加了一倍,满足了城市的粮食需要。糖和油的供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年中大大减少(同上,第302页)。1928-1935年间,布匹产量下降或维持原状(同上,第274页)。鞋类生产的状况也是如此,由于鞋匠的家庭作坊消失,鞋子供不应求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尖锐(同上,第293页)。在整整10年中,重工业最需要的人力与原料的不足都很突出,在这之前已经很严重的城市人口过密现在变成了灾难。新的城市建设为每个城市新居民所提供的住宅面积平均不超过4平方米。

②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四章。

事实真相，五年计划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工人的热情和耐力，最起码是他们的工作意愿。[①]

五年计划开始时即便不是在平均主义精神下，也是在尚未受到可耻的不平等玷污的共同劳动、共同牺牲的精神下实施的。这种精神激起了共青团员和突击队员的热忱，使他们忘我地投身于冶金企业、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②] 但是，随着最初的高潮的衰落，工人感到筋疲力尽，于是政府用等级工资、奖金、斯达汉诺夫运动、生产纪录奖等等对工人进行刺激。官僚集团、管理者和工人贵族一起获得了明显的特权地位。从此以后，斯大林开始不断抨击"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反平均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强。托洛茨基以"反对工人贵族和官僚特权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为依据，反对这种倾向。他并不宣扬平均主义。托洛茨基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整体文化水平低下时，无法实现劳动报酬平等，这是无可争议的。"他甚至承认革命后头几年实施的工资平等政策走得太远而妨碍了经济进步。但他断言说，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且逐渐缩小它，保护广大无特权群众的利益。

---

① 1937 年 1 月 10 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中(《苏共中央决议汇编》第 2 部分第 723 页)，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农民的收入平均增长 85%，在同一时期内，国营和集体商店中的零售总额从 120 亿增长到 400 多亿(《1958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698 页)。这几年中，除了凭证按固定价格出售的面包外，可能还有土豆的价格未变，其他大量商品的价格不断上调。因此，卢布购买力与 1928 年相比，就是用国家控制价格来衡量也下降了¼或⅓。用非国控价来衡量，下降的比例还要大。这样，即便 1932 年的平均工资的票面价值翻了一番，它的实际价值也只有 1928 年的一半。由此可得出结论，斯大林通过通货膨胀，不折不扣地拿走了工人的一半工资，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② 所谓的苏联在两三年之内将"赶上或超过"西方工业化国家并由此为"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建起一道钢铁围墙"这一幻想滋养着热情。《反对派通报》1930 年第 17－18 期。

"在女工与官僚的冲突中,我们左派反对派站在女工一边反对卡女工脖子的官僚……。"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特权保护人,托洛茨基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所有革命成果的威胁"。[①]

现在,托洛茨基重新界定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只有当劳动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批评当权者时,他们才能防止特权的增长。从社会主义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最高尺度就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及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如果说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中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民主力量能够与联合起来的耐普曼、富农及保守的官僚相抗衡的话,现在他则认为,民主是唯一一种政治体制,在其框架内计划经济可以取得最佳效益。因此,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不仅符合苏联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它最重大的经济利益。与被庸俗化了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并不赞成任何种类的"工人直接监督企业",即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苏维埃管理轻重工业工厂。在革命胜利后不久,这种管理方式在俄国已经失败,此后,托洛茨基一直是一长制管理和集中管理的坚定支持者。只有在广大生产者都获得良好的教育、并且对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理解时,通过厂委会管理生产才有可能。工人反对派把企业交给工会和生产者协会管理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也遭到他的断然反对。他在沦为反对派乃至被驱逐后,仍未改变这些观点。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工人批评和反对政府的自由,但不是他们对生产进行直接监督的"权利"。他认为集中计划和管理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与任何向社会主义演化的经济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同时还指出,要想使计划过程变得更有效,它就不能仅仅自上而下,还要自下而上。下达生产任务不应是来自行政金字塔顶端的命令,而要事先经过全国性的讨论,应认

---

① 《反对派通报》1931年8月第23期和1932年3月第27期。

真地分析现有的物资和可能性，还要预先估计工人的情绪，让他们充分理解计划并由衷地愿意完成它。在不允许工人检查、修正、改变计划机构提出的计划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比例失调，而这正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经济的特征。

托洛茨基又将其批评的锋芒指向一国自给自足的假设，而这正是斯大林经济实践的基础。对托洛茨基来说，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论是以千里马速度还是乌龟爬速度实现，都是“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断言说，苏联仅凭本国的资源和自己的努力不仅不能超过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赶不上它们。而赶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格外强调这点，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夸张或无的放矢。在任何条件下，扩展革命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不仅对重大革命战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影响，对贸易的直接目的也有影响：斯大林不考虑“国际分工”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忽略外贸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苏联外贸条件急剧恶化时。那时，托洛茨基仍坚持让莫斯科在贸易中以政治手段加强自己的地位，让它向西方数百万失业工人呼吁，争取他们赞成与俄国进行贸易（提供出口贷款），这些都有助于俄国，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率。托洛茨基以他本人及其规模有限的组织的名义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宣言。但他的想法没有引起莫斯科的任何反响。[①]

---

① 卡冈诺维奇断言，左、右倾反对派“要我们加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托洛茨基回答说：“自给自足不是马克思、列宁的理想，而是希特勒的理想。”（《苏联经济在危险中》，载《反对派通报》1932年11月第31期）。从1930年到1935年，苏联的出口额降至原来的⅓，进口降至¼。不利的贸易条件是贸易额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从道义上消灭共产主义的政策的强烈激愤的抗议中,他的批判也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1931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甚至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斯大林的宣传工作者必须支持这些奢望,他们刻意突出苏联社会与垂死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反差:一边是不着边际的光明形象,一边是生硬夸张的贫困景象。[1] 托洛茨基揭穿了这种双重的歪曲。他声称,如果让广大苏联群众相信他们所遭受的饥饿、贫穷和压迫就是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扼杀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把他们变为它的敌人。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工人阶级最珍贵的期望,并有败坏未来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声誉的危险。[2]

※ ※ ※ ※ ※

我们已经说过,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它还预料到斯大林时代之后的改革。也许人们会问,在30年代进行这种改革是否适当?托洛茨基的建议在当时是否切实可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之间严重的脱节是否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否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这种脱节变为不可避免的?像上述问题那样破坏一个人对自己判断的信心的重大问题,连历史学家也碰不上几个。托洛茨基本人当时并不那么热衷于论战,他反复强调苏联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植根于贫穷、落后和孤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统治的主要指责是:斯大林加剧了这些

① 参见《苏共决议汇编》第2部分第717-724页,在30年代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和所有其他苏联报刊上都充斥着这类对比。

② 《反对派通报》1932年11月第31期。

困难，而不是制造了困难；区分“主客观”因素，区分俄国革命继承下来的灾难和由斯大林专横残暴造成的灾难，无论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历史学家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还有“对立统一”与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官僚集团的专横残暴是俄国落后、孤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是革命继承人对本国落后的滞后反映。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当前都认为(尽管有一部分是心照不宣的)，苏联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才能实现工业迅速高涨。历史以下述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本世纪中，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在任何其他基础上获得的成绩都无法与俄国相比。但是，原始积累要求工人、农民担负起比“平时”更沉重的经济发展的担子。斯大林计划中的某些重大的比例失调恰恰是植根于这些条件中。无论如何，投资增长都应比需求的增长要快得多。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享有优先权。反对派理论家证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国民收入迅速增长，因此人民的消费将与投资一起增长，尽管速度并不一样。1930 年之后的几年危机中，消费不仅没有增长，而且降低到灾难的程度。托洛茨基断言，如果工业化稍稍放慢一些，如果提前几年着手并能在其过程中采用更合理的方法，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些论据言之凿凿，但其正确性却无法证明。斯大林虽然并不总是公开反驳，但他的反驳也有同样的说服力。宏伟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即使提前着手、推行和缓些也不能避免。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内，饥饿一直威胁着俄国的城市(革命前，饥荒也周期性地发生)。只要农业生产仍是分散的、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工业化和城市人口激增无论如何都会加剧粮荒。布尔什维克否定资本主义农业，又担负着急剧扩展的城市的粮食供应，因此，他们只能实施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主义者指出，如果他们试图像托洛茨基坚持的那样，逐步实行集体化

的话,他们将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无数小农无疑会进行反抗,这样一来,农业进步就像资本主义农业那样过于缓慢,它不能在工业化的迅猛过程中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托洛茨基则相反,他相信可以促使农民自觉地走上经济健康的集体化道路。不过,任何形式的集体化都会极大地伤害乡下人固执的"非理性"及其对私有财产的忠诚,他对这种伤害的深度是否估计不足,这一问题仍是悬案。斯大林根据的是马基雅维里的原则行动,后者认为,执政者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既想凌辱敌人又想安抚敌人,而对斯大林来说,他的臣民就是他的敌人。他全力以赴地反对小农经济,而整整一代人为这一经济灾难的后果吃尽了苦头。但是斯大林认为,以这一代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成就:威胁并破坏工业化的根深蒂固的农村个人主义的脊梁被打断了。既然已经做到这点,他就不可能放弃他的成果,而要皆尽全力地捍卫这一成果。

托洛茨基不相信马基雅维里式的成果的巩固性,他根本不承认斯大林彻底战胜了农民的个人主义。托洛茨基深信,个人主义将会消灭集体农庄或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据此他预言说,在集体农庄中新的富农阶级将会崛起,它将执掌权柄。[①]在这点上,托洛茨基仍看破了真实趋向,尽管过分地强调了它的力量。农民发财致富的特点确实在各方面重新表现出来,斯大林必须与集体农庄中富农的复活作斗争。无论如何,他将经济措施与恐怖结合在一起,在狭窄有限的范围内成功地遏止了私有财产的复活,农民个人主义始终未能从它所受到的致命打击中恢复元气,尽管它的死前痉挛震撼俄国达25年之久。

托洛茨基在流亡中不止一次地恳求斯大林的政治局:放弃这

---

① 参见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俄文书名是《什么是苏联,它向何处去》——译注)第128-135页,即《集体化农村中的社会矛盾》一章。

一残暴的举措，停止这场反对野蛮的农村的野蛮战争，回到更文明、更人道的行动方式上来，因为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的。他呼吁政治局在与农民进行事关重大的和解上采取主动并公开对全国人民宣布：政治局强迫农民集体化是错误的，因此想退出集体农庄恢复个体耕作的农民可以这样做。他毫不怀疑，这将导致许多，甚至是大多数集体农庄的垮台。但托洛茨基认为，这样的集体农庄根本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即便垮了损失也不大，而坚持下来的集体农庄（如果能保证为它们提供农业机械、贷款和农业技师，以这种方式使其成员得到超过小农收入的物质利益）则能成为真正自愿的集体化运动的先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改造全国的农业，把它的生产力提高到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水平上。托洛茨基声称，如果反对派能重新执政的话，它一定会这么做的。①

对斯大林的政治局来说，寻求与农民和解为时已晚。从1929年秋季起党和国家就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现在若放弃它并作出重大的让步的话，可能会导致全面崩溃。从战役一开始，牺牲就如此之大，激起了苦不堪言的激情，对待农民如此专横，以至于使得他们一心渴望报复，转折又是如此巨大、如此血腥，因此，只要承受打击的这一代人依然活着，想找一条合理的退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政府宣布农民可以退出集体农庄，整个农业经济结构马上就会坍塌，集体农庄也未必能生存下去。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私人农业恢复其生产能力并按其原来的方式劳动。在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会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何况，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

① 《反对派通报》1932年第29－30期。

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与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至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坎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对斯大林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烈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它路。许多年之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①

我们看到,俄国农村的实际条件也不允许在工业化政策上作任何合理的改变。畸形的新工业结构超过了战前俄国工业结构的好几倍,但它不得不建立在比旧制度下更为狭窄的农业基础之上。许多年中,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生活取决于不断减少或极端匮乏的粮食供应。据我们所知,仅在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000万激增到6000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与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策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下了硬性的框架。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预料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条件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几年前他曾断言,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机的阶段……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应以最快的速度越过

① 丘吉尔写道:"午夜已过,我问道:'请告诉我,对您个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压力是否与实行集体化时一样大?'这个话题使元帅马上激动起来。他说:'不,集体化是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他举起双手说道:'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4年之久,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47页。)

这个过渡阶段……。”[1] 对已经切断了所有退路的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以疯狂的速度越过这个过渡阶段，根本不理睬任何旨在让它温和些的警告和劝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号召布尔什维克“持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消费者的观点”，因为“我们尚未进入社会主义，不能享受它生产的消费品，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之下”。如今，这一铁蹄变得如此沉重，令人难以承受。在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之后，斯大林应接受的生产者的观点也更加严酷得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见到了消费品相对短缺永远伴随着积累，它将导致行政人员和工人、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为了鼓励技术工人和模范工人，这种不平等是必要的，但是它不会产生阶级对抗。事实上，不平等与消费品匮乏同步增长，二者都远远超出了预料。

斯大林利用一切意识形态手段来扩大并掩饰少数人的特权与大多数人难堪的生活状况之间的悬殊差别，并为之辩解。但是，光凭意识形态的巧妙手段还不够。恐怖对这条鸿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监视。疯狂的恐怖与社会关系全面紧张一致，乍看起来，30年代的暴行是内战时期的恐怖的复活。事实上，前者在规模和盲目使用暴力上远远超过了后者。在国内战争期间，这是愤怒的革命真理的灼人的呼吸，其打击对象是维护旧制度的力量，因为后者组织、策划反对新生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阴谋。契卡工作人员都是不久前的起义工人，他们依赖本阶级的经验，依靠它的支持，与它同甘苦共患难。他们的恐怖在内战的混乱局面中是有选择性的，其矛头所向是革命的最嚣张的敌人，即便不是“一小撮”，至少也是

---

[1] 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中的推论，本书作者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二章里作了概述。

少数。在军事共产主义的严酷气氛中,恐怖保卫着那几年中的斯巴达乌托邦式的平等。

30年代的恐怖则是不平等的保卫者。就其性质来说是反人民的,它潜在地或实际上反对大多数,它是全方位、毁灭性的恐怖。但这也不能充分说明它那无孔不入和狂暴: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如果单纯是为了保障工资差别乃至官僚特权,则是小题大做了,因为用小得多的措施就足以保障更严重的不平等和更大的特权。大规模地滥用暴力与集体化同时开始。在农村进行的巨大变革需要暴力,而变革又使恐怖永久化。只有农村的惩罚队和政治部可以防止农民回到个体农业中。暴力保证了没有内在经济联系的集体农庄的活力。必须对绝大多数人民使用暴力(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60—70%),一年中的每个季节:春耕、播种、秋收直至最后农民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都要使用暴力,所有这一切导致为社会机体的绝大部分不断地注入剂量如此可怕的恐怖,整个躯体必然会受到毒害。规模空前的恐怖机器只要一开动,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惯性。城市俄国不能使自己与农村俄国的震荡相隔绝。农民的绝望和仇恨洒向了城市,触及到了大批工人,作为答复,城市释放了旨在反对绝望和仇恨的暴力。

※ ※ ※ ※ ※

虽然1929—1930年间所进行的变革是非理性的,它们却像十月革命一样使社会革命发展到无法逆转的程度,尽管二者的内涵截然相反。在这个转折中,体现出托洛茨基预言的革命过程的"不断性"。但是,预言的实现和预言本身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不承认也不能承认它。不久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认为,只有在

推翻封建资产阶级统治、剥夺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时，革命才是必要的，在这一目的实现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上应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这种看法托洛茨基至今未改变。在处理苏联内部问题时，《不断革命论》的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改良主义者。当然，他比别人更早地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在国家改良的框架内彻底解决内部问题。托洛茨基以革命方式解决国际阶级斗争，以改良方式处理苏联内部政治事务，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斯大林则完全相反，1929 年前，他深信国家改革本身就能解决苏联的冲突。当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后，他就跳出了国家改良的框架，发动了一场新的国家革命。他抛弃了其政策中的改良因素，而非国家因素。斯大林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革命的前景，对它漠不关心，这和他的国内政策的伪革命性也同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现在，历史发展以其自己的嘲弄方式证明了托洛茨基公式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却与这一公式本身相矛盾，至少是部分地与它矛盾。托洛茨基在本世纪初写道：“如果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代表自己，在农民背离无产阶级的时刻，它必然会被反革命击溃。”这一时刻第一次出现在 1921 年，20 年代末再次出现，那时农民背离了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继续写道：“那时工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俄国革命……的命运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结合起来。”自 1917 年以来托洛茨基反复强调，俄国本身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俄国革命还有潜能，1917 年是世界革命的序曲。现在表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确没有耗尽，尽管它未能点燃欧洲革命的烈火。这一动力未能跨越国界，被挤压在本国的框框之内，因此它转向内部，再次以暴力来改造苏联的社会结构。现在，强制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取代了扩展革命，消灭富农成了推翻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代用品。对托洛茨基来说，他的思想与下述公式是不可分割

的:只有德国、法国或至少是中国的革命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真正继续,俄国革命过程只有在其国际化时才能达到高潮。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目前,斯大林在苏联境内的行动像是不断革命论的不情愿的执行者的行动。托洛茨基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不愿把赝品当真品。

托洛茨基的观点保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而在斯大林实现的巨变中却贯穿着非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典型的革命在社会意识和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潮中完成,它是群众生活意志和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的最高体现。1929—1930 年的转变是在社会自我意识和政治能量最低点上完成的。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以压抑群众自发的积极性为基础。其推动力不是社会的某个阶级,而是党的机关。托洛茨基的世界观汲取了欧洲经典革命的丰富传统,对他来说,这一转折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斯大林官僚集团强奸历史。但是,不管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从经典角度来说是多么不"合法",它在社会关系上,因而也在全民的生活方式中造成了长久的、规模空前的变化。[①]

※　※　※　※　※

我们在全部叙述中不只一次地分析了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它蕴涵在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的非常权力之中。旧的沙皇专制政体从俄国社会原始、无差别、不定型的各组成部分中汲取力量。米留可夫指出:"如果说在西方是各阶层创立了国家,在俄国则是国家形成了阶级。"托洛茨基补充说,就连俄国资本主义也是作为"国家之子"而产生的。俄国社会各阶级的不成熟使得知识分子领袖

① 参见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八章。

和一小批革命者用自己取代人民，并以其代理人的名义行动。[1]本世纪头20年，俄国人民在相对时间不长但却巨大的高涨之后，他们的精力在国内战争和革命后的社会解体中消耗殆尽，也导致了类似结果的产生。1921—1922年间，当工人阶级不能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列宁和老近卫军担当了它的代理人。“代理”的逻辑导致他们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垄断，此后，它又让位于更狭隘的斯大林派的垄断。为了解此后事件的进程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内战结束后的10年中苏联社会各阶级的生存条件。

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和衰落是20年代初的特点，现在已成了过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随着工业的复苏，新兴的工人阶级也不断壮大，在人数上几乎与过去一样。只过了几年，到1932年时，在工业战线上工作的人从1000万增至2200万。在30年代中有如此之多的工人进入工矿企业，以至到1940年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与俄国历史上人数最多时相比超过了3倍。[2] 尽管在人数上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却没有体现出来。工人阶级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极小，根本无法与沙俄存在的最后几年相比，就更不用说1917年了。工人阶级完全不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官僚集团。问题并不在于在工人国家中没有这种必要性，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1920—1921年曾坚持工人阶级应该保护自己不受国家的侵害，如果说在1921年有这种必要，那么在1931年其必要性就更为突出。可是工人却十分消极、沉默不语。

用什么来解释这么长久的社会自觉的衰落和政治意志的麻痹

① 《武装的先知》第六、七章。

② 《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56－657页。其中有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统计资料。

呢?问题不在于恐怖,甚至不在于集权制的恐怖,因为恐怖的有效与否取决于反抗的力量,取决于它能否镇压后者。工人阶级自身应对这种消极负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工业战线的数百万新工人主要是来自落后的农村,开始是在农村人口过剩压力下的"自发"过程,后来则是有计划地把农村人力资源输向城市,此事由政府操作,它把集体农庄当做招募中心。工业中的新人把俄国农村的文盲、驯顺和宿命论的精神带到了城市和工厂居民区。脱离了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环境之中,他们感到不知所措,很快就被卷进了可怕的机制中,后者急剧地改变了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工业的节奏和纪律,教会他们操作技术、把党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号牢牢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挤在庞大的营房或工棚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承受着工作压力,服从的往往是军队的纪律,他们无力反抗对他们的压榨。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与被早期资本主义投入工业坩锅的过去几代农民没有区别。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则会自发地调节,对失业和饥饿的恐惧慢慢地改变着农民,迫使他们遵守纪律,把他们变成了产业工人。而在斯大林的俄国,这些都由国家来做,整个过程也要短得多。

新工人承受的压力如此之大,对他进行的技能训练是如此紧张,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帝和人们抛弃,感到自己已被形成其生活的可怕力量所压垮,他没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抗议。他的不满时常从酒后斗殴、偷偷地毁坏机器或从一个企业逃到另一个企业的企图中发泄出来。他只想让自己与世隔绝、改善他本人的生活,对整个阶级的状况连想都不想。他那祖传的个人主义与禁止罢工的禁令一样,使他不能为自己而与工人同志们团结起来并与他们团结一致地行动。斯大林在工人的故乡消灭了个人主义,却鼓励并利用工业中的个人主义,斯达汉诺夫运动和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工人的摄取欲达到了极端，推动他们在机床前互相竞赛。

这样，在农民集体化之后，工人阶级的水平大幅度下降，它那传统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已所剩无几。一位被流放的反对派社会学家悲叹地指出：“大批农民涌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使它产生了质的变化。这根本不是使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是使无产阶级农民化。”[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团结一致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已被彻底消灭，它们仍存在于“十月革命那一代”的幸存者及20年代培养出来的某些年轻工人身上。任何一个在1930年观察过首批突击队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热忱的人，都会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简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乌拉尔光秃秃的山岩上或更遥远的东方建起了钢铁厂和电站。斯大林的宣传尽管自相矛盾，但仍继续盛赞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东西，虽然也有歪曲和篡改。受到这种传统熏陶的工人不满意农民个人主义对企业的侵袭，不屑于为工资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奖励而进行斗争。但是，这样的工人只占少数，他们湮没在数百万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之中。此外，国家和党不断地消耗着工人阶级的智力和政治资源，把其中阶级觉悟最高、最有教养、精力最充沛的人抽调到新设的管理和行政岗位上或派到其任务旨在使农民集体化的工作队中。失去精华的工人阶级备受离心力的折磨，不断分裂。当然，在集体化问题上它也产生了裂痕。向农村进攻在开始时使城市出身的无产者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他们对农村资产阶级极不信任。但是，农村出身的工人却极为愤怒。他们在城市里传播发生在农村的骇人听闻的事，赢得人们的同情。我们刚刚引证过其论点的那位社会学家指出，在第一个

① Я. 戈烈弗的一篇论述集体化和人口过剩的随笔，载《反对派通报》1930年第11期。该文对我们所研究的苏联社会转折时期作了最独到的分析，虽然有些教条。

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充满了那种被他界定为与无套裤汉相反的人。这位社会学家解释说,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指的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敌人,但现在在苏联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最有力的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和情绪在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定的支柱上都有所反映,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1930年,顿涅茨克煤矿区有40%的矿工是被褫夺了财产的富农和其他农民。老无产者阶层的情绪已发生了变化,它本来对政权反感、敌视,现在却认为党和国家终于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愿望,因此,反对派在这些人中也没有市场。但毫无疑义的是,大批与无套裤汉相反的人、无数流氓无产者及形形色色的农民不能适应工业区的生活,在郊区酗酒、犯罪,他们是所有"热月政变"、反革命甚至法西斯运动的潜在、庞大的炮灰预备队。

新工人阶级的涣散、混乱和缺乏政治人物,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早期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把它界定为"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自在的阶级"在社会中完成其经济职能,但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能形成其集团和体现其历史利益,不能使其成员的小团体或个人利益服从于它的阶级和历史利益。工人阶级一旦实现社会一体化并具有政治意识,它就能成为"自为的阶级",就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这种状态,而不会倒退到不成熟的状态中,这一假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俄国工人阶级却不同,它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却倒退回本阶级原来的低劣状态之中,它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

农民的状况还要差,这是不言而喻的。落在它头上的打击打垮了它,使它彻底崩溃,虽然在1929年前夕农民的内部团结曾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显然,全体农民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化方面同仇敌忾。但它对党和国家的仇恨却被其内部矛盾——即富农与贫农之间的冲突抵消了。富农领导着村社,农业工人和贫农看

到数年来布尔什维克不懈地努力与富农达成协议，因此克制自己不向富农的地位挑战，并不得不接受它的领导。因此，集体化工作人员刚刚走上舞台时觉得很难打破农民的团结一致。富农如此自信，贫农对此又是那么习惯，因而他们不相信威胁要消灭富农的政委们。大多数人认为站在富农一边保卫农村的古老准则更安全，因此他们根本不理睬政委的号召。但当大家都明白政府不打算让步，富农确实在劫难逃时，农村的一致崩溃了。长期压抑的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现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广大群众因彼此冲突的利益、打算和感情而分裂了，因为政府打击的不仅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还有农村的私人经济，甚至还要求贫农放弃他那块小小的土地。农民仍倾向于团结一致地保卫他们的财产。贫农的有产者本能与富农的一样强烈，这一本能再加上最普通凡俗的人性都被集体化中的专横和无人性而震撼，使他们都义愤填膺。但这种感情被贫农的冷静算计所破坏、减弱，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将会从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及合并的土地中获益。当谁将获胜的形势已经明朗时，很多人都投到了胜利者的阵营。

集体经营的思想对俄国农村来说并不陌生。土地是耕作它的人们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上帝赐于少数人让他们发财、让其余人贫困的。这种信念在当时仍相当强，在“米尔”或古老的俄国村社的范围内，土地定期在其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这种村社直到革命前才消亡。直到1907年，斯托雷平的政府才给了殷实的农户离开“米尔”的可能，让他们把自己的土地从那里划出来，以免重新平均分配。诚然，从1917年起农民对自己业已扩大的份地的热衷已大大增强，但党的宣传鼓动人员仍能把集体农庄说成是“米尔”的合法继承人，在村民们面前极力称赞它，不说它是破坏性的新措施，而说它是旧体制的变通形式。虽然旧体制已被资本家的贪婪所破坏，但人们尚未把它忘记。由此看来，决定农民行为的动机和影响

是复杂、矛盾的。怯懦和信念、恐惧和希望、绝望和信心控制着农民的思想,使他们变得神经质、充满仇恨,但他们并不反抗,只想用无奈的顺从来减轻自己的灾难。

当农民被带进这种状态时,疯狂的破坏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在集体化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多一半。大盘大盘的肉成了丧宴上的主要食物,小农在这个宴会上庆祝的是自己的葬礼。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农,他们还教唆其他人追随自己的榜样。富农看到自己已丧失了一切,它是人民的供养者,但其财产却被剥夺,因而决定让国家失去粮食;为了不让集体化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牲口赶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们宰杀了牲畜,把自己的仓房装满了肉,以便饿死自己的敌人。开始时,集体化工作队被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吓退了,他们束手无策,惊讶地看着中农乃至贫农也加入到屠宰牲畜的行列中,直到整个俄国农村都变成了屠宰场。

这场荒诞的狂欢节就这样开始了,主宰这场狂欢的是绝望,人人都满腔怒火。暴饮暴食像传染病一样从一村传到一村,从一乡传到一乡,从一州传到一州。农夫、农妇及他们的子女一起大吃大喝,偶有中断,很快又回到餐桌上。在这个国家中从没有酿造过这么多的私酒,几乎每个农舍的房顶上都能看到酿私酒设备冒出的浓烟。遵照古老的斯拉夫传统,喝酒要喝上半天、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撑坏了肚子的富农打着饱嗝,点燃了他们的羊圈和马厩,火光照亮了整个村庄。人们被肉臭味、伏特加酒味、房屋燃烧的浓烟连同自己的绝望呛得喘不过气来。集体化工作队用机枪扫射来结束这种阴沉的宴会,这样的场面屡见不鲜。它把顽固的敌人就地枪决或赶走,然后宣布,今后凡是剩下的村民都是集体农庄的模范庄员,一心一意地追求社会主义在农业上的胜利。在消灭了富农

和富农的爪牙之后，屠宰牲口和饮宴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可能煞住它们。宰杀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或是由于它们因照料不周而生病。甚至加入了集体农庄的贫农仍十分关心自己的财产，继续浪费它，填塞着自己空了好久的肠胃。继之而来的是长期可怕的饥饿：集体农庄没有马匹，没有种子。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员跑到中亚去购买马匹，但空手而归，只好把所剩无几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 年间，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着，饿殍遍野。小农在惊心动魄的软弱和野蛮中灭亡，像它存在时一样。它的彻底失败既是道义上的，也是经济和政治上的。

不过，集体化同样遭到了道义上的失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新的农业体系在后来的年代中始终是在这一失败的规律下运作的。一般来说，革命的建设性任务的成功不取决于它所推翻的那个社会阶级，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它所能依靠的只有站在它这一边的阶级。1929—1930 年革命的怪诞之处在于它的实际纲领恰恰取决于战败者，如果由小农变成的集体农庄庄员不愿为集体农庄工作的话，那么它就无法繁荣，这点现在已昭然若揭[①]。

工人与农民之间没有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这点造成了国家的无限权力。如果说在内战结束后官僚统治是在经济崩溃和工人阶级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话，[②] 如今，这一统治实际上则由于截然相反的过程，即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而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而这种过程原本应赋予社会以新的结构及面貌，但当时却使社会变得更加混乱，加剧了它的智力衰退。在未来的年代中，苏联的全部精力都被物质进步所需的努力所吞噬，因此用来确定道义与政治目的的资本就所剩无几了。由于国家的巨大力量是在

① Я. 戈烈弗的随笔，载《反对派通报》1930 年第 11 期。

②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章。

一个政治上降为零的民族中实现的,所以当权者千方百计地使人民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但是,甚至连官僚集团也不是由某种真正的共同利益或世界观联合起来的,使其他阶级分裂的内讧在它身上也有反映。长期以来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隔阂——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间的隔阂始终未能克服。它在接二连三的对"专家"的吓人的指控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都被指控为消极怠工者和"有害分子"。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中,大多数"专家"及其朋友们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革命动力耗尽的时刻来临,那时俄国将重新变为"正常的"国家。他们确实曾为新耐普和热月政变——这二者的幽灵一直缠住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不放——祈祷过。开始,他们把宝押在斯大林和布哈林身上,反对托洛茨基,然后又幻想着布哈林或另一个"真正的热月政变分子"能战胜斯大林。现在,这些希望统统破灭。怀有这些希望的人往往不能或不愿意适应新局面,因而陷于慌乱之中。而在官僚集团中当政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派成员与斯大林派成员已反目为仇。前者在新经济政策中站稳了脚跟,而现在则受到迫害,被纷纷撤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新人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以及其他许多经常出现的空缺。因此,官僚集团的成分很不稳定,世界观则更加不同。唯一一个能把它结合起来的连锁——特权连锁也极其脆弱:当时不仅是个别人,还有一批批的官僚一日之间失去一切特权,被开除出党、投入集中营,斯大林派中那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或工业国有化的领导人是执政派的中坚,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丝毫安全感。在斯大林独裁的年代中,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

与狂热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混乱相伴的是群众社会意识的衰退和政治意志的熄灭,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它有利于从一派执政转变到一个领袖执政。经常而大量的阶级矛盾及阶级内部的矛盾

要求仲裁，而仲裁只能来自权力的顶峰。底层越不稳定、越动荡、越混乱，权力顶峰就应该越稳定、越强硬。所有社会力量变得越软弱、越没有意志，仲裁者就越有力、越刚毅，而他变得越有力，下层就变得越软弱。他的使命是把他们没有的决断和行动力量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应把全国分散的激情聚集到自己的身上。只要人民中的大部分群众低于人类最崇高的抱负的水平，他就应作为超人。他那永远正确的头脑应支配整个不理智的俄国。他那永不懈怠的警惕性应该保护所有人免遭危险，而这些人却对危险一无所知，因而不能自卫。为了他这个唯一有视力的人能成为领袖，其他所有的人都应成为瞎子。他应自命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唯一捍卫者，而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与他同司此职的同事们则应放弃对这一地位的任何奢望，即便这样，也仍应被消灭。为了使他的优越地位超越一切挑战，人民群众应不断地为他唱赞歌，而他则应极其精心地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关注人民对他的称颂，以便使赞歌的调子越唱越高。如同黑格尔著作中的历史宠儿一样，他应是本国乃至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时代的体现。但是，对于他那由其地位发展起来的病态的伟人狂来说，这些还不够，于是超人用胳膊肘移动了时间框架：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存在于他的一身，在他身上融为一体，这样，过去及其头几位创立帝国的沙皇的影子不可思议地与马克思、列宁的影子结合起来；现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而未来则允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梦想。把个人抬高到荒诞程度的秘密与其说隐藏在斯大林本人身上，不如说在他领导的社会之中，因为这个社会抛弃了自己的政治特点，拒绝理解其无比宏大的运动的意义，于是，它的政治特点和所有历史运动便集中到了领袖一人的身上。

从斯大林派执政到斯大林执政的过程不像导致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到斯大林集团执政的过程那样清晰、

合乎逻辑。从一开始,集团的政治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斯大林个人的垄断,因为斯大林的支持者总是比其对手的支持者更守纪律,他永远是追随者的唯一统帅,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从来不像他那样指挥自己人。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所有对手之后,斯大林仍然要把使自己完全凌驾于其支持者之上这件事彻底完成。现已搞清,一派执政与一党执政一样,就其定义本身来说是矛盾的。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只要该党成员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它的各个集团和派别就会形成影子多党制,而这与一党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样,在一派统治时也会产生这样的倾向,即在本派内再现刚刚被摧垮的各派和各思想流派的观点。斯大林已经在他自己的人中查出了隐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他应该剥夺这些支持者还能享有的有限自由。现在他们应该明白,在剥夺了所有对手的自由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沦为本集团领袖的附庸。斯大林一度曾宣称,党应该实行垄断,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如今,他坚持他的一派应实行垄断,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斯大林派了。斯大林主义不再是思想流派或某一政治集团的体现,它成了斯大林的个人利益、意志及其任性要求的表现。

所有政治关系的人格化同样也影响着托洛茨基的地位。随着斯大林变成唯一官方正统的革命的体现,托洛茨基则成了革命的唯一一个非官方、非正统的代表。1929 年之前情况还不是这样。托洛茨基反对派无论如何都不是托洛茨基个人的领地,虽然他是它的杰出领袖。反对派的领导核心是由有独立见解的人组成的,如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及其他人,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人是托洛茨基的亲信,而为党内民主而斗争的普通反对派成员在本派别的小范围内也享有这种自由。在联合反对派中,过于热衷于自己个人威信的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尽管自知无法与托洛茨基相比，但仍与他平起平坐。托洛茨基不仅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了对自己的信徒或临时同盟者让步，在反斯大林的活动中往往十分克制。直到1929年，布哈林派作为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一种选择，吸引了党内外的许多人。因此，尽管斯大林手中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一统天下的趋势越来越强，但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和期待尚未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或某一政策上，而是把它们系于不同的人、各个领导集团、不同的立场乃至它们之间的不同色彩之上。

1929—1930年间的事件使这种局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布哈林派还没有来得及公开反对斯大林，就遭到了彻底失败，它不能继续进行争论反对巨变的某些既成事实，也不能反抗工业化或依赖大农业主。布哈林主义的合理内容是它对待农民的方式，而现在已变得毫无意义。随着小农的消失，右派反对派失去了根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失败与布哈林及李可夫的失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斯大林为了战胜前者，不得不偷窃他们的政治武器，而后者则自己抛弃了他们过时的武器。因此，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929年11月被开除出政治局时，他们的抱怨声几乎没人听到，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当年离开政治局时，却发出了战斗的号召。

季诺维也夫派的投降和布哈林派的悄然死亡使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成了在忠于布尔什维主义方面的仅有的两个竞争对手。但现在，在对立的古怪平行发展的道路上两派都解体了，不过各自的途径不同：托洛茨基派是由于内部无休止的叛变，而斯大林派则是由于自身队伍中的猜疑和混乱。正如斯大林主义在胜利中变成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主义在其失败中只能与托洛茨基本人同一。诚然，在30年代初，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被监禁、流放中

的矢志不移的反对派队伍在拉柯夫斯基的领导下由于新的支持者和对投降失望的投降者的回流而不断壮大。尽管队伍有所扩大，但托洛茨基主义者已不能保持其1928年时还有的团结和信心。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各自为战的小团体间的不稳定的联合，他们深知自己与世隔绝，对未来已经绝望，但他们对托洛茨基忠心耿耿，忠于他所捍卫或他所要捍卫的一切。他们之间仍不停地争论，撰写彼此矛盾的提纲和报告。但甚至在恐怖达到其最高峰——大清洗之前，他们都不能像沙俄时代的革命者那样，把监狱和流放地变成他们的政治活动基地。他们的思想不能传到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到1932年时他们之间的通信被完全切断。他们再也不能知道他在捍卫什么，他再也不能确信他们的观点是否与他一致。托洛茨基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取代整个反对派；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公开或默默地承认他是他们唯一的代理人，因而也是唯一一个革命的保护神。现在，只有托洛茨基的声音是反对派的声音，俄国国内反斯大林的声音的沉寂使它变得更加洪亮。

这样，托洛茨基作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代理人进行着反斯大林的斗争，后者是当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监护人。托洛茨基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一样，变成了某种神话似的东西。但是，斯大林的名字是权力塑造的权力神话，而托洛茨基的名字却是由殉难而酿成的反抗和殉难的传说。30年代的年轻人在刽子手面前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却不大了解他的思想。他们把他当成象征，是他们本人反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不幸、被压迫的象征，是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许诺成为现实的强烈渴望和对革命“复活”的模糊希望的象征，与他认同，而不是把他当做行动的纲领。

不仅是忠实的支持者和大部分投降者这样对待托洛茨基，他已成了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唯一选择，这种感觉不仅存在于那些默

默地执行斯大林命令的党员之中，也存在于党外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之中。当人们担心或感到斯大林把他们领到了灾难的边缘，当他们的感情被他那又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撼时，他们就会想到托洛茨基，尽管是瞬间的；他们知道，他在异国他乡仍没有放下武器，单枪匹马地为反对歪曲革命而继续奋战。

斯大林担心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对托洛茨基就像古时候在位的君主对待最危险的王位觊觎者及双重或三重分裂时教皇对待非法教皇一般。现在，历史的嘲弄使托洛茨基充当了非法教皇的角色，可这个角色对他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继承人来说很不合适，他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整个30年代中充满了巨大、危险的爆炸性事件：苏联的社会改造，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纳粹的抬头和日益迫近的大战的惊雷，在这10年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决斗始终是苏联政治的焦点，尽管它有时被其他问题所冲淡。在反托洛茨基战役中，斯大林未曾有片刻松懈，也不允许他的喉舌和警察袖手旁观，他在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中进行着这场战斗，一月紧似一月，一年紧似一年。对觊觎者的害怕使他无法安眠。他不断地搜寻觊觎者的代理人：他们有可能非法越过国境、秘密地带来他的对手的信函、挑唆煽动、阴谋策划、网罗人马进行斗争。猜疑使他不得安宁，迫使他揣度其臣民中最忠于他的人内心对托洛茨基的想法。他在无可指摘的意见中，甚至在廷臣的阿谀中看到别有用心或拐弯抹角的证明——证明托洛茨基奢望的合法性。斯大林自视越高、自吹越甚，托洛茨基昔日的支持者对他越恭顺，甚至对他奴颜婢膝，他对托洛茨基的看法就越偏执，他就更加卖力地强迫全苏联都接受他的偏执狂。他继续疯狂地仇恨托洛茨基，使后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使一切政治、策略、智力和其他利益都服从于这一斗争，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调动如此巨大的政治与宣传力量来反对一个人，这种情况在

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尽管这种疯狂是病态的,但它却有其现实基础。斯大林夺权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他几经反复才夺得政权。他的成功不应掩盖一个事实,即至少在大清洗结束之前他的首脑地位并不稳固。他升得越高,他周围的真空层就越厚,就有更多的人有理由害怕并憎恨他,因为他本人也害怕并憎恨他们。斯大林看到在其昔日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即右派和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正逐渐淡化和消失,担心这些"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共谋"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联盟",他的警察应当搜寻、揭露或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地制造它们,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它们的产生确实是可能的。最后,斯大林凌驾于自己的派别之上,使真正的老牌斯大林分子变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潜在的盟友。在凌驾于布尔什维克党之上后,他不无理由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反对他的潜在同盟,为了防止潜在变为现实,他应该竭尽他的全部力量和狡诈。他深知,一旦形成这种联盟,托洛茨基将是它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在迫使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向他俯首称臣之后,他无意中提高了托洛茨基独一无二的道义权威。现在他又得尽其所能使托洛茨基声望扫地,但这不是他力所能及之事。他只好求助于最有效的措施,求助于越来越荒谬的诽谤,但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斯大林越是抨击其对手,说他是所有异端邪说和反对派的唯一鼓舞者,就越是为渊驱鱼,把遍布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中所有无声的反斯大林的感情驱向远在异国的流亡者的伟岸身躯。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整个30年代托洛茨基都在与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非理性狂潮作思想斗争。尽管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已经证实而无可辩驳，但他的某些俄国追随者们仍然担心，他未能给苏联时局中的非理性因素留有余地。[1] 托洛茨基本人早在数年前与伯特兰·罗素的争论中就曾断言“革命道路”是不可能“用理性方法预先拟定出来的”、“革命是不可能用理性方法重建阶级社会的一种表现”。[2] 如今，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使是在革命以后，在一个既不

① 《反对派通报》1939年第11期。

②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八章。

要资本主义的优点、也不能利用社会主义的优势的制度下,用这些方法同样也不可能重建一个社会。那些造成阶级社会中非理性现象的因素,诸如根本的利益冲突、商品和货币的短缺、对生产力缺乏普遍的社会监控或监控薄弱——这些因素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大多数都曾在苏联十分活跃过。布尔什维克想要使俄国实现工业化、得到启蒙、建立计划经济、对社会混乱状态实施监督这些幻想本身也受到它们身处其中的环境的非理性精神的影响。尽管可以从理论上解释甚至预料到这种情况,但它竟引发了如此荒谬绝伦的现象,以至分析思维和辩证思维在力求将理性与疯狂区别开来也有时难免陷入困境。

而在西方,那几年正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年代,在记录着疯狂和犯罪的编年史中忽然增添了纳粹主义兴起并获胜这一页。从此,纳粹主义的获胜便在某种程度上给托洛茨基的生活投下了阴影。在此,不妨让我们把下面将要说的话稍稍提前一点儿,可以说,托洛茨基力求向德国工人阶级指明这一威胁其生存的危险并动员它与之斗争,是他流亡中的最伟大的政治业绩。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将使世界淹没于其中的那一毁灭性的疯狂,而且他对这一点的认识远比任何人都早得多。托洛茨基写于 1930 至 1933 年间,即希特勒上台前这一时期的阐明德国局势的那些文章乃是就社会病态心理这一荒谬绝伦的现象及其将给国际工人运动、苏联和全世界带来的后果所作的英明而又冷静的临床分析和预告。而那些对德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人却以极端仇恨的态度对待托洛茨基在那个命运攸关的 3 年中在其避难所王子群岛上敲响的警钟,而他们对未来漠不关心的态度更加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疯狂。有关托洛茨基遇到的所有诽谤和嘲笑,在历史叙述中很难给读者一一转述。实质上,他是力求反对竭力走向自我毁灭的工人运动本身以求自救

的工人运动的代表。他无奈地注视着第三国际如何在希特勒面前俯首称臣，如同一个父亲恐惧、羞愧、愤恨而又无奈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疯狂地走向自杀之途一样。因为他忘不掉自己还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命运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使玉石俱焚，时代的疯狂甚至渗透到了托洛茨基的家庭中来。

※ ※ ※ ※ ※

从世界性经济危机，即 1929 年 10 月华尔街大恐慌开始后不到几个月，魏玛共和国的整座大厦便已摇摇欲坠了。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它以毁灭性的力量将 600 万工人抛向街头。1930 年 3 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Hermann Müller)被迫辞职：构成政府支柱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联盟垮台了。这一联盟的伙伴之间在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应在何种限度内缩减失业者补助金这一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霍亨索伦帝国的遗产和象征——兴登堡元帅如今成了共和国总统，他解散了议会，任命亨利希·勃鲁宁(Heinrich Brüning)为总理。勃鲁宁在任期间颁布法令，开始实行“紧缩”政策，缩减社会保障经费，采取大量裁减国家职工、降低工资、用苛捐杂税压迫小商人的措施，因此加重了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绝望。在 1930 年 9 月 14 日的大选中，在 1928 年仅获得 80 万张选票的希特勒的党获得了 65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它由一个小党一跃而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的选票也从 300 万张增加到 450 万张。而多年执掌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则遭到失败。德国民族党及其他一些传统右翼党派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大选表明议会民主不稳定性的深刻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忽略了所发生事情的一切征兆。对于纳

粹运动的出现,保守派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们虽然为自身的败绩和纳粹分子的猖狂而忧心忡忡,但仍对一个公然宣布要与工人组织决一死战的大党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满意,希望纳粹主义能成为其反对左翼党派的同盟,或许还能成为它在政府中的小伙伴。希特勒"要让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人头落地"的狂妄叫嚣震惊全国,吓破了胆的社会民主党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准备姑且"容忍"勃鲁宁政府。共产党为自己在大选中获胜欣喜异常,而视希特勒所获选票数的大量增加为不足道。大选次日,当时在欧洲颇有影响的共产党报纸《红旗报》这样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他们末日的开始。"几星期后,《红旗报》又说:"9 月 14 日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

数月之后,当德国的各个城镇开始初次感受到希特勒冲锋队员所制造的恐怖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表声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 9 月 14 日大选中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之后,他们在全德国的党徒们开始想入非非。然而,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情绪搞得迷失了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过,在某种意义上,9 月 14 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了。"台尔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后者不但向台尔曼表示祝贺,并重申了国际"第三阶段"的政策,即责成共产党否定任何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组成反纳粹联盟的想法,并责成它"集中火力攻击社会法西斯分子"。[①]

---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次会议于 1931 年 4 月召开。曼努伊尔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不遗余力地为"第三阶段"政策大唱赞歌,而这只能使该政策的荒谬绝伦更加突出。

我们知道,早在1929年托洛茨基就已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930年3月,距那次重要的大选还有半年的时候,他就在《致联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全欧洲,首先是在德国的增长表示不安,并坚持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协同行动的必要性。[①] 9月大选的结果刚一公布,托洛茨基就专门针对这次选举写了一本小册子,并特意将其用欧洲数种语言出版。"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其最重要的品质是能够正视现实,"托洛茨基写道。他强调指出,共产国际没什么值得为自己庆贺的,因为共产党所获得的100多万张新的选票与纳粹党所得到的600多万张选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共产国际所炫耀的"群众的激进化"并非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原因在于"深刻的社会危机",它打破了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一部分人的心理平衡,也在于共产党无力解决这一危机所提出的课题。如果说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是工人的革命愿望的话,那么,纳粹主义所表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愿望。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处于巅峰时,跟随其后的不仅是工人阶级,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底层的中产阶级。但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却恰恰相反:染有反革命绝望情绪的党派囊括了底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许多阶层。共产国际的评论员们认为纳粹主义只不过是远在1923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后果,并以此来自慰。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纳粹主义非但不是过去某次危机的间接后果,而且相反,它正在为未来的危机积聚力量。"纳粹主义居然得以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它的终点占据如此有利的进攻阵地,这一事实

---

① 《反对派通报》1930年4月第10期。另见发表在《真理报》、《不断革命报》和《战斗报》及其他出版于1930年1月至2月的托派机关刊物上的《共产国际的第三阶段》这篇文章中的毁灭性的抨击。

的根源乃是共产主义的软弱而并非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但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①]

在这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已经勾画出了他分析民族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在嗣后写的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中他仍继续进行这一分析。在30年之后,托洛茨基的某些思想会使人觉得像是老生常谈,但在作者最初发表这些思想的当时,它们却无一例外地全被当做异端邪说。总的说来,他关于纳粹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洋溢着新鲜感和独创性,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它是针对民族社会主义(或整个法西斯主义)唯一完整和实际的分析。因此,我们在此对托洛茨基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加以总结是必要的,这些想法他主要是在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争论中以论战方式阐述的。[②]

托洛茨基观点的核心在于将民族社会主义定性为"带有反革命绝望情绪的党派"。他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一个躁狂的小市民运动和意识形态。这一点使纳粹主义有别于其他所有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政党。一般来说,反动势力在捍卫现政权的时候通常是从上面、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开始活动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势力,是从社会底层崛起的一次平民运动。它们表达了中产阶级底层反对其他社会阶层用以自固的需求。这一动机通常被压抑着,而在现政权和共产党无力对付民族劫难的时代,它则带有侵略性。在20年代的"繁荣"期间,希特勒的党在德国政治中只不过是那些极端小党派当中的一个。1929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25-46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有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论著有如下几种:《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德文版和英文版书名是《何去何从》);《唯一的道路》(德文版书名原文为《Der einzinge Weg》),以及在《反对派通报》和其他托派出版物中所发表的论著。)

年的危机却将其推到了前台。迄今为止,大量商贩和办公室职员一直追随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身后,将其视为议会政治的堡垒。现在他们丢开这些党派而去追随希特勒,因为突如其来的经济灾难使得他们丧失信心、感到恐惧,并且刺激了他们想要自我确立的愿望。

一般来说,小市民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满意,他们既羡慕又仇恨地仰望着那些他们在竞争中往往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对之屈从的大资本家,而在居高临下地鄙视工人的同时却又对后者从事政治、组织工会以及集体自卫的能力钦羡不已。马克思曾阐明是什么原因促使法国小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对巴黎的起义工人的。马克思说,那些小铺老板们看到工人的街垒把他们商店的门口都堵死了,于是他们走到街上,拆除了街垒。德国30年代初期的小铺老板却没有导致他们如此狂怒不已的这类理由。其商店的大门未曾被任何一个街垒堵死。但德国的小铺老板在经济上却处于破产的境地。他们认为过错全在于多年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魏玛共和国,他们害怕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一威胁尽管是因为或正是因为尚未具体化而使得社会处于经常的纷扰和骚乱不安中。在小店主们的眼中,大资本家、犹太金融家、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政府、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凝结成为一个一心要扼死他们的多头怪物的形象,它们全都是一个旨在使他们破产的凶险阴谋的同谋者。一个小人物挥动着拳头对大资本家发出威胁,好像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似的。而当着工人的面,他又会炫耀其资产阶级的威风,夸大其对阶级斗争的恐惧、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鄙视。沦为赤贫的数百万人的政治神经官能症赋予了民族社会主义以力量和活力。希特勒就是一个身患这种神经官能症、骤然膨胀起来的小人物,他完全处在偏见和狂怒的支配之下。"并不是每一个狂怒的小市民都能成为希特勒,"托洛茨基说,"但

在每一个狂怒的小市民身上都有来自希特勒的某种东西。"

其实,中产阶级的底层通常只是些"人类渣滓"。他们不具备自我组织的能力,实质上,他们没有组织,是一盘散沙,虽然他们会虚张声势、威胁恫吓,一旦遇到现实的抵抗,他们却变得胆小如鼠。欧洲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了,它最终不是追随大资产阶级就是追随工人阶级。它反对大资产阶级而掀起的骚乱注定要失败。弱小的手工业者和小铺老板绝对无法战胜垄断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因此,当权的纳粹党的那些社会主义的许诺连一个也无法兑现。它将以保守势力的形象出现,将力求把资本主义永恒化,将从事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并加速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破产,而恰恰也是这一部分人曾将其推上执政地位。目前,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及其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中的同盟者们正处于狂热之中,而指望希特勒会带给他们社会与政治领导权的幻想更加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

托洛茨基论证说,政权的磁石吸引着这些"人类渣滓"。在斗争中,他们总是追随表现出更大必胜信心、更勇敢、更有能力与类似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样的劫难斗争的一方。所以在俄国 1917 年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布尔什维克主义除了领导起工人阶级之外,还带领了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农民群众,甚至还包括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德国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如若感觉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胜利的决心,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合理的话,它仍可以把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大量地吸引到自己的一边。小市民那被过分夸大了的虚荣心和纳粹主义的力量就来源于工人阶级的软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竭力想同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联合在一起,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者,而嗣后却又胆怯地拜倒在

勃鲁宁的体制之下，顽固地捍卫着社会与政治的原状。然而，中产阶级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起而反对的恰恰正是魏玛共和国及其在勃鲁宁身上的延续和这种原状。因此，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危险地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疏离开来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纳粹主义就是利用这一契机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仍继续宣扬适度节制和小心翼翼，而此时这类品质已彻底破产；他们继续捍卫原状，但这种原状已令人无法容忍，民众宁愿落入任何其他境地，甚至包括希特勒正将他们推入的深渊。

社会民主党人的表现有如一只鸵鸟，在这点上他们忠实于自己的性格。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因此更加重大。然而，它的领袖却并不理解这一威胁的规模和性质。他们以一种伪装的超激进主义态度拒绝把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他们断言，由于垄断资本力求将资产阶级民主变为法西斯主义，所有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政党也必定经历这一过程。如此一来，所有公猫都成为褐色的了：希特勒是法西斯分子，那么传统右翼和中派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尤其是现在正在颁布法令和执政的勃鲁宁也成了法西斯分子，更不用说构成"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了。这绝不是论战过程中的肆意抨击，因为其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目标和错误的战略。共产党的宣传鼓动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德国已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希特勒未见得会使饥饿总理勃鲁宁统治下的现状变得更坏。"[1] 但托洛茨基反驳说，如果

[1] 整个1931年和1932年上半年，这类所谓具有深刻思想的诊断和预言几乎天天出现在《红旗报》上，而《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则给予这类言论以颇具权威的支持（另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及《共产国际》1932年第27－30期）。不仅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及其他俄国领导人，而且像陶里亚蒂（艾尔科利）、多列士、加香、伦斯基、库西宁等欧洲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也都不遗余力地让自己及其追随者相信，台尔曼领导德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乃是唯一的获救之途。

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然获胜,这就等于承认这场战斗早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输掉了。告诉民众说希特勒不比勃鲁宁更坏,这种话至少是使得民众在道义上在希特勒面前解除了武装。但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否定或是抹煞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差别,那就是发疯。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同形式和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形式和方法上的差别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议会民主制度下,资产阶级靠与工人阶级达成广泛的社会妥协这一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妥协必然导致经常性的协商,而且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这类组织会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形成"无产阶级民主的孤岛"、据点和堡垒,无产阶级可以由此出发去与所有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法西斯主义则意味着这种社会妥协和阶级间协商的终止。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使这类协商得以进行下去的那些渠道,也不可能容忍任何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托洛茨基不但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演变过程的教训中而且无疑还根据自己在布尔什维克一党制体制下的经验预先清晰地描绘出了希特勒集权主义政权的垄断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和独立自主的工会的任何地位的。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或更确切地说,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中已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孤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斯大林式的宣传舆论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它迟早会"同纳粹分子勾结起来"。他们没看到这样的勾结在客观上是根本不可能的。[1] 应当补充的

① 托洛茨基:《何去何从》前言及第一、二章,载《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09-113页。

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同样相信这一幻觉。1933年他们就已经自杀性地企图同希特勒达成协议。[1] 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希特勒会把工人运动的最后一点儿残余也消灭干净，无论它是改良主义的抑或是共产主义的。他的预言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是使德国社会全部化为尘土。

因此，以为勃鲁宁政权就是法西斯体制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尽管勃鲁宁政权标志着曾作为魏玛共和国基础的资方与劳方之间已广泛的妥协实际上已结束，勃鲁宁无法消灭工人运动(但也无力抵抗民族社会主义)。如果不算天主教中央党的微弱支持和社会民主党的"容忍"，那么，勃鲁宁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官僚机构的寻常手段了。仅只依靠官僚机构的帮助他是无法镇压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因此，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结构得以保留了下来。能够摧毁这一结构的便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这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了。阶级间妥协的垮台为内战准备好了舞台，纳粹主义和整个工人运动将是内战中真正的对手。勃鲁宁政权"犹如一只放在金字塔顶端的球"，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之上的。纳粹吸收了数百万新党徒，煽动歇斯底里情绪，并准备了一支庞大的突击力量，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只是在浪费时间，实际上是在对破坏自己的力量实施总动员。

几段引文当能表明托洛茨基在叙述其论据时是何等急迫、何等愤怒：

勃鲁宁政权是一场劫难到来之前的过渡性的短暂序

---

[1] 一次，德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维尔斯利用其所剩无几的在议会讲坛上演讲的机会说：他的政党已公开宣布在对外政策方面准备支持希特勒政府。他指望以此为代价来使党免于被纳粹分子所消灭。但希特勒并没有接受这项建议。

曲。……那些一口咬定说他们看不到勃鲁宁与希特勒的区别何在的智者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组织的存在与已被消灭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貌似激进的言词背后隐藏着无可救药的消极性。……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能透过空洞而又放肆的胡扯发现真理之光……他们说什么勃鲁宁和希特勒乃是一丘之貉。我们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错得可耻,因为你们害怕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你们被摆在你们面前的巨大难题给吓住了。战斗尚未开始你们就投降了。你们说什么我们已经失败了。你们是在撒谎!工人阶级只是被分裂了……削弱了……但尚未被消灭。它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勃鲁宁政权是过渡性的,它究竟过渡到何处呢?不是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是过渡到工人阶级的胜利……两个阵营才刚刚开始为殊死的战斗作准备。你们如果把勃鲁宁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你们就是在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就是事先自认失败。你们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绝大多数工人,首先是共产党员,是不希望这样的。斯大林官僚集团也同样是不希望这样的。但不应只考虑他们的良好愿望,因为希特勒就是利用它们铺设通往地狱的道路的。……我们应当彻底揭露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雷梅尔(Remmele)的消极、怯懦、动摇和失败主义的政策。我们应当向革命工人表明,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解决当前局势问题的钥匙,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想要用这把钥匙关闭通向革命行动的大门。①

---

① 托洛茨基:《何去何从》第38-39页,载《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29-130页。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许诺，一旦希特勒试图掌握政权，他们就开始"总攻"，而此刻则要求工人克制、冷静。斯大林派夸口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共产党在德国国会的主要议员雷梅尔声称："希特勒即使掌权，也很快就会垮台，到那时，胜利将属于我们。"对此，托洛茨基是这样答复的：

> 总攻应当在希特勒取代勃鲁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以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这是无耻谰言。他们这样说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主义掌权，如果它竟至做出如此盲目消极的举动，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在法西斯掌权之后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恹恹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主义一举推翻。在意大利就没有发生任何类似事件（在墨索里尼上台以后）。雷梅尔的理由与法国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如出一辙。在1850至1851年间，那些空谈家们曾相信，如果路易·波拿巴将自己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人民就会起而反抗。……但允许这个冒险家掌权的人民嗣后却表明自己无力将其打倒……而在他被推翻以前，注定要发生诸多的历史性地震和战争。（反对希特勒的这类斗争正是这样结束的，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和拿破仑三世不过是"一座小城镇里性格柔顺、几乎满有人情味的药剂师而已"。）"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雷梅尔在国会夸口说，"我们并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意味着明天的胜利将属于希特勒而非雷梅尔。这一点请你要好好地记住：共产主义的胜利并非很快就来到。"我们不害怕希特勒掌权"，这

> 不是彻头彻尾胆怯的表示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止希特勒夺权。而且比这更糟的是:我们,官僚主义者们,业已退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不敢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下与希特勒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呀?与希特勒斗争!噢,不……他们不怕希特勒取胜,不怕拒绝战斗,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之至![1]

托洛茨基抓住每个时机不断提出警告,期待着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实现联合。他们的状况远非毫无指望,但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托洛茨基的号召正是要人们作好内战准备。对于社会民主党中鼓吹中庸的宣传家们和激励希特勒夺权的斯大林派来说,托洛茨基的号召听起来像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挑拨,至多也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事件却最无情地表明了究竟是谁不负责任、谁别有用心、谁的行为是堂吉诃德式的。事件表明,在德国左派所能采取的各类行动中,如果进行能够防止希特勒掌权的内战,实际上风险最小,而且,这还是能够拯救德国和世界使之免受第三帝国的恐怖和世界大战灾难的唯一手段。早在论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就深信,统一的左翼阵线还能几乎不经战斗就可挫败纳粹,如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8月粉碎科尔尼洛夫那样。这个例子常被他引用。托洛茨基论证说,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对其自身力量的展示还可以在希特勒党徒的队伍里引起纷争,这个“人类渣滓”之所以能积聚起狂涛巨浪般的力量,仅仅因为它是在政治真空中行进着的,并且从未遇到过团结一致的抵抗。尽管德国工业界和银行界某些代表人物已经在支持希特勒,但传统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60-62页。

右翼党派尚未同希特勒联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事实有利于左翼。托洛茨基在其有关战略和策略形势问题缜密的全面概述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士官生、"铁甲军"和警察局充满虚荣的渴望,他们很深的内心矛盾:既想利用纳粹主义又怕纳粹主义;既想借希特勒之手消灭工人,又担心希特勒会把德国抛入其结局无法预料的血腥内战中去。兴登堡、工业巨头和军官团尚在犹豫观望中。他们与纳粹之间的争吵不和即由此而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必要采取有力行动,以便制造障碍:在保守派领袖们的心目中加大其支持希特勒的风险性,加强他们的动摇和分歧,至少要使其中某些人采取中立立场。左派迷失方向和为减小风险而无所作为只能将大资产阶级和兴登堡推入纳粹主义阵营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能使政治舞台上的整个局面为之改观。这两个党都面临着同一个致命的威胁,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两党联合来说,仅此一点就足够了。当然这一想法本身被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愤怒地否定了。从1918年开始,反共产主义便是该党政策的基础。反共迫使他们与其同共产党联合以反对希特勒,倒不如追随兴登堡和勃鲁宁这一"小害"。托洛茨基一再指出,他们大肆宣扬的小害论为纳粹这一大害开辟了道路。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统一战线当做工人阶级全部政策中的中心任务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的"第三阶段"路线的羁绊。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没有察觉这一危险时,共产党甚至不想擦亮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眼睛去让他们看清威胁着他们全体的这一危险。而莫斯科不允许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禁令也妨碍了共产党有效地与该党联系。斯大林派每日每时喋喋不休地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言论也进一步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使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有可能为其反共产主义立

场找到貌似公允的借口,以便于他们推行其灾难性的政策。共产党人只有不倦地向整个工人阶级宣讲,真诚地、令人信服地向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和利益呼吁,才有可能拆除两党之间的壁垒。

两党统一战线不应饰以外交或议会游戏色彩,不应是言不由衷的漂亮空话,如 1924—1926 年间的英俄委员会的风格(或者还可以追加上 1936—1938 年间的人民阵线),而应带有合作、联手准备并组织共同斗争的性质。"两党及其工会应当各走各的路,但却一同实施打击",并且应就"如何打击,打击谁和什么时候打击"达成协议。为此两党不必为了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某种谅解而牺牲任何各自的原则。共产党人永远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他们"暂时而不可靠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总是害怕采取超越议会的行动,甚至会在斗争最危险的时候退出战场。尽管如此,共产党仍有义务向其施加压力,使其起来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对此压力让步,则一切皆好,如其不然,至少也可以使社会民主党的数百万追随者们看到各个党所站的位置,因而更易于响应共产党独自发出的行动号召。早在 1930—1931 年间,工人与冲锋队员之间零散的流血冲突便已天天发生,但在此类冲突中工人的战斗力却被无谓地消耗掉了。只有零星的少数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偶尔同意协同反击纳粹的进攻。托洛茨基在评论其中一个这样的事例时指出:"啊,最高领导者们!聪明之极的战略研究家们!学一学工人们吧……像他们那样做吧!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范围去吧!"在 1931 年内,希特勒冲锋队员的人数从 10 万增加到 40 万。托洛茨基力主德国左派应创建自己的反纳粹民兵并同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党部和设在每个工厂的工会委员会等等。托洛茨基没有忘记俄国赤卫队,他这样写道:"每家企业都应成为拥有自己的指挥员和队伍的反法西斯堡垒,必须学会使用地图,熟悉每座城市和每个区的法西斯兵营与工事的位置。法西斯

竭力想包围无产阶级的堡垒。而包围者自己应该被包围起来。"①

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却没有迫使自己按照内战的逻辑来思考和行动。部分原因是因为希特勒在其向政权迈进的过程中不时地否定他有搞政变和采用暴力的意图。他保证说，他一旦掌权一定按照宪法来行使权力，而这些许诺产生了作用。"他在迷惑自己的对手，"托洛茨基警告说，"为的是出其不意地一举抓获敌人，并在最有利的时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之所以援引议会民主，是因为这有利于他在不远的将来创建一个联盟，而他的党将在其中获得最重要的职位，以便嗣后利用这些职位来搞政变"。"这一狡猾的军事手腕无论看起来多么简单明确，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旨在满足那些想要和平合法地解决一切问题的中间派的心理需要，更危险的是，它能满足易于轻信的人民大众。"②

《真理报》和《红旗报》现在把托洛茨基说成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勃鲁宁的代理人"，说他想要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和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③ 为了向被花样翻新的论战搞得晕头转向的人阐明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最古怪的论据也极为耐心地予以分析，虽然也有几分愤怒。他不倦地与下述迷误作斗争，即"不首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无法战胜

---

①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第 41 页，载《反对派通报》第 27 期。

② 托洛茨基：《何去何从》第 147－148 页。

③ 德国斯大林分子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文集颇有教益，尽管读起来非常沉闷。就连明岑贝尔格这样的人也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对于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像实施这样一个罪恶的建议那样有害，它会推动法西斯事业。提出如此联合……只会有利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此外，它的作用……显然是法西斯主义的。"（《红旗报》1932 年 2 月 15 日）。明岑贝尔格在流亡中以自杀结束了这场论战。

法西斯主义”,他指出,情况恰恰相反,只有粉碎法西斯主义,共产党才能有效地从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成功地反抗纳粹中才能成长起来。

一切都是徒劳。甚至直到1932年9月,在希特勒成为总理前的几个月时,台尔曼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重弹明岑贝尔格(Münzenberg)的老调:“托洛茨基在其论述应当如何粉碎民族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中仅提供了一个答案:德国共产党应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或者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建统一战线,或者是德国工人阶级沉沦10到20年。这是一个彻底破产了的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理论,而且更糟的是,这还是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宣传活动中最近几年中所创造的最糟糕、最危险、最罪恶的理论。”[①]

“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正在到来,”托洛茨基反驳道,“作为一个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将被从政治地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只有那些盲人和懦夫们拒不认清这一点。让那些诽谤者和雇佣的下流文人们谴责我们同反革命结盟去吧。不是任何……会败坏共产党官僚胃口的东西都已被斥为反革命了吗?但任何东西都无法隐瞒、无法缩小。我们应当振聋发聩地对普通工人说: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阶段’之后,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阶段了。”在为唤起共产党员所而作的近乎绝望的努力中,托洛茨基往其话语里注入了自己信念的全部力量,并再次敲响了警

① 请把《红旗报》(1932年2月15日)的引文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材料第3部分(《共产国际》1932年第28-29期第102-103、112页)作一下比较。台尔曼虔诚地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前进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

钟："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十万、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从你们头顶和肩上碾过。拯救你们的出路只有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结成战斗同盟，才能获得胜利。快动手吧，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①

※　※　※　※　※

在这样的时刻却只能在宁静的王子群岛上作壁上观，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越来越痛苦难耐了。从欧洲来的信件和报纸要好长时间才能寄到，有时甚至长达两个星期。将他的小册子和宣言送到德国去，所需时间还要多。1923 年当德国似乎已处于革命的门坎上时，他曾请求政治局解除自己的官方职务，允许他应德国共产党的请求到那里去领导革命运动。既然如今他离运动舞台更近了，而且又是在决定今后数十年共产主义的未来和世界的政治命运的时刻，他就更加焦急。到处传言说托洛茨基要到德国短期讲学，但这种说法并未实现，他当时没有任何机会离开土耳其。而且更糟的是，托洛茨基的某些追随者在德国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他们出版的一份主要登载托洛茨基文章的每月只有一期的小报《不断革命报》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他的小册子被人们广泛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想在柏林建立"国际书记处"，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在那里积极活动，而且就连《反对派通报》的出版事宜也已转移到了那里。为了加强与书记处的联系，决定让廖瓦去柏林代表其父亲工作或者按照组织形式的要求担任"左派反对派俄国分部的代表"。

我们知道，廖瓦分担了他父母流放岁月中的全部厄运，并且一

①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第 44 页。

直是托洛茨基的得力助手。但在父子关系中也曾出现过磨擦。父子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廖瓦对父亲钦佩不已，以至一心想做父亲那样的人。而恰恰是这一点造成两人关系的紧张。托洛茨基一直感到不安，担心他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会对廖瓦造成过分压抑，担心自己会把廖瓦贬低到一位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小儿子这样一个角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对他忠诚。托洛茨基越孤独就越需要忠诚。廖瓦是托洛茨基能够与之自由讨论他的思想和计划、与其交流最隐秘思想的唯一一个人。他是他最信赖的批评者，同时也是——如他喜欢认为的那样——他的"联络员"(在近几年是唯一的联络员)，即把他同俄国革命的年轻一代联系在一起的"联络员"。但廖瓦的绝对忠诚有时也使他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具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性，甚至希望他带有几分固执己见、倔犟执拗的特征。而当这种固执倔犟的个性一旦表现出来或只不过刚刚露头，却又会使托洛茨基伤心，让他担心是否会与儿子疏远起来。他们那离群索居的生活和从不间断的交流加强了相互依赖，同时也加深了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父子之间虽然十分自然，却也隐含着某种过敏、紧张的成分，犹如两个长久关在同一间囚室里的囚徒之间的关系一样。托洛茨基对其助手和秘书们一向要求十分严格，但对谁的要求也没有像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那么生硬严厉。对外人他倒能克制忍让、礼貌客气，而在神经极度紧张的状况下、一人独处或与亲人在一起时他便失去了自制力。每逢这样的场合，他会把十分严厉的指责向廖瓦劈头盖脑地倾泄出来，说"书记处"混乱不堪、"敷衍了事、疏忽草率"，说儿子在"坑害"父亲。这些指责不能不使这个忠诚、勤快而认真的年轻人感到委屈。[1]

---

① 此处及以后几页中对父子关系的描写均根据托洛茨基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写成。它们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共有40个卷宗，共计1244份文件。

因此，当父母和儿子都同意分手时，悲伤的同时也掺有几分轻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雷蒙·莫利尼耶的妻子让娜决定抛弃丈夫而与廖瓦同居。而莫利尼耶依旧常常因事要来王子群岛。廖瓦和让娜的离去会使大家都摆脱那尴尬的会面。一开始大家对廖瓦能否得到德国入境签证还有些心存怀疑。（一年前他曾经请求获得法国签证，却是徒劳：法国警察局回答说，他们对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不愿意在巴黎看到他。）不过一旦注册成为柏林高等技术学校的大学生，廖瓦终于在 1931 年 2 月获得了德国的入境签证。他居留德国学习并非纯属借口。在高等技术学校，他勤奋地研究物理和数学，但主要还是从事政治工作。[①] 1 月中旬，即在廖瓦动身的两星期前，发生了一件触动全家人生活的事件：季娜带着她 5 岁的儿子谢瓦从莫斯科来了。在比尤克·阿达村，全家人已等了她好几个月，几乎已经放弃与她见面的希望了，因为苏联政府已经数次拒不允许她出境。季娜的丈夫普拉东·沃尔科夫已被流放，她本人也由于同反对派的联系曾两次被捕。只是在西欧的朋友们出面向苏联大使交涉以后，出于人道的考虑——季娜的身体状况在妹妹尼娜死后急剧恶化，她曾护理妹妹直到最后一刻——才允许她出境。但即是在这里也有陷阱。只允许她带一个孩子出境，而把六七岁的小女儿作为斯大林的人质留在莫斯科。托洛茨基的前妻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本人此时也是被怀疑对象，她抚养着尼娜留下的两个孩子，现在又开始照料这个孩子。她敦促季娜出国跟父亲团聚和到国外

① 廖瓦的几个数学练习簿写得满满登登的，每天的作业都注有完成日期和老师打的分数，嗣后，这本日记在 1937 年墨西哥反审判期间成了他不在现场的证明。这些笔记本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中。在一封未具日期的致索博尔（威尔）医生的信中，廖瓦对促使他到柏林的组织上的原因作了解释（他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才取得德国入境签证）。

治病。

季娜初到王子群岛时已经神经失常了,只是在久别重逢的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没马上表现出来。父亲对她非常亲切。"我刚到的时候,"事后她给远在列宁格勒的母亲写道,"他对我是那么体贴那么关心,我无法用笔墨描写。"在托洛茨基的所有孩子中,季娜是老大,长得最像父亲。她脸上有着跟父亲一样鲜明的线条,一样洞察一切的眼睛,一样带有挖苦嘲弄意味的微笑,她拥有和父亲一样深沉的感情,而且有时也会有和父亲一样的所向披靡的智慧和雄辩。看来季娜继承了父亲的激情、战斗精神和对行动的渴望。母亲回忆说:"她在生活中最关心的不是生活小事,而是社会大事。"托洛茨基对季娜总有些内疚。在1917年那些日子里,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马戏场面对人山人海似的群众演讲时,感觉得到两个女儿从观众席投到自己身上的深情的目光,他已察觉季娜对自己万分眷恋,尽管如此,女儿对他来说仍是个陌生人。从托洛茨基把他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东西伯利亚小城维尔霍恩斯克——他的第一个流放地,从他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个假人以便瞒哄警察延缓追逐[1] 至今,已经过了差不多30年了。但看来,这个假人似乎连他头婚生的女儿也给瞒哄过去了。在1917年之前的15年中,托洛茨基只是匆匆见过女儿两到三次,而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他能给予女儿的时间和关怀也少得可怜。在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时候,他一心渴望与女儿相会。但为时已晚:尼娜很快就病故了,而季娜也病体不支。甚至当托洛茨基被从俄国放逐之时,她都无法走出莫斯科参加全家人在火车上的凄凉的告别性团聚。季娜来到王子群岛时心已破碎,但她仍然充满喜悦、爱慕,并为父亲而感到自豪。她来到这儿不是作为病人、作为历尽艰辛的女儿,而是

---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二章。

作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拥护者，满心希望能对他有用、为他效力，渴望得到他的信任。父女二人一块儿哀悼已故的尼娜，一块儿谈论朋友、同志和被流放的亲戚，一块儿争论政治问题。她喜悦地聆听或贪婪地阅读《俄国革命史》的手稿及其他论著，了解父亲进行的论战，专注于其中戏剧般的庄重，欣赏父亲的讽刺和机智。当她读完丘吉尔的文章《欧洲的食人恶魔》时，她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以后，便喜欢戏称父亲为“食人恶魔”。[1]

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很喜欢和同情季娜。他们作出一切努力让季娜感到舒适。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的处境格外微妙，但她对托洛茨基头婚生的孩子比他本人更亲近，她不仅力求用友谊来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而且力求做她们的第二个母亲。她没有被季娜表面上健康状况的好转所迷惑，带着她遍访医生，十分关注她的身体状况。她是那样敏感，当然不会相信潜在的伤害已经永远消弭。因此，当她认为最好是把父女二人单独留下来时，她总是找借口离开。有趣的是，倒是廖瓦跟他姐姐的关系比这要紧张得多。姐弟两人性格不同，廖瓦像他的母亲而不像父亲。他沉着，谦逊，性情稳重。姐姐那热情激昂、火爆易怒的性格很容易使他失去自制，而与此同时，在姐姐的感情里也掺杂有对廖瓦一直在父亲身边而生的忌妒心。但在最初全家人亲密团聚时，在廖瓦准备动身到柏林时，所有这一切还没被察觉。对季娜儿子的到来，全家人都异乎寻常地高兴，他喋喋不休，顽皮淘气，给家里严峻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种新的音调。显然，这是已有5个(外)孙子、(外)孙女的托洛茨基初次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作为姥爷的感情吧。

季娜到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住宅里着了一场大火。家里的大

---

① 引文摘自季娜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在档案中，我还找到了她的照片，是赠给父亲的，下面的题词是：“给食人恶魔”。

部分财产和托洛茨基的图书室都被烧掉了。托洛茨基好不容易才把档案和刚刚竣稿的《俄国革命史》第一卷手稿从火中抢救出来。大家都怀疑是有人放火。也许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想要毁掉档案?于是开始侦察。对证人进行了盘问,但什么也没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很沮丧不安……,"托洛茨基的一个秘书这样写道,"只有托洛茨基本人例外。"举家搬进最近的一家旅馆,"可还没等我们安顿好,他就把手稿摊在桌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该书的另一章,就好像夜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①]几天之后,他们又迁居到君士坦丁堡东面的郊区小镇科季科伊,那里住着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全家这次迁入一栋四周围着带铁丝网的高栅栏墙的木头房子。他们一家和秘书们、警察及渔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直到他们在比尤克·阿达村的房子重新修好为止。

迁居科季科伊的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次火灾。档案再一次被匆匆忙忙地拖了出来。全家不得不把旁边的几个板棚改为临时避难所,每个人都再次想到可能是有人纵火这个念头。但后来事情查清楚了,火灾的原因出在季娜儿子的身上,他曾在堆着木料、废料和锯末的阁楼里玩火柴。所有的恐惧过后,大家全都感到轻松,大家笑着逗这个"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小秘探"。

几周过后,季娜旧病复发。她有肺病,已经动过好几次手术。她无法忍受东地中海炎热的气候,对留在国内的丈夫和女儿命运的担忧也折磨着她。疾病和忧虑使她失去了心理平衡。也许,早在她那艰难的童年即已深深植下了根的精神紧张和冲突被后来的经验进一步强化后浮出了表层。她的表现开始失常:沉湎于回忆,开口说出一些迄今为止别人从未从她口中听到过的愿望和抱怨。

---

① 约翰·弗兰格尔发表在1932年1月2日《战斗报》上的文章。另见《东方杂志》1931年4月8日)

一种感觉死死纠缠着她，即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女儿，是父亲的累赘，而她却以全部热情崇拜他这个生机勃勃的革命天才。季娜写道，对父亲的信仰给了她生活及以与困难斗争的勇气。没有父亲，生活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但她却感到自己与父亲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知道，我知道，孩子是多余的。他们的出世是对罪孽的惩罚。”[①] 这就是她掷给父亲的话，看来，在这句指责中回响着她在孩提时代经历的一次恐惧，当时她在被窝里找到的不是父亲，而是一具假人。

处于这种感情波动中的季娜竭力压抑着她从内心不接受父亲第二次婚姻的心理。表面上她对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亲热温顺，但这里面有一种不自然的取悦于继母的姿态。在她身边，季娜的确是小心翼翼，经常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为她牵肠挂肚，对她温柔体贴。然而隔阂还是显露了出来，对这一点父亲和继母也都感觉得到。这种隔阂感时不时地会公然地爆发出来。尽管他们都尽量做出什么都未察觉的样子，但关系还是变得紧张起来。为了不使情况更加恶化，托洛茨基变得缄默起来。但他越是缄默，渴望得到他的信任和亲近的季娜就越不安。她希望至少是充当父亲的助手之一。而他呢，一是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二是想到她也许还有可能回到留在俄国的孩子身边，因此不鼓励她工作。托洛茨基希望季娜能利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好好治病，也希望她能避免在政治上败坏自己的名声，好像她是托洛茨基的女儿这一事实并未使她永远背上黑锅似的。随着季娜身体状况的逐渐恶化，他感到必须更加爱护她，因此，让她共同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不能把反对派在俄国的事务委托给她，而季娜最向往的却恰恰是这个工作。那时，托洛茨基和他在俄国的拥护者们保持着十分广泛的通讯联

---

① 季娜1932年2月26日的信。

系,一部分是公开的,而另一部分是通过秘密渠道,署名和地址均用密码。这些密码需要严格保密。而要将它们瞒过一个精神病人,一个将来一旦回到俄国便可能遭到宗教裁判似的审问的人,密级便须成倍地加大。是地下工作的起码规则要求采取这种防范措施的,但这个不幸的女人却认为这是爸爸不信任她的证明。季娜经常叨咕这句话:"对爸爸来说,我是百无一用。"她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对自己的自责越来越严厉,她越来越悲伤,而这逐渐加重的精神失常开始成为大家的心病。夏天,她到离家最近的一家疗养院做了肺部手术。回来后的精神状态略有所好转,但依然忧思重重。

处于悲伤和深切同情中的托洛茨基感到十分内疚而又无能为力。解除患不治之症的女儿的痛苦,居然比同社会顽症作斗争还难。与深入了解季娜病态的个性相比,给德国小资产阶级集体理性中的恐慌症开药方反倒容易得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的理解何等深刻,却无力洞察一个人的心理!他看出季娜的脸上和眼睛里已经透露出发疯的迹象,要知道这脸庞、这眼睛多么酷似他啊。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个以头脑清晰和严于自律著称的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就是看着女儿处于没有条理和心神错乱这样的状态中。仿佛理性本身在疯狂中发现了它的最亲近的孩子和它的面貌酷似者。温情与恐惧、同情与反感、骄傲与屈辱——全都集中于托洛茨基一身。他备受刺激,无能为力,暴躁易怒。有时,当季娜充满妒意地想要欺负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时,托洛茨基提高嗓门,要她注意分寸和礼貌。父亲的大嗓门使她沮丧消沉。一年以后,在回忆起这样的场面时,她给父亲写道:"别冲我喊,爸爸,别冲我喊,你的喊叫使我难以忍受。在这点上我像母亲。"随后,她又说:"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来做此事,那么,世界上没有谁像我那样渴望减轻我带给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的痛苦了,尽管我是一个无

辜的罪人。"[1]

由于关系紧张，季娜的病变得更凶险，天天夜里说胡话，眼看性命难保。托洛茨基一度考虑要她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为此给柏林的普费姆费尔德一家写了信。季娜不愿去。她说她不愿陷入自己的潜意识这个"泥坑"里去，也无法忍受这样一个想法，即为了与父亲团聚她克服了如此之多的障碍，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可是才与父亲团聚，又要跟他分手。她还得跟儿子分手，因为她无力照料培养他。尽管如此，季娜还是听从了大家的劝说，于1931年夏天留下了谢瓦而只身前往柏林。分手对于父亲和女儿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转述了托洛茨基对她说的话："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的人。""他说此话时的语调意味深长而严厉，"她补充道。

这是一个为疯狂所困惑并被其挫败的理性的声音。

※ ※ ※ ※ ※

当季娜来到德国首都柏林时，那里的生活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恐慌。她是在由希特勒和戈培尔倡议的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议会的全民公决几个星期后到达柏林的。纳粹掀起了疯狂的沙文主义运动，号召进行"人民革命"，以反对那个"居然会同意奴役和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党。于是，共产党向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布劳恩（Braun）和泽维林格（Severing）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同意某些要求，它就保卫他们的政府，而如果它的要求被否决，它就投票反对这个政府。乍看起来这是对"第三阶段"策略的背离，至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产党直接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话

① 俄语是"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а。此信没有标明日期。

了。而实际上他们这是"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而且,一旦普鲁士政府否决他们的要求,共产党会号召工人反对它。这样一来,共产党不是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有条件或无条件的统一战线,而是与纳粹建立起了虽未获承认、但更实际的无条件的统一战线,但他们为了挽回面子,把这一举措称为"红色全民公决"。

于是,在共产党的政策中现在出现了不可救药的、使人沮丧的愚蠢,这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掌权时甚至掌权之后。在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旗帜下往往会喊出同样一些口号。纳粹党为了争取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激进分子而许诺说,在其"人民革命"过程中,他们要和金融资本家算账。共产党则不敢号召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侈谈什么"人民革命"能够保障德国"社会和民族解放"并将打碎凡尔赛和约的锁链。在共产党的宣传中民族主义精神日甚一日的时候,恰恰是在德国任何东西也没有比遏止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狂热势头更必要、更迫切的关头。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全民公决中取胜,但它的后果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加剧了混乱。

托洛茨基对台尔曼和共产国际的"民族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以极大的力量揭露了"红色全民公决"的荒谬。托洛茨基指出,所有这些举措都由于共产党与纳粹彼此乃是、而且也不能不是死敌而显得更加使人厌恶。斯大林派为了自我辩解便说社会民主党是在为纳粹主义铺路。托洛茨基指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是在为纳粹的胜利铺路,那么共产党难道就该让这条道路缩短吗?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即革命党和反革命党派会从各自完全相反的立场出发,来攻击同一个"中庸"的敌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党只有在潮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时才能这样做,而不是在如当今德国那样潮流的发展有利于反革命时。"举着'打倒勃鲁宁、布劳恩政府'的标语走上街头,这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因为根据力量的对比,取代旧政府的只能是希特

勒和兴登堡的政府。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参与了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斗争的话，那么同一条标语便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甚至直到现在他也未曾稍稍怀疑共产党的善良愿望。然而，“糟糕的是，斯大林的官僚集团试图用法西斯主义自身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它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了某些颜料，并且竭力想在爱国主义的拍卖场上压倒对方。这不是重大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侈谈“人民革命”和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人忘记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论断，即“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的主要敌人在本国之中”。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根开始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现在却已嫁接到了台尔曼的“民族共产主义”身上了。“……思想不仅具有自己的逻辑，而且具有自己的爆破力”，共产国际恬不知耻地想要在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方面战胜希特勒，表明“斯大林主义的精神空虚”。[①]

托洛茨基认为，他们用来做赌注的不仅是来之不易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成果，还有文明的未来；随着纳粹主义兴起，中世纪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希特勒如果获胜，他不仅会保留资本主义，而且还会把它拉回到野蛮时期。发狂的小市民“否定的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达尔文主义”，并且用10或11世纪的神话与18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对抗。这一假设的种族优越论刺激着德国最贫穷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自豪感，为其提供了一条摆脱日常生活困境的虚假的出路。民族社会主义在其野蛮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摒弃“经济史观”中更为堕落：“从经济唯物主义转向动物唯物主义”。纳粹主义“将国际政治思想中的垃圾全部收集到一

① 《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载《反对派通报》第24期。此文在德国曾出过单行本。

起……以便拼凑一个新德国救世主义的政治理性宝库"。它唤醒并且集合了在"文明化了的"阶级社会这层薄薄表皮之下躁动着的全部野蛮力量,它动用了取之不竭的黑暗、蒙昧、兽性的储备。托洛茨基把纳粹主义界定为:"社会在其正常发展(也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一定会将之作为文化粪便……而摒弃的一切全都通过它的嘴排泄了出来:未及消化的野蛮撕裂着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理学。"[①] 这句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话使人感到他已经预见到了第三帝国的焚烧书籍和毒气室。

3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舆论竟然会漠视这一针对纳粹主义的哲学历史观,这个事实也许不会使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然而对他来说,远比这点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苏联以及全世界广大的共产党员群众也会对托洛茨基关于威胁着苏联的那一危险所作的预言置若罔闻。1931年,即在莫斯科保卫战的10年前,托洛茨基就写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②] 而在当时,莫斯科把法国当做是苏联在西方的主要敌人,而且担心很快就会遭到来自刚刚占领满洲的日本的打击。如果说纳粹主义的成功当时曾引起过斯大林及其幕僚们的担心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希特勒早已扬言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征服东方,但斯大林以为那只是"叛乱者"希特勒的主张,而身居总理之位的希特勒未必会拒绝接受德国从其与俄国的关系之中——即根据拉帕洛条约而获得的好处。斯大林期待的是,要把德国重新武装起来的希特勒会与法国冲突,而这会迫使他放弃敌视苏联的政策。共产国际之所以鼓励德国共产党员给希特勒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运动以模棱两可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

① 《什么是民族社会主义》,载《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391-399页。

②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00-101页。

运动应能使希特勒放弃领导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远征的野心。

托洛茨基与不理解纳粹主义隐含的国际后果这一现象进行了斗争。他不相信法国仍像在武装干涉时期那样是俄国的主要敌人。托洛茨基断言:“在目前,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敢冒以战争反对苏联的风险:这样的行动会在国内引发无穷的后果。但只要希特勒一掌权并摧毁德国的工人阶级、使其在以后许多年中不能恢复元气,他的政府将是唯一能进行一场反苏战争的政府。”[1] 托洛茨基同样也不相信日本会对苏联构成真正的威胁。他预料到,占领满洲后的日本会陷入一场同中国的持久的消耗战中,而这场战争将把日本的力量从苏联引开,并能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东方的基本条件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这就表明整个过程(即日本占领的过程)将是缓慢而又艰难的。无论如何,苏联的远东地区不会受到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今后一段时期中的危机事件将发生在欧洲和德国”,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对抗已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而且结局即将揭晓”。他再次指出:“今后许多年中,不仅德国的命运……而且还有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发展,英国革命形势的高涨,法国帝国主义的未来,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于一点:在今后数月中,谁将在德国取胜?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2]

托洛茨基认为,希特勒如若组织反苏的十字军远征,就会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而这将导致“苏联陷入可怕的孤立之中,迫使它必须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殊死的战争”。“如果法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00-101页。

② 同上,第95页。

西斯把德国工人阶级粉碎了的话,那将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至少灭亡了一半。"只有当工人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掌权,德国、苏联和世界才能从灾难中获救。因此,斯大林在对德关系上的政策既违背了苏联的也违背了德国共产主义的根本利益。苏联的安全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多年以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在叫嚷什么反苏的十字军远征即将开始;而现在,当危险已成为现实时,他们反倒沉默了。何况,纳粹夺权的企图"必定会导致红军的总动员",这应当成为一个"定理"。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来说,这就是革命的自卫。……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还是欧洲的心脏。希特勒也不仅仅是希特勒,他还是担任超弗兰格尔角色的候选人。但红军也不仅仅只是红军,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工具。"①

几个月以后,在1932年4月,托洛茨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这一思想。埋头于政治与外交的成规中的人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样。"我与莫斯科现政府关系的性质使我无法以它的名义或根据它的意图说话。……现在,我可以极为坦率地按我的观点说说一旦德国发生法西斯政变苏联政府应当如何行动。设若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一旦收到通报这一事件的电报,我会立即签署动员令来招募若干年龄段的人。当局势的逻辑表明战争将不可避免之时,面对死敌居然给他时间,使他得以强大、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得以结盟……得以制订进攻方案,这是不负责任的和不可饶恕的。"他再次指出:"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期不远。"考虑到这一点,谁首先发起进攻就是次要问题了。托洛茨基没有忘记法英两国的某些人希望维持西方原状和凡尔赛体系而怂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0页。

恩德意志帝国东侵，他写道："无论巴黎人抱有什么幻想，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告，凡尔赛体系将首先被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这场战火吞没。"[①]

共产国际的出版物立刻痛斥托洛茨基是"叛徒"、是企图挑动俄国与德国冲突的"战争贩子"。在共产国际以外也有许多人觉得他的大胆的声明过于鲁莽。然而如果人们考虑到，由于德、英、美缩减军备，甚至在30年代初苏联就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了，那么托洛茨基的立场就不会显得如此鲁莽。实质上托洛茨基并未鼓动苏联进行反德战争，即便是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1933年，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以后，托洛茨基声明说在当时的局势下动员红军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此之前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托洛茨基推断希特勒不得不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因为他不相信德国工人会一枪不放地允许希特勒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假设德国发生内战的条件下，他坚持认为红军有义务介入。[②]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有风险的行动方式，但其风险要少于消极等待希特勒掌权和重新武装德国。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军事上与丘吉尔在4或5年以后所采取的立场是相近的。丘吉尔号召英法两国政府宣布总动员、进行军事准备，以便制止希特勒的军队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一立场奠定了丘吉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英国领袖所需要的无可争议的威望。而托洛茨基得到的却只有诬蔑和的诽谤而已。

此时，纳粹的狂潮铺天盖地。1932年春，德国将举行大选。希特勒推自己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候选人所得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04－105页。

② 此文最初刊登在1933年4月15日的《美洲论坛》上。同上，第233－240页。另见《希特勒与红军》，载《反对派通报》1933年5月第34期。

选票必定会多于希特勒或其他竞争者。同年,在分为两个阶段的议会大选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始终多于1300万张。但社会民主党决定投票支持老朽不堪、已经退休的前总统兴登堡竞选,而在此前的大选中他们曾竭力反对他,认为他是反动的德意志帝国的象征,现在他们却竭力想躲在这位老者的背后。共产党号召工人投票选举台尔曼。再次当选后的兴登堡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给予议会制度和社会民主党以最后的打击。他解除了勃鲁宁的职位,后者优柔寡断地试图取缔希特勒的冲锋队并引起东普鲁士贵族上官的仇恨。兴登堡的新总理冯·巴本(von Papen)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1932年7月20日以法令形式取缔了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政府。而纳粹曾想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推翻这个政府,但未能做到。这一事件的悲喜剧性质颇耐人寻味:一个指挥一个排士兵的中尉竟将普鲁士总理和名义上领导整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内务部长赶出了办公大楼。当共产党草率敷衍地向社会民主党建议号召举行全面罢工并答应提供支持时,为时已晚。社会民主党又一次拒绝同"左派敌人"协同行动,他们幻想冯·巴本和兴登堡的智囊(其主要动力是施莱希尔〔Schleicher〕将军)能以智取胜并遏止希特勒。这是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幻想:在普鲁士,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一举攻破社会民主党"堡垒"的冯·巴本在工人眼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仿佛他已从希特勒手中偷走了雷霆,纳粹运动顷刻间就会失去其惯性了。[1]

正是为此,托洛茨基的分析和预言的精确性就更应使人惊奇。"工人从事斗争的准备越是不足,"托洛茨基指出,"巴本政府的出场就越能给人以力量印象……。"但这还不是法西斯政变。政变尚有待发生。巴本无法以巧妙智谋战胜希特勒,也无法阻止纳粹专

[1] 参见W.L.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58－160、170－172页及同书各处。

政的建立，因为他甚至连勃鲁宁那点儿有限的力量也不具备：支持他的只有普鲁士官僚政体中最腐朽的那部分。他无法控制跟着希特勒走的数百万人的狂怒和愤懑，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数百万工人的决心和战斗精神。但工人们又从哪儿得到这种精神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居然会只让人"在鼻子上轻轻一碰"就被推翻，而许多年以来一直告诉他们德国已经是法西斯德国的德国共产党，现在却号召他们举行全国总罢工以反对巴本的"法西斯"政变来捍卫"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普鲁士政府。然而，无论工人处于什么样的慌乱状态，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依然存在：不是纳粹获胜就是工人阶级获胜，第三种结局是不会有的。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巴本执政的期限不会超过"百天"，而在他之后继任总理之位的施莱希尔的情形也与之相仿，尔后，国防军和贵族士官生会与纳粹结盟并期望使之驯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政治上说，一切所能想到的与希特勒联合的形式都意味着将官僚政治、法庭、警察和军队溶入法西斯主义之中。"托洛茨基断言，即使是现在建立工人"联合阵线"也不太晚；但"多少时间已被毫无目的、轻率和可耻地白白浪费掉了！"[①]

※　　※　　※　　※　　※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普里摩·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专政于1930年垮台，随后在1931年4月，君主制也垮台了。在德国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变为专制制度的时候，在西班牙却发生着完全相反的事。而共产国际在这两个国家中却遵循了同一个"第三阶

① 《团结之路》，另见《反对派通报》第29－30期。

段"政策。德国共产党声明,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没有意义,而西班牙共产党也同样对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冲突不予考虑。1930年2月普里摩·德·里维拉垮台后,曼努伊尔斯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说:"此类运动在历史屏幕上不过是小事一桩,它在工人阶级的头脑里是不会留下深刻痕迹的。……一次罢工的意义也要比一场类似西班牙这样的'革命'的意义更大……。"① 一场吸引世界关注几乎整整10年之久的革命,却只是被加上引号地一带而过。阿尔丰斯国王的退位使共产党措手不及。在此之后当民主选举整个国会的要求响彻整个西班牙时,共产党的官方代表如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那样断言工人和农民从任何议会中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并起而抵制选举。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声明,由于国家落后,西班牙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以内,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不难看出发展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反题的、曾被应用于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的斯大林的教条。这一教条又要贯彻在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的所有阶段的政策之中。在下一个阶段,即1936至1938年间,这一教条还被用来为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阵线中的联合,为共产党"温和"政策及其反对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托洛茨基派成员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惩罚行动作辩解。但在30年代初,这一教条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极左策略结合起来,即同否定召开立宪会议、民主自由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要求结合起来。

托洛茨基断言,为了不至失败,西班牙革命应当像俄国革命那样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根据社会结构、阶级

① 但同年晚些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又指责西班牙共产党未能理解这些事件的革命意义。参见《共产国际》1930年第34-35期。

力量的配置，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和各政治力量结盟的情况与1917年前夕的俄国最为相像。西班牙也和俄国一样，工人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负有成为革命机构的使命。托洛茨基在坚持革命发展的不间断性的同时，要求共产党采取更为实际的策略，提出或支持争取普选权、召开立宪会议和加泰罗尼亚及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自决权，首先要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要求。农民当然期待议会能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就必须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自己的土地纲领，哪怕只是为了鼓励农民从事超议会行动也罢。而按照“第三阶段”政策，当人们倾向于蔑视和抵制议会时，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议会克汀病是一种十分讨厌的病症，而反议会克汀病也好不到哪儿去，”托洛茨基指出。难道1917年布尔什维克没有召开过立宪会议吗？对西班牙来说，议会政治比在俄国更重要，因为革命的节奏将更缓慢，而且，西班牙共产党在采取行动时应更多汲取的不是俄国的经验，而是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雅各宾党人专政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国民会议，而在西班牙将会出现某种类似现象。

西班牙共产党不仅仅是迷失了方向而已，这是一个弱小的党。这也是一个被斯大林的正统思想必然引起的分歧而肢解的党。这个党已经将若干托洛茨基主义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和党的缔造者与领导人安德列斯·尼恩开除出党。分裂是后来几年西班牙共和国陷入混乱的原因，而反尼恩的运动则以他被杀而告终。早在1931年4月，君主制被推翻仅几天后，托洛茨基就在给莫斯科政治局的密信中强烈抗议在西班牙迫害异端者的行动。他提醒说，1917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计较过去的分歧，而是与所有与其相近的团体实行了联合。而他本人就是在那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他们的这种策略以及他们在党内自由辩论的基础上奠定的统一和纪律的能力肯定会在党

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使党变得更加强大。托洛茨基问道:"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使自己充满对其正确性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仅凭这一信念就足以使自己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决定性的进攻呢?"对异端者的围攻会使党的普通成员头脑混乱、士气低落,从而加速法西斯的胜利,这将"对整个欧洲和苏联产生严重的影响"。托洛茨基请求政治局向西班牙共产党组织建议——"只是建议而非命令"——要求他们召开一次联合代表会议,他建议他的追随者在这点上进行合作。"西班牙事件的进程每天都将证实统一共产党队伍的必要性。这一沉重的历史责任将由那些挑起分裂人来承担。"莫斯科没有给这封信以任何答复。而在这份文件中,的确指出了七八年后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种子。

※ ※ ※ ※ ※

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剥夺了托洛茨基的国籍和重返俄国的权利。1932 年 2 月 20 日的《真理报》公布了有关的命令,其理由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活动",但却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罪行。这是前所未有的迫害。那些在第二国际领导机构任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侨民曾在它的物质和道义的支持下从事反布尔什维克宣传,此前也尚未被剥夺苏联国籍。为了弥补这一疏漏并多少掩饰一下其主要目的,2 月 20 日命令同时还剥夺了大约 30 名孟什维克侨民的国籍。

在这个"混合物"中隐藏着歹毒的阴谋。与托洛茨基不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并未曾被驱逐出境。其中多数人在 1921—1922 年间被"奉劝"出国——如果他们不愿受到迫害的话。于是他们离开了俄国。决定给孟什维克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列宁,而托洛茨

基无疑是赞同这一决定的。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的仇恨直到流亡中也未曾改变，而这一仇恨使他在2月20日驱逐令以前的几个月时严重失策。1931年，在莫斯科对孟什维克分子进行可耻审讯过程期间，托洛茨基完全同意检察官对他们的指控。被告苏汉诺夫（Суханов）、格罗曼（Громан）等人被控犯有经济怠工和与侨民勾结的罪行。指控根据的是一些伪证和“供认”。[①] 托洛茨基的立场部分出于以下原因，即检察官对主犯、前国家计委顾问格罗曼的指控中说他企图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混乱的说法含有真实的成分。格罗曼的确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抵制托洛茨基的工业化纲领。在法庭对其审判时，托洛茨基指出，由于有斯大林的纵容，格罗曼及其一伙对苏联经济实施怠工，直到“左倾方针”才结束了斯大林的纵容，使孟什维克坐到了被告席上。[②] 尽管这一情况能够解释托洛茨基何以会同意检察官的指控的原因，但它却无法为托洛茨基辩解和开脱。嗣后，托洛茨基曾公开表示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遗憾。[③] 然而这一事件表明，托洛茨基依旧是那么狂怒地仇恨孟什维克，因此不难想象，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怠工者”一起钉在耻辱柱上，以一道指令同时

① 检察官认定被告全都听命于孟什维克的侨民领袖D.阿布拉莫维奇，说后者曾秘密潜回俄国检查地下组织的工作。阿布拉莫维奇则证明，在检察官所说的那段他在俄国活动的时间里，他正在布鲁塞尔参加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并与莱昂·布卢姆、王德威尔得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一起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② 关于托洛茨基对审判孟什维克的最初评论参见《反对派通报》1931年第31－32期第25－36页。30年后，即1961年7月至9月，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信使报》发表了H.亚斯内的回忆格罗曼的文章，文章证实了格罗曼在布尔什维克派别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托洛茨基所描写的那样，尽管在法庭所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上他当然是无辜的。

③ 参见《反对派通报》1936年7－8月第51期。促使托洛茨基承认错误的是廖瓦，他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前夕承认错误的。

剥夺了他们的国籍,他会感到何等反常的喜悦。

继此次事件之后,很快就发生了相当神秘的"图尔库尔事件"。1931年10月31日《红旗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以前曾在国内战场上指挥过白军的侨民将军图尔库尔打算利用王子群岛警卫松懈的情形组织对托洛茨基的暗杀活动。文章还说,如果暗杀得手,暗杀者们将把罪过转嫁到苏联政府身上。这些话听起来相当可信。但使人惊奇的是,《红旗报》居然会披露此事。在托洛茨基坚持下,他的朋友们向柏林和巴黎的苏联大使馆递交了呈文,提醒说苏联政府曾允诺保护托洛茨基在流亡中的生命安全,并要求履行这一职责。莫斯科没有理睬这一请求;于是托洛茨基断定《红旗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谋杀提供斯大林不在现场的证明。于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便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声明(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带有托洛茨基的风格):"斯大林关心的不是如何制止白军实施他们预谋中的行动,而仅仅是防止他们把从事恐怖活动的罪责加在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的头上。"[1]斯大林以间接方式,即通过共产国际作了回答。他指责托洛茨基忘恩负义、如此报答他斯大林对他的关怀,该答复暗示托洛茨基的生命的确处于来自白军的威胁之中。[2] 斯大林现在惩罚了"忘恩负义者",剥夺了托洛茨基的国籍,甚至连对他加以形式上的那一点儿保护也剥夺了。而这种保护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为它在国外的属民提供的。

这一行动旨在达到处死布柳姆金所未能达到的目的——切断托洛茨基与其在苏联的拥护者之间的所有联系。尽管官方对信件

---

① 这封信被秘密地发往莫斯科。托洛茨基只是在自己被剥夺国籍以后才公布了这封信。参见《反对派通报》1932年3月第27期。)

② 答复以秘密通告的形式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落在托洛茨基手中的一份通告副本,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

实施审查和没收，但托洛茨基还是能收到来自流放地和监狱的大量信件。在柏林，廖瓦竭力与到这里来执行任务的老同志建立联系，并把成败结果汇报到王子群岛。1931 年春，他和皮达可夫邂逅。此人曾是朋友，而现在正如廖瓦说的那样，“这个火红头发的犹大扭过头，装作没看见我的样子”。在这之后，7 月里，廖瓦走进一家大百货商店时意外地见到了伊万·斯米尔诺夫，此人在投降以后在苏联工业界身居高位。他们拥抱在一起。斯米尔诺夫热情询问了托洛茨基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倾诉了一个投诚者的一腔苦水，讲述了苏联的阴暗形势和人们的普遍不满。尽管他向斯大林投降时的希望已经变为失望，但他仍无意重新斗争而宁愿采取观望态度。但斯米尔诺夫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将十分欢迎与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联合”，其直接目的是交流信息。至少，他还想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他在准备返回莫斯科时，答应以后将通过可靠朋友将综述苏联国内经济和政治情绪状况的文件传递过来。他俩约定了使者见面时使用的暗号。早秋时节，从前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的投诚者 E.C.戈尔茨曼带来了斯米尔诺夫转交的备忘录，一年后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的这份文件中首次公布了集体化运动期间屠宰牲口的巨大规模、工业严重的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等等。备忘录结尾是下述意味深长的结论：“鉴于现任领导无力摆脱经济和政治困境，必须更换党的领导的信念正在与日俱增。”廖瓦和戈尔茨曼经常碰头并讨论苏联的发展。

斯米尔诺夫和戈尔茨曼的话不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代表了许多投降者，他们虽不无胆怯，但却明确地将目光转向托洛茨基。他们既为德国上空越来越浓的暴风雨而忧虑，也为本国的形势而忧心忡忡。他们为德国共产党的瘫痪状态而担忧，并满怀好感地关注着托洛茨基的活动。其中多数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一个看法，后来由拉狄克把它说了出来。1933 年，他在与一位德国共产

党员推心置腹的谈话时指了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说:"那里坐着的人应对希特勒的胜利负责。"[①] 看不到改变共产国际政策的出路何在、灰心失望而又士气低落的投降者们现在后退了几步,转而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接近起来。这些都没有逃脱斯大林的注意,他为使党免受托洛茨基的影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斯大林此刻开始后悔把托洛茨基赶出俄国使之有可能向全世界传播他的思想。斯大林决定弥补自己的过失:在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托洛茨基身上永远打上流亡的烙印。今后如有任何苏联公民想与托洛茨基联系的话,他的罪过不仅是与国内反对派可耻的首领联系,而且是在与外国阴谋家联系。

托洛茨基以一封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公开信"作了答复,2月20日的命令就是以后者的名义发表的。[②] 他揭露了这条命令的非法性质(把它称做"热月政变风格的大杂烩","软弱无力而又可怜巴巴的""斯大林的个人报复行动"),同时还对10年党内斗争作了总结。"你们以为以你们2月20日的一纸欺诈性指令就可以遏止布尔什维克批评的发展了吗?就可以阻止我们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吗?就可以吓跑和我们思想一致的人了吗?……反对派将跨越2月20日的决议,就如同一个工人前往他的劳动地点的路上跨越一片水洼一样。"他知道,这样的迫害并不是斯大林的"最后手段"。"他的武器库是我们所熟知的……你们对斯大林的了解不比我差。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与我本人的个别交谈或在与我接近的人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评价了斯大林,而且这种评价

① 《红旗报》的前出版家和"红色阵线"的领导人E.沃伦贝格写道:"1933年初,季诺维也夫对我说:'如果不算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应对希特勒的胜利负主要历史责任。'"见E.沃伦贝克:《红军》第278页。

② 《反对派通报》1931年第27期。

不带任何幻想。"接着,他转向斯大林周围的那些人,那些"机关工作者",向他们的良心,同时也向他们的利益发出了呼吁。托洛茨基力图使他们相信,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之下,他们非但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会丧失许多。他清晰地讲述了斯大林使他们和全党蒙受的屈辱。

> 你们是站在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这面旗帜之下向"托洛茨基主义"开战的。你们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赖以对抗你们自己虚构的托洛茨基对个人领导权的觊觎。而由集体领导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呢?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保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凌驾于工人阶级和党之上的机关奠定了凌驾于机关之上的斯大林个人专政。如今,宣誓忠于"列宁的党中央"几乎等于公然打出谋反的旗帜。而唯一可以容许的忠诚公式就是以斯大林的名义起誓——演说家、宣传家、记者、理论家、教育家、运动员都必须在自己的发言、文章和演讲中加入赞扬"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政策的英明这样的语句,也就是说骑在中央头上的斯大林永远正确。这意味着,每个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到小小的州办事员都必须面向全国公开宣誓,一旦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之间发生分歧,他,签字人,将支持斯大林反对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正在压制着自己那一派,而此派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帮助他镇压他的所有对手。他在自己那一派的内部又组建了一个人数更少的个人的派别,通过特工、暗号和密码等进行工作。他全力以赴力求彻底消灭反对派。2 月 20 日指令即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是放开手脚,以便与自己周围的人和拥护者算账。"机关工作

人员"为自己利益着想应当拒绝听命于斯大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拯救自己。

> 斯大林的力量永远不在他自身,而在机关,……斯大林一旦与机关分开,或与机关对立,他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就什么也不是。……现在该戳穿斯大林神话了。现在你们应当信任工人阶级和真正属于它的党,而不是什么伪党……。你们还想沿着这条(斯大林的)道路往前走吗?!但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斯大林已把你们领进入绝境。……现在应当重新审核苏联的整个体制,并无情地清除它身上积聚起来的垃圾。现在必须完成列宁的执著的遗嘱:罢免斯大林!

托洛茨基的这一席话显然是说给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人物听的,而并非向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呼吁。旨在改革而并非推翻执政党的托洛茨基是应当向他们发出呼吁的,因为只有几乎清一色的斯大林派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本着宪法原则进行改革。实质上,托洛茨基是在促使老斯大林派的领导人开始——而这是在1932年呀!——非斯大林化,而其中某些人在20年以后即斯大林逝世以后才着手进行这一非斯大林化工作。尽管没有什么人跟托洛茨基走,但他所发出的号召无论如何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斯大林与普通拥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后者大多数人死于非命。观察他们之间这场冲突的托洛茨基丝毫也不想缩小它的意义,尽管实际上他只是在更通俗的论战文章中触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苏联史上最危险、最阴暗的一个时期,整个民族都感觉到了农业中一场灾难和饥馑的全部力量,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似乎眼看要把工业的艰难发展拦腰斩断。"失败与挫折接踵而来。斯

大林的声望几乎跌到了零点。他紧张地关注着冲击克林姆林宫宫墙的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怨怼的浪潮。"——我在另一本书中这样描述了这个时期。[1] 应当补充的是,不满不光冲击着克里姆林宫宫墙,而且冲破了这堵墙。

斯大林与其幕僚的分歧早在1930年就已露头。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他刻意拒绝在集体化过程中使用暴力,而且越过中央委员会,以农民唯一的保护人形象出现在全国面前。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抗议。斯大林不得不告诉人民,不仅是他一个人,整个中央都在号召结束专横武断现象。下一个回合的分歧是在同一年中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失宠而引起的。此人曾是斯大林派的台柱子之一,是其正统性的最狂热的捍卫者,也是党史教科书的作者。这部党史乃是一部伪造书的典范之作,曾作为党内斗争的教条迷宫中的指南而受到欢迎,并被灌输进了党员的头脑中。现在也正是这本教科书给雅罗斯拉夫斯基带来了不幸。斯大林突然发现这本教科书充满异端邪说,便下令废止。在20年代中写成此书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无法使其达到能使1931年的斯大林满意的程度。伪造历史的人也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伪造的范围和放肆程度取决于由时间本身的推移、淡漠和此前的歪曲而造成的对人物和事件的遗忘已达到何种程度。在20年代,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得不顾及到一个事实,即许多读者对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还记忆犹新。而在1931年,斯大林所要求的伪造术就更多了。随着他对权力的逐渐强化,他需要按照他的身材来重新剪裁历史这块布。若干年以前,任何一本斯大林派成员的著作只需把托洛茨基说成是"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和把斯大林捧为列宁主义的可靠阐释者就够了。而现在,任何一部教科书的作者都必须说托洛茨基一直就是一个

---

① 本书作者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32页。

狂热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叛徒,甚至在他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时就已是叛徒了。而且,还要迫使人们忘掉这个坏蛋一度曾经担任过如此之高的职务,再把从托洛茨基身上剥下来的所有华美的外衣全都披在斯大林身上,并要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间毋庸置疑的正统传承关系。此类伪造之所以必须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不是出于斯大林派整体利益的需要,而仅仅是出于斯大林个人专制的需要。当时的斯大林派成员是把斯大林当做彼此平等的一批人中的第一人对待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教科书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书中对斯大林主义当然多有赞扬,但却并未刻意突出斯大林本人,并未称他为超人的天才而使他凌驾于自己一派之上。所以得把雅罗斯拉夫斯基打下去。但这在虔诚的斯大林派成员中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恐慌,以致使得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被贬黜很快解除了(作者当时正在莫斯科,听到了许多使最"正统"的党员感到恐慌的令人焦虑不安的故事)。

也在1931年,梁赞诺夫被免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这件事更具有戏剧性。这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很久以前就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尽管他与托洛茨基的友谊深长,但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研究院里丰富的档案和藏书上。研究院只要有梁赞诺夫在,就足以保证保存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但这在斯大林想把研究院变成个人崇拜的圣殿的时代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因此,梁赞诺夫被赶出莫斯科,借口是,他与孟什维克合谋企图隐藏某些未发表的马克思著作。①

① 托洛茨基为梁赞诺夫所作的辩护刊登在《反对派通报》1931年5-6月第21-22期上。身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在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上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他所得到的马克思大量手稿中,有几封马克思致考茨基的信。考茨基在将手稿交给他时提出的条件是,其中几封含有批评考茨基内容的信件不要在考茨基生前发表。作了承诺的梁赞诺夫始终未将它们发表出来。直到斯

与所有这一切相关的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的臭名昭著的攻击，他指责他们"夹带"托洛茨基的"私货"。该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以前对待罗莎·卢森堡的态度的历史论文，对这位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这件事本无任何反常之处，因为自从1919年卢森堡被杀害以来，每年在她的忌日，共产党都隆重地纪念她。从1924年列宁逝世周年纪念起，苏联开始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叫做"三Л"的活动。①而现在斯大林认为，卢森堡的思想与托洛茨基主义相似，骨子里是仇视布尔什维主义的。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相似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此之前，斯大林派成员所反对的都是活着的反对派领袖，而从未反对过鬼魂。现在斯大林开始怀疑，给鬼魂以应有的评价就是变相地为托洛茨基翻案。

> （斯大林写道）我认为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道路是目前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间相当流行的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它固然犯了错误，干了不少蠢事，有时甚至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但总还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由此产生了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看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是反

大林需要找个借口将其逐出研究院并令其名誉扫地之前，谁都没有利用这个事实来整梁赞诺夫。

① 列宁这个姓的第一个字母是"Л"，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被译成俄文时第一个字母也都是"Л"。——译注

> 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因为如此,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①]

斯大林现在与之冲突的不仅是自己周围人们身上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他还必须对付那些直接的挑战。在中央委员会里和在周围产生了一些新的不满者集团。柳亭(Рютин)、斯列普科夫(Слепков)、瑟尔佐夫(Сырцов)、罗明纳兹的案件此时已经拖了两年多。这四个人都先后被免职、判刑、半恢复名誉,然后又再次被打成阴谋家。但在确定这些人罪行的大小以及惩罚他们的措施问题上,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1932年,又揭露了几个新的"阴谋集团":前农业人民委员阿·斯米尔诺夫、供应人民委员艾斯蒙德(Эйсмонт)、交通人民委员托尔马乔夫(Толмочев)领导的集团,由科诺尔(Конор)、科瓦尔斯基(Коварский)和武尔夫(Вульф)组织的集团则在农业人民委员部被揭露。在工会和其他各个人民委员部里,一个"反对派网"也被揭露了出来。[②] 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实际上并未参与任何真正的阴谋。其中那些中央委员只不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试图使同志们相信:斯大林的政策是毁灭性的,斯大林犯了滥用权力的过失,中央委员会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他们就此事散发过有关文件,并试图得到前反对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7-89页。

② H·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册第394、399、418-419、434页。《苏共决议汇编》下册第742页。这些"倾向分子"的案件在莫斯科1937-1938年审判期间曾是许多"招供"都涉及到的问题。参见该审判的速记记录。另见V·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80-281页;《反对派通报》第31期。

派的道义支持。例如，柳亭曾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咨询，而艾斯蒙特和托尔马乔夫则曾向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请教。1931至1932年间，斯大林向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在处置这些批评者的问题上给他以充分自由。但他在中央委员会遭到抵制，甚至就连国家政治保卫局也不热心这一战斗。[1]

只是在拖延了好长时间以后，斯大林才得以在1932年11月和1933年1月将某些不满者清除，并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新革出教门，将他们再次逐出莫斯科，发配到西伯利亚。在第二次流放中，季诺维也夫似乎曾说过，他这一生中所犯的一个比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反对列宁还要严重的错误，就是在1927年抛弃了托洛茨基而向斯大林投降。在此之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姆拉齐科夫斯基、穆拉洛夫、泰尔－瓦加尼扬等许多投诚者很快就被开除出党、投入监狱。对待他们比对从未投降的反对派分子更加残酷。而到了年底，反对派似乎业已夺回了在1927年被从他们脚底下抽掉的基地。当时的一份报告这样描述迫害投降者的效果："一些老革命者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试图寻找与机关的共同语言。尝试持续了大约4年，结果以失败告终。当他们投降时，党的所有支部都被告知'所有老布尔什维克都已与反对派决裂'，这一理由无疑给广大党员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目前，逮捕前左翼反对派分子使人产生了更强烈的印象。但其效果却恰恰相反：'许多人都说，如果说以前抛弃左翼反对派的人现在又回到它的立场上来了，那就说明左翼反对派终究是正确的。'"[2] 实际上，他们的回归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斯大林把他们驱逐出党，因

---

① 尼·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公布了斯大林和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给政治局的电报，电文中谴责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问题上"落后了4年"。尼·赫鲁晓夫：《斯大林的垮台》第12页。

② 参见《莫斯科来信》，载《反对派通报》1932年第33期。

为在他与他本人的拥护者发生冲突而使他周围的人瓦解破裂的开始阶段,他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忧虑。恰巧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二次被流放期间,斯大林的第二位夫人娜佳·阿利卢耶娃自杀了。她丈夫管理党务、国务的方式使她产生自责,她不堪自责的重负而精神崩溃。

托洛茨基鼓动斯大林周围的同志最终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的形势就是这样的。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不只是对那个剥夺他公民权的命令的一种反应而已。他考虑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个人独裁的野心终究会激怒执政派成员,迫使他们为了自卫而起来反抗。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5或6年后,斯大林下令处死了总数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出席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代表),算起来他实际上就消灭了大多数斯大林自己的“干部”,他们几乎占所有精英中的3/4,那就可以承认,托洛茨基对这些干部讲这番话不仅在为自己的、反对派的和党的利益上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斯大林派成员应注意自身安全的考虑。“拯救一下自己吧!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实质上,他的这句话是针对所有那些很快就会成为斯大林恐怖的牺牲品的斯大林派成员而说的。他鼓动如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类的人“清除苏维埃国家身上的污垢”,而在他们准备着手做这件事以前,污垢又滋生了24年之久,要知道,在当初必须清除的污垢远不如后来累积得那么多。他当然也知道,即使他们真的决定反斯大林,行动起来也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仍然预见到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向他们提供自己坚决的支持,他确信只要反斯大林的运动一旦开始,他和他的拥护者们就会立即被推上前台。[①]

---

① 参见《反对派通报》第27期。1932年托洛茨基在和廖瓦的通信中常常谈起这个话题。

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来鼓舞不满于斯大林的人们的士气。在柏林的廖瓦由于距恐慌不安的莫斯科较近，就更希望托洛茨基能这么做。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证实，在斯大林派当中不满正在增长，人们已在谈论必须“清除斯大林”。但在这同一些消息里也透露出，那些不满于斯大林的人只要一想到托洛茨基会回来就害怕了。“如果托洛茨基回来，”他们说，“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再就是说：“他会为了我们对他和他的信徒们所做的一切而复仇，他会把我们的人成百上千地枪毙掉。”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并竭力把它夸大。“这就指明了我们应当遵循的路线，”托洛茨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一些有可能被解释为带有……任何报复意图的口号或是说法把人们都吓跑。距一场厮杀越近，我们的说法便越应该温和宽容，尽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应当而且不会作出任何让步。”[1] 在《反对派通报》和专拟在俄国国内散发的传单中，托洛茨基这样安抚那些害怕他报复的人：

> 毋庸置疑，只有一个领袖并强迫人民崇拜这一领袖的波拿巴式的政权必须休矣。因为它是对革命政党的思想的最可耻的歪曲。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放逐什么人，而在于改变整个体制。此时斯大林的党羽们不知疲倦地散布谣言，说什么左派反对派回到党内来必将手执利剑，说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情地镇压其他派别的对手。必须否定这一歹毒的谎言。……报复不是一种政治情感。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过去从未听任它的摆布，今后就更不可能让它来支配自己。对于那些将数万党员逼入死胡同去的历史原因，我们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① 托洛茨基致廖瓦，1932年10月17、24、30日。

……我们愿意与每个想要通过使党的复兴来制止灾难的人携手一起工作。

然而,这毕竟是1932年,而不是1953年或1956年。尽管某些征兆似乎表明将会有一个反斯大林运动,可这个运动却远未具体化。"机关工作人员"是不可能起而反抗他们的领袖的。对托洛茨基的回归和报复的恐惧还不是阻止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由于斯大林派的解体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斯大林以下述方式统治他们、分化他们:在他们内部创立各个小组以互相牵制和建立自己的御林军,其成员已然不懂得应当忠于过去的同志,而只知道应当时刻准备支持斯大林个人的统治。这是一个"秘密的参谋部",它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借助于"暗号和密码"进行工作,对此,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了。这是一些"五人帮"、"六人帮"和"七人帮",按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它们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组建的,他就是通过它们而使党的这些机构失去作用的。把他夺取权力的手段用到掌权上来也同样有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善于在任何一种敌对活动尚未来得及扩散之前及时发现它。无论哪一个不满者集团,就连那些由最富于影响力的斯大林派成员组成的集团也不能进行任何批评或试图对等级制度中的其他人施加影响,因为只要他们刚一走上这条道路,就会立刻被"揭露",并被扣上叛徒的罪名。

然而,如果不满者集团不是慑于束缚住此前所有反对派手脚的那种恐惧而无所作为的话,那么斯大林所有那些秘密小组、"五人帮"、"六人帮"及其他阴险狡诈的手段就都不会起多大作用。不满者害怕,任何反斯大林的行动都会成为人民不满得以爆发的一个信号,从而为会把斯大林连同他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们一起吞没的反革命奠定基础。这一恐惧也折磨着托洛茨基。他看不

到这一早在20年代中即已折磨着他的两难选择的出路何在。在他发表他那极富于戏剧性的、以“罢免斯大林!”一语结束的号召以后不久,很快就改变了主意。1932年10月,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 “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只在某一特定的具体意义上(即在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选举另外一个人做总书记时所说的这句话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大,……提出这一口号便绝不会有任何危险。然而目前,米留可夫、孟什维克及形形色色的热月政变的狂热分子们……时刻准备应声虫似的响应“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也许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斯大林不得不实施自卫,以抵制热月政变狂热分子的压力,而我们也不得不暂时支持他。我们还没有度过这一阶段。……情况既然是这样的,那么,“罢免斯大林!”这一口号有两重含义,因此,我们当前还不宜将它作为战斗口号提出。[①]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声明说,如果苏联官僚集团的平衡(即指斯大林的统治)在当前被打破,那么,这几乎可以肯定只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②]

对于在莫斯科的心怀不满的斯大林派成员来说,且不说对于投降者了,这一婉转的话也就意味着不要斗争的建议了。如果说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反对派通报》第33期。有趣的是,部分是出廖瓦的敦促,托洛茨基才放弃“罢免斯大林”的口号。

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认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太冒险和轻率的话,那么,它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于心怀不满的斯大林派成员来说,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想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吗?但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托洛茨基在3月份对他们说,"斯大林把你们领进了死胡同。"他们直到现在才看清,连退路也没有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努力在困境中活下来,指望时间和国家的发展会引导他们走出困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还必须屈服,于是他们屈服了20多年,直到斯大林逝世。

※ ※ ※ ※ ※

不知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曾对托洛茨基说过,斯大林要报复他、他的孩子和孙子,直到他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现在,这一圣经式的报复之剑果然向托洛茨基一家刺来。剥夺了托洛茨基苏联国籍的那一指令同时也剥夺了和他一起被流放的那几个亲人的国籍,禁止他们返回到苏联。这一点立刻就波及到了季娜。她与丈夫和小女儿隔绝,永远也别指望能够再次见到他们了。

季娜在德国首都过了将近4个多月。陌生的柏林以及那里正在上演的政治戏剧最初竟使得她如此入迷,以至医生满意地以为她已经恢复了精神平衡。但精神状态的好转仅仅是表面的,当着医生的面,这位骄傲的女病人未曾表露其真正的精神状态,也许就是这一点迷惑了医生。她固执地拒绝进行心理分析治疗。她后来承认说:"医生只会把我搞得糊里糊涂,而我把这些可怜的医生搞得更糊涂。"季娜紧张的神经并未稍稍松弛下来。她对父亲的赞美和她所受到的委屈依旧无论如何也无法调和。在心里和书信中,她总是一再回想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分手,并为父亲不同寻常的冷淡、疏远和奥林匹亚神式的优越感而生气。她总是在沉思父亲的

那句话:“你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人。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令她费解的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她。她渴望与父亲更多地通信,而父亲却很少给她回信,至少是比她所期望的要少。尽管信中充满对她的关心,她仍能感觉得出父亲的冷淡和疏远。

此外还要加上与廖瓦的不和睦。她无法搞好与廖瓦的关系,尽管在柏林除弟弟外她连一个亲近的人也没有,而且父亲也要他们遇到难处要相互支持。季娜嫌廖瓦缺乏同情心,而且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使她感到揪心的忌妒。她刚到柏林不久就写道:“每次一见他,我就感到神经紧张。”[1] 季娜总是避免与弟弟见面,而他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政治工作和学业忙得焦头烂额,但这却使季娜嫉妒:她将他的忙碌与自己的“消极无为”作对比,并自嘲地称自己是“寄生虫季娜”。

剥夺她回俄国的可能性的那一指令加重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父亲建议要她平静温和地向苏联使馆提出抗议。一旦莫斯科明白季娜并未从事政治活动而不过是在治病,也许他们会将她排除在法令效力范围之外。[2] 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听从了父亲的这个建议,而只是知道人家并没有恢复她的苏联国籍。与此同时,医生的诊断结论是,为了使她康复,她必须回到俄国的家,并尽快地在熟悉的环境恢复其正常生活。而这恰恰是她做不到的。作为流亡者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庞大而又陌生的城市,与家庭的一半疏远,同时又不断责备自己抛弃了家庭的另一半,这使得季娜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坏。精神病的发作和心神恍惚状态越来越频繁。她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回到心理分析医师的沙发床上去。命运将她抛弃到这里,而躺在这里的季娜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充当这场席卷

---

① 例如可参见季娜 1932 年 2 月 26 日、5 月 30 日和 6 月 7 日给父亲的信和明信片。

② 参见托洛茨基 1932 年 3 月与孩子们的通信。

这个民族的政治狂热的见证人。

季娜在书信中描述了德国的不幸和苦难,她的观察中常常夹杂着一些尖锐的评语和辛辣的幽默。在她第一次给父亲的信中,除了说她由于远离俄国和在那里的亲人而痛苦之外,她还写道"红色全民公决"以及德国工人阶级的慌恐不安和士气低落同样也给她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印象。[①] 她贪婪地关注着托洛茨基"德国战役"的进展情况,但她对此事的满意程度却由于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他的工作和政治利益之外而有所下降。"跟爸爸这个不信神的使徒多玛通信真没意思……,"她在信中写道,"他在耸人云霄的政治最高峰上越登越高……而我却差不多陷足于心理分析的泥淖之中。"[②]她所看到的政治风云景象由于她精神失常而特有的惊人的洞察力而得到强化。在她的书信中的内容极丰富的、富于讽刺意味的句子就像是出自父亲的笔端。柏林醉醺醺,饥肠辘辘,充满橐橐的沉重马靴声,而且已然落入绝望和嗜血之中,这一形象如叠句一般不断在她的书信中出现。"柏林总是在歌唱……它的嗓音常常是嘶哑的,或是由于酒醉,或是由于饥饿。……这是一座欢乐的城市,的确非常之欢乐。……真不可思议,克雷洛夫老爷爷居然会轻率地说什么任何人都不会饿着肚子唱歌。"[③]

这座难逃厄运的都市把她迷住了。她深深依恋着柏林,仿佛自己就属于这座城市。她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所有的骚动。1932 年 6 月初,当希特勒的冲锋队员无视勃鲁宁的禁令而再次得意洋洋地走上舞台时,廖瓦劝她离开柏林到维也纳去,说在那里比较安谧的氛围里可继续她的心理分析治疗。由于警察局已经在找

① 参见季娜 1932 年 2 月 26 日的信。

② 5 月 30 日的信

③ 1932 年 6 月 7 日和 8 月 17 日的信

廖瓦本人的麻烦，所以廖瓦担心他们也会对季娜动手。她不但不理睬廖瓦的劝告，反而嘲笑他胆小，并写信到王子群岛诉苦说廖瓦的庇护已使她厌烦。而父亲却重申了廖瓦的建议，季娜的回信恭敬得令人吃惊，说她甚至都不敢反对，可随后却又说她热爱柏林，拒绝出走。父亲和弟弟的关心甚至使她感到屈辱。难道不是父亲曾多次对她说，欧洲的命运，不，而是全人类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将在柏林决定吗？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让廖瓦呆在那儿的吗？难道不是他拒绝一位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他身边做秘书，说什么在这种时候哪怕只有一个他的信徒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都会是一种耻辱的吗？她感到自己已被抛弃了、受到了侮辱。[1]

孤独损害着她的健康。医生建议：至少得把留在王子群岛她的小儿子带到她身边来，也好让她有点儿事做。然而，那项指令连小孩子也没放过。年仅6岁的谢瓦成了"没有国籍的政治侨民"，官方登记就是这么写的。这给发放出入境许可签证的领事出了个难题。要求给谢瓦办理入境签证的申请遭到了否决。理由是他只能跟父母或是姥爷、姥姥之一一起成行。母亲不在身边和母亲的来信都使小男孩很伤心，季娜在信中央求孩子不要忘记妈妈，并答应很快就回来。大家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不再写这样的信。现在期待与她团圆已经牵动着小男孩和全家的神经。

处境不幸的季娜自理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差，甚至连合理支配每月寄来的钱都不会。[2] 她埋怨自己成了父亲的累赘，便换了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馆，在那儿她生活在一群流浪汉和小偷中间，经常给他们劝架。弟弟或是父亲只要一提起要她搬出那家旅馆和替她管钱，就会引起她的愤懑，使她精神病发作。在一次这样的发作

① 1932年6月7日和8月17日的信

② 廖瓦在1932年11月26日致父亲的信中就是这样描写了她的情况。

之后,她怒气冲冲地给父亲写了封信,为她的发病而责备父亲,请父亲不要再管她的事。[1]

季娜的痛苦及其给托洛茨基所造成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他与廖瓦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托洛茨基本指望廖瓦能对季娜表现出更多的耐心和爱。然而,他对廖瓦的信赖和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且也越来越脆弱。托洛茨基大力夸奖廖瓦在领导《反对派通报》出版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上的成绩,依然向廖瓦倾诉最隐秘的思想,和他商量,并征求他的批评。廖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使托洛茨基十分感动,他拥有成百上千个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责备廖瓦在花钱上过于节约并把给他的生活费用在《反对派通报》的出版上。)[2] 然而他也一次又一次怀疑,儿子对其观点和思想的赞同只不过是出于做儿子的尊敬之情。这一点即使他欣慰也使他恼火。托洛茨基越紧张、疲劳,他对儿子的要求也就越严格,甚至严格得出奇。娜塔利娅证实,托洛茨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在他等待廖瓦来信时急不可耐的心情中流露出来。如果一连几天时间柏林没有信来,托洛茨基就要发火,指责廖瓦对工作不负责任,甚至会辱骂他。过后又会生自己的气,可怜儿子,但接着又会变得更加易于动怒。[3]

廖瓦私生活中的困难也相当多。妻子从莫斯科寄来的信都是在诉苦,讲述被摧残的生活和孩子的不幸。她提醒廖瓦说,他是不顾她的反对和孩子的眼泪而出国的,而且当初为的是呆在父母身边和保护父亲。而现在他既没和父母在一起,也没在妻儿身边。

---

① 季娜致托洛茨基,1932年10月5日和24日。

② 参见1932年5月11日托洛茨基的信。

③ 这段描写根据娜塔利娅的信,特别是1932年7月27日她给廖瓦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对她解释在俄国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是毫无用处的——她是个普通女工，贫病交加而又绝望，老是威胁说要自杀。[1] 廖瓦除了寄钱以外，无法给她以任何帮助。他与让娜·莫利尼耶的结合也比这幸福不了多少。能够帮助他摆脱个人生活中种种难题的就只有对父亲事业的忠诚了。廖瓦无条件地执行着来自王子群岛的无数指令，同所有零散的托派政治团体保持联系，催促俄国出版商按时出版《反对派通报》，关注父亲有关时局问题的小册子能否尽快译为德文出版，与出版代理人讨价还价；他常常一连数小时饿着肚子徘徊在柏林街头，希望能碰上一个因公出国的本国人或准备前往俄国的西方旅游者，以便获取信息或是托转邮件。此外，他还正规地继续学习数学和物理，而每天夜里还要给父母写信。没有什么比父亲情绪不好、或对儿子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的任何暗示更使廖瓦伤心了。他很难冲淡父亲的不满、向他解释发生的事，请求解释或是请求原谅。他只能向母亲诉苦，倾吐他的悲伤。

身体羸弱、处于痛苦中的女人娜塔利娅落入了季娜感情这一危险的纠纷中，又置身于父子之间而左右为难，她只能尽其所能。她很聪明，能清晰地想到家中每个成员的难处。她有足够的爱去爱每个人，有足够的坚强去支撑全家人。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解释了季娜所遇到的难处，她一再向廖瓦和季娜讲述他们的父亲，一个与敌对世界斗争的真正的英雄内心那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么，在家庭范围内他常常会克制不住自己，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你父亲的难处你们也知道，不在重大问题，而在生活小事”。他对大事有无穷的耐心，而对细枝末节却极易发火甚至动怒。她恳求孩子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要怀疑父母对他们深厚而又热烈的爱。“你的痛苦也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痛苦，”——

[1] 她谈及这点的那封信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的家人通信中。

在给廖瓦的信中她请求他常给父亲来信,而且要他写那些"鼓舞人心"的信,让他对季娜也要更温和更关心一点儿。然而,尽管娜塔利娅的意志足够坚强,有时候也感到所承受的压力过于沉重。"怎么办——毫无办法,"在她写给廖瓦的信中常常可以读到这样一句悲伤的话。有一次,她对廖瓦承认说:"我给你写信,一如你给我写时一样,都是闭着眼睛、隐匿着情感写的呀。"[1]

※　※　※　※　※

这是1932年夏末。从托洛茨基来到王子群岛以来已经过了三年半了。在此期间,他在最不相关的多个领域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没有忽略过任何一个通信者,为每期《反对派通报》撰稿,除了几打篇幅不大的小书和小册子以外,他还写了回忆录《我的生平》、三大卷《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于6月29日将《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卷末所附的最后一份附录寄给了亚历山德拉·拉姆)。这是规模空前浩大的工作的岁月,由于托洛茨基鄙薄那些轻率的文字作品,所以,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每一本书中的每一章,对每一页,甚至几乎是每一个句子都耐心推敲。

他被高度紧张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他的大脑里总是装满了新的写作计划,曾想撰写一部国内战争史、列宁生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等好多好多著作。但局势对于开始着手一项巨大工程来说并非十分有利;他需要休息。为在王子群岛上的囚居生活而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2] 政治事件使他无法安宁。来自俄国的消息

---

[1] 娜塔利娅的许多信都没有标明日期。

[2] 在侨居王子群岛期间,托洛茨基只到过伊斯坦布尔一两次,去参观索菲亚大教堂和看牙医。

常常使他失去自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沿着老路走到了深渊的边缘。托洛茨基的斗争毫无结果。托洛茨基派的力量本来就弱小之极。而在反对派的国际组织中困难也在增加：柏林书记处的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不久前在反对极左的"列宁主义者同盟"的论战中还支持过托洛茨基，现在却对斯大林主义采取了令人担忧的妥协立场。如果他能摆脱这座美丽而又可恶的小岛，到离政治生活和文明主流更近一点儿的地方去，那该有多好啊！

初秋时节，一些丹麦社会民主党员大学生邀请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15周年之际到哥本哈根演讲。以前托洛茨基也曾接到过许多这类邀请，但却从不曾有过任何出访欧洲的机会。[①] 尽管托洛茨基怀疑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未必会发给他签证，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他刚一接到邀请函便立即着手动身前的准备。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希望一去就不必回来了，尽管他极为审慎地预先搞到了土耳其当局在他回程时的入境许可证。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还想把谢瓦也带到哥本哈根，然后再从那里把他送到季娜身边。然而他们却无法搞到允许小孩通行的许可证，于是只得把他留在王子群岛，交给一个秘书看管。

11月14日，在娜塔利娅和3个秘书的陪同下，托洛茨基乘船驶离君士坦丁堡港。他是以无国籍的旅客的身份，用谢多夫先生这一化名登记的，但匿名也无法使他摆脱公众的好奇心。这只能加重环绕着他的那层神秘的光环。《真理报》套用萧伯纳的话，对"逃跑的狮子"大加嘲弄，这一嘲弄有意无意间透露出许多国家的政府、警察局和报纸都在有些神经过敏地关注着托洛茨基的出行。即使他真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阴谋集团的首领，而且到处都有许

① 当时，曾有一些爱丁堡大学的学生请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推举他作为该大学校长候选人。托洛茨基委婉地谢绝了这一荣誉，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多欢迎他的拥护者的话,他横穿欧洲的旅行恐怕也不会引起如此之多的恐慌。而他这次哥本哈根之行完全是在撞大运,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保护,陪伴他的只有他那位上了年纪且患病的妻子和几个年轻信徒,何况他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作一次演讲。离奇古怪的谣言先他而行。报纸围绕着此次出行的真实目的问题而大炒特炒。它们毫不怀疑,演讲纯属借口。有些报纸指出,托洛茨基是要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同斯大林的特使秘密会晤,而另一些则说托洛茨基是要为反斯大林的阴谋作最后准备。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一些港口,当地记者围住了托洛茨基,但他拒绝跟他们谈话。当地政府不让他游览雅典。他在那不勒斯下了船,在警察的监视下游览了庞贝城遗址。法国人不许他在马赛下船。警察局命令他在公海上换乘一艘小汽艇,由它把他送到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让他在那儿上岸。他坐汽车和火车急速穿越了法国全境,而且只允许他在巴黎停留一小时。结果,从马赛一直跟踪他的记者直到敦刻尔克才找到他。在敦刻尔克,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丹麦的轮船。在经过法国时,他成了右派报纸诅咒的对象,这些报纸的社论作者们只要想到这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叛徒"、这个将法国食利者中的"孤儿寡妇掠夺一空"的元凶居然也能获准登上法国领土时,便怒不可遏。托洛茨基力图平息人们的激动,并要那些记者相信,他这次旅行"纯粹是一次私人旅行,没有任何政治意图"。[1]

11月23日,托洛茨基抵达丹麦,他得到命令在埃斯堡上岸,诚如《政治报》所写那样,托洛茨基"是通过后门进入哥本哈根的"。一群共产党员来到这里,准备给他喝倒彩。然而,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当托洛茨基出现时,周围立刻鸦雀无声——人们意识到这

[1] 托洛茨基1932年11月21日和22日对法国报界的声明。

是一个历史性人物，意识到这也许还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 记者们发现托洛茨基“绝对平静”，而“他的那几个秘书和此行的组织者们却神经过敏。托洛茨基刚一出现在哥本哈根，王室成员阿伽王子便重复某些报纸的言论，指责托洛茨基是“杀害沙皇母亲的凶手”；丹麦宫廷没有忘记末代沙皇的母亲是丹麦公主。与此同时，苏联大使就托洛茨基抵达一事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担心。社会民主党热烈欢迎托洛茨基的到来，但这热度也并未持续多久。由于王室和苏联大使馆仍表示不满，陷入困境的社会民主党大臣们开始催促托洛茨基离境。

托洛茨基尽一切努力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住的地方相当奇特——一幢乡间别墅，是雷蒙·莫利尼耶从一个外出旅行的著名女舞蹈家手中租来的，屋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墙上挂着不在场的女主人颇有魅力的照片。其后，一家报纸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住处，便在报端刊登出这幢别墅的照片。托洛茨基和他的旅伴们便不得不匆匆忙忙搬到郊区的一家旅馆。在此期间有过数不清的故事。莫利尼耶提供给托洛茨基使用的那辆车一度神秘地失踪了。几个小时以后，警察局把车还给了他们，未作任何解释，只是取走了车主的指纹。谣言风传，说托洛茨基的敌人打算破坏托洛茨基拟作演讲的那次集会。他一直处于警察局及他自己信徒的保护之下，只在城里短暂地兜了一两次风。

托洛茨基的演讲进行过程中没有发生起哄或是捣乱。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德语对大约两千名听众讲话。托洛茨基演讲的题目是俄国革命。由于当局允许演讲的条件是演讲者要避免争论，所以，托洛茨基便以教授的风度向听众传达了他刚刚竣稿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的精华。演讲人的冷静无法掩盖其信念的深度

---

[1] 《政治报》1932年11月24日。

和力量。这次演讲是对十月革命的辩护,而且是一次成功的辩护。因为演讲摆脱了带有成见的赞扬,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也有过局部性过失和错误。过了差不多25年以后,当年听过那次演讲的人仍能记得这次演讲,并说它是演说艺术的一部杰作。[①] 然而,这却是托洛茨基本人最后一次在大型集会上露面。

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别的事情,这里不妨说一说他用英语通过广播对美国发表的答记者问和讲话。他在这次广播讲话中说:"我的英语,我的可怜的英语,无论如何与我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赞美极不相称。"对那些以苏联的倒退和托洛茨基自身的命运为由而否定十月革命的必要性的人,托洛茨基反驳说:"在批评中也和在创作中一样,需要高瞻远瞩。"十月革命才过了15年,这"在历史的时钟上只不过是一分钟而已"。美国国内战争同样也引起那时人们的激愤。然而,"今天的合众国那无拘无束的务实的首创精神与它那合理化的技术和经济的高涨就脱胎于那次内战。这些成就……构成了未来社会基础的一部分。"[②] 他对美国采访记者说,尽管1929年经济危机极其严重地震撼了他们的国家,但合众国国内的形势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更为稳定。他对法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出于保卫苏联的需要的话,那么,他永远不会拒绝与斯大林合作:"在政治中没有个人好恶,也没有个人报复精神。政治只承认有效性。"[③]

4年以后,在大清洗时期,在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公审中对托洛茨基和其他被告指控的主要事实是建立在下述断言

① 1956年我在哥本哈根讲学期间,有几个听过那次演讲的人对我讲述了1932年那场永志难忘的集会。

② 托洛茨基的谈话是对"哥伦比亚广播网"发表的。丹麦广播台拒绝转播他的讲话,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同上。

上的：托洛茨基在1932年11月的最后一周中在哥本哈根推出了一个大阴谋，命令其拥护者们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工业上搞怠工，毒害俄国工人群众，破坏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总检察官维辛斯基（Выщинский）的声明，在哥本哈根，托洛茨基在儿子也在场的情况下接见了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Фриц Давид）和贝尔曼·尤林（Беман Юрин）——这3人坐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面的被告席上——并且通过他们传达了他的指令。在此，没有必要详细反驳这些指控和用以证实这些指控的所谓被告的“招供”。在此后20年当中始终支持这一指控的斯大林后继者们已改弦易辙。在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深受托洛茨基阴影折磨的赫鲁晓夫讲述了此类指控是如何炮制出来的以及“招供”是如何逼出来的。然而，早在很久以前，即在这一审判过程尚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将检察官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揭示出它的荒谬绝伦和自相矛盾。例如，维辛斯基一时疏忽，说“布里斯托尔饭店”是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总参谋部。可在1932年这家饭店已经没有了，好几年前它就被拆除了。维辛斯基指控廖瓦作为恐怖分子的头子在哥本哈根活动，可廖瓦当时根本就没有跟父亲一起到丹麦首都去。托洛茨基完全可以根据以学究方式系统地整理过的档案材料再现丹麦之行的每个细节。还可以举出为数众多、能够提供有利于他的证词的证人来。[①]

在哥本哈根，托洛茨基的随从比平常多。不算和他同来的3位秘书，还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25名托派成员也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莫利尼耶、纳维尔、斯内夫利特（Sneevliet）、托洛茨基的法国律师杰拉德·罗森塔尔（Gerard Rosenthal）。有一

---

① 《列夫·托洛茨基案》第137－173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伙大学生专程从汉堡赶来，一是为了和他见面，二是给他担任警卫。另外一个拜访者是德国著名律师奥斯卡尔·科恩（Oscar Cohn），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战友，也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的法律代表。如此众多的拥护者的在场，使得托洛茨基有可能举行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讨论会”，以研讨德国的局势及各个托派集团的情况。这个小宗派的信徒虽然热情洋溢，但却软弱无力，他们这个小型会议更像是地下工作者的会议。唯一一位来自英国的参加者这样回忆道：“托洛茨基几乎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不是写就是口述什么东西，除他之外，每个人都说个不停。”[1] 5年以后，当年的参加者中，除了那些在法西斯监狱里或集中营里的人之外，每人都提供了证词，证实维辛斯基所说的那些在哥本哈根时曾从托洛茨基那儿得到过指令的人当时或是根本就不在那儿，或是即使在也不可能在众多警卫面前接受指令而不被察觉。托洛茨基接待过的唯一一位与俄国有联系的人就是谢宁-索博列维丘斯。他到那儿去是为了洗掉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务这一嫌疑。他总共与托洛茨基呆了一个或两个小时，托洛茨基对他不像对待一个奸细，而像对待一位政治上的对手：在两人之间的通信中，索博列维丘斯公开地而且不无正确地批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在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集体化的长期效益估计不足。据两人嗣后的来往信件可以推断，哥本哈根会面结束时，双方的分歧已经得到了弥合。在任何情况下，索博列维丘斯都未曾以证人身份出现在任何一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同样，他对这些审判案大概也未作出任何其他形式的贡献，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肯定

[1] 为我提供这一印象的是不列颠的参加者哈利·维克斯先生。他曾想通过在不列颠港口停留的俄国海员将托洛茨基的某些文本传入苏联。托洛茨基给了他一封授权他做此事的信。

会使指控中对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的生活情形远比维辛斯基的描述更加真实得多。

因此，托洛茨基在丹麦逗留期间总的说来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在当众演讲之后，他只对一小伙邀请他来的丹麦大学生又讲过一次话。住宅的主人记述了下面这件有趣的事情：

> 托洛茨基与五六个人呆在我家里，突然有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刚出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来自莫斯科的电讯，说季诺维也夫逝世了。受到强烈震撼的托洛茨基站了起来，……说："我一直与季诺维也夫斗争，……在某些问题上我跟他是一致的。我知道他的错误何在，但此时此刻我想的不是这些。我想的只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终生都在努力为工人阶级运动而奋斗……。"托洛茨基继续以雄辩有力的语言赞扬和纪念这位刚刚去世的对手和战友。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合，听到这样庄严的悼词，使人非常感动。[1]

任何一个外人，甚至就连托洛茨基的朋友和秘书都无从得知他在哥本哈根所经历的失望和痛苦。对他来说，一个人不得不以一种应有的戒备心态在敌对的喧嚣声中横穿整个欧洲，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到丹麦作一次演讲，然后再回到王子群岛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他感到悲哀了。既然不能下脆不回去，托洛茨基就为延缓归期作了几次可怜的尝试，他曾对美国记者说，他多么渴望哪怕只有一段时间"从纽约观察国际局势的全景"，那会使他分外高兴，就好像一个人从摩天大楼的顶端瞭望地平线一样。"请

① 《列夫·托洛茨基案》第147页。有关季诺维也夫去世的传闻第二天就被否定了。

间,我在美国某家最大的图书馆工作2到3个月的幻想难道是乌托邦吗?我希望,丹麦政府做出的良好表率会对其他各国产生影响。"[①] "表率"根本就不具有表率的意义:丹麦政府拒绝为他提供避难所,甚至短期也不行。奥斯卡尔·科恩曾徒劳地向他的私交和朋友、社会民主党首相斯汤宁(Stauning)请求过,托洛茨基本人请求斯汤宁将其签证期延长两个星期,以使他和他的妻子能够在哥本哈根看病,但也是徒劳。他还曾想要获得瑞典签证,然而也落空了。他之所以遭到瑞典政府的拒绝,可能是由于苏联大使的反对,当时的大使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前工人反对派领袖)。

与新近体验的重重敌意相比,对托洛茨基来说,更加沉重的是对季娜的担忧,她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大约就是在逗留丹麦期间,托洛茨基收到了一封可怕的信,信中的话听起来像是临别时的最后一次指责。季娜给父亲写道:"你总是在行动,过于急躁,所以,有时考虑不周。你是否理解那被称之为本能的东西的意义?它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绝不能拿它开玩笑。……谁说本能是盲目的……?根本不是。本能有一双令人惊奇的、洞悉一切的眼睛,它在黑暗中也能看见东西……它能征服时空。本能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代人的记忆,而且始于生活本身所开始的地方,这绝非偶然。本能可以奔向任何目标。但最可怕的是——本能能准确无误地、无情地鞭挞那敢于阻挡它的道路的人。"她详细地讲述"预感"、"可疑的想象"和构成本能的"极其敏锐的感性",她写到:"假如我说,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我感到一种与此相似的东西触动了我的话,你别害怕。但我却以一种令人害怕的狂怒之情投入了斗争。没人支持我。医生只会吓唬我……你知道是什么支撑了我吗?是对你的信仰,明知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而这,难道不

① 摘自对美国记者的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就是本能吗?"[1]

廖瓦本来也该到哥本哈根来,除所有别的原因外,还要和父母商量季娜的事。然而,办护照和签证的困难无法克服,这使他滞留在柏林。但他在信中忧心忡忡地汇报了季娜的表现:她的精神状态坏到了极点。即使把谢瓦送到她那里去,她也不可能照顾他了。她自理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差。而使廖瓦担心的是她那奇特的政治生活:想必她与德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廖瓦担心她会因此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巴本辞职后的那些日子里,季娜反复对廖瓦说:"难道你没看见德国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革命吗?"[2] 他劝父母尽一切可能把她送到奥地利。托洛茨基或者娜塔利娅每天都忧心如焚地和廖瓦通电话,有时甚至一天两次,了解季娜的情况,打听医生是否认为将她的小儿子交给她抚养不妥当,并让廖瓦到哥本哈根来。

8天就这样过去了。这8天中,全世界都得知托洛茨基正在筹划一个骇人听闻的反苏联政府的阴谋。这些天中他"密谋"筹划反对暴政,对一个既无国籍也无家宅的人来说,暴政就是普通护照和发放签证的规则。托洛茨基利用一切影响、偶然机遇、无恶意的巧妙手段甚至自己的知名度,以便取得允许他在丹麦或欧洲某个地方再多呆数周甚至只多呆数天的许可。与此同时,娜塔利娅向法国总理爱德华·埃里奥(Edouard Herriot)请求,在她和托洛茨基经过法国返回土耳其时允许她与廖瓦在法国会面。当托洛茨基签证规定的8天时间到期后,托洛茨基声明他误了船期,而且还没作好动身的准备。也许托洛茨基是这样想的,在他等待下一趟轮船时,廖瓦就该到了吧。也许他和廖瓦终会决定能否或如何把小男

① 这信未署日期。但据间接特征判断,当写于1932年11月。

② 摘自1932年11月26日廖瓦致父亲的信。

孩交给季娜？也许，某国政府冰冷的心会融化，他们终将得到一张前往这块不好客的大陆上某个地方的签证。然而，丹麦政府却坚持说托洛茨基的居留期已过，要求他离开。丹麦人用汽车把他送出境，以便在签证期限到期以前仍能让他赶上某艘别的轮船。于是，12月2日，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秘书们离开了丹麦。这一次，没有人到码头上来朝他吹口哨，然而同样也没有人来与他告别。

※　※　※　※　※

轮船驶入安特卫普时，港口已被封锁。整个港口黑压压的，到处都是穿制服的警察。边防军人上船审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绝回答问题。他声明说，自己不打算在比利时上岸，而且审讯是非法的。接着便是一场争吵，其间夹杂着要逮捕的威胁；而且不允许托洛茨基的任何一个旅伴上岸。

此时此刻，托洛茨基想起了1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1922年，当多拉·卡普兰因刺杀列宁而在莫斯科受审时，著名的比利时工人党人，第二国际主席艾米利·王德威尔得请求允许他作为辩护人出庭。得到允许后，王德威尔得利用这次机会在苏维埃法庭上猛烈抨击了苏维埃政体。在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他也是如此。1922年，托洛茨基没有答复此信，现在，他决定趁轮船停留在比利时水域的时候答复此信。王德威尔得过去曾数次出任王国首相，甚至在身为反对派一员时，他在比利时政治生活中仍举足轻重。

(托洛茨基在致王德威尔得的信中写道)我曾是其成员的那个政府不仅允许您到苏维埃俄国，而且还允许您作为那些企图杀害第一个工人国家领袖的人的律师在法

庭上发言。在您那篇发表于我国出版物上的辩护词中，您总是呼吁民主原则。这是您的权利。1932年12月4日，我和我的旅伴们路过这里，停在安特卫普港。我既不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想作为被比利时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罢工者的辩护人去发言，而他们，据我所知，绝对未曾刺杀比利时政府成员……我们的轮船停泊的那部分港口已经被严密封锁。轮船的两侧——从左到右——停泊着待命出动的警察局的船。站在我们这艘轮船的甲板上，我们便有幸检阅民主制下的警察局暗探、军人和文职人员。真是一个威严的场面！狗子和雷子——请允许我为简洁起见而使用这样两个低俗的词——的数目大大超过了海员和搬运工人的人数。这艘轮船多么像一座临时监狱，而它所停靠的港口就是监狱的院子。[①]

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这种方法和所有这些不快"比起现在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所遭受的迫害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他之所以提及这件事，仅仅是为了给王德威尔得在1922年反布尔什维主义、鼓吹民主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以一个迟到的回答：

如果我把比利时归入民主政体，我希望这没有错。须知你们进行的那场战争（1914—1918年间）是为了保卫民主制而进行的。战后，您作为大臣甚至首相而成为比利时的领袖，为使民主制繁荣昌盛还需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民主政体依旧散发着旧普鲁士警察制的臭气呢？人们怎能相信，由于一位布尔什维克偶然靠近

① 《反对派通报》1932年第32期。

> 了其边界而体验到神经性的震颤的这个民主政府竟然能使阶级斗争中性化并保证能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哦,是的,托洛茨基,他当然对格别乌和苏联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了如指掌。但苏联政府至少并未炫耀它有何民主伟绩。它公开宣布自己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它的唯一考验就是看它是否能保障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 专政有其自身严格的方法和相当严格的逻辑。往往……有些亲手建立专政的革命者却沦为专政逻辑的牺牲品。……然而,当着阶级敌人的面,我还是不仅要为十月革命……甚至还要为今天的那个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将我放逐、剥夺我苏联国籍的那个政府负起全部责任。而你们呢,你们却打着保卫民主的旗号捍卫资本主义。民主在哪儿?至少在安特卫普港是找不到的。

尽管如此,他在离开安特卫普港水域时没有丝毫悲观。他的眼睛看着"身上落满厚厚一层煤灰、身体健壮、表情冷峻的佛莱米码头工人",他们与轮船之间隔着一条警察的警戒线,他们"默默地观看着这个场面,评价着每个人",辨认着哪些是"自己人",嘲弄地朝着暗探们站的方向挤着眼睛,与站在甲板上船舷旁的这位危险的旅客交换着友好的笑容,"用自己那粗糙的大手一触帽沿",表示对他的欢迎。"当轮船在大雾中沿着斯海尔德河,从由于经济危机而停靠在岸边不动的大吊车旁边向下游驶去时,从海滨街上传来一些不知名的忠实的朋友告别的呼声。在结束从安特卫普到符利辛根之间的这一节文字时,我要向比利时工人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　※　※　※　※

12月6日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在巴黎北站下了火车。在站台上，一条稠密的警戒线再次将他们包围起来，把他们与一群群的旅客隔开。廖瓦正在这里等候他们：埃里奥满足了娜塔利娅的请求。在边界上，托洛茨基被告知：他得在马赛停留9天，等待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班轮。能滞留9天使他很高兴。莫利尼耶在马赛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托洛茨基便要求朋友们都到那儿跟他一块儿过几天。可是，他刚一到达马赛，警察局就通知他说，他连一天也不能呆在城里，必须立即登上一艘凑巧当晚就要起锚的意大利货轮。抗议归抗议，托洛茨基还是上了那艘货轮。可上了船他才知道船上没有客舱，而且路上得走15天。他担心自己被人诱进了陷阱，于是又回到岸上。当时，正是半夜，警方想用武力强迫他回到船上，可是没有成功。跟宪兵厮打了一番以后，所有人都在码头上安顿下来，在冬季的寒风中过了一夜。托洛茨基从码头上给埃里奥、内务部长布吕姆和多列士发了抗议电。他还给罗马发电报请求提供过境签证。黎明前，警察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领进一家旅店，并告诉他们作好马上离境的准备。

一天过去了，又几个小时也过去了，巴黎的埃里奥及其他人都没有答复。想必是命运的拨弄，倒是墨索里尼的外交部很快就通知说将给予过境签证。于是，警察便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送上了第一列驶往意大利的火车。两人隔着警察的警戒线和廖瓦拥抱接吻。他们和廖瓦在一块儿只呆了一天，而这一天又充满了如此之多的焦虑不安，以致像娜塔利娅所说的那样，都没来得及好好地相互看一眼，更不用说好好地谈一下挂在他们心头的那些烦恼了——无非是环境在他们之间引起的小小的疑虑和误会。

在列车上,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思考着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事情。两人感到屈辱,而且疲惫不堪。他们一生中的全部重担、各国政府和宪兵磐石般的仇恨、季娜的不幸和她儿子未卜的命运,似乎一下子全都向他们劈头压来。在从意大利写给廖瓦的信中,娜塔利娅写道:"我和你爸爸坐在黑暗的包厢里哭了很久……。"①

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他们已经抵达他们从未到过的威尼斯,他们抬起溢满泪水的眼睛,望见了恢宏壮观的圣马克大教堂。

※　※　※　※　※

12月12日,他们回到了王子群岛。"逃走的狮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笼子"里。看来,他已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回来之事了。也许,一看见这座美丽的岛屿、边界上彬彬有礼的土耳其官员和比尤克·阿达村渔民那开朗的、洋溢着亲切友好笑容的面孔,他的神经就安定平静下来。书架和堆满信件、书报的写字台似乎在召唤他重归熟悉的工作。不久之后,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在王子群岛上执笔写作是多么惬意呀,尤其是秋天和冬天,当小岛变得空旷、园林里出现啄木鸟的时候。"窗外就是大海,煞像一个波翻浪涌的湖,成群的鱼儿径直游近岸边。近几个星期的焦躁不安、紧张喧闹之后,从未有过汽车鸣笛声和电话铃声的宁静安谧的小岛给人以安宁,激励人思考。

这一年最后的几个星期就是这样在安宁和休憩中度过的。此间唯一一件使人不快,但却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是与谢宁-索博列

① 娜塔利娅致廖瓦,1932年12月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另见12月8日托洛茨基在布林迪西对报界的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维丘斯的最后决裂。此人在柏林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反对派的国际秘书处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一次严厉的抨击划清界限。[①]这件事使托洛茨基很吃惊，尽管几个月前他就曾给索博列维丘斯写信说过"党对您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他以为在哥本哈根时两人已经求得了共识。12 月 18 日，他在给谢宁的信中写道："您曾告诉我说，苏联之行使您最终确信反对派是正确的。"甚至直到现在托洛茨基也不怀疑有人做了手脚，以为谢宁只不过是屈从于党的诱惑而已，而这会使他走向投降。他警告谢宁说："投降就是政治上的灭亡。"劝他往后放一放，再好好考虑一下。显然，他是在为失去一个聪明有用的拥护者而遗憾。但决裂已然发生，很快，谢宁就从托洛茨基的视野里消失了。[②]

在这几周的休息过程中，托洛茨基发现捕鱼"是驱除忧愁、安定骚乱思绪"的百试不爽的良方。在他离开王子群岛前写下的日记中，以沃尔顿式的风格亲切地记述了他那些渔民朋友，尤其是那位经常与他出海的、几乎一字不识的哈拉拉姆斯。[③] 这位年轻的希腊人"浑身的骨头都挂满了鱼钩"，凡是他能记得起来的所有祖先都是渔民。"他自己的世界就在王子群岛周围大约四公里方圆以内的范

---

① 参见 1932 年 12 月 15、16、18、19 和 22 日托洛茨基与谢宁－索伯尔－索博列维丘斯兄弟的通信。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月两只手》，载当月的《反对派通报》第 32 期)遭到了他们的反对。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在同美国资本主义进行无原则的调情。托洛茨基的批评所根据的是斯大林对一个叫做托马斯·坎贝尔的美国人发表的答记者问。此人是工程师和一本有关俄国的书的作者。坎贝尔引用了斯大林的原话，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决裂的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企图向别国输送革命，而他，斯大林却力争"使一切努力只局限于本国之内"。斯大林事后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但他的否认却很难使人相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认为，托洛茨基的批评是不公正的，是极左的。

②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③ 这些标明 7 月 15 日的几页日记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

围内。但他熟知这一世界。"他在这里能找到足够多的迷人之处,以便让它来充实他的一生(如沃尔顿笔下所谓"永远无法穷尽的、有点儿像诗歌、有点儿像数学的东西")。"他像一位艺术家那样阅读马尔马拉海这部绝妙的书"。他竟能让与此相距甚远的老革命家的大脑对它产生兴趣。他们只能用手势、微笑和不多几个单音节的土耳其、希腊和俄语单词相互交流。对于哈拉拉姆斯来说,这些语汇就足以解释清楚大海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了。根据地平线、天气、季节和风向撒网——螺旋形还是半圆形;要引诱鳌虾入网,该怎样把重物抛下小船;该怎样保护捕获的鱼免于被在周围游来游去的海豚叼走。《不断革命论》的作者热情而又恭敬地学习着这门"复杂而又古老的、数千年以来一成不变的技艺"。只要他抛重物的方法稍不对头,便可发现哈拉拉姆斯朝他投来"令人无地自容的一瞥"。"出于善意的情感和社会规矩的意识,他承认总体上我抛重物抛得还可以。可是只要把我干的活儿跟他的一比,就足以使我的骄傲和自豪不翼而飞了"。毕竟,回到哈拉拉姆斯这儿和他一块儿阅读马尔马拉海这本书,又写自己的书,倒是蛮惬意的呢。

这首田园诗的中断来得既突然又可怕。1933 年 1 月 5 日,廖瓦发来电报,说季娜自杀了。在儿子终于回到她身边后才过了一个星期,她就自杀了。显然,孩子不仅未能安定她的神经,而是使她彻底崩溃。在一大堆文件中,她留下了一张用德语写的字条:"我感到可怕的疾病正在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我自顾不暇,哪里还能照管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他都不该来。他是一个感觉敏锐、神经质的孩子。他也怕 B 夫人(旅店女老板)。他现在在 K 夫人处(下写地址),他连一个德语单词也不懂。请打电话通知我弟弟。"[①] 季娜精神病的发作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频繁。她觉得自己

① 这张用德语写的字条未署日期。

无用处，哪怕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她已经再没有力气继续奋斗了。而除去所有这些以外，警察局也刚刚通知她，说她必须离开德国。这是施莱希尔将军的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天，月底希特勒就当上了总理。在柏林，上了铁掌的马靴的橐橐声和醉醺醺的嘶哑歌声都比从前更响亮。其中最下流的一首叫什么《褐色的团队清理着街道》，更是震耳欲聋，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歌曲。纳粹"令人恐怖的坦克"朝德国工人碾过来。《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在她的耳边回响轰鸣。本国的大门对她是关闭着的。她自己也远离家庭，正要被赶出德国，病又是那么严重，以至无法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季娜把自己关在屋里，在堆放了好多障碍物后打开了煤气。她设置了如此庞大的一道壁垒，以至任何想要抢救她生命的企图都属无望。医生为季娜在设置这道壁垒时表现出的"罕见的力气"而震惊。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种解脱意识使她脸上浮现出轻松的笑容，最后在她脸上留下轻松、安详的表情。她死时只有 30 岁。[①]

廖瓦通报季娜自杀的电文非常简短，但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在它的每一行里，都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压力"，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守着姐姐的遗体"。该怎样告诉谢瓦所发生的事呢？季娜的母亲，远在列宁格勒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又会如何对待这一噩耗呢？廖瓦试图通过电话与莫斯科的弟弟联系。"国家政治保卫局也不知道是面对季娜自杀的事实慌了手脚，还是指望听到什么秘密，反正电话出乎意料地打通了，于是廖瓦得以亲口向莫斯科通报这一悲惨的死讯。我们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在劫难逃的兄弟之间，就是这样在尸骨未寒的姐姐身边

---

① 在弗兰茨·普费姆费尔特 1933 年 1 月 20 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对季娜的去世和葬礼作了动人的描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廖瓦的那封电报，同上。

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①

季娜自杀6天后,托洛茨基写了致联共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共(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他讲述了2月20日指令是如何摧垮了季娜的精神的:她的死"不是自愿的。斯大林把死神强加给了她"。"对我的女儿的迫害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只是毫无政治目的的赤裸裸的报复行为,仅此而已"。在信的末尾,托洛茨基的语调中愤怒已经压倒了悲伤:"我只限于通报这件事,而不进一步推出结论。做结论的时代终将到来,新生的党是会做出结论的。"②

从列宁格勒传来了季娜母亲痛苦责备和绝望的呐喊。她的两个女儿都死了,两个在她们的父亲第一次流放时降生的女儿又都在其父最后一次流放时死去。1月31日,她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说明所有情况:"如果不让我了解所有情况,我会发疯的。"她引用了季娜在临终前几周寄给她的信中的话:"可悲的是,我再也不能回到爸爸身边了。您也知道,我从幼小的童年时代起就多么崇拜他、仰慕他,可现在我们却彻底吵崩了。这就是我的病根。"季娜抱怨父亲冷淡。季娜母亲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回答她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你的性格,你即便愿意,也难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对那些只了解托洛茨基在公众场合的面貌及这位热情演说家的人来说,其前妻的这封信肯定会使他们吃惊的,因为它证实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格是含蓄的。)接下来,则是痛苦万状的指责:"你们只考虑她的身体状况,而她是个成年人,是个完全成熟了的人,是一个需要理性交往的人。"她渴望参与政治活动,渴望有所作为,因为她追随的是她的父亲,而"你,作为她的父亲,本是能够解救她的"。亚

① 引文摘自6年后写的悼念廖瓦的悼词。《反对派通报》1938年3月第64期。

② 同上,1933年3月第33期。

历山德拉问道，季娜在来信中曾提到过的她与廖瓦的冲突，其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托洛茨基非要坚持让季娜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不可，而"她是那么孤僻，和我们两人一样，本不该强迫她说她不愿说的话呀！"然而，尽管作为一位母亲的她对托洛茨基大加指责，但一想到假如季娜留在俄国也必死无疑——会死于肺结核，便把话说得缓和一些。"我们的孩子都命遭不幸"，她又补充说，还描写自己是如何怀着恐惧看着留在她身边的外孙子和外孙女的："我不再相信生活了，我不相信他们会长大成人。我一直在等待新的灾难。"她最后写道："写、寄这封信，对我来说并不轻松。请原谅我对你的冷酷。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亲人的一切。"[1]

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怎样以及是否答复了这封信。也许，创伤太重以至无言以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在为自己没有答复朋友的吊唁而致歉时写道，他正害疟疾，"半已失聪"。[2]

※ ※ ※ ※ ※

托洛茨基始终不愿相信，德国工人运动会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竟至对纳粹主义未加任何反抗，而且在纳粹的第一次进攻之下就可耻地垮台了。在几乎长达3年的时间里，托洛茨基不断论证说，如不进行一场国内战争，希特勒未必能取胜。但未必可能的事却发生了：1933年1月30日，赶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开始积聚其

---

① 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这封信所署日期是1933年1月31日，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

② 托洛茨基致弗兰茨·普费姆费尔特，1933年2月5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据当时正在比尤克·阿达村的皮埃尔·弗兰克说，托洛茨基一连好几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只有娜塔利娅跟他在一起。当托洛茨基终于露面时，秘书们发现他的头发白了许多。

巨大力量准备进行斗争之前,希特勒当上了总理。一周后,托洛茨基指出:"希特勒掌权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次失败还不是最终的和无可挽回的。当敌人刚刚开始上升之时本来可以将他粉碎,而今天他已占据了整整一系列重要岗位。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决战尚未开始。"即使现在也还有机会,因为希特勒目前尚未掌握全部政权,他还得与兴登堡和德国民族主义者分割权力。以他为首的联盟尚未巩固,内部充满矛盾。他还必须剥夺其伙伴的所有影响才能独控整个国家。只要这些尚未发生,希特勒的地位就还相当软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可以给予回击,尽管已经太迟了:"这是关系到德国工人阶级、共产国际和……苏联命运的大事!。"[①]

如今,根据大量德国档案和日记我们得知,希特勒的第一个政府班子在刚刚组成之时实际上是多么软弱。[②] 甚至在一个月以后,在纳粹党徒袭击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宅和国会纵火案后,在法西斯恐怖甚嚣尘上的3月5日进行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能获得1200万张选票,且不说投给反希特勒的天主教中央党的约600万张选票了。我们还知道,希特勒与其伙伴之间存在着争执、冲突和不信任,如果千百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行动起来的话,将导致他们的联盟破裂。早在2月6日托洛茨基就指出:"无产阶级不是在自卫,而是在退却,而明天就可能变成仓惶逃窜。"在文章结束时,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在这样的日子里,为了要更加鲜明地揭示党的决议和行动的历史意义,依我之见,就必须毫不含糊、万分明

① 《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3期。

② A·布洛克:《希特勒传》第229-233页。

> 确和毫不妥协地向共产党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党拒绝统一战线，拒绝建立地方自卫委员会即明天的苏维埃，就意味着党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也就是犯了历史大罪，也就等于党和共产国际的灭亡。在发生类似灾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跨过尸山血海、经历数年不堪忍受的痛苦和不幸的岁月，才能达到第四国际。[①]

但早在这些话被刊出以前，无数的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政党、工会，它那为数众多的报纸、文化机构和体育组织就已然成了一片废墟。

惨痛的失败很快就影响到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反对派通报》在柏林被查封。廖瓦被迫转入地下并秘密穿越国界。3月24日托洛茨基在给普费姆费尔特一家(其家已被纳粹捣毁)的信中写道："我们一直非常担心Л.Л.(即廖瓦)。德国朋友认为，他如果落入法西斯手中，必死无疑。我也是这么看的。而昨天我们收到了他发来的电报：'我将去巴黎'。希望他旅途顺利吧。我们尚未得到他进一步的消息。"[②]

※ ※ ※ ※ ※

在这几个星期里，托洛茨基宣布他不再忠于第三国际。在题名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标题为《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的文章中，托洛茨基这样总结了时势：德国工人运动所遭受的不是暂时挫折或战术性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战

---

① 《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3期。

②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略崩溃,它会使工人阶级在整整一个时代中软弱无力、丧失活动能力,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都拒绝承认这一点,而侈谈什么希特勒的胜利是"过眼烟云",而现在,当时机已经错过之后,却又叫嚷什么统一战线。然而,"首先,决战的到来仍有可能,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当重新辨别方向,也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到所发生的事,要分担这一历史性重大惨败的责任,要确定新的道路,以此来恢复自信"。许多年来,"时局的关键"一直把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而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主动。德国的所有阵地都已丧失,并且这将持续多年,因此对于工人运动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尚在手中的前哨并在德国的周边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和法国从事斗争。"受法西斯政变直接威胁的奥地利成了最前沿。"而共产国际方面却极端不负责任地发表声明,说什么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大决战的前夜",因为他们投了500万张选票给共产党。"是的,500万共产党员还来得及一个一个地走近投票箱。但在企业里和大街上却并非如此。他们被枪杀,被碾为齑粉,士气低落。……早在法西斯匪帮的恐怖到来之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的恐怖就已剥夺了他们的意志。"①

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斯大林主义也有其自己的"8月4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第二国际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当时,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志同道合者声明,第二国际已经消亡,并提出了创建第三国际的思想。与8月4日类比,这暗示着托洛茨基已经提出了建立第四国际的思想。但他暂时尚未迈出这一步。他只是号召在德国筹建一个新的共产党。"德国先进的工人今后在谈及斯大林官僚集团支配(德国共产

① 《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一文,所署日期是3月14日,刊登在《反对派通报》5月号(第34期)上。

主义的)的时期时只能带着强烈的羞耻感。……德国官方的共产党注定灭亡。从今以后,等待它的只有分化、瓦解,直至彻底消亡。"托洛茨基还设想过一种可能性,即这一失败对于其他共产党来说也可能成为有益的震动,它将唤醒他们继续斗争、增强责任意识并最终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共产国际(或是它的一个部分)尚能挽救自己的革命声誉,不辜负自己的存在。"在德国,斯大林官僚集团这首预兆不祥的歌无论如何已唱完。……面对敌人的可怕打击,德国先进工人的任务是组建新党"。在这方面也许会有异议,即号召组建新党而非创建新的国际是不符合逻辑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永远符合逻辑的法则,应该等一等、看一看,看各国共产党能否从德国经验中汲取教训。[1]

即使托洛茨基曾有过这种希望,这希望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希特勒获胜后第一次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人们宣称这次胜利没有任何意义。执委会断言说德共的战略和策略从始至终都是无可挑剔的,并严禁各国共产党讨论这个问题。[2] 没有一个党敢于向这一禁令挑战。这一令人震惊的情况促使托洛茨基指出:"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7 月,托洛茨基发表声明,在德国,仅建立新的共产党已经不够了,为新的国际奠基的时刻来到了。[3]

但甚至到现在托洛茨基也无法明确判定新国际是否应该将其活动扩大到苏联,也就是说,它的拥护者应否不再把自己当做旧党的一个派别而创建一个新党呢?在数月当中,他曾劝说拥护者们反对采取这样的行动方式,他坚持认为,第四国际的活动领域应在

---

① 《反对派通报》第 34 期。
② 《共产国际》1933 年第 36 期;《反对派通报》1933 年第 36—37 期。
③ 同上,第 34 期。

苏联以外。尽管斯大林滥用权力垄断,但托洛茨基仍旧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是革命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指出,反对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即在反对派对改革体制的可能性丧失一切希望并转而以从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斗争为宗旨时,它力求建立新党才是正确的。否则,反对派绝不应该这么做。新国际应当克制自己不在苏联以内开展工作,因为工人运动"当前局势的关键"已不在苏联:反对派在那里未必有展开活动的机遇,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这样的机遇,因此,有关新的共产党的问题纯属纸上谈兵。只有当新国际在其他国家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时,苏联的力量对比才可能发生变化。首要的是西方革命的进展,它不可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进展会削弱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控制力,从而能给共产党反对派注入新的力量。①

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新举措的逻辑很快就迫使他改变观点。在德国宣传创建新党而非创建新国际的做法是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同样,要求新国际不在苏联境内从事任何活动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因此,1933 年 10 月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认为反对派在苏联国内也应当组建新政党。② 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花费了大约 6 个月的时间。在这方面,他必须修正某些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了 10 年的观点。他不再坚持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新党一旦开始存在,就应当力求不是以改革和以合法的

---

① 《反对派通报》第 36—37 期。皮埃尔·弗兰克谈到,托洛茨基在几周和几个月之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的秘书看到他每天一连数小时在屋里踱来踱去,全神贯注地紧张思索。"他满头大汗,使人可以感到,他因思考和犹豫而精疲力竭。"

② 同上。托洛茨基在其论文《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中阐述了这一修正,据托洛茨基档案来看,该文于 1933 年 10 月 1 日完稿,刊登在《反对派通报》第 36－37 期上时该日期被误印为 1932 年 10 月 1 日。

方式取代斯大林的政府，而是以革命的方式将其推翻。那么，托洛茨基是否依然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呢？现在，他是否把苏联的体制视做是热月政变式的或波拿巴式的反革命的翻版呢？现在，反对派是否还应该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呢？

托洛茨基论证，在经历了最近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后，以为可以在党或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上罢免斯大林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能够迫使官僚集团将政权移交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只有暴力。”然而，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指望这个已被击溃的涣散的先锋队去从事夺权斗争的。因此，对是改革抑或是革命这个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属于遥远的将来。如果没有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反对派休想觊觎政权，而只有经过国内的社会变动和国际舞台上的急剧变化，首先是革命在苏联以外获得成功，否则反对派是无法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的。在这样的变动和变化之后，“斯大林的机关将被吊起来”，在人民的支持下，反对派甚至可以不经过革命或内战而获胜。如果斯大林及其同谋者不顾自己已被孤立的现实，仍然牢牢把持着政权不撒手的话，反对派就要考虑“采取警察式的措施”。在工人阶级政治热情高涨的形势下，斯大林主义会极其软弱，因为“除了在工人阶级中，它无处汲取自己的力量”。只是由于工人的消极和顺从而非积极支持，斯大林才获得了力量。没有这些因素，斯大林可以被一掌打翻。[1]

托洛茨基再次重申，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其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占主导地位，因此苏联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尽管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官僚们不管享有多少特权，但仍是“长在工人阶级肌体上的恶性肿瘤，而非新的有产阶级”。特权和不断加强的社会不平等并非像极端激

---

① 《反对派通报》第36－37期。

进派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新的剥削方式，而是普遍贫困和物质匮乏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作为刺激劳动生产率因素的特权和不平等是"资产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武器"。官僚集团的寄生和暴政统治可能会危及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并诱发反革命，但它也可以成为简陋而又"昂贵的社会发展的工具"。"苏联官僚集团浪费了……大部分国民收入，同时也关注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繁荣，国民收入越高，官僚特权的份额就越丰厚。不过，在苏维埃国家社会基础上实现的劳动群众经济文化的提高会逐渐削弱官僚统治的基础。"这样，在斯大林时代结束的20年前，托洛茨基就预见到了苏联的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斯大林主义可以破坏它自身所赖以生存并从中得到滋养的土壤，即原始的贫困、文盲和野蛮的土壤。[①]

托洛茨基虽然不再捍卫苏联的一党制，但却又重申了他先前的警告，即"今天，如果苏联官僚集团的平衡受到震荡，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再次强调了他的无条件捍卫苏联的宗旨："……新国际……在改革苏维埃国家之前，应当担负起保卫它的责任。所有以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为借口而拒绝承担这一义务的政治派别都有沦为帝国主义手中消极武器的危险。"托洛茨基补充说，新国际的拥护者"在生死攸关的危险关头，应当坚守在保卫苏联的最后一道街垒上。"[②]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断然坚持根据其经济结构而言苏联仍属于工人国家，但他的结论是：目前作为一个国际革命因素的苏联，

---

① 《反对派通报》第36－37期。托洛茨基总结说："很清楚，在这一幸运的历史方案中，官僚集团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可怜却又昂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然而，不言而喻的是，他当然不会认为这个"幸运的方案"真会实现。

② 同上。

其所具有的意义不会比一座死火山更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革命斗争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这在十月革命后更为明显。而如今这一地位已经彻底丧失了。"不仅官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对党的讽刺——而且就连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也由于其工作条件的艰难而无力"在国际范围内起领导作用"。"革命的重心最终转移到了西方，那里建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托洛茨基提出了第四国际的思想，他相信，革命的新的动力将来自西方而非苏联。[①]

我们已经看到，托洛茨基在决定与第三国际决裂时曾是多么动摇不定。导致其动摇的原因很清楚，因为他本人已曾多次声明反对他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当时曾证实，各国革命的工人正在寻求第三国际的领导，他们把它看做是第二国际和第一国际的合法继承者以及俄国革命思想的体现者。当共产国际与苏联还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精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是完全正当的。托洛茨基并非完全相信这一论据已失去其意义。同样，考虑到他本人在第三国际中所起的作用，对他来说公开宣布与第三国际决裂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个伟大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竟会有力量公开宣称这一运动毫无意义，这种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与第三国际决裂要比 1914 年与第二国际决裂难得多。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令人震惊的失败才使他迈出了这一步。托洛茨基承认，1914 年第二国际领导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是有意识的叛卖，而在 1933 年，共产国际却由于愚蠢的不负责任与盲目而加速了希特勒的胜利。不过，1933 年的灾难在许多方面比 1914 年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从它遭受的打击下复元：

① 《反对派通报》第 36－37 期。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和俄国革命是对“社会帝国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抗议。而对于1933年骇人听闻的行为，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提出类似的抗议。共产国际的政策不仅使得潜在危险得以成为现实，使得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整个运动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漠和无动于衷的氛围中发生的。托洛茨基问道，广大共产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解力究竟怎么了？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在毒化工人的意识，从内部破坏工人的意志。他的那些警告那么明确、那么响亮，而且又都惊人地为事件的发展所证实，却如空谷足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更加坚信自己的结论准确无误。他的警告是如何被人们刻意忽略的，对此，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本人更了解了：1932年年初托洛茨基在写给索博列维丘斯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甚至“连10个德国产业工人”也未能招募到（它只招募到有数儿名知识分子和侨民）。[①]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至少还有数千名德国工人参加了地下组织“斯巴达克”，并且支持对“8月4日”的谴责，当时尚在狱中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谴责“8月4日”。可现在，在希特勒的胜利之后，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自我辩解和自吹自擂只有顺从和沉默。也许，在所有各国共产党中，理性、国际团结和责任感已荡然无存？托洛茨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如若不然，那就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被斯大林主义败坏到如此地步，致使改良它的意图不啻于西叙福斯的苦役。托洛茨基从事这项苦役已达10年之久。他不想继续努力把沉重的石头推到这座山顶上去了。

① 1932年3月6日给谢宁－索博列维丘斯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对托洛茨基来说，与列宁缔造的、在革命中获胜的苏联共产党彻底决裂更加困难，而他本人就是在革命队伍里才成为一个伟人的。一年前，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被第二次流放后，看起来似乎1925年至1927年统一的反对派已然复活了似的。来自莫斯科的每一封信都指出，在国内普遍恐慌的气氛下，就连斯大林最亲近的拥护者也幻想有朝一日能够摆脱斯大林。然而，从1932年起，斯大林得以重新获胜。他在这一点上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采用了托洛茨基推荐的某些措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给了经济以"喘息"之机，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定了较低也更切实可行的目标，对已经集体化了的农民作出了某些让步。其结果是使得混乱、骚动和党内人心的浮动大大减少。德国的灾难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斯大林的地位。那些对这一灾难的后果有所了解的人们感到动摇莫斯科统治的稳定性是不合时宜之举。德国集权制的确立给了苏联的集权主义倾向以新的动力。当"一个元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口号声震撼整个德国时，苏联领导集团和许多普通党员也认为，革命和苏联也只有在一个领袖的领导之下才能生存。1933年5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投降，并从流放地回来。1926年当他们第一次投降时，他们投降的是斯大林主义，却未在斯大林个人面前下跪，而且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1932年，当人们要求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无法强迫自己就范。然而在1933年时他们却正是这样做的：在他们新写的悔过书中颂扬斯大林永远正确，说他是空前绝后的天才。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托洛茨基刚刚提出第四国际思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发出在苏联创建新党的号召之时。斯大林成功地摆脱了危机，他头上笼罩的新专制主义光环，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场面，这些都促使托洛茨基挣脱将他与旧党从理论上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一重束缚。在评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悲剧命运"时,托洛茨基写道:"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想要展示一个充满巨大震荡的时代是如何无情地蹂躏人的性格的时候,他会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例……斯大林的机关已经成了一部敲碎(前革命家)脊梁骨的机器。"此外:"斯大林和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一样,由于买不到活的农奴,便开始收购死农奴。"[1] 托洛茨基以为苏联共产党可能会复兴的希望现在也破灭了。向脊梁骨被打断的人、向亡灵呼吁是徒劳无益的,无论如何,在一个可以向专制独裁者俯首下跪的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已荡然无存了。布尔什维主义只有彻底摆脱这个党、在这个党之外才能复兴。

简言之,托洛茨基的这些理由对于创建新国际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一思想被提出并经讨论获得所有托派集团赞成之后,托洛茨基也没有宣布这些集团就构成了第四国际。对它们的弱小颇有了解的托洛茨基仅限于提出这一思想,他希望这一思想能很快就会赢得大量的支持者。托洛茨基以某种方式重复了他在齐美瓦尔德时期的行动,他对这一时期的记忆在他的论著和行为中看得很清楚。从1915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始宣传创建第三国际思想的那一刻起到他们召开国际成立大会,他们进行了长达4年的说服和准备工作。与此相仿,现在,问题不在于"立即宣布……建立新国际",而在于如何做准备工作。"新的前景意味着……有关'改良'(斯大林的组织)和要求恢复反对派成员在官方党中的地位的言谈,应当休矣。……左翼反对派也不再作为(党内)反对派而行动。"[2] 在托洛茨基准备好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同样也需要4年时间。

---

① 《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5期。

② 同上,第36－37期。

1933年时，托洛茨基对新国际的希望并不像后来那样显得似乎毫无根据。在德国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主义却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道义上的胜利。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说迄今为止他向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所有号召几乎都没有引起反响的话，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与斯大林争论的主要问题都是苏联内部问题，中国革命对欧洲共产党员来说不是相距太远就是难以理解。而最后阶段的争论则集中在德国——"欧洲的心脏"——问题上。希特勒的上台直接涉及到每个共产党，它提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导向战争，它威胁要铲除共产主义。托洛茨基跟共产国际进行了公开论战，并以极大力量将论战进行到最后关头，直至他们的分歧为事件的发展所验证。检验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对"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人们还应记忆犹新，每个共产党员都能重温这些理由，认真加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是：那些把西方这一最强大的共产党领入如此可耻的毁灭地步的人，其罪过在于因无能而犯了近似背叛的罪行，他们丧失了当领导的一切权利。依据同一个标准，反对派有权要求或者应该要求把领导权夺回手中。

某些这类的看法无疑也渗入到斯大林派的队伍中。共产国际越是恶毒攻击和嘲笑托洛茨基在"吓唬小孩"、"夸大纳粹的威胁"、"坚持为与社会法西斯建立统一战线效劳"，所有这些用飞去来器进行的抨击便越是有力地打到了它们的作者身上。许多党的组织都感到窘困和羞愧。就连顽固的斯大林派成员也都悄悄地赞扬托洛茨基明确无畏的立场。[1] 在从希特勒的恐怖之下逃出来的德国人中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美国等国的共产党员中产生了

① 许多年以后，当形势已能允许人们说这些话时，他们亲口承认过这类"暗中的赞美"，有些人亲口对本书作者说过。

新的托洛茨基和准托洛茨基小组。它们当然不是很大,但其影响力却不容低估。它们吸引了一些聪明而又忠诚的党员,向共产党员的良心发出了呼吁。它们迫使斯大林主义采取守势。党的领导人只有靠狂热的呼唤党的精神、威胁开除或真的开除的办法才能铲除这种在自己的队伍中扩散的疾病。归根结底,共产国际只有放弃它的一切立场,只有将自己有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并采取统一战线(继此之后是人民战线)的策略,才能彻底铲除这种疾病。此外,魏玛共和国灭亡同样也震撼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对议会民主制的信仰遭到了最残酷的打击。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把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庄重地写进自己的党纲。这些党内的激进派和左翼团体也把目光转向托洛茨基,认为他的思想比官方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更合理,也更有吸引力。这是流亡中的托洛茨基政治影响力所达到的顶点。如果说托洛茨基曾经有过建立独立的共产党的机会的话,那么就是这时。

然而,托洛茨基经常恰如其分地引用的与他本人现在开始采用的行动方式相矛盾的那些论据并未失去效力。诸如只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苏联未被触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仍然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国际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等说法就依然是正确的。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广大群众来说,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在他们眼里依然是国际革命的前哨,官方共产党对他们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除了斯大林的领导,这些人看不见有任何别的选择,而斯大林的领导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传统的代表。斯大林官僚集团竟成功地把自己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战斗中的法国码头工人、波兰的矿工和中国的游击队员全都把莫斯科的领导人当做判定有关自己苏维埃利益问题的最好的法官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可靠顾问。这

就是为什么他们盲从斯大林政策中忽左忽右的路线、甘心受它最荒谬的操纵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就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如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眼中，罗马教廷的敌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一样。

所有这些，对托洛茨基所从事的事业来说都是不祥的预兆。能够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口号有所反应的只有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但正是这些人最不愿团结在新国际的周围。由于托洛茨基对在他们各自党内进行改良的呼吁长期以来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所以他们更不可能响应托洛茨基要他们与这些党决裂的号召。

同样，无论旧国际的声望如何扫地，德共毁灭的后果不会、也不可能会有利于新国际的创立。每一个旧国际都是在工人运动的浪潮达到高峰时出现的，每个国际在诞生时都没有与任何地位牢固的对手作战。[①] 而第四国际居然敢于在运动处于最低潮的时期向两个强劲的对手挑战。在德国，正如托洛茨基预言的那样，工人阶级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的确无法在政治上获得新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主义无法从其在德国问题上所获得的道义优势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在这10年的后半期中，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继续退却，尽管1936年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现过力量的高涨。一连串不断的退却和失败引发了道义上的软弱和这样一种局面，就连加入新国际这一最富于说服力的号召也被人们所忽略。托洛茨基证明工人阶级需要有新的领导来中止退却、重新组织力量以自卫和反攻。但广大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中甚至那些尚未丧失勇气的人都认为，不能在危急关头中途换马，因此，两

① 对这一论据后面的部分，特别是波兰托洛茨基派成员反对创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可参阅本书《地狱之夜》一章。

个现有的国际竟然在各自的错误和失败中繁荣起来:它们的拥护者们在纳粹和法西斯冰雹般的打击之下不顾自己的担忧,不愿寻找新的领袖和新的斗争方式。他们宁愿在熟悉的旗帜下从失败走向失败地爬行,也不愿团结在新的旗帜下,因为在这面旗帜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秘而又可疑的伟岸旗手。

托洛茨基深信,共产国际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其作用已经完结了。他没有全错。10年后,斯大林解散了这个组织并宣布它不能再起任何作用。在这10年当中,共产国际只不过是给它在德国的破产增添了新近在法国和西班牙失败的记录和1939—1941年间,即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期间所推行的模棱两可的政策。然而,处于共产国际身后的那个运动,却绝非一具"僵尸"。无论斯大林使用什么方法想要从道义上破坏这一运动,也无法把它消灭。也就在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西方共产党在反抗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中积聚着新的力量;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尽管与斯大林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仍在斯大林的旗帜下一步步走向胜利。无论斯大林如何想把各国共产党变为一个听命的小卒,南斯拉夫、中国以及某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有足够的力量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进行各自的斗争、改变自己国家与全世界的命运。而且,由于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他们获得了新的革命动力。

新的革命动力当来自西方而非苏联这一思想渗透在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所作的宣传工作中。托洛茨基一再重申,尽管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继续起着双重的作用——既是进步的又是反动的作用,但在国际领域,它却只能施加反革命的影响。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未能把握实际情况。斯大林主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都继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对苏联国外的阶级斗争既有推动,又有妨碍。在其后的30—40年间,革命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因此,托洛茨基决定创建第四国际的主要前提是缺乏根据的。而由

于他想要改良共产国际的全部努力都归于徒劳，因此，如我们所知，他无法继续这一西叙福斯式的劳役。他必须寻找到别的解决办法。然而他的新任务至少也和旧任务一样是无法完成的。西叙福斯怀抱着希望，只是将石头从那座可怕的山的这一面坡滚到了另一面坡下，然而在那里，他又得重新开始推着巨石往山上爬。

※ ※ ※ ※ ※

我们已经知道，与共产国际决裂后的托洛茨基再次要求他的拥戴者们誓死捍卫苏联。他本人则在文章中竭力要西方资产阶级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三帝国意味着世界大战。早在1933年春，他就呼吁西方强国与苏联结盟。这是第三帝国存在的最初几个月，那时，未必会有一个西方国务活动家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希特勒当时采取了和平主义立场，在国际裁军会议上接受了由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和约翰·西蒙（John Simon）提出的裁军方案，这使得伦敦当局喜不自胜而大松了一口气。1933年6月2日，托洛茨基在《希特勒与裁军》一文中写道："最危险的莫过于低估敌人……德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不愿把希特勒当回事。……同样的危险也会出现在国际政坛上。"他指出英国政府是如何一厢情愿地对希特勒"温和的语调"作出反应的："当事件正按照熟悉的轨道进行时，外交惯例自有其优点。"然而，"在外交剑术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动因和计划"。奥斯丁·张伯伦和约翰·西蒙"本以为他们见到的（希特勒）会是一个手舞大斧的疯子，可看到的却是一个其后裤袋里藏着左轮手枪的人——于是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是希特勒在外交上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他的目标是重新武装德国，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来已经恢复了它作为欧洲工业强国的地位，但仍没有武装。"潜在的实力和事实上的软弱两相

结合,决定了所订目标极具爆炸性,也决定了它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头几步的极端谨慎小心。"希特勒之所以同意英国的裁军方案,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方案不会被法国所接受。这使他有机会利用英国反对法国,并把以后军备竞赛的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希特勒的爱好和平的姿态不是偶然心血来潮的外交即兴之举,而是一个大谋略的组成部分,它能急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德国,从而为德国帝国主义进攻欧洲和世界打下基础。"托洛茨基预言道:如果不阻止希特勒的行动,那么再过5到10年,它们必然导致世界大战。"希特勒是很想进攻苏联的,然而,如果东方战线不是一条抵抗力最弱的战线的话,那么,突破口也可选择在别的方向……能用来打东方的武器,也能用来打西方。"[1] 托洛茨基指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捍卫凡尔赛条约的义务。欧洲需要重新组织,但这事如若落到法西斯手中,那将是欧洲的不幸!"

托洛茨基在其为美国报界撰写的声明中呼吁美国政府(该政府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十六个年头仍然不承认苏联政府)与苏联结盟以对付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威胁。[2] 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的这一呼吁对此后不久罗斯福总统作出的与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是否有影响,但托洛茨基的观点无疑在斯大林的外交主张中留下了印记。斯大林马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问题。当问题涉及到自己统治的安全时,斯大林是很愿意倾听其对手的建议的,尽管他的做法总是粗鲁而又有所曲解,而且还总要拖上好久。

然而,苏联政府却延长了与德国签订的拉帕洛条约,使得极端

---

① 《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5期。该文最早发表在1933年6月21－2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在该文章完稿后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常常引用此文中的一句话,即"射击东方的那支枪也可以射击西方"。

② 参见托洛茨基答《纽约国际电讯报》记者问。

激进的反斯大林分子将斯大林的这一步骤称做是新的"叛卖"。托洛茨基认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不能把它作为讨论题目。他不断强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希特勒的上台负有责任,但他不否认斯大林有权在外交领域里搞谋略。据我们所知,两年前托洛茨基曾敦促苏联政府在希特勒威胁要夺取政权时对红军进行总动员;他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德国左派会手拿武器起来反对纳粹,那时红军有义务帮助他们。托洛茨基指出,但是现在希特勒不流血的胜利和德国左派运动的彻底失败使得力量对比不利于苏联,尤其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国内已空虚的情况下。因此,苏联外交必须要能赢得时间进行谈判,甚至要寻求与希特勒达成临时协议的途径。托洛茨基以一种未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的不偏不倚态度声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掌权的是反对派,其做法也不会与此不同。"如果今天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的话,那他们的直接实际行动也只能从由于追随者们10多年来的政策而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出发。他们也不得不保持与希特勒德国现有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他们会为翻本和复仇作好准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不能靠示威性的姿态来解决,但它会要求急剧改变所有领域里的政策。"[①] 托洛茨基的论断和以前一样,并未染上敌视斯大林的个人感情色彩,而是非常客观的。

※ ※ ※ ※ ※

这是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在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们,尤其是他的翻译莫里斯·巴黎冉宁

① 《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5期。

(Maurice Parijanine)请求法国政府撤消1916年将托洛茨基"永远"逐出法国的命令并为其提供避难权。托洛茨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刚刚组建的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激进政府必将力求改善对苏关系,根本不会让他在法国居留。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地帮助他的法国朋友。此前不久,他刚刚谈妥了在纽约发表有关爱德华·埃里奥的一篇文章之事,这是一篇颇有些不敬的速写,是他在停留马赛深夜时与警察扭打后不久写的。现在,他又放弃发表这篇文章,为的是不给对手以不让他进入法国的口实。他还写信给教育部长亨利·盖努(Henri Guernut),此人作为政府的一员支持托洛茨基在法国避难。他郑重许诺在法国将奉公守法,不给政府找麻烦。[1]

几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粗略草拟了有关国际的设想,还写了几篇有关法国政治和文学问题的小文章。今后的情形仍在未定之天,这迫使他把较大的写作计划先搁在一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经济上的困难,这一点他从1929年以来还从未体验过。哥本哈根之行,季娜的病,廖瓦移居法国,《反对派通报》编辑部迁址到巴黎,这些事使得他的支出陡然增加,而它们偏偏又是在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托洛茨基主要著作广泛流行的德国,纳粹发布了禁书令,他的著作与所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一样都被付之一炬。而这又恰巧是赶在《俄国革命史》第三卷刚刚问世时同时发生的。《俄国革命史》在美国的发行情况不大好。早在3月份托洛茨基就写信给他在英国的拥护者说:"世界经济危机同时也成了我个人的危机,尤其是因为《俄国革命史》一书发行量微不足道。"托洛茨基虽也不时给《曼彻斯特卫报》及其他报纸写文章,但稿费收入亦极菲薄。为了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加快法国入境签证的申办，7月7日他写信给亨利·莫利尼耶说，即使不让他在法国本土上而只让他居住在科西嘉，他也满足了，因为即使是在那儿也会使他能与欧洲政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且还比在王子群岛更远离国家政治保安局。[1] 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们要求给他以避难权，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很快就得到了回报。早在7月中旬之前托洛茨基就获得了签证，但签证所提供的居留权却绝非不受任何限制：只允许他在南部某省居住，即使是短期到巴黎去也不允许，他必须严格履行不公开身份的规定，并要接受警察局的严密监视。

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些条件，还把这当做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他终于要到法国了，那里的生活和文化他是如此熟稔，那里现已成为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中心。满怀期望的托洛茨基在准备动身时回顾了他在王子群岛上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年半以前，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繁荣的阳光还照耀在合众国的上空。如今，这样的日子似乎已经如此遥远，像史前史或是一则童话……这里，在这座静谧的岛上，连回声也如此温柔，大千世界的喧嚣声迟迟才能传到我们耳边，而且，声音是那么喑哑。"他不无激动地与宏伟壮阔的马尔马拉海、与出海捕鱼的生活和诚实的渔民告别，其中有些"连骨头里也渗透着海盐"的人前不久才在乡村墓地里找到自己的安息地，其他人在这危机的岁月里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以便把自己捕到的鱼卖出去。"房子里已空空荡荡，地板上刷了一层如此奇怪的油漆，以至直到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之久，桌椅腿和我们的脚还直往地板上粘。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的双脚正如树根一般在王子群岛的土地上扎下去了。"[2]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动身之前》1933年7月15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命运并未保护他,并未使他在王子群岛上免遭失望和痛苦。在那些年月里,死神的阴影曾多次把他造访,甚至直到动身的时刻。他在王子群岛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除了给土耳其政府写告别感谢信之外)是为斯克雷普尼克(Скрыпник)撰写的悼文。后者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一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他在与斯大林冲发生突之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1]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岁月有这种种磨难,但仍是他在流亡中所度过的最平静、最富于创造性的和最少不幸的日子。

[1] 悼词发表在《反对派通报》1933年10月第36-37期上。

第三章

革命家兼历史学家

如修昔底德、但丁、马基雅维利、海涅、马克思、赫尔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诗人一样，托洛茨基作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群岛上度过的那几年中才达到其巅峰的。他不仅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作为它的历史学家将为后代所永远铭记。关于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都未能写出或无力创作出如此壮丽恢宏的叙事，而且那些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的许多作家中，也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之抗衡的相反叙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才华。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写至今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的最生动的全景叙述。十月起义以后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写了叙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后在布

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间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中,他持续不断地撰文对他曾亲身参加的那些事件进行历史的阐释。他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双重动力:一位创造历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并把握其意义的作家的冲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过去,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极少的几个人能够赢得未来。但就在这极少的几个人中也未必有谁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被迫在道义和身心两方面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斯大林最初像古罗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样对他使用了流放这一手段,后来便对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满了。早在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义上的凶手们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从革命的编年史上抹去,随后又将它作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予以恢复。因而使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面对双重的难度:他既要捍卫革命、反对它的敌人,又要捍卫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样在撰写其主要论著时身处这种境地:周围的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的愤怒,剥夺其安静思考的可能性并歪曲其对于事件的观点。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思维的冷静和观点的清晰。他常常回忆起斯宾诺莎的规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却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时也理解了。

如果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集极端偏激和严格客观性于一身的话,这不全对。对他来说,没有必要将两者集于一身:它们本来就是他从事工作的光和热,而光和热是不可能被分开的。他曾嘲笑一位学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围的城的城墙上,同时既属于被围者,也属于围城者”。[①] 托

① 托洛茨基在此具体指的是L.玛德兰,一个“因反动而时髦”的法国历史学家。《俄国革命史》第1卷前言。

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间那样处于革命的围城之内。然而,参与斗争不仅没有使他的观点迟钝,反而使它变得更鲜明。托洛茨基与旧俄统治阶级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拥戴者们的对立,不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们的缺陷和弱点,而且也使他能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在这方面,如在其有关军事问题的优秀论著中那样,托洛茨基的极端偏激与周密审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确是并行不悖的。对于一个好的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对"山岗那边"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实的概念,不要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要感情用事。作为十月起义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行动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正是以类似方式行事的。他对革命的描写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

托洛茨基的历史论著充满了辩证法,这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中空前绝后。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风格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他的《俄国革命史》与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的历史论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法兰西内战》相比,恰如巨幅壁画与小型彩画相比。如果说在抽象思维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马克思要高于他的学生的话,那么,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位用线条描绘群众和个体的大师,学生却要优于老师。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艺术洞见是如此谐调,达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维和想象并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讲述者的张力和热情阐述着革命理论,而他的叙述本身因其思想而获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笔下的场面、肖像和对话无疑是真实的,而且都被他的历史进程观从内部所照亮。其论著的这一显著特点给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刻

> 画性格或场面的语言的力量，尽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华常常使人想起卡莱尔。他的笔下有某种同样的技巧、同样的个人惯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动的灯光一样，它将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于中心，使之变得异常鲜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义。也许有人会补充说，在力求考察事件的连续性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赖的那种令人吃惊的直觉力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却具有一种历史理论，使他有可能理解历史并将事件联系起来。如果将他的著作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世界性危机》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就性格和才华而言，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异。在丘吉尔先生的笔下，历史带有个性色彩，事件叙述得生动、有力，与托洛茨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丘吉尔的历史背后没有历史哲学。

说托洛茨基与丘吉尔有相似之处，这是对的。这两个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之上的人物同样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同样都具有生命力，同样都具有超越自己阶级和环境的预见力和超前性，同样都具有创造性和书写历史的动机。没有必要否认丘吉尔也有其“历史哲学”：他下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哲学。而托洛茨基则具有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理论渗透进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目光更加敏锐，尽管他和卡莱尔一样具有强烈而又光彩夺目的想象力，但他还具有善于言简意赅地明确表述思想并保持平衡的能力，这已然是最伟大的经典历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质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迄今所产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也是迄今一直

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否定的历史学家。[1]

※　※　※　※　※

在托洛茨基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中,前一部当然最少虚荣。在某种意义上,他写这本书有点儿超前,尽管假如他不是在1929年或1929年之后很快就写出它的话,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写了。该书主要讲述了他的前半生,讲述了革命的胜利,而对他的后半生,即当时仍处于发展中的另一半,却只勾勒了一个草图。此书是托洛茨基在流亡后的几个月中写完的,即在与斯大林开始公开论战的5年以后。冲突刚刚过去,还十分新鲜,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以及因其前途未卜,増加了它的难度。在其后的11年中,他被迫忍受的一切不仅本身很有意义,而且在他的前半生中也有所反映:黯淡的结局使他的整个一生都放射出悲剧的光芒。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的结尾中用普鲁东(Proudhon)的话向所有评论其悲剧的人提出了挑战:"我欣赏这种场面,我理解其中的每个画面……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提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 ……"[2] 几年以后他还会说同样的话吗?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悲剧必须含有主人公的赎罪苦行的话,那么托洛茨基没有悲剧,因为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未进行过赎罪苦行。和雪莱一样,他无法设想他的普罗米修斯以在朱比特面前受辱作结。托洛茨基"对由软弱而导致的灾难极端厌恶"。他的悲剧是一个与其同时代人处于冲突中的

---

① 但只是在同意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38页。

先驱者的现代悲剧,他认为巴贝夫就是这种悲剧的典范。区别仅仅在于托洛茨基的悲剧要宏大得多,介入其中的灾难性力量也要强大得多。但在他的自传中甚至就连这样的悲剧也没有预见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在自传中看待其命运的观点给人以肤浅的印象,而这对一个即将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的悲剧主人公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我的生平》中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是叙述托洛茨基如何与斯大林斗争的最后几章。在这几章中,他提供了许多细节、真知灼见和评价,但却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且,对斯大林扶摇直上的原因也只解释了一半。他把斯大林描写成了一个极其狡猾的恶棍,认为这个人微不足道,而且仍然持他几年前所持的看法:斯大林根本不配当自己的对手,更不用说会统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整整30年了。"对党的最高领导层人士(较大范围内几乎没人知道他)来说,斯大林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托洛茨基在此提出了他的这样一个推断,即尽管斯大林攫取了主角,但他很快就会智穷力竭的。[1] 在这方面,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在《遗嘱》中的评价,他说斯大林是"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之一,另一个是托洛茨基。列宁警告全党说,这两个人的相互敌视会成为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托洛茨基无法说明斯大林上升的多方面的政治原因,只说他是党的机关和官僚集团贪婪地攫取权力和特权的体现。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什么会在一开始帮助斯大林篡权、尔后又对此加以纵容以及为什么这导致了形式如此惊人的党内斗争。作为一位自传作者,同时也作为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确忽略了布尔什维主义压制其他各个党派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自我压制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斯大林就是这种压制的最高体现。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47页。

他不理解为什么党不得不用自己亲手锻造的武器来对付它自己，而且即便是对敌人也未曾如此凶狠。他觉得这是“一个阴谋”的结果。[1]

尽管如此，《我的生平》仍不失为自传体裁中的一部杰作。弗郎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公正地将此书的头8章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对童年的描写相比。[2] 托洛茨基与上述两位作家一样，都具有一种清新的“儿童”的目光，都具有取之不竭的视觉记忆力，都具有再现气氛和情绪的力量，并且也都具有同样的看似轻松裕如地表现形象和场面的能力。他善于借描写人的表情、手势或眼神，通过寥寥数笔来传达一个人的本质和性格。他就是这样描绘出了整整一系列由亲戚、家里的仆人、邻居和中学老师组成的人物画廊。让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尽管在他那上下文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叙述中作任何摘取都会有损于其原有的生命力。例如，他对敖德萨中学的校长是这样描写的：“他从不正眼看和他谈话的人，穿着一双胶底鞋，悄然无声地在走廊里或教室里走动，他用低沉沙哑的假嗓子说话，能不提高嗓音就使人心惊胆战。从外表看……他是个宁静平和的人，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没有摆脱过根深蒂固的忿恨恼火的状态。”托洛茨基有一位老师，他“身材瘦削，黑黄的脸上长着刺人的胡须，他的白眼球总是浑浊的，动作没精打采，好像没睡醒似的，他时不时地大声咳嗽，并把痰吐在教室里……他是一位不错的数学老师，但他的目光却总是超越于学生、工作甚至数学之上。过了几年之后，他用剃须刀割断了自己的气管”。另一位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小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那张胖胖的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只有在他笑的时候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27－234页。

② F.莫里亚克：《内心的回忆》第128－132页。

才突然暴露出这个人的威严纯粹是假象，这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有什么东西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他总是担心别人知道他的私事，这一点是那么明显，甚至我们这些小孩也能看出来……”。还有一个“……是身躯庞大的德国人，长着一颗大脑袋，长长的胡子垂到腰际。他那双孩子般的小脚负载着他那沉重的躯体，这机体似乎装满了善良。斯特鲁韦是一个最正派的人，他为学生的成绩不好而痛苦，他总是激动不安，苦口婆心地劝说……”。[①]

我们看到，那些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衰败——发展”的地主邻居们身上，都打上了“注定灭亡的印记”。其中有一家前地主“一度曾是这个地区所有土地的主人；而现在他们的后代却靠替农民写诉讼状和书信为生。每当他来我家时，总是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讲述她的青春，讲她那众多的女奴、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们家的作坊里当学徒”。再如对另一位犹太地主的描写：“他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他的左手弹得不好，而右手，用他的话来说，可以举办演奏会，……老头突然停止演奏，走到镜子跟前。如果旁边没人的话，他就用香烟把胡子整个烧一遍。用这种方式把胡子理整齐”。在这一组由破产地主、正在上升的农场主、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形形色色的亲戚们组成的人物画廊后面的，总是乌克兰草原上的气息：“法尔茨-法因这个名字(一个被称为“绵羊大王”的地主)就像数万只羊蹄的橐橐声，像无数只绵羊的咩咩叫声，就像背上背着长长牧棒的草原牧人的喊叫声和口哨声……像无数牧羊犬的汪汪吠叫声，无论在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草原呼唤的也是这个名字。”[②]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67-71页。

② 第50页。

托洛茨基又把我们从其童年的生活环境带到尼古拉耶夫市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带到敖德萨和莫斯科的监狱、西伯利亚流放者居留地，尔后又向我们展现了《火星报》编辑画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诞生。我们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看到的对这次分裂的描述，比所有涉及这一时期的回忆录、见证人的笔记及其他任何文献都更鲜明。托洛茨基在1903年还是一个孟什维克，但撰写此书时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一事实本身对他再现会议气氛、描写其中人物具有重要意义。他回顾了自己是如何转而站在列宁一边的过程，也给自己、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以应有的评价，说明当时为什么他们全都反对列宁。与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回忆录作者不同，他是从内部来表现彼此敌对的每个团体的，尽管如今他在政治上批评孟什维克分子，但对他们仍怀着理解和好感。甚至在将我们引导到政治论战的实质性问题上来之前，他就使我们感受到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冲突：

> 那时，马尔托夫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他们一起工作已经多年。他们当时相互之间还是以"你"相称，但两人的关系已冷淡下来。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当前的热门话题、今天的文字工作。……而列宁则把今天压在身下，他的思想已经进入到明天之中。马尔托夫有无数往往是很机智的猜测、假说和建议，这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会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而列宁却总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种精雕细刻的脆弱的思想不止一次使列宁不安地摇头。……至于列宁和马尔托夫，早在分裂和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是"强硬派"，而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他们两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列宁

> 常用略带怀疑的目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见面交谈时,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玩笑,最起码我没有听到过。列宁说话时不看马尔托夫,后者的眼睛在那付从来不擦的、下垂的夹鼻镜后面变得呆板无情。当列宁与我谈起马尔托夫时,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语调:"这大概是尤里说的?"为什么尤里这个名字用稍稍有些加重的特殊声调说出,似乎是在警告:"人是挺不错的,甚至非常出色,不过就是太温和了。"①

此时此刻,在这两个"亲密的战友"之间所产生的命运的气息和悬在瘦弱而又邋遢的马尔托夫头顶上的失败的预感让人立刻就能感觉出来。托洛茨基没有忘记,在他还是个年轻人时马尔托夫对他帮助很大,所以,在提出对马尔托夫的最终裁决时,他怀着感伤和温情说:"马尔托夫(是)……革命运动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头脑敏捷、才气横溢的作家,是机敏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远远地高出于他所领导的思想派别。但是,他的思想缺少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这二者是执著所不能取代的。他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流露出革命的意向。但是他的思想因没有意志的弹簧支撑,很快就消沉下去。"积极的意志力的缺乏在此被描写成是使得大胆的理性和高尚的性格削弱的根本缺陷。而对普列汉诺夫的描写却截然不同,带有有节制的反感:

> ……看来,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也感觉到了点儿什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75-176页。

么。至少，他当时曾这样对阿克雪里罗得评价列宁："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普列汉诺夫本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很难叫人羡慕。我只看到一次处于其巅峰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并听了他的讲话，这是在代表大会的纲领起草委员会上。普列汉诺夫是会议主席，他胸中已有一个清晰严密的党纲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学识、自己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在他那张蓄着花白梆硬的胡子的脸上，一双眼睛里闪耀着愉快嘲讽的光芒，他做着稍稍有些做作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机智喷涌而出，像生机勃勃的焰火一样，照亮了所有与会的小组。"[1]

这张貌似赞美的肖像就这样入木三分、击中要害，它透过他那杰出品质暴露出他的自满和虚荣并把他比做转瞬就会消失在黑暗中的焰火。

对 1914 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素描也同样鲜明、令人难忘，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让·饶勒斯、维克多·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Rdolf Hilferding）、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许多人。在那些讲述表面看似乎毫不新奇的小事的简短而又富于幽默感的片断中，托洛茨基对那个时代与人的描述的内容要比许多学术专著丰富得多。例如，他讲到，他在 1902 年第一次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后，身无分文、饥肠辘辘，但却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维也纳的使命的重要性，于是就到社会民主党本部向著名的维克多·阿德勒求助，以便继续其前往伦敦的旅行。事情发生在礼拜日。机关关门。在楼梯上他碰到一位中年先生，脸上一副"爱答不理"的表情，他对那人说要见阿德勒。"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1 卷第 189 页。

子吗?"那人严厉地问道。"今天是礼拜日,"那位高大的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并想从他身边走开。"无论如何我也要见阿德勒。""'告诉您,阿德勒博士礼拜天不会客!'那先生吼道,声音就像在暴风雨中指挥一个营一般。'哪怕您的事再重要上十倍也不行,明白吗?即使您带来了你们的沙皇遇刺身亡或你们那里又发生了革命的消息也不行,听见没有?您无权在礼拜天打扰博士的休息!'"此人是弗里茨·奥斯特利茨(Fritz Austerlitz),他是《工人报》"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惧的人物",1914年他成了沙文主义战争的最有力的吹鼓手。[①]

这位刚刚从俄国地下工作状态中逃出来的年轻革命家就这样在那段楼梯上与秩序井然、等级森严、备受官僚体制陈规陋习压抑的欧洲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发生了冲突。托洛茨基最终还是找到了阿德勒。他在自传中用寥寥数语描述了他同后者的会面:"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出来迎接他。他背有点儿驼,几乎可以说是驼背,两眼肿胀,脸色疲惫。"托洛茨基为在礼拜天来打扰他而表示歉意。"'说下去,说下去……,'他外表严厉,但声调却不是要把人拒之门外,而是在鼓励。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露出智慧。"当托洛茨基向他讲述了楼梯上的奇遇以后,阿德勒思考起来:"这能是谁呢?高个的?大喊大叫?这大概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是吗?这准是奥斯特利茨。您别介意。如果您从俄国带来了革命的消息,可以深夜来按我的门铃。"寥寥数行,立刻使我们认识到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另一种素质,这位前辈先驱领袖的洞察力和智慧;后来他却逐渐转变成为党内军士长手中光荣的俘虏。全书中有着上百个如此简明扼要但却富于表现力的小故事和对话。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65页。

当托洛茨基转而讲述他一生中的至高点——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他的叙述准确而又极端节制，并且常常轻描淡写。这里举一个例子。在1917年7月那些饥馑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反动势力暂时得胜，布尔什维主义走入低潮，被诬蔑为德国间谍的列宁也被迫隐藏起来，对在这些日子里的人民的情绪他是这样描绘的。托洛茨基将我们带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食堂：

> 我却发现格拉福夫经常眼望着别处，悄悄塞给我一杯最热的茶、最好的夹肉面包。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不想让上司发现。我开始仔细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斯莫尔尼宫的所有下层人员：看门的，送信的和警卫员，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但目前也仅是一半而已。[①]

孩子的议论，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宁那"脏兮兮的衬衫领"的细节，如蚁巢一般挤满了人的斯莫尔尼宫的长长的、昏暗的走廊，在殊死决战进行到白热化关头发生的一件可笑的事和紧张的对话——托洛茨基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细节来传达时代精神的。托洛茨基的艺术才华表现在他通过迂回的手法来接近那些在自传作品中难于从正面描绘的，用响亮、谥美之词也不可名状其宏大的事件。

关于《我的生平》还有一种说法，说其中表现了托洛茨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吹自擂"。然而，仅就其定义而言，任何自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这一批评等于是建议托洛茨基不要写自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6－37页。

传。托洛茨基有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良心谴责,在他为书名而沉思的时候,它折磨过他。托洛茨基抱歉地说:"如果我在其他情况下写这些回忆(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我是根本不会写的),将难以转达我目前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许多东西。"然而他被迫采用相应措施以反对斯大林派伪造历史的狂潮。这股浊流已经淹没了他所经历的全部岁月。"我的朋友们有些入狱,有些被流放。我不得不讲述自己在其他情况下不愿讲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事情不仅关系到重要的历史真相问题,还关系到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问题。"他正处在被告席上,受到各种可能有的和莫须有的罪名的指控,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向法庭提供一份有关自己全部活动的完整报告。可人们却在对他大喊,说他关注的首先是他自己。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丝毫没有公然表露出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植根于他的艺术家天性中的品质是在革命前的岁月里培养起来的,那时托洛茨基在走着自己的路,既非布尔什维克,也非孟什维克;是斯大林发动的攻击迫使托洛茨基在自卫中采取紧张的个人防卫,是斯大林的攻击突出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但有关托洛茨基的自吹自擂的指责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成立,即如果他的自传或有关他的任何传记对其一生的描绘比其实际情况更富于戏剧性。由于托洛茨基在写作《我的生平》时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命运的悲剧性,因此,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他自吹自擂的程度还不够。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说什么托洛茨基夸大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无论是在《我的生平》还是在《俄国革命史》中,主人公都不是他托洛茨基自己,而是列宁,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列宁的身影之后。

还有人批评《我的生平》缺乏自我分析,说作者没有展现自己的潜意识世界。托洛茨基当然没有做"内心独白",也没有讲述自己的理想或情结,而且在性的问题上,他也遵循了一种几乎是清教

徒式的宗教观。这本书毕竟是一本政治自传，它是最广义的政治书籍。尽管如此，作者对心理分析的合理内核是尊重的，这表现在：他描述了童年生活，其中没有忘记为心理分析学家提供诸如童年生活的经验、“遇险”、玩具一类可能需要的材料。（叙述以这样一句话开始：“有时我觉得，我记得我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情景。”）他捎带着解释了自己对弗洛伊德自我分析如此慎重的原因。他在前言中写道：“记忆……的私心最重。它常常把从虚荣心角度看对监督它的意识不利的情节遗忘或推入阴暗角落，这是心理分析批评的工作了。这种批评有时机智敏锐，颇有教益，但更多的是任性和胡闹。”托洛茨基曾经系统深入地研究过心理分析问题，所以深知这种方法的缺陷。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对自己的潜意识世界进行任性和胡闹的猜测。但他却为自己画出了一幅就完整性和人情味儿而言非常出色的自画像。

《我的生平》作为一本政治论著未能达到它的直接目标。它未能使共产主义阵营的读者产生印象。而他这本书首先是写给他们看的。对于普通党员来说，仅仅浏览一下这本书也会构成罪过。所以，他们根本不读这本书。读过自传的少数人或是感觉受了侮辱，或是义愤填膺。这些人中有的是赞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因而此书在他们眼里仅仅证实了斯大林诋毁托洛茨基有个人野心的话是正确的而已。有人看到一个革命领导人居然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心里十分不快。“瞧，托洛茨基干脆是个自我欣赏的自恋狂”——这是此书所遇到的非常典型的评论。因此，共产党员忽略了托洛茨基为他们提供的这份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他的革命思想、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阐释，否则，他们会从中获益匪浅。从另一方面说，此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却广为流传，人们盛赞此书在文学上的优点，但在此情况下，此书的社会意义却完全消失了。“我的痛苦与他们格格不入，我的痛苦不会使他们的心灵震颤……”，

托洛茨基也许会这样说。

※ ※ ※ ※ ※

就规模、叙述力度和革命思想表述的完整性而言,《俄国革命史》堪称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这部叙述这场革命的著作出自其主要人物之一的笔下,就此而言,它在世界文库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俄国发展的特点》一章中,托洛茨基将我们带到了1917年那个大变革的舞台上。他在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了当时的各种事件。我们马上可以认出,这一章是其写于1906年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早期论文的更丰富、更成熟的版本。[①]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俄国刚刚进入20世纪,它虽然没有受过中世纪的震撼,没有经历过基督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但却具有了已在其古老生活中扎下了根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因素。被迫在西方经济和军事压力下发展的俄国无法走完西欧进步的"典型周期"的所有阶段。"野蛮人抛弃了弓箭,抓起了火枪,却并未走过过去将这两种武器分隔开来的那条道路"。现代俄国是无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从事自身改革或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落后本身迫使它在政治上急剧地向西欧已达到的水平靠拢,并超越它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摆脱束缚自身的半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组织严密,最终得到了骚动的农民的支持,因而能够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走上前台。工人阶级不会仅仅满足于搞一次导致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他应当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因此,在"组合发展法则"的作用下,极端落后具有与极端进步结合的倾向,这就导致了1917年的爆炸性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六章。

事件。

"组合发展法则"还可以用以解释俄国社会结构的内部压力。但托洛茨基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局势因素,它本身不会是导致革命事变的原因。在与波克罗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论战时,托洛茨基指出,无论是在 1917 年还是在此前的 10 年中,俄国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动。战争削弱并暴露了这一结构,却并未根本改变它。[①] 总的说来,1917 年的俄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 1912 至 1914 年间,甚至和 1905 至 1907 年间的俄国一样。那么,导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在这两次革命之间的革命涨潮和退潮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回答说:是群众的心理的变化。如果说社会结构是一个恒定因素的话,那么,群众的情绪就是一个决定着事件的涨与落、节奏和方向的可变因素。"革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特点,那就是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当群众走上街头以前,革命已经存在于他们的神经中了。"因此,《俄国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研究群众革命心理的书。托洛茨基在考察了"恒定"和"可变"因素的相互关系之后,表明革命不仅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制度早已走向衰落、且的的确确已在呼吁上苍将其推翻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数百万人第一次听到了这声"呼叫"时就意识到它的存在。在社会结构中,革命早在 1917 年以前就成熟了。而在群众的头脑中,革命只是在 1917 年才成熟的。因此,无论这有多么悖谬,革命最深刻的原因不在于人类思维的活动性,而在于人类所固有的保守性: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在智力方面业已落后于时代而想立即纠正既成的事态之时,他们才会作为一个群体而奋起。《俄国革命史》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都不会由于旧制度的衰亡而自动产生。整整

① 《俄国革命史》第 1 卷前言,第 2、3 卷导言。

好几代人可以生活在业已走向衰落的制度下而不自觉。但是,一旦他们处于某种诸如战争或经济危机这样的灾难的压力之下,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产生绝望、希望和活力的巨大爆炸。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洞悉"数百万人的"神经"和头脑,以便感受和传达摧毁现存制度的强大推动力。

仅为重构一个历史事实就钻进浩如烟海的文件中的学院派学究也许会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洞悉"数百万人的"神经"。托洛茨基也理解这件事的难度。群众意识的展示是零星分散的,它能引导历史学家走向主观武断的理论和错误的直觉。但托洛茨基指出,只要采用一些严格客观的范畴,一个历史学家仍有能力在其对群众意识的观念中有效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历史学家应当坚定不移地以事件的内在含义为准绳。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而且应当检验他所看到的群众意识的运动是否与自身相符,每一个阶段是否一定由前一个阶段发展而来,其后的阶段是否确实是由它导致的。他还应该进一步考察群众意识的运动是否与事件的运动相符:人民的情绪是否在运动中得到了反映,还有,事件本身是否也反映了这些情绪?如果有人争辩说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将是模糊和主观的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即以实践活动为最终标准。他指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所做的。依据分析和观察,他们构想了有关群众情绪的一些假设。他们所有的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以这些"猜测"为依据;革命的进程证明,尽管也有过一些麻烦和失误,它们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如果说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革命家尚能对百万人的政治热情和思想形成基本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在事件业已完成之后,一个历史学家没有任何理由达不到同样的结果。

托洛茨基对群众运动的描写,其风格与爱森斯坦(Эйзен-

штейн)执导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的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从人群中撷取个别几个人,把他们放在情绪激昂或淡漠消沉的关头予以表现,让他们有机会用话语或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尔后再一次表现热血沸腾的广大人群,他们或为情感的浪潮所激励,或正在投入行动,于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个人的话语或手势是群众情绪或行动的先声。当群众大声说出他们的思考时,托洛茨基具有一种善于倾听他们心声的特殊的才能,并且能让我们也有机会聆听到群众的呼声。在观念和形象方面,托洛茨基常常从一般到具体,然后再从具体到一般,在他笔下两者间的过渡总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在此又一次能使我们想起对托洛茨基与卡莱尔所作的比较。但这种比较与其说突出了相似性,倒不如说是突出了对比。在这二人的历史著作中,相当一部分形象取决于群众场面。两人都能使我们感受到起义人民的自发性力量,使我们好像看到一场山崩。但是,如果说在卡莱尔笔下推动人群的仅仅是情绪的话,那么托洛茨基笔下的人群却会思考和思想。他们是自然之子,但同时又是人。卡莱尔笔下的群众裹着一层华而不实的神秘主义的烟雾,它暗示法国的革命人民是上帝报复统治阶级罪恶的盲目的武器。卡莱尔笔下的群众既可爱又可憎。只有在作者自己也慷慨激昂起来、确实像人发烧说胡话时,卡莱尔才能“洞悉神经”。托洛茨基以同样的想象力描写了群众场面,但他的描写具有一种水晶般的透明。他使我们感到:人们当时就是这样创造着历史:既遵循“历史的规律”,又有自觉的坚定行动。他为这样的人而自豪,尽管他们可能目不识丁、粗直憨愚。他想让我们也为这些人而自豪。对他来说,革命是短暂的,但又是意味深长的事件,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终于赢得了发言权。在他看来,这样的瞬间足以补偿世世代代所受的压迫。他带着怀旧之情追述革命,这就使其再现变得栩栩如生。

然而,托洛茨基却并未过高估计群众的作用。他并未像法国革命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家克鲁泡特金那样把群众与党和领袖对立起来,后者总是力求证明,革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民群众行动的结果,而革命的每一次失败都是政客的阴谋和"政治手腕"的结果。托洛茨基虽也认为群众是推动变革的动力,但必须把群众集合起来加以指导,而只有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起指导作用的组织,群众的力量会像未能进入活塞的蒸汽一样烟消云散。但活塞不是靠事件推动的,而是靠蒸汽。"托洛茨基从1917年两次革命中得出的强烈对比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的。二月革命基本上是群众自己搞的,而群众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迫使沙皇逊位,并促成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但此后却被消耗殆尽,以致未能解决任何最根本的问题,结果使得利沃夫公爵当上了政府首脑。而十月革命则主要是把群众力量集中起来并加以指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杰作。

在托洛茨基的阐述中,阶级与党的关系远较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机械性比较更复杂。托洛茨基描述了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微妙组合和交织。指导党行动的首先是特定的阶级利益。然而,阶级与党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模棱两可,而在革命时代则更是极不稳定。尽管党的行为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与特定阶级的关系,但它却可以从其他潜在的敌对阶级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或者,它只能代表社会环境发展中的某一阶段,这是因为其领袖的思想只适应于这一个阶段。而此时的社会环境早已把该阶段抛在了身后。或者,党还可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而提出该阶级还不准备接受的纲领,而且事件也在迫使他们接受它,等等,等等。在革命进程中,传统的政治平衡往往被打破,而新的联盟便会迅即涌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可以说是一部研究这些过程的原动力的重要著作。

※ ※ ※ ※ ※

我们已经指出过，托洛茨基并不隐瞒他对十月革命的敌人心怀仇恨。确切地说，他像一个检察官将敌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并继在彼得格勒大街上那次以后第二次让敌人遭受失败。按照惯例，这一角色通常不是由历史学家来扮演的。但在历史中亦如在法学中一样常会出现下述情况，检察官在许多场合之下都可以对案件的实质作出最完整的陈述：一、他所指控被告的罪行确实是被告所犯下的；二、检察官并未夸大被告的罪行；三、检察官了解被告的动机，说明其所处的环境，并恰当地考虑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况；四、检察官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他的每一项指控，而拥有充分自由反驳指控的被告不但不能提出反诉，而且被告席上被告相互之间的大声争吵只能证实检察官的正确。托洛茨基正是这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他的《俄国革命史》问世之时以及问世以后的许多年中，多数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领导人——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阿布拉莫维奇等人还健在，并在国外作为侨民继续活动。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在托洛茨基编织出的这一张由事实构成的网络中有什么实质性的弱点。除米留可夫外，任何人都不曾认真地作过某种相反的陈述。[1] 由于在苏联至今没有一部值得冠以此名的革命史出版，因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在十月革命5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唯一一部翔实可靠的

① 但米留可夫本人曾多次否认他本人的著作从历史观点看有什么不足。参见米留可夫的《俄国第二次革命史》的前言。克伦斯基用以反驳托洛茨基的主要的、或不如说唯一的事实就是重弹以往指控的老调，他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都是从德国领取津贴的间谍。克伦斯基：《自由的苦难》第285页。

革命史;这绝非偶然。除米留科夫外,其他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于自己本身的重重矛盾和错误之中不能自拔,所以没有能力对这些事件进行一番多少有些条理的叙述。他们拒绝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返昔日那个决定命运的战场,因为那里的一切,甚至每一寸土地都能令他们想起他们的耻辱。而托洛茨基却怀着纯洁的良心,高昂着头颅重访昔日的战场。

尽管如此,在托洛茨基的史书中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恶棍。他一般不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定性为行贿受贿、卑鄙龌龊的人。他并不否认他们个人的优点和人格。但他认为,他们仍注定要灭亡,那是因为他们捍卫了不可能捍卫的东西;是因为他们蹒跚在事件之后,仿佛是变幻不定的局势将他们抬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在智力和道义方面他们并未达到那一高度;是因为他们经常言行不一。被托洛茨基所揭露的卑鄙和凶残植根于古老的社会制度而非某个个人。但他那历史决定论观点使他能公正地对待对手,所以他不仅不居高临下,有时甚至还宽宏大量。当他描绘当权的敌人时,他展现他们的自命不凡、自吹自擂,给他们以致命的嘲讽,用雷霆万钧的愤怒将其击溃。然而,托洛茨基也常常会驻足留步,给对手以往的成就、其天性的完整、甚至英雄主义精神以应有的评价,并为本应享有更好命运的人的毁灭而痛心。当他描写已被打倒的敌人时,他总要强调指出所发生的一切是必然的,并为历史的公正审判而欣喜。但有时候他抑制住胜利的喜悦,向那已被打倒的牺牲品投去同情的、往往也是最后的一瞥。

在描绘革命的敌人时,他从未使用比敌人相互描绘时所使用的更黑的油彩。托洛茨基往往不把敌人描绘得那么阴险,因为他剖析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竞争,给蕴含在他们彼此之间粗暴攻讦中的夸张打了折扣。他对待沙皇和皇后的态度并不比对维特、米留可夫、邓尼金及正统的保皇党们更无情。当自由派批评家断

言只有沙皇适时作出让步才能防止灾难时，他甚至“保卫”沙皇而反对自由派的攻击。托洛茨基证实，尼古拉二世已经作了许多让步，他不能再退了，因为这将与他的自我保护的利益相抵牾。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托洛茨基笔下的沙皇也是“历史的囚徒”。“尼古拉二世从其祖先那里不仅继承了一个巨大的帝国，而且也继承了革命。他的祖先未曾给他遗留下来任何一种足以使他有可能统治一个帝国、一个省、甚至一个县的品质。当历史洪流的浪头一个比一个更近地朝他宫廷的大门涌来之时，最后一位罗曼诺夫却只会以无言的冷漠与之抗衡。”[①] 托洛茨基比较了注定要灭亡的3个君主——尼古拉二世、路易十六与查理一世之间和那几位王后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尼古拉的主要特点不是残酷，尽管他能做出残酷的事；也不是愚蠢，而是“缺乏内在力量、神经系统软弱和精神资源贫乏”。“无论是尼古拉二世还是路易十六，都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无力担负肩上的重担，同时却又不愿放弃哪怕是部分自己无力使用的权力”。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带着他们戴在头上的王冠”走向深渊。但托洛茨基指出，“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劫数难逃的深渊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托洛茨基表明，在命运攸关的时刻，当宿命主宰着这3位君主的时候，他们之间是那么相似，所以其间本有的差异似乎也化为乌有。因为“人们对胳肢的反应各不同，但对烧红的烙铁的灼烫的反应却是完全一样的”。至于皇后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这两位妇人都“精明强干，但头脑空虚”，而且两人“即使在已陷入灭顶之灾时仍看到彩虹般的希望”。[②]

托洛茨基还描绘了诸多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71页。

② 同上，第108－118页

党人的肖像。如米留可夫这位"历史学家、几部重要的学院派论著的作者,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他丝毫未曾沾染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半贵族半知识分子式的半吊子政治家的习气。而这是大多数俄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所固有的毛病。米留可夫对待自己的职业非常严肃,这一点使他卓尔不群。"俄国资产阶级并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加任何粉饰地、平淡清醒地表述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在米留可夫这面镜子里,俄国资产阶级照见了自己的尊容,于是它明白了它是多么乏味、自私和胆怯,就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它开始抱怨起这面镜子来"。罗将柯(Родзянко)曾是沙皇的管家,后来成了二月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一个怪诞的人物:"在从阴谋家、暴乱分子和专制暴君手中窃取到权力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他一脸恐慌万状的表情……蹑手蹑脚地围绕着革命的大火打转,被烟火呛得直咳嗽,他说:'就让一切都烧成木炭好了,到那时候我们再来煮点儿什么。'"[①]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斯大林时期,甚至在后斯大林时期文学中往往被描写成毫无个性的反革命幽灵,而托洛茨基笔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与此绝少共同之处。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既属于某一类型,又具有个性特征。如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齐赫泽的出色速写:"他竭力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奉献自己的一切,经常借愉快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缺乏自信。他身上带有无法去掉的土头土脑的外省习气的烙印……而且是多山的格鲁吉亚——俄国革命的纪龙德三角湾的习气。"来自纪龙德三角湾的最杰出的活动家策列铁里,在西伯利亚服了多年苦役,

但仍然是南部法国类型的激进分子。在通常的议会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97－198页。

> 陈规条件下，他如鱼得水，但他却不幸生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并在年轻时饮下了一口马克思主义而毒害了自己。在所有孟什维克分子当中，策列铁里至少……具有最开阔的视野和想要推行一种始终一贯的政策的最强烈的愿望。由于这个原因，在破坏二月体制这个问题上，他提供的帮助要多于其他任何人。齐赫泽对策列铁里俯首贴耳，但有时，后者那种使昨日的苦役犯革命者同保守的资产阶级代表握手言欢的死教条和固执常常使得他惊恐万状。[1]

一度曾是托洛茨基学生的斯科别列夫看起来像是一个肄业的学生"在业余演出中扮演着国务活动家的角色"。

至于李伯尔：

> 如果说乐队中演奏第一小提琴的人……是策列铁里，那么，睁着充血的眼睛、使出全部肺部的力量尖声刺耳地吹奏黑管的人必是李伯尔无疑。这位孟什维克属于崩得，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非常忠诚，热情洋溢，能善辩，但鼠目寸光，他狂热地想要表现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护国主义者和意志坚定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极端仇恨布尔什维克。

再比如切尔诺夫，他以前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现在担任克伦斯基政府的部长：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43页。

这是一个博览群书但却没有教养的人,知识渊博,但不成体系。切尔诺夫身边常备有一大套合适的引文,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俘虏了俄国青年的想象力,但却并未教会他们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口若悬河的领袖无法解答的:他在指导谁,并把他们引导到哪儿去?切尔诺夫那些粉饰了道德说教和美丽诗句的折衷主义格言只能暂时网罗一批乌合之众,但一到危急关头,这些人就会各奔东西。所以,切尔诺夫居然会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建党方法与列宁的"宗派主义"对立起来,这点不足为奇。……他决定避免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也不参与投票,这成了他政治生活的方式。彼此仇视的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尽管完全不同,但此二人都与革命前萎靡不振的旧俄国社会和无血性而又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渴望教育人民群众、充当人民的保护者和施惠者,却根本不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不善于理解人民和向人民学习。[1]

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有别于其他所有党派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既善于教育群众,也善于"向群众学习"。但他们在向人民学习、挺身担当自己的任务时并非没有勉强和抵触。当托洛茨基以对革命和党的赞美来结束此书时,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题:即布尔什维克还将"向群众学习"多久?他为我们所展示的党绝非是一支"钢铁队伍",按照官方传说,这支队伍没有人的弱点,它坚定不移地朝着预定目标迈进。问题并不是说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不具有钢铁般的决心和勇敢,而是说他们拥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44-246页。

有的这类品质的多寡与人的性格相应以及它们在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分布极不平衡。我们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全都正处于他们最艰苦的日子中，他们处境孤立，横遭诽谤，怀抱着希望继续进行斗争。就其对事业忘我的忠诚而言，在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当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比。尽管托洛茨基记述了他们的伟大目标和性格，但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那些领袖近视而又胆怯，而普通党员则磕磕绊绊地在黑暗中摸索。人们正是为此指责托洛茨基，说他讽刺了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什么比这一结论离事实更远的了。他的描述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展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弱点：犹疑和动摇。但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和纷争歧见会减弱或被完全克服，怀疑让位于信心。党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必须与敌人斗争，而且还必须与自己斗争，这种情况非但不会抹煞它的成就，而且恰恰相反，会使得成就更大。甚至就连对那些曾对十月革命的大步飞跃感到惊恐万状的人，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加里宁及其他人，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他们在政治上的诚实。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叙述给他们带来了羞辱，那也只是因为这些人在革命以后竭力想以一支钢铁队伍的从不犯错的领袖形象而出场的缘故。

在《俄国革命史》中详细讲述了布尔什维主义在革命的那一年中所发生的两次重大的“内部危机”。在第一次危机期间，刚从瑞士回国的列宁发表了他的《四月提纲》，从政治上“武装了党”，以便发动反对二月政权的战争。第二次危机期恰好在革命前夜，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起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们相互对垒。在对这两次危机的描写中，叙述的中心限于领袖圈，但这些场面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下述事件同样深刻：波澜壮阔、雄伟壮丽的二月起义、十月革命的画面、以及最阴暗的过渡期——七月事件，当时运动处于最低潮。在这两次危机发生时，我们都能感觉到革命的

命运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为数不多的几位委员:他们的投票将决定群众的力量将付诸东流还是走向胜利。群众与领袖的关系问题被十分尖锐的提了出来,而关注的重心立刻就集中在了唯一的领袖——列宁身上。

无论是在4月还是10月,列宁几乎都是孤立的。就连他的学生也不理解他。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差点儿没把列宁坚决要求他们准备起义的那封信给烧了。列宁曾下定决心与中央委员们"开战",而且如果必要,他将无视党的纪律,直接向普通党员呼吁。托洛茨基解释说:"列宁不信任一个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列宁的不信任完全是正确的。"[①] 尽管如此,每次危机,列宁最终还是说服全党相信其战略的英明,并使它投入战斗。托洛茨基表明,列宁的洞察力、现实精神和坚定意志是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就其重要性而言,与数百万工人士兵的自发斗争同样重要。如果把群众的力量比做"蒸汽",把布尔什维克党比作"蒸汽机",那么列宁就是司机。

托洛茨基因此着手研究历史中的个人这一古老的课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显然微不足道。他对列宁的活动记述,其真实性是无可指摘的。可以说,在各个阶段上,在每一件事上,列宁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都与托洛茨基的叙述一致。托洛茨基同样也不把列宁说成是事变的唯一创造者。托洛茨基告诉我们:"列宁不是从外部来反对党,他本人就是党的最完整的体现。"他不止一次证实,列宁只不过是把激动着普通党员的思想和情绪活动转变成为明确的公式并因此而最终获胜。领袖与群众可谓行动一致、配合默契。在列宁与他的党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即使在列宁与中央委员会有矛盾时也是这样。正如布尔什维主义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131页。

走上历史舞台不是偶然的那样，列宁的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列宁是“全部过去时代的产物……并深深地植根于过去之中”。列宁不是“革命进程的缔造者”，而是一个环节，一个客观历史规律链中的“重大的环节”。[①]

但在把列宁的作用定义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后，托洛茨基接着又提醒说，如没有这个“环节”，整个“链条”便会中断。他问道，如果1917年4月列宁没有回到俄国，那会怎样呢？“是否仍能满怀信心地断言即使没有他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呢？我们没有勇气来断定这一点……。”托洛茨基又补充说，完全有可能的是，“迷失方向和四分五裂的党可能错过革命的机会，把它延误数年之久”。如果说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还只是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他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则是畅所欲言。在从阿拉木图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托洛茨基断言：“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列宁没有在1917年4月回到彼得格勒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在写于法国的日记中，他的说法更加绝对：“1917年如果我没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不过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那里有列宁在领导**。如果我和列宁当时都不在彼得格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不会允许举行起义。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②] 如果说列宁仍然不能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不是在虚无中完成了革命。革命需要有社会结构的衰落，群众的力量——即“蒸汽”，布尔什维克党——即蒸汽机（由列宁设计并缔造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能发挥其作用。托洛茨基告诉我们，但是即便所有这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341－342页。

②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3－54页。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写于1928年，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些因素都已具备而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也会错过革命的机会,使它延误多年"。延误多少年?五六年还是三四十年?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假如没有列宁,俄国也许会继续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可能会生活在复辟的沙皇制度之中。而且时间可能还会很长,长得无法确定。至少本世纪的世界历史将会重写。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使人吃惊的结论。这一结论无疑带有经院哲学的色彩,而一个以经验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学家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无法把列宁排除在行动场以外,再搞一次革命,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说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被进一步地考察了的话,那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从这个角度看一看该书中的主要人物。在此,历史学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作为已遭到失败的反对派领袖的托洛茨基的经验和情绪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大可怀疑的是,托洛茨基在此之前未必会表达与马克思主义理性传统如此背道而驰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著名的文章《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传统。如同普列汉诺夫的其他理论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同样也对俄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通过一对经典对立范畴——必然性与自由来考察这一问题的。他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他同意卡莱尔的观点,即"伟人是开创者"。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名称。伟人就是开创者。因为他看得比别人远,而且他的期望也比别人强。伟大领袖在历史中的"巨大意义"和"极大的力量"即来源于此。但普列汉诺夫坚持说,领袖不过是历史必然性手中的武器。当必然性感到需要伟人时,它会创造出自己的武器。因此,不要以为任何伟人都是"不可取代的"。任何一种相当深远广阔的历史倾向都不仅仅通过某一个人,而且还通过一定数量的人来体现。在考察法国革命时,普列汉诺夫提

出了一个与托洛茨基所提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或拿破仑，事件进程会怎样呢？

> 我们假定他（罗伯斯庇尔）在党内是一种完全不可取代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他并不是党的唯一的力量。假如他在1793年1月间偶然被砖头给砸死了，那么他的位置当然会被其他什么人占据，尽管占据他位置的这个人在所有方面都远远不如他。事件仍然还是会沿着罗伯斯庇尔在世时的那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吉伦特党徒们也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罗伯斯庇尔的党丧失政权的时间也许会略早一些……罗伯斯庇尔的党也仍会垮台……在时间上，也许会略早，也许会略晚，但垮台乃是不可避免的……。"[①]

托洛茨基也假设说，假如1917年3月列宁被砖头砸死了，那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那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都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一块砖头的坠落也许会将巨大的历史洪流引入不同的渠道。对个人作用的考察由此转变成为一场关于历史中的偶然性问题的争论，而这场争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普列汉诺夫在结束自己的论证时指出："事件进程中的偶然性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嗣后的政治生活……"，但"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终究是不会与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具有影响力的个人由于其思维和性格独有的特征可以改变**事件的个性特征及其若干具体结果**，但却无法彻底改变事件的总倾向，因为它取决于其他力量"。托洛茨基则认为，列宁个人不仅改变了"事件的个性特征"，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5页。

而且也改变了事件的总倾向,因为,如果没有列宁,构成这一总倾向以及有助于这一总倾向的各种社会力量就不起作用了。这一结论与托洛茨基本人的世界观和许多其他理论不尽相符。如果说一切时代的伟大革命没有某一个具体的领袖便不可能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对这位领袖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也不是荒谬的。而这样一来,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所有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以及进步思想界对它的义愤都会是毫无意义的了。

显然,托洛茨基在此堕人了普列汉诺夫在与一些历史学家的论战中所说的"视错觉"的掌握之中。这些历史学家坚决认为拿破仑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其他任何人即便占据了他的位置也不会带来这样的或与此相似的结果。"错觉"在于这一事实,即领袖似乎是不可取代的,因为领袖只要一占据领袖地位,便会防止他人问鼎。

> 拿破仑一旦以拯救社会秩序的"利剑"的角色出场,便以此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扮演这一角色的可能,尽管在这些将军们当中有些人扮演这一角色也许会和他一样或相差无几。既然对一个精力旺盛的军人统治者的社会需求业已满足,那么社会组织便会切断所有其他军事天才们想要夺取军人统治者位置的道路。……拿破仑个人的力量以极其夸大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将把他推至显著地位和支持他的所有社会力量都归到了他的名下。这种力量看起来似乎是唯一的,因为其他与之相似的力量都未能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当人们问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样时,我们的想象力会发生混乱,我们会觉得,如果没有拿破仑,以拿破仑的力量和影响为基础

的整个社会运动便不会发生。[①]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我们看来，列宁对事件的影响也被极度夸大了，因为列宁只要一占据领袖地位，便会防止他人问鼎。我们当然不能说，如果列宁不曾在其位的话，谁又能占据他的位置。托洛茨基自己就可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有意思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乌里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这样一些著名革命家在1917年夏季讨论和比较过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优点时都同意托洛茨基在当时已经胜过了列宁这种说法。说这话的当时，列宁还在位。尽管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十月起义事实上是根据托洛茨基而非列宁的计划完成的。如果当时既没有列宁又没有托洛茨基，那么也会推出某个别的什么人来的。显然，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并不曾有过一个与他们并驾齐驱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此二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历史上，伟大领袖和军事首脑职位的空缺数额的确有限得很，如果空位被占，潜在的候选人则没有任何机会达到其“自我实现”的目的。难道由此就可以引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吗？较次一些的领导人是否也能发挥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作用呢？其中唯一的区别恐怕仅仅在于，较次一些的人不是“让命运来指导”他们，而是被命运“拖着自己的衣领走”。

毫无疑问，差不多每位伟大领袖或独裁者在其生前都是无法取代的，在他们死后都会有什么人来占据其位置。而这个人在他的同事看来，往往是一个最不可能被选中的、命定只配扮演二流角色乃至三流角色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当许多人先看到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继承者、继而看到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时都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第327页。

会惊讶不已的原因。这种惊奇感乃是有关不可替代的巨人的视错觉的副产品。托洛茨基断言,只有列宁的天才能胜任俄国革命的任务,他常说,在其他国家中,要使革命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像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党和像列宁这样的领袖。没有任何必要否认列宁的卓越才华和坚定性格,否认布尔什维克由列宁来领导乃是它的运气。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难道说中国和南斯拉夫革命在一个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有很大区别的党的领导下,在一些水平低一些、甚至低好多的领袖的领导之下没有取胜吗? 在每一种情况下,革命倾向总是能从手头现有的人材资源中遴选或是创建自己的机构。如果断言十月革命即使没有列宁也会发生不无根据的话,那么,相反论断的根据就要小得多:1917年年初苏黎世屋顶上落下的那块砖头可能会改变本世纪人类的命运。

在此,我们要补充说明一点,即这后一种观点,与托洛茨基有关革命的基本哲学和观念并不十分吻合。因此托洛茨基无法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观点。例如,在几年以后所写的《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断言:

> 领袖的品质绝非是无关紧要的……但这却不是唯一一个因素,而且归根结底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布尔什维克的获胜……不是由于其领袖个人的优越性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法国大革命中)米拉波、布里索、罗伯斯庇尔、巴拉斯、波拿巴相继当政的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其力量远比历史主角本人身上的特殊特征更大。[①]

---

① 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第87、88页。有趣的是,西德尼·胡克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时,根据托洛茨基在列宁评价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这一特点得

正如上文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托洛茨基在列宁问题上的“视错觉”所阐明的不是列宁，而是他本人及其在这些年中的心境。他撰写《俄国革命史》这本书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狂热已经开始了。因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对这种崇拜的否定性反应。他以列宁的“不可取代性”为依据反对斯大林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注意到苏联社会的普遍冷漠和无序性，那么这位领袖在那些年中肯定显得是一个比在人民群众政治热情沸腾的1917年重要得多的人物。一方面，斯大林是作为一个独裁者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亦有发挥其某种类似于思想和道义上的独裁者、反对派唯一一位代言人的作用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即便失败了，也会令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凡的人，而且就其重要性而言，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托洛茨基把领袖的巨大身影投射在1917年的荧屏上，并由此得出带有自我保护性的教训：“由列宁的抵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即领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逐渐被遴选出来并由数十年的斗争锻炼出来的，因此，领袖不能被任意更换，把他们机械地排除在斗争之外会给党造成巨大创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会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丧失行动能力。”[①] 托洛茨基在日记中更清晰地表述了这一教训：

> ……我认为我目前从事的工作(领导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和创立第四国际)尽管极不充实并带有局部性，却是

出结论，说十月革命“与其说是全部俄国以往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有史以来所有划时代性格之一的产物”。参见西·胡克：《历史上的英雄》第150－151页。)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342页。这一教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如果说领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那么他们在后来被排斥同样也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

>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它比我在1917年的工作更重要,也比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作以及其他任何工作都更加重要。……我不能说我在1917—1921年间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但我现在的工作的确是"不可取代的"。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儿夸张之处。两个国际的垮台提出了一个这两个国际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个人命运的反复无常迫使我正视这一问题,并赋予我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经验。今天,除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用革命方法来武装新一代的重大使命。……为了保证它的成功,我必须至少不间断地工作5年。①

托洛茨基必须使自己确信,领袖,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30年代中的他本人,都是无法取代的,他就是从这一信念中汲取着支持他独自进行英勇斗争的力量。现在,当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中唯有他一个人出面反对斯大林时,的确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的位置。……但也正是由于托洛茨基是孤立的和无法取代的,才使得他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被徒劳无益地消耗掉了。

我们先不管这段论据中的"对"与"错",继续考察一下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不妨让我们摘录两个同时代人的话。1923年,在反托洛茨基战役即将打响时,卢纳察尔斯基这样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浑身带刺、不能容人和专横的人。只是在他对列宁的态度中(在他们结盟之后)才表现出动人的发自内心的敬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4页。

意。他以真正伟人的谦虚承认列宁的优越……。"[①] 在 30 年代初，克鲁普斯卡娅曾与一位著名的外国非党人士交谈，当时她知道自己的话被偷听并肯定会被汇报给斯大林的。她同样提到托洛茨基的"专横和难以相处的性格"，但补充说："他由衷地爱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他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后，他休克了，两小时后才苏醒过来。"[②] 对列宁的热爱和承认列宁的优越，这在托洛茨基于革命后发表的关于列宁的言论中处处可见。早在1918 年 9 月，在范妮·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以后，托洛茨基曾这样谈及这位受了伤的领袖：

> 自我牺牲、敢做敢为、仇恨压迫——这些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身上一切最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他依靠俄国年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用世界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在政治的天穹上顶天立地地站了起来。这就是列宁——我们这个革命时代中最伟大的人物。……当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的生命受到死神威胁的时刻，我们当中每个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微不足道。[③]

这段话里丝毫也没有恭维讨好的味道。当时的列宁还没有被崇拜所包围，而且托洛茨基此后还不止一次激烈地表达过与他的意见分歧。1920 年，在列宁诞辰 50 周年时，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传记随笔，口气比较节制，文章谈及列宁身上的民族性，说它们体

---

① 卢纳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

② 《卡罗伊回忆录》第 265 页。

③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 211－218。

现了俄罗斯性格中最优秀的方面。[①] 在流亡中,在离开王子群岛以后,托洛茨基开始写作列宁大传,但只写出了前几章。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但他还是部分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20年代初,发表了许多传记随笔。托洛茨基在其中讲述了列宁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时期:1901—1902年和1917—1918年,提供了一幅非常生动的肖像,它充满了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温情。[②]

托洛茨基盛赞列宁目标明确、善于使自己完全服从于伟大的目标,而且还赞扬了列宁的人格,他说,在列宁身上,崇高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严肃认真和富于幽默感、对原则的狂热忠诚和思维的开阔、行动中的毫不留情、狡黠和细腻的感受力、高度的智力和纯朴结合在一起。他表明"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同样也会犯错误,从而打碎了斯大林创造的列宁偶像。但托洛茨基自己却走向列宁,向他脱帽致敬,对他无比景仰,并且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但他没有跪倒在列宁面前。托洛茨基不是在给偶像而是给他所了解的人以应有的评价。托洛茨基即使是在描写列宁的英雄主义性格时也没有把他变为半神似的人物。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与本人一样的平凡形象,而不是在描写一尊庄严肃穆的半身雕像。他虽未用传世之作的风格而仅采用了记者随笔的形式,但却创造了历久弥新的画面。他描述列宁的那些随笔比同时代另外两位伟大作家——高尔基和威尔斯的随笔的艺术感染力更强。他从各个角度关注着列宁:列宁怎样思考问题,怎样立论,怎样走上讲台以及在讲台上的风度,列宁的手势和动作,列宁的笑声和戏弄人的玩笑。我们能看到列宁雷霆般的震怒;看到列宁在采取重大决定的紧要关头是怎样亲切地逗小狗。我们看到列宁如何像一名中学生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205-210页。
② 同上

似地匆匆忙忙地跑过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到政府会议厅去，急于跟他那些人民委员朋友们风趣地开个玩笑。我们总能在这位艺术家的目光中捕捉到热爱“平凡的革命天才”的闪光。

然而，在这位艺术家的眼里还可以看到一种遗憾的表情。托洛茨基和列宁并肩紧密合作了大约只有6年时光。虽然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划时代的6年。而此前的13或14年，他却是在反对列宁的派别斗争中度过的，他对列宁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称列宁是“一个马虎的律师”、“是罗伯斯庇尔的一张令人反感的漫画”、“居心叵测、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俄国落后的利用者”、“败坏俄国工人阶级道德的”，等等。和他的这些诬蔑相比，列宁的答复不但显得颇有分寸，甚至很温和。尽管从1917年以来列宁从未重提此事，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但托洛茨基的恶毒攻击是如此凶猛，不可能不留下创伤。甚至在1917至1923年间，当两人都在同一个最紧密的政治同盟中共事的时候，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也没有个人间的亲密关系，列宁对他有所保留。[①] 托洛茨基竭力想要以自己的“令人感动的尊敬和爱戴”默默地、有分寸地平息此事。在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也许只是半无意识地在自己的论著中继续纠正他侮辱列宁的行为。他承认，在他与列宁决裂的1903年时革命对他来说基本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而在那时，列宁却完全理解革命的现实性。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在“走向列宁”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克服内心的抵触情绪。但当他一旦克服了这种情绪并和列宁联合，他便处于列宁的身影之下，他始终把作为历史学

① 《武装的先知》第三章。当我和娜塔利娅·谢多娃谈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缺乏私人感情时，我推断说，托洛茨基在革命前的那场论战中所表现出的侮辱性质使得这种关系不可能建立，她说她从未这样想过。但她沉吟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也许这就是列宁之所以有点儿矜持审慎的原因。过去的派别斗争就是这样进行的，那是一场野蛮的斗争”。

家的自己留在了那里。他一再故意讲述曾经有过的许多分歧,但他的记忆却不愿回想。他本能地有意缩短他们分手的时间,缓和对立的严重性,满怀喜悦地追溯他们友好的岁月,并竭力把这段时间往后、往前扩展。有时,满怀崇敬的他努力重新体验自己的生平,似乎任何东西都未曾打断他和列宁的一致性。他还想写一本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亲密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终生友谊的书,而这种理想的友谊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未能获得。在列宁逝世11年后,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

> 昨晚……我梦见我在跟列宁谈话。看情形谈话是在客轮的三等舱里进行的。列宁躺在铺位上,而我在他身边,不是站着就是坐着。……他担心地询问我的病情:"您显然是得了神经性疲劳,您必须休息……。"我回答说,我以前总能很快克服疲劳,不过……这一次,情形看来不那么简单。……"既然这样,您可得认真(他着重地强调了这个词)去瞧一瞧医生了(接着说了几位医生的姓名)。"我说我已找许多医生看过了……但我瞥了一眼列宁之后想起来他已经死了。我即刻就想把这个念头从我头脑里赶走……当我讲完我在1926年前往柏林治病的事之后想追加一句:"这事发生在您去世以后",但克制住了自己,只说一句:"这是在您生病以后的事……。"①

梦境和幻想保护着易受伤害的托洛茨基,他在幻想中看到自己处于列宁的友爱和关心的保护之下。

---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30－131页。

※　※　※　※　※

在列宁问题上的"视错觉"是《俄国革命史》中主观思维的唯一一个例证。在所有其他场合下，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描述所有事件的。当然，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才会有他那么深刻的感受，才能感觉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实质、色彩和味道。但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却比作为亲历者和旁观者的自己站得更高。人们关于凯撒所说的一切是不能用于托洛茨基身上的，因为作为作家的凯撒与作为统帅与政治家的凯撒相比则会黯然失色。托洛茨基让自己的论著经受最苛刻的检验，而且他以极其严格的事实来加强自己的叙述。这些事实往往不是从朋友那里，而是从敌人那里拿来的。他从不依赖自己个人的威望，而且把自己当做书中人物的情形也极为罕见。例如，对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一事，他只说了干巴巴一句话，而实际上这事是当时发生的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之一。[1] 此书的缺陷可能在于，如果仅就此书来评价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必然会导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在1917年的《真理报》上，在每种反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在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报告的每一页上，托洛茨基的形象远比在他自己亲手所写的书中显得重要得多。在这样一幅巨大而又生动的历史长卷中，托洛茨基的剪影差不多是全书唯一的一个空白点。

※　※　※　※　※

哈兹利特(Hazlitt)断言，演说天赋和文学才华不可兼得。但托洛茨基却既充分具有演说家的敏锐感受、天生的雄辩和善于理解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47页。

听众的能力,同时又在同等程度上具有持续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不但对转瞬即逝的成功十分淡漠,而且具有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必不可少的"心灵的耐力"。本身也是一位杰出演说家的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托洛茨基"是我们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演说家",而他的文章和著作则仿佛是"冷却下来的言辞"。"……他的演说是文学性的,他在文字工作中也是演说家。"[①] 这种评价非常适合托洛茨基的早期著作。卢纳察尔斯基的这句话是在 1923 年说的,那时,作为一位作家的托洛茨基尚未登上新的高度。在《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中,演说成分严格遵守记述和阐释的需要,其叙述具有一种史诗般的节奏。"言语凝重"虽仍然保留,但仅仅是因为这是任何叙述都在所难免的。

数十年中,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只能以译作的形式为人所阅读。随着他本人的被放逐,连他的文学天才也被放逐到外国语中去了。他找到了几位很有才华而又忠实的译者,如马克斯·伊斯特曼、亚历山德拉·拉姆和莫里斯·巴黎冉宁,他们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介绍给了欧洲和美国的读者。但在译本中却缺乏某种来自于托洛茨基精神和风格的神韵,尽管托洛茨基从欧洲文学传统中汲取了许多东西而成为最具有世界主义的俄国作家。然而,他从母语中汲取的养分又最多,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了俄语的力量、含蓄、色彩和幽默。在自己的那一代人中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俄国散文大师。对于英国人的耳朵来说,托洛茨基的风格听起来似乎有些滞重、"冗长累赘",柯勒律治认为这一缺点就连最优秀的德国或大陆风格也难于幸免。但这只是一个趣味与公认的风格标准的问题。况且,仅在公认的风格标准这点上,不仅不同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就连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代也有发展和变化。慷慨

①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

激昂、铿锵有力、反复强调，这是革命时代特有的一种风格，那时演说家和作家对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所宣传的思想是人们为之进行殊死战斗的思想。当然，在战场上或在革命时期，人们说话的声音是高亢洪亮的。这对于英国城堡中守着宁静壁炉的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但《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并无“冗长累赘”的毛病。在这两本书中，托洛茨基在选择表现手段上体现了古典主义式的精炼。在这里的托洛茨基像一个“客观的语言创造者”，一个在文学这块庄稼地里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他力求在词义色彩和情绪色彩方面达到高度精确。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始终高度警觉地关注着全书的结构及其各部分间的比例，艺术统一感从未离他而去。他是如此巧妙地把自己的理论论据编织进叙述之中，以至一旦想把它们从中抽出来，整幢大厦的比例便会被破坏。他深知何处可以压缩、何处可以扩展故事的底蕴，在这方面能与他媲美的屈指可数。但他在此的做法的确并非出于任性；速度和节奏是事件脉搏的反映。所有这一切都如一股巨流滚滚向前，而这正是有关革命的故事所需要的。在篇幅较长的段落中，他又保持了一种平稳节奏，直至叙事达到高潮点时为止。一旦达到高潮，节奏立刻加快，语调升高，叙述变得波澜壮阔、热情洋溢；赤卫队攻打冬宫，涅瓦河上军舰的汽笛，苏维埃内各党派之间最后一次搏斗，社会秩序的混乱，革命的胜利，都像交响乐一样气势磅礴。[①] 尽管如此，叙事的完整性却并未因而消失。托洛茨基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古典主义的庄严和现代健全的理智融为一体。

在托洛茨基这部著作的每一页上，令人惊奇的各种明喻和暗喻俯拾皆是。它们是他想象力的自发产物，但他从未放弃对它们的监督。他的想象力十分生动，也同样精确、富于理性。他使用暗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301、305、313、315－316、377－378页。

喻都带有一定的目的——加快节奏,说明情境,或是把两三个思想联结得更紧密一些。一个形象既可以被包容在一个短句中,也可以在整个段落进行中慢慢地生成或是在整整一章中如植物一般长成:先是种子破土而出萌发新芽,过几页后植物开花,而到一章的末尾它就开始结果了。这里,不妨让我们以作者在描写二月革命开端的那一节中如何应用暗喻的情形为例来作说明。这里讲的是彼得格勒的2500名工人在狭窄的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时与一队哥萨克——人民起义"永恒的讨伐者"相遇的情形。

> 军官们纵马开路,首先冲进了人群。紧随其后是一队哥萨克打马奔驰而来,马队宽度与街相等。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可那些骑手们却排成一溜儿,像一根长长的带子,小心翼翼地通过军官们给他们开出的那条长廊。"其中有几个人脸上还挂着笑容,"卡尤诺夫回忆说,"有一个哥萨克还好意地冲工人们眨了眨眼。"这眨眼并非没有意思。由于这种友好的、非敌意的保证,工人们敢于跟在哥萨克后面了。那眨眼人很快就有了模仿者。不顾军官们再次努力约束,那些哥萨克在并不公然违反纪律的情况下不是去驱散人群,而是从人群中穿过去。这种情形重复三到四次以后,两边的人开始接近了。个别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们的提问,甚至还有人和工人开始了简短的交谈,纪律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透明外壳,似乎随时都会訇然倒塌。军官们放弃了想要将人群驱散的念头,急忙去把哥萨克和工人分开,他们让哥萨克站成一排、隔断街道、组成一道屏障,不让示威者走进市中心。可就连这也无济于事:完全遵守纪律的哥萨克们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听任工人们从他们的马肚子底下"钻过去"。革命

> 不择其路。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1]

从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钻过来的革命这一概括性形象自然来自这个片断。它揭示了新的形象、乐观主义和局势的不确定性。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至少工人们这次再不会被哥萨克的马蹄所践踏了，尽管他们的地位还有待巩固。但当我们翻过讲述起义声势如何逐渐壮大的20页后，看到这一暗喻又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再次出现，这一次它的作用是提示革命所走过的路程：

> 于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我们自己的第一批装甲车出现了！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下，它们向尚未投降的地区传播着恐怖。革命再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爬行了，它挺直了腰杆，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2]

在同样典型的另外一段描写中，作者热情地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场面，使它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他讲的是业已分崩离析的沙皇军队中的官兵对立情景：

> 盲目的搏斗也有其潮涨潮落。军官们努力去适应它。士兵们再一次赢得了时间，但在这个短暂时期中，在这些和解的日子里，使旧制度下的军队解体的社会仇恨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它越来越频繁地、尖锐地爆发出来。

---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22－123页。

② 同上，第143页。

在莫斯科的一家剧院里召开的一次残废军人会议上,参加者中有军官也有士兵。一个残废士兵在发言中开始侮辱军官,台下响起了抗议声。皮靴声、手杖声和拐杖声。而你们,军官先生,又是如何拳打脚踢地侮辱士兵们的呢? 这些因伤而残废的人像两堵墙一样面对面地站在那里,残废士兵对残废军官,多数对少数,拐杖对拐杖。这一发生在剧院中的可怕的场面是嗣后狂暴凶残的国内战争的一个先兆。

这一严格现实主义的报导洋溢着高度浓缩的激情。传达这一场面只用了6个简短、如刀砍斧凿般的句子。寥寥数语就将我们带进了剧院,我们的耳边好似回响着"皮靴、手杖和拐杖的笃笃敲击声"。用普通的比喻来说明不寻常的场景:拄拐杖的人"像两堵墙一样"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在这言简意赅,初看上去十分简单的短句里包含有多大的悲剧性呀!

托洛茨基的作品充满嘲弄讽刺和幽默。他起而反抗现行制度,不仅出于愤怒和理论信念,而且也出于深知它的荒谬性。即使在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白热化关头,托洛茨基也能发现可使人发笑的喜剧性的事件。人们的愚蠢、无理性的虚伪一次又一次使他惊讶。在《我的生平》中,他回忆1917年年初在纽约当他预言俄国革命将以资产阶级政权和专制主义的被推翻而结束时,一些俄、美社会主义者的反应:

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玩笑。我在一次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证明在俄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上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效果有如往满是自负迟钝的青蛙的

> 池塘里投了块石头一般。英格曼博士不失时机地在会议上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算术的四则运算，连花费5分钟驳斥我的痴人臆语也不值得。[1]

多数情况下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蔑视嘲笑他的对手。他的笑不是善意的，只有他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时，他才会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声，这只是罕见的例外。后来，他太深地投入那些极其严酷的斗争，而他嘲笑人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民来反对它们。他问道："什么？什么？我们居然能让这些自负迟钝的青蛙们走自己的路并替我们进行我们人类的事业？"他的讽刺旨在促使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蔑视这个强权的世界，迫使那些强者们在它的鞭挞下发抖。托洛茨基正如莱辛在那幅有名的海涅肖像上题词所说的的那样，不仅砍下了敌人的脑袋，而且还"恶毒地把头颅从地上拿起来，让人们看一看它是多么空虚"。托洛茨基从未像他和克里俄一起重新造访伟大的十月战场时那样砍掉过如此之多的头颅并展示这些头颅的空虚。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315页。

第四章

“人民公敌”

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我命中注定要参与一些伟大的事变,正是由于有这个原因,现在,我的过去割断了我行动的可能性,我被迫只能安于解释和说明这些事件,并力求预见到它们今后的发展。”[①] 有关自己的这种看法,他一生中大约只说过这一次。因此,他在此所表达的比他本想说的要多一些。根据上下文判断,托洛茨基在此指的是他所遭受到的流放,它使他失去了参与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活动的可能。确实,他的过去还在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割断了”他行动的机会。他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性格所属的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315页。

那个时代与现在——即流放时期是彼此敌对的,因此它们没有产生影响。他的思想和方法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且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的革命前景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的政治面貌是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哺育了俄国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气氛中形成的。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中,尽管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国际革命还是走向衰落。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预期的要强大得多,而当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从政治和道义上解除了工人运动的武装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革命才恢复了进攻的态势,但那时它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落后的东方,其形式和部分内容已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有了很大差异。在东欧,革命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和从外部”引进的,是征服和占领的结果;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不像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从城市扩展到乡村,而是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扎克雷农民起义那样,由农村包围城市,也只是在此之后才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无论如何,托洛茨基被流放的年代是一个历史的喘息时期,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的拥护者脚下的基础訇然倒塌了。在30年代发生的,尤其是在苏联境外发生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事变中,托洛茨基基本上只是一个伟大的局外人。

然而,那个“割断他行动的机会”的过去不允许他无所作为:这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共产国际一度的鼓舞者不安于只当局外人的角色。问题不在于这一角色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两不相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长期以来就曾与“实际”政治隔离,仅从事基础理论工作,满足于“解释和说明”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局外人。不是他们,而是拉萨尔领导了德国第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他们,而是普鲁东和布朗基鼓舞了法

国社会主义。他们对英国工人运动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公设的理解不那么狭隘,因而不强迫自己必须始终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①] 他们在不具备创建自己的党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可能性时就退入思想领域中。而他们写成的论著从历史的而非直接目标的角度看,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在借鉴了社会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后,他们指明了未来行动的方向。至于说托洛茨基,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所面对的形势都不允许他脱离正式的政治活动。他不愿意也无法脱身于日常斗争。托洛茨基被放逐的那一时期不是平平淡淡的政治间歇期,不像1848年以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数十年间那样。那是一个全世界社会决战和灾难的时代,一个像托洛茨基那种类型的人是无法作壁上观的。他无法把他与斯大林之间从未稍稍间断的残酷的决斗中断哪怕是一秒钟。托洛茨基的过去无情

① 1851年2月,当欧洲革命显然已经失败之后,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终于再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假装样子,似乎任何一群坏蛋都是我们的党吗?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那些我们认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而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各委员会的职务等等,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在几本厚书中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用政治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卷第209–211页。

地推动着他行动,如同它无情地割断任何行动的前景一样。

托洛茨基在流放中的全部行为都带有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冲突的性质。他感觉到了这种冲突,但从未清醒地理解和认识它。甚至当他同不可能性发生冲突时,他也认为这是偶然的、暂时的,只不过是由于迫害和人身隔离引起的。这种对更深刻的困难一无所知的情况使他有力量在力量对比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是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未曾遇到的。必要性激励着他去从事正式的政治活动。而他又一次次地后退,这绝非出于他的本意,而是由于不自觉的情绪和本能的反应所决定的,因为他的自觉情绪总是乐观的。他的意志总是在与这些情绪搏斗,从不屈服于它们。然而,这是一场可怕的、绝望的、使他心力交瘁的冲突。

在他生活在王子群岛上的那些年中,人身隔绝状态本身使得这一问题显得还不是那么紧迫。他万分渴望离政治活动的战场更近一点儿,深信这会使他的行动更加奏效。但他只能埋头于撰写历史著作的工作,别无选择。于是他走进——尽管不是全身心地——理论思想的王国,在那里他特别强大。正由于此,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上生活的4年是他在流亡中创造力最强的时期。离开王子群岛加深和加剧了摆在他面前的两难选择。问题不仅在于他立刻会体验到那无法抑制的仇恨的冲击,而遁世和隐居部分地使他免受这一仇恨的侵扰。靠近政治活动战场在他身上唤起了行动的激情,而如今即使在这里也隐藏着他的弱点。他可能已发现,或确切地说是重新发现事件已经与他无关,而他却在努力扭转事件的进程。在他一生中的最后8年中他未能写成一本具有如《俄国革命史》或《我的生平》那样意义深远的巨著,尽管他一刻也未辍笔。在离开王子群岛时,他曾想撰写国内战争史,由于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本史书将会与革命史同样重要,也许会

比后者更加重要。他开始着手写作大部头的列宁传,如他在给马克斯·伊斯特曼和维克多·戈兰茨的信中所说,这本传记应当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而且借此还可以全面地、"建设性地、批判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1] 他的这个计划以及其他一些计划都未能完成。其中部分原因是漂泊和遭迫害使他没有机会集中思考,而主要原因是为正式的政治活动、为创立第四国际的不倦的工作而牺牲了这些著作的写作计划。

因此,托洛茨基的全部生活都挣扎在行动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的冲突之中。现在,在他行将离开王子群岛的时候,他预感到了这一冲突的严峻性质。他情绪高昂地离开那里时充满希望和重大的期待,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悲凉的担忧。

※ ※ ※ ※ ※

1933年7月17日,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马克斯·沙什曼以及3位秘书:范·海耶诺特(Van Heijenoort)、克莱门特(Klement)、萨拉·韦伯(Sara Weber)一起站在低速意大利客轮"保加利亚号"的甲板上驶离王子群岛。在开往马赛的航程中,客轮走了一个星期。对行期予以保密的一切防范措施再次失效。和访问丹麦时一样,托洛茨基上船之后用的是妻子的姓,并尽量不引人注目。但当客轮驶入比雷埃夫斯市时,许多急于打探新闻的当地记者已在那里等着他了。托洛茨基对记者说,他此行完全是私人性质,未来的几个月中,他和妻子将全力治病。他拒绝发表任何政治声明,说:"我们

[1] 托洛茨基致伊斯特曼,1933年11月6日;托洛茨基致戈兰茨,1933年9月23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在给戈兰茨的信中托洛茨基写道,他和阿尔图尔·朗索姆一样,将努力出版此书的英文版。

这次旅行没有任何理由吸引公众的注意,尤其是现在当全世界都在忙于解决无穷无尽的更加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但报界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关注着他,并就他此行的目的大肆投机。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他应斯大林之邀来到法国,以便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讨论他回俄国的条件。这一谣言持续、广泛地流传,以致一家严肃的德国报纸《福斯报》询问是否属实,塔斯社发表官方声明予以辟谣。[①]

旅途中,托洛茨基多数时间呆在客舱里思考着有关第四国际的问题。他写了《再不能和斯大林……之流在同一个"国际"中了》一文〔他还就他的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信徒伊格纳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丰塔玛拉》写了一篇简短而又热烈的书评。[②]〕经过几天在船上的紧张工作,当客轮驶近法国时,剧烈的腰痛迫使他卧床静养。[③]娜塔利娅回忆说:"天气炎热,剧痛折磨着他……使他无法站起来。我们请来了船上的医生。客轮已接近目的地,而我们却担心上不了岸。"使他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的疼痛减轻了一些,此时离马赛还很远,客轮在海上停了下来,法国警察局命令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换乘一艘汽艇,与此同时,他的秘书们却继续其前往马赛的旅程。和秘书分手使托洛茨基感到不快,他本想抗议,却见小汽艇上站着廖瓦和雷蒙·莫利尼耶。由于疼痛而呼吸急促的托洛茨基慢腾腾地登上了汽艇。这事是廖瓦安排的,为的是使托洛茨基

---

① 托洛茨基怀疑这家受纳粹分子控制的《福斯报》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提出这个问题的;斯大林连忙安抚希特勒,说他并不打算与一个建议苏联政府以动员红军来回答希特勒掌权的人和解。参见1933年19月评论《斯大林安抚希特勒》,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档案;《反对派通报》1933年第36-37期。

③ 根据布莱克《医学辞典》的定义(第731页),"腰痛不是背部肌肉病变的结果,而是情绪失调造成的,它的确能使患者无法站立应付生活中的精神负担和紧张。"

抵达时不被人们发现,同时也是为了避开聚集在港口的大群本地记者,毫无疑问,人群中肯定会有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间谍。托洛茨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马赛附近的凯撒城上岸。在那里,法国安全部门的军官交给托洛茨基一份官方文件,该文件宣布取消1916年将托洛茨基"永远"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就此,托洛茨基说:"我已很久没像今天这样满意地接过一份官方文件了。"[1]

这种满意之情很快就被右翼报纸所掀起的反对允许托洛茨基进入法国的喧嚣声浪所破坏。[2] 由于命运的嘲弄,在托洛茨基抵达的当天,7月24日,《人道报》也抗议取消1916年的驱逐令,该命令是应沙皇最后一任大使伊兹沃利斯基伯爵的请求作为对托洛茨基反战活动的惩罚措施而下达的。此外,《人道报》还发表了法共政治局决议,号召全党密切关注托洛茨基的动向。廖瓦的担心和防范完全应验了。托洛茨基一行在几位年轻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陪伴下,从凯撒城动身向波尔多方向前行,随后往北向圣巴莱。莫利尼耶在鲁昂附近的大西洋岸边租了一幢别墅。与此同时,秘书们在马赛上岸,他们卸下了所有图书、档案和托洛茨基的其他行李,办理了托运到巴黎的手续,随即也动身前往巴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暗探们由此断定托洛茨基也去了巴黎,而4年以后在莫斯科审判中,维辛斯基就是以这一推断作为其判定托洛茨基曾在法国从事恐怖活动的指控的核心部分。

托洛茨基和他的陪同者们慢慢腾腾地向鲁昂方向行进。由于托洛茨基的腰痛一直持续不断,所以一行人在吉伦特省一家乡村旅馆住了下来。当夜,廖瓦和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守护在托洛茨基房间的门口。次日中午才抵达圣巴莱。托洛茨基发着高烧,一到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晨报》和《日报》1933年7月24、25、26日。

圣巴莱就躺下了，可一小时后又不得不穿上衣服匆匆忙忙地离开。此时发生了火灾，所有房间里都浓烟滚滚。凉台、花园和篱笆墙都着了火。这第一件意外的事件有某种象征意味：托洛茨基在法国居留期间，他脚底下的土地燃烧起来，迫使他匆匆忙忙地移往另外的地方。但圣巴莱所发生的不幸并非是有人故意干的。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许多森林和房屋都燃起了大火。如果托洛茨基被人认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惹来麻烦，因为他作过保证要隐姓埋名。别墅周围围满了人，为了避免被认出来，托洛茨基匆匆忙忙穿过公路，躲在莫利尼耶停在路边的小汽车里，一直等到妻子、儿子和朋友们把火扑灭。还好，风的变向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当他蛰伏在车里等待时，有几个人朝他走来，他装作一个不大懂法语的美国游客，支吾了几句，当他发现他的口音没有出卖他时，松了口气。次日，当地报纸在报导此事时提到“一对中年美国夫妇”恰好在火灾发生前开车驶入别墅。

从 7 月 25 日到 10 月 1 日，托洛茨基住在圣巴莱，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而且主要是躺在床上度过的。按照娜塔利娅的说法，每次无论有什么事使托洛茨基激动，他的身体状况就会恶化。他患有失眠症，头疼和寒热病也折磨着他。“他不能自己起床到院子里走走或是到海滩散步，把这一‘许诺’拖了一天又一天”。一旦觉得自己稍微好一点儿，他便开始接待来访者，但很快便会感觉疲劳，于是就坐在屋里的沙发或果园里的安乐椅上呆好几个钟头。来访者们回忆说，托洛茨基与人谈话超过 15—20 分钟，便会出虚汗，甚至几乎丧失知觉。因此，其中几位来访者不得不在圣巴莱住上几天，以便能和他进行几次简短的交谈。[1]

---

[1] 参见娜塔丽娅·谢多娃 1937 年 3 月 1 日向杜威委员会呈交的声明和克莱蒙特及“埃尔德”的证词(1937 年 3 月 31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然而,托洛茨基在圣巴莱居留的两个月当中接待的来访者不下50位。他们当中除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外,还有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的夫人珍尼·李(Jenny Lee)和A.C.史密斯(A.C.Smith)(两个都属于不列颠独立工人党);德共前领导人、现领导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雅各布·瓦尔希(Jacob Walcher)和保罗·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曾任共产国际驻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代表,现为荷兰议会议员和独立社会党领导人的马林·斯内夫利特;未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而当时任比利时社会党青年领袖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此人当时非常崇拜托洛茨基;路特·费舍;意大利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卡尔罗·罗塞利(Carlo Rosselli);安德烈·马尔罗等等。

拜访托洛茨基的多数来访者都是为了拟于8月末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政党和团体都对建立新国际的想法有兴趣。托洛茨基虽未能到会,但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还为会议草拟了《提纲》和决议,并且十分关心会议组织方面的详情细节。他希望把许多处于现存国际之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但是,在参加会议的14个小党和团体中,只有3个团体——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两个荷兰小组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联合参加了创建第四国际的活动。而其他所有的党派和组织却被托洛茨基对改良主义和对斯大林主义采取的极端反对派立场吓破了胆,因而裹足不前。甚至就连上述3个团体的赞同也是有条件的。他们实际上并未建立一个国际,而不过是创建了一个初级组织。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对这个开端是满意的,认为这是与当年的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会议同等重要的一件大事。

但他不会不明白,这样一个开端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一点当然使他气馁。有关托洛茨基在这几周中的情绪可以从他与娜塔利娅的通信中看出来,后者在9月初到巴黎去看病。他们之间那些

悲伤而又充满温情的信件表明,当时的托洛茨基是何等孤立无援,他在精神上对她何等依赖。此前,在托洛茨基一生比较活跃的时期中,这样的事未必会发生。娜塔利娅在巴黎的逗留令托洛茨基回想起他俩在那里共同生活的那个遥远的年代。娜塔利娅离开了一两天以后,他写道:“我是多么想再看一眼我俩一块儿拍的那张旧照片,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你现在在巴黎……在你动身的那天……我觉得很难受。……我走进了你的房间,抚摸着你的物品……。”他一再努力回想他们年轻时的模样,诉说失眠、厌倦和“由于近几年所遭受的痛苦”而导致的记忆力的丧失,但他要娜塔利娅相信,他的理性力量还未失尽,要她放心,并说有一个从巴黎来的同志是个很不错的医生,现跟他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起居。9月11日他这样写道:“我最最亲爱的人,我们在王子群岛上要安宁得多。现在我已觉得不久以前的过去比实际更好了。但我们已把多少希望同法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莫非我们已经老了?抑或这不过是我正在努力克服的精力暂时的急剧衰退?昨天,有两位老工人和一位教师来看望我。纳维尔也在这里。……我觉得很不舒服。谈话内容十分空洞,但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位来自外省的老工人。”[1]

一周后,托洛茨基稍稍康复了一些,便写信给娜塔利娅说,他还卧病在床,曾经接待过一个拥戴者小组,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廖瓦在送走那些人回来后隔着被子拥抱和亲吻他,并附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爱你,爸爸。”在多年的分别后,儿子的爱和赞扬使托洛茨基很感动。几天之后他又写信说,处在来看望他的年轻人中,他感到自己已经很年迈了,每天夜里他都会醒来,“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呼唤着娜塔利娅,“歌德不是说过,老年突然降临到我们头

[1]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上时才发现我们不过是群孩子吗?"娜塔利娅在信中回答说:"瞧,你是多么悲伤呀,你从来没这样过,我看见你面容苍白、疲惫而又悲哀。这太可怕了,这可绝不像你。你作着超人的努力,而你却在谈论什么衰老,这真叫人惊奇,你如何能够担负起如此巨大的重担。"但在内心深处他已承认自己无力完成使命了。多数情况下在封闭的圈子里循环的来访和谈话以及小集团的阴谋已很难使他精神振作起来。[1]

10月初,托洛茨基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彻底休息一下,他和娜塔利娅前往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巴涅尔—德比戈尔城,在那儿过了三个礼拜,游览了卢尔德城。[2] 这座人类易于轻信的纪念碑即使托洛茨基开心,又使他愤慨。托洛茨基完全复元,急于工作。他从巴涅尔写信给鼓动他继续撰写《列宁传》的戈兰茨(Gollancz)说,他现在可以集中精力着手此书的准备工作了。[3]

就这样,从托洛茨基抵达法国时算起,已经过了3个月。抗议他人境的声浪已经平息下去。他继续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报界对他的逗留一无所知,只有来过圣巴莱的极少数朋友和好心人知道他的确切住址。廖瓦极其小心谨慎地安排了他们的访问。斯大林派成员未能跟踪侦察到他居住的地方,因此无法举行计划中的抗议托洛茨基居留法国的示威游行。一位同情托洛茨基派的法国共产党员专程来到鲁昂观察地方党组织的动态,一旦必要便向圣巴莱报警。但本地的斯大林派成员一点儿都不知道托洛茨基就住在附近。政府确信托洛茨基能谨慎小心,因而取消了对其迁移自

---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卢尔德城系法国南部城市,天主教徒的圣地。传说圣母于1858年向卢尔德的一位女居民显圣。——译注。

③ 1933年10月25日给戈兰茨的信。戈兰茨对这一保证的答复是为《列宁传》预付1500英镑,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由权的某些限制，允许他在除巴黎和塞纳省以外的法国各地居住。11月1日托洛茨基到了巴黎附近的巴比松，一个著名画派就是以该地的名字命名的。在那儿他住在城郊的一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公园里，对于那些贪婪的眼睛来说，这里十分隐蔽，而且还有哨兵和看门狗警卫着。托洛茨基与其在巴黎的拥护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信使定期从城里往返传送信件。冬天，他还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到首都去了两到三次。在巴比松，托洛茨基希望至少能有一年的时间不受任何干扰地撰写《列宁传》。

看样子，不久前的消沉连一点儿影子也没留下。他恢复了自己日常的作息制度：早晨6点，屋里所有的人都还在睡觉，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只在吃早饭时中断一小会儿，然后继续工作到中午。午饭后休息1小时，再接着工作。午后4点，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秘书们一块儿喝茶，然后大家各干各的工作直到晚上。晚上，房内住户和来访者组成了讨论俱乐部，托洛茨基是当然的主持人。他恢复了为写此书而做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研究乌里扬诺夫一家的过去、列宁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和列宁精神成长的各个阶段，亦即与传记的第一部分、同时也是唯一竣稿的那一部分有关的那些问题。他想分析列宁的哲学著作，但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知识欠缺，于是转而研究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经典作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特别是研究黑格尔。托洛茨基不允许其他计划分他的心。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请托洛茨基写一本类似于《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的《美国向何处去?》。这位不列颠工党的老师，研究美国立宪史和政治问题的著名权威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就这一题目写出更对美国人口味的书来。”[1] 但托洛茨基不愿分心。

---

① 拉斯基致托洛茨基，1933年11月，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情地关注着法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作为休息,他撰写或是改写了有关白利安(Briand)、米勒兰(Millerand)、彭加勒(Poincare)、埃里奥(Herriot)的随笔和有关几部法国小说的书评。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值得简要论述的是有关谢林(Céline)的《走到夜尽头》和彭加勒回忆录的文章。[①] 写头一篇短文缘于谢林的处女作《走到夜尽头》。托洛茨基对作者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生活经验的丰富、观察的细致入微和语言的大胆泼辣赞不绝口,他写道,"谢林进入伟大的文学,即如他人回自己家那样","他震撼了法国的文学词汇"并赋予早已被学院派清教徒排斥的语汇以新的生命,植根于直溯拉伯雷的丰富传统,"如同第一个运用法语词汇的人那样"写了他的《走到夜尽头》一书。托洛茨基还对以彭加勒为其完美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因袭性提出了挑战。将谢林与彭加勒对比的想法是受了《走到夜尽头》书中的一个场面——彭加勒为狗展剪彩——的启发。"法国资产阶级廉洁的公证人"和第三共和国神性的庇护者"没有一点儿个性特征"——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程式化的,都是模仿;他在演说和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犹如一个用带刺的铁丝做成的、缀满纸花和金银线的骷髅"。彭加勒满可以说"我是一个资产者,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切我都具有"。在他对战败国德国提出的索赔要求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和他那"已经成为某种真诚的绝对的"虚伪披上了传统法国理性主义的外衣。然而,法国资产阶级表述中的逻辑和清晰性与崇高的哲学传统间的关系恰如"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一样"。"它们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三维空间中而是在文件的两维空间中观察这个世界的"。法国人素来以之著称的比例感,到了彭加勒那里业

① 此文标出的写作日期是1933年5月10日,但是托洛茨基来到法国之后仍继续加工此文。

已变成了“小比例感”。法国资产阶级从其祖辈那里“继承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服装存衣室”,他们用它来遮掩其顽固的保守主义,继理性主义之后,“护国主义宗教”对它来说就如宗教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彭加勒以其名义讲话的、思想自由的法国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本质属性投射到了本民族之中,而其他民族则将它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法兰西对他来说乃是圣母。“护国主义弥撒是政治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谢林的功绩在于他揭露和否定了这一神圣性。在他描写的生活方式中,仅为了蝇头小利就杀人,在通行的道德框架中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或极端之举,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与其说谢林是思想上的革新者,不如说是风格上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疲惫而又绝望的资产者,“他对自己映在镜中的尊容是如此厌恶,以至动手打碎了这面镜子,直打得双手血淋淋的”。只属意欲用对谎言的极端仇恨和对某一真理的不信任来武装人的谢林,是不可能写出另外一本类似于《走到夜尽头》这样的书的,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如果谢林不彻底改变自己,他势必会被人们所遗忘(时隔不久之后谢林果真被纳粹的狂潮所迷惑并被它卷走)。

托洛茨基对马尔罗作品的意见也值得注意。他盛赞小说《人类的状态》展示了伟大而又独特的天才,如果说他不是首先提出这种看法的评论家的话,至少也是最先提出这种看法的评论家之一。托洛茨基请纽约的出版商在美国出版此书,他的推荐是这样写的:“只有那一个人准备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极其伟大的超人的目标,才能赋予个人的生存以意义。小说得出的这一结论当然与哲学式的训诫无缘,而是从头到尾都是艺术杰作的作品的结论”。[1] 然

---

[1] 托洛茨基致纽约的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33年11月9日。托洛茨基的档案保密部分。

而,在较早写的一篇书评中,托洛茨基曾说过,在马尔罗身上有一种“廉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吸引马尔罗的与其说是革命及其真正的斗士,不如说是竭力想要统治和支配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冒险家和“官僚主义的超人”。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马尔罗这种对“超人”的迷恋使他很容易先与斯大林主义、尔后又与戴高乐主义联系起来。但当时他还想把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与对托洛茨基的好感和赞美调和起来。[①]

※ ※ ※ ※ ※

在巴比松,托洛茨基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西欧的,特别是法国的那些拥护者们,他力求超越自己这一派别的狭隘范围来物色未来的第四国际成员。他对侨居法国的路特·费舍与马斯洛夫联合寄予了很大希望。托洛茨基在巴比松经常接待费舍,使德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大为恼火的是,他让她当上了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他还为前德国国会的共产党议员玛丽娅·里斯(Maria Reesse)的小册子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后者曾经揭露德共在1933年的恐慌和混乱状态,并宣布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然而,时隔不久,里斯就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阵营,回到德国并发表言论支持纳粹。[②]

---

① 托洛茨基有关马尔罗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31年,载《反对派通讯》第21-22期。托洛茨基抵法后过了一段时间,马尔罗成为列夫·托洛茨基安全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组织募捐活动筹集用来为托洛茨基提供警卫的费用,在有马尔罗签名的那份公告中,向“一切不愿让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为了美好社会而斗争的事业的流亡者倒在反动派的枪弹下的人”发出呼吁。(在支持这份公告的人中有罗曼·罗兰,但后来他却为斯大林的清洗辩护。)引文摘自法国《卑贱者》杂志1934年5-6期合刊。)

② 《反对派通报》1934年第38-39期。

物色新成员的工作难于开展。同意为新国际工作的少数几个团体被自己内部的尖锐矛盾搞得四分五裂。一些如尼恩及其拥护者那样的老托派成员分裂出去以后在加泰罗尼亚省另组织了一个独立党派。在法国，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有托派团体也不过只有约百名成员，而《真理报》的发行数也不超过3000份。罗斯默在作壁上观。他写道：“在托洛茨基逗留法国的整整两年时间中，我和他一次面也没见过。他大约在期待着由我来迈出第一步，而我却盼望他先迈第一步。”[①] 大约就在此时托洛茨基发现，罗斯默之所以不能与雷蒙·莫利尼耶共同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托洛茨基对莫利尼耶“政治上的无责任心”十分厌恶，尽管莫利尼耶一家在他在法国生活时所发生的一切变故中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纳维尔“傲慢”、“缺乏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也使托洛茨基伤心。[②] 托洛茨基还曾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谈过数小时话，此人当时还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托洛茨基发现她“思维混乱”，对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一窍不通。“在随后的几年中，她作为一个带有天主教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而名声大噪。有关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托洛茨基在两年以后写给维克多·塞尔日的信中曾经谈到过，他说他们都是些“凡夫俗子”：“我到过他们的家，嗅到过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气息——我的鼻子没有欺骗我。”他所能指望的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些热情的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但就连他们也缺乏政治知识和经验，而且活动在工人

① 这与托洛茨基后来(1936年4月29日)写给塞尔日的信完全吻合：“在一个次要问题上不同意我的罗斯默有点儿过于感情用事了。……因此当我在法国逗留期间，我们没有见过面。然而，我们对罗斯默夫妇始终十分尊敬和喜爱。罗斯默是一个在困难处境下永远可以信赖的人。”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托洛茨基致廖瓦，1935年12月27日；同上。他评价其在法国的另外一位拥护者大卫·鲁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血儿”；同上。

运动之外。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寻找走向工人的道路。与此同时要回避那些极端革命的分子,甚至要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开……。"①

这正是发生斯塔维斯基(Stavisky)案件的时期,这件丑闻暴露了第三共和国和它的那些部长、议员、警察局官员和报界耸人听闻的背私舞弊内幕。激进党是共和国在议会中的支柱,它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一案件中,政府在斯塔维斯基案件的乌烟瘴气中几乎窒息而死。一些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同盟,尤其是"火十字架"和蒙面党徒在德·拉·罗克(de la Rogue)上校的领导下利用人民怨怼之机威胁要推翻议会制。1934 年 2 月 6 日,他们组织了一个类似一次小规模的起义的行动,呼喊着"打倒达拉第!"的口号,攻击议会大厅。然而政变并未成功,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这次暴动就引起了巴黎工人总罢工,在这次罢工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经历了多年的睽隔之后,首次自下而上地组织了统一战线。发生这件事时恰值共产国际开始放弃其"极左"战略之际,遂使得 2 月 12 日产生的统一战线成了一个先例。7 月份,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共同捍卫共和国以反对法西斯的任何进攻"达成了正式协议。激进党没有和他们联合,但它参加了次年产生的人民阵线。尽管如此,历史还是掀开了新的一章:达拉第的政府被统一战线所挽救,并且日益依赖统一战线的支持。法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工人热情高涨,阶级斗争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他的拥护者们站在群众运动的行列中去。既然他们已不可能回到曾经诬蔑他们和无情地迫害他们的共产党内,托洛茨基建议他们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在赖昂·布吕姆(Leon Blum)领导下的、得到

① 托洛茨基致塞尔日,1936 年 7 月 30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多数工人拥护的社会党(当时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是一个由办公室职员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像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托洛茨基建议自己的拥护者们参加这个党,不是为了要他们接受这个党的思想,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打入改良主义的城堡向改良主义提出挑战“并把自己的革命纲领带给群众”。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个由一些公开竞争、争相扩大各自影响的各个团体和派别组成的联盟。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托派成员完全可以为自己招募有利于第四国际思想的拥护者。这就是所有反对派集团在1934—1935年间所讨论的“法国式的转变”。到后来托洛茨基甚至向几乎所有的托派成员建议,在其各自的国家中也都采取类似的行动方式,亦即作为独特的团体加入社会民主党。[①]

托洛茨基以此默认他创立新国际的最初计划是不现实的,“法国式的转变”只不过是想要挽救这一计划的一次绝望的尝试。这个计划注定无法成功。个别情况除外,托洛茨基主义无法对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发生影响。它与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改良主义传统有着很深的矛盾。托洛茨基无法挫败布吕姆在其本土的影响,而这恰恰就是他想要间接达到的一个目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以小组形式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些小组既无威信也无声望,而且他们已经声明自己对该党公认的领袖和纲领采取敌对态度。他们只是使一些年轻人转而接受自己的信仰,但很快就在仇恨的墙上碰了壁。“法国式的转变”使托洛茨基派成员更加远离共产党群众,并助长了斯大林派的宣传声势。对于普通党员来说,说什么

① 甚至30年以后,托派成员在评价和讨论这些事件时,还使用“加入”这个术语,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加入,退出或再加入一些其他党派,在这一过程中分化着自己的队伍,并且继续进行“创立第四国际”的事业。

托派分子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仅仅是为了向改良主义宣战,这听起来只是个虚伪的托辞。党员们看到的只是社会党通过托洛茨基派成员加入该党而暂时捞到了政治资本,听到的只是后者在社会党的讲坛上大肆攻击斯大林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原有的不信任由此转变为对"变节者和叛徒"的盲目仇恨。当然,与此同时,党员们还看到托洛茨基派成员大肆攻击社会党的领袖及其政策,并且正是为此才被开除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这是在人民阵线依旧存在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共产党为此鼓掌助威,甚至还赞同将他们开除。因此,"法国式转变"反而有利于使普通法共党员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冷淡转变成为疯狂的仇恨。尽管这种差异十分细微,但它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西欧共产党人的情绪不知不觉地逐渐发生了转变,以至发展到对托洛茨基主义极端厌恶的地步,而他们就是怀着这种情绪对待大清洗的。

※　　※　　※　　※　　※

托洛茨基抵达巴比松后过了还不到6个月,这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日子突然被打破了。他一直隐姓埋名,并且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住处,甚至连朋友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和他通信都是按约定地址进行。没有一封托洛茨基的信是从巴比松发出去的。他的一位秘书充当信使,负责在巴比松和巴黎之间传送邮件。但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破坏了所有这些复杂的防范措施,使之全都归于无效。4月的一天晚上,托洛茨基的使者由于稍稍触犯了交通规则而被警察局扣留了。警察局注意到此人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且带有外国口音(信使是德裔政治侨民克莱门特),于是顺藤摸瓜,探知了托洛茨基就住在巴比松的秘密。由于法国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警察局隐瞒了这一点,所以,地方宪兵很为自己的洞

察力而欣喜,于是就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他们的这一发现。地方检察官在一个排的宪兵的保护下,协同从巴黎来的地方记者对托洛茨基进行审问。右翼报纸立即恢复了他们的抨击,《人道报》也再次与它并肩战斗。政府给吓慌了手脚。法西斯组织开始因政府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而对它进行攻击。他们叫嚷说,这是这个“腐朽堕落”的制度所犯的罪行之一,斯塔维斯基案件已暴露了该制度的真实面目。宣传部长戈培尔从柏林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正在筹划共产党起义。仇恨第三共和国的小资产阶级被这场危机弄得惊恐万状,贪婪地捕捉报纸上有关托洛茨基这一神秘案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也乐于相信他们自己这一回就正是这位“欧洲的食人恶魔”想要捕获的猎物。《人道报》声称托洛茨基已经制订了一个反对法国民族利益的阴谋。为了平息这一场带有敌意的抨击浪潮,政府宣布它正准备驱逐托洛茨基,并已向他递交了驱逐令。但由于尚无任何一国政府准备接纳托洛茨基,所以政府并不要求立即执行驱逐令。

4月16日或17日,警察局命令托洛茨基离开巴比松。他家被人群团团围住。人们担心蒙面党徒或斯大林分子会暗害他。托洛茨基刮了胡子,并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以使自己不被别人认出来。然后不引人注意地溜出了家门。他到了巴黎,并在大学生住的简陋的顶楼里和儿子住了几天。但是由于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因此呆在那儿很危险。于是,他丢下娜塔利娅上了路。他和亨利·莫利尼耶和范·海耶诺特去了南方,没有确定的目的地。此后托洛茨基在法国又呆了14个月,而在此期间,他不得不过流浪汉生活,或是隐藏在阿尔卑斯山间偏僻的小村庄里,这期间他时刻得把自己那颗高傲而又引人注目的头隐藏起来。

在警察局暗探的跟随下,托洛茨基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不断地迁移。直到来到沙莫尼克为止。地方报纸

几乎立刻就公布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托洛茨基写道:"显然,警察局怀疑我对瑞士或意大利有什么图谋,于是就出卖了我。"他不得不重新上路。警察局严禁托洛茨基在边境地区居住。命令他在距巴黎至少300公里的小镇或村庄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娜塔利娅在沙莫尼克和他相聚。在莫利尼耶和范·海耶诺特寻找新的避难所时,托洛茨基只能住进小旅馆里。可要住小旅馆就得进行"非常复杂的操作",因为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名,而警察局又不允许采用化名。最后,托洛茨基只好以国外出生的法国公民谢多夫先生的名义登了记。为了私人生活不受打扰,他和娜塔利娅又装成正在服丧期间,连吃饭都不出自己的屋。范·海耶诺特假装他们的侄儿,密切注意着周围的情况。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带有悲喜剧色彩的事:原来这家小旅店是保皇党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中心,继续护送托洛茨基的安全部门的暗探和"忠实的共和分子"在餐桌前与他们进行激烈的争吵。"每顿饭后,我们的侄儿就会向我们讲述这些只有在莫里哀笔下才会出现的场面,半小时压抑的笑(因为我们正在服丧期间)至少能部分补偿我们在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每逢礼拜天,娜塔利娅和我就要'上教堂',而实际上是去散步。这提高了我们在这家旅店中的威望。"从旅店出来后,他们又搬到村里的一幢小别墅里。当县长得知这个地址后,他高举着双手嚷道:"你们选择了一个最不适宜的地点!这是教权主义者的老巢,而且市长还是我个人的死对头。"托洛茨基已将这幢别墅租了好几个月,而且现在又要"破产",因此拒绝搬出,直到报纸上又一则报导迫使他匆匆离开为止。[①]

过了将近3个月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7月初,托洛茨基一家终于来到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多门,住在一位乡村教师波(Beau)先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04页。

生的家中。在这里他们住了将近11个月，完全与世隔绝。身边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卫兵。在多门，只有两三个专门为此从境外而来的访问者造访了托洛茨基。秘书隔几周才从巴黎到这里来一趟。此外就是本地的几位教师不时来看望波先生。那时他的两个客人就和他们一起讨论当地中学里的事务。托洛茨基写道：“我们在这儿的生活与坐牢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被关在屋里和院子里，见到的人还没有监狱里允许探视时见到的人多，我们有一台收音机，可在有些监狱里大概也有这玩艺儿。”就连他们每日的散步也和监狱里的放风并无二致。为了避开人，散步时他们也只能在村里稍稍走一走，还不能走得太远，因为那样就得穿过邻村。巴黎来的邮件每月只到两次。在民主制下的法国，他们拥有的自由远比在王子群岛时少，甚至比在阿拉木图时都少。[①]

托洛茨基的工作比平常少，效率也大不如前，《列宁传》的写作毫无进展。10月，他以《法国向何处去?》为题，写了一本论述人民阵线前夜的法国政治的小册子。书里尽管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却并未对标题中所提问题作出回答，或者说做出了错误的答案。托洛茨基是带着他观察德国局势时的那副眼镜来观察法国局势的。但那副使他得以清晰地预见到希特勒将要上台的眼镜却使他在如何看待法国前途的观点上产生了错误。他再次给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开出了正确的诊断。但他却再一次——而这次是错误地——以为“正处于疯狂状态的”下层中产阶级是在暴力活动中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最活跃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火十字架”的2月叛乱似乎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某种证明。然而，德·拉·罗克上校却并未成为法国的希特勒，法国小资产阶级也并未开创一个类似于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运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37、92及同书各处；另见比埃尔·纳维尔：《不朽的托洛茨基》。

动,这或是由于人民阵线的防范阻止了它,或是因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传统与德国小市民的有所不同。法国30、40至50年代的政治史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曾多次试图掀起群众性法西斯运动,而每次都失败了。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德国入侵的战火中垮台。即便那时,在共和国的废墟之上诞生的也不是本国法西斯,而是贝当(Pétain)政府的铁血专政。18年后的第四共和国也同样经历了军事政变。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国反动势力和在19世纪时一样,采取了一种导向"刺刀统治"的准波拿巴或伪波拿巴形式,其统治方法和作用与集权法西斯的方法和作用截然不同。[①]

托洛茨基根据以上前提提出了他有关法国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批评多列士和布吕姆搞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局限于议会手段和选举中的结盟,而不是发动工人从事反法西斯的非议会斗争,而这种斗争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要协力防止希特勒掌权,但他的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共产国际的谴责。现在,共产国际又毫不犹豫地承认了统一战线,其目的仅仅是要使其蜕化,使其成为一种逃跑的战术、"议会迷"和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这些做法报以嘲讽。由于命运的拨弄,现在请求布吕姆扩大他们的联盟、吸引激进分子"以便把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结

① 在他那个时代,托洛茨基是给法西斯主义以精确定义的唯一一位政治理论家。但在某些场合下他对这一定义的使用却极不精确。他认为在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已经迫近,认为应把毕苏斯基在波兰的伪波拿巴专政视为法西斯的,尽管毕苏斯基的统治方法并非集权主义的,而且还必须与现存的多党制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他还把施莱希尔和巴本的昙花一现的政府,以及1934年杜梅格的软弱政府也说成是波拿巴式的,这些说法都相当缺乏说服力。(只是在1940年他才最终把贝当体制说成是伪波拿巴式的而非法西斯的)。30年代中,我曾就这些问题与托洛茨基争论过,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很大,而且也相当复杂,因而不适于在这里涉及和谈论。

合起来"的恰恰就是这个多列士。托洛茨基证实,人民阵线的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把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而且还会在他们中间挖开一道深渊,因为下层中产阶级现在反对激进分子和反对其传统的政党。他号召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员们:一旦必要,就成立工人民兵,拿起武器和法西斯斗争。在写于1935年3月的另一本小册子中,他再次重申:"再问一句:法国向何处去?"

人民阵线的失败当然证实托洛茨基的批评多数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行动也给了法西斯组织以致命打击,使之自此之后再没有恢复元气。人民阵线无疑一度鼓舞了工人阶级并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但后来,人民阵线的政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导致小资产阶级的疏远,从而把国家抛入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处的那种反动的和令人沮丧的状况。而在1934—1935年间,法西斯的威胁有所减弱,托洛茨基呼吁采取非议会行动和成立工人民兵的号召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托洛茨基躲在其阿尔卑斯山区的避难所,观察着人民阵线最初的一些举措,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僧团无可救药地毁了自己。它必将臭气熏天地垮台。"[①] 从人民阵线的胜利到它在1940年臭气熏天的垮台已经没有几年了。

※ ※ ※ ※ ※

直到1932年年末,托洛茨基还跟他在苏联的拥护者们保持着联系,不断收到来自许多流放地和监狱的信件和通报。这些信函分别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写成,多数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有时甚至是在烟盒纸上写的,内容涉及政治和理论问题,或是私人问候,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48页。

信件几经辗转,其传递方式非常巧妙,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一次,一个火柴盒掉在了托洛茨基的桌上,结果他从火柴盒里找出一篇用极其细小的字体写的政治论文。通信都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里,它把西伯利亚和北极风的气息、牢房里的臭气、血腥搏斗的回声、注定灭亡并已绝望的人们的哀叹——但也有清晰的思想和不灭的希望带到了王子群岛上。在通信持续期间,托洛茨基尚能感受到苏联的现实。但通信渐渐缩减到几近于无,而且早在托洛茨基离开王子群岛以前就已完全中断了。

在法国,他和苏联国内的反对派没有任何联系。当托洛茨基声明运动在俄国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首创精神、只有新国际才能使之复苏时,他心里想的是由于变节者的无休止的忏悔而显得更加喑哑的反对派的沉默。1934 年 2 月,当托洛茨基还在巴比松时,他得知了拉柯夫斯基变节的消息。不难想象这一消息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托洛茨基来说,其他任何一位志同道合者都不如"朋友、战士和思想家"拉柯夫斯基那么亲密。拉柯夫斯基尽管年纪已大,但始终没有被迫害所摧垮。当几乎所有反对派领袖都已投降时,他还仍然坚持其反斯大林立场,在监狱和流放地中,他在道义上的威望仅次于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几乎在每一期《反对派通报》上都要刊登拉柯夫斯基所写或有关他的某些东西:拉柯夫斯基的文章、书信、以前的发言片断或反对迫害的抗议信。反对派每次遭受挫折或出现大批变节者之后,托洛茨基总要把拉柯夫斯基树为光辉的榜样,并以之证明反对派依然存在。拉柯夫斯基的临阵脱逃使他伤心至极,对他来说,这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托洛茨基写道:"拉柯夫斯基的的确确是与革命老一代的最后一点儿联系。在他变节之后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1] 托洛茨基在想,

---

[1] 《流亡日记》第 41、53 页;另见《反对派通报》1934 年第 40 期。

这位老战士究竟是怎么啦？是疲惫终于战胜了他吗？还是像拉柯夫斯基自己声称的那样支配他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当苏联遭受第三帝国的威胁时他应该“与斯大林团结起来”？无论如何斯大林的胜利是十分圆满的。而且，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斯大林对业已忏悔了的对手的态度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真诚，尽管党依旧在不断将“不忠实分子”开除出自己的队伍。

可是还没到年终，和解的表象突然被打破了。12月1日，9年前取代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了。按照官方公布的第一种说法，凶手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身后是一帮白卫军阴谋家，其活动受拉脱维亚领事的指使。关于党内反对派是否参与了谋杀的问题，根本就没人提。可要按照第二种说法，凶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拥护者，而关于白卫军却只字未提。尼古拉耶夫和其他14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共青团员)都被处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第三次开除出党。他们被关进监狱等待军事法庭审判。报纸和广播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系起来，说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对斯大林心怀不满的人为目标的大规模恐怖行动开始泛滥。数千人被投进集中营。最后，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几位主要领导人也被以“渎职”罪指控，被判处2到3年的监禁，判刑之轻令人惊讶。

托洛茨基呆在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屋里，守着无线电收音机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广播说一个阴谋已被揭露，托洛茨基一边听一边随手记下他的评论。[1] 他当即断定来自莫斯科的喧嚣仅仅是那些比基洛夫案件更重大、更加居心险恶的事件的前奏曲。他坚

① 1935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41期全刊登载托洛茨基对基洛夫事件所作的评论。

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基洛夫被刺一案无关——对于他们这些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秘密采取旨在除掉某个人而不改变整个体制的行动更格格不入的了。他丝毫也不怀疑斯大林是在以刺杀为借口向反对派发动新的进攻。12 月 30 日,在审判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的消息公布的前两周,托洛茨基根据官方声明断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事先知道有人在筹划谋杀,却别有用心地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如此,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在所有的反对派都已被镇压之后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由于没有机会合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又未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育,在绝望中便想用炸弹和手枪来抗议。托洛茨基断言,应当对这起事件负责的不是反对派,而是执政派。对尼古拉耶夫的企图,国家政治保卫局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小卒在利用。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样做达到了什么目的?据说尼古拉耶夫供认拉脱维亚领事促使他与托洛茨基联系并让他给后者写信。托洛茨基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计划只有在拿到尼古拉耶夫与托洛茨基通信的证据以后才“揭露”他的阴谋,由此可见,“领事”是在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尚未得到这些“证据”时,他们不会惊动尼古拉耶夫,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能力密切监视和指挥他的行动。国家政治保卫局失算了。尼古拉耶夫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尚未达到目的时就向基洛夫开了枪。官方种种说法之间的矛盾和尼古拉耶夫案审判上的严格保密正是由此而来。最后,仅以“渎职罪”审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人以及对他们的判决如此之轻,原因也在这里。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既然无法从尼古拉耶夫那里得到有关他的伪证,便想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得到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分别判处 10 年和 5 年徒刑,但却允许他们公开声明与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联系,但由于在以往的岁

月里他们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已对这个恐怖分子产生了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凶手的间接同谋。法庭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托洛茨基断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肯定有一笔幕后交易：斯大林肯定许过诺，一旦他们同意将托洛茨基作为恐怖主义阴谋的领导人加以谴责，就为他们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写道：“据我所知，……斯大林围绕着基洛夫的死尸所拟订的战略设想并未给他带来桂冠”；事情的荒谬悖理使人有理由相信那些认为责任在斯大林及其幕僚的评论和传言。“正因为这样，斯大林只能破釜沉舟。他必须再搅起一团混水以掩盖这次挫折，而这团混水必须具有更大的规模，必须是在国际舞台上，而且还必须获得更大的成功……。”[①] 托洛茨基在分析基洛夫案件之后预言了一个后来的确“是在国际范围内”设计的几次大审判的阴谋，但在这几次大审判中取代毫不起眼的拉脱维亚领事出场的，是被斯大林说成是托洛茨基的同谋的希特勒。

※ ※ ※ ※ ※

基洛夫案件很快就波及到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从1928年就被流放的他的两个女婿被逮捕。并不加审判地延长了他们的流放和监禁时间。他的前妻现已年逾60，被驱逐出列宁格勒，开始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后来又发配到鄂木斯克州的一个偏远的村庄。由前妻抚养的3个外孙只得跟他们年迈的姨姥姥在一起，听天由命。亚历山德拉在给廖瓦的信中写道：“我能收到外孙们的来信。但却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可以肯定，我姐姐的

---

① 参见《致美国友人的一封信》（1935年1月2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以及《反对派通报》1935年2月第42期。

日子不好过……尽管她总是在安慰我。我的身体马马虎虎,这里没有医生,因此我必须挺住。"[1] 这一次,恐怖落到了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头上,我们还记得,他是个学者,既不问政治,又避免与其父联系。从1929年以来他一直只与母亲通信,向她讲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科研工作上的成绩,询问全家人的生活情况——在他所写的全部书信和明信片里,对政治只字不提。恰好在基洛夫被刺杀的前几天,他又写信给母亲,谈了他的科研工作,谈了他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讲授的课程,谈了为讲授这些课程而需要他付出的努力,只是在信的最后几行里他暗示说,"有人正在酝酿某种使人不快的事;目前还只是一些谣言,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一周以后,即12月12日,他再次写信谈了他自己的科研工作,结尾却不无忧虑地说:"总之我的情况很不妙,比所能设想的要糟糕得多。"[2] 处于极度焦虑中的父母惊讶得很,国家政治保卫局该不会把谢尔盖抓起来作人质吧?一连几星期他们盼望谢尔盖的来信。可是没有等来。全家的老朋友们、侨居维也纳的Л.C.克利亚奇科(Клячико)的遗孀游览莫斯科时打听了一下谢尔盖的情况,唯一的结果是人们不加任何解释地建议她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一连数周、数月和许多个不眠的夜晚父母都在思念着谢尔盖。最使他们心焦如焚的是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也许他的灾难是个人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也许,国家政治保卫局只不过是把他驱逐出了莫斯科而并没有关进监狱?他根本就不搞政治,这一点国家政治保卫局无疑是知道的。他们是否会在根本不通知斯大林的情况下就把他投进监狱?娜塔利娅似乎还存有一线希望,她问,求求

---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79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斯大林是否管用？托洛茨基说，没用，如果谢尔盖被关进了监狱，那也只能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只有斯大林才会有这么重的报复心。他们是否在逼迫谢尔盖承认对他父亲的那些指控？可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伪造证据不是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吗？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抓谢尔盖呢？他们会拷打他吗？谢尔盖会屈服吗？①

儿子此刻正站在宗教裁判官面前受审的这种想法日夜萦绕在父母的心头。他们担心政治上尚不够成熟的谢尔盖难以经受这次打击。他们看到谢尔盖无端遭受迫害，就责骂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他跟他们一起流亡。然而，难道说他们能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要求谢尔盖抛弃他的科研工作吗？他与完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廖瓦完全不同。他们回忆着他们未能拯救的尼娜。他们回忆着谢尔盖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他对父兄那种生活方式的拒绝、对政治的厌恶和他那虽不平静但却不乏欢乐的少年时代，最后，还回忆起他对科学的绝对忠诚。不，他们不能要求他介入其父亲的事业。但这会不会让他以为自己被他们抛弃了、遗忘了呢？他们阅读俄国的报刊，在愈演愈烈的侮辱和谩骂“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前公爵、前伯爵和前宪兵的残渣余孽”的鼓噪声中寻找有关谢尔盖的蛛丝马迹，他们见到了一些亲朋好友的姓名，但没找到任何关于谢尔盖的消息。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是足够聪明的，所以他不会不明白，即使是今天我也不愿与他交换位置……然而，如果最高（政治和道义）层次的复仇也未成功，而且，它也绝不会成功的话，那么（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仍有可能以打击我的亲人来犒赏自己。”②

---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61－72页。

② 同上，第66－67页。

一想到斯大林由于抓不到父亲而向儿子伸出毒手,就使托洛茨基感到愧疚。在日记中和有关谢尔盖的札记中,他叙述了处死沙皇和沙皇一家的事,看起来这似乎与上下文无任何关系。他担心谢尔盖会成为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的牺牲品,显然使他想起了另外一些无辜的孩子——即由于父亲的罪愆而被杀的沙皇的孩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并未参与通过处死沙皇的决议的事。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刚一听到沙皇一家的命运时深感震惊。但他之所以回忆这件事却不是为了摆脱同列宁的干系或是为自己辩白。经过17年以后他证实,为了革命的利益,列宁的决定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写道,在国内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关头,布尔什维克当然不会给白军留下"一面他们可以在其下集合起来的活的旗帜";而在沙皇死后,他的某个儿子也会有可能成为此类象征物。沙皇的孩子成了"构成君主制本质的一个原则——王朝的继承性的牺牲品"。日记中这段插笔所隐含的结论相当明确:即便承认斯大林有权消灭其对手——而托洛茨基当然不承认他有这种权力——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迫害其对手的孩子。谢尔盖与他的父亲并不是靠一种王朝的继承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段插叙之后,托洛茨基紧接着写道:"没有有关谢辽沙的任何消息,也许,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他的消息了。长期的等待会缓和最初的焦虑。"①

但这种焦虑仍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影响。他的心绪恶劣已极。他重新反复思考老年和死亡的问题。他还不满55岁,但已不止一次回忆不知是列宁还是屠格涅夫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你们知道最可怕的罪孽是什么?是活到55岁以上。"他不无几分嫉妒地写道:"可列宁并未活到犯这种罪孽的年龄。""我的身体状况不容我乐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82页。

观。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症状越来越厉害，机体的抵抗力越来越弱。”“当然，我的生命的曲线仍会暂时上升，但总的说来，我已感到最后清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清醒地预见到将发生的事，写道：“只要能取消当初流放我的决定，斯大林此刻什么都愿意做。在下述两种情况之下……：一是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二是他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必然会采取恐怖行动。当然，不排除还会有第三种乃至第四种情况……总之我们会看到的。即使我们看不到，别人也终将会看到。”他开始想到自杀，他在想，当自己体力耗费殆尽、无法继续斗争时，是否应该走这条绝路。也许他在想，他这么做是否能救得了谢尔盖？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念头。尽管托洛茨基的精力大大衰竭，但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对远比这更加严峻的挑战，他表现出的生命力和果敢顽强仍使人惊奇。然而有时他也体验到一般中年人常有的危机，他常常陷入忧郁多疑。长期与世隔绝和消极无为造成的疲惫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①

这是托洛茨基平生最消沉的时期。离开土耳其时还抱着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乐观的希望全部訇然破灭了。他大举抨击斯大林投降希特勒的举动在政治上并未得到任何报偿。斯大林主义甚至利用这次投降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利用人们害怕纳粹的心理，将欧洲的左派拉到了自己的一边。托洛茨基感觉到第四国际刚一生下来就是个死胎，尽管他对自己也不肯承认这点。他既无法摆脱他周围的环境，也无法与之妥协。只有当他对其创立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进行崇高的思索时，才能得到几分安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如果没有列宁和他本人，俄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据此断言，他在创立新国际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不可取代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1、109页及同书各处。

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就连他在十月起义和国内战争中所做的工作也无法与之相比。托洛茨基写道:"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儿夸张之处。两个国际的垮台提出了一个这两个国际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除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越过第二和第三国际领导人用革命方式武装新一代的使命。而……最大的罪孽在于活过了55岁而不死!为了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说,要使能够将工人阶级引向革命的国际得以创立,"我必须至少不间断地工作5年"。[①]

在其一生事业的最低点上,他向命运发出了挑战,命运恰巧"又给了他5年时光",却没有让他的工作"获得成功"。

※ ※ ※ ※ ※

在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已长达33年的共同生活的全部岁月里,他们从未像居住在多门的这11个月那么孤独。孤独和痛苦使他俩更加亲密。托洛茨基一再说,在最悲惨的时刻他"总是为她的性格力量而惊奇"。他们的爱情经历了事业的胜利和失败,过去幸福的余辉冲淡了这些日子里的悲伤。她的脸上早已满是皱纹,不安和焦虑使她的面部表情显得紧张。托洛茨基心疼地回想着她那生机勃勃、欢乐愉快、富于挑战意味的青春。"今天散步时我们登上了一个小山岗。娜塔利娅走累了,出乎意外地坐在了枯叶上,脸色苍白。……即使现在她的步态还很优美、从不疲倦、走路仍像年轻时那样,可最近两个月以来她的心脏有些不适。工作干得太多……她突然坐了下来,看样子是再也走不动了。她冲我笑了笑,好像请求原谅。我万分痛苦地为她的青春而惋惜。"她平静地肩负起了自己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4页。

的十字架。将自己的一生与丈夫的一生联系在一起。他所经历的每一场暴风雨都强烈地震撼了她。他的每一种情绪都渗透进了她的机体，他的思维的每种细微之处也在她身上反映出来。她并非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同志，不像克鲁普斯卡娅与列宁之间的关系那样。因为没有孩子的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是中央委员。娜塔利娅不仅没有她那么积极，而且也不像她那么关心政治。“她尽管对政治上的日常小事不乏兴趣(托洛茨基原话如此)，却往往无法将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匀称的画面。”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是无法更加明确地表示他对自己妻子的政治判断力的怀疑的。但重要的不是这些：“当政治逼到面前，并要求给以全面的回答时，娜塔利娅总是能从其内心的音乐中找到正确的音调。”[①]

托洛茨基对其妻子这种“内心的音乐”常常十分理解，其实，当托洛茨基在日记中描写自己的妻子时，多数情况下都写的是她正在聆听音乐。她个人的兴趣往往只和艺术有关。她具有非凡的理解、观察与表达的能力，这从她的日记就能看出。托洛茨基的学生们有时对她的政治见解感到惊讶，对此，托洛茨基说：“敏感的人往往能本能地感觉到她天性的深度。……谁要是在从她身边走过时对她淡漠或俯就而不能察觉她体内蕴含的力量，那么，你就可以信心十足地断定，他们是肤浅平庸之辈。……一切市侩行为、庸人作风和胆小怕事都休想瞒过她的眼睛，尽管她对人们的小缺点极度宽容。”对她的“内在力量”是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怀疑的。在他几乎支持不下去的最艰难的时刻，正是她支持他挺住，并在他身上重新激励起肩负十字架的力量。在多门，他不无感激地发现，她从未因为谢尔盖所遭受的不幸而责备他，她对他隐藏了自己的痛苦。有时候，她的悲伤仅只在类似这样一些话里流露出来：“他们不会驱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1、56页。

逐谢尔盖的……为了从他嘴里掏出点儿什么，他们会拷打他，然后就把他干掉。”她隐藏起自己的感情，投身于工作，操持家务，帮助丈夫写作，和丈夫讨论读过的法文或俄文小说。托洛茨基写道：“她的嗓音使我感到强烈的痛苦……这嗓音略有些嘶哑，是从她胸腔的深处发出来的。在她痛苦的时候，她的嗓音反而会压低，仿佛是她的心灵在直接倾诉。我是多么了解这温柔而痛苦的嗓音啊。”有一次他写道，许多日子以来，娜塔利娅想的更多的不是谢尔盖而是他的前妻，她说谢尔盖终究会没事的，而年过六旬的亚历山德拉未必能挺过流放。[1]

向全世界的良知发出呼吁也许能解救谢尔盖，娜塔利娅怀着这一线希望写了一封为谢尔盖辩护的公开信，登在《反对派通报》上。[2] 她说明谢尔盖是完全无辜的，并不惜有损其自尊地讲述了谢尔盖如何由于反感政治以至对父亲怀有敌意的情况。难道近几年的事件改变了谢尔盖的情绪而使他转变到反对派立场上来了吗？“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我倒会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谢辽沙承受落在他身上的打击要容易得多。”可遗憾的是，这种推测是不现实的：她从许多人那里了解到“最近几年中，谢辽沙依然远离政治。而对我本人来说，甚至根本不需要这类旁证……。”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学校当局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一直都在监视着谢尔盖，而“其子曾是我们孩子房中常客的”斯大林同样也清楚这一点。她向著名的人道主义者，诸如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萧伯纳等这些“苏联的朋友”发出呼吁，请他们出面说话，并建议国际委员会对基洛夫案件之后出现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进行调查。“苏联官僚集团不能凌驾于全世界工人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51、71、121－122页。

② 《反对派通报》1935年7月第44期。

阶级舆论之上。至于工人国家的利益，对它的行为进行一番严肃的调查，其结果只会对它有利。我将提供……有关我儿子的一切必要的信息和文件。如果说经过长久犹豫之后我仍决心公开提出有关谢尔盖的问题，那么我这样做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这一理由对一个母亲来说可说是绰绰有余，而对政治行为来说却远不够充分。但是，谢尔盖一案十分简单明了，是蓄意和罪恶地滥用权力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调查起来将轻而易举。”但呼吁并未得到任何结果。

由于偶然的机缘，大致也就在娜塔利娅发出这一呼吁的同时，托洛茨基重读了大司祭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的自传。这是俄国的一位色彩鲜明、遐迩闻名的旧教神父，他生活在18世纪混乱时期以后。阿瓦库姆捍卫“真正的”希腊正教，反对其严厉的对手尼孔（Никон）大主教。尼孔大主教按照上流社会的意愿改变了教堂仪式并对祈祷仪式书作了修改。阿瓦库姆揭露了教会等级制度的贪污受贿，起而捍卫受压迫农民的利益。他被免除教职、投进监狱、发配，先到西伯利亚；然后又到蒙古边境，遭受毒打，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但他却拒绝忏悔。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受苦。他这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一度也想过，为了拯救他的亲人，屈服也许是值得的。他的孩子们由于疾病和饥饿在流放地相继死去。在西伯利亚，阿瓦库姆写成了他那部在俄国文学中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自传。他继续努力宣传他的思想，而他那“一个为真理而受难的英雄”的声誉也很快就传遍全国。对于敌人来说，作为流放犯的阿瓦库姆比在王位旁边更加危险。于是，敌人把他押回莫斯科烧死了。[1] 尽管隔着岁月和意识形态的深渊，托洛茨基仍不能不颤栗

① 新版《大司祭阿瓦库姆传》于1960年在莫斯科出版，该书有一篇有趣的影射时局的序言。

地感受到他与这位传奇性的叛乱者的相似性。俄国的变化有多大而又有多小呀！就连阿瓦库姆妻子的灵魂也仿佛化身为娜塔利娅站立在他的身旁：

> 昨天，当想到落到我们头上的打击时，我向娜塔利娅讲述了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平。他们——一个造反的大司祭和他忠实的妻子——磕磕绊绊、步履蹒跚地前往西伯利亚。这位疲倦已极的可怜女人常常一头栽倒在雪堆里。阿瓦库姆讲述道："当我走近她跟前时，她，这个可怜的人责备我说，这种磨难还得持续多久。我回答说：'马尔科芙娜，直到死。'她叹了口气，说：'随它去吧，彼得罗维奇，我们还是上路吧。'"[①]

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受苦受难，"一直到死"。

※ ※ ※ ※ ※

他们已无法再在多门逗留下去了。任何一次将法西斯组织推至前台的政治上的向右转和为共产党补充力量的向左转都有可能剥夺托洛茨基这个不可靠的避难所。这时发生的是向左转。基洛夫案件之后，斯大林派对"世界反革命领袖"的诋毁已经达到如此野蛮和歹毒的地步，以至随时都会导致暴力。[②] 即使是在阿尔卑

---

①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21页。

② 雅克·杜克洛在其发表于1934年12月《人道报》上的文章中说什么"托洛茨基的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红色救援国际(保护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的国际组织)法国支部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法国。

斯山这座被人遗忘的小村庄里，托洛茨基也没有安全感。托洛茨基讲述道，就在这些日子里，一次当他和娜塔利娅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紧张沉默地听见有两个男人高唱着《国际歌》走近他们住的小屋。以前唱着这首歌来的只能是朋友，而现在连敌人和凶手也可以这么做。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两代人以前的老一代民粹主义者，他们来到乡村教育和解放农民，而鞭笞他们和对他们用私刑的恰恰就是那些农夫。

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斯大林派的抨击了。1935 年 5 月，拉瓦尔(Laval)去了莫斯科，就苏—法同盟一事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并带回了一份令人惊讶的联合声明。按此声明，斯大林保证说将支持达拉第和拉瓦尔的防务政策。在此之前，原则上是反对这一政策的法国共产党领袖立即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人民阵线立刻形成。托洛茨基有充足理由认为，现政府会毫不迟延地执行在此前一年已经交给他的驱逐令。由于任何国家都不愿接受他，所以他担心自己会被驱逐到遥远的法属殖民地，很可能是马达加斯加。

1935 年春，托洛茨基提出了到挪威避难的请求。挪威刚刚举行过大选，工党当政。这个社会民主党十分特别：它曾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尽管在 1923 年与其脱离了关系，但并未加入第二国际。自然可以指望这个党会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当时侨居奥斯陆的德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瓦尔特·赫尔德(Walter Held)他向领导该党激进派的非常同情托洛茨基的该党著名领袖之一奥拉夫·舍夫勒(Olav Schöffle)提出了请求。官方的答复过了一些时候才到。托洛茨基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挪威人在掌权之后摒弃了共和国的传统而与国王妥协，他料想这件事会刺痛挪威人。但在 6 月初，他得到通知，挪威允许他前去避难。6 月 10 日，托洛茨基离开多门前往巴黎去办签证。但就在此时碰到了障碍。挪威政要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竭力破坏此事。托洛茨基没有领到签证，不得不

推迟动身的准备。法国警察局怀疑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在巴黎定居而寻找借口,便命令他在24小时、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之内离开法国。他作了让步,同意先回多门,但警察局却不允许。托洛茨基提议允许他呆在一家私人诊所以便等候来自奥斯陆的最后答复,但怀疑他又在跟警察局耍花招的警方连这也不同意。托洛茨基在巴黎著名的外科医生罗森塔尔家住了一两天。6月12日,托洛茨基向挪威首相发报责备说,他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以后一心指望首相的许诺兑现,可现在"法国政府以为我在骗它,要求我在24小时之内离开法国。我已生病,我妻子也是个病人。处境绝望。请求立即采取有利的决断。"[①] 处境的确糟糕至极。因为托洛茨基一文不名,不得不借上路的盘缠。挪威人仍然要他争取得到第二次进入法国国境的许可,可这在他得到挪威的入境许可之前是无法办到的。最后,由于奈夫勒的努力,托洛茨基才终于得到只允许他逗留6个月的签证。他急急忙忙与巴黎的朋友们辞行:"我在巴黎见到了许多同志。这位声望卓著的医生的住宅出乎意料地成了列宁派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所有的房间里都在举行讨论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一批又一批的新朋友络绎不绝。"[②] 他描写这一场面的笔法令人想起1928年他被驱逐出莫斯科时的情形。但这种描写只不过是文学手法上的模仿而已:莫斯科的分别是一个伟大斗争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而这次在巴黎的告别,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端。

像1916年他被驱逐出法国以前那样,托洛茨基又给法国工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告诉工人,他在流亡法国期间被迫保持沉

① 摘自1935年6月12日托洛茨基给挪威首相尼加德斯沃尔德的电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25–126页。

默。“最‘民主’的部长和最反动的部长一样，都把保护资本主义奴役方式当做自己的使命。我属于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其宗旨恰恰是要推翻资本主义。”他抨击那些斯大林分子说：“两年以前，《人道报》每日都在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法西斯分子达拉第把社会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请到法国来，就是为了在他的帮助下组织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众所周知，如今这些先生们又断定与‘法西斯分子’达拉第在一起的是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了。他们如今已只字不提法国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相反，他们认为法国资本家与苏联官僚集团的军事同盟是和平的保障……他们又说什么托洛茨基的政策是为希特勒而非为埃里奥和达拉第服务的……。”他义愤填膺地指出，斯大林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的“最大的溃疡”，要医治它只能“用烧红的烙铁来把它烫掉”，工人应当重新集合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我们是带着对法国人民炽热的爱和对法国工人阶级光辉未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离开的。我相信，或迟或早劳动人民会把资产阶级拒绝给我提供的待客之道还给我的。”[①] 经过黯淡、虚掷的两年以后，他终于离开了法国，并且再没有回来过。

※ ※ ※ ※ ※

有关托洛茨基逗留挪威期间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题材的宏大的翻版。易卜生讲述的是斯托克曼大夫的悲惨遭遇。他一直被所有同胞看做是高尚的典范，直到他揭示出人们财富的来源已被污染的真相并因此有破坏该市繁荣的危险时。于是他的身为市长的哥哥和“激进派”朋友们便开始无情地疯

---

① 《反对派通报》1935年7月第44期。

狂地反对他,一心把他置于死地。现在我们也到了易卜生的国度。但这次的人民公敌是个从国外来的流亡者,而且所说的不是挪威一所疗养院的自来水管已被污染,而是革命已被歪曲,这些并不重要。戏剧、场面也与之一模一样,连易卜生笔下的剧中人,尤其是儿孙两代伪激进派分子的遗传特征在此都是一清二楚的,甚至就连他们的"人民使者"也出场了。跟以前一样,他们瞬间就会转变自己的立场,就能形成舆论。在人群中我们同样可以分辨出一到两个孤身捍卫人民公敌的谦恭而又勇敢的霍尔斯特大尉的后继者。变化了的只是时代,而作用力更强大,冲突更严酷。

一开始就预兆不祥。挪威人不但在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一事上十分勉强,而且还给他规定了许多与法国相差无几的限制。并且保留了在距首都一定距离之外确定他的居住地的权力。6月18日,托洛茨基刚刚踏上挪威国土,农场主全国联盟就抗议允许他进入本国,6月22日,抗议信就已提交国会讨论了,但这并没有马上产生结果。显然反对派是在利用托洛茨基的到来给政府制造些麻烦。保守的资产阶级对"食人恶魔"怕得要死,根本就不可能给他找到一个立脚之处。没有一家房主敢接受托洛茨基做他的房客。政府要求托洛茨基保证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托洛茨基作了保证,条件是:所谓不从事政治活动意指不干涉挪威的内政。政府后来证实它所指的是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任何一个政治侨民都无法接受、同时也不能强迫其服从的要求。与托洛茨基对话的那些人居然还自命为正统共产主义的异端,这一事实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行为如何卑鄙了。

尽管如此,在托洛茨基抵达时,政府和工党的领袖还是举行了一次热闹的集会,以显示他们的慷慨大度。他们的《工人报》是这样欢迎托洛茨基的到来的:"政府的决定会使挪威工人阶级和一切客观公正的人们感到欣喜。避难权不是僵死的字母,而是活生生

的现实。挪威人民认为……托洛茨基来到他们的国家乃是他们的荣幸。”他们不细谈他们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有关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但他们否认斯大林有权“迫害和驱逐一个如列夫·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因为他的名字在俄国革命史上将永远与列宁并列在一起。这个人尽管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却被放逐出自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一个民主制度理应把为其提供避难所当做愉快的职责……。”[①] 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马丁·特兰梅尔(Martin Tranmmael)以个人名义发来了欢迎信。许多大臣都肯定地说，允许托洛茨基入境的条件、签证上的6个月期限及对其迁徙自由的限制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政府要求工党党员，出版家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帮助托洛茨基定居。克努德森发现已无法租到房了，便提议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住在他家里。[②]

党的3位领导人——特兰梅尔、司法大臣特利格威·赖伊(Trygve Lie)和《工人报》的主编很快就正式拜会了托洛茨基。会面十分尴尬。挪威人旧事重提，说1921年他们在莫斯科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与托洛茨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进行过谈判，特利格威·赖伊插话打断了这段回忆，他向托洛茨基指出，托洛茨基必须恪守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诺言。托洛茨基回答说他根本就不想干涉挪威的内政。特利格威·赖伊嗣后肯定地说，他当时要求托洛茨基不从事“任何与任何友好政府敌对”的活动。有个见证人回忆说，“托洛茨基拒绝卷入与我们进行的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之中，

① H·克罗格：《见解》第220页。我十分感谢克罗格先生和H.K.达里先生将下文中将要引用的此书和其他挪威文件译成英文。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28－129页。

② 这些事实是康拉德·克努德森告诉对我的。

只谈天气"。但来访者在履行此次拜会的官方职责部分以后,突然换了一种同志式的口气,竟然讨论起政治问题来,并尽情地沐浴在一个他们为其提供避难地的伟人的光环中。他们请托洛茨基向《工人报》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发表详尽无遗的长篇答记者问。根据同一位见证人的说法,托洛茨基很冷淡地回答说司法大臣刚才还禁止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来访者们耸了耸肩,笑了笑说,这项禁令纯属一纸空文,不过是走走形式,无非是为了平息议会内的反对派。而司法大臣则向托洛茨基保证,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根本不会违反允许其入境的条件。此时的大臣本人早已成了一个贪婪的记者。于是托洛茨基详尽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借此机会对斯大林的政策和基洛夫被刺案后的肆无忌惮的恐怖活动进行抨击。7 月 26 日的《工人报》发表了答记者问。编辑部在按语中大事赞扬,以致读者丝毫也不会怀疑,为了让他们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司法大臣本人也费了不少辛苦。这样一来,"最初的误解"烟消云散了。执政党对待托洛茨基不再像对待一位流亡者,而像对待一位贵宾。国会议员和记者们争相向他献媚,一段时间里,在奥斯陆左翼圈子中,谁吹嘘自己已蒙这位伟大的流亡者亲自接见,谁顿时就身价百倍。

6 月末,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住进了克努德森的家。他的宅邸坐落在奥斯陆以北大约 50 公里霍涅弗斯附近的一个名叫维克斯哈尔的村庄。在这个宁静而又和平的国家里享受着朴实、善良的一大家人的热情好客和礼遇,使他们得以从前不久的那一番磨难中康复过来。克努德森是一个稳重的、百分之百的工党党员,与托洛茨基主义相距甚远——他之所以肯给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提供庇护,是出于博爱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让庸人难堪。主客双方十分默契地从不涉及存在歧见的政治问题。有关这一点,克努德森是这样说的:"在托洛茨基逗留我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之间连最

微小的误解都没有产生过。托洛茨基工作太忙,不愿耗费时间去进行无谓的争论。他在这儿做了好多工作。我从未见过一个在生活习惯上像他那样精确、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的人。在没病的情况下,每天早晨他都是5:20或5:30起床,到厨房稍微吃点儿东西后就开始工作。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生怕打扰什么人。他对我家的所有人都十分尊重,做事很有分寸,对他的这一特点,我感到我没有足够的词汇加以描述。娜塔利娅的举止也同样如此。我们都亲切地称她是"大家中的小主人"。"他们的生活需求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①

从1917年以来,托洛茨基还是第一次不必隐姓埋名地生活在"警卫同志"的保护下或警察局的监视之下。院门白天黑夜都是敞开着的,村民们随时可进来进行友好的谈话。国外也时常有人来访:他们是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德国侨民、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美国人中还有刚从中国回来的哈罗德·艾萨克(Harold Isaacs),他在那儿呆了好几年。他是有关这个国家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珍贵信息的来源(他正好在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托洛茨基为该书作了序)。到维克斯哈尔来的还有沙什曼和加入托派的著名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穆斯特(Muste)。争吵不休的法国人也来过几次,他们请托洛茨基做他们的仲裁人。他们在应否退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而组建一个独立政党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雷蒙·莫利尼耶创办了自己的鼓吹退出支部的报纸《公社报》。这一做法引发了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和莫利尼耶的决裂。如果不是这场争论竟持续了许多年,并且十分可笑地与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话,它根本就不值一提。托洛

① 我在此又一次引用了克努德森的叙述和他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挪威版撰写的前言。

茨基在法国时不能自由地与朋友通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抓紧通信,因而通信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托洛茨基开始撰写一本新书,书名定为《被叛卖的革命》。[①]

9月19日,托洛茨基因寒热病和浑身乏力而住进了奥斯陆市立医院。在病房的一片寂静中他沉湎于悲伤的思考。他写道:"从我躺在马德里监狱的床铺上不无惊讶地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到那里时起,已经过了几乎有20年了。我记得我当时大笑起来……笑呀笑呀,直到睡着为止。而现在我再次不无惊讶地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到了这儿,到了奥斯陆医院?"[②] 放在床头柜上的《圣经》使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敖德萨监狱里的囚室。37年以前,他曾在那里用好几种语言出版的《圣经》文本学习外语。"遗憾的是我无法保证,再次见到这本熟悉的旧书时会有助于拯救我的灵魂。但读一本挪威语《圣经》会有助于我研究一个慷慨待我的国家的语言和它那……我从小就十分喜爱的文学。"经过多次检查后,托洛茨基出院了:灵魂未得到拯救,健康却一去不返。12月的多数日子他是卧在床上度过的,如他后来所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月"。

妨碍托洛茨基身体康复的是一些新愁旧虑。他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徒劳无功,这使他感到压抑。法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无休止的争吵烦扰着他。他在给廖瓦的信中写道:"至少得给我4周的'假期',并要求分部不要再给我任何信件,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的工作能力将不可能得到恢复。这些讨厌而又烦琐的意

① 托洛茨基与其在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美国、希腊及其他国家中拥护者的通讯急剧增加,这在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的卷宗里有所反映。那里还保存着哈罗德·艾萨克关于中国的报告。

② 引自托洛茨基为挪威版的《我的生平》撰写的序言以及托洛茨基档案。

气之争不仅使我无法从事更加重要的工作，而且会让我失眠、得寒热病和其他病。……请你在这一点上决不要通融。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许在2月1日吧，我将能够重新听命于你。”[1] 但在此后的数周数月中，他却不止一次因为廖瓦用那些“琐碎的纠纷”打扰他而责备后者，并对“法国集团愚蠢的阴谋”表示“绝望”。[2] 托洛茨基的通信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大多数未来的第四国际的其他分部中，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除此之外，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和谢尔盖下落不明也使人揪心。向莫斯科间接查询所得到的官方解释是，谢尔盖并未被捕，而只不过是被“软禁”了，旨在不让他与父亲联系。可娜塔利娅给住在莫斯科的谢尔盖的妻子寄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却被退回到奥斯陆银行，附言是收款人不详。这还不算，手头拮据也使托洛茨基担心。出版商的预付款刚够他支付迁居挪威的费用和偿还欠亨利·莫利尼耶的钱，这笔账他想在与莫利尼耶派决裂之前还清。从9月29日托洛茨基在奥斯陆医院写给哈罗德·艾萨克的信中可以判断，他在金钱方面的处境何等困难，托洛茨基在信中请求帮助他度过“财政危机”：他的住院费每天须交10克朗，而他拢共只有100克朗。[3]

恰恰是在圣诞节前夕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以及几位年轻的挪威人动身前往霍涅弗斯以北蛮荒的山区，指望在新鲜的空气里进行几天体育锻炼会改善他的身体状况。他们动身的日期应该记住——1年以后，在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审讯过程中，维辛斯基断言，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的秘密会晤恰好就在这个时间；皮达可夫

---

① 此信所署日期为1935年12月27日，是写给廖瓦的，但看样子也同时写给国际书记处的另一个成员，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1936年1月14日及3月22日的信；同上。

③ 与哈罗德·艾萨克的通信；同上。

本人供认他从柏林乘飞机抵达奥斯陆,然后从机场坐汽车直接去见托洛茨基。这些证词遭到了挪威当局的否定,他们证实1935年12月末以及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数月中没有一架德国飞机曾在奥斯陆降落。托洛茨基的旅伴们也证实没有人能坐汽车抵达他们和托洛茨基所在的那个地方。"那年的冬季格外寒冷。那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到处覆盖着北极的冰雪。这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因为在旅途中托洛茨基掉进了一个冰雪的陷阱之中。我们都穿着滑雪板,而托洛茨基的滑雪技术不高明,因此我们不得不组织一次完整的救援行动,而且当时还十分担心。"[①]

此后不久,由于又一次连医生也感到吃惊的托洛茨基身体状况的急剧变化——他复元了,并重新开始写作《被叛卖的革命》一书。此后的6个月中他一直忙于写作此书,直到把它写完。

※ ※ ※ ※ ※

《被叛卖的革命》一书在托洛茨基的文字工作中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这是由他亲手写完的最后一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此书中他对苏联社会作了最后一次分析,并对其直到斯大林时代中期的全部历史作了概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复杂的一部。此书既显示了托洛茨基的力量,也表明了他的弱点。书中充满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和工人国家中官僚集团的作用问题的新颖独特的思考。作者同时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国际地位,并力求前瞻未来,而且还大胆地提出了尽管有部分错误的预言。该书是对其时

① 这是曾陪伴托洛茨基出行的H.K.达尔先生和夫人讲述的。另见《列夫·托洛茨基案》第204-223页。

代的一次深刻的理论研讨，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号召在苏联进行革命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宣言。托洛茨基在此书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他既是一位高度客观的思想家，又是业已被打垮的反对派的领袖，而且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册子作者和论战者。该书中论战部分形成该书的最通俗的部分，并使它的客观性与分析性论证黯然失色。由于其丰富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方法，《被叛卖的革命》是本世纪中最出色的论著之一。它既能给人以教益，也能把人搞糊涂。对它的理解是如此众说纷纭，这是任何其他政治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就连此书的书名本身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套语之一。

《被叛卖的革命》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时代关键时刻的一个批评性反应。莫斯科官方刚刚宣称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可在此前不久，莫斯科还满足于谦虚的说法，即“社会主义的基础”才刚刚奠定。工业化刚取得一点儿成效，集体农业的巩固刚刚显示出最初一些表面的征兆，人民生活前不久才有所改善。30年代初的饥馑和血腥屠杀刚刚过去，斯大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的确应当反映新的时代：宪法正式取消了对过去的有产阶级的歧视，规定了平等的普选权。这就是假定，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需要有某种特殊的宪法来加以保障，因为实际上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已然诞生了。然而，宪法在赋予公民以平等投票权的同时却剥夺了所有人的选择权和投谁的票的权利。与以前的苏联宪法不同的是，它使一党制神圣化。那些宣传家们断言，这一体制和一个坚如磐石的政党与一个没有阶级冲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本身是相适应的，而多党制却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性。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时代，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很大，“社会主义竞赛”演变成了一场为了争夺特权与生活必

需品而进行的野蛮的殴斗，斯达汉诺夫运动将这种殴斗扩展到了全国各工厂的每一台车床和煤矿的每一个掌子面，少数人的富足与多数人的贫穷对比以最令人厌恶的形态出现。曾猛烈抨击“平均主义”的斯大林成了一些暴发户的首领。他刺激他们的胃口，嘲笑约束他们的怯懦和顾虑，将新的不平等当做社会主义的成就而大肆赞扬。新的等级制度也已经形成。它的等级划分十分严密，级别、称号和特权分明，漫长的权力阶梯上的每一个台阶都以惊人的精确性标了出来。在武装力量中，放弃原先的“无产阶级民主”，走向新的集权制现象表现得最明显，军队又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军衔制。在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的礼炮声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类似于复辟时期的气息。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精神生活深受影响。20年代曾经使得许多外国教育工作者赞不绝口的进步改革被当做极左迷误而受到批判。民族主义的墨守成规和旧式的家长制式的纪律越来越深地渗透进学校的每个年级和每间教室，毒害着年轻一代的思想和心灵。官僚们对科学、文学和文艺的监督已经成为令人无法容忍的折磨。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国家都不明智地强行实施着一种绝对权力，将自己美化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保护者。独裁者被吹捧为各族人民之父、一切智慧的源泉、人类的恩人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

托洛茨基通过把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对比的方式否定了斯大林的这一野心。他指出，社会所有制形式占主导地位还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它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繁荣为前提。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当时苏联所充斥的匮乏和贫困的基础上的。它们只能导致极端不平等。斯大林滥用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原理：在低级阶段社会实施“按劳取酬”，在高级阶段实施“各取所需”。斯大林宣称苏联已经处于低级阶段。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是在滥用马克思的

权威来为自己所实施的不平等辩护。尽管马克思确实早已预见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等仍将保留，但他从未想过，它会像在斯大林统治之下所发生的那样扩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苏联社会只不过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半路上。它既可能向前进，也可能向后退。它的前进仅仅取决于它的不平等将在何等程度上被克服。不平等的扩大证明了社会在倒退。

斯大林的专断和肆无忌惮是倒退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宁在其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原理，使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习惯思想。现在，托洛茨基捍卫这一思想以反对斯大林的篡改。他坚持认为国家不消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即便是在初级阶段上，社会主义也意味着阶级对抗和政治强制手段的消失。而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只应保留其纯粹的行政管理的功能——而且它“管理的是物，而不是人”。列宁所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半国家形态”，它是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的官员应由投票选举产生和替换，而且支付给他们和工人一样的工资，为的是不让他们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官僚集团。但在落后而又孤立的俄国，这一计划却是无法实现的。向社会主义的迈进应以国家强制性力量消失的程度来衡量。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国家地位的强化本身就否定了斯大林所谓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斯大林证明国家是不会在一个国家中消亡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只不过等于间接承认社会主义同样也不可能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然而，强化国家力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因为斯大林恐怖的锋芒所指首先是“国内的敌人”，即共产党反对派。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批评大部分是“教条主义”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批评十分重要。因为它粉碎了斯

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野心,把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的实践区分开来。托洛茨基力求给马克思主义学派提供这样一种立场,以便使它能否认斯大林主义想让它承担的道义责任,并且使其得以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须对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承担责任,正如十戒和山顶布道无须对神圣宗教裁判所的行为承担责任一样。这一论证不仅具有道德或历史的意义,而且还对共产党员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赫鲁晓夫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宣称苏联已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依据是,斯大林在30年代就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这和斯大林的断言一样不现实。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苏联社会尽管已有了巨大进步,但离社会主义仍很遥远。由于苏联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全部思维都与社会主义业已建成的教条相关,而且迄今总是在围绕着这一教条而形成的观念的怪圈中运行,因此,将托洛茨基的标准用于分析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势必会导致对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更加彻底的修正,其程度将远远高于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第一个10年中所进行的修正。

《被叛卖的革命》是托洛茨基对官僚集团的一份经典起诉书。托洛茨基又一次在"普通女工和扼紧了她们咽喉的官僚主义者的冲突"中站在了女工一边。托洛茨基认为捍卫特权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特权赋予斯大林的政策以某种统一性,该政策将热月政变精神、外交手腕和破坏共产国际结合在一起。统治集团捍卫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压制国内人民的不满,对抗国外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冲击。托洛茨基分析了党的机关、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和所有军官队伍的管理者集团的社会构成,他们总计已达居民总数的12—15%,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深知自己的分量,由于享有特权,他们已趋于保守,全力以赴地维持国家和国际的现状。

托洛茨基不满足于只对官僚集团提出起诉，他再次考察了官僚集团是如何和为什么能在苏联取得政权的问题，官僚集团占上风的可能性是否隐藏在一般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之中。他走得比他以前的回答更远，并且更加清晰地强调苏联在“匮乏和贫穷”环境下恢复不平等的客观原因。但他同时又强调，某些这类因素在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仍将反复出现，因为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无法彻底根除不平等现象。甚至美国这样一个“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也还无法实施按需分配劳动报酬”。这个国家也同样在为相对匮乏所苦，这迫使它即使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必须保留劳动报酬上的差别。所以，紧张状态和社会冲突并不会消失，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要比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缓和得多。因此，“官僚主义倾向……即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将到处显现”。[①] 马克思和列宁都清楚这一点。马克思曾经谈到保留物质财富不平等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在某些方面仍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它的管理是按照无产阶级民主精神实施的。但只有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才表明了问题的真实范围究竟有多大，并使人密切关注后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个社会中的矛盾。革命政府既应保留不平等，同时又要同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它的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政府应当鼓励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以保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迅速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力求减少并最终取消特权。

总之，只有当社会财富增长超过人类的幻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普及能够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时，这一矛盾才

---

① 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第57－59页。

能解决。而在这些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以前,革命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性:一是社会主义性,因为它保留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二是资本主义性,因为生活资料的分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进行的,所以带有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指出这一矛盾和这种双重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对之加以清晰的表述,是托洛茨基对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①]

在回过头来分析苏联社会时,托洛茨基承认,他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会与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水火不相容,而且,由于促进和扶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铁的必要性",国家竟不会"消亡"。这样一来,对苏维埃民主制的破坏,其原因就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阴谋,因为它无非是更加广泛的客观进程中的一个主观方面。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政府带有任何革命政府都具有的"双重性",但在这个政府中,资本主义成分"依赖社会主义成分而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就其实质来说,官僚集团是不平等现象的传播者和保卫者",由于商品严重不足,所以它像警察那样行动"以维持秩序"。它"知道"该给谁而谁却得等一等。然而,"分配财富的人是从来都不会漏掉自己的。于是从社会需求中便会产生一个机构,它远远超出了其社会所必要的功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与此同时,也成为整个社会机制的最大危险的源头。……群众的贫困和文化上的落后再次在一个手持大棒的统治者的狰狞形象中体现出来。"[②]

托洛茨基问道,苏联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已经达到足以消除社会主义因素的地步了呢?他再次坚决否定了这种观点,

---

① 《被叛卖的革命》,主要参见第2章《社会主义与国家》。

② 同上,第111页。

即认为官僚是一个“新的阶级”，苏联人民正遭受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没有资本家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是矛盾的。至于官僚，它并不具有作为一个阶级所应具有的社会单一性，而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赖于它所掌握和管理的生产资料。充其量仅只实施管理功能这一点并不会使苏联工业界与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一个阶级，尽管他们全都像对待自己个人的产业那样对待国家和工业。斯大林主义所鼓励的不平等，其存在只限于个人消费领域。特权集团不可能占有生产资料。与任何剥削阶级不同，他们不可能有权对别人的劳动实施监督并能获得日益增多的财富这种形式来发财。就连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也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交织在一起。因此他们必须保卫这一所有制形式，这样，他们也就履行其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必要的和进步的功能，尽管在他们履行这一功能时社会需要付出十分重大的代价。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统治的国家中的社会平衡并不稳固。最终取胜的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不平等现象的逐渐增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管理者集团不会永远只满足于消费上的特权。他们迟早会力争形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靠剥夺国家成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股东和所有者。“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异议，即对于大官僚来说，只要能保证使他有必要的收入，采用怎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都无所谓。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主义者权力的不稳定性问题，而且也忽略了其后代命运的问题。……他们的特权如果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儿孙，那么这特权也就只有一半的价值。但遗嘱权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只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不够，必须还得是股东。官僚集团在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里的胜利意味着它已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是不会领导这种“转变”的。他的制度是建立

在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正在转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那些官僚们因而必然会同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而鼓励官僚主义这种积聚财富倾向的斯大林无意中不仅破坏了他自己的统治,而且会破坏所有革命成果。托洛茨基觉得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他毫不犹豫地指出,1936年的宪法"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复活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认为,官僚集团或它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的代理人。但如果说过去他曾把官僚集团视为富农和耐普曼的辅助势力的话,那么现在,在这些阶级都已被"消灭"以后,他认为官僚集团是一支独立的力量。[①]

从回溯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的官僚集团不仅没有攫取生产资料,而且在未来的10年中也仍是社会所有制形式的保护者。但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集团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这只是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他相当谨慎地指出,不要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他特别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他是在斯大林反平均主义倾向和反早期布尔什维主义达到顶点的时候探讨这一史无前例的复杂而又神秘的现象的。理论家从不认为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这些倾向会释放出一种深深敌视社会主义的强大而又独立的力量。作为"正统列宁派"和反抗革命原则的双重复合体的斯大林,有时显然已把俄国带到了复辟的边缘。托洛茨基毫不怀疑斯大林不会跨越这道界线,但他担心别的人会踩着斯大林的尸体最终跨越这道界线。[②]

恐惧也同样压迫着斯大林,因此他对他的官僚也十分狂暴,并

---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40、251页及同书各处。

② 同上,第236-237页。

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斗争的借口下在连续的大清洗中大量地消灭官僚们。大清洗的成果之一是防止了管理者集团联合成为一个牢固的社会阶层。斯大林唤醒了他们身上发财致富的本能,并用这种本能套住了他们的脖子。这是经常的恐怖造成最不为人所知、最少被人讨论、然而又非常重要的后果之一。尽管一方面大恐怖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的干部,迫使工人阶级和农民俯首贴耳;另一方面大恐怖又不断地改变着整个官僚集团的成分,使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允许从原生质中或阿米巴变形虫阶段中滋生出有其社会政治身份的、有生命力的顽强的机体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管理者集团有这种愿望,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站在自己的企业和集中营的交叉路口的管理者集团是无法着手积聚资本的。斯大林“消灭”了富农,还不断“铲除”新资产阶级的萌芽,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自己特有的野蛮的独裁方式,但他这样做的前提则是托洛茨基也默许的。无论如何,潜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并非托洛茨基的杜撰,但他显然夸大了它的生命力和它自我实现的能力,就如同他当初夸大了富农的力量一样;却对斯大林的狡猾、顽强和残酷无情估计不足。斯大林采用的在国家中刺激和压制资本主义因素的方法对托洛茨基来说不仅格格不入,而且也是他无法理解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只有自觉而又积极的工人阶级才能制止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倾向。

但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知道,苏联工人不愿起而反抗官僚集团的原因是,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仇恨官僚,但担心“推翻官僚集团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当官僚集团仍在继续履行其必要功能时,工人“便会认为它是其自己的部分成果的卫士。一旦他们看到有其他的可能性时,他们必然会把不诚实的、无耻而又不可靠的卫士赶跑的。”这是多么矛盾的说法呀!同一个社会集团,可以成为新的有产阶级而消灭革命,又在某种程度上仍不

失为革命的保卫者。托洛茨基也知道,"那些教条主义者是不会满意于"他对局势的评价的,"他们想要的是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当然,如果社会现象永远都具有完整性质的话,那么社会问题无疑会简单得多。但是他不肯把现实强行塞入简洁的公式并"为了逻辑的完整性"给"尚未完成的过程盖棺论定"。面对全新的和"动态的社会构成",理论家只能提出一个工作假设,让事件来验证它们。[1]

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团会变成新的有产阶级的假说。当时,国防的需要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欧和中国的灭亡极大地巩固了苏联经济的国有化结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出于自身的考虑而促进或帮助了东欧和亚洲的革命,由此有力地遏制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国内实行的工业化,苏联工人阶级数量的激增,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人阶级自信心的提高都具有抑制资本主义成分的倾向。在斯大林死后,官僚集团也被迫对群众的财产平均主义一再作出让步。当然,国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紧张状态仍然存在。由于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结构所固有的特征,这种紧张状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仍将存在。管理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技工们仍是享有特权的集团,但他们与劳动大众之间的鸿沟已经缩小。50年代中期、末期以及60年代初期国内这些矛盾因素之间的平衡已与托洛茨基写作其《被叛卖的革命》时有明显不同。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经预见到了事件会如此发展的可能性:

在苏联体制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由于它与

---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41－242、269－270页。

> 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发展了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了满足上层，它又把资本主义的分配规则引向更加极端的地步，因而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好了准备。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不会无限制地扩大。或是资产阶级规范将以某种形式扩大到生产资料领域；或是相反，分配标准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相适应”。[①]

过了20—25年以后，当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开始虽不情愿，但却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分配方式更密切地适应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政策时，事件的发展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的有产阶级抬头的假说是悲观的、无根据的，尽管它反映了平衡状态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因素极其不利而且危险的形势。托洛茨基对革命后国家所作的动态矛盾的分析尽管有些“悲观主义”的味道，但它迄今仍不失为理解嗣后社会演变过程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为了反对这一“贪婪、虚伪而又无耻的统治者集团”，为了铲除新的有产阶级的萌芽，托洛茨基提出了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纲领。他写道：“摆脱危机的和平出路是没有的……还没有一个魔鬼会自愿削掉自己的利爪……苏联官僚集团是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的。”“落后国家中的无产者命定会完成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而根据现有全部资料看，无产者还须以反对官僚集团的第二次附加革命来补偿它所拥有的这一历史特权。”[②] 托洛茨基所宣扬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它将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制度，但并不改变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这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前景：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想到在进行社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31－232页。

② 同上，第271－272页。

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得重新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因为他们以为工人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历史已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同资产阶级制度有多种统治方式——君主制、共和制、立宪制和独裁制——一样,工人国家的政治存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官僚专制制度到通过民主的苏维埃实施统治。托洛茨基证明,如同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用1830和1848年的政治革命——在其进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统治集团和统治方法而非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补充"1789至1793年的社会革命一样,工人阶级亦应对十月革命予以"补充"。反对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是本着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行动的。工人阶级亦应合理行动,将其国家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样的一种政治革命与恐怖主义活动无任何共同之处:"个人的恐怖行为是失去耐心或已经绝望的个人的武器,他们往往是属于年轻一代官僚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有在得到绝大多数工人的公开拥护时,他们才能成功地完成社会革命,这一点已经成为公理。因此,当工人还把官僚集团当做是"其成就的卫士"时,托洛茨基不会号召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对它的。托洛茨基提出的是革命的思想而非革命的口号。他提出的是与斯大林主义长期斗争的方向而非对直接行动的指导。

托洛茨基如此表述他的革命纲领:

> 问题不在于以一个领导集团取代另一个,而在于改变管理经济和领导文化的方法本身。官僚独裁专制制度应当让位于苏维埃民主制。国家今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恢复批评权和确立真正自由的选举。这必须以恢复苏联各政党的自由(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自由)和以行业工会的新生为前提条件。将民主带入工业领域意味着

>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计划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核。对经济问题的自由讨论会降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挫折所造成的附加开支。造价昂贵、华而不实的设施——各种会议宫、新剧院、装门面的地下铁道——的建设都要压缩，工人住宅的建设要扩大。“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要严格地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以便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其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平等。要立即废除头衔，把勋章等一类丁当响的小玩意儿投入坩锅。年轻人有可能自由地呼吸、批评、犯错误、成长。科学和艺术要摆脱束缚。最后，对外政策要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上来。①

托洛茨基在此列举了早在他赞成改革的那一时期中就已为人所熟知的一些要求。他只在一点上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也就是要求“真正的选举自由”。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面临着两难选择：他既抛弃了一党制原则，但也不赞成无限制的政党自由。他退回到了1921年以前的公式，当时他曾说苏维埃政党自由的复兴亦即拥护十月革命的政党自由的复兴。可由谁来判定哪些是“苏维埃政党”而哪些又不是呢？例如，孟什维克是否亦应有可能充分利用“复兴”的自由呢？托洛茨基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无疑，他会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能脱离具体情况事先解决的。与此相仿，在对待平等的问题上他也十分小心。他从未说过什么要“取消资产阶级分配标准”——这些标准应予保留，而只是说要将它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应当“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逐渐排除这些标准。这样一来，政治革命就理应给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技工保留某些特权。而如果说连他本人有时出于论战的狂热而毫无顾忌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73页。

地说出"推翻"或是"废除"官僚集团的话,那么,以上的解释则将这一课题置于更加真实的背景之上。托洛茨基心中所想的是坚决缩减而非消灭官僚特权和管理者的特权。

这一纲领在提出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其中所包含的多数思想在斯大林身后推行的改革运动中再次出现。但一个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的同时是否对前途持有一种过分教条的观点?他是否违背自己的警告而给"未完成的过程盖棺论定"了呢?根据《被叛卖的革命》的全部精神实质可以明显看出,他没有看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托洛茨基生前还是在斯大林时代所剩的那一段时期中的确都没有出现过。在这一时期中,苏联也未曾有过进行政治革命的机会。这是陷于绝境的时期:斯大林主义这个结,无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还是其他方法都解决不了。任何革新纲领,无论是革命的还是改革的,都是幻想。但这并不能妨碍托洛茨基那样的斗士寻找道路。然而,他在其中探索道路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许多年以后才被一系列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打破。当这一切发生之时,苏联开始首先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背离斯大林主义。而这些改革都正是由托洛茨基已经说过的那些因素引起的:即经济的进步,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苏联孤立的结束。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只能逐渐进行,因为在斯大林时代的末期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够并愿意以革命方式行动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在斯大林身后的第一个10年期间,"从下面"也未曾出现过任何一种哪怕是有利于改革的、自主而有能力表达自我的群众运动。由于斯大林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早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所以对苏联来说,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乃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领导集团本身应当主动与之决裂。例如,由于命运的捉弄,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开始消灭斯大林主义并违反自身意

愿部分地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政治遗嘱。[①]

他们是否能继续并且完成这一工作呢？政治革命是否仍是必要的呢？乍看起来，进行革命的机会如托洛茨基生前一样渺茫，与此同时，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则更加现实。正如列宁曾一度指出过的那样，任何革命都必须具备如下条件：a)统治者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统治；b)、处于不幸、绝望和狂怒中的被统治者拒绝像以前那样生活；c)、有一个充满决心并有能力充分利用所能出现在它面前的一切可能性的革命政党。然而这些条件在这个国家中未必会实现。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富有生命力，生活水平日益改善，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前所未有，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景。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中，人民的希望与领导集团的自私之间的任何冲突（苏联社会始终深受这种冲突之苦）与其说会导致革命的爆发，不如说会增强有利于不断改革的压力。因此历史证明，正确的是那个在12或13年中为改革而斗争的托洛茨基而不是那个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中宣扬革命的托洛茨基。

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结论。工人国家中的官僚集团问题的确是如此新颖和复杂，以至不可能得出最终的结论。而我们也无法

---

① 我在我于1953年出版的《斯大林以后的俄国》一书以及斯大林时代刚刚结束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都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当时，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其理论机关刊物《第四国际》上用整整一期的篇幅（1954年冬季号）讨论了“是托洛茨基，还是多伊彻”的问题，他们的领袖詹姆斯·坎农愤怒地指责我是“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伯恩斯坦”。我的罪过在于说出了这样一句预言：在以后的几年中在苏联将不会有任何从事“政治革命”的机会，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开始了（而这却是斯大林身后第一个10年中的现实和主要政治特征）。然而，我所依据的论据是，消灭所有的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其结果是使得苏联社会在政治方面走向无序，因而不能自我表现，不能自下而上地发挥其首创精神。奇怪的是，西方托洛茨基主义者却根本不理解在苏联消灭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他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而产生的这一后果。

事先判断:官僚集团在放弃特权方面能走多远;在一党制条件之下,有利于改革的人民的压力会具有怎样的力度和效应;以及"垄断"制度是否会逐渐解体而成为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允许有言论、结社自由的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强制性和对抗性的消失,隐含在其中的社会紧张会在何种程度上缓和或是消失?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消除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对抗性?只有比任何哲学想象的意外情况更多的生活经验才能提供答案。无论如何,本书作者宁愿把如何最终评价托洛茨基有关政治革命的思想的任务留给下一代历史学家来解决。

※ ※ ※ ※ ※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对自己的苏联热月政变这一概念所作的修正。我们已经说过,20年代中,这一抽象的历史相似性曾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过激情和不安。我们还曾指出,那是个活人被死人抓住的例子。[①] 大约10年之后我们看到在挪威一个小乡村里的托洛茨基仍然在同1794年的法国幽灵搏斗。我们记得,只要托洛茨基赞成在苏联进行改革时,他就否定那种最早由工人反对派提出的观点,即俄国革命衰退到了热月政变或后热月政变阶段。托洛茨基论证说,热月政变是斯大林政策中所包含的一种危险性,但尚未成为事实。在最初的流亡岁月中,托洛茨基仍旧捍卫这一立场,这使他既与敌人对立也与朋友对立。但当他判定反对派应当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和苏联的政治革命不可避免以后,他经过思考得出结论:苏联早已生活在后

---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九章。

热月政变的时代里了。

托洛茨基承认,历史相似性与其说能启发人的智慧,倒不如说能使人的头脑更加混乱,尽管如此,他仍详尽地阐述这种相似性。托洛茨基指出:当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和复辟时,他们错了;在他们对热月政变作了这样的界定后坚持认为俄国不曾有过热月政变时,他们是正确的。但这个判断却是错误的和反历史的:最初的热月政变不是一次反革命,而不过是“革命范围内的反动阶段”。热月政变分子并未破坏法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1789至1793年间所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财产权关系。但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确立了反人民的统治,并为拿破仑的执政和帝国时代准备了舞台。在苏联,可以与之相比的事件早在1923年就发生了,当时斯大林镇压了左翼反对派,并在十月革命的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了反无产阶级的制度。托洛茨基始终把法国革命的日历摆在面前,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统治带有波拿巴的特征,因此苏联生活在如同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条件下。从这种前景看,复辟的危险是完全现实的。在法国,在热月政变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之间隔了20年。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新的革命并回到苏维埃民主去的号召则是“平等会”秘密执政内阁所提的回到第一共和国的口号的回声。

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开始越来越多地“召唤过去的幽灵”,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英国清教徒祈灵于旧约中的预言家,雅各宾党人则祈灵于罗马共和时代的英雄和美德。马克思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单单是为了“滑稽地模仿过去,而是真诚地想要重新找回革命的精神”。[1] 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05页。

革命无需借用过去的服装,因为它对自己的性质和目的有清晰的认识。的确,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并未给自己穿上一套这样的服装,而且他们也不需要以前革命的象征物。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他们却从雅各宾党徒那里承袭了他们的所有噩梦和恐惧。即"清洗"噩梦和对热月政变的恐惧,并以自己的行动在自己的想象中将它们大大地夸大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单地模仿,而是因为他们是在与相似的困难作斗争,并力争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他们转向黯淡的过去,为的是不重蹈覆辙。况且,尽管布尔什维克确实未能避免在内部斗争中兄弟相残的恐惧,但他们终究得以避免那种导致雅各宾派走向毁灭、法国革命走向终结的完整的宿命怪圈。纠缠着布尔什维克的对热月政变的恐惧则是自卫和自我保护心理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今托洛茨基也承认,10多年以来反对派一直敲着警钟要人们警惕热月政变,却并未清晰地认识到热月政变的先例的意义。难道说现在他本人对热月政变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晰了吗?

法国革命中的热月政变是近代历史中最复杂、最神秘的现象之一,这一点部分地说明了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它的原因。在雅各宾派内部发生过一系列斗争,在这一过程中,领导着党的中间派的罗伯斯庇尔消灭了党内的右翼和左翼——丹东的信徒和埃贝尔分子。但在此后,热月政变分子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统治的终结标志着他那一派以及整个雅各宾党的衰落。热月政变之后不久雅各宾党人俱乐部就被解散了,不复存在了。热月政变用"法律和秩序"的统治取代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使已遭受多次失败的巴黎平民彻底失败。他们取消了罗伯斯庇尔的准财产平均主义的粮食分配制度,废除了罗伯斯庇尔保持的粮食最高限价。因而使得资产阶级可以放手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积聚财富

并取得他们即使是在帝国时期对他们也是禁区的社会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在革命力量衰落、人民大众失望和冷漠的背景下，一个革命的制度从人民阶段转入反人民阶段。

只需简要地描绘一下热月政变的不同方面就足以看出断言俄国在1923年即已经历了自己的热月政变的托洛茨基错在什么地方。反对派在当时的失败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可与雅各宾党的垮台和解体相比的事件。它与早在热月政变前发生的左派雅各宾党人的失败更为相似。在托洛茨基撰写《被叛卖的革命》时，苏联已经站在了大清洗的门坎上；而在法国，“清洗”是雅各宾时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断头台才停止运转。热月政变实际上是对无休止的清洗的绝望情绪的一次爆发，多数热月党人都是在大屠杀时期侥幸活下来的前丹东信徒和前埃贝尔分子，他们侥幸逃过了对这两派的屠杀。在俄国，如果1936年至1938年审判过程结束后，残余的布哈林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功地举行反斯大林政变的话，那才与热月政变相似。

另一个差别也许更重要。热月政变导致法国社会革命的终结和财产关系的改变。而在苏联，这一过程在斯大林上台后并没有终止，相反倒是最急剧的变革——农业集体化是在他的统治下进行的。当然，无论是1923年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任何其他时期，盛行的都不是“法律和秩序”，哪怕是极端反人民形式下的“法律和秩序”。20年代初和热月政变时期只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人民革命力量的衰落和群众的绝望和冷淡。在这种条件下，罗伯斯庇尔力求使雅各宾党的残余留在政权里却未成功，而斯大林竭力保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亦即他那一派的专政，却成功了。

当然，在斯大林反对财产平均主义的政策中掺有许多热月政变的调料。有趣的是，1921年，当孟什维克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成是“苏联的热月政变”时，无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未进行过

抗议。相反,他们还庆贺自己和平地搞了一个类似于热月政变的事件,既未破坏自己的党,也未丧失政权。托洛茨基在1921年曾经这样写道:"不是他们(指孟什维克)而是我们自己作出的诊断,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保留无产阶级政权而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的热月政变情绪和倾向所作的让步是共产党作出的,它既不会破坏体制,也不会使党丧失统治地位。"① 斯大林也对其官僚集团和经理集团的"热月政变"情绪和倾向作了很大让步,"既未破坏体制,也未丧失统治地位"。无论如何,正是这一历史相似性使得托洛茨基在1921年几乎是夸耀地说他和列宁搞了半个热月政变,因而他在1935年断言,苏联已在热月政变的条件下生活了12年。但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未察觉:这样一种相似性的确是与其说能够启发人的智慧,倒不如说只能把人搞糊涂。

托洛茨基本来可以向斯大林提出更有历史根据的指控,即斯大林确立了与罗伯斯庇尔相似的恐怖统治,并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后者,但托洛茨基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布尔什维克传统不允许他提出这样的指控。应当提醒的一点是,1903至1904年间,当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主义第一次决裂时,他曾指责列宁为雅各宾主义者,而列宁则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20世纪"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来作答。列宁和托洛茨基心中所想的不是同一个罗伯斯庇尔:列宁指的是在反对吉伦特党人的斗争中保证了革命胜利的罗伯斯庇尔;而托洛茨基所指的却是那个将自己的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不仅在列宁的心目中,而且在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一个世纪后业已进入革命"先贤祠"的罗伯斯庇尔遮掩了指挥"清洗"的罗伯斯庇尔。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后悔曾用罗伯斯庇尔主义指控列宁,因此不愿再以此指控斯大林。在以

① 托洛茨基:《红军与白军之间》第77页(此书托洛茨基于1922年2月竣稿)。

往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对雅各宾主义的推崇和赞扬使得托洛茨基最终与罗伯斯庇尔认同，这使他把自己的敌人视做热月党人，尽管他们实际上不是。当然，他所敲响的警钟大大有助于唤醒全体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派成员提高警惕性。除此之外，在苏联仍然还存在着某种热月政变式的情绪，在任何一个工人国家里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与“资产阶级因素”和“资产阶级分配方式”一起）。40和50年代中，拥有变幻莫测的充沛力量的俄国革命在规模和冲力上远远超过了法国革命。无论如何，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我们只会对这一奇特现象感到惊奇，即热月政变的幽灵居然能如此长久地徘徊在俄国舞台上，而且存在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 ※ ※ ※ ※

渗透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的真正的和表面上的悲观主义在托洛茨基力求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的影响的章节中也有所表现。他指出，新社会制度建立的“国防所具有的优越之处是在旧俄国无法想象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将民用生产转变为军工生产相对容易得多，“甚至新企业的建设和装备也以国防利益为中心”。他着重指出苏联武装力量在掌握各类现代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指出“红军中有生力量和机械力量的比例总体说来已达到西方先进军队的水平”。[1] 1936年，这一观点还不是西方军事专家普遍赞同的观点，而托洛茨基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一点，无疑是想要给西方列强的政府和总参谋部留下强烈印象。但他认为苏联国防的大患在于军官阶层中的热月精神和军队中取代革命民主组织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首先在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写道，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196－197页。

斯大林起初不重视来自第三帝国的危险，而现在又主要想依靠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结盟、国际联盟和“集体防卫条约”与第三帝国对抗，为此，在战争之时他将放弃向交战各国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发出任何真正的革命号召。

托洛茨基问道：“能否期待苏联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呢？对一个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也应是直截了当的：如果战争仅只是战争的话，那么苏联必败无疑。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强大得无可比拟，如果西方的革命不能使其瘫痪的话，那它就会铲除十月革命所孕育的制度。”[①] 尽管西方业已四分五裂，但归根结底它终究会联合起来，“以便不让苏联在军事上取胜”。早在慕尼黑危机发生之前托洛茨基就指出，法国早就把与苏联的同盟视为“一纸空文”，并且仍将继续这样对待它。无论斯大林如何竭力通过人民阵线去保持这一条约，只有斯大林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再次让步，联盟才能实现，即便那时，各同盟国也会利用苏联在战时的困难而力图破坏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求它对资本主义全面让步。与此同时，农民的个人主义会使得集体农业受到威胁。但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战争也同样使革命迫近欧洲。因此，总的说来，“尽管苏联的制度矛盾重重，但与敌人的制度相比，它在稳定性上仍然有巨大的优势”。“……波兰资产阶级使出浑身解数却只能加速肯定会使他们灭亡的战争的到来”，而“希特勒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远比威廉二世要少得多”。托洛茨基对欧洲革命的信心一如他对在没有这样一场革命的情况下对苏联前途的悲观主义一样强烈：

战争的威胁以及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都是现实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16页。

的,但革命也是现实的。如果革命不能防止战争的话,战争将有助于革命。第二次生育往往比第一次容易得多。从新的大战到第一次起义恐怕用不着等待整整两年半时间(如1914年以后那样)。而革命一旦发生,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结底,苏联的命运最终不是在各国总参谋部的地图上而将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被决定。只有那毫不妥协地与其本国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免遭溃败的命运、不受来自"盟国"的背后打击。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中取得胜利,那么,甚至苏联在军事上的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仍得以维持,那么,任何军事上的胜利也无法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苏联如果没有红军,就会像中国那样被打败,被打得四分五裂。只有红军对未来资本主义敌人的顽强英勇抵抗才能创造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有利条件。因此,红军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唯一的历史因素。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并不是站在现状的旗帜下(斯大林的外交在30年代捍卫的是这面旗帜),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使国界永久化,而是恰恰相反,是以革命的方式取消国界。我们要的不是现状而是欧洲社会主义联邦![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与这种二难抉择相比,远不是那么清晰明确。如若根据《被叛卖的革命》一书来罗列托洛茨基预言中的

---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219-220页。

错误,那真是再容易不过了。但他的每个错误都含有真理的成分,其错误所依据的那些前提都含有合理性。因此,我们从他的错误中所能汲取的教益远比大多数政论家正确的陈词滥调要多得多。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与马克思十分相像:即使当托洛茨基的"算术"结论不准确时,他的思想在"代数学上"也仍是正确的。即使他的预言错了,那也是因为他常常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整体评价却仍然是深刻的,而且对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后果仍然十分重要。[①]

《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产生影响的方式十分特别,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此书于 1937 年 5 月问世时,恰好是在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在对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的公开审判刚刚结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将军被处死的前夜。该书书名有如刺耳、绝望的抗议和呐喊,它与斯大林的刽子手们震耳欲聋的排枪射击声产生了古怪的共鸣。此书是托洛茨基悲愤怒斥的高度浓缩,它断言十月革命已遭到彻底的、无可挽回的失败,说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们已与苏联彻底决裂。因此,《被叛卖的革命》成为使人震惊、永志不忘,同时又是空泛的口号。长期以来,该书的扉页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它的内容更强烈。此书的扉页往往阻碍读者去了解托洛茨基那复杂而又细致的论证。托洛茨基有关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可能崛起的论断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看不到他那些与这一论断正相反的思想。就连托洛茨基的许多学生也都把托洛茨基仅仅视为可能性的东西当做现实性。他那辉煌而又考究的论战风格本身也促使了这种不确切理解的产生,加上由于批判地研究他的思想远不如模仿这位语言大师的辛辣语调容易,所以这种风格吸引了大量二流作家群起效尤。

---

① 本卷的跋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据。

《被叛卖的革命》成了托洛茨基教派的圣经，它的成员们在托洛茨基死后的许多年中仍然虔诚地诵读着这本书的每一行文字。此书的影响范围极广，甚至连西方前共产党员于40和50年代所出版的作品中也长期留有此书影响的痕迹。其中，有些人不是靠托洛茨基丰盛的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是靠它的残羹剩饭为生，他们只给这些残羹剩饭洒上些自己的调料，居然也赢得了见解独到的美誉。3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就是以断章取义地从托洛茨基的理论中摘取的若干片断为基础而写下了《管理者的革命》一书。在伊格纳齐奥·西龙(Ignazio Silone)和阿尔图尔·凯斯特勒(Artur Koestler)的早期论著中也响彻着《被叛卖的革命》的回声。此书给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其小说《一九八四年》中，占有许多篇幅的《书籍》的一些片断即系有意套用《被叛卖的革命》中的话写成。书中人物大哥的神秘对手伊曼纽尔·戈尔茨坦即以托洛茨基为原型。最后，还有按顺序而非按意义来说的最后一个例子：40和50年代冷战时期的许多有雄心的苏联学学者和宣传家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这本书中汲取论据和惯用语。[①]

尽管《被叛卖的革命》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但它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部经典之作，但它也是托洛茨基的最难读懂的一部论著。只有那些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这本书的有辨别力的读者才能从中获得教益。歌德在某次论及莱辛时曾经指出，尽管莱辛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但他对其

① 1961年，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个政府部门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叛卖的革命》的小册子，旨在为美国反对古巴的军事行动辩解。国务院、五角大楼、古巴前甘蔗园园主和某些“激进分子”将其当做革命叛徒而抨击的那个人就是菲得尔·卡斯特罗。在美国人的庇护下对古巴的入侵被说成是一次旨在恢复古巴革命的纯洁性的行动。

同时代人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某些方面甚至有害,因为只有智力与莱辛一样的人才能真正弄懂其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只是当莱辛死后,他的思想才间接地震撼了德国思想界。这一点对于《被叛卖的革命》一书的作者来说也是公正和适用的,而且也说明了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何以会遭到曲解以及这一影响本身被曲解的原因,此书的思想在苏联也已经能觉察到,尽管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仍是禁书。如今在苏联,在无意中重复着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各类报刊杂志数不胜数,而且在大学、企业、文学俱乐部、共青团支部甚至在领导者的圈子中都可以找到这类刊物。这里只需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例如,托洛茨基曾说,斯大林时代将主要以平庸无能、受勋者和溜须拍马者的时代载入艺术创作史册,如今这一论断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如今没有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下述说法,即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文学流派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而且

> 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里都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由于这种破坏绝大多数是无意识的,所以更加坚决。当今的统治阶层不仅认为自己赋有从政治上监督精神创作的使命,而且还要为其规范的发展开辟道路。武断的命令以同等的程度扩展到集中营、农艺学和音乐。党的核心机构发表指令性的不署名的文章,以指导建筑、文学、戏剧艺术、芭蕾舞,更不用说指导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了。官僚集团迷信地害怕不直接为它服务的东西,也害怕它所不理解的东西。[1]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173页。

如果有幸说并非所有这些论断都始终正确的话，那么，其中许多仍然是正确的，作为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批评家，已辞世的托洛茨基所说的话仍然比如今在世的所有非斯大林化者们更有力量：

> 形式主义和虚伪渗透了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生活。孩子们学会了开数也数不清的、使人窒息的、空洞无聊的各种会议，会上还有必不可少的名誉主席团、吹捧敬爱的领袖，他们的简单化的讨论完全跟成年人的一样，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思想更深刻的教育家和儿童作家不顾强加的乐观主义，有时也无法掩饰自己面对那种窒息学校环境的压制、虚伪和无聊精神所产生的恐惧。……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思想一样，只要一露头必将遭到批判。与此同时，苏联青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交流思想、犯错误、检查和纠正自己的和他人的错误。所有问题……都由别人代他们解决。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服从和唱赞歌……数百万共青团员居然连一个大人物都未能推举出来，其原因正在于此。
>
> 青年人投身技术、科学、文学、体育或象棋，是在为将来搞一番大事业打基础。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都与未经过很好训练的老一代竞争，并在某些方面赶上或是超过后者。但只要一涉及政治，就被搞得焦头烂额。

这位先知的愤怒、信念和远见是多么富于生命力呀，从他的笔端倾泻出这样的话来：

> ……今后要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采用苏联政府所采用的、侮辱人的落后的资本主义方法，而应采用更配得

上已得到解放了的人的方法——首先不能用官僚集团的棍子。因为这根棍子本身就是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份最使人厌恶的遗产。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社会主义之前先应当把它当众销毁。

※ ※ ※ ※ ※

托洛茨基撰写《被叛卖的革命》的那几个月，尽管工作紧张，但仍不失为一次休息。维克斯哈尔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又安宁。每天的工作日程难得被来访者打断。托洛茨基一家和克努德森一家每周一次到霍涅福斯的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老影片。托洛茨基的写作很顺利，写完《被叛卖的革命》以后，他打算立即着手写《列宁传》。看来他终于有了真正安全的避难所了。然而地平线上却时不时地出现一小团乌云。秋天将举行大选。从夏天起，一个亲纳粹的小党就抨击政府由于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而对国家的和平和幸福造成了威胁。领导这个党的是吉斯林(Quisling)少校。几年后，在德国占领期间，他当了傀儡政府的首脑，他的名字成了与占领者“合作”的同义语。但在当时，追随他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些政治狂人。他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最使人担心的倒是一家叫做《工人报》的共产党报纸。尽管读这份报的人不多，但它反映的是苏联大使馆的观点，它指责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恐怖活动的基地，并说其矛头针对的是苏联、苏联领袖，而且首先针对的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该报问道：“挪威工人还将容忍多久？挪威工党中央执行局何去何从？挪威政府何去何从?”有关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从事恐怖活动的基地”的谣言就是这样首次出笼的，数月之后，维辛斯基也附和了这一说法。

工党坚决否认了这些说法。舍费尔写道:"他们居心何在?想迫使挪威工人相信谎言……迫使工人政府逮捕托洛茨基?可是,要愚弄挪威工人和挪威工党政府可不那么容易。"执政党的其他代表也都以相同方式作了回答。[①]

但挪威警察局还是对托洛茨基实行了监视,他们不仅定期向司法大臣汇报自己的发现,还转发比利时及法国警察局的通报。有一个在布鲁塞尔的名叫夏洛克·霍尔姆斯(Sherlock Holmes)的人发现,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真正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而在奥斯陆,警察局总部一些深谋远虑的人开始认真研究这一使人担心的信息是否准确的问题。法国警察局证实了这条消息,并对托洛茨基秘书的来来往往表示担忧,因为他们全都是第四国际的代理人。这一侦探工作的杰作只是使挪威的大臣们感到十分好笑;要知道还在不久以前,他们,或是其中的某些人还竭力想要加入这个从事颠覆活动的组织呢。尽管如此,为了使警察局满意,司法大臣下令将托洛茨基的秘书扬·弗伦克尔(Jan Fraenkel)驱逐出境。弗伦克尔的位置很快就由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接替。他在维克斯哈尔生活了将近1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还娶了克努德森的女儿为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托洛茨基请求他的拥护者们把他的名字从第四国际的国际执委会委员名单中去掉,并在发表有关托派组织的内部事务的文章时不署他的名或只署笔名。[②] 托洛茨基拒绝接见外国报刊的记者,并极其小心谨慎地避免涉及挪威国内生活,甚至当克努德森邀请他以旁观者身份参加议员竞选集

① 《被叛卖的革命》第125页。

② 这段时期托洛茨基最常用的笔名是克鲁克斯。与其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拥护者的部分通信,托洛茨基署的是暗号。破译暗号的密码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保密部分。另见克罗格:《见解》第245-246页。

会时,他都拒绝参加。平常他都是陪克努德森一起去,然后他在汽车里等候,直到散会。[1] 警察局如实地向大臣汇报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外交大臣库特说:"我们当然知道托洛茨基仍在继续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但我们认为,尊重他在避难权民主原则下做这些事的权利是我们的义务。"[2] 政府十分满意,并两次自动延长了托洛茨基逗留挪威的期限,而且没有就此提出任何问题。

尽管如此,当库特在 1936 年夏天前往莫斯科访问并在那里受到格外隆重的欢迎时,托洛茨基还是不无担忧地等待着他的归来。他对克努德森说:"他们正在克里姆林宫就我的脑袋讨价还价呢。"克努德森震惊地问道:"难道您真这么想?我们挪威工党会出卖您的头颅?"十分尊重主人感情的托洛茨基说:"不会,但我相信斯大林想要买我的头。"[3] 而库特则说,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只不过是礼节性拜会:在此之前,他作为波兰政府的客人刚刚到过华沙,他不愿让莫斯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和波兰人"搞什么交易似的"。库特说,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根本就没有提起过有关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的问题。只是在日内瓦国联的一次会议期间,李维诺夫在私下交谈中顺便提过这件事。[4] 对库特的声明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因为斯大林未必会同库特这样一个温文尔雅且有几点超凡脱俗的学者兼外交家就托洛茨基的人头问题搞交易。要做此

① 这是克努德森亲口对我讲的。

② 库特教授的这份声明是在 1937 年年初发表的,1956 年当我访问奥斯陆时,他又重申了这番话。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罪行录》;《列夫·托洛茨基案》第 33 页;克努德森对本书作者所作的声明。

④ 库特是这样对我解释他的动机的,他补充说,长期以来他一直与莫斯科学术界就俄国—挪威早期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问题保持着联系。

事,斯大林需要找一个恶人。

托洛茨基的疑心是由苏联镇压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恐怖活动甚嚣尘上而引起的。有关此事,他从3个直接从苏联监狱和集中营出来的拥护者手中得到了第一手证明材料。这3个人是:俄国工人和老布尔什维克A.塔罗夫(Таров)、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西利加(Антон Силига)和维克多·塞尔日,有关后者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1] 塞尔日能获得自由是罗曼·罗兰亲自向斯大林说情的结果。西利加被释放是西欧那些朋友努力坚持的结果。而塔罗夫则是秘密逃出国境的。塔罗夫讲述道,在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压力下,他曾准备与斯大林主义和解并就投降的条件问题与国家政治保卫局谈判。人们问他:“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头目?”如今,这正是投降者们必须赞同的一种说法。塔罗夫回答说,他认为托洛茨基是“最忠实于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始终不渝的革命家”,“是他个人思想上的朋友和同志”。[2] 人们对他审讯了好几个夜晚,要他谴责托洛茨基,可他就是不肯。

这3个人都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的大恐怖:苏联各地建立了无数的集中营,自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被关押者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还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毒刑拷打“逼供”、“诱供”的情形。尽管托洛茨基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但他远未充分认

---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塔罗夫:《一位斯大林流放地的逃亡者的信》,载《反对派通报》1935年第45期。西利加论斯大林恐怖的文章载《反对派通报》第47、48、49期。维克多·塞尔日在其给安德烈·纪德的一封公开信中,向当时对斯大林还十分友好的纪德揭露了斯大林制度的内幕。此信发表于《反对派通报》1936年第51期。在上述各期《反对派通报》中还有许多来自苏联的新信息。另见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中的廖瓦和塞尔日1936年4月的通信。

② 塔罗夫:《一位斯大林流放地的逃亡者的信》,载《反对派通报》1935年第45期。

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跟任何一位政治侨民一样,他仍然保留着他所了解的形象,那时的恐怖活动远比现在缓和,其规模也比现在小得多。这些新发表的见闻(安德烈·纪德刚刚出版了他的《访苏归来》一书)使他感到耻辱、愤怒难当,加强了他摒弃一切"改革幻想"和与共产国际断然、彻底决裂的决心。

应当补充的一点是,这些消息未必会给反对派留下什么希望,因为尽管他们描述了领导集团如何为所欲为以及人们对他们充满何等仇恨和轻蔑,但这些消息也以极为黯淡的色彩描绘出反对派的彻底衰败和软弱无力。[①]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得知如塔罗夫那样的人即使身在刑讯室、集中营和监狱之中仍然捍卫着他的荣誉,只是一种可悲的慰藉而已,这些人是反对派中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然而,早在1935年年底就已宣布要再次大规模清党了。12月30日,当时的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宣布,仅首都一地就开除了1万人;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宣布开除了7000人。全国至少有4万人被开除出党。而从共青团队伍里开除的人数肯定会大大多于此数,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被戴上了托派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帽子。在这些人中真正的反对派即便只有一半或1/3的话,其人数也大大多于1927年在联合反对派纲领上签名的4000至6000人。托洛茨基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来了一次新的浪潮?尽管塞尔日和西利加的讲述很悲观,但托洛茨基仍然很乐观:

> ……在斯大林的报界及其代理人(如路易·费舍一类的先生)的影响下,不仅我们的敌人,就连我们的许多西方朋

① 西利加在其《巨谎之国》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形势。塞尔日在与廖瓦的通信中也描述了反对派衰落的情形。他引用了著名托洛茨基派成员老埃尔津的话,说:"连两个观点相同的同志也找不出来。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只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 友们也都不知不觉地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使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苏联依旧存在的话也几乎都在服苦役。不，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纲领和伟大的革命传统是无法用警察手段根除的。……我们这一流派如果不是作为学说，而是作为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面旗帜的话，它在苏联是群众性的，而且现在显然还在不断地吸收新鲜力量。在1935年最后几个月中被开除的1至2万名“托派分子”中，参加过1923至1924年运动的老一代的代表仅占半数。也许不多于数百人。骨干力量全是新人……。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尽管无耻之极、冷酷之极的诬陷诽谤、大屠杀已长达13年之久，尽管有那么多人走上了比受迫害更危险的投降和变节之路，但第四国际目前在苏联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强大的、人数最多的和久经考验的一个分部。①

显然，这同托洛茨基先前的悲观主义论调是矛盾的。以前他说，在苏联，即便存在他的拥护者，也别指望他们能有任何革命的首创性。如若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面旗帜”，而非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话，那么，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懂得，一旦遇到有利的形势，“情绪和传统”是很容易凝结为一个政党的。因此，斯大林才着手准备对托洛茨基主义发动最后一次进攻。1936年春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

在西欧，这一时期却正是人民阵线的蜜月。人民阵线中的诸党在法国的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促使工人提高自己的要

---

① 《反对派通报》1936年第48期。

求,上百万人加入了工会,干劲十足地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托洛茨基在为美国杂志《民族》所写文章的标题中宣告:《法国革命开始了》。(保守的期刊《时代》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指出,法国经济已经崩溃,各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尖锐激烈,有产阶级及其政党陷入绝境,群众运动在积聚力量。"整个工人阶级都已行动起来了。这一广大的民众是无法用语言加以阻挡的。斗争的结果不是辉煌的胜利就是最可怕的失败。"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正在将他们的事业引向失败。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以压制工人的力量和自信心,并给资产阶级打气。"社会党和共产党竭尽全力,以便使埃里奥或至少是达拉第来领导政府。而群众在做什么呢?他们给他们强加了一个布吕姆的政府。难道这还不是直接投票反对人民阵线的政策吗?"一段时期中,反革命偃旗息鼓了,他们在等待暴风雨过去后好东山再起。"如果以为他们的打算毫无根据,那就太轻率了。有了布吕姆、若奥(Jouhaux)和加香的帮助,反革命还是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始终高喊"让苏维埃遍布全国"的口号;但现在当把语言变成行动的时刻来临时,当需要团结武装工人、建立工人苏维埃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却又宣告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了。托洛茨基同时还对自己的拥护者们发出了如下警告:"一个政党或是集团,它如果无法在当前的罢工运动中找到支柱并与战斗的工人建立巩固的联系,就配不上革命组织的称号。"但他的追随者们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支柱",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　※　※　※　※

8月4日,向出版商寄发了《被叛卖的革命》一书的序言以后,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一起动身去休养,他们想在南部峡湾里的

一座无人居住的岛上过一段时间。他们乘车前往那里。路上，克努德森发现了一伙人，其中有几个跟踪而来的吉斯林党的党徒。直到摆渡时他们才摆脱了这伙人，他和托洛茨基对此十分满意。他们渡过海湾，登上小岛，在一座渔民的茅屋里安顿下来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他被来自维克斯哈尔的紧急信件惊醒。原来，当天夜里有一伙装扮成警察的吉斯林党徒闯入克努德森家，声称他们有逮捕证，还想闯进托洛茨基的房间。克努德森的女儿怀疑其中有诈，起来反抗，他的弟弟叫醒了邻居。歹徒们仓惶逃窜。只来得及从桌上抓了几张打印的文稿。这些歹徒被警察抓住后供认，他们偷听了克努德森的电话，得知克努德森和托洛茨基要出门。因此想趁托洛茨基不在之时潜入宅中。他们并不想刺杀托洛茨基。他们的目的是获取托洛茨基从事政治活动和违反允许其居留挪威的规定的证据。吉斯林党徒想要在大选期间利用这些证据大作文章。歹徒们声称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件事纯属笑谈。托洛茨基相信吉斯林党徒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他违规的证明。同样，他们也无法从他的档案中取走任何重要文件，因为早在动身前克努德森就已把档案小心地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了。因此，经过一阵短暂的激动以后，克努德森和托洛茨基就开始在岩石上散步和钓鱼了。一星期后，即 8 月 13 日或 14 日，一架小飞机降落在小岛上。走下飞机的人是挪威刑警局局长。他奉特利格威·赖伊的命令前来就与即将对吉斯林的特务进行的审判有关的问题询问托洛茨基。提问涉及到那些人从克努德森家里拿走的那些文件——托洛茨基写给他的一位法国拥护者的私人信件的副本和他的文章《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关于这篇文章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托洛茨基答复了所有问题，警官就乘飞机离开了。随后他向报界代表发表声明说，纳粹党徒对托洛茨基的全

部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①

次日凌晨,克努德森如往常一样收听新闻广播。接收清晰度极差,因为岛上没有电,他带的是一台袖珍便携式收音机。但仅仅听到的那些内容就足以使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托洛茨基身边说:莫斯科刚刚公布,即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 14 名被告进行审判,罪名是叛国罪、阴谋罪和刺杀斯大林罪。随后播送了冗长的起诉书,起诉书称托洛茨基是他们的主谋。克努德森尽管对细节没有把握,但对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指控搞恐怖活动并与盖世太保勾结这两项罪名确信无疑。托洛茨基深感震惊。他嘀咕道:"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就算这条指控我还能理解,可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盖世太保了吗?您对这一点能确信吗?"他惊奇地问道。克努德森证实道:"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一天稍晚一些时候,他们得知起诉书断言:托洛茨基将恐怖分子和杀手从挪威派到苏联。他们感到似乎这座荒凉小岛的每块岩石都突然燃起了大火、喷发着岩浆。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返回维克斯哈尔。

同一天,即 8 月 15 日,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否认了这一指控,说它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大的假案"。"斯大林一手导演这次公审旨在压制人们的不满和镇压反对派。执政的官僚把任何批评和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看做阴谋。"托洛茨基指出,说他利用挪威作为从事恐怖活动的基地这一指控的目的在于剥夺他的避难所和自我保护的可能。"我郑重担保,自从跨进挪威领土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甚至连一封来自那边的信也没有收到过。我也没有给那边的任何人直接或通过他人寄过信。我妻子和我连一行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罪行录》;克罗格:《见解》;托洛茨基档案。参见克努德森及各类挪威官方人士的声明。

字也无法跟我们的儿子交流，而他是个学者，和我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托洛茨基建议挪威政府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并愿意为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文件和材料。托洛茨基还向各国工人组织发出呼吁，要求成立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国际调查委员会。[1]

托洛茨基已多次预言的恐怖活动的高潮就这样降临了。但这一次的恐怖行动比他预见的更令人厌恶，更有威胁。从8月19日到24日，他一直把耳朵贴在无线电收音机上收听公审报告。他不时地体验到审讯的恐怖。法庭上那些检察官、法官和被告煞像一出剧中的演员，法庭上虐待狂和受虐淫的表演是如此惊心动魄，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从审讯一开始就已很清楚，16名被告已性命难保，而跟他们一起被控告的托洛茨基和廖瓦的性命也岌岌可危(在起诉书中，廖瓦是作为其父的主要助手出现的)。随着审讯的进行，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它只不过是消灭整整一代革命家的一支前奏曲。但最可恶的是，被告们受到百般凌辱，在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令人厌恶已极的谴责漫骂和自责自谴中被迫屈辱地爬着走向死神。与此相比，法国革命的所有噩梦，那些囚车、断头台和雅各宾党人的兄弟相残都似乎是一场平静而又庄严的正剧了。罗伯斯庇尔将自己的对手送上了被告席，让他们与小偷和刑事犯坐在一起，向他们提出了匪夷所思的指控，但却并未剥夺他们捍卫自己的荣誉和英勇就义的权利，至少那位丹东还可以喊一句：“在我之后就该轮到你了，罗伯斯庇尔！”而斯大林却把已被打倒的对手抛进无法描述的自作自贱的深渊，他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思想家们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中世纪女人的样子，要他们向宗教裁判所讲述其巫术的每个动作和与魔鬼同居的每个细节。下面试举维辛斯基和加米涅夫在世人睽睽众目之下的一段对话：

① 引文摘自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原件。

维辛斯基:该如何评价您表达对党忠诚的那些文章和声明呢?欺骗?

加米涅夫:不,比欺骗更坏。

维辛斯基:背信弃义?

加米涅夫:更坏!

维辛斯基:比欺骗更坏;比背信弃义更坏;——请您找出这个词。背叛?

加米涅夫:您已经找到它了!

维辛斯基:被告季诺维也夫,您承认这点吗?

季诺维也夫:承认。

维辛斯基:背叛?背信弃义?两面派?

季诺维也夫:是的。

让我们看一看加米涅夫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罪过的吧:

我已经得到两次宽恕,没有杀我,但一切都有个限度。无产阶级的宽大也有其限度。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限度的边缘了。……在这里,我们与外国秘密警察的间谍并排地坐在一起。我们都持有同样的武器。早在我们的命运在这被告席上交织在一起以前,我们的双手早已经握在一起了。我们为法西斯效劳,组织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掉入其中的可耻的叛徒的深渊。①

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审判报告》第68、169-170页,引文是从法庭审判报告的官方英文文本摘录的。

季诺维也夫紧跟其后：

> 我的罪责是追随托洛茨基，充当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组织者，该集团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他领袖。……我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要组织者，我承认我的这一罪行。我与托洛茨基结盟。我曲解了布尔什维主义，把它变成了反布尔什维主义，我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1]

伊万·斯米尔诺夫是国内战争中打败高尔察克的英雄，是托洛茨基领导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声明说：

> 除了我们国家现在所走的那条路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除了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那位领导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领导。托洛茨基发号施令，指挥恐怖行动，把我国当做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他是敌人。他站在街垒的另一边。[2]

托洛茨基的另一位老战友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国内战争的英雄，他说：

> 我是怎么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呢？是与托洛茨基的关

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审判报告》第170页。

② 同上，第171－172页。

系把我引上了这条道路的。我从和他建立联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欺骗党,欺骗党的领袖。[①]

巴卡耶夫——列宁格勒契卡领导人,1927 年反对派示威游行的领袖,承认说:

在这个法庭上所揭露的事实向全世界表明,托洛茨基是反革命恐怖集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我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性命押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利益上。一想到我成了他们手中驯服的工具和反革命间谍、竟然想要杀害斯大林,我就痛苦万分。[②]

维辛斯基过去是孟什维克、国内战争后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而现在已是总检察长,他蓄意造成歇斯底里的效果,义愤填膺地一连咆哮了数小时之久: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居然妄想把我们苏维埃土地上最最优秀的人撕成碎片。他们杀害了对我们来说最可贵的革命者之一,他是杰出的、不可思议的人,他开朗、愉快,他嘴上的微笑永远是那么明快欢乐,就像我们的新生活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几乎刺伤了我们的心脏。……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对阴险狡猾的敌人不能宽容。……我们的全体人民都在颤抖、义愤填膺。让我这个国家公诉人义愤仇恨的声音也加入到这几亿人

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审判报告》第 165 页。

② 同上,第 168 页。

民的怒吼声中来吧！……我要求将这群疯狗们统统枪毙，一个不留！[1]

这是充满了可怕的谩骂和肮脏的谴责的5天，在这5天中，检察院连一份证据也未出示，法庭就判处所有被告死刑，判决词结尾说：

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儿子谢多夫，列夫·利沃维奇……犯有直接策划和领导苏联恐怖活动组织的罪行……一旦他们在苏联境内被发现，应立即逮捕，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2]

斯大林把这次审讯恰好安排在希特勒完成了他向莱茵河流域进军和人民阵线在法国组成了自己的政府之后进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恐吓把他当做反希特勒同盟者的西方工人运动及左派知识分子。他实际上在威胁说，如果他们起而反对大清洗，他就要给予回击，摧毁人民阵线，让西欧单独与第三帝国对峙。在这一点上，法庭上那晦暗不明的非理性帮了他的忙，它把一些人给搞糊涂了，这些人本来会公开抗议他们明白的罪行，但他们不愿出面反对一个暧昧而又血腥的秘密并因此卷入其中。

尽管法庭和死刑判决书留下了痛苦而又沉重的印象，但它们还是在托洛茨基身上激发了一个战士的全部激情。他满怀决心要集中力量和信心迎接挑战，当年他就是以这种精神领导了国内战争最初的一些战役。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中，他倒成了主要被告，因此他知道，新的审判会接踵而来，到那时，比这更可怕的指

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审判报告》第120、164页。
② 同上，第180页。

控会朝他压过来。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了活下来的孩子们，为了全体命中注定遭受迫害却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尊严，他开始战斗。整个审判过程的自相矛盾和荒谬绝伦他都一目了然。为了揭露它的虚假谎言、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他积聚了全部力量。他知道自己是在单枪匹马与强大的斯大林政权和为其效力的宣传军团搏斗。但至少他还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和组织自己的反击，他决心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公审的第二天，他就对《工人报》记者发表了长篇答记者问，次日，即8月21日，该报便在头版刊登了这篇答记者问，其标题是《托洛茨基断言，莫斯科的指控纯属谎言》。读者丝毫也不怀疑这家报纸是同情托洛茨基的论据的。托洛茨基还为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讯社以及许多急忙赶赴奥斯陆的记者准备了声明。他正处于激战的白热化时期。时间决定着一切。他得赶在惊讶不已、深受震撼的世间的良心尚未变得迟钝之前驳倒斯大林的指控。他所需要的仅仅是自卫的自由权。

但这个自由却出乎意料地被人狡猾地剥夺了。做出此事的正是那些不久前还向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表示崇敬、以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而骄傲的人。8月26日，即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的第2天，警察局的两个高级官员来找托洛茨基，他们奉司法大臣之命声称托洛茨基违反了在挪威居留的条款。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名，保证他今后不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别国政治”，保证作为一位政论家“严格地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历史著作和一般性的理论见解范围内，而不应发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见解”。[①] 这要求听起来近似嘲弄。时至今日，当斯大林指责他

① 特利格威·赖伊1937年2月18日向议会提交的报告同司法部和警察署的《议会报告》第19号；克罗格：《见解》；托洛茨基：《我要求对我进行审判》，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以及《斯大林罪行录》。

是希特勒的同谋、破坏分子和凶手匪帮大头目时，他能克制自己“不对别国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吗？他又如何能只限于“不发表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见解”呢？他如果沉默，无异于证实斯大林在全世界散播的对他的诽谤是真实的。托洛茨基断然拒绝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名。于是警察局对他实行了软禁，在门口设了岗，禁止他发表公开声明。

挪威政府突然改变立场的原因何在呢？原来，8月29日苏联大使雅库博维奇(Якубович)在奥斯陆递交了一份官方照会，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照会以莫斯科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为证，指出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其阴谋活动的基地”，照会的最后一句话是略加掩饰的威胁：“苏联政府指出，继续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会损害苏联与挪威之间的友好关系，并破坏……国际关系准则。”[①] 这份照会是在对托洛茨基实行软禁后过了3天才递交的，这就使得特利格威·赖伊有可能证实，他对托洛茨基采取行动并非由于苏联的干涉。但实际上早在几天以前，苏联大使已经正式口头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库特说：“无法确定苏联大使首次要求我们剥夺托洛茨基的避难权的确切日期，这一困难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他是在口头声明中表示的，却未在书面文件中反映出来。我当时不在奥斯陆，我正在北方周游自己的选区，而我在外交部的副手当时是特利格威·赖伊。”[②] 实际上，在《工人报》发表了托洛茨基就莫斯科审判所作的答记者问以后不久，大使就会见了特利格威·赖伊。因此，说他居然没有对执政党报纸发表托洛茨基答记者问表示抗议和没有提出剥夺托洛茨基避难权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奥斯陆谣

① 照会是提交给议会的19号报告的附录。1936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只报道了苏联大使的声明。

② 这是库特本人对本书作者讲述的。

言蜂起,说苏联大使还威胁要中断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于是船舶公司和捕渔业要求政府在此经济萧条、失业众多的形势下不要让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库特说:"尽管俄国人没有说要采取经济制裁,但我在政府中的同僚们都很担心这一点。我不相信他们会采取商业抵制的做法,而且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同俄国的贸易额不是很大,而我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鲱鱼,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此我反对拘押托洛茨基。但在内阁中我成了少数派。"[①]

大臣们害怕与俄国的关系破裂,担心由于这个问题会在大选中落选。因此,尽管连他们也知道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搞恐怖活动的基地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尽管他们在答复苏联照会时也否认了这一点,终于还是对压力屈服了。但他们也无法驱逐托洛茨基,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他们也无法把托洛茨基引渡给并未要求引渡他的苏联政府,尽管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发出了挑战,似乎在刺激他提出这一要求(该要求有可能迫使挪威法庭调查此案,从而可以给托洛茨基一个驳斥这些指控的机会)。由于担心允许托洛茨基当众辩护的决定会惹恼莫斯科,所以大臣们决定把托洛茨基扣押起来。民主主义的良心和自身的尊严感使得这些大臣们不敢承认,他们这是在向威胁低头,甚至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不能给一个他们深信无罪的、而其伟大为他们所称颂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他们不得不给托洛茨基的无罪投下一个怀疑的阴影。尽管他们缺乏捍卫真理的勇气,却也并未支持维辛斯基的指控和附和这样一个弥天大谎。这是一些只能在小事上撒谎的小人物。他们决定指控托洛茨基滥用了他们的信任、抨击外国政府、涉足第四国际,尽管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现在他们才开始寻找托洛茨基犯有过失的证据。可这样的证据到

① 这是库特本人对本书作者讲述的。

哪儿才能找到呢？在奥斯陆的法庭上，吉斯林党徒坐在被告席上，手里晃动着他们从克努德森家里抢来的那几张稿纸——托洛茨基的文章《法国革命已经开始》的副本。难道说托洛茨基在此文中没有抨击法国的人民阵线和布吕姆政府中那些部长们吗？难道这还不构成“旨在反对友好邻邦政府”的活动吗？然而此文中却没有任何秘密的和非法的内容。文章刊载在美国的《民族》杂志和托派的两份小报——《真理报》和《我们的言论报》上。工党政府的大臣们居然利用吉斯林党徒从托洛茨基的书桌上偷来的文件大做文章，这有失体面。司法大臣的卷宗里还藏有一份警察局提交的情报，说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有联系。但政府却认为这种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就在6月份时他们不理睬警察局的这一情报并主动地延长了托洛茨基在国内逗留的期限。大臣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到足够的理由来剥夺托洛茨基的避难权。

尽管如此，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即便为此而将合法的理由抛到一边也在所不惜。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和莫斯科的怒气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怕，担心他们那小矮人的利益和小矮人的名声会成为巨人之间的战争关注的焦点。他们开始诅咒他们允许“山岳般的巨人”进入他们国家的那个时辰。但他毕竟尚在他们手中，他们满可以使他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他们犹豫不决地这么做了，同时为自己成为斯大林的帮凶而羞愧。还是让我们引用一位挪威作家的一段话吧：“良心的谴责和羞耻感很少能使一个罪犯忏悔……他必须得到对其劣迹想象出来的辩护词。这往往导致罪犯憎恨他的牺牲。”[①]如果说这些大臣们在作为主人而接待“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时对自己重要性的意识一度曾异乎寻常地膨胀起来了的话，那么现在当他们成为看守此人的狱卒以后，却变得烦躁不安、怒气冲冲了。

① 克罗格：《见解》第220页。

8月28日,托洛茨基在警察的押解下走上奥斯陆法庭,第二次为吉斯林党徒案作证。但他立刻处于一种与其说是证人不如说是被告的地位。吉斯林党徒证实说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在挪威有"非法"行为;于是首席法官对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托洛茨基在挪威居留期间是否与其在国外的同志有过通讯往来?他是否在自己的文章里抨击过某个外国政府?托洛茨基对所有这些提问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它们与法庭上所调查的案件没有任何法定的联系,须知这里所要查明的是那些假扮警察潜入克努德森家里的人是否系骗子和盗贼。法官随后声称,托洛茨基的证词本身就违反了允许他进入本国的那些条件。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从未承担克制自己不发表其见解和不与同志联系的义务,并且他随时准备证明从未从事任何非法和秘密活动。此时法官打断了他的话,命令他走下证人席。

从法庭出来后,警察将托洛茨基直接带到了司法部,在许多官员的簇拥下,大臣威严地要他当场在下述声明上签字:

> 我,列夫·托洛茨基声明,我、我妻子和我的秘书在居留挪威期间,不从事任何旨在反对挪威友好国家的政治活动。我声明我将在政府为我选定或许可的地方生活……我、我妻子和我的秘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无论是挪威还是外国当前的政治问题……我作为一位作家,将只限于撰写历史著作、传记和回忆录……我的理论性著作将不以反对任何政府、任何外国为宗旨。此外,我同意我的、我妻子和我的秘书的所有信件、电报、电话都要经过审查……。[1]

---

① 《议会报告》第19号。

过了20年后，当年这一场面的见证人还能记得，当托洛茨基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时他脸上那既愤怒又轻蔑的表情和他那如同雷霆般的声音。托洛茨基问道，大臣怎么居然敢向他出示这么一份可耻的文件？他竟然以为一个有托洛茨基那样生活经历的人居然会在这么一份文件上签字？大臣这是在要他绝对服从并放弃任何表达政治信念的权利。如果托洛茨基以前愿意同意这样的条件，那么现在他也不会被流放，也不会仰仗挪威政府令人生疑的好客精神了。难道说特利格威·赖伊竟以为自己如此强大，能指望从他身上得到斯大林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东西？当挪威政府允许他进入本国时，他们应该知道他是什么人。它怎么敢要求就连他的理论著作也不能带有反对某一外国政府的倾向？难道说他曾经放任自己哪怕稍稍插手挪威的内政了吗？他们能否指出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事例吗？大臣承认他们指不出。难道他们居然真的相信他把挪威作为恐怖活动的基地了吗？不，特利格威·赖伊回答说，政府明确表示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能否指控他从事过某种反对某一外国政府的阴谋或非法活动呢？不，大臣再次回答，这里说的不是什么阴谋或非法活动问题。政府仅仅指控托洛茨基未能履行其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义务，而他那篇《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的文章和与第四国际的联系却恰好证明他没有履行义务。托洛茨基否认自己曾经作过类似的保证。任何时候，任何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共产党员都不会承担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义务。那么大臣先生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见解又是如何呢？与那篇发表在《工人报》上的托洛茨基接受特利格威·赖伊本人采访时所作的答记者问相比，他关于法国的那篇文章有哪些方面应受指责，难道不是大臣亲自向他保证他发表个人政治见解不会违反他居留挪威的条件吗？政府怎么可以以纳粹撬锁盗窃犯提供的文件为根据对他

提出指控呢?难道它居然允许希特勒雇佣的匪徒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吗?

说到此处,托洛茨基提高了嗓音,以至司法部大厅和走廊里都回荡着他的声音:"这是你们在自己本国向纳粹投降而迈出的第一步。你们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你们以为自己处于安全之中并且可以自由处置一个政治流亡者,但请你们记住这一点,纳粹将把你们连同你们的草包首相一起赶出自己国家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听到这些奇谈怪论,特利格威·赖伊耸了耸肩。然而,过了还不到4年,由于纳粹的入侵,这个政府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挪威。当大臣们和他们那位年迈的国王哈康(Haakon)站在岸边等候去往英国的轮船时,他们战战兢兢地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这句话。预言家的诅咒应验了。[①]

在这次交锋后,特利格威·赖伊将托洛茨基置于更加严厉的拘押境况之下,驱逐了他的两个秘书,还在克努德森家里安排了哨兵,以便禁止托洛茨基和克努德森交往。他扩大了自己的权限,因为挪威宪法不允许他剥夺一个未经法庭审判的人的自由。许多人,其中包括保守派,都为此事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于是,赖伊在下令逮捕托洛茨基的3天后要求国王签署了一份命令以赋予他处置这一特殊事例的特殊权力。9月2日,赖伊下令把托洛茨基

---

① 库特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这一场面的:"会面(与国王和德国大使)以后,我召集了议会议员并向他们宣布了德国人的新要求。……我不怀疑政府会拒绝这些要求……我们得再次逃亡……而且得跑出本国。我想起了托洛茨基对特利格威·赖伊说的一番话:'过若干年,你们的政府也会和我今天一样成为无家无国的政治流亡者。'那时我们都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不让泪水横流,我不得不数度中断我的发言。库特:《壁垒森严》(挪威文版)第47页。当时在场的挪威议会议员们也是这样对我描述这一场面的,其中一人还证实,国王哈康还要特利格威·赖伊想一想'托洛茨基的咒语'"。

和娜塔利娅从克努德森家转移到奥斯陆以南20英里的峡湾附近胡鲁姆的桑比，司法大臣专门为此在那儿租了一幢关押他们的房子。处于昼夜24小时监视下的托洛茨基一家和20名警察住在一起，他们的皮靴橐橐作响，他们高声喧哗，抽烟，打牌。除了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外，任何人都不许访问他，就连他的法国律师也不例外。甚至连一个囚徒的最普通的权利——体育锻炼和放风也被剥夺了。只有经过特殊许可之后他才能拿到报纸，所有来往信函都要经过检查。负责审查的是吉斯林党徒，在指挥警戒班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叫约纳斯·赖伊(Jonas Lie)，他后来当了吉斯林政府的警察局长。克努德森回忆道：“托洛茨基太孤独了，甚至在我已经当上了议会议员以后，特利格威·赖伊还多次拒绝了我前往胡鲁姆的要求。经过长久奔波和拖延以后，他们才准许我给托洛茨基寄一台收音机。起初甚至都不让他听广播。”①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答复斯大林的指控。但他并未屈服。他撰文详细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在写给其拥护者和廖瓦的信中，他指导他们如何与清洗斗争，怎样收集反驳维辛斯基每项指控的事实材料。他一边抗议，一边向审查官呈交他的书信和文章，然后一连几星期急不可耐地等候答复。但答复却迟迟不到。审查官常常是在根本就不通知托洛茨基本人的情况下就将他所写的所有东西统统没收。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天天收听谴责声浪喧嚣不已的莫斯科广播，它那震耳欲聋的指控如同可怕的噪音在全世界回荡。托洛茨基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从最初的震惊状态中恢复过来并开始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指控了呢？莫斯科腾起的毒雾浓云是否已留在人们的大脑里发干、变硬、结为一层厚厚的硬壳了呢？就连挪威政府也

---

① 这里我引用的是克努德森对我说的原话。

以为可以扣押他这一事实,必然会使许多人重新起而反对托洛茨基:人们会如此推断,假如他是完全无辜的,那么他那些挪威工党的朋友们绝不会剥夺他的自由。托洛茨基沉默的本身看来对他也不利,敌人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托洛茨基被扣押后过了还不到两个星期,维辛斯基就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声称,看来,托洛茨基并不急于反驳,否则他早就出来说话了。

在囚笼里备受煎熬的托洛茨基竭力想把两个挪威出版商、纳粹党徒和斯大林分子以诽谤罪送上法庭,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支持维辛斯基的指控。10月6日,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蓬特福德(Puntervold)起诉。法庭已将传票分别送达,预计此案将在一个月内听证完毕,可政府却下令终止此案调查。既然政府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答复斯大林而将他扣押,那么现在就不会允许他把法庭当做他的讲坛。但根据法律,政府无权干涉他这样做,因为就连在押犯也有权在法庭上针对诽谤而为自己辩护。但司法细节却不是特利格威·赖伊关心的要点。正如他搞到用以关押制裁托洛茨基的法令是倒填日期那样,10月29日,他以同样方式又搞到了一份"国王临时法令",说什么"根据1936年8月31日法令被拘留的外国人(托洛茨基是据这一法令被拘捕的唯一一位外国人),未经司法部同意,不得在挪威法庭充当原告"。而司法部当然拒绝"同意",并严禁法庭受理托洛茨基对两个出版商的起诉。

于是,托洛茨基便请他的法国律师以诽谤罪起诉斯大林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比利时、西班牙的出版商,指望即便他不能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至少也能通过法律代表阐述自己的理由。看来,挪威人无法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理由不允许他在外国法庭上为自己的名誉申辩。但在此时政府取悦于斯大林的意愿没有止境。特利格威·赖伊声称:"司法部与政府商议后决定,在托洛茨基居住挪威期间,司法部将反对列夫·托洛茨基

想要在外国法庭上有所动作的意图。”[1] 除此之外，司法大臣还严禁托洛茨基和任何外国律师接洽，最后，他终于彻底把托洛茨基赶进囚笼，并封住了他的嘴。

11月19日，托洛茨基通知他的法国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说：“昨天我接到一份官方指令，甚至禁止我在国外对任何人提出起诉。为了保证您能收到这封信，我克制自己没要求他们作任何解释。”在给廖瓦的信中他写道：“你要注意，司法大臣没收了与我的自我辩护有关的一切重要信件。如今我面对一帮诽谤者、盗贼和恶棍……却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你应当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并把此事告诉我们的所有朋友。”在下一封信中，他更强烈地发泄了他的愤怒。他指出，《工人报》正在为解救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著名激进派作家奥谢茨基(Ossietzky)而斗争，而关于挪威扣押托洛茨基一事它却只字不提。“至少奥谢茨基还没有遭到其看守的诽谤”。“毫无疑问，这封信得经过(审查官之手的)检查，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是我写给儿子的私信，是我与他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在巴黎也遭到匪徒跟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此时我却身陷囹圄，手脚被缚。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在肉体和道义上的生存全都取决于它。我必须把话都说出来。”[2]

也许这些书信是一种军事谋略。特利格威·赖伊断言，托洛茨基通过非法途径与他儿子沟通。托洛茨基的某些信件是用隐显墨水写的，这样与他的拥护者们秘密保持联系，当允许他进城看牙医时，他偷偷地与他的拥护者联系，他们把给他的信件塞进蛋糕里寄往胡鲁姆，等等，等等，这些断言显然是有事实依据的，尽管事隔

---

① 提交给议会的报告第19号；克罗格：《见解》；托洛茨基致热拉尔·罗森塔尔，11月19日和22日。

②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10年之后当有人向娜塔利娅问起赖伊的话是不是真的时娜塔利娅不知如何答复是好。一般说政治犯都会使用某种方式与自己的同志秘密联络的,因此,当托洛茨基本人已经成为暴力、圈套和欺诈的对象时,如若他不采用此类方法倒会令人奇怪了。

※ ※ ※ ※ ※

当托洛茨基被迫沉默时,公开抨击莫斯科审判的首战的重担就落在廖瓦肩头了。腼腆害羞、口才不佳、而且习惯于做父亲的助手的廖瓦突然被推到了这一重大而又严酷事件的前台。维辛斯基说,廖瓦是"恐怖主义阴谋"的台柱子,是他父亲的副手和参谋长,指导那些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应如何行动。在法庭的判决书中,加之于他的罪名与加之于他父亲的罪名是一样的。而现在他却真要代替他父亲了。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几个星期以后,廖瓦出版了《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红皮书》——这是首次以事实驳斥斯大林的指控、首次详尽无遗地揭露这些指控难以成立的一本书。他引用证据证明,他从未跟父亲一起去过哥本哈根,而且他们说的那家他与阴谋集团接头的旅馆"勃里斯托尔"纯属子虚乌有。他分析了被告的坦白之谜,指出,"他们那些无一件事实或证明的假坦白都是逐字逐句地重复检察官的话,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自我诽谤,实际上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不要信我们,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这一切全都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1]

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的不幸和自作自践仍然使廖瓦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他从童年时代起就认识他们每个人,还和他

---

① 《反对派通报》1936年10月第52-53期。列·谢多夫:《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红皮书》巴黎1936年法文版。

们的孩子们一块儿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和走廊里玩耍。少年时代，他把他们看做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父亲的朋友。他对所有这一切都难以忘怀，因此，他这样捍卫他们的荣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内在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中等水平，虽然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它们看来尚不足以抵制压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被告所承受的连续不断的、万分沉重的压力，数十万人……连它的1/100也无法承受。”但“斯大林要的是托洛茨基的脑袋，这才是他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求助于最卑鄙的杜撰。……他之所以如此仇恨托洛茨基，是因为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思想和传统的活生生的体现。”果然，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不满足于他们在国内取得的“胜利”，而竭力想把国外的托洛茨基主义一并铲除。他们指控西班牙托洛茨基派成员破坏人民阵线，企图谋杀它的领袖，并诬蔑波兰托派成员是盖世太保的间谍，“斯大林竭力想把工人运动中的所有分歧纳入这一公式：“是格别乌还是盖世太保？谁不跟格别乌走，谁就是盖世太保”。“今天他主要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使用这种方法，明天他会用它来对付工人阶级中的其他派别。……如果国际工人运动无力抵制这一剂致命毒药的话，那该是多么可悲呀。”①

身在胡鲁姆的托洛茨基收到第一份《红皮书》时，大大松了口气：“有一种瘫痪症患者，能看，能听，也能理解一切，就是连一根指头也动不了，以致无法躲避致命的威胁。挪威的‘社会主义’政府便使我们陷入这样的政治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廖瓦的这本书是何等珍贵的一份礼物啊……我记得我觉得此书的最初几页似乎显得有些苍白：那几页上重复转述了一些（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评论……但从作者开始独立分析这次审判案的那一刻起，我就

① 《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红皮书》。

完全被吸引住了。而且一章写得比一章好。'我们无畏的、亲爱的廖瓦,'我和我的妻子相互说着,'我们有了辩护人了!'"[1] 在充满痛苦、忧伤和温情的通信中,廖瓦讲述了他为了发动对清洗的反击而做过的一切,并把为数寥寥无几的好心人的支持和同情的每一句话都转达给父母。

廖瓦被卷入这场可怕的戏剧,但他显然力不从心。继父亲之后,他成了格别乌的下一个目标。他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有一个神秘人物的手在拆阅他的信件。他很担心自己会被绑架。他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保护,完全依靠他周围一小伙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同志感情的支持。他在和罗斯默夫妇的友谊中找到了几分慰藉,这两个人如今毅然为父亲辩护,忘掉并且宽恕了过去的所有龃龉。在狭小的朋友圈中,他最信任马尔克·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这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他研究医学和哲学,化名为埃蒂安(Etienne)在组织内工作。他协助《反对派通报》的出版工作,并参加了一个负责与苏联反对派保持联系的小小的俄国委员会。埃蒂安有波兰和乌克兰血统,懂俄语,并对苏联的现状十分敏感。这使他得以为托洛茨基在许多小事上提供帮助并取得廖瓦的信任。

但这个有着良好教养、心地善良的"朋友"却是斯大林的间谍。他转换角色的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廖瓦和托洛茨基都从未对他有过丝毫怀疑。廖瓦对他是如此信任,甚至给了他一把自己信箱上的钥匙,还常常让他代替自己取邮件。那"拆阅"廖瓦信件的神秘的手就是埃蒂安的手。他还负责保管托洛茨基档案中最机密的卷宗,他把它们藏在了自己屋里。[2]

---

① 《反对派通报》1936年3月号第64期。

② 埃蒂安(兹马克·兹博罗夫斯基)后来曾招供;1955年12月被美国法庭以伪证罪判

托洛茨基在他被扣押的几个月前曾要廖瓦把他的一部分档案存在荷兰的社会史研究所。他之所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手头拮据。该研究所准备为这批档案付很小一笔钱,即1.5万(贬值以后的)法郎。但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担心格别乌会想方设法得到这批档案。因此他想把它存在可靠人的手中。11月初,廖瓦和埃蒂安将几个卷宗转移到了该研究所在米舍尔大街7号的巴黎分所。当时分所的领导是著名的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他一度曾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职。这次转移是尝试性的,但档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些最机密的材料却仍在埃蒂安手中。[①]

可是,那些卷宗刚刚被转移到米舍尔大街,11月6日至7日夜,就有人破门而入,若干卷宗被盗。立刻便有人怀疑这是格别乌干的。破门而入的窃贼没有动他们已经找到的贵重物品和钱财,却单单偷走了托洛茨基的文件。除了格别乌的特务外,谁还会这么干呢?法国警方惊讶于溜门撬锁者的技术和技巧,断定这并非法国罪犯所为,而是国际大盗干的。警方讯问了指控格别乌的廖瓦。警察问他,格别乌是怎样以及从哪里那么快就得知卷宗被转移到了米舍尔大街的呢?知道转移卷宗的都有谁?廖瓦声称,除他以外,知道此事的只有3个人:尼古拉耶夫斯基、荷兰研究所的某位工作人员埃斯特琳(Estrine)夫人和埃蒂安。廖瓦保证这3个人都十分忠诚,但他怀疑尼古拉耶夫斯基也许会不经意说漏了嘴

处5年监禁。我对埃蒂安和廖瓦的关系的叙述依据的是他们与托洛茨基的通信以及他们向法国警察局和法官提供的证词。埃蒂安的故事由H.卡松(1955年11月21日)和大卫·达林(1956年3月26日)在《新领袖》杂志上叙述过。另见《美国参议院国际安全问题小组听证会》1957年2月14—15日第51部分第3423-3429页。还可参见伊萨克-堂-列文:《一个刺客的内心》。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而给格别乌提供了线索。那么埃蒂安呢?——警方问道。廖瓦回答说,埃蒂安绝对可靠:证据是在溜门撬锁事件发生时他在自己的家里存放着最重要的一部分档案。于是,格别乌是如何得知卷宗转移一事始终未能搞清。

后来发现,盗窃者偷走的只是一些剪报和不太重要的文件。无人怀疑因所获甚微而失望的格别乌会更加严密地组织第二次尝试的。托洛茨基终生关心自己档案的安全,其程度不亚于他对自身安全的关心。但格别乌再也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进行新的攫取文件的尝试。于是又产生了新的猜测。由此处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格别乌没有必要窃取档案。因为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兹博罗夫斯基来了解档案或文件副本的内容。这一在巴黎显系暗中策划的盗窃事件只是为了掩护埃蒂安,加强托洛茨基和廖瓦对他的信任。的确,当格别乌看来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窃取档案时,埃蒂安却在自己家里"可靠地"保存着档案,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事实更有力地把一切疑点从他身上引开而指向他人的了。

※　※　※　※　※

在胡鲁姆,数月时光沉重而又单调地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托洛茨基的监禁将中止或放松。托洛茨基在美国的信徒竭力想要为他取得墨西哥的避难权。但他们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托洛茨基尽管很想离开挪威,但又不急于在此危难关头到一个名声不好而且又十分遥远的国家去避难。那里的政治所采用的方法是斗篷和短剑(廖瓦曾提醒过他,在那里只花几个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杀手)。[1] 托洛茨基还有一线希望,即在挪威人们还可以听到他

---

[1] 廖瓦致父母的信,1936年12月7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的声音。12月11日，他应再次以证人身份出席久拖未决的对溜进他在霍涅芬斯住所的吉斯林党徒的审判。他以为这回政府该再不敢休庭了。但司法大臣还是出面干涉了，虽然没有休庭，却下令关起门来进行审判。因此，当托洛茨基出现在法庭上时，听众席上连一个听众和记者也没有。与上次公开进行的审判不同，这次为了不让托洛茨基有可能当众宣读自己的证词已经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法官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也极其恭敬礼貌，因而托洛茨基在一连几小时里有根有据地说明了自己的案子，并且如此有力而又严肃地驳斥了斯大林的所有指控，好像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主持人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发言，甚至在他严厉抨击挪威司法大臣是斯大林的帮凶时也没有打断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在一个封闭的、空荡无人的法庭上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审判过程中发表一篇堪称法学艺术杰作的讲话，显得有些可笑。但这时他对自己的未来是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他都怀疑以后他未必有机会阐述自己的理由，因此便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畅所欲言，哪怕只是为了作调查记录也罢。

※ ※ ※ ※ ※

只有不多几位见证人对托洛茨基在被监禁期间的表现作过生动的描述。指挥警卫班的军官之一阿斯克维克(Askvik)在他那本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托洛茨基的平静、尊严、自尊及自律。如阿斯克维克所说，对其自由的每一次限制，托洛茨基都要表示抗议，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从不侮辱警卫人员，而且他还能用正确的挪威语自如地和警卫交谈。[①] 挪威律师彭特福德回忆了托洛茨基是

① 我对某些这类细节能有所了解，得感谢阿斯克维克夫人——那位警官的遗孀，1956

如何关注大选进程的。使托洛茨基不安的是,克努德森在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区里被提名为议会候选人,他因为是托洛茨基的房东而遭到抨击,很可能落选。当克努德森意外地以明显优势当选的消息传来时,彭特福德正在胡鲁姆。他讲述道,当时托洛茨基高兴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把娜塔利娅搂在怀里,欢庆自己朋友的胜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政府的一记耳光)。在这痛苦难熬的几个月里,克努德森的一贯忠诚,是所能留给托洛茨基的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如同激进派政论家赫尔格·克罗格在奥斯陆自由派报纸上机智而又出色地领导的那场为托洛茨基辩护的笔战一样。

特里格威·赖伊曾两或三次到胡鲁姆拜访托洛茨基。第一次是在12月11日或13日,他通知托洛茨基,后者的拘留地将从胡鲁姆转移到更偏远、更隐蔽的北方地区,因为司法部"不能继续支付"它在胡鲁姆所承担的"大笔警卫费用"。托洛茨基告诉赖伊,他的朋友们(他提到迭戈·里维拉)打算请他到墨西哥去,与其让人把他送到挪威北部的荒凉地区,他还不如去墨西哥呢。在谈话过程中赖伊注意到托洛茨基的书桌上摆着一套《易卜生全集》。赖伊便问道:"您正在读易卜生?""是的,我正重读他的全集。易卜生是我青年时代最喜爱的一位作家,现在又回过头来重读他的作品。"以下的话说它出自易卜生本人笔下也不为过。托洛茨基说,《人民公敌》的思想非常契合他和这位大臣目前的处境。赖伊则闪烁其词地说"对易卜生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托洛茨基说:"无论您对他作何种解释,他的证明永远对您不利。您还记得市长斯托克曼吗?"大臣问托洛茨基,将他与易卜生剧中那个为了权力和金钱

年4月当她听说我在奥斯陆时,便把她丈夫回忆录的手稿交给克努德森,并托他把手稿转交给我。克努德森只是在他译到有关的段落时才惊奇地得知托洛茨基懂挪威语。在霍涅芬斯期间,他俩通常用德语交谈。

不惜迫害其弟弟的恶棍相提并论该不会是认真的吧？“与斯托克曼市长相比吗？那还是好的，大臣先生，那还是好的呢，”托洛茨基回答说，“您的政府具备资产阶级政府的所有缺陷，而其优点却连一个也没有。”这一意见使得这位大臣很委屈，于是就托洛茨基的“忘恩负义”大肆数落一番，说他允许托洛茨基到挪威来是个“愚蠢的错误”。“那么您现在不正在竭力用犯罪来弥补这个愚蠢的错误吗？”托洛茨基反驳道。于是，他打开了《易卜生全集》中的一本，朗读了斯托克曼先生对他那位坏蛋兄长说的一番话：“我看到人的卑鄙和怯懦如何封住一位自由、正直的人的嘴……。”谈话到此结束。大臣站起身来，但在出门之前，又转身向他的俘虏伸出了手。可托洛茨基拒绝和他握手。[1]

一周后，赖伊再次拜访托洛茨基，并通知说墨西哥方面已答应为其提供避难，他已经租好一艘油轮，次日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就可以在约纳斯·赖伊——胡鲁姆警卫队长的护送下动身去墨西哥了。时间的仓促以及驱逐的细节引起托洛茨基的不祥预感。他问大臣，为什么只给他 24 小时作动身前的准备？为什么不释放他？他要求允许他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允许他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允许他收拾收拾文件并了解所有事项，允许他先和墨西哥政府联系一下，允许自己选路线，允许他自己考虑自己的安全。他说：“如果您这艘油轮被斯大林知道了，那会怎么样？也许我们连英吉利海峡都到不了就在公海上被鱼雷击中。”(他甚至问这艘油轮是否带有武装)。大臣回绝了他的所有要求，但极力要他相信旅途会平安无事的，他说除了他本人和油轮主人外，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于是托洛茨基请求准许他经过法国。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去墨西哥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罪行录》第 77－78 页；托洛茨基日记片断，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克罗格：《见解》。

避难的许可,难道法国人还会不给他过境签证吗?这个要求也被赖伊否决了,他急于在议会开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之前将他送出挪威。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位大臣的急切之情远比实际情形更加凶险。他说:"当然,你们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我们,但在道义上,你们都会自己扭断自己的脖子,犹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事上扭断了自己的脖子一样。"接着,他又重复了他的预言:"再过三五年……你们将全都成为难民……";说完,他再一次转身背对大臣,拒绝和他握手。[1]

托洛茨基感到,人们这是在把他从一个囚笼转移到另一个囚笼去,而且他也不大相信自己和娜塔利娅在途中不会出任何意外。在娜塔利娅收拾行装时,他用隐显墨水写了一篇题名为《可耻!》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那些诽谤者,首先是对那些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合法性"担保"的英法两国著名律师们的答复。其中一个是皇家律师,另一个是人权保障同盟的委员,此二人都为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案没有缺席判处托洛茨基死刑大唱赞歌。托洛茨基评述道:"凡对革命史、人类心理和……此案所涉及的那些人的经历略知一二的人都会同意,我们有多一千倍的理由推断,这些律师是在为斯大林效力,而连一分钟也不会承认托洛茨基是盖世太保的同谋……整个太阳系所有的人权保障同盟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如果我能抵达墨西哥,我会在那里给这些指控者及其仆从以最终答复。"他想在动身之前"像一个沉船的水手把瓶子放入大海那样"留下这篇文章。[2] 他给廖瓦写信说:"看样子,明天他们

---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罪行录》第77-78页;托洛茨基日记片断,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克罗格:《见解》。

② 此文发表在《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上,是在托洛茨基离开挪威后发表的。

将把我们发配到墨西哥去。如果我们在途中或在别的地方遇到不测，你和谢尔盖就是我的继承人。这封信具有遗嘱的效用。……如你所知，我指的是我的著作将来的稿酬。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如果你将来能见到谢尔盖，就告诉他，我们从来就没有忘记他，而且时刻挂牵着他。”在他写这封信时，医生、律师和税务员给他送来了他们的账单，而且为了保障付款冻结了他在银行的存款。[①]

12月19日，“鲁特号”油轮驶出挪威，船上的乘客只有托洛茨基、娜塔利娅和押送他们的警察。驱逐托洛茨基一事搞得十分机密，在他起程后数天之内，胡鲁姆拘留所周围仍然站满了警察，为的是造成一种他还在那里的假象。航程开始时，海上波浪滔天，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在船舱里读着有关墨西哥的书，猜测着未来给他们准备了些什么。后来海面平静下来，托洛茨基开始以日记形式写分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的文章，后来他把它收在《斯大林罪行录》这本书中。在油船避开正常航道不断变换航向航行的3个星期里，他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全世界已经得知托洛茨基离境的消息，各国通讯社争相通过无线电采访托洛茨基。但“鲁特号”船长奉奥斯陆的命令不许托洛茨基使用船上的发报机。在这条空空荡荡的油轮上，人们对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仍像对待拘留犯那样，甚至在他们吃饭时旁边也站着警察。

托洛茨基在1936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该隐年。”第二天一早，“鲁特号”鸣笛迎接新年的到来。船上却没人响应，也没人祝贺新年。只有那位法西斯警官扬着手里的新年贺电走近餐桌，他收到了他那位工党大臣发给他本人的贺电。这个世界似乎到处充满了荒诞。

这是个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那些十分奇特的巧合之一，恰好在

---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20年以前,托洛茨基最后一次离开欧洲,那时他也是侨民,从为他提供临时避难所的那个国家被驱逐出来。而在1917年,世界处于战乱之中,海洋被潜艇搅得如一锅沸水。如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之中,海洋里也没有潜艇,但在油轮上却笼罩着一种几乎和战争时期一样的紧张气氛。托洛茨基在日记里写道,船长和船员们在提到格别乌时都回避直呼其名,"好像它是水底暗礁似的"。[1] 20年前,托洛茨基在途中写道:"我向欧洲这个老坏蛋投去最后的一瞥",为的是能尽快在3个月之后再重渡大洋回到那里。现在,他的确是在向这个"老坏蛋"投去最后的一瞥了。离开欧洲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他的思绪仍在留在身后的坟墓——两个女儿、许多友人和追随者及诸多希冀的坟墓上萦绕徘徊。

① 这本日记的一部分收入《斯大林罪行录》一书中,另一部分未曾发表,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中。

第五章
地狱之夜

1937 年 1 月 9 日，"鲁特号"驶进石油大港坦皮科，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仍忐忑不安，担心朋友不来接。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就难以获准在墨西哥登岸。正当挪威警方威胁要用暴力驱赶他们时，一艘小艇驶近前来，一位墨西哥将军在一群官员簇拥下登上油轮，表达了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①]对他们的正式欢迎(总统特地派自己的专列到坦皮科迎接托洛茨基和娜塔

---

①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1934－1940 年任墨西哥总统，参加过 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1969 年任世界和平协会名誉主席，1955 年获列宁国际奖金。——译注

利娅)。在码头上,两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与马克斯·沙什曼致词欢迎托洛茨基,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妻子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则表达了东道主的拳拳盛意。刚遭受到挪威冷酷的驱逐,此刻又置身于墨西哥的热情欢迎中,对比是如此鲜明,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一登上总统专列,迎面碰到警察卫队,不禁急忙向后躲闪。她后来说:"我们真害怕把我们又送到什么地方关起来。"在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小站上,迭戈·里维拉已热情地等候在那里,并将他们送到自己在首都郊区科约阿坎的"蓝屋"家里。随后的两年里他们就住在这儿。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来抚慰疲惫不堪的神经了。房子很大,充满了阳光,到处是图画、鲜花以及各种各样的墨西哥和印第安艺术品。客人在这里时时处处都能感到亲切周到的关怀。墨西哥和美国的朋友们为他们准备这个新的避难所时处处为他们的个人安全和工作方便着想。在墨西哥最初的这些日子,他们感到了梦想不到的轻松。这儿甚至能体味到一番田园诗般的情调。[1]

甚至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也十分宜人,墨西哥的革命正日益高涨。卡德纳斯总统不久前刚签署法令,宣布将部分大庄园分配给贫苦农民和着手将美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和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外国资本家、本国地主和天主教会被打败了,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变得十分紧张。但是卡德纳斯却获得了农民和墨西哥劳动者联盟的支持,后者当时已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由于里维拉的请求和自己周围人的坚持,卡德纳斯本着革命团结的精神接纳了托洛茨基。他声明说,不但为托洛茨基提供避

① 这在托洛茨基从墨西哥给廖瓦写的第一封信里相当明显,他在信里表达了他对新避难国的欣赏,包括它的气候、甚至水果与蔬菜。

难地，而且邀请他作为政府客人居留下来。从一开始他就尽一切努力保护客人，使其免遭迎头而来的仇恨的疾风暴雨的袭击。他始终不渝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是他本身的处境又十分微妙。一方面，他的政敌迅速开始散布诽谤，说托洛茨基是他的革命政策的鼓动者，这种无稽之谈随即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①] 另一方面，他所依赖的墨西哥劳动者联盟却是一座斯大林派的堡垒。它的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Lombardo Toledano)和共产党对于准许托洛茨基来到这个国家而提出愤怒抗议，警告总统说，只要"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没有被撵走，他们就不会安静下来。卡德纳斯极力驳斥说他剥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是受托洛茨基指使这种指控；同时尽量去抚慰墨西哥劳动者联盟。其实，卡德纳斯在政治上与各种形式的托洛茨基主义相距甚远，更遑论共产主义了。作为贫苦农民的儿子，支配其一生实践的是农业激进思想以及在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爱国斗争中的实际经验。因此他担心被卷人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任何冲突之中。他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斯大林派对接纳托洛茨基的抗议，但也审慎地与自己的"客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两人从未会过面。他请求托洛茨基承诺不介入墨西哥内政。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但汲取在挪威的痛苦教训，他要保留和捍卫自己"公开答复各种攻讦和诽谤"的道义权利。[②] 卡德纳斯对此感到满意。他根本就没有要求托洛茨基放弃政治活动的念头。他本人支持托洛茨基反击斯大林派的攻击以进行自卫的权利。他坚持这种间接的但警惕的善意态度。托洛茨基

① 卡德纳斯后来感到有必要公开驳斥这种诽谤(《出版报》1938 年 11 月 12 日)；而托洛茨基则想起诉一家美国报纸《纽约每月新闻》，这家报纸大肆攻击他是卡德纳斯的邪恶精灵。只是当艾伯特·戈德曼告诉他这样做缺少法律依据时他才作罢。见托洛茨基与戈德曼 1938 年 12 月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致墨西哥报界代表》1937 年 1 月 12 日。托洛茨基档案。

经常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严守承诺,从不对墨西哥的政治生活发表意见,甚至在私下里也不说,尽管他对卡德纳斯的政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批判性的,认为它甚至还没有超过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

在墨西哥生活的第一年里,迭戈·里维拉是托洛茨基最忠诚的朋友和保护者。他是伟大的艺术家,是政治和艺术中的叛逆者。他是墨西哥共产党创建者之一,自1922年起任中央委员。1927年11月,他在莫斯科目睹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和反对派被驱逐的场面,受到强烈的震撼。随后,里维拉与党决裂,也与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另一位伟大的墨西哥艺术家、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同志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决裂了。托洛茨基戏剧性的命运激发了里维拉的想象力: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这是可以在他的史诗般的壁画里占据中心位置的英雄形象,他还确实曾把托洛茨基和列宁摆在了他的一幅著名壁画的中央。这幅装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墙的壁画由于其赞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而令所有高雅体面的美国人惊骇万分。对于里维拉来说,这真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变幻莫测的命运将他的领袖和先知送到他在科约阿坎的住宅里。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创作早就十分赞赏。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巴黎初次见到里维拉的画,1928年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信里提到了他的那些作品。[①] 里维拉对新的艺术表现手段孜孜不倦的探索是对托洛茨基下述观点的最佳注脚:当代绘画的病根在于与建筑和社会生活的脱节,而这种脱节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将绘画、建筑和社会生活

① 安德列斯·尼恩给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寄去了一本里维拉绘画与雕塑的画册,托洛茨基回信感谢他送的书,并表示对艺术家的赞赏,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统一起来的追求推动着里维拉的艺术创作,它把文艺复兴、戈雅(Goya)和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传统与印第安、墨西哥的民间创作和立体主义融合在一起。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符合托洛茨基的趣味的。在里维拉的宏伟的巨幅绘画中,用以反映俄国与墨西哥革命主题的那种永远带有挑衅性的勇气、热情高涨的想象力深深打动了他。甚至里维拉粗犷质朴的气质、仿佛梦游症似的举止、"卡冈都亚似的块头和胃口"都不能不令他惊异和神往。这些气质将里维拉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喧嚷的怪物,就好像是他的画里的那些幻想的形象。与他相反,他的妻子弗里达却是一个偏于忧郁的象征派艺术家,一位娴雅的美人。她身上洋溢着异域风情,穿着装饰华美的绣花墨西哥式长连衣裙,遮盖住她那畸形的腿。经过可怕的数月羁押,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朋友做他们的避风港。

一个只要稍微长于蠡测人的性格的旁观者可能都会想知到,托洛茨基与里维拉怎么能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是否会发生龃龉。里维拉并不满足于自己在艺术领域的声望,还自认为是一位政治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例外:艺术家与雕塑家在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同寻常的巨大作用。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大多数都是艺术家。(对于没有文化但对农民艺术敏感的广大群众来说,借助画笔和雕刻刀所进行的政治宣传,其作用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更直接。)但是,里维拉作为政治家甚至都够不上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常常使他成为自己的受害者。但只要托洛茨基在场,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他在监督之下就会收敛起他的政治自负,谦逊地只满足于学生的角色。至于托洛茨基,他对艺术家们政治上的自命不凡总是抱着宽容、谅解的态度,即使对于那种与他毫无关系、不入流的艺术家的自命不凡也是如此。尤其是对里维拉这样的人,他总会说:"天才做的事总是对的。"

因此,托洛茨基应该庆幸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安乐窝,倘若他没有立即投入到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去的话。他每天都处于威胁之中,他是莫斯科和当地斯大林派的猎取目标。卡德纳斯总统命令在"蓝屋"附近建立一个警察岗。在蓝屋里面,来给他做秘书兼保镖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承担着警戒职务。在组织保卫工作以及反对莫斯科审判的斗争中,托洛茨基的美国追随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人少又穷,但他们竭尽全力帮助他恢复与全世界的朋友和拥护者的联络、重新开始工作。托洛茨基在 1937 年 2 月写给廖瓦的信中说:"我们真是幸运,赶在莫斯科开始新的审判之前来到了墨西哥。"[1]

※　※　※　※　※

托洛茨基来到坦皮科不到两星期,新审判就开始了。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及其他 12 人站到了被告席上,而缺席的托洛茨基重新成为主要被告。现在罗织的罪名愈加荒谬绝伦。维辛斯基说,托洛斯基与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签订了正式协议。维辛斯基言之凿凿地说,作为他们帮助他反斯大林的交换,托洛斯基进行旨在使苏联遭到军事失败并使之分裂的活动,此外,他还竟将苏维埃乌克兰出卖给第三帝国;目前他正组织并领导在苏联工业中的破坏活动;矿井、企业和铁路上的各种惨祸,苏联劳动者的大规模中毒以及多次对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未遂谋杀——这一切都是他所干下的勾当。检察长的话得到了被告们的响应,他们对他的指控作了详细说明。曾任《消息报》派驻法国的记者罗姆(Ромм)承认说,他于 1933 年 7 月在巴

[1]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黎与托洛茨基会过面，后者给他下了恐怖活动的指示。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1935年12月在奥斯陆附近，他曾与托洛茨基接头，并在那儿接受了他的指示。[①]

娜塔利娅写道："从收听到的广播，收看到的邮件和莫斯科的报纸中，我们感到疯狂、荒谬、卑鄙、交易和鲜血从四面八方涌来，淹没了我们。在墨西哥一如在挪威，……列夫·达维多维奇手里握着铅笔，尽管紧张过度、极度疲劳、经常发着热病，但仍然不知疲倦地标注出那些大量孳生的无法一一批驳的谎言。"[②] 审判持续了一周后结束，除了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被判了10年徒刑以外，其他被告均被判处死刑。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批驳指控真如在梦魇中与妖怪搏斗。审判过程因其在梦魇中而愈显得荒诞，而因其荒诞也愈显得像一场梦魇。看来这些审判只是为了麻痹各种批评意见，它们竟然把每一种论点都变得荒诞贫乏。因此，甚至在托洛茨基还没有收集到并整理出他的事实和论据之前，不少罪名就不攻自破了。挪威外交部调查了所谓皮达可夫于1935年12月从柏林乘飞机到奥斯陆与托洛茨基会面的说法。奥斯陆机场当局就此发表声明，断言这一个月及前后数周内没有任何来自柏林的飞机曾在奥斯陆机场降落。托洛茨基发电报质问莫斯科法庭：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皮达可夫飞抵奥斯陆？何时、何地并在何种情形下托洛茨基会见了他？关于他与罗姆莫须有的会面，他也提出了类似问题。[③] 检察长与法官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不管被告们怎么答复都将漏洞百出，这场戏就演砸了。1月29

① 《托洛茨基反苏总部案审判报告》。

② 引自V.塞尔日：《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258页。

③ 《反对派通报》1937年第54－55期。

日,即审判结束前夜,托洛茨基向斯大林提出了引渡要求。在诉诸国联的呼吁书中,托洛茨基声明,倘若国联根据苏联倡议成立一个有关政治恐怖活动的调查委员会,他愿意将自己的密件提交给这个委员会。他在挪威时已经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了。但是国联保持沉默;斯大林依然漠视他的引渡要求。托洛茨基给纽约一次群众集会的信件是又一次与审判者搏斗的尝试,他声明说:

> 我愿意站在一个在文件、事实、证据各方面都公开的、公正的委员会面前坦陈事实真相,没有丝毫隐瞒。我声明:我此刻保证,如果这个委员会判定我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那些罪行中有哪怕丝毫的罪责,我将自动听凭格别乌刽子手的处置。……我对全世界作此声明。新闻界,请把我的话传遍这个星球最遥远的角落吧。但即使委员会判明了莫斯科审判是一场蓄意的、预谋的骗局,我也不会请求我的诬陷者自动接受处决。——你们听到我的话了吗?——不,几代人记忆中的诅咒就足够了!克里姆林宫的诬陷者听到了吗?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这个挑战。我等待着他们的答复!”①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两个儿子的命运也最终与他紧紧绑在了一起,他们受尽了磨难。这使我们的叙述变成了拉奥孔传说的现代版。廖瓦感到格别乌正追逐着他,就在法国报纸上发表一份声明指出,如果他突然死去,那么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他是被斯大林分子害死的。其他说法都不要相信,因为他健康状况良好,也没有自杀的念头。而谢尔盖,按苏联报刊上的报道,在西伯利亚

---

① 《我以生命做赌注》,《被叛卖的革命》附录。

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并被指控按其父指示对企业工人进行大规模下毒活动。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企图逼迫我的亲儿子招供，让他反对我。格别乌会毫不手软地把谢尔盖逼得精神失常，再把他枪决。"娜塔利娅重又枉然地诉诸"世界的良知"。[①] 娜塔利娅后来回忆道："列·达·不止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并悲叹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有一次他对我说：'也许，我死了谢尔盖就能得救吧？'"[②] 这样的时刻唯有她知道。而世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坚强刚毅、天生精力旺盛的托洛茨基。他总是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去行动，总是去鼓舞疲倦的朋友们的斗志。比如，他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期的老朋友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因莫斯科审判而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主义，他得知后写信去说："激愤、憎恨、厌恶？噢，还有短暂的衰竭。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非常合乎人之常情。只是我不相信你会陷入悲观主义……而这本身正是对历史的一种消极的和屈辱的愤懑。这怎么行？历史就是历史，应该这样去接受它。当它放肆地变得反常和过分丑恶时，那就用拳头揍它，使它恢复正常。"[③] 他本人也正是这样坚持斗争的。

他埋头搜集自己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用它们证明斯大林分子的指控没有一项曾是或可能是真实的，揭露这场巨大骗局的政治意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必须重现自己流亡以来生活与活动的全部细节，从浩如烟海、枝蔓芜杂的档案和各种语言的报纸中寻找证据，从旧日的秘书和卫士那里搜集证词，而其中有些人早已变成了他的对头；同样，他还要从不同国家

① 《反对派通报》第 54－55 期。

② 塞尔日：《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 266 页。

③ 巴拉巴诺娃后来流亡到纽约。托洛茨基致巴拉巴诺娃，1937 年 2 月 3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的政府各部、领事馆、警察局、旅游局、地主、房东、旅店老板以及无数偶然相识的人那里搜集证明材料。但在一定意义上,这项投入极其巨大的工程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希望探究真相的人用不着如此繁琐的证据也能理解,而冷漠狭隘的人则受成见支配。后代人要形成自己的观点也未必须要这一大堆证明材料。托洛茨基这个好争辩的人可以像廖瓦、几位朋友、还有萧伯纳所劝戒的那样,满足于仅根据审判本身的材料来揭露它。① 然而学究气极浓的托洛茨基仍然不能摆脱他的典型做法,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决不肯放过任何偶然情况,决不允许哪怕一件事、一个事实没有书面证明或者一个证据未被备案。他这种做法仿佛是暗示,斯大林的诬陷会永世长存,而他为此则要准备多少代也不会磨灭的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

这项伤脑筋的工作耗费了托洛茨基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不管是秘书还是拥护者都被他无情地督催着,而首当其冲的是在巴黎为他完成基础工作的廖瓦。他不能容忍丝毫的拖延、反对或者道歉。稍有速度延缓的苗头,他就威胁"断绝一切关系",先是对沙什曼,后是对纳维尔,"骂他们是在怠工,以及更严重的罪名",尽管两人都全力以赴地帮助他。还在他从墨西哥写给廖瓦的第一封信里,他就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因为没有收到他在海上旅途中期待的那一批证明材料。过了两个星期,他愈加焦躁不安,给廖瓦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斥责。为什么没有搞到有关他去哥本哈根的文件?难道这不是"明显的罪过"吗?为什么某些证明没有按规定在公证处公证?为什么另一些证明上的签名辨认不清?为什么日期不准确?为什么某某地方不加标题以避免引起误

① 萧伯纳的观点见本书第400页。廖瓦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表示了他不赞成的态度(1937年3月8日)。

解？每过去一周，托洛茨基的语气就增加一分尖刻和粗暴。2月15日他给廖瓦写道："今天我收到你的信，……老一套的道歉……老一套的许诺……但我早已听腻了道歉，早就不再相信道歉了！"他还指责廖瓦近似"出卖"的"懒惰"。"经过近几个月来的这一切，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黑暗的日子——当我拆开你的信时，我以为会在里面找到证据，然而我却只能找到道歉和许诺。""很难说哪种打击更沉重——是来自莫斯科的还是来自巴黎的。"[①] 他已规划好春天开始反审判，可担心卷宗不能及时准备好。在这些日子里，"蓝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催命的工场。秘书们、托洛茨基本人及娜塔利娅全都埋在无穷无尽的文件堆里，翻译，复制和打印。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评论塞满了美国报刊的版面，力图使自己的观点更易于墨西哥报界理解，商议在各国建立"调查委员会"。出于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具有重要性的意识、对任何耽搁的多疑、对格别乌破坏阻挠的恐惧，还可能出于对事情能否完成的绝望，因此，他没有丝毫内疚地督促、责骂着廖瓦，用后者及自己的生命与名誉孤注一掷。拉奥孔也正如此，他责骂自己的两个儿子，命令他们竭尽全力同巨蟒搏斗，而在巨蟒窒息的缠绕中，他们全都毁灭了——父亲和儿子们。

廖瓦感到他做儿子的忠诚受了伤害。当托洛茨基被羁押在挪威时，他勇敢地站到了战场上父亲遗留下的位置上。然而这场斗争对于他是太沉重了，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重量；他盼望着父亲获得自由并把斗争的重负接到自己宽阔的双肩的那一天。但现在他看到父亲精疲力竭、暴躁易怒，只感到绝望。他一直对此事的整个价值抱有怀疑，并写信给娜塔利娅说，托洛茨基在去墨西哥路上写的小册子《斯大林罪行录》将比"反审判"或其他任何调查委员会的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1937年2月1日至15日的信。

行动更有驳斥力。但是,既然父亲决定搞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廖瓦就兢兢业业地承担起自己的那份工作。工作进展缓慢、产生误解并不是他的错。例如,托洛茨基从胡鲁姆责成他在瑞士组织反审判,但很快又决定在美国组织反审判。廖瓦不知道这事,仍继续瑞士的准备工作,结果招致了父亲的严厉指责,威胁要停止必需的汇款,并将下一步的工作转交给纳维尔(他对此人素来不大的信任)。[1] 资料的搜集因托派集团的内讧而困难重重:廖瓦必须从莫利尼耶派那里得到许多资料,而托洛茨基已与之绝交,这使廖瓦不得不施展外交手腕。他被搞得焦头烂额、心情沮丧。他也参加了反审判的出版行动,其文章不时出现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廖瓦继续照料父亲的出版事务,收取稿费并定期汇往墨西哥,偿还父亲在挪威和法国的债务,出版《反对派通报》。被父亲责骂的委屈,被格别乌包围的惊恐,个人生活的极度不幸,使他在30岁就已患上失眠的顽症。他心力交瘁,厌倦不堪。

他通常只对母亲敞开心扉。("亲爱的妈妈,我毫不怀疑,唯有你才不会为我的沉默或别的什么事骂我。")而对父亲的申斥他则反唇相讥:"……我应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会成为你的累赘的那部分工作,而且是在缺乏你才有的威望和帮助的情况下去完成它。我常常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我以为能指望你的支持,但是你只把我当成一个箭靶,大谈我的'犯罪的马虎'……即使我对哥本哈根文件的耽搁负有责任,这也不能成为……你对我的态度的理由。"[2] 委屈和灰心的廖瓦愈加信赖埃蒂安,在诚实、工作勤奋和对事业的忠诚等方面,可以说没人比得上他。

---

① 托洛茨基致廖瓦,1937年2月24日,3月5、1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廖瓦致托洛茨基,1937年3月8日。同上。

托洛茨基起初指望反审判能以与挑衅相应的规模进行，指望它能触动国际工人运动的良知。他打算与第二国际和所谓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建立联系。于是廖瓦根据他的主意找到了第二国际的秘书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后者主动谴责莫斯科的清洗是“中世纪的异端迫害”。阿德勒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然而他所做到的只是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拖延很久之后发表声明谴责清洗，但却拒绝参与任何调查或反审判。工会国际的态度也一样。在它们的德国支部和奥地利支部被希特勒和陶尔斐斯(Dolfuss)镇压后，这两个组织已落入莱昂·布吕姆的掌握。他需要依赖斯大林的支持才当得成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甚至第二国际反对清洗的空洞声明都使布吕姆感到为难；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防止党本身和“兄弟支部”进一步行动。这样一来，西欧社会民主党一反通常热衷于反对共产主义以捍卫“个性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次却宁肯保持外交沉默，甚至为斯大林辩护。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国际抵制了自己的秘书长。”这一点事先就削弱了各种反审判的效果：没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①]。

于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试图获得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支持。这种做法不太对托洛茨基的口味，他经常嘲笑斯大林分子荟萃文学界和科学界的“明星”搞什么“和平委员会”、“和平大会”、“反法西斯游行”等等。托洛茨基瞧不起此类大杂烩似的表面文章，尤其是当共产国际用它们来取代工人运动的大规模联合行动时。托洛茨基批评他的美国追随者未能将工人吸收进“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然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① 《反对派通讯》1937年第56－57期；廖瓦与弗·阿德勒的通信，1936年。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但知识界的反应也令人扫兴,因为在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斯大林派具有强大的影响,他们对知识界施加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防止它对清洗提出哪怕最微弱的抗议。在莫斯科,俄国文学艺术之花备受摧残,只听得见高尔基、肖洛霍夫和爱伦堡的声音,他们也加入了合唱,“杀死疯狗!”的嚎叫声震耳欲聋。在西方,声名显赫的文学家,如特奥多尔·德莱塞、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巴比塞和阿拉贡,也都齐声应和。而像罗曼·罗兰这位甘地的崇拜者,暴力的反对者,当代“人文科学的良心”,则以自己福音书式委婉的语气为俄国的血腥屠杀辩护,颂扬主要的刽子手。罗曼·罗兰干得如此卖力,以至托洛茨基想以败坏名誉罪对他起诉。如果说高尔基和罗兰定下了调子,那么无数的小文人和道学家则心安理得地紧随其后。他们支持斯大林的声明和呼吁听起来很奇怪。例如在美国,他们宣布抵制在约翰·杜威主持下建立的调查委员会。他们警告“所有善良的人”不要支持委员会,说莫斯科审判的批评者是在干涉苏联内政、帮助法西斯“打击进步力量”。在宣言上签名的有特奥多尔·德莱塞、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以及许多教授和艺术活动家,其中不少人在40—50年代时又站到了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线。[①] 路易·费舍(Louis Fischer)和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是知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担保,斯大林是正直的,维辛斯基是可靠的,格别乌是用人道方法得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的口供的。甚至伯特伦·D·沃尔夫(Bertram D. Wolfe)这位早被开除出共产党的洛夫斯通反对派成员还一直颂

① 参见发表在《今日苏联》上的声明,1937年3月号。

扬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阴谋中挽救了革命。[1] 迄今为止一直自称是"托洛茨基的敬慕者"的美国犹太人报界同仁现在也开始反对托洛茨基了，因为他的声明指出在莫斯科审判中潜藏着反犹主义。一份报纸的编辑写道："我们犹太出版界还是首次听到这种指控。在反犹的问题上，我们一贯将苏联看做是我们唯一的慰藉。……托洛茨基将这类毫无根据的的罪名加诸斯大林，这是不可原谅的。"[2]

这一切行为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伪善、盲信以及那些唯恐批评斯大林会帮希特勒忙的好好先生的顾虑。知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认为托洛茨基所进行的反击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断言："托洛茨基用不着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即正面证明自己的无辜。倒是他的审判者应该

---

① "今天，不管他的（即托洛茨基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对此我不想加以评论，他的客观作用却是在工人阶级中煽动反苏情绪。他指示他在法国的追随者加入社会党国际。他愈益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他甚至赞成苏联内战，这样他就成了他曾忠诚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和国家的公开敌人。"这就是伯特伦·D·沃尔夫在 1936 年写到托洛茨基的话！（《我们要知道的事》，载《工人时代》。）只是到了大清洗就要结束、布哈林即将站上被告席时，沃尔夫这位"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才为自己在道义上支持清洗感到后悔。（《新共和国》1937 年 11 月 24 日。）因此托洛茨基评论他说，沃尔夫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或忘掉，以免将来再犯严重的错误。在以后的年代里，沃尔夫又攻击其他作家（那些人一贯谴责斯大林分子的大清洗）是"斯大林的辩护士"。

② B.Z.戈尔德贝格的文章载纽约《秦格报》1937 年 1 月 26－27 日。这段时间托洛茨基重新审视了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在另一家美国犹太人日报对他的一次采访中他承认，最近第三帝国甚至苏联的反犹事件使他放弃了让犹太人与他们居住国民族"同化"的希望。他产生了一个新的看法，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犹太人问题仍然需要"从领土上解决"，也就是说，犹太人应该定居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他不相信这块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争辩说，腐朽的资本主义存在得越久，全世界范围的反犹主义就越凶恶、越野蛮，存于托洛茨基档案，1937 年 1 月 28 日。

提出比供认更多的东西,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①] 萧伯纳也否定了反审判的想法,并写道:"但愿托洛茨基不要让自己站在更为狭小的各式法庭上,而是站在他的听众讲坛上,在那里,他的审判者将会处于他的掌握之中。……他的笔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一个月之后,他更不以为然地写道:"托洛茨基事业的力量在于对他提出的指控不真实,但他恰恰是因为对斯大林进行了同样的攻击而损害了整个事业。此刻,当我与斯大林在一起度过差不多3个钟头并以强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之后,我很难相信他会是个粗野的强盗,正如我不相信托洛茨基是杀人凶手一样。"[②] 萧伯纳显然偏离了根本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并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同样的攻击"。但毕竟与罗曼·罗兰不同,萧伯纳还不至于因与斯大林的友情而为大清洗辩护。他在这整个事件中看到的不是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冲突,而是真理与真理之间的冲突,看到是如同他在《圣女贞德》中所描写的那种历史悲剧(此剧大约写于托洛茨基第一次被革出教门之时),是为了未来而斗争的革命同保卫合理的现实利益的现存政权之间的矛盾。安德烈·马尔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托洛茨基是世界上伟大的道德力量,但斯大林赋予人类以尊严;正如宗教裁判所无损于基督教的基本尊严一样,莫斯科审判也无损于(共产主义的)基本尊严。"[③]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的反应也与此类似。他

① 引自《列夫·托洛茨基案》第464页。

② 萧伯纳致英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秘书,1937年6月20日与7月21日。引自委员会档案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③ 引自马尔罗在《民族》杂志编辑部成员为他举办的宴会上的讲演摘要(托洛茨基的一位追随者寄给他一份摘要,收入档案保密部分)。马尔罗曾带着一批斯大林主义者来到美国,试图支援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际旅。早些时候,托洛茨基曾由于他对大清洗的态度而攻击过他。

多少有些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并被清洗所震惊。但是他还未能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他像俄国的变节者一样怀着疑虑向它屈膝，并在《伽利略传》中用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及那些人的困惑。他是通过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去看伽利略的：伽利略跪在宗教法庭上，其行为是出于被人民精神与政治上的幼稚所制约的历史必然性。他剧中的伽利略不过是穿着历史外衣的季诺维也夫，或是布哈林或是拉柯夫斯基而已。焦尔达诺·布鲁诺的"无益的"受难令他苦恼。这个可怕的榜样迫使他屈服于宗教法庭，正像托洛茨基的命运迫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屈服于斯大林一样。"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布莱希特剧中这句名言与其说体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苦恼的思索，还不如说体现了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托洛茨基的问题。[1]

在回答斯大林的辩护士及那些推卸责任的人时，托洛茨基所发泄出来的强烈怒火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使他看起来像是民间故事里的歹人，这就给予了不很情愿的"真理捍卫者"保持沉默的口实。因此，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拒绝与抗议运动发生关系就不足为奇了。不但如此，他们还变成了斯大林的颂扬者。但甚至如安德烈·纪德、赫·乔·威尔斯那样的人，他们最初的冲动是支持反审判的，最终也决定袖手旁观。因此，这次行动局限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而且五花八门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主要是由誓死反斯大林主义者和一些长期持反共产主义立场者组成，这就在更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委员会活动的影响。

1937 年 3 月，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国的各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旨在进行反审判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加入者有：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唯一同卡尔·李卜克内西共同投票反对 1914—1915 年战

① 布莱希特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1938 年写出了《伽利略传》的最初版本。

争的德国国会议员奥托·吕尔(Otto Rühle)、前国会议员共产党人文德林·托马斯(Wendelin Thomas)、以无政府工团主义而著名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具有浓厚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美国激进女政论家苏珊·拉福利特(Suzanne La Follette)、新闻记者本杰明·斯托贝尔格(Benjamin Stolberg)与约翰·R·张伯伦(John R. Chamberlain)、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教授爱德华·A·罗斯(Edward A. Ross)、大学讲师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右翼拉丁美洲作家弗兰西斯科·扎莫拉(Francisco Zamorra)。这些成员里除了罗斯默以外,没有任何人曾与托洛茨基有过关系——而且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政治上的反对派。委员会自身的权威主要应归功于其主席——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众所周知他是苏联的朋友。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是约翰·F·芬蒂纳(John F. Finerty),他在美国政治大审判中作为被告律师而闻名全国,特别是在汤姆·穆尼(Tom Mooney)、萨科(sacco)和万齐蒂案的审判中。

托洛茨基起初不相信这个委员会能胜任自身的任务。其大多数成员的姓名对他来说几乎说明不了什么,他甚至对它的主席都抱有怀疑。他想到许多问题:这位年近80高龄的杜威未免太老了点儿了吧?委员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离他未免太远了点儿吧?在听证会上他不会睡着吗?他怎么能对付得了那么一大堆证据、文件呢?而他作为"苏联的朋友"难道不会为斯大林粉饰吗?委员会积极的组织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消释了托洛茨基的疑虑,他写道:"杜威是老了,但他头脑仍然敏锐,他的正直的人格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他对萨科和万齐蒂案件写出了最透彻的分析文章。此外,他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学者和逻辑学家去处理问题,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不会在听证会上打盹。……低估他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杜威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正

直的人格和智力不能防止他在政治上骑墙。在这点上，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他……。"[1]

杜威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差不多是一桩英雄主义的举动。在哲学思想上他是托洛茨基的对头。他们不久前还就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公开发生了冲突。尽管总的来说杜威是个激进主义者，但他赞成"美国生活方式"和议会民主制。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倾向于"非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斯大林，而反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在耄耋之年背上了调查主席的重负，这使他不得不与自己的许多朋友断绝了来往。斯大林主义者竭尽全力劝阻他。当他们没有得逞时，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诽谤——最轻的诽谤是，他之所以"成为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是由于老年痴呆症。连他创立并任其编委会成员达 25 年之久的杂志《新共和国》也起来反对他了。他不得不退出编委会。亲属们恳求他，不要使自己姓名上的光环因为令人置疑的脆弱的事业而遭到污损。然而阴谋与阻挠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在杜威看来，为了阻止他，压力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或明或暗，仅这件事本身就强调了调查行动的必要性。为了投入到对此特殊事件的实际调查，他甚至丢下了论文《逻辑：探究的理论》的写作，而这是他自认为最主要的工作。数周乃至数月之久，他埋头研究散发出血腥气的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官方报告、托洛茨基大量的著作、通信及其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做笔记、比较事实、数据和观点，直到完全掌握了此案各方面的情况。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恐吓和威胁。什么也无法动摇他的冷静或削弱他的意志。委员会需要对作为主要证人的托洛茨基进行询问，由于美国政府不允许托洛茨基来纽约，于是杜威决定在墨西哥展开调查。人们警告他，墨西哥劳动者联盟不准进行反审判，他及其伙

---

① 伯纳姆致托洛茨基，1937 年 4 月 1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伴将在边界遇到敌意的示威,甚至遭到暴力。但老哲学家不为所动,仍然继续他的事业。他对问题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他确信托洛茨基的罪行并没有被莫斯科证明,但也不肯轻信托洛茨基的清白。他决心不但要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而且还要将这公正昭示世人,因此他从未在委员会会议之外与托洛茨基会面,尽管"很想私下同他非正式地谈谈。"[1]

4月10日,委员会开始了一系列的听证会。起初想在墨西哥城中心的一间宽敞的会堂里举行,后来为了避免干扰和省钱又放弃了这个主意。会议始终在"蓝屋"中的托洛茨基的书房里举行。"气氛是紧张的。外面站着警察……一个带武器的托洛茨基的秘书对客人们进行搜身以免他们携带进武器,并对他们加以辨认。"临街的双扇大窗户"都关上了,在每一扇后面垒起了两米高的用砖砌就并用水泥加固的工事,还有沙袋……这些工事都是前一天晚上完成的。"出席者大约有50人左右,包括记者和摄影师。听证会是按照美国通行的司法程序进行的。杜威曾邀请苏联大使、美国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派代表列席会议并参与讯问,但邀请如石沉大海。[2]

在简短的开幕词中,杜威声明说,委员会既不是法庭,也不是裁判官,仅仅是一个调查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听取托洛茨基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证词,对他进行讯问,并提出我们所从属的整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委员会赞成托洛茨基。它遵循的是"美国传统":"任何人在没有为自己辩护之前都不能被定罪。"委员会的目的是,当被

[1] 上述情况是杜威本人和他的秘书拉特纳在1950年告诉我的。

[2] 《列夫·托洛茨基案》附录三;另见詹姆斯·法雷尔:《约翰·杜威》(西德尼·胡克主编的专题论文集)第361页。

指控者是否得到公正审判引起怀疑时,它提供一次公正的审判。托洛茨基案件可以与穆尼案件、萨科和万齐蒂案件相比较。但是后者起码在最后定案之前还可以申诉,而托洛茨基和其儿子却被苏联最高法庭两次缺席判定有罪,他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自动有效的引渡要求,使他能出席挪威或墨西哥的法庭,但都遭到漠视。"他在不被听取申诉的情况下被定罪,这个事实令委员会以及整个世界良知十分不安。"在坦陈自己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动机时,杜威说,既然献身于社会教育事业,他就将今天的工作看做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任务和教育任务——"否则就意味着背叛我一生的的事业。"

听证会持续了整整一周并举行了13次长会。杜威、芬纳蒂、托洛茨基的律师艾·戈德曼及其他人就罪名及证据的所有细节对他进行了讯问。有时讯问几乎变成了政治辩论,某些讯问者坚持说托洛茨基和列宁应对斯大林主义负有道义责任,而托洛茨基否定这种断言。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拒绝回答或者回避。争论尽管激烈,但会议却进行得很平静缓和,在这当中只受到了所谓的比尔斯(Beals)插曲的干扰。

委员会成员卡尔顿·比尔斯多次向托洛茨基提问,其中一些与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另一些问题可看成是展示其亲斯大林的偏见,而且在形式上咄咄逼人。托洛茨基克制地、扼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4月16日的长会快结束时,比尔斯提出了几个问题并断言说,托洛茨基与苏联的那些主张"建设(苏联)经济"的人相反,他在极力鼓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指出,在莫斯科审判中他并没有被描绘成世界革命的鼓动者,而是被描绘成反革命的鼓动者、希特勒的同盟。)比尔斯又问他,他是否认识鲍罗廷(此人是苏联派驻中国的特使,斯大林主义者,蒋介石的顾问)。托洛茨基回答,他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从未与他谋面。比尔斯问,难道1919年或1920年不

是托洛茨基派他到墨西哥建立共产党的吗?这个问题是暗示托洛茨基在欺骗委员会,尤其是暗示他曾企图在这个现在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里煽动革命。争论尖锐起来。挪威的经历还记忆犹新,托洛茨基不禁怀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旨在唆使墨西哥人反对他和剥夺他的避难地并破坏反审判。他指出,他是将自己的希望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但努力用政治上合法的手段去促进它,而不是在异国组织政变;关于他在1919—1920年派鲍罗廷去墨西哥这种断言纯属捏造。当时正值国内战争最紧张的关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装甲专列,他的目光只盯在军事地图上,"整个世界地理"差不多都忘光了。

然而比尔斯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补充说,是鲍罗廷自己宣称托洛茨基派他去墨西哥的,而且早在1919年,苏俄共产党就分裂为国务活动家与革命鼓动者。托洛茨基问:"我能得知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来源吗?它是公开发表的吗?"比尔斯说:"不是。"托洛茨基反击道:"我只能向这位委员建议,去告诉他的那位报信者,他是个骗子。""谢谢您,托洛茨基先生。鲍罗廷先生原来是个骗子。"托洛茨基简洁地回答:"很可能。"听证会快结束时,他表示对比尔斯的"亲斯大林腔调"的抗议。这件事更使他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鲍罗廷事件与莫斯科审判毫无关系,看来仅仅是要使他以及墨西哥政府为难。因此,在下一次会议开始时,他再次否定比尔斯的断言,并请委员会查明这些说法的来源。若是比尔斯是从鲍罗廷那里直接获知这些情况的,那么让他说明发生于何时何地。若是他是间接获知的,那么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搞清楚这些问题将揭示出旨在破坏反审判的意图。"如果比尔斯先生与这些阴谋没有蓄意的、直接的关系,那么我希望他能尽快作出一切必要的解释,以便委员会揭穿阴谋的真正源头。"因为比尔斯拒绝说出自己消息的来源,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中对他进行了谴

责，他则退出了委员会。这件事没有任何后果。①

托洛茨基在他本人4月17日的最后声明中对讯问的结果作了概述。② 他已经精疲力竭，劳累不堪，请求准许他坐下宣读自己的声明。他首先指出，或者是他以及几乎所有列宁政治局的成员如莫斯科起诉人所宣称的那样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叛徒，或者斯大林与他的政治局是一群骗子，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说，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干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内政，那么这是一个不允许工人讨论其事务的"奇怪的祖国"。他本人及他的家庭被剥夺了苏联国籍，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栖身于"国际社会舆论的庇护下"。至于查尔斯·A·比尔德那些人断言说的：论证的责任在斯大林一边而不在他身上，"以正面论据驳斥反证"是根本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对此回答说，不在现场这一司法概念提供了反驳的可能性，而他可以提出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以展示"正面的事实"——斯大林作了"历史上最大的伪证"。

然而，这场司法审理只"涉及到伪证的形式而非它的本质"——与清洗、"被告、证人、法官、辩护人甚至检察官所遭受的极权压迫……"的政治背景不可分割的本质。在这种压力下，任何审判在司法上都不再是公正的，它已成为演戏。被告只是经过排练之后才登场，导演十分放心，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超出自己角色的范围"。在起诉与辩护之间没有任何辩论的余地。主要演员在枪口下演完自己的角色。"剧可能演好，也可能演砸，但这是一个宗教裁判的技术问题而非公正问题。"

对指控进行估价，应该考虑被告的政治历史。罪行一般是罪犯性格的产物，最起码与之相符。因此讯问时必须考察他，托洛茨

① 《列夫·托洛茨基案》第411－417页。

② 同上，第459－585页。

基以及其他被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工作以及在革命中的作用;而根据这些事实来看,强加于他们的罪行是与他们的性格根本不符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需要伪造他们的履历。这里应该提一个基本问题:对谁有利?杀死基洛夫给反对派带来了或可能带来什么好处?要不然就是有利于斯大林,给他提供镇压反对派的口实?在煤矿、工厂和铁路进行破坏,反对派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要不然这就有利于政府?它坚持过快的工业化,但因其官僚的玩忽职守又在工业生产中造成了大量灾难,而现在它极力用这些灾难来指控反对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反对派同希特勒或者日本天皇联盟能赢得什么?要不然就是斯大林用被告供认他们是希特勒的同盟来积累政治资本?

对于反对派来说,犯下这些罪行中的任何一桩都无异于愚蠢的自杀行为。指控的荒谬是起诉方无法提供确凿证据所致。维辛斯基所指的阴谋仿佛源远流长,遍布苏联国内外。其被臆想出来的多数领导人及参加者这些年来一直处于格别乌的掌握之中。然而格别乌不能提出有关这些巨大阴谋的任何实际材料,甚至连一个证据也拿不出来,只有供认、供认、没完没了的供认。"阴谋既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被告没有引证阴谋过程中任何具体的事件或行动,而只有本人关于它的谈论——法庭审理就是关于谈论的谈论。缺乏任何心理学的说服力和事实内容,说明这些戏是按照专门准备的"脚本"演的。但是,"如此巨大规模的伪证,连警察局都承受不了……太多的人物与情节、性格与事实资料、利益与文献,……都与准备好的脚本不相符!""如果从艺术家的立场来看问题,那么,哪怕莎士比亚的肩膀也担不起使上百个人物及无数情节协调一致……的任务。然而并没有对格别乌唯命是从的莎士比亚。"当它炮制那些仿佛发生在苏联的事件时,它还能保持表面的说服力。宗教法庭似的暴虐可以强迫被告与证人和他们自己的某

些荒诞故事保持一致。当阴谋的线索延伸至其他国家时,环境改变了,而格别乌仍是如法炮制地指控他这个"头号人民公敌"。但是在国外,对事实、数据和情节是可以检验的,而每一次都使关于阴谋的故事露了馅。编造出来的通向托洛茨基的那些"线索"没有一条是真的。已经查明,似乎接受了他的指示进行恐怖活动(在他儿子在场或不在场的情况下)的某些被告如达维德(Давид)、贝尔曼-尤林(Берман Юрин)、罗姆(Ромм)和皮达可夫没有也不可能在莫斯科所指出的地点和时间与他(和他的儿子)会面,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儿子,或是他们一起,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在那里。假若能证明不存在这类接触,那么一切罪名都将落空,因为捏造出来的他与拉狄克(通过罗姆)和皮达可夫的关系对"阴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皮达可夫和拉狄克供认,他们是托洛茨基的主要代理人,是阴谋的两大支柱。而其他所有罪状与证词都是基于或者出自这一点。拉狄克在审判中曾这样说:"其他被指控者的证词都是基于我们的证词",然而他们自己关于在巴黎和奥斯陆同托洛茨基会面的证词却完全是空穴来风。托洛茨基指出:"假如支撑大厦的两根主要的柱子坍塌了的话,就无须一块砖一块砖地去拆它了。"不过他本人倒是在"一块砖一块砖地去拆它"。

他提请委员会注意:他本人的叙述充满了心理学的和历史的真实性,而这显然是莫斯科一面之词所缺乏的;提交给委员会的那些文件极其完整地反映了他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倘若他犯下了这些罪行的任何一桩,他的书面材料肯定会在不定哪个问题上出卖他。那些小事拘谨大事糊涂的人肯定会说,他可以为了掩盖真实意图而炮制自己的档案和书信卷宗。但若是出于伪装,可以编造出5个、10个甚至上百个文件,却不可能编造出上百个人写的上千封书信、上百篇文章和数十打书籍,不,他"不会为了藏一只死老鼠而去盖一座摩天大楼"。比方说,如果有人声称迭戈·里维拉

是天主教会的奸细,难道调查指控的陪审团就不去看里维拉的壁画了吗?谁敢说在那些壁画里显而易见的火热的反教权主义仅只是一种伪装?从事艺术、历史和革命政治的人,谁也不会仅仅为了蒙骗世界而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相比之下,维辛斯基的证明材料是何等贫乏——仅仅是几封托洛茨基的书信:给克拉奇科夫斯基的两封,给拉狄克的三封,给皮达可夫的一封,给穆拉洛夫的一封。而且全是伪造的!

那为什么被告们要供认呢?不能指望从他这里得到关于格别乌残忍手段的准确报告。"我们在这里不能审问亚戈达(此刻叶若夫(Ежов)正在审问他),或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斯大林,或……他们的牺牲者——其中大部分已遭枪决。"但是在委员会面前摆着俄国和欧洲许多共产党人的见证,他们是格别乌以残忍手段折磨的对象。人们常常忘记,供认者们现今已不再是积极的反对派领导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匍匐在斯大林的脚下。他们的最后供认不过是长期投降过程的顶点,是不折不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诬告"的完成。13年来,斯大林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座诽谤的"巴比伦之塔"。一个毫不手软地使用恐怖手段、"收购灵魂好似用麻袋装土豆"的独裁者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的。但是斯大林害怕自己的巴比伦塔,因为他清楚,只要在它身上打开第一个缺口,它就会坍塌,而缺口肯定会被打开!

托洛茨基的发言以颂扬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作为结束语。他说,尽管有斯大林,尽管有大清洗的恐怖,苏联社会仍然是人类社会组织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布尔什维主义可悲的堕落,其罪过不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未能传播到俄国之外。今天,苏联工人面临着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选择。他们宁肯认为斯大林是对的:"斯大林比希特勒好"。当他们还不知道另一种两难选择时,他们甚至在可怕的斯大林统治下也会是麻木的。只有在国外出现了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胜利的前景时，他们才会抖落身上的冷漠。“因此，我并不绝望……我有耐心，3 次革命把我变成一个耐心的人。”

> 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 18 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托洛茨基在结束为自己辩护的发言时讲了上述这番话，并对委员会及其秘书表示感谢。

受到强烈震撼的委员们坐在那里，久久沉默。杜威原打算作个正式总结结束会议，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都只能破坏气氛。”①

因为托洛茨基的克制，使讯问的结果更为引人注目。他经常有意识地不发挥自己的雄辩才能，以免使墨西哥政府为难。他在解释自己与斯大林的复杂关系时尽量不用习惯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怕听众难以理解，他用的是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的语言——这种术语转换之困难只有作过这种尝试的人才深谙其中滋味。为了便于与自己的听众交流，他在为自己辩护时不用母语，甚至也不用德语或法语，而是用英语。托洛茨基的词汇有限，语法知识和成语表达都不准确。他失去了原先的雄辩才华和即使蹩脚演说家依靠其母语都能得到的优势，还要即兴回答那些五花八门

① 杜威仅用寥寥数语对委员会未来工作作了正式通知。

的最复杂、最意外的问题。每一天，每一次会议，他都在苦苦寻找着合适的语句，克服着语言上的"抵牾"，常常陷入停顿，不由自主地讲出一些相当可笑的句子，有时甚至答非所问，或者听不懂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就像还没治好口吃的德摩斯梯尼，嘴里塞满石头，来到法庭上为自己的生命斗争。他讲述自己漫长经历中的各种事件，展示自己的信念，描绘苏联制度的大量嬗变，分析那些使他与斯大林和布哈林，还有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分裂的争议问题，描写当事人的性格并深入地探究了这场可怕斗争的每一阶段。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 13 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

※　※　※　※　※

杜威的委员会为准备最后的裁决需要好几个月时间。这期间，托洛茨基应按它的要求补充证明材料，于是他督促全家都去工作。讯问以及与此相应的工作使托洛茨基疲劳不堪。短期移居乡间也未能恢复他的体力。晚春及整个夏天，托洛茨基重又苦于头

痛症、恶心和高血压的折磨，并抱怨衰老"出其不意地攫住了他"。对反审判的最初反响极为可怜。[①] 笼罩全家的紧张几乎没什么减弱。廖瓦在4月末写信说："亲爱的爸爸，您仍然对我实行贝壳放逐法……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收到您的任何信件了。"托洛茨基照旧对廖瓦管理《反对派通报》的方式不满，重新建议将出版移至纽约。在回信中，廖瓦平静地指出，通报应该在欧洲出版，因为它的大多数读者在那里，并又苦恼地向妈妈抱怨父亲粗暴的责骂。托洛茨基于1937年5月写了一封似乎是辩解的长信，试图平息事端。[②] 他向廖瓦解释，他在准备反审判之前在挪威已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新的拖延使他十分焦虑，而且他还急于将完整的卷宗交给杜威的委员会。他确信耽搁是由廖瓦不愿与同志们合作而引起的。他劝廖瓦休息一下、松弛一下神经："前面还有巨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

劝告的确很及时。廖瓦也患上了头痛症和寒热病，但却不具有父亲那般抵抗力。"我从前的精力都到哪儿去了？"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说，并暗示他现在需要"动一个小小的手术"。他生活在贫困之中，却还惦记着去打工或获取奖学金从经济上帮助父母。娜塔利娅劝他为报纸撰稿，他苦涩地回答："写作……对我很困难，我需要读书、研究和思考，而这需要时间……但是自从流亡以来，我就苦于没完没了的技术上以及其他方面的沉重责任。我是一头驮着重负的牲口。我不能求学，不能指望做任何文字工作。我又没

① 英国与法国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通知科约阿坎，上述国家的报纸几乎完全漠视反审判。

② 廖瓦致托洛茨基，1937年4月28日；托洛茨基致廖瓦，5月29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20多年以后，娜塔利娅对我说，托洛茨基"给廖瓦写了一封严肃的长信，消除了一切误解"。尽管担心那封信已丢失，她还是答应尽力去找出它。娜塔利娅所说的那封信，其要点大致如文中所述。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完全"消除误解"。

有可以作为知识的部分补偿的轻灵的笔和才能。"[1] 在这绝望中又融会着热忱与忠诚。当父母将他从法国出版商那儿收到的支票又寄还给他后,那些钱他自己只拿了很少一点儿,剩下的全部分给需要的同志或者转为组织基金。他担心父亲操劳过度而伤害身体。他问娜塔利娅,他们在墨西哥为什么不买一辆汽车,为什么不去打猎或钓鱼?为什么列·达·不玩他很爱玩的槌球?收到她一封充满忧愁的信后,他回信写道:"最最亲爱的妈妈,请想一想,要是斯大林不犯'错误'、不驱逐爸爸的话,那现在会怎么样?爸爸可能早就死了。……或者1929年允许我返回苏联,或者谢尔盖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或者爸爸此刻正在挪威,或者更糟,正在土耳其?基马尔也许已经把他出卖了……说不定事情还会坏得多。"[2] 除了这样聊以自慰,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大约这时,在家庭私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在充满阴暗的事件和个人不幸的当儿,娜塔利娅却吃起醋来了。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在她给丈夫的那些信里对此讳莫如深,从中只能找到一个疑点: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有了嫉妒的理由。大概自信心较弱的女人更易嫉妒,因为托洛茨基偶尔与女人相处时表现得格外殷勤,不能摆脱男人的虚荣心和对女人注意自己的敏感。起码,有时女人在场会让他表现出更富有诱惑性的活力和机智。这类"调情"中包含着一种旧式的骑士风度与艺术家的雅致。但这与他极度的严肃和几乎禁欲主义的生活不大协调。因此娜塔利娅相信丈夫的爱情,对这类事情从不见怪。但是在科约阿坎,她开始强烈猜忌起丈夫与一位女人来,对这位女人,她在自己的信里仅以字母F相称。从各方面来看,这位女人可能是弗里达·卡洛。住在这

① 廖瓦致母亲,1937年6月29-30日。

② 1937年7月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个家里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两位女人之间的疏远，以及两位丈夫之间微妙的冷淡。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弗里达那异乎寻常的纤雅的美和她那艺术气质招来了托洛茨基过分的殷勤呢，还是年届55岁的娜塔利娅成为人到中年易见的嫉妒的牺牲品。总之，"危机"降临了，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娜塔利娅都感到不幸，情绪恶劣。[1]

7月中旬，托洛茨基离开科约阿坎，偕同卫士到山上进行体力锻炼，在大庄园里工作、骑马和打猎。他每天都给娜塔利娅写信，有时一天两次。他答应她不在信中提及她的伤心事，但又"不能不违背诺言"：他劝她"不要再嫉妒"与他"没有太大关系的女人"，说她，娜塔利娅——才是一切。他充满了"对自己的羞耻与悔恨"，信末签名是"你忠实的老狗"。"我多么爱你，娜塔，我唯一的，我永恒的，我忠实的，我的爱，我的牺牲品……。""噢，我真愿意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哪怕是一点点儿。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每过两三行，我就要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流下自责和感激你的泪水，我为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衰老而哭泣。"自怜的调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这些信里，这是无论局外人还是家里人都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的。"我仍然还生活在我们的昨天里，生活在我们的悲哀、回忆和痛苦里。"突然，他全部的生命活力乃至生命欢乐又重新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娜塔，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你应该恢复健康，变得更强壮些。"有一次，仿佛是在刺激她似的，他写信告诉她，他"倾倒了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特别是到山上来拜访他的女人"。他的生命力达到了高潮，并且感到对娜塔利娅的性欲要求。他告诉她，他刚刚在重读托尔斯泰回忆录的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描写他在70岁还能纵马，还有占有自己妻子的充分欲望。他，托洛

[1] 1937年7月7日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茨基,才58岁,在精疲力尽的骑马狂奔之后,也正处于这种状态中。对她的渴望,使他忍不住说出性的黑话,然后又感到"可耻,平生第一次在纸上写下这样的话","行为像个贵族士官生"。好像是要证明人的一切对他都不是外在的,他又重温他们夫妻生活的旧日芥蒂。他提到娜塔利娅那段大约是发生在1918年的隐情,并说,正如他从未责备过她并从未提起这个"事件"一样,她也不应当对他过于严厉,他并未给她任何嫉妒的理由。她在同信中解释1918年"事件"。此事发生在她刚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博物馆管理处主任之后,她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而她的一位助手、同志帮助了她,此人无疑"爱上了"她。她很感激他,对他很同情。但是并没有体验到任何温情,也并不想与他建立过分亲密的关系。经过35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丈夫和妻子找不到另一件"不忠"之事;又纠缠于这种喜剧式的温柔的互相责备,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证明了他们爱情的力量。[①]

在自己的信里,娜塔利娅显得很克制,托洛茨基的亢奋令她为难,她希望使他回到正常状态。对他关于衰老的抱怨,她一如既往地回答:"只有没有前途的人才会衰老",还有当你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而这当然与他不相干!"振奋起来,回到工作中去,这样就能使你开始痊愈。"她早已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即使在自己身体不好、十分劳累的情况下,也为他的病情、热症、失败而操透了心,帮助家庭里每一个成员,她总是比任何人都更安详、强壮有力。他了解她的坚毅,这是他的依靠。在托洛茨基给她的一封信里,人们看到这样生动的话:"你仍然在用自己的双肩驮着我,娜塔,正如

① 娜塔利娅的"解释"信没有标明日期。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它写于7月15日。7月19日托洛茨基回了两封信。在这些日子里,他还在日记里作了专门为娜塔利娅看的解释(他对此强调过好几次)。

你这一生都驮载着我一样。”[1]

※　　※　　※　　※　　※

此时在苏联，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进行大屠杀。5月末，格别乌宣布揭露了一桩阴谋，其首脑是致力于红军现代化并任其总司令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一些著名的将军如亚基尔(Якир)、乌博列维奇(Уборевич)、科尔克(Корк)、普特纳(Путна)、普里马科夫(Примаков)，以及包括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Гамарник)在内的其他人都被指控叛变。除了加马尔尼克自杀之外，所有其他人都被处决了。在签署死刑令的四位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Блюхер)与叶戈罗夫(Егоров)中，后两位很快也被处决了。这些人都是托洛茨基任军事人民委员时被提升到指挥员岗位的。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从来都不属于反对派，而且自从托洛茨基被驱逐以来，也无一人曾与他有过接触。但是他们全都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的同伙、图谋导致苏联军事失败和国家分裂。他们的死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使红军丧失其指挥官的波及25000名军官的大清洗的前奏。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大多数将军在25年之后被正式平反，但这次大清洗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仍从未得到说明。根据各种反斯大林的消息来源说，图哈切夫斯基为破坏国家道德基础及其国防的恐怖手段而不安，策划政变以推翻斯大林和剥夺格别乌的权力。但是他的活动与托洛茨基毫无关系，更遑论希特勒以及任何外国列强。托洛茨基不相信有阴谋，但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陨落标志着斯大林与军官团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使军事政变“列上日程”。[2]

---

① 托洛茨基致娜塔利娅，1937年7月18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反对派通报》1937年第56－57期。

在这期间,格别乌已排练好了"二十一人审判",准备由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亚戈达出演主角(其中仅托姆斯基一人由于自杀而逃避了公开审判与供认的耻辱)。还在舞台大幕升起之前,恐怖就已袭击了斯大林派。鲁祖塔克(Рузутак)、梅日劳克、柯秀尔(Косиор)、丘巴尔(Чубар)、波斯特舍夫(Постышев)、叶努基泽(Енудидзе)、奥库贾瓦(Окуджава)、埃利阿瓦(Элиава)、切尔维亚科夫(Червяков)及其他政治局成员,莫斯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地党的书记,工会领袖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差不多全是不久前的斯大林派成员——都被打上叛徒、外国间谍的烙印而处决了。奥尔忠尼启则忠于斯大林长达30多年,出于良心谴责而开始反对他,因而死得不明不白,或者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被迫自杀。如果说托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是公开蒙辱,那么斯大林分子却是未经公开审判就被秘密清算了。斯大林为何对他们发怒、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一直不太为人所知。恐怖溢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范围,波及了许多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及巴尔干的共产党人,他们当初都是逃出本国的监狱和集中营后作为避难者居留在苏联的。尔后,"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进攻"转向了其他国家。在西班牙,格别乌早在该国内战期间就已扎下了根,并攻击波乌姆。[①]尽管波乌姆的领导安德列斯·尼恩与托洛茨基不和,由于参加加泰罗尼西亚的共和政府以及在革命中所持的"畏葸不前的小孟什维克"立场而遭到托洛茨基批判,但对于人民阵线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尼恩的政治路线仍然太过激、太独立了。因此他与他的党被扣上了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恶名,他最终遭到绑架并被杀害。任何胆敢抗议的人均遭到格别乌的报复。政治迫

① 西班牙托派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的音译。——译注

害，谋杀和犬儒主义，斯大林以此来利用西班牙革命破坏共和国阵营，并促成了它的失败。仿佛是一种嘲弄，斯大林没有派别人，却单单派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位当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1917年的英雄去领导对波乌姆的堡垒加泰罗尼西亚的清洗。然后，当安东诺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斯大林却给他加上了敌对分子和间谍的罪名，下令把他处死了。

在莫斯科，此刻人人自危，甚至连酷吏和刽子手也不例外。亚戈达被捕后，格别乌与整个秘密机构也都遭到清洗。它们在欧洲的间谍被召回苏联，而倾倒在他们头上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指控。通常这些间谍都知道或能猜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还是仿佛接受了催眠术般地回来了，也有许多人宁愿选择自我清洗，到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请求避难。因此，欧洲的苏联间谍网的领导人伊格纳茨·赖斯(Игнаций Райсс)抛弃自己的工作以示对清洗的抗议就成了惊人事件。甚至还未接到回莫斯科的召回令，他就已下了决心。他被大清洗所震惊，于是去找荷兰国会议员，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内夫利特(并通过他找到廖瓦)，他警告托洛茨基，斯大林决定在苏联境外"清除托洛茨基主义"，将采用在国内对付它的同样手段。赖斯谈到了令人发指的暴虐、讹诈、长时间的可怕拷问——格别乌以此获得莫斯科审判所需要的供认，并从精神上折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使他们在慌乱中走向死亡。但他也同样谈到了拒绝投降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塞满了监狱大墙内与死刑场上，高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从容就义。①

7月18日，赖斯从巴黎给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声明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并"参加第四国际"。他写道："国际社会主义对最近10年里的所有罪行进行大审判的那一天就要到了。什

① 《伊格纳茨·赖斯札记》，载《反对派通报》1937年12月第56－57期第12页。

么也不会遗漏,什么也不会宽恕。……'天才的领袖,人民之父,社会主义的太阳'必将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1928 年,我被授予'红星'勋章。如今我把这个勋章还给你。佩戴它……有损我的尊严。"①

6个星期以后,9月4日,在瑞士洛桑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发现了赖斯的尸体,一具弹痕累累的尸体。其实早在他将自己的辞职声明转交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助手之前,格别乌就已得悉他的决定了。他深知大清洗甚至在他的间谍部门的旧同事中间也都引起了憎恶,因此他指望说服一些人跟他走。为此,他打算在洛桑与一位派驻意大利的苏联间谍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Гертруда Шильдбах)会面,她是他长达20年之久的密友。她假装同情他,在第一次谈话后又在洛桑郊区设下另一次会面的诱饵。在那儿,格别乌已为他准备好了陷阱。

瑞士警察局与法国警察局很快查明了真相。在对被抛弃并溅满鲜血的汽车以及留在旅馆里的行李进行取证后,警察局确定了谋杀者的身份。他们是在巴黎的受苏联大使馆保护的"俄国移民遣返团"成员。

警察局宣称,杀害赖斯的匪帮早就在追踪着廖瓦了。驾驶那辆溅满鲜血的汽车的女人负有追踪他的使命。(他记得,此事发生的前一年,他到法国南方休养,她也跟随而至,并住进他所在的公寓,有时莫名其妙地硬要拉他去洗海水浴。)进一步调查表明,1937年1月,正是这个匪帮在瑞士边境不远处的牟卢兹为廖瓦设下了圈套,当时他正打算到那里去与瑞士一位律师商议进行反瑞士斯大林分子的调查事宜。廖瓦逃过了厄运:疾病阻止了行程。然而

① 赖斯:《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载《反对派通报》1937 年 9 - 10 月第 58 - 59 期。

在整个上半年，匪帮始终在追踪着他，而他也感到了这一点。7—8月，他确信对他的追踪几乎停止了，不由得十分惊奇。显然，匪帮此时正忙着赖斯的事儿。现在可以预料他们将卷土重来。①

当廖瓦从警察局获悉格别乌的间谍非常迅速和准确地完全掌握了他的所有计划与转移时，他极为惊诧。到底是谁？谁向格别乌通报了赖斯的动向？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琢磨：是不是廖瓦最亲密的朋友中出了奸细？而埃蒂安最有嫌疑（他曾短期在"俄国移民遣返团"工作过）。斯内夫利特对埃蒂安极不信任，因此赖斯第一次来找他时，他不肯为赖斯与巴黎的托洛茨基中心取得联系，认为那太危险。但是，廖瓦却不愿怀疑"优秀的和最可靠的同志"。②

怀着绳圈在脖子上勒紧的神秘感觉，廖瓦为《反对派通报》撰写了赖斯的悼词。③ "'人民之父'和他的叶若夫们很清楚，还有很多潜在的赖斯。……斯大林的计划正在破产。……没有人能用手枪阻止历史前进。斯大林主义注定要灭亡。它就在我们眼前腐朽着，瓦解着。把它那腐烂的尸体扔进历史阴沟里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④ 但是，赖斯的命运却吓住了那些可能有意仿效他的人。在随后几周里，仅有两人走上了他的道路——机要处另一位重要间谍瓦尔特·克利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Кривицкий）和苏联驻雅典临时代办亚历山大·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мин）。他们从来不是托洛

① 参见廖瓦1937年9月16日给科约阿坎的电报及10月4日和12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亦见马尔金（廖瓦的笔名）关于谋杀的叙述，发表于《反对派通报》第58－59期.

② 对上述所引廖瓦的信的补充，可见他1937年8月的信。

③ 《反对派通报》第58－59期第21－22页。

④ 廖瓦致托洛茨基，1937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致廖瓦，1938年1月2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茨基的拥护者,但与自己的政府决裂后,他们也在寻求与他的接触,因为按克利维茨基的说法,即使在负有反托洛茨基主义任务的格别乌合作者眼中,托洛茨基身上也“围绕着光环”。[①] 他们是奇怪的新人教者:克利维茨基担心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不信任他并因他为斯大林效忠多年而会歧视他。因此,他从与斯大林决裂的那一刻起就极力为自己的过去辩护。赖斯的未亡人指控他参与了旨在谋杀她丈夫的阴谋。他垂下头,承认自己并非无罪。[②] 为尽量替自己赎罪,他讲述了大清洗的真实情况。但涉及到苏联的军事安全时,他也尽量不暴露他所知晓的许多秘密。廖瓦怀着某种厌恶听着他那折磨人的坦白。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父亲转达信息,而对于任何与斯大林决裂的苏联公民都应同样给予帮助、安慰和尽可能的保护。托洛茨基从自己那一方面请求克利维茨基和巴尔明为了自身的安全与政治上的明朗而应毫不含糊地和公开地发表声明反对斯大林。他为他们的看风使舵而感到不安,廖瓦对他们的姑息态度也让他生气。这导致了父与子之间的又一轮争吵。[③]

同时,在廖瓦周围奸细的存在也引起了更大的猜忌与惊慌。克利维茨基进一步证实了赖斯关于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谋杀已迫在眉睫的警告,说格别乌在巴黎的托派总部有“耳目”。但他拿不准谁是奸细,只是怀疑维克多·塞尔日。克利维茨基说,格别乌绝不会释放塞尔日,也绝不会允许他离开苏联,倘若不是确信他可以充当反托洛茨基派的间谍的话。当然啦,谁来当这个角色都比塞

① 《反对派通报》,1937年12月第60-61期。

② 廖瓦致托洛茨基,1937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致廖瓦,1938年1月2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③ 参见托洛茨基:《惨痛的教训》,载《反对派通报》第58-59期;1937年11月16、19日与12月17日廖瓦的信。

尔日强。塞尔日曾是托洛茨基旧日的拥护者，一个才华横溢、宽宏大量、政治上笨拙的文学家。他最让人不齿的毛病就是喜欢说不着边际的废话——对于一个必须保守自己与格别乌的秘密的组织的成员来说，这是最严重的缺陷。不管怎样，当真正的间谍还继续得到和阅读托洛茨基的通信、得悉廖瓦的全部秘密并极尽狡诈之能事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名声和诽谤他人时，嫌疑不能不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是廖瓦本人身上。[①]

法国警察局在继续调查赖斯事件中发现，这个谋杀匪帮的一个成员已申请到了墨西哥签证，并准备了一套墨西哥城的详细地图。廖瓦立即向科约阿坎发出警告。警察局也认为廖瓦的生命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并给他指派了一个专门警卫。[②] 廖瓦的一位同志，几乎可以肯定是克莱门特（阿道夫），对廖瓦的不幸忧心如焚，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恳求他们让廖瓦立即离开法国到墨西哥去。他警告说：廖瓦病了，憔悴不堪，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仍固执地认为他在法国是“不可代替的”，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其实并非如此，同志们是可以代替他的，而若是他留在巴黎，则“完全无力”对抗格别乌。起码父母应该请他来墨西哥住一段时间，休息一下，治治病：“他有才能、勇敢、精力充沛，我们应该救他。”[③]

这种催人泪下的关怀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托洛茨基当然清楚廖瓦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他时常请求廖瓦要格外谨慎，避免与一些“可能受格别乌支配”的人接触，特别是思乡心切的俄国侨

---

① 作为对上述提到的廖瓦信件的补充，埃蒂安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证明了这一切详情。

② 廖瓦致托洛茨基，1937 年 11 月 1 日和 5 日。

③ 此信是用德文写的，日期标的是 1937 年 11 月 5 日，仅署了笔名 A.，显然表示阿道夫，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民。就在赖斯事件的前夜托洛茨基还写信说:“如果你我的生命被谋害了,人们当然会谴责斯大林,但对他来说什么也不会失去,起码在名誉上。”然而他却否定了让廖瓦到墨西哥来的想法。当廖瓦坚持他在巴黎是“不可代替的”,并保证出于安全考虑将隐姓埋名居住在那里时(正像托洛茨基本人住在巴比松时那样),托洛茨基回答说,廖瓦离开法国将一无所获:美国未必允许他入境,而他在墨西哥将会比在法国更不安全。他不愿让儿子关进科约阿坎的“准监狱”里。大概父与子之间的不睦使双方都不情愿面对共同生活的前景。托洛茨基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信是以干巴巴的寥寥数语结束的:“嗯,小伙子,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不多,但……是全部……你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的钱,现在你应该全部留给自己。你需要它们。拥抱你。你的老父。”[①] 这封信看起来有点儿像是公函,寄给派遣出去站在注定要牺牲的最前线的战士,而他却不能给予支援(而数月以后托洛茨基却怀着深切的悲哀回忆起它)。不过,托洛茨基认为廖瓦在墨西哥并不比在法国更安全,这种看法确有一定道理。格别乌的许多特务装成来自西班牙的难民,刚刚在墨西哥安顿下来。于是要求驱逐托洛茨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愈来越刺耳。就在年底,墨西哥城的墙上出现了许多招贴画,指责托洛茨基与反动将军们串通一气阴谋推翻卡德纳斯总统、在墨西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这种诬蔑运动很难说会导致什么结果。

这几个月来的阴霾到9月就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杜威的委员会结束了反审判调查,并公布了自己的裁决。委员会明确指出:“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无

---

① 1937年11月18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罪。”[1]托洛茨基高兴地迎接这个裁决。然而裁决的影响却很小，如果说不是无足重轻的话。杜威的声音在美国还能引起一定注意，但在欧洲却毫无反响，因为那里的舆论贯注于在慕尼黑协定前一年的各种危机事件、法国人民阵线与西班牙内战的成败之中了。托洛茨基又一次失望了，当刊有裁决报道的那期《通报》出版延期时，他极为光火，又为“这个罪过”与“政治上的盲目”训斥廖瓦。托洛茨基在1938年1月给廖瓦的信中说：“《通报》的状况完全不能让我满意，我要重新提出将它转移到纽约去的问题。”

而此时廖瓦的精力终于衰竭了。按塞尔日的说法，廖瓦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与对他的信念和自尊心的打击相比，他忍受贫困和个人失败要更容易些。我们再引用一次塞尔日的回忆：“我们不止一次在黎明前沿着蒙帕尔纳斯大街游荡，试图在莫斯科审判的错综复杂的迷宫里理清道路，我们时而停在这盏路灯下，时而停在另一盏下，感叹着：‘我们是在完全疯狂的迷宫里’。[2] 工作上劳累过度，没有钱，为父亲担忧，这就是廖瓦所生活于其中的迷宫。他像回声一样重复着父亲的论据、他的揭发以及他的期望。而每一次审判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震动。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最好的回忆是与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加米涅夫是他的姑夫，布哈林可以说是一个很合得来的玩伴儿，拉柯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及其他人则是年长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的革命功勋与英勇业绩曾使他激动。他深思着他们的败落，难以接受它。怎么可能把他们全都摧垮，强迫他们从泥泞与血泊中爬过呢？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从法庭上站起来拒绝供认并对那些捏造的可怕的指控迎头

---

① 《无罪！》(调查委员会关于莫斯科审判中对列夫·托洛茨基指控的调查报告)。另见1938年1月21日托洛茨基致廖瓦的信。

② V.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75页。

痛击呢?廖瓦徒然地期待着这种事的发生。当消息传来,列宁的遗孀也支持这些审判时,他震惊了,惊慌了。他再三说,希望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最终将背叛革命。但即使这种诠释也无法说明所有的血腥与残暴。是的,这是一个完全疯狂的迷宫。即使像父亲那样高瞻远瞩的天才是否能从中找到出路呢?

心痛、绝望、热病、失眠。由于不愿抛下自己的"岗位",他不管那一阵阵剧烈的发作,硬把阑尾炎手术搁到了一边。他吃得很少,心情烦躁,走路驼着背。但在2月初,他终于出版了那期刊有杜威委员会裁决报道的《反对派通报》,并高兴地通知了科约阿坎,同时附上了校样。他还讲了进一步的工作计划,但丝毫未提及自己的健康。这是父母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

2月8日他还在工作,但整天粒米未进,同埃蒂安在一块儿呆了很久。晚上,阑尾炎又一次发作,这是最凶猛的一次。他再也无法拖延手术了,就写了一封信,封好交给妻子,对她说,倘若他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就把信拆开来看。他又同埃蒂安谈话,不想见另外的人。两人一致同意,廖瓦不能去法国的医院,也不能用本名登记,否则格别乌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他必须住进有俄国移民医生工作的私人小诊所,自我介绍是马尔金先生,法国工程师,另外他只应讲法语。而且,不能让任何法国同志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拜访他。商议好后,埃蒂安就叫了救护车。[①]

一眼就能看出,这办法真是蠢透了。廖瓦根本不能指望俄国移民把他当成法国人。他极有可能在热病中或麻醉中说出母语。最最荒谬的是,在整个巴黎为他找到的竟然只是这样一家诊所,在其中工作的那些人正是赖斯被杀以后他应该把他们当做瘟疫一样

① 参见埃斯特林夫人、埃尔莎·赖斯夫人、让娜·马尔金夫人以及埃蒂安本人的证明,另见警察厅报告。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躲避的人。然而他却立即同意去那里治病，尽管他的妻子和埃蒂安把他领到诊所时他还没有说呓语，神智也清醒。显然，他对事物判断理解的能力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已经变得迟钝了。

当晚就对他施行了手术。随后的几天里，他看来恢复得又快又好。除了妻子，只有埃蒂安来探望他。这探望使廖瓦多少振作起来。他们谈论政治、组织工作，而他不断地恳求埃蒂安尽可能常来。有一些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想见他，埃蒂安故弄玄虚地告诉他们，这事不行，地址对他们保密，以防将廖瓦的行踪泄露给格别乌。当一位法国同志对这种过度警惕表示惊讶时，埃蒂安答应再同廖瓦谈谈，但任何人都不许接近病床。4 天过去了。接着，病人健康突然间急剧恶化。他疼痛难忍，神志不清。2 月 13 日夜，人们看见他身体半裸、满口呓语、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与病房。那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值班人员，也没有保护者。他的呓语是用俄语说的。第二天早晨，他的外科医师对病人的健康状况十分惊讶，以致问让娜，她的丈夫是否企图自杀，过去他是否有过自杀的意图？让娜对此加以否认，痛哭着说，肯定是格别乌给他下毒了。很快又给他做了一次手术，但却没有什么改善。病人在濒危中痛苦挣扎，为了挽救他，医生又试图给他输血，全都是白费事。1938 年 2 月 16 日，他死了，年仅 32 岁。

他是否如他的遗孀所说死于格别乌之手呢？许多间接证据表明，事情正是如此。在莫斯科审判中，他被认为是父亲最积极的助手，不仅如此，他还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头子。按赖斯与克利维茨基的说法，在莫斯科格别乌的总部里，人们常这样说：“小伙子干得不坏，要是没了他，老头子就难办了。”格别乌很想从托洛茨基身边夺去他的帮助，这特别符合斯大林的复仇心理。格别乌在他身边安插了最可靠的通风报信者和奸细，可以把廖瓦带到死亡等待他的地方。格别乌有一切理由相信，一旦廖瓦被消

灭,它的奸细就可以在托洛茨基组织的俄国"分部"里占据一个位置,与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接触。在这家诊所里,不仅医生和护士,甚至厨师和看门人都是俄国移民,有一些还是"遣返团"的人。格别乌要在他们中间物色一个给病人下毒的奸细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格别乌已经杀了那么多的人,难道还在乎多杀一个吗?

但也不能确凿无疑地说就是如此。按让娜要求进行的侦查未能证明任何罪行。警察局与医生们都特别否定了下毒或以其他方式对廖瓦生命的谋杀。他们将廖瓦的死因解释为术后并发症(肠梗阻)、心力衰竭和身体抵抗力的低下。一位著名的医生(托洛茨基的朋友)同意他们的诊断。但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媳也提出了一些很有道理的问题,它们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廖瓦真是偶然地落到这家诊所的吗?(托洛茨基不知道,埃蒂安在叫了救护车后就马上把一切通知了格别乌——这是他本人后来供认的。)诊所的头头断言,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真实姓名和他的国籍。然而证人们肯定说他们曾听到廖瓦用俄语说胡话甚至谈论政治。廖瓦的外科医师为什么要把他的身体状况恶化说成是自杀企图,而不是出于自然原因?据廖瓦的遗孀说,事件发生后,这位医师惊慌失措,沉默不语,并以保护职业秘密的权利来搪塞。让娜要求侦查者注意这类暧昧情况,但白费力气。托洛茨基指出,例行调查没有涉及格别乌"精心策划及秘密的"谋杀手段。法国警察局是否真像托洛茨基所猜测的那样为掩盖自己的无能而敷衍了事呢?还是法国人民阵线对警察局施加了政治压力,阻止深入的调查?家属除了要求新一轮的调查之外,别无良策。[①]

---

① 证词、目击者的叙述、医生的证明和托洛茨基的信件部分来自托洛茨基档案的保密部分,部分来自列夫·谢多夫的文件,它们是让娜·马尔金通过皮埃尔·弗兰克的热情协助转交给我的。

※　※　※　※　※

当廖瓦的死讯传到墨西哥时,托洛茨基不在科约阿坎。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维拉发现一些陌生人围着"蓝屋"游荡,在附近的一处观察哨向那里的居民打探情况。他警觉起来,建议托洛茨基避开几天——在里维拉的朋友、老革命家安东尼奥·希达尔戈(Antonio Hidalgo)的沙皮尔塔贝克花园里住上一段时间。2月16日,托洛茨基正在那儿写一篇文章《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晚上,报纸就报道了廖瓦的死讯。里维拉一得知此事就给巴黎打电话,希望证实这只是谣言,尔后又赶往沙皮尔塔贝克花园去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不肯相信发生的事,勃然大怒地指着门口叫里维拉出去,但随后就跟他回到了科约阿坎,将实情告诉娜塔利娅。她写道:"我正在整理孩子们旧时的画册和相片,门铃响了。当我看见列夫·达维多维奇时,我很惊讶。我上前迎接他,他进来时低垂着头,那样子我从来没见过,脸色灰暗,显得一下子老了许多。'出什么事儿了?'我担心地问,'你病了?'他低声回答:'廖瓦出事了,我们亲爱的廖瓦……'。"[1]

一连几天,他和娜塔利娅关在他的房间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他们不能接见秘书,不能会见朋友,不能答谢吊唁。"没有人跟他们说一句话,大家都明白他们的悲痛实在太深重了。"过了8天,托洛茨基才从房间里出来,他的两眼肿胀,胡子长长的,连声音都不像是他自己的。过了几个星期,他给让娜写信说:"娜塔利娅……还不能给你回信。她一遍遍读你的来信,痛哭不止。我放下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父与子》,载《第四国际》(1941年8月);《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

工作的时候也同她一起哭。"① 在分担她的悲哀时,他为这最后的一年里他泼向廖瓦的尖刻责骂并让他留在巴黎而感到悔恨。他已是第三次哀悼自己的孩子了,而悔恨每一次都在增长。1928年尼娜死后,他责备自己不曾好好地安慰过她、甚至最后几周都没给她写信。季娜同父亲疏远并自杀了。而现在,廖瓦又因为父亲要求他坚守在岗位上而迎来了自己的厄运。没有一个孩子能像廖瓦那样分担他的生活与斗争。再没有别的损失能唤起他如此的痛惜了。

在哀悼的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为廖瓦写下了悼文,这是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挽歌。"此刻,就在我写下这些句子,而列夫·谢多夫的母亲坐在我身旁时,表示同情的电报从各个国家飞来……我们仍不能相信这是事实。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可靠的、忠诚的、可爱的儿子。而首先是因为,这世上再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融进我们的生活里了,根连着根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是我们的同志、同伴、卫士、顾问、朋友。"

> 那老一代人,上一世纪末我们就是站在他们的队列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今他们都被从舞台上铲除净尽了。沙皇的苦役、监狱、严酷的流放、流亡岁月的贫困、国内战争与疾病这一切所做不到的,斯大林在这些年里都做到了,他是对付革命的最凶恶的一条鞭子。……第二代人,即被1917年所唤醒、由革命阵线的24个军哺育成长的一代人,其精华也被消灭了。年轻一代,即廖瓦的同龄人,……其精华也被无声无息地踏碎了。……在我们流亡的最近几年,我们结识了无数新朋友,有一些与我们的

① 托洛茨基致让娜·马尔金,1938年3月10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家庭生活如此亲近，仿佛已成为它的成员。但他们全都是在最近几年才与我们相遇的，而我们已接近老年了。唯有廖瓦是我们还年轻时就了解我们的，并且从他懂事的时候就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他还年轻，却已像我们的同龄人……。[①]

托洛茨基扼要而温情地回忆了廖瓦短暂的一生，如他童年时怎样同父亲的狱卒打架，怎样到狱中送信件、食物和书籍，怎样与革命水兵交朋友，怎样藏在苏维埃政府会议大厅的板凳下，想看看"列宁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他描绘了一位青年的肖像，在国内战争的"伟大的饥饿的年代"里，这位青年有时把新鲜面包放在破外衣的袖子里带回家，这是面包作坊里的工人给他的，他当时作为政治宣传员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他藐视官僚特权，拒绝坐父亲的汽车，并离开父母在克里姆林宫的家，住进无产阶级学生的普通宿舍，他还同志愿者一道在莫斯科大街上扫雪，到铁路上卸粮食与木材，修理机车和"扫除"文盲。托洛茨基回忆起这位年轻的反对派成员"毫不犹豫"地抛妻离子，跟随父母一道流放到阿拉木图。在那儿，他们生活在格别乌的包围之中。他担负起父亲同外界联络的任务，经常夜里冒着雨或暴风雪出去与革命同志接头，有时在城外树林里，有时在集市上，有时在图书馆里，有时甚至在公共澡堂里。"每一次他都是激动而喜悦地回来，眼睛里燃烧着英勇的火焰，外套下藏着无比珍贵的战利品。""他很善于交际，——他认识的反对派人士比我多得多。……他的革命本能使他能丝毫不爽地辨别出冒牌货。他的母亲眼里闪烁着骄傲，她比我更了解他。"

父亲的悔恨之情此刻得到了宣泄。他忆起自己对廖瓦的苛

① 《列夫·谢多夫——儿子、朋友、战士》，载《反对派通报》1938年3月第64期。

求,歉疚地将它们解释为自己"书呆子式的工作嗜好"、对愈亲近者愈严格要求的习惯。对他来说,有谁能比廖瓦更为亲近呢? 可以说,"我们的关系是显得有一些严肃与疏远。但在外部的硬壳下面……活跃的却是深深的、热烈的相互依赖,它源自某种远远超出血缘关系的东西,源自共同的观点、共同的爱憎、共同的喜悦与痛苦、共同怀着的伟大期望。"某些人将廖瓦仅仅看做是"伟大父亲的小儿子"。但他们错了,正像那些长期这样看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人一样。只是环境使廖瓦没能充分成材。接下来,对廖瓦在父亲的文字工作中所占的地位,托洛茨基的评价也许是过于慷慨了:"为公平起见,几乎所有我在1929年以后写的书,在我的名字后面都应该出现他的名字。"在挪威被羁押的日子里,父母是怀着怎样的欣慰和喜悦收到廖瓦的一本"红皮书"啊,它"首次对克里姆林宫的诽谤给予了致命的回击"。格别乌的人真是说对了,"要是没了小伙子,老头子就难办了"——现在的确难办了!

他又历数了这个"多情善感的"人不得不承受的那些考验:汹涌如潮的谎言与诽谤,旧日朋友及同志一批批地脱逃与变节,季娜的自杀,最后,还有"深深震撼了他的精神机体的大审判"。不管廖瓦死因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死于这些考验的摧残,还是格别乌对他下了毒,反正"他们(及他们的主子)要为他的死承担罪责"。

这首悲切的挽歌在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头的音调:

> 这个世界上与他最亲近的母亲,还有我,当我们忍受着这痛苦时刻的煎熬的时候,我们面前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们不肯相信他已永远地走了,但又因不能不相信而哭泣,……他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年轻的那部分……我们身上所剩的年轻部分,也随着我们的骨肉一起逝去了。……你的母亲和我从来也没有想

到，也没有料到，命运竟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必须为你写悼词。……而我们没能保护你。

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与此同时谢尔盖也毁灭了，尽管关于这事始终没有任何正式的报导，甚至在25年以后的今天仍是如此。不过有一位政治犯在1937年初与谢尔盖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同囚一室，从他那儿我们知道了下面的故事。[①] 1936年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格别乌向谢尔盖施加压力，要他公开宣布与父亲及父亲所主张的一切脱离关系。谢尔盖拒绝了，于是被判关人集中营劳改5年，发配到沃尔库塔。到年底，许多集中营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集中到了这里。在铁蒺藜后面，谢尔盖首次与他们有了密切接触，尽管直到此时他仍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却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谢谈到父亲的追随者们，特别是那些拒绝投降、差不多已被关了10年之久的人。他参加了他们发起并坚持了3个多月的绝食，几乎饿死。

1937年初，他又被送回莫斯科接受新的审问（正是在这时，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那位政治犯遇到了他）。他不指望获释或者任何援助，他确信他与父亲所有的拥护者一样，都难逃灭顶之灾。但是他从自己精神与道德的源泉汲取力量，保持着坚忍不拔的冷静。“当我们议论格别乌的各种审问手段时，他认为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理应能抗得住它们；他指出，自从巴尔扎克精确描述了这一切阴谋与手段后，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们几乎没什么改变。……他平静地面对未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作任何对他本

---

① 约瑟夫·伯杰先生曾帮助创立巴勒斯坦共产党，并在共产国际的中东分部服务，后在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25年。他于1956年获释并得到平反。他讲述了谢尔盖在狱中的表现。

人或者对其他人会招致最微小指控的声明。"他显然是至死不渝,因为,只要格别乌能从他那儿挖出任何供认,他们一定会向全世界散布的。他猜测他的父母会担心他们的"不问政治"的儿子可能缺乏必要的坚定信念与勇气来承受自己的命运,而"他最遗憾的是,永远没有人去告诉他们(特别是母亲)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不相信他被捕后遇到的人能活下来并讲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作者很快就与谢尔盖分手,不过却从别的囚犯那儿听到他被处决的消息。过了很久,1939 年,通过一位美国记者转送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里肯定地说谢尔盖直到 1938 年底还活着,但这封信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①]

※ ※ ※ ※ ※

托洛茨基的后代中,那时唯有季娜的儿子谢瓦仍然活着,住在苏联境外,已经 12 岁了。而对托洛茨基其他孙(外孙)子女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谢瓦是由廖瓦和让娜抚养大的,让娜自己没有孩子,当了他的母亲后,对他爱得刻骨铭心。廖瓦死后,托洛茨基在他第一封信里请她带着孩子到墨西哥来。他写道:"我很爱你,让娜,而对于娜塔利娅来说,你不仅仅是……也是她亲爱的女儿,她是如此强烈地爱着你,也只有娜塔利娅才能这样去爱。你还是廖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宝贵最亲近的那部分。"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让她和谢瓦到墨西哥来跟他们住在一块儿。要是让娜不愿意,那么至少要带他来看望他们。"如果你觉得现在已很难与谢瓦分开,我们也理解你的感情。"[②]

---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托洛茨基致让娜,1938 年 3 月 10 日;同上。

然而,一个凄凉的故事在这里却变成了一场闹剧,与巴黎的托洛茨基宗派的勾心斗角纠缠在一起。廖瓦与让娜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他属于"正统托洛茨基派",而她则属于莫利尼耶派。廖瓦作为遗嘱留下的那封信很能说明他的分寸与尊严。廖瓦写道:尽管观点不同,还可以说,尽管家庭生活不幸福,他仍然十分尊重让娜,并无限信赖她。然而宗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都不肯放过死者;它围绕着幼小的孤儿展开。托洛茨基本人也被卷进了尴尬的漩涡里。[1] 让娜正在为争取重新调查廖瓦案件作绝望的努力,因此委托一位属于莫利尼耶派的律师在法国法庭与警察局面前全权代表家属利益。"正统托洛茨基派"(以及托洛茨基的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否定让娜有这样做的权利,声称只有廖瓦的父母才有权以家属的名义发言。主权之争只让警察局和法庭更乐得撒手不管重新调查的事。[2]

另外的纷争起于托洛茨基档案。廖瓦死后,它们在让娜手上,也间接落入莫利尼耶派之手。托洛茨基要求通过他的一位"正统派"法国拥护者把档案归还给他。让娜拒绝交出档案。她与廖瓦父母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甚至达到了敌对的地步。托洛茨基最终还是取得了档案,然而为此他不得不专程派自己的一位美国拥护者到法国去。尽管第二次请求让娜,她仍拒绝来墨西哥,也不肯把孩子送过来。她本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赶上此刻心绪不佳,连跟孩子分离一刻也不干。敌对双方为此而大闹了一场。托洛茨基倒是想与儿媳和解,然而这些小宗派使各种和解的意图都化为泡影。托洛茨基决定诉诸法律,可能是出于下述原因:在失去所有的孩子以后,托洛茨基千方百计想留住外孙,唯一能在自己身边的

---

① 托洛茨基致罗斯默、让娜、劳斯和卡米尔(克莱门特),3月12日。

② 托洛茨基与热·罗森塔尔的通信,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外孙;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把孤儿留给——正像他自己所说——“神志不清的和喜怒无常的头脑”照管;或者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随之而来的是拖了一年的诉讼,使报纸和宗派小报有了耸人听闻的谈资。[①] 在对失去孩子的恐惧中,让娜试图否定托洛茨基的法律效力,断言他的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婚姻都是不合法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去证明并非如此。在写给法庭的信中,即使是回敬这类攻讦,托洛茨基也仍然对让娜的激动情绪表示理解,承认她对孩子道义上而非法律上的权利,再次邀请她来墨西哥并表示愿意提供旅费。他甚至声明,他愿意考虑把谢瓦送回给让娜,然而得先见到孩子。[②] 法庭两次作出有利于托洛茨基的判决,并指定了几位监护人,以担保孤儿回到姥爷身边。然而让娜拒绝履行法庭判决,带着孩子离开巴黎,把他藏了起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与在孚日省的“冬季探险”,玛格丽特·罗斯默才算找到了孩子的藏匿地点,把他从托洛茨基的儿媳手中夺了过来。但事情还没算完,让娜的朋友又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偷回去。直到1939年10月,罗斯默夫妇才终于把谢瓦带到了科约阿坎。

托洛茨基在一封哀婉的信中向谢瓦解释为什么坚持要他来墨西哥。为了避免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伤及让娜,他不能向孩子透露真实原因。结果使解释显得牵强附会:

---

① 托洛茨基致罗斯默,1938年,9月19日;托洛茨基致热·罗森塔尔,1938年10月27日;罗森塔尔致托洛茨基,1938年10月7日。除了其他报纸,1939年3月26日的《巴黎晚报》报道了此事,1939年4月的第4期莫利尼耶派机关报《真理报》还就此事增加了一个附刊,标题冠以《不择手段》,介绍让娜的诉讼案,攻击托洛茨基对孩子监护权的要求。

② 参见托洛茨基给法定监护人M.阿梅尔的声明,1939年2月7日;法庭审理案件的总结,法律文件,托洛茨基与他的秘书、律师的通信,特别是1939年3月22、27、29日与4月17、29日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另见1939年5月26日托洛茨基给罗斯默的信。

我的孩子谢瓦……廖瓦舅舅不在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应该在一起，我亲爱的孩子。我不知你爸爸在哪里、他是否还活着。大约在4年前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很关心地问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俄语。你爸爸是个很聪明、很有教养的人，但他却不会说外国话。倘若有一天他又见到了你，却不能跟你说话，那对他将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说到你姐姐也一样。你想，要是见面时你不能同自己的小姐姐说本国话，那该多糟糕。……你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因此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对于你妈妈和爸爸、对于你舅舅廖瓦、对于我和娜塔利娅曾经并一直是共同的那些思想。我很想跟你解释这些思想与目标的巨大价值，为了它们，我们全家……曾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现在还在受苦。我要为你，我的外孙，负全部责任。在自己面前，在你的父亲面前，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在你的面前。

在这封给孩子的信里，最后作为结论的那些话听起来是那样不适宜和生硬："因此，我的关于让你到这里来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1]

※　※　※　※　※

同时，格别乌仍在继续编织着阴谋。埃蒂安毫不费力就占据了廖瓦在巴黎托派组织中的地位。现在他负责出版《反对派通

① 此信注的日期是1938年9月19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报》,成了托洛茨基在欧洲最重要的代表并放手与那些从斯大林恐怖下逃出来、试图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的新人接触。该组织的"俄国支部"在巴黎统共只有3至4个成员,他们谁都不太了解俄国事务,也不像埃蒂安那样受过教育、勤奋工作。托洛茨基从廖瓦的信中知道,廖瓦认为他是最亲密、最可靠的朋友,而奸细也竭力促成这种印象。利用托洛茨基的悲哀和多疑,他千方百计煽动托洛茨基怀疑那些挡在他——埃蒂安——道路面前的人。廖瓦死后第一个星期,他以适宜的愤懑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斯内夫利特在散布"诽谤性流言"——廖瓦对赖斯之死有责任,又仿佛偶然地提醒托洛茨基记起廖瓦对他的充分信任,因为他始终拿着廖瓦信箱的钥匙,并领取廖瓦的全部信件。[①] 托洛茨基本来就与斯内夫利特有政治歧见,于是在回信中向"诽谤者"发泄了勃然怒火。[②] 当然啦,奸细是正统托洛茨基派中的榜样,从来不拂逆"老头子"的意见,但也从来不让人觉得像是下三滥的马屁精。他处处有分寸地证明自己的忠诚,他无微不至地探询"老头子"的健康起居,但又不向托洛茨基本人,而是向他的一个秘书提出这些问题。与托洛茨基会面时,他就讨论政治问题与《反对派通报》的内容,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相比,现在《通报》的出版愈加正常了。他请托洛茨基写一篇纪念赖斯的文章,说等着在赖斯的去世纪念日时发表。他密切关注着这一期纪念廖瓦逝世周年的《通报》,要求充分说明廖瓦的功绩。他通知托洛茨基,在《通报》上将刊登一篇文章——《托洛茨基的生命在危险中》,其中将揭露格别乌间谍在墨西哥的活动。他从旧俄

① 埃蒂安与托洛茨基通信时,有时署的是本名,有时署的是国际书记处,而有时又代表《反对派通报》编辑部。例如可参见国际书记处致托洛茨基的信(署名是埃蒂安与保尔森),1938年2月22日。

② 托洛茨基致国际书记处,1938年3月1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报纸合订本上及其他出版物上搞来各种资料提供给托洛茨基，它们都是很难搞到，而又是托洛茨基写《斯大林》这本书需要的。总之一句话，他使自己几乎成为不可代替的人，正像廖瓦那样。同时，对各宗派之间的内讧以及托洛茨基与让娜的龃龉，他又经常火上浇油，以至托洛茨基拒绝支持让娜对廖瓦之死重新进行正式调查的要求。埃蒂安自己也尽一切可能去阻挠调查：他向警察局自我标榜是"列夫·谢多夫最亲密的朋友"，同时却否定一切关于阴谋诡计的想法，宣称廖瓦的死因就是机体抵抗力的衰竭。[①]

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活动中，奸细也同样处于中心地位。在筹备活动最紧张忙碌的关头，1938 年 7 月 13 日，曾是托洛茨基在巴比松的书记，拟议中的未来国际的秘书，德国移民鲁道夫·克莱门特从自己的巴黎寓所里神秘地失踪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托洛茨基收到一封信，好像是克莱门特写的，署的他的名字，但发信地点却是纽约。信中揭露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的联盟、与盖世太保的合作等等。信的作者重弹斯大林派惯常指控的滥调后，宣布与托洛茨基决裂（一些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收到了从佩皮尼昂寄来的此信复印件）。信中有如此大量的克莱门特绝不至于犯的谬误和错误，所以托洛茨基立即断定，此信显然是伪造的，或者克莱门特是在格别乌枪口下根据口授写下的。"倘若克莱门特还活着，但愿他能挺身出来，向法庭、警察局或任何公正的委员会公布他所知道的一切。不过可以预言，格别乌永远

① 引自埃蒂安在警察局侦查期间的证词；1938 年 7 月 6 日他给托洛茨基的信，及托洛茨基致"洛拉与埃蒂安同志"，1939 年 2 月 17 日；托洛茨基的秘书范·海耶努尔特在 1938 年 4 月 29 日给纳维尔的信里说："我收到不少法国朋友的来信（作者注：部分来自埃蒂安），探询'老头子'的健康情况。"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另见：《反对派通报》1938 年第 66－67、68－69 期和 70 期；1939 年第 74 期。

也不会让他脱出自己的掌心。”[1]没多久,克莱门特的尸体就被塞纳河的浪头冲上岸来,但已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显然,杀害赖斯的匪帮又杀死了他,然后一个凶手冒用克莱门特的名字,作为“幻灭的追随者”与托洛茨基决裂。两年以后,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又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格别乌为什么要选中克莱门特?他的能力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并不突出,但他却是一个谦逊的忘我的工作者,总是眼睛睁得大大地关注着组织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猜想,正是他促使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叫廖瓦离开法国的。是不是他发现了格别乌的什么重要秘密?或者他嗅到了奸细的味道并打算揭露他?托洛茨基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格别乌为什么要杀死他,而且手段又如此残忍。

此时,斯内夫利特已经确信不疑埃蒂安就是奸细;而且他与塞尔日公开表示了这一点。厚颜无耻的奸细居然向托洛茨基请教,他该怎样对待这些指控。托洛茨基回答,他应该要求自己的指控者在权威的委员会面前陈述罪证:“埃蒂安同志应该走这一步,愈早、愈坚决、愈果断愈好。”托洛茨基不可能提出其他建议。在这类场合,作为惯例与义务,遭受怀疑的人应该要求进行调查,保全自己名誉的清白。但托洛茨基本人并不相信这个指控。[2]

还有一件更怪的事:就在当月,托洛茨基接到了另一个警告。它来自一位叛逃到美国去的原格别乌高层军官。警告人对格别乌恐惧至极,不肯说出他是谁。他装成一位俄国出生的美国犹太老

---

① 《反对派通报》1938年第68-69期.

② 托洛茨基致埃蒂安,1938年12月2日。信在形式上是寄给《反对派通讯》编辑部的,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在提到斯内夫利特的指控时,托洛茨基在“指控”一词上加了引号。

头儿把自己的一个亲戚、逃到日本的前格别乌军官的一封信转交给托洛茨基。他告诫托洛茨基警惕在巴黎一个叫做“马克”的奸细。虽然不知道“马克”的姓，报信人却对埃蒂安作出了详细和准确的描绘，以及他的历史和他与廖瓦的关系，因此托洛茨基能清楚地知道他说的是谁。对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轻信与麻痹，报信人深感吃惊，因为甚至那样的事情都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即“马克”曾在臭名昭著的“俄国移民遣返团”里工作过（他说此事无人不晓）；报信人向托洛茨基担保，倘若对奸细进行跟踪，肯定能发现此人仍在与苏联大使馆的官方人士秘密接头。至于“马克”在廖瓦之死上是否有罪，报信人不知道，不过他担心，对托洛茨基的谋杀“现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或者由“马克”执行，或者由某个具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身份的西班牙人执行。这个警告十分惊人。报信人告诫说：“列夫·达维多维奇，主要的是您一定要警惕，不要相信奸细派来的或介绍的任何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①

托洛茨基对警告并非全不在意。他在托派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请报信人与他在纽约的拥护者联系。报信人害怕暴露身份，想在纽约与托洛茨基通过电话交谈，但未能与他联系上。不见报信人的反应，加上奇怪的警告方式，托洛茨基不禁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不过在科约阿坎还是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审理问题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发现对埃蒂安的指控没有根据。托洛茨基产生疑虑，这个指控是不是格别乌旨在清君侧的一个花招，目标针对他所

① 50年代初，我的妻子和我在托洛茨基的文件里发现了这封信，并把它整个重抄下来（档案公开部分）。后来，原格别乌的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承认他就是该信的作者。（参见他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关于苏联在美活动范围的听证会上的证词第51部分第3423－3429页。）关于奥尔洛夫在格别乌特别是在西班牙大清洗期间的作用，参见杰塞·埃尔南迪斯：《大叛变》；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录》。

有助手中最有效率、最忠诚的人,他能用俄语交谈、写作,精通苏联事务,为他出版《反对派通报》。不管怎样,在巴黎的托派的小圈子里本来就已经散布着太多的指控,若对它们都认真对待,那对奸细的追查将会没完没了。托洛茨基很清楚在任何组织中出现囮鸽都是灾难;然而他也很清楚频仍的猜疑追踪会更糟。他决定,任何指控,只要不是明确提出来并证据确凿,均不予注意。他宁愿冒极大的风险,置自己于险恶的地位,也不肯让猜忌与恐惧涣散自己队伍的军心。因此,奸细在巴黎继续作为他信赖的人,一直活动到战争爆发。①

※　　※　　※　　※　　※

廖瓦死后两个星期,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亚戈达也坐上了莫斯科的被告席。可以认为,在前两次审判中导演已将其惊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点,但与此次的新幻术相比,以前的审判至多只是适度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已。检察官与被告又一次将托洛茨基作为阴谋领导者加以猛烈攻击,但这次阴谋却包括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布哈林分子。与以前的起诉相比,廖瓦作为父亲同案犯所起的作用被强调得更突出了。克列斯廷斯

① 莉莉娅·达林小姐(30年代末在巴黎的国际书记处俄国分部的"洛拉同志")在美国作证说,1939年夏她去科约阿坎时,托洛茨基向她出示了反对埃蒂安的警告信。"我觉得多少有点儿不自在,因为内容很让人不舒服。……我说:'这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肮脏勾当,它就是想撵走您身边本来就不多的追随者……'(托洛茨基)有一封来自另一位匿名报信人的信,信上说有一个女人,就是我,要到他那儿去毒杀他。因此我们两人认定……信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伪造的。……(回到巴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此事告诉了埃蒂安。……我信任他。"埃蒂安听后"爆发出一阵大笑"。伊萨克·堂·列文:《一个刺客的内心》第60页。

基起初企图否定对他的指控，但经过软弱的尝试之后，他到底供认说，他曾在柏林及其他欧洲疗养地不止一次与托洛茨基秘密谈话，与廖瓦私下会面；他为廖瓦与帝国首脑冯·塞克特（von Seeckt）将军牵线搭桥，建立联系，支付了200万金马克（约100万美元）及其他不同数额的货币作为阴谋的财政支持。托洛茨基与被告们现在不仅被描绘成希特勒和天皇的间谍，而且也被描绘成英国军事奸细，以及波兰“二局”的奸细。在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之上，如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制造铁路灾难，矿井爆炸，大规模工人中毒等等，又加上了杀害高尔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甚至斯维尔德洛夫（死于1919年）的故事——这一切都归罪于托洛茨基。随着每一次的供认，阴谋不仅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回溯得愈远——达到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初期，甚至更早的年代。一度曾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的卡姆科夫（Камков）与卡列林（Карелин）也仿佛鬼魅一般出现在审判大厅里。他们作证说，在1918年，他们举行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曾与布哈林达成秘密协议，意图杀害列宁。亚戈达曾领导对托派成员的调查达10年之久，把他们大批流放，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刑讯逼供，以及着手准备对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审判，而现在他供认说，在整个这段期间，他仅仅是托洛茨基手中的工具而已。除了旧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部长与大使之外，在被告席上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年过7旬的列文（Левин）大夫，革命后列宁与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的罪状是根据亚戈达的指示投毒谋害高尔基与古比雪夫。在数次开庭的漫长时间里，医生们叙述着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墙内如何下毒，详细描绘着自己那令人发指的勾当。[1]

托洛茨基将此次审判比做拉斯普京（Распутин）事件，因为在

[1] 《托洛茨基反苏右倾集团案审判报告》

这次审判中散发出“专制独裁特有的腐败与恶臭”。[①]大概没有比这句话更能清楚地表明这出闹剧是怎样激动他的思维的了。当然,与这些审判相比,拉斯普京事件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几乎不值一提。只是审判未必会加速斯大林的毁灭,尽管关于他的回忆将充满耻辱。但是托洛茨基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先例与之对照了,因为它们不存在。斯大林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历史经验与各种想象力。他将恐怖提升到一个新的规模,并赋予它新的尺度。看看这些审判过程,对它们的任何理性反应都愈来愈无能为力了。托洛茨基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的荒谬性,精确地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无论是他,还是廖瓦,都不可能在审判中提到的地点与时间与被告中的任何一位搞阴谋活动,更遑论冯·塞克特将军了。

(他评论道:)在这种罪恶活动中,首相、部长、元帅与大使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一个人。不是服从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服从一个流放犯。托洛茨基只要使使眼色,革命老战士就变成了希特勒和天皇的间谍。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并经过塔斯社的资深记者传达,工业、运输与农业经济的领导就去破坏国家生产力及其文化。根据“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下达的命令,远东铁路工人就去使军用列车出轨,德高望重的医生们就去毒杀自己的克里姆林宫里的患者。这是维辛斯基画出的……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但这样一来就很难自圆其说了。集权制度是机关的专政(即党与国家机关)。若是机关的每一个枢纽都由我的下属所占据着,那么为什么此刻斯大林

① 拉斯普京,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1872-1848)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的宠臣,出身于托博尔斯克省的农民,被暴民打死。——译注

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而我却被驱逐了呢？

托洛茨基同样将审判后果与国际形势联系了起来：希特勒军队刚刚胜利地开进奥地利，并且准备进一步的征服。

难道斯大林还能躲在幕后窃笑吗？难道这个出乎意料的事变没有震动他吗？不错，他被一堵不学无术和奴颜婢骨的厚墙与世界隔绝开了。不错，他习惯于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里，而格别乌对于他才是一切。但是他却应该看到各种威胁的迫近与日益增长的征兆。全世界工人群众都忧心忡忡。……法西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并在斯大林主义这儿……找到了主要帮助。致命的战争威胁已在敲着苏联的大门了，而斯大林却选了这个时刻糟蹋军队、蹂躏国家。……但甚至这个第比利斯的僭主……也很难笑得出来了。巨大的仇恨正滋生在他周围，可怕的怒火已凝聚在他头顶。

完全可能，这种灭绝……国家优秀人材的制度，最终会激起真正的恐怖反对派。倘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规律，……然而，基于绝望的恐怖主义与复仇是与第四国际的拥护者不相容的。……个人报复……对于我们来说是太渺小了。杀死一个该隐－朱加施维里，国际工人阶级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任何一个新官僚主义‘天才’就能轻而易举地取代他。如果说我们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命运多少有点儿兴趣，那也只是希望他能活着看见自己的独裁完蛋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托洛茨基预言"另一次真正的审判",届时工人阶级将审判斯大林及其同伙。"在人类语言中找不到任何词汇在末日审判的时刻能帮助历史上最邪恶的该隐。他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必将倾塌,或者被陈列在恐怖集权主义者博物馆里。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将重新审理这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审判,并将在解放了的苏联的广场上为卑劣无耻的斯大林制度所造成的不幸牺牲者们树立丰碑。"①

应该说: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只是拖了许多年。不过,按其幅度及张力来说,大清洗类似于人类无力对抗的巨大的自然灾变。恐怖摧毁了理智,压垮了意志,粉碎了各种反抗。而托洛茨基所说的仇恨与愤怒虽然存在,却被驱向内部,蓄积以待未来。在当时及斯大林时代的余年它们还无法找到出路。在所有那些人——首先是托洛茨基派成员——身上,类似的情感是与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思想并能够提出行动的纲领,但都被有步骤地、无情地消灭了。

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派成员在监狱的铁栅栏和铁丝网后面已关了10多年了,使他们遭受着非人的刑讯逼供,摧垮了其中不少人的士气,分裂他们并几乎成功地把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看起来,从1934年起,托洛茨基主义差不多完全被肃清了。然而,过了2至3年,斯大林却从未这样强烈地害怕它。随着基洛夫被害而来的反常的大清洗与大规模流放赋予了托洛茨基主义以新的生命。当在他们周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新流放犯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再也不是孤立的了。大批变节者重又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这些人悲伤地想,要是他们一直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站在一起,也许就不至于有今天了。年轻一代反对派——在托洛茨基主义被摧毁很久后

① 《反对派通报》1938年第65期。

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各种色彩与倾向的“异端分子”、由于破坏劳动纪律的琐故而遭流放的普通工人、心怀不满与发牢骚者，他们仅仅是在铁丝网后面才开始其政治思考的，所有这些人为托派老战士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新讲坛。[①] 集中营里的管理愈来愈严酷了。囚犯们像奴隶一样必须每天劳动10—12小时。他们死于饥饿、疾病以及难以形容的肮脏。但是集中营仍然成为反对派的学校，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是其中的教师。几乎在所有罢工和绝食行动中，都是他们在领导流放犯向当局提出各种改善集中营条件的要求，并常常以自己英勇的挑战行为鼓舞其他人的反抗。他们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政治成熟，是一批被投入铁丝网中的真正的民族精英。

斯大林明白，进一步镇压再也捞不到什么了。拷打与迫害早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而它们只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加上一道殉难者的光环。只要他们活着，对他就是威胁。随着战争的危险愈益迫近，这种潜在的威胁也愈益现实了。我们已经看到，自从斯大林攫取政权的那一刻起，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获得它。现在，他决定摆脱这种必要性。他开始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权力。唯一的手段就是彻底消灭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为这个计划铺路，而计划的主要部分从此以后不会是在审判大厅里而是将在东方与北极的刑讯室和集中营里完

① M.芬索德：《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该作者引证格别乌文件，其中提到，在1936－1937年大清洗高潮中，当工人被问到他们认为谁是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时，他们回答：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在为纪念基洛夫而举行的会议上，学生们提议把托洛茨基包括进名誉主席团（第302页及同书各处）。托洛茨基主义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不特别流行，在其他地方，类似情形更为频繁。所有罪犯，甚至常常是孩子，都是作为“托派分子”被流放的。参见该书中对斯摩棱斯克地区宣判托派成员闹剧的描写，第232－237页。

成。

※ ※ ※ ※ ※

一位曾是沃尔库塔大集中营的囚犯的目击者本人并不是托洛茨基派成员,但他在描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最后活动与毁灭[①]时这样说,仅他所在的这个集中营里就关押着近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他们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其中大约500名在沃尔库塔的矿井里干活儿。在伯朝拉的所有集中营里有好几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是"1927年被流放至此的","始终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领袖"。作者也许把旧日的变节者也算进"正统托洛茨基派成员"中了,否则对他们人数的估计就太夸张了。他继续写道:"在沃尔库塔各集中营里,除了这些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外,同时还有10多万囚犯,他们在党内或在团内的时候曾加入过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因为不同的原因,被迫'悔悟并承认自己的错误',离开了反对派队伍。"不少从未入过党的流放犯也认为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正如目击者本人所指出的,在上述人数里,还得算进各种倾向的反对派,甚至包括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拥护者以及年轻的及最年轻的一群新手。

他指出:"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列·达·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是人数最多的一派。"在他们的领导者中,他记得有斯·维·柯秀尔、波兹南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及其他久经考验的真正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他们在1936年来到煤矿,并被安置在……两个大棚子里。他们断然拒绝下矿井干活,只在地面干,而且一天不超过8

① 这份报告《沃尔库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署名为M.B.,发表于孟什维克派侨民的《社会主义通报》1961年第10-11期。

小时，而不像制度规定和同一集中营的其他囚犯那样须每天劳动10或12小时。他们挑战性地、有组织地蔑视内部规章制度。他们大多数被隔离了差不多10年之久，先是在监狱里，然后是在索洛维茨基群岛集中营，最后是在沃尔库塔。在政治犯中，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唯一敢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总路线'并公开而有组织地反抗狱方的群体。"正如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做的那样，他们一如既往地声明：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同时努力推翻斯大林的统治。甚至"极左派"，比如萨普龙诺夫的拥护者，也采取了这种立场，尽管有所保留。

1936年秋，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审判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集中营里举行了集会和示威，以纪念被处决的同志和领袖。很快，10月27日他们开始了绝食。据我们上面所讲的故事，这正是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所参加的那次绝食。伯朝拉所有集中营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参加了这次持续了132天的绝食。他们抗议把他们迁出以前的囚禁地以及未经公开审判的处罚。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所有的囚犯领取同等食品（不管他们是否完成生产定额），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将残疾人、妇女、老人从极地转移至气候较温暖的地区。绝食的决定在公开集会上被采纳了。有病的及年老的囚犯可以不参加，但是"后者坚决不肯被排除在外"。几乎每个工棚里的非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起来响应号召，但"只有在清一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棚里，罢工才是全体一致的"。

当局害怕这次行动扩散，就将托洛茨基派成员转移到离营地40公里之外的半倾塌的废弃工棚里。1000名囚犯中死了几个人，然而只有两个人投降。这两个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37年，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当局在所有条件上让了步，绝食停止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直到叶若夫的恐怖达到其顶点之前，托洛茨基派成

员们享受着他们争取到的权利,这极大地振奋了其他囚犯的精神,以至他们的许多人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十月革命20周年大庆的部分大赦。然而恐怖统治很快就以新的力量发作了。食物每天只限400克面包。格别乌用粗棒子武装起刑事犯,唆使他们去对付反对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射杀开始了。所有政治犯又在集中营内被隔离起来,把他们围在带刺的铁丝网里,由10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昼夜不停地看守着。

1938年3月末一天的清晨,25个人被叫了出来,他们都是最主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发给他们每人一公斤面包,并吩咐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他们与难友们依依告别后,跨出了工棚。重新点了一遍数,他们走了。过了15-20分钟,大约离工棚才半公里的地方,在一条名叫上沃尔库塔的小河陡峭的岸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齐射声。然后听见一些零散的射击声,接着一片沉寂。不久,押送兵回来了,从工棚旁边经过。每个人都明白那25个人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天,又有不少于40个人被叫了出来,发给他们面包并吩咐准备上路。"有些人已衰弱得走不动路了,允许他们乘马车。工棚里的人屏着呼吸,倾听着被带走者脚下积雪的咯吱声。此时,人们都紧张地谛听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冻土带响起了射击声。"工棚里的人们终于明白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但是,经过去年长期的绝食与数月的饥寒交迫,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反抗了。"整个4月与5月的部分时间里,冻土带都在执行处决。每天或每隔一天,就会有30至40个人被叫走。扬声器里不断响起通报:'由于反革命宣传、怠工、抢劫、拒绝出工、企图逃跑,下列人员已被处决……。'有一次被叫出来一大帮人,约有100来个,大部分是托洛茨基派成员……当他们被带走时,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而几百个嗓音在工棚里应和着他们。"目击者讲述了许多反对派成员全家被处决

时的情景。一位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妻子是拄着拐杖走向刑场的。只有不满12周岁的孩子才能活下来。血腥的大屠杀在伯朝拉地区所有的集中营里一直持续到5月。在沃尔库塔，“工棚里活下来的人已不足100人了。两个星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他们又被派回矿井，在那儿人家告诉他们，叶若夫被免职了，现在领导格别乌的是贝利亚(Берия)。”

此时真正的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几乎一个也不剩了。两年之后，又有几十万流放者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他们在老囚犯中发现了许多失宠的斯大林派成员，甚至少数布哈林派成员，但却没有一个托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老囚犯们在讲述他们的死刑故事时，都压低了嗓音，或只是隐晦地暗示，因为对于不幸的囚犯来说，再没有比招致同情或怜悯托派成员的嫌疑更危险的了。[①]

叶若夫时期的大恐怖可以比做政治上的种族灭绝。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反斯大林主义者被消灭了。在以后斯大林统治的15年中，苏联社会里已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向他提出挑战的派别了，甚至在监狱与集中营里。没有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中心被允许存留下来。民族意识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它的集体记忆是一片空白，革命传统中断了，形成各种创新思想并使之具体化的能力被摧毁了。总之，在苏联，不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甚至在潜在的思维进程中都没剩下任何能与斯大林主义抗衡的东西。(人民的意识是如此混乱，以至在斯大林死后，任何反斯大林运动也不能从下层和苏联社会深处产生出来；而对斯大林制度的最落后于时代的方面的改革也只能由旧日斯大林的爪牙与同伙自上而下地进行。)

---

① 我要感激贝尔纳德·辛格尔对沃尔库塔集中营里这一阶段生活的的详细透彻的描写，他是著名的波兰记者，在二战初期被流放到那儿。

如果说莫斯科审判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则几乎被忽略了。它潜行得如此之深,以至唯有时间才能让真相暴露出来。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在审判中暴露出来的只是恐怖统治微不足道的一角。他只能去猜测幕后所发生的情况。但甚至连他也不能把握整体真实。就算能,那他在所剩无几的余年里也未必能明了它的发生过程、认清它的影响。他依旧认为,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目标、在政治上生机勃勃的反斯大林力量将登上前台,特别是他们能在战争时期推翻斯大林,将战争进行到胜利和革命完成。他仍旧寄希望于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复兴,斯大林对它无穷无尽的十字军远征从反面推动了它的力量与影响。但他不知道,所有这些反斯大林力量已被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和布哈林主义全都倒在了血泊里,就像那个阿特兰提斯洲一样从政治地平线上消失了。他是阿特兰提斯洲的唯一幸存者。

※　※　※　※　※

1938年整个夏天,托洛茨基都忙着准备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所需的纲领草案和决议草案。1938年9月3日,大会在别列尼亚——巴黎的一个小地方——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家中举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型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会议。有21位代表出席,宣称代表11个国家。[①] 不久前谋杀与劫持的阴影笼罩着大

① 本文叙述根据的是1938年9月3日会议举行时的《第四国际全球代表大会记录》,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我手头有一个得之于当年的英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的记录副本。)据我记忆,我于1938年读到过对"代表大会"更为详尽的批判报告,为波兰参加者们所写。

会。3 位年轻的殉难者被选入大会的名誉主席团：廖瓦、克莱门特与埃尔温·沃尔夫(Erwin Wolf)。[①] 由于大会组织书记克莱门特失踪，关于各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工作情况的文件和第四国际章程草案以及其文件也都一同丢失了。为了防备来自格别乌的打击，代表大会只举行了一次全会，持续一整天没有休息，并且拒绝加泰罗尼亚的波乌姆和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的观察员参加。[②] 为了保守“绝对机密”，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只说是“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在大会上，国际的“俄国支部”是由埃蒂安代表的。出席大会的还有两位“客人”：某位来自纽约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阿奇洛芙(Sylvia Agelof)，作为翻译旁听；她在大会开幕前不久从美国来，在巴黎碰到一个自称雅克·莫纳德(Jacques Mornard)的人，遂成了他的情人。此人在会议厅外徘徊，对这个极其秘密的聚会装出一付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只专心等待西尔维娅出来。

马克斯·沙什曼主持大会。在会期仅仅一天的代表会议上，对委员会报告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所写的决议进行了表决。这一天的正式日程十分紧凑，要按通常的大会则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纳维尔作了“进展形势的报告”，证明组织者们决定建立第四国际是正确的。然而，他无意中却证明了国际差不多形同虚设。它的所谓的各执行委员会与国际局在最近几年没有一个曾工作过。国际每一个“支部”只由几十个成员组成，最多几百个成员。即使人数最多、号称拥有 2500 名成员的美国支部也是如此。[③]但是根据托洛

① 埃尔温·沃尔夫是托洛茨基在挪威时的秘书，康拉德·克努德森的女婿，1938 年来到西班牙，在那儿惨遭格别乌毒手。

② 无论波乌姆或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法国一个活跃的小党，由马尔索·皮韦尔领导)，都“同情”托洛茨基主义，但与它有分歧。

③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公报》估计支部成员有 1000 人。德怀特·麦克唐纳指出：“我们大约有 800 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17 页。)

茨基的建议，代表大会仍然决定称其为“成立代表大会”。只有两位波兰代表提出异议，指出“波兰支部基本上反对建立第四国际”。他们说，企图建立新国际是不可取的，当前整个工人运动正处于“特别反动与政治萧条”的低潮阶段，以往每一国际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之于如下事实：即它们产生于革命高涨时期。“以往每一国际的建立都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某种威胁。……而第四国际的情况不同。没有一支重要的工人阶级队伍会响应我们的宣言。需要等待……。”波兰人同意托洛茨基关于第二、第三国际已“在道义上死亡”的说法，但他们警告代表大会说，低估这些国际对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则是轻率的。尽管波兰人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但他们反复呼吁自己的同志避免“空做姿态与愚蠢。”[①]

这一重要的反对意见是苏联境外唯一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及源于罗莎·卢森堡的牢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提出的。反驳波兰人占去了大会的大部分工作，但他们的论点并没有真正被驳倒。纳维尔宣称，现在是建立新国际“最合适的时机”。“结束当前不明确的状态，提出明确的纲领，明确建立国际领导，以及明确建立各国际支部是极其重要的。”沙什曼反驳波兰人，说他们的历史论点为“不符合当前形势的、不正确的”，并将波兰人说成是“我们中间的孟什维克”，因为只有孟什维克才会这样不理解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不相信国际的前途。大会以 19 票对 3 票决定立即宣布建立第四国际。

---

① 这两位波兰代表中，一位是在法国留过学的年青学者斯蒂芬，青年时代由于政治活动被判刑，在波兰未成年监狱中关押了几年；另一位是年长的犹太工人卡尔，在沙皇与毕苏斯基统治下坐了 12 年监狱，在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头几场战斗。回到波兰后因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在押赴刑场途中逃跑。我是反对建立第四国际的论点提出者，而这两位波兰代表在大会上对此论点加以发挥。

在匆忙地、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所有决议后，代表们开始选举执行委员会。这时，"俄国问题"的主要报告人埃蒂安提出抗议，说"俄国支部"没有席位。大会纠正了疏漏，指定托洛茨基作为执委会"秘密的"和名誉的成员。因为托洛茨基不能参加执委会的工作，于是奸细就继续代表着"俄国支部"。

※　※　※　※　※

托洛茨基欲"建立"新的国际时，波兰人就警告他此事难以产生预期的影响。他在苏联的追随者("最强大的俄国支部")被摧毁了。在欧洲与亚洲，他的拥护者人数也在锐减。莱茵河以东，阿尔卑斯山以南，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德国、奥地利以及近来在捷克，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能在希特勒统治下进行有组织的地下斗争。在法国，人民阵线陷入绝望与冷漠。在西班牙，国内战争即将结束，左派力量在它的军事失败之前就遭到了精神失败。整个欧洲大陆在政治上已被征服，只等着希特勒的武装力量从它身上碾过了。还要好几年，纳粹的占领、无法忍受的压迫与屈辱才能使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恢复政治上的活跃或展开抵抗运动。但到那时，起码在法国与意大利，工人转而依靠的是各斯大林主义政党，因为它们背后站着的是苏联——最强大的、1941年后最有效的抵抗力量。看来，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都注定是微不足道的。

亚洲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尽管整个亚洲都被革命风云所激荡着。托洛茨基花了很多时间密切注意着中国、日本、印度、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事态。在所有这些国家，他都对一小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产生了影响。但除了锡兰，他的拥护者在哪儿也未能建立起像样的政党。在中国，即使他反对斯大林

1925—1927年间的政策曾产生过最强烈的印象,但第四国际在那里也没有能当得起“支部”这个称号的组织。一些活动于地下、困于极度的贫穷并受到国民党政府与斯大林主义者围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成立了一些小组,在上海有二十几人,在香港有几十人,还有分散在中部和东部各省的少数人。[①]甚至在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之后,他们也未能摆脱孤立。陈独秀在监狱里被关押了6年。出狱后,他被放逐到重庆附近一个偏僻的乡村,被禁止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于恐惧之中,为1927年的失败承担的罪责压弯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员也不信任他了。毛主义者对他大加指责。他被奸细包围着,蒋介石的警察又以谋杀威胁着他,于1943年把他重又投入监狱,并暗杀了他。[②] 1938—1939年,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尝试,想把他从中国救出来,指望“他能在第四国际起到与片山潜在第三国际同样的作用,……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利益。”但陈独秀认输了,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然而他仍不时地分析中国形势,十分透彻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受挫。在第四国际宣布成立两个月后所写的一份声明里,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说,中国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与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一些最先进地区的工业;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40年前的条件下”。因此,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理解将来的政治形势会向何处发展,不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以及其政党所处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坐井观天,由于自满自大

① 这些数字不准确,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召开时,计有成员400多人。——译注

② 此处有误,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译注

而痛失良机。”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派成员常因其宗派傲慢、对毛主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及无视抗日战争的需要，使自己脱离了现实政治生活。他担心，第四国际的建立只会加强他们的“傲慢与孤立”，而这场冒险将以破产告终。他本人倾向于时而同国民党、时而同毛主义妥协，但既不能也不愿同前者或后者结盟。在余下的悲剧性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个垮掉了的人。他的警告以及他的沉重的命运仿佛聚焦般在他身上集中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世界这一角落的困境。[①]

美国是托洛茨基主义能唤起某种兴趣的唯一国家。1938年1月，经过多次分裂与联合，社会主义工人党形成了，并很快获得了第四国际“最强有力的支部”的美誉。它的长处是在工会与工业部门有一定的战斗力。它定期出版两份期刊：《新国际》（理论月刊）与《战斗》。党的领导集团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以美国人眼光看来都是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马克斯·沙什曼与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②] 托洛茨基常乐于应该党的请求提出建议、进行批评、给予褒奖、协调解决争论与冲突。在纽约与墨西哥之间有密使来往，而“蓝屋”的秘书与卫士差不多全由美国人担任，这更使联络变得轻而易举。纽约很快就取代巴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但

① 参见1938年2月5－25日托洛茨基给“格拉斯同志”的信；H.弗利特曼所述中国之行及与中国托洛茨基派成员会见印象记（1940年2月19日）。托洛茨基与其中国拥护者有过大量通信，表明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引证的陈独秀的观点是根据他在合川写的长文，日期为1938年11月，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詹·P·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M. 巴勃罗：《第四国际的二十年》，载《第四国际》1958－1959年；马·沙什曼：《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二十五年》，载《新国际》，1954年。

即使如此,美国党还是一株长得过于孱弱的庄稼,因为它从自己扎根的土地上只能汲取很可怜的一点儿养料。

那么,尽管有这种种不祥的预兆,托洛茨基为什么还要建立第四国际呢?

自从他决定再不能"与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之流同处于一个国际中"之后已过了5年多。在这几年里,第三国际已经衰落与瓦解到这般地步,以至托洛茨基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毅然斩断自己及其拥护者与它的关系。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时,有一次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人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破旧"肮脏的衬衣",称自己为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则谈到"斯大林主义的梅毒"或者"应该用烧红的烙铁从工人运动中烫掉的毒瘤",并相信他正赋予一个组织以生命,使它在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①]

不太清楚的是,他这样做是对不久的将来有成功的把握呢,还只是"为了历史"而不计成败。他个人的一些声明是相互矛盾的。他就自己的追随者稀少这一事实而写道:"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以从老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小派别'开始的,基督教起初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新教是从天主教即堕落的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派是从黑格尔左派中'分离出来'的。共产国际是由那些从社会党国际中'分离出来'的人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运动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获得群众拥护,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不怕孤立。"类似这样的说法尽管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但也表明托洛茨基并没有指望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为国际写的纲领草案与其说是一种原则声明,不如说是一种策略说明书,以供忙于工会斗争与日常政治、力图取得实际的领袖地位的党使用。他在给"成立代表大

① 在"成立代表大会"的英语演讲,载《反对派通报》1938年11月第71期。

会"的信中写道:"群众运动的任务今天已摆在了第四国际的面前。……现在它是唯一这样的组织,不仅清楚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动力,也同样有一整套能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日常规章。"往下是:"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我们将来的任务是不成比例的,这一点我们比我们的批评者更清楚。但是当前时代的严峻的悲剧性的辩证法站在我们一边。对于被战争驱向极端绝望与愤怒的群众来说,除了第四国际给他们提供的领导外,再也找不到别的领导了。"在给美国拥护者的信中,他用几近神秘主义的、但更为坚决的语句颂扬了第四国际的使命:"在最近10年里,第四国际的纲领就能获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就能改天换地。"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再次声明,尽管第四国际在未来战争的初期可能是弱小的,但"每新的一天都有利于我们。甚至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劳动群众就将疾风暴雨般地横扫沙文主义的狂热。第二、第三国际的政党连同法西斯主义都将一起被它所埋葬。它们的崩溃将是……由第四国际……领导的公开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条件。"1937年,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来拜访他,谈话中托洛茨基大声说:"我告诉你,从现在算起,三五年内,第四国际就将成为世界上的一种强大的力量。"①

托洛茨基的希望是建立在双重前提下的:当前战争将导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类似的革命结果,但具有更大的规模与力

① 《反对派通报》1938年第66-67、71期。他在写于1937年4月10日的《新政治家与民族》里描述了他与金斯利·马丁的这次谈话,谈话气氛相当不友好,因为马丁一心想"捍卫"他的朋友D.N.普里特的"名誉"。普里特是皇家律师与议员,正忙于从法律观点在英国舆论面前为莫斯科审判辩护。也许,英国报界对普里特名誉的关心和它对莫斯科审判中被告及托洛茨基本人名誉的冷漠激怒了托洛茨基,促使他写下了这份冒失的声明。在与巴黎的国际书记处的通信中,托洛茨基对马丁在科约阿坎的拜访作了尖刻的描述。

量;斯大林主义的党将像社会民主党一样竭尽全力压制革命潮流。他比以往更坚信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将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战场,拯救革命的首创精神将来自它们的工人阶级,唯有这种首创精神才能砸碎那个怪圈: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与官僚独裁——俄国革命正是被禁锢在这种独裁之下。若说被30年代的大危机与大萧条震撼的西方资本主义能躲过即将来临的这场浩劫,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毫不怀疑希特勒意欲将欧洲纳入日耳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并必将遭到失败。欧洲的确需要联合,但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它联合,这场革命将为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奠定基础。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德国,还有具有其革命传统的法国与意大利,甚至北美洲,都将被卷进这场社会巨变之中。在写于1939年的《马克思活的思想》一书的前言中,托洛茨基驳斥了罗斯福的"新政"及一切复活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企图,称之为"反动的和不可救药的公谊会教派"。他欢呼美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曙光,指出《资本论》仍适用于分析美国的经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同样,"美国几次跃进就能赶上欧洲并超过它。先进技术与先进社会结构将以此学说为指南开辟自己的道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出现在美国大地上。马克思是先进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导师。"①

托洛茨基并不轻视不发达国家中巨大的革命潜能,特别是中国。关于这个问题,他比30年代任何一位政论家写的都要多。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前途要取决于欧洲革命:"只有当社会主义革命以现在法西斯的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这种革命前途才会出现。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落后国家也将被带进社会主义的主流中。"经典马

① 《马克思活的思想》第38页。

克思主义认为“先进技术与先进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托洛茨基将这种逻辑推向了极端，却没有料到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倘若先进的工业国家会起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赋予它的那种作用，那么就会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美国更快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在最近几十年，一些落后国家正成为“社会主义主流”，“先进的西方”将极力遏止这种潮流或将它拉向倒退，而美国不但没有发展出最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它最强大的障碍。[1]

他期待着西方工人阶级起义，正如它在1848、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起义一样。他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运用于中国，因而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担心它会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军队一样变成反动的工具而去反对工人阶级，倘若后者未能将革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尽管有陈独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条公理：现代一切阶级斗争，主导权都属于城市。革命运动可以在农村发生并领导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和落后的。托洛茨基坚持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革命或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他丝毫没有预见到另一种情况，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在东方和西方，阶级斗争的进程先是被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盟、尔后是被它们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对抗所支配，因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歪曲了。

根据这些前提，托洛茨基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什么样的党将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他回答说：第二国际是旧制度

① 当然，到本世纪末，托洛茨基对“先进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预测是否还如本世纪中期看起来那样不现实，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的正在腐朽的支柱;第三国际则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斯大林在用不着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而在与资本主义列强做交易时就用它做筹码。斯大林及其政治局生活在对国外革命的恐惧中,因为这种革命能唤起苏联工人阶级并威胁着独裁统治与特权。所以,当工人阶级步入新的社会震荡时期时,将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自己。缺乏领导正是他们在20—30年代遭受到一连串挫折的根本原因;而缺乏革命领导甚至还会使他们遭到更为悲惨的新失败。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虚假的教条,如果工人阶级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承担者,并且列宁主义关于工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就不可能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严重的"领导危机"就只能靠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来解决。在成为布尔什维主义者之前的那些年,托洛茨基跟罗莎·卢森堡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工人阶级的自发作用,却忽视党的领导功能与组织功能,而这点正是列宁注意的中心。自此,托洛茨基就将此视为自己漫长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他再也不想把希望寄托在"自发的"革命高潮上了。当他的整个思想要求他给自己提出相应的任务时,他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哪怕看不到什么希望。"第二和第三国际死了!第四国际万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责任就是宣布这个口号;至于其余的事,那就让将来去关心吧。

※ ※ ※ ※ ※

起码在美国激进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文学界,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获得了进展。受世界经济危机、纳粹抬头、西班牙内战的影响,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站到了共产党一边。而最有批判思想的人对人民阵线的机会主义望而却步,它使党追随罗斯福并赞扬"新政"。莫斯科审判、斯大林主义那种暧昧手腕与怪异仪式强烈震撼

了他们，引起他们的憎恶。托洛茨基主义对他们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左派阵营中沉闷的空气，展示了新的地平线。托洛茨基斗争中的那种悲怆色彩、他的雄辩及文学才能打动了作家们。托洛茨基成为一种时髦，在美国文学里留下了许多痕迹。在受其影响的作家中，特别在批评家中，有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查尔斯·马拉穆德（Charles Malamuth）、菲利普·拉夫（Phinlip Rahv）、詹姆斯·罗蒂（James Rorty）、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等。[①]

《党派评论》成了这个"文学托洛茨基派"的中心。这家杂志原由菲利普·拉夫与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主编，由约翰·里德俱乐部、也间接由共产党赞助出版。然而，编辑部被党对文学事务的干涉所激怒，党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又令他们难堪，加之震惊于莫斯科审判，于是杂志停刊了。1937 年末杂志复刊，但改变了方针：《党派评论》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编辑部邀请托洛茨基为他们撰稿。起初他拒绝了，对此事态度冷淡。他在给德怀特·麦克唐纳的信中说："我的印象是，《党派评论》的主编们有能力、有教养、有学识，然而我对他们却无话可说。"[②] 社会

① 德怀特·麦克唐纳：《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12－15 页。

② 托洛茨基致麦克唐纳，1938 年 1 月 20 日。《党派评论》编辑部想邀请托洛茨基出席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座谈会，拟有下列人参加：哈罗德·拉斯基、西德尼·胡克、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埃德蒙·威尔逊、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约翰·斯特雷齐、芬纳·布罗克韦等等。主题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哪部分还有生命，哪部分已经死亡？"《党派评论》想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上揭开"新的一章"，但此事并没有使它得到托洛茨基赏识。参见托洛茨基与《党派评论》编辑部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编辑部放弃了召开座谈会的想法。

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不喜欢看到托洛茨基的威望与这家杂志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则搞不清楚《党派评论》宣称热衷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认真到什么程度。它的多数撰稿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了解仅仅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歪曲。难道他们不会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失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吗?另一方面,他又指责编辑部对莫斯科审判过于消极的反应以及试图保持与《新大众》、《民族》、《新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这三家杂志或者支持审判,或者对审判态度暧昧。托洛茨基在给拉夫的信中说:"有一些手段对于反对错误理论的斗争是必要的,而另一类则对同霍乱流行斗争是必要的。斯大林无疑属于霍乱一类,而非错误理论一类。斗争应该是紧张的、凶猛的与无情的。'狂热'的成分……有益于健康。"[①] 那年晚些时候,当《党派评论》变得更加率直地反对斯大林时,坚冰开始打破了。与托洛茨基最紧密联盟的时刻已经来临,勃勒东(Breton)和里维拉受托洛茨基鼓舞,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自由"宣言",号召建立革命作家与艺术家的国际联盟,同集权制度对文学与艺术的控制作斗争。[②]

1938年2月,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勃勒东(Breton)来到了科约阿坎。他早就是托洛茨基的热烈的仰慕者。在返回法国的轮船上,他倚着船舷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表达他对托洛茨基的感情了:"最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现在给您写信时,我缺乏自信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在您身边的痛苦。我感到有一种以这种方式接近您的不断的渴望。我跟您说这番话

① 托洛茨基致拉夫,1938年3月2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② 《党派评论》1938年秋季号;托洛茨基致拉夫,1938年5月12日至7月30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存有詹姆斯·伯纳姆对那些在《党派评论》工作的人的尖刻批评,以及关于他们糜烂生活的故事。(伯纳姆致托洛茨基,1938年4月12日。)

是为了让您明白，在您面前，我迈步走近您时是多么困难。"这个困难，其原因就在于"无限的赞美"。这是每一次与托洛茨基相会时都要控制住他的"考狄莉娅综合症"。每当他不得不接近最伟大的人时，才会屈从这种压抑："您是他们中间……唯一健在的人。……我要费好大力气才能使自己相信，您不是不可接近的。"托洛茨基的回信也并不更少客气："阁下，您对我如此谬奖，使我不由得担心我们未来的关系。"①

逗留科约阿坎期间，勃勒东、托洛茨基与里维拉作了一次长途散步和郊游，他们畅谈政治与艺术问题，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在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前超现实主义者纳维尔）是对立的。不过，托洛茨基对超现实主义，正如他对待艺术领域里一切新事物一样，是抱着友好态度的，尽管也不乏批评。他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者专注于梦境与潜意识经验这种准弗洛伊德主义观念，却对勃勒东及其朋友们的创作中那种"神秘主义的调子"责备地摇头。尽管这些问题跟当时托洛茨基心中所关注的事情过于遥远（勃勒东的访问正值廖瓦之死和对布哈林的审判），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跟勃勒东与里维拉辩论着共产主义与艺术、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这场争论孕育出了一个想法，即发表告作家与艺术家的宣言书并建立国际联盟。托洛茨基是"宣言"的合作者，但"宣言"是以勃勒东与里维拉的名义在《党派评论》上公开发表的。② 托洛茨基在给勃勒东的信中及在《党派评论》上这样评价这件事：

---

① 勃勒东致托洛茨基，1938年8月9日；以及托洛茨基8月31日的回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另见勃勒东：《田野的钥匙》第142－154页；《访谈录》第118－119、187－190页。M.纳多：《超现实主义史》第242－244页。

② 《党派评论》1938年秋季号。勃勒东肯定地说，里维拉的贡献只限于他的签名，宣言的主要作者是托洛茨基，但他认为没有必要署上自己的名字。

> 对您跟里维拉倡导真正的革命家与真正的艺术家的国际联盟,我衷心欢迎,为什么不能加上真正的艺术家呢?我们的星球正变成一个肮脏的、邪恶的帝国主义病房。民主英雄们……在拼命效法法西斯英雄……而独裁者愈是不学无术,愈是愚笨透顶,就愈是觉得自己注定是科学、哲学与艺术发展的领袖。知识界的盲从本性及其卑躬屈膝是另一种并非不突出的象征,标志着当代社会的堕落。

宣言的思想基本上还是托洛茨基15年前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当时他正企图防止形成斯大林主义对文学艺术的监控。现在他攻击斯大林主义的献媚者——"阿拉贡分子、爱伦堡分子和其他小滑头","这些(巴比塞式的)先生,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撰写着耶稣·基督的传记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传记",还有马尔罗,他最近对德国和西班牙事件的描写中的"谎言""尤其令人作呕,因为他竟想给它穿上艺术的外衣"。他评价马尔罗的行为"在整个悲剧中,在几乎一代作家中都是典型的:他们中许多人出于对十月革命的'友情'而撒谎,仿佛革命需要谎言"。因此,为艺术真实与艺术家自身的真正信念而斗争,就成了为革命理想而斗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人们用艺术表达……自己对和谐与健康生存的渴望……这是阶级社会无法满足他们的。(引文据托洛茨基发表在《党派评论》上的信。)因此,在真正的艺术中,……总是存在着对现实生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乐观的或悲观的抗议。……对于不同程度上适应

当前时代需要的那些艺术趋势的发展，垂死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哪怕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它迷信地恐惧任何新世界。被压迫群众过着自己的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则锁闭于自身的狭隘之中。……近几十年的艺术流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彼此更替，却没有一个成熟起来。……仅靠艺术手段是不可能走出这个死胡同的。这是整个文明的危机……倘若现代社会不能改造自己，那么艺术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正如希腊艺术在奴隶制文明崩溃下毁灭一样。……在这里，艺术对我们社会的作用是由它与革命的关系所决定的。

然而正是在这里，历史为艺术挖下了一个陷阱。整整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东方……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其说是同革命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同胜利的革命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一码事。而在那个胜利的革命中，不仅是革命，还有新的特权阶层……它用专制独裁的手扼杀着艺术。……即使在君主专制政体时代，宫廷艺术也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像苏联的官方艺术——那里没有别的艺术——与官方司法制度共命运那样，以造假为基础，其目的就在于颂扬"领袖"，一本正经地制造英雄神话。……

苏联官方绘画的风格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类标签唯有作为艺术部门头头的官僚才琢磨得出来。现实主义就是模仿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粗陋的照相底版，而"社会主义"风格就是利用摄像聚焦再现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人们不能不怀着厌恶与恢惧去读那些诗和小说、去看那些绘画和雕塑，那都是由手里拿着笔、毛刷和雕刻刀的官员在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的官员监督下颂

> 扬着"天才的伟大领袖",而那些领袖身上既没有丝毫的天才,也没有丝毫的伟大。斯大林时代的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极度衰落的最鲜明的表现。

托洛茨基指出,这一问题并不只限于苏联:

>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借口承认十月革命太晚而跪倒在苏联官僚集团的脚下……。五花八门的中心与团体,……及其必不可少的罗曼·罗兰那些信函,接受资助的出版物、酒宴和代表大会(其中很难将艺术同格别乌区分开来)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这些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运动尽管声势煊赫,却从未产生过一部能够比作者及其克里姆林宫主子活得更长久的艺术作品。
>
> 艺术、文化和政治必须有一个新前途。否则人类就无法前进……但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却无意于"领导"艺术,更不用说"指挥"它了。……只有沉醉于无限权力、不学无术和厚颜无耻的官僚集团才会有这样的野心。……艺术唯有忠实于自己,才能成为革命的最伟大的同盟军。①

尽管这号召是如此鼓舞人心,但作家与艺术家国际联盟却从未成为现实。在欧洲,它号召捍卫艺术创作自由的呼声很快就湮没在隆隆逼近的战争喧嚣中了,在美国,"文学托洛茨基派"的蜜月也十分短暂。托洛茨基的担忧成了事实,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转变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

① 《反对派通报》1939年第74期。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怪圈，即托洛茨基在他的精神拥护者身上唤起的那种情感所经历的怪圈。他们大都对他抱着一种过分的敬畏，他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引起了勃勒东所说的那种“考狄莉娅综合症”。然而他们逐渐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充满了难以承受的精神紧张。他们突然看清楚了，他的确是“不可企及的”。他们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李尔王依然是一个最虔诚的革命者。他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打算把自己的拥护者派去反对大地上的一切权力：反对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斯大林主义，反对各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护国主义、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甚至世俗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他要求他的拥护者，尽管存在斯大林的暴政，他们也要“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而同时要以不亚于他的那种愤怒去攻击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是从来不会从自己的原则上后退一寸的，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后退。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他们手足无措了，他们对他极度的敬仰让位于动摇、困惑和疲倦，但仍然还夹杂着尊敬，慢慢地，他们先是转向反对派，尔后则产生了隐蔽的或公开的敌意。知识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先是羞怯地，然后是恶狠狠地放弃自己早先的热情，大谈特谈托洛茨基的错误和缺点。既然没有比失败本身更大的失败，于是他们就开始指责托洛茨基的各种错误与挫折，既有真的也有假的，直至痛骂他是一个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一个轻浮的空想家，直至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

别。

在不断的失望与友谊的破裂这类常例背后的是激进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整个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增长的愤怒。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政治变换过程,其结果是某个时代的激进派和革命派变成下一时代的中间派、保守派或反动派。30年代文学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了40年代或50年代时很少人没率领过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十字军东征。他们注进这个十字军东征中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亵渎,是对它薄弱环节的偏激而片面的理解以及对它的强烈厌恶,而这种厌恶却是托洛茨基教给他们的,原指望他们发泄到斯大林主义头上而非马克思主义头上。(当然,从未受过托洛茨基任何影响的旧日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反共产主义进军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主要是作为庸俗的知情人而不是作为理论家。)

在一些次要争论的纷乱中,这个变换过程半公开地开始了。1937—1938年冬季,伊斯特曼、塞尔日、苏瓦林、西利加等人提出了托洛茨基在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责任问题。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为的是搞清何时何地布尔什维主义中出现了致命罪孽并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产生。他们的答案是,它就出现在1921年对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镇压中。那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镇压是导致布尔什维主义衰落的头等罪孽!难道托洛茨基不应对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负责吗?难道在这次行动中他不正是斯大林恐怖的先行者吗?批评者们如此轻率地谴责他,以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喀琅施塔得暴动理想化了,颂扬它是对"叛变革命"的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抗议。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们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镇压暴动,就会打开反革命的闸门。他将他所赞同的政治局决定的全部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仅仅否认他亲自领导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行

动。①

在这场争论中夹进了莫名其妙的不必要的激动。用不着站在托洛茨基的观点上也能看出，他的批评者将喀琅施塔得起义从历史环境及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割裂出来，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斯大林主义的前奏曲，该事件在他们的眼中远比那些有助于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因素更重要，如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失败，苏联的贫困与孤立，劳动群众的弱小，城乡对立，一党体制的"逻辑"，等等。关于这件已很久远并且意义模糊的事件的争论有时竟如此凶猛激烈，因此托洛茨基评论说："你可以认为，喀琅施塔得暴动不是发生在17年前，而是昨天刚刚发生的。"托洛茨基很恼火，他的所谓同情者偏偏在他的反莫斯科审判行动正值最紧张的关头用喀琅施塔得事件来难为他。尤其是当他正在谴责对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妻子儿女进行屠杀时，塞尔日和苏瓦林却指控他在国内战争期间杀害人质。难道这些"哭喊和哀号"不是在帮斯大林的忙吗？难道他们看不到国内战争时期他使用暴力与今日斯大林恐怖之间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区别吗？或者他们

① 《反对派通报》1938年第70期。在1937年11月给廖瓦的信中，托洛茨基讲述了当时政治局所面临的问题，他支持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行动；而斯大林却表示反对并指出，如果听其自然，叛乱者两三个星期就会投降。有趣的是，无论在关于斯大林的公开辩论中，还是在关于斯大林的传记里，托洛茨基都闭口不提此事，而他一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利用斯大林政治上的"温和"或他对列宁路线的偏离的。这是否是因为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在当时那种场合下的"温和"会有利于斯大林呢？《新国际》继续展开关于喀琅施塔得的争论（列·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批评与喧嚣》，1938年4月；塞尔日致编辑部的信，1938年2月），这种争论也出现在一些著作中：A．西利加：《巨谎之国》；V．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托洛茨基的一位美国秘书伯纳德·沃尔夫1937年去过科约阿坎，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公爵之死》，其主旨是托洛茨基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上的罪行腐蚀了他的良心与生活。但很遗憾，小说既没有历史真实性，艺术性也十分低劣。

想否定1918年至1921年布尔什维克政府自卫和要求纪律的权利吗?

> 我不知道……(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是否有无辜的牺牲者……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此刻我无法断定,到底谁应该受到惩罚,以什么方式……特别是手头没有资料。我愿意承认,国内战争不是人道行为的范例。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永远都在为"过火行为"而指责革命。事情的本质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根本特点,而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谁愿意,谁就(用他们那些蹩脚的政论文章)以这个理由去否定革命吧。我决不否定它。

批评者指责他的"伪善"或者"列宁式的不讲道德",即指他坚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他撰写《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文作答,这是关于共产主义伦理学的一份咄咄逼人的雄辩的声明。[①] 文章以打击"从左边"来的那些民主派与无政府派开始,说他们在反动派胜利时期"分泌的道德排泄物要比平时多一倍,就像别人恐惧时加倍出汗一样",但他们不是对强大的迫害者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对被迫害的革命者进行道德说教。当然,托洛茨基不承认任何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宗教之外这类抽象无任何意义。起码教皇们是从神的启示中抽象出这些道德原则的;而他的批评者们,这些"世俗的小神甫",能从哪儿获得他们那些永恒的道德真理

① 当里维拉通知他廖瓦死讯时,他已完成此文的初稿,于是他以此文纪念廖瓦。《反对派通报》1938年第68-69期;《新国际》1938年。此文还以小册子的形式用多种语言出版。

呢？从“人类良心”、“道德本性”及类似的概念中找不到别的东西，只能找到神启的形而上学替代物。

道德植根于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它反映了社会生活与需要，因此永远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他以雄辩犀利的一大段话为耶稣会士“辩护”，[①]反对批评他们的道学先生。“耶稣会僧团从未教导人说……任何手段，甚至犯罪，……只要能达到目的都是允许的。……这一类的……说法是反对派新教徒、有时是天主教徒恶意强加于耶稣会的。他们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呢，而且从未感到丝毫的良心谴责。”耶稣会理论家宣传的不过是老生常谈：对于各种本身在道德上可能是中性的手段的运用，应根据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性质来辩护或谴责。枪杀，一般来说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是，枪杀一只威胁孩子的疯狗却是一桩善行，而以谋杀为目的的枪杀则是犯罪。“在其道德实践上，耶稣会士并不比其他各类祭司和僧侣更坏……相反，他们超过了后者，起码他们更言行一致，更勇敢，更彻底。他们是一种战斗的、隐蔽的、旧集权制的和侵略性的组织，不但对敌人是危险的，而且对自己的朋友也是危险的。”与布尔什维主义者类似，他们也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与衰落时期，那时，教会的军人变成了官僚，“像一切好官僚一样地变成了好骗子。”不过，耶稣会士在其英雄时代是不同于通常的祭司的，正像教会中的战士不同于教会中的商人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前者或后者理想化，但若是用愚笨懒惰的小店主的眼光去看狂热的军人，那也是不礼貌的。”

① 上文批评者指责托洛茨基“伪善”，“伪善”与“伪善者”在西文中皆为“耶稣会士”之转义。因此托洛茨基要为“耶稣会士”辩护。同此，下文的“耶稣会士的”也可作为“伪善的”来理解。——译注

托洛茨基指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其实潜藏在各种道德观念中,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功利主义中并不更少,对耶稣会士与布尔什维主义"不道德"的攻击大部分都是出于这种观点。既然"为了最大多数人类的最大幸福"这一理想在自身中包含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什么都可以,那么在道德上,这个理想是符合"耶稣会士"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的。一切政府,甚至最"人道的"政府都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战争期间用军队消灭最大量的敌人,难道它们不正是在运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吗?但是目的也应该是合理的,目的与手段可以相互交换位置,因为现在被当做目的的东西在以后则可能成为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要提高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并要消灭人对人的统治。对于他来说,这个目的是合理的,因此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也是合理的,这个目的就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德观服从革命的需要。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符合革命利益,一切手段,甚至撒谎、叛变和谋杀都可以使用呢?托洛茨基回答:"凡真正能实现人类解放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然而,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某些手段不可能达到目的。"唯有这一类的手段才是允许的和必要的,即它能保证革命工人的团结统一,使他们充满对压迫制度不可调和的仇恨,……巩固他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意识,加强他们的勇气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并不是所有的手段都是允许的。"他宣称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其实等于在宣称,目的"否定"与它不一致的那些手段。"要长出小麦就要播种小麦。"社会主义是不能通过谎言、欺骗或对把群众踩在脚下的领袖的崇拜来推进。同样,也不能违反工人阶级的意志将社会主义强加给它。正如拉萨尔所说的:

要说道路,别只说目的。

目的和道路交织在一起，
一个总把另一个来替换；
另一条道路通向另一个目的。

真诚对待劳动群众，对于革命道德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任何另一条道路只能通向另一个目的，但不是社会主义。在自己的英雄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是“整个历史上最诚实的政党”。当然，他们欺骗了自己的敌人，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但是他们正确地对待工人阶级，获得了它的空前信赖，这是任何别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获得过的。列宁否定一切伦理学上的抽象，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被压迫者。他在思想上是极其慎重的，在行动上是大无畏的，而他从来都没有对普通工人、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流露出一点儿傲慢。至于说到托洛茨基本人怎样不道德，那么，他的确曾发布过命令将白卫军军官的家属拘押作为人质，他是应该为这个基于内战需要的措施承担全部责任的，尽管就他所知，从来没有一个人质被处决。“倘若革命从一开始就少一点儿多余的宽宏大量，就会有上万条生命获得拯救。”他相信后人评判他的政治业绩会像评判美国内战时期林肯的无情一样：“历史以不同的尺度衡量北方人的残酷和南方人的残酷。奴隶主用尽一切心机和暴力去束缚奴隶，奴隶用尽一切心机和暴力去打碎锁链——只有卑鄙的宦官才会说，两者在道德审判面前是平等的！”

由于斯大林的暴行而指控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道德”，这意味着歪曲历史。斯大林主义既不是革命的产物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而是旧社会的余毒，这就是斯大林进行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的原因，俄罗斯古老野蛮的制度通过这一斗争向 1917 年获胜的进步力量与愿望进行报复。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是一切“谎言、兽行与卑鄙”的同义词，它们构成了各类阶级统

治与国家机器的根基。因此,阶级社会与国家的辩护士,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捍卫者,未必有理由感到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斯大林主义就是他们自身的一面镜子,尽管是一面有点儿失真的镜子。

在《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这本著作引起的许多反驳中,应该提到杜威的评论。[①] 杜威赞同托洛茨基关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道德评价具有历史相对性的观点。他也赞同"手段的合理性只能由其目的决定……那样的目的是合理的,如果它旨在提高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并消灭人对人的统治"。但与托洛茨基不同,他不懂这个目的为什么主要或只能由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实现。在他看来,如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把阶级斗争当做了目的本身。他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哲学上的矛盾":一方面,目的的性质(即社会主义)决定了手段的性质,而另一方面,却又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中引申出这些手段,或者,借用这样的"规律"说明它们的合理性。在杜威看来,臆想出一种所谓支配社会发展的"固定规律",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坚信历史规律决定了一条具体道路,比如应该进行斗争,那无疑会在生活中导致盲目的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热衷于使用阶级斗争的具体手段,并排除一切其他的手段。……如同正统的宗教和……传统的理想主义一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信人们的目的被编织进存在本身的经纬结构中——这显然是起源于黑格尔派的观念。"

杜威的结论成为几乎所有新近对托洛茨基攻击的基础,这些攻击来自他昔日的学生与朋友,矛头所向是"唯物主义中的黑格尔遗产"、辩证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宗教狂热"。例如,马克斯·伊斯特曼就谈到了"社会主义梦想的"最终破产:"我认为,我们

① 杜威:《手段与目的》,载《新国际》1938年秋。

应当同这些乌托邦式的纯粹的理想决裂。"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古代的宗教"或"德国式的浪漫理想"，而且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始祖，正如它是斯大林主义的始祖一样。"请不要忘记，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也都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西德尼·胡克也谴责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倒向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紧随其后的还是埃德蒙·威尔逊、本杰明·施托尔贝格、詹姆斯·罗蒂等等。[①]

托洛茨基经历了40年"意识形态"论战，他在这些论据中看不到多少独创见解。也许这让他想起了季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的《我为什么不再是革命者》一文，这几乎是一个典型的老民粹派放弃信仰的声明，他抛弃了革命运动而与现存秩序妥协。从那以后，每一代、每10年都有一些逃离火线或跑进另一阵营的疲倦失望的人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一次，新鲜的只是绝望的深度，它与斯大林主义对信仰与幻想打击的力量之凶猛成正比。还从来没有人脱离革命斗争时怀着如此痛切的感觉、如此坦率的愤怒，在抛弃他的那些教授、作家、文学批评家眼里，也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像托洛茨基的事业这样看起来毫无希望。他们愈益感到，一旦选择了托洛茨基主义，就被无谓地卷进了俄国革命中一场大规模的、遥远的、模糊的和危险的事件里了，而这种关系则使他们不得不与自己的大学、编辑部与文学团体里流行的生活方式、精神氛围发生冲突。将自己的名字列入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抗议大清洗是一码事，而在第四国际的宣言上签名、响应托洛茨基的号召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变成全世界各国的国内战争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

① 马克斯·伊斯特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第275－297页；西德尼·胡克：《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

了。连伊斯特曼和塞尔日这样的老朋友和拥护者也背弃了他,这使他十分生气。他极为轻蔑地对待他们以及"他们的同类",并且跟其他不挑剔牺牲者的大雄辩家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让一小撮鳖脚的文人得以扬名,就跟让昆虫在琥珀里不朽一样,要不然这些人老早就被人忘记了。下面是他以苏瓦林为靶子的雄辩例子:

> 前和平主义者、前共产主义者、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前民主-共产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前苏瓦林愈是厚颜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与革命者,他愈是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此人爱好……搜集并装订……引文、文献、逗号与引号;此外,他还有一支锐利的笔。起初他以为这点儿行头就够一辈子用的了。但后来才晓得还得会思考。……他那本谈斯大林的书里尽管有趣的引文和事实很丰富,然而却是他智力贫乏的自我证明。苏瓦林既不懂什么是革命,也不懂什么是反革命。他用喋喋不休的二流说教者的标准衡量历史过程。……他的批判态度与其创作无能之间的比例失调好似硫酸在腐蚀着他。因此他在评价思想、人物和事件时,干巴巴的道德说教掩盖下的是他那一贯的冷酷无情与缺乏起码的善意。苏瓦林正像一切厌世者和犬儒派一样,本性上就倾向于反动。但是他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了吗?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更喜欢模棱两可,这是他天生的素质。他在对我的小册子《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的评论中写道:"托洛茨基……重又骑上他那匹阶级斗争的木马了。"对于这位昨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已经成了……"托洛茨基的木马"。看来苏瓦林本人更喜欢骑在永

恒道德的死狗身上。[1]

他的两位学生詹姆斯·伯纳姆和马克斯·沙什曼自愿伴随托洛茨基踏上这些论战征程。他们凶猛地攻击那些“逃跑的知识分子”，为后者的“恐斯大林症”和“背叛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而要将其撕成碎块。然而这两位学生很快也从自己的主人那儿开了小差，加入到“逃跑的知识分子”中去了。[2]

※　※　※　※　※

托洛茨基跟里维拉的友谊持续了两年，终于破裂了。争吵发生得很突然，刚好是在《党派评论》发表了艺术自由的宣言之后。夏天，托洛茨基希望里维拉能参加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写信告诉巴黎的组织者：“你们应该邀请他……个人……并要强调他将使第四国际非常自豪自己的队伍里能有这样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不屈的革命斗士。我们起码要像马克思器重弗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列宁器重高尔基那样器重迭戈·里维拉。作为艺术家，他要远远超过弗莱里格拉特和高尔基，他……还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而弗莱里格拉特却只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同情者，高尔基则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同路人。”[3] 因此，当年底里维拉就像“斯大林分子的帮凶”那样猛烈攻击卡德纳斯总统，并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卡德纳斯的竞争对手——那个许诺要抑制工会和镇压左派的右翼将军阿尔马扎恩(Almazan)时，对他是致命的一击。里维拉也感染

---

① 《反对派通报》1939 年第 77－78 期；《新国际》1939 年 8 月。

② 同上，1 月。

③ 托洛茨基致巴黎的国际书记处，1938 年 6 月 12 日。

了"恐斯大林症病毒"。(不过,他的政治行为是如此怪异,几年后他竟又悔悟地回到了斯大林信徒的行列中。)托洛茨基担心卷入墨西哥的政治,无论如何他与眼下里维拉所支持的反斯大林运动与反卡德纳斯总统的行为没有任何瓜葛。他试图说服里维拉,但失败了。在社会舆论中,他与这位艺术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地亲密,除非公开决裂,否则托洛茨基是绝没有办法与艺术家那种政治怪癖摆脱干系的。托洛茨基为此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对里维拉在总统选举中的立场表示遗憾。他声明,今后他不再与后者保持"道义上的一致",也不再接受他的殷勤款待。[①] 然而,当斯大林主义者攻击里维拉"卖身投靠反动派"时,托洛茨基却为他洗刷见利忘义的罪名,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这位"天才"的赞赏:"无论他的艺术,还是他的人格,都不会由于他的政治失误而染上丝毫污点。"[②]

与里维拉的决裂以及离开"蓝屋"使托洛茨基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困境。他的生活来源急剧减少,只要他不必为头上的屋顶付费,这本来是无所谓的。而现在他不得不绞尽脑汁自谋生路了。眼下他就得跟朋友借钱。[③] 他着手写斯大林的传记。但是工作常常中

---

① 参见1939年1月11日托洛茨基发表于墨西哥报刊上的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另见范·海耶诺特在托洛茨基指示下给勃勒东的信,信中将决裂之事通知了他(1939年1月11日)。勃勒东在6月2日给托洛茨基的信里不肯表明他在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的争执中站在哪一方。

② 1939年1月30日托洛茨基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写的文章《不学无术不是革命的武器》,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告诉我此事的是一位墨西哥的俄裔出版商和书商,一位俄国革命者的后代,托洛茨基在不同时候的债主。我还听到一些有关托洛茨基流亡生活中"经济方面"的离奇故事。比如,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托洛茨基从美国的银行里提取了大笔款项,是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以自己和托洛茨基的名义开的户头,当时考虑到布尔什维克万一失败,就必须在国外重新开展革命斗争。假如真是这样,这故事就太有趣了。可惜不是真的。

断,进展很慢。他的出版商们由于没有得到他的《列宁传》的书稿而感到失望,不肯轻易预支稿费。[1] 托洛茨基曾想写点儿通俗性的小书,若能畅销,他就能从报刊杂志的苦役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商议出售他的档案。他十分希望将自己的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要价几乎低得可笑。然而未来的买主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商谈拖了一年多。[2] 甚至在报刊杂志上,他的行情也大幅度看跌;著作代理人常常发现很难安插他的文章,尽管他写到了许多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如慕尼黑、苏联军事力量现状、美国外交、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的作用等等。[3]

经济困境使他与《生活》杂志发生了一场稀里糊涂的争吵。[4] 1939 年 1 月末,杂志的一位编辑根据伯纳姆的建议来到科约阿坎,请托洛茨基写一篇有关斯大林的特写以及列宁之死的文章。(托洛茨基刚好完成了《斯大林》一书的一章,他在其中推测斯大林毒害了列宁,并打算把这种看法交由《生活》杂志发表。)他的第一

① 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其中包括了托洛茨基与出版商们的通信、经费使用情况的报告、账单等等,清楚展示了 1939 年他的经济困窘。例如,道布尔迪出版社在 1939 年曾为《列宁传》一书预支给他 5000 美元,此刻追要书稿。它在 1936 年为《被叛卖的革命》一书同样预支给他 1800 美元,稍后又预支给他一笔较少款额。但到了 1939 年,书的销售却未能抵偿预付款。1938 年上半年,托洛茨基为《斯大林》一书与伦敦的尼克尔森-沃森出版社和纽约的哈珀斯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在年底,哈珀斯出版社以他延付部分书稿为由拒绝预付稿费。

② 托洛茨基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 年 1 月 11 日。1940 年 3 月,哈佛大学愿出价不多于 6000 美元买下档案。最后,大学用 15000 美元买下了档案——比起它本身的"价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③ 在托洛茨基写的许多被英美出版商认为没有"新价值"的文章中,就有一篇 1939 年夏初写的文章,谈的是斯大林打算与希特勒签署条约。

④ 参见托洛茨基致詹·伯纳姆,1939 年 9 月 30 日;他与《生活》杂志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篇文章10月2日在杂志上登了出来。尽管这只是一篇未加褒贬的回忆录,但是文章还是招致了彻头彻尾斯大林主义化的“自由派”的愤怒,他们激烈的抗议淹没了编辑部。《生活》杂志登出了其中一部分抗议,这令托洛茨基很恼火。他肯定说,是纽约的“格别乌策划了”这些抗议来诽谤他。虽然如此,托洛茨基还是送去了自己的第二篇文章,但《生活》杂志却拒绝发表。具有讽刺性的是,编辑部的反驳却是十分合理的。他们感到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毒害列宁的推测缺乏说服力,于是请他“少点儿推测,多点儿事实”。托洛茨基威胁要以违约起诉《生活》杂志,在愤怒驱使下,他将文章转交给了《星期六晚报》和《矿工报》,但在那里也吃了闭门羹。这篇文章最后是《解放》杂志登出来的。令人惋惜的是,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折磨人的和无益的通信耗去了托洛茨基生命最后一年中的大量时间。《生活》杂志最终还是为这篇拒载文章支付了稿酬。托洛茨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些钱及其他一些不多的收入,在经济上能“保障”他“好几个月”,使他能够把出售档案的交易拖下去。

※ ※ ※ ※ ※

1939年2月或3月,在科约阿坎远郊区的阿文尼达－维纳的一条偏僻、尘土飞扬的石铺长街旁,托洛茨基租了一幢房子,两边只有很少几间农舍。房子很旧,盖得很粗糙,但很坚固也很宽绰;而且房宅本身带有庭院,有厚墙隔开马路与近邻。托洛茨基刚搬入不久,就有了“格别乌想把这块地产买到手”的传言。为了防止这一点,托洛茨基自己买下了房子,尽管为了“生平第一次置办不动产”他不得不去筹钱。考虑到斯大林分子欲采取人身暴力的不断威胁,加固房子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看起来是必要的。过了不久,大门旁边就建起了一座瞭望塔,同时各个屋门也都立刻加固,

墙边堆起了沙袋并装上了报警器。5名警察在街上昼夜值勤,8到10个托洛茨基派成员守卫在房子里面。这些托洛茨基派成员生活在院内,他们在大门边站岗后再做秘书工作,还参加家庭活动,特别是晚间定期的辩论——除非拜访者的到来把白天都变成辩论的时间。

拜访者经常是一些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但更多的是美国人,他们大都是些激进的教育活动家、自由主义的教授、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偶尔会有几个众院或参院的议员,当然,还有托洛茨基派成员。讨论涉及到极其广泛的问题,从辩证法和超现实主义到美国的黑人状况,从军事战略到印度的农业或者巴西、秘鲁的社会问题。每一位拜访者对托洛茨基都是新知识的一个来源。他听着,问着,做着笔记,争论着,又重新提问。他的好奇心与吞噬事实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他的卫士们为他随随便便会见陌生人而捏着一把汗,但又无法可想。只有当他将好奇心转向近在咫尺的周围环境和望着马路对面的简陋农舍想搞清楚那儿的人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对土地改革是怎么想的"时,卫士们才制止他。他们觉得,托洛茨基在他们护卫下去乡间远足都比跨出大门在房子附近游逛要更安全些。

每次去乡间远足都是突然进行的,并且极其秘密。他通常都是乘坐汽车,由娜塔利娅、朋友与卫士陪伴着。当他们穿过墨西哥城时,他必须坐在汽车最里面,蒙着脸,否则会让街上的群众认出来,不是受到欢迎就是遭到嘘声。如同在阿拉木图、王子群岛时一样,这类旅行都是"军事远征",长途跋涉、攀登和劳作。既然在墨西哥不太可能去钓鱼和打猎,他就培养了一种新的嗜好——在岩石重叠的锥形山上收集罕见的巨大的仙人掌。虽然托洛茨基的头发已经灰白,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显得早衰,但只要不生病,他就依然具有强健的体力。他还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在攀登峭岩

时,尽管托洛茨基背着“像剑一般锐利的”仙人掌的重负,最强壮的卫士仍然不容易跟得上他。一位秘书说:“有一次我们陪几位朋友到距科约阿坎大约380公里的塔马曾查尔去,指望能找到一些形状特别的仙人掌。但我们失败了。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在靠近墨西哥城的一处地方,列·达·发现了几株‘维兹纳加斯’。尽管我们到达那儿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但他仍决定停下来收集仙人掌。夜色十分迷人。列·达·情绪高涨,……他飞快地走在这一小群人中间,借着汽车的前灯刨挖仙人掌。”[1] 朋友们经常不得不冒着似火的骄阳跟着托洛茨基到处跑。当他在岩石间攀登时,他穿着法国农民蓝色上衣的身影在岩石背景上被衬得十分鲜明,一头浓密的白发则随风飘荡。娜塔利娅开玩笑地称这些远足是“做苦役的日子”。她回忆道:“他真是疯了,总是第一个跑出去,最后一个离开……就像被催眠了似的,开了头的事情不干完决不肯放手。”[2]

渐渐地,由于日益增长的斯大林的严重威胁,甚至这类远足也是十分冒险的了,托洛茨基的生活愈益局限于这堵半庭院半牢狱的大墙之内。他的体力活动方式和爱好也受到这种影响。他开始在自己的花园里栽种最奇形怪状的仙人掌,养鸡和兔子。连这类最悠闲的事情,他做起来也是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他在院子里能呆老半天,按“严格科学的”公式去喂兔子和鸡,照料它们,清扫鸡窝和兔笼。娜塔利娅说:“有时他感到身体不适,喂兔子对他都成了重活,然而对小动物的怜爱使他不肯罢手。”

---

① 卡尔·迈耶:《列夫·达维多维奇》,载《第四国际》1941年8月;查尔斯·康奈尔:《同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载《第四国际》1944年8月;阿尔弗雷德·罗斯默:《〈我的生平〉法文版附录》,载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② 娜塔利娅·谢多娃:《父与子》,载《第四国际》1941年8月;娜塔利娅·谢多娃、塞尔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

※　※　※　※　※

他那震撼世界的疾风暴雨般的往事如今已是那么遥远了，无限地遥远了；他跟娜塔利娅的孤寂又是多么难耐。只是偶尔出现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响起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而这只能又一次让人意识到，往事如烟、不堪回首。1939 年 10 月，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与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终于来到科约阿坎。他们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的朋友中的唯一健在者。直到 1940 年 3 月末，他们在阿文尼达－维纳他的家住了将近 8 个月。他们在温馨的谈话与回忆中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托洛茨基跟罗斯默一起披阅档案，给它分类，对旧文件反复掂量。有时老战士奥托·吕尔(Otto Rühl)也加入进来，他也是住在墨西哥的流亡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吕尔是德帝国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的两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另一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脱党的异教徒之一。在流亡生涯中，他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不参与政治活动，尽管也曾同意参加杜威的调查委员会。反审判过后，他开始经常拜访“蓝屋”，尔后又到阿文尼达－维纳来。托洛茨基很尊重他的科研成就，一直保持着与他的友谊，尽量帮助他。他们共同发表了《马克思活的思想》。[①]

在战争的最初几星期，他们 3 人的思绪自然又飞回到他们站在革命反对派立场上反对战争的那些日子，飞回到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那些日子。托洛茨基(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建议他们

① 托洛茨基建议美国朗曼－格林出版公司请写过马克思传的吕尔作为本书的唯一作者，并肯定说，吕尔是梁赞诺夫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出版公司同意让吕尔编选马克思一书的正文，但坚持要托洛茨基撰写前言。

发表一个新的宣言，以此象征两次世界大战中一以贯之的革命立场。虽然罗斯默同意，但因为吕尔既不同意也不想参与政治，因此"新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想法就放弃了。过去已经太遥远了，不仅没有回答，连回声也听不到了。

※　※　※　※　※

谢瓦跟随罗斯默一家来到了科约阿坎。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对找回来的外孙百般疼爱。自从他们在王子群岛失散以来，已经过去了7年。这些年来，小男孩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生活，监护人、学校和语言多次变换，以至都快把俄语忘光了。外祖父的巨大悲剧仿佛也在他那狭窄的童年范围内反映出来。失去父亲时，他差不多还在襁褓中，他刚到柏林和妈妈团聚，她又自杀了。后来，当了他父亲的廖瓦又突然神秘地死去，孩子成了家庭纷争的对象。他被偷走、藏起来，又被找到，最后被送到他只是依稀记得并被教诲应该热爱的外祖父身边。此刻，给搞糊涂的孤儿不安地望着他被领进来的这个奇怪的挤满人的家，这个家仿佛像个城堡，但已经散发出死亡的气味了。

跟随最尊贵的客人罗斯默一家，拉蒙·梅尔卡德尔-"雅克松"的邪恶阴影也爬进来了。这就是那位出席过在罗斯默家里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朋友"。有人说这位"雅克松"就是在那时或稍晚介绍给罗斯默夫妇的，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悄悄地跻身于他们的团体，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帮了他们许多小忙。罗斯默断然否定这一点，肯定地说只是在墨西哥才遇到他的，而罗斯默的说法得到了

"雅克松"本人的证实。[1]"雅克松"的表现十足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生意人、运动员、花花公子。他自称是石油公司的代理人,说他来墨西哥时恰值罗斯默夫妇也在这里。他躲在暗中,在好几个月里并没有去打探进入阿文尼达－维纳这座坚如城堡的房子的途径,然而早已准备好去完成自己的邪恶使命了。

※　※　※　※　※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在这些年里最后撰写的唯一大部头著作。这本他辞世后才问世的书由已完成的七章及大量不同的片断组成。这些片断是由编辑收集、补充并拼凑在一起的,并不总是符合托洛茨基的构思。因此,这本书缺乏托洛茨基其他著作所有的成熟与均衡,那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就算托洛茨基能活着完成这部著作,并消除掉初稿中的许多含糊的陈述与明显的夸张之处,《斯大林》仍然是他最差的一部著作。

托洛茨基丝毫未意识到,他为自己的对头与敌人充当肖像画家这一角色是在贬低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觉去完成的各种文字或杂志的工作会贬低自己的尊严。有人说,出版商跟他催要斯大林传记,而经济困难使他不得不让步。这不完全符合事实。对于他允诺完成的有关列宁生平的著作,出版商们即使不是十分感兴趣,起码也是相当感兴趣的。[2]假如对金钱的需要在促使他优先完成《斯大林》一事上起了一些作用,推动他的主要还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动机。他想趁着对邪恶的大清洗还记忆犹新时重新认识

---

① 阿·罗斯默:《解开托洛茨基谋杀案》,载《革命无产阶级》1948年第20期;阿·戈德曼:《刺杀托洛茨基》第11、15、25页上"雅克松"的供词。

② 托洛茨基与他的著作代理人柯蒂斯·布朗的通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

斯大林的性格;虽然他的自尊心和自负本来可以防止他成为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但他对这一任务的迷恋超过了这二者。这个超级该隐的主要特点如今已被揭露,但在某种程度上,托洛茨基自己对它也不甚了解。托洛茨基重新研究斯大林的特点,挖掘档案,在自己的回忆里搜寻着此刻看来又展示了新的意义和角度的那些场面、事件、印象。他极其多疑地审视着斯大林生平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处处揭露或重新揭露同一个恶棍。托洛茨基总结说,是的,搞大清洗的该隐还是那同一个该隐,他隐藏在那个政治局委员身上,隐藏在1917年前那个布尔什维克身上,隐藏在1905年前那个宣传鼓动员身上,甚至隐藏在那个梯弗里斯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小男孩索索身上。他描绘了一个偷偷摸摸爬向权力顶峰的阴险的、凶恶的、几乎坏到猴子地步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粗糙的、片面的,甚至是不现实的,但由于鼓舞作者的热情力量使然,它还是具有某种艺术性。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可怕怪物的残缺塑像。

即便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仍然能以自己通常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对待事实、资料和数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能将已判明的事实、结论、推测、传闻等等明确区分开来,因此读者能够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过滤出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的书呆子气使他的调查与分析方法过于繁琐,以至令人厌倦。他用无数文件把自己武装起来,竭尽全力批驳着斯大林的谄媚者与廷臣这一庞大军团,却不懂得这给了他们本来不配的声誉。但是,在刻画肖像时,他却大量地、甚至过于经常地利用猜测、假定与传闻了。他抓住每一件传闻或流言,只要它们能够证明或者推论出青年朱加施维里的残忍或背叛。他轻信斯大林昔日同窗、后来的敌人说的话。事隔30年或更长,他们在流放中所写的童年回忆录里说,"对于同志们的喜悦或悲伤,索索只知道讥笑嘲讽","对人或动物的同情心都跟他无缘",或诸如他从年轻时起努力去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密谋复仇为

目的。他引证斯大林对头们的证词,这些证词刻划的差不多是一个少年和成年的奸细。尽管托洛茨基不尽同意这类指控,但他却赋予它"意义",表明斯大林昔日的同志们认为这种事他是能做得出来的。[①]

不必在这方面举太多的例子了。当然,最惊人的是托洛茨基早先已提到过的关于斯大林毒害列宁的推测。托洛茨基说,在1923年,瘫痪在床丧失语言能力的列宁想自杀,请斯大林给他毒药。斯大林将此事通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回忆起当时斯大林脸上那种奇怪的表情,并在下列基础上推导出自己的指控:一年后列宁死得十分"突然",斯大林恰恰就在这段时间与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可能他已决心加速列宁的死亡"。"斯大林是否给了列宁毒药并暗示医生对他的康复不再抱有希望,或者斯大林是否采取了更直接的手段,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坚信,斯大林是不会消极等待的,因为当时他的命运千钧一发,而结果只取决于他的手稍微一动。"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将他以前多次讲过的一段故事又以惊人的新方式讲述了一遍。斯大林在列宁葬礼期间将他支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也许是担心,我会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会去问医生有没有下毒的事并要求进行特别检测。"他回忆道,等葬礼后他回到莫斯科才知道,医生们"无法解释"列宁的死,甚至两三年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回避任何关于此事的谈话,在回答托洛茨基的问题时"目光游离不定,躲避着我的眼睛"。但他本人并没有指出,他是在1924年就已怀疑或确信斯大林的罪行了,还是在大清洗期间、在亚戈达与克林姆宫的医生们被指控在其杀人阴谋中使用毒药之后他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倘若他早在1924年就已产生了这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1-12、53、100、116、120页。

种想法或怀疑的话,那为什么在 1939 年以前他一直没有讲出来呢? 为什么他甚至在列宁死后还形容斯大林是"勇敢的和真诚的革命者",而且不是对别人,而是对马克斯·伊斯特曼说的呢? 甚至在这部指控性的传记里托洛茨基仍持那种意见:倘若斯大林预料到党内斗争会以这样血腥的痉挛而结束,他也许永远不会挑起这场斗争。[①] 这样一来,他仍然是把 1924 年的斯大林当做一个虽然目光短浅但基本正直的人来看待的,这个人未必会毒害列宁。诸如此类的矛盾都说明,以这种具体罪行指控斯大林时,托洛茨基是将大清洗的经验反射到了 1923—1924 年。他总结说,即使是对列宁,斯大林这个列宁所有学生的刽子手当然也敢杀,并真的杀害了他。但是不难想到,列宁死亡之"谜"、投毒嫌疑、斯大林竭力逃避检验的伎俩——故事里所有这些地方都可能是廖瓦之死的移位。[②]

斯大林的个性是任何传记作者都面临着的一个难题。斯大林的性格无疑是大清洗最重要的因素,而传记作者的任务就是追踪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并揭示这种性格的各种特点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及什么范围内表现出来。一般来说,这类任务跟研究罪犯生活的学生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区别。犯罪倾向可能早就潜伏在该性格中了。然而在罪行实现之前却不能将之视为现实。当然,早在斯大林升上顶峰之前很久,猜忌多疑、爱搞密谋、对权力的肮脏欲望就已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但是多年里它们只是他的次要特征。在对待这些特点时,传记作者理应有一种敏锐的分寸感,注意他的个性的发展和环境与性格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托洛茨基描写的斯大林在这方面还缺少说服力:他的性格在

① 《斯大林》372-382 页。

② 同上,第 393 页;马·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 55 页。

1936—1938年与在1924年甚至1904年时似乎都没什么两样。这个怪物没有经过形成、成长、表现的过程——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羽翼丰满的。各种优秀品质与激情几乎让人完全看不到，比如理性的抱负和对被压迫者的某种同情，一个年轻人缺乏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加入先进的革命政党的。斯大林在党内地位的上升既不是由于品德也不是由于成就，因此他的一生就很难解释了。斯大林被选入列宁的政治局、参加只有少数成员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些都好像是偶然的。托洛茨基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升迁的过程是在难以窥测的政治幕后完成的。在一定的时刻，他那灰色身影突然从克林姆林宫的宫墙后显露出来——于是世界首次认识了一个大权已经在握的独裁者斯大林。"[1] 不过，即使是托洛茨基的分析也清楚表明，斯大林并不是这样登上前台的，起码从1918年起，在党的内部委员会里，他就是仅次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列宁在自己的遗嘱里评价斯大林是"中央两位杰出领袖"之一，这并非偶然。

无论是作为反对派领袖还是作为一个传记作者，托洛茨基都同样低估了斯大林以及有利于他的环境。他严正地指出："当今官方拿斯大林跟列宁相提并论，这简直是下流无耻。"然后又补充道："若就个性能力来说，斯大林甚至都不能跟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比。不管法西斯'思想'如何贫乏，这两人都是意大利和德国反动派的常胜将军，他们重整乾坤，表现出首创精神，鼓舞群众行动起来，在政治莽林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而斯大林却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值苏联进入计划经济的第二个10年，这些话即使在当时听起来也不实际。而数年之后，斯大林的作用

① 《斯大林》第336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背景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些话就更是不着边际了。"倘若我们想找出一些能跟斯大林相媲美的历史人物,那么我们要找的不是克伦威尔,不是罗伯斯庇尔,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而只能拉出墨西哥暴君波尔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或土耳其暴君穆斯塔法·基马尔·帕沙。"[①] 这里历史尺度和透视的缺乏令人感到惊诧与不安。

在这一类篇章中,到底是什么在牵动着托洛茨基的笔呢?很清楚,当然就是他对荒谬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极端愤怒与厌恶。他将斯大林贬低到实际情况以下的水平——这是一个独裁者,自吹为超人的僭越的暴君。托洛茨基这种做法为后人铺好了道路。多年以后,人们毁掉了斯大林纪念碑,把他的尸体扔出了红场的陵墓,从广场和街道上擦去他的名字,甚至把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托洛茨基深知这一切都会发生,因此他想起了尼禄。尼禄也同样被吹捧为神,但是,"他死亡之后,人们毁掉了他的塑像,他那镌刻在各处的名字也被抹掉了。历史的报复将比最强大的总书记的报复更有力。我认为,这是令人欣慰的。"由于斯大林最后的叛卖行为,托洛茨基正站在毁灭的边缘上,然而他却为即将来临的历史报复、自己死后的胜利而欣慰。他用沉甸甸的语言准备下这种报复,当做后人的神圣经文。他将斯大林看做是巨大真空的象征,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里,旧的道德已经崩溃了,而新的还没有诞生。

"朕即国家",与斯大林集权制度的现实相比,这句名言几乎可以算得上一条自由主义的公式了。路易十四将

① 《斯大林》第413页。

> 自己俨然视为世俗政权时代的国家本身与教会本身。集权制度却比君主专制和教皇权力走得更远……斯大林有理由说，他与“太阳王”不同，“朕即社会”。

托洛茨基仅用了一条警句就概括了斯大林同布尔什维克之间悲剧性的紧张关系：

> 基督的12个使徒中只有犹大是叛徒，然而他一旦攫取了权力，就会把其他11个使徒以及路加福音书作者所列举的70个小使徒统统都打成叛徒。

※　※　※　※　※

托洛茨基关于引发战争的各种事件、战争与革命的前途的评论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专题。在他这些著作里，他对国际形势中的各种战略因素及外交因素作了清晰而又几乎无可挑剔的分析，这跟他对革命前途的含混概念形成了比以往更让人惊诧的矛盾。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对世界的继续瓜分。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他看到“希特勒的力量（与弱点）在于……善于利用讹诈与恫吓，不惮拿战争来冒险”，而老牌殖民帝国却害怕武装冲突，因为它们除了大大赔本外，可能什么也赢不到。“张伯伦为了1/10个印度就将世界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全部民主出卖了。”在他看来，慕尼黑协议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成功也是如此，因为它消除了各资产阶级政府对欧洲革命的恐惧。斯大林的政策也具有同样效果：工人运动“就像石油或锰矿一样”被出卖了。斯大林也帮助资

本主义获得了自信。[①] 但是,美国的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张伯伦和斯大林害怕与希特勒对抗时,美国的双手却没有被捆住。然而,现在美国已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正上升为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它不可能保持其孤立主义状态。扼制德意志帝国与日本帝国的扩张对它来说性命攸关,因此它将被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早得多"。美国注定要在调停中起到大得多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倘若和平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话,那么获胜的美国就将全面操纵和平"。

不难想象,托洛茨基为什么向1939年8月的德苏协定倾泄了自己雷鸣般的抨击:大清洗的头子现在自我暴露是希特勒的同伙了。早在1933年托洛茨基就一再指出,再没有比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更令斯大林心满意足的了。现在,在红军群龙无首之后,对自身虚弱的恐惧将斯大林投入到希特勒的怀抱。托洛茨基在战争初期就指出:"当希特勒进行军事行动时,斯大林就给他当军需官。"[②] 托洛茨基补充说:然而,斯大林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第三帝国去取得胜利,而在于使苏联尽可能地置身于战争之外,争取时间在波罗的海国家与巴尔干半岛方面腾出手来。当斯大林跟希特勒在共产国际的掌声中瓜分了波兰的时候,托洛茨基评论说:"波兰将会复兴,而共产国际则万劫不复。"但即使在最猛烈地攻击斯大林的无

---

① 在标明日期为1938年9月22日的一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写道:"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苏联在外交上正试图跟德国接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尸体上的妥协……为希特勒发动战争创造了一个更有利的基础。张伯伦(来往于慕尼黑)的穿梭,将作为外交恐慌的象征载入史册,由于这种外交恐慌,分裂的、贪婪的、软弱无能的欧洲进入了一个将席卷全球的血腥屠杀的前夜。"另见《反对派通报》第71、74与75-76期。

② 论文《希特勒的军需官——斯大林》于1939年9月2日凌晨3时脱稿,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原则性与厚颜无耻时，托洛茨基也没有把整个罪过归咎于斯大林。他再次说："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关键在华盛顿"，为使斯大林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美国应该竭尽全力反对希特勒。在1939—1940年冬天的"骗子战争"期间他又重复了那种看法：法国和英国为了避免跟德国发生真正的军事对抗而正在对美国搞"军事怠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纵容希特勒去占领欧洲。波兰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流亡到法国。1939年12月4日，在法国陷落的数月之前托洛茨基就写到："谁知道法国政府会不会落到跟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等国政府一道去英国避难的地步呢？"他不能容忍纳粹分子取得"哪怕一分钟"的胜利的可能性；"然而，在希特勒的丧钟敲响之前，欧洲许多人将死于非命，斯大林不想列身其中，因此他害怕与希特勒过早地翻脸。"[①]

法国投降和几乎整个欧洲都屈服于希特勒的武装力量时，托洛茨基痛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制造这场灾难上应负的罪责。"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欺骗了工人阶级并败坏了它的士气。斯大林突然转向希特勒阵营，这使法国工人阶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争导致了方向的极度迷乱，引起了消极失败的情绪。"现在苏联正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上。斯大林政权在东欧攫取的领土与希特勒拥有并用来反对苏联的那些资源和能量相比，真是太微不足道了。[②]

表达这番意见后，托洛茨基又毫不退让地坚持这一点：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保卫它和反对它的那些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敌人。他甚至不否定斯大林有权跟希特勒做交易，尽管认为德苏协定并未给苏联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他宁愿苏联跟西方结盟。但是托洛茨基断言，苏联同谁结盟的问

① 《双子星——希特勒与斯大林》，引自托洛茨基档案。

② 1940年6月17日为报刊撰写的声明（《克林姆林宫在欧洲悲剧中的作用》），同上。

题只能在有利性的基础上解决,任何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则都不应该左右它的选择,因为西方毫不逊色于第三帝国,它也是紧紧抓住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不放的。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托洛茨基否定的不仅是对同盟者或伙伴所作的选择,而且还在于:斯大林错把这种选择当成一桩善行并宣称与该时的伙伴在意识形态上一致,却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吹捧苏—德"用鲜血浇灌的"友谊。他们的走狗对希特勒的兽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宣称波兰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他们的乌布利希(Ulbricht)之流的宣传家将自己全部"反帝"炮火指向西方列强。托洛茨基总结说,"斯大林主义"正是这样"对国际舞台施加了自己的反革命影响",这就是苏联工人阶级要全力打倒它的另一个原因。但是他又强调说,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工人国家仍然是事实,因此要保卫这个国家和反对各种外国敌人,对此要始终不渝。[1]

托洛茨基十分清楚他的思想又会让人觉得荒谬——然而现实生活本身难道不也同样很荒谬吗?斯大林根据与希特勒的协议吞并了波兰东部以后,就开始剥夺大地主的财产分配给农民,将工业与银行收归国有。为了保证对被占领土的军事监督,他把这个新的"防护甲板"装修得在各方面都适合于苏联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在斯大林跟世界上最反革命的一个强国的合作与竞争中,革命就这样派生出来了。斯大林一下子就实现了波兰与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所有纲领中提出来的主要要求,那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实现的。当然,占领地区的社会改革是苏联占领军一手炮制的,而不是出自波兰与乌克兰的劳动者——这是斯大林强加于东欧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革命中的第一站。他从经济上剥夺有产阶级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剥夺工人和农民,剥夺了他们言论

① 托洛茨基:《战争中的苏联》,载《新国际》1939年11月;《捍卫马克思主义》。

与结社的自由。[1]

托洛茨基蔑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方法"和他"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交易",但承认了在波兰东部地区社会变化"基本进步的"性质。他争辩说,斯大林之所以要在那里推翻旧制度,仅仅是因为在苏联存在着一个工人政府。正是这一事实阻止他与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做交易。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国家的革命动力现在已越过了苏联国境线。然而,托洛茨基做出这一论断就陷入了矛盾之中。难道他没有说过,斯大林主义所起到的进步与反动的"双重的"作用仅仅限于苏联国内,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却是"特别反动"的,也就是说试图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吗?难道这不是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的主要根据吗?他依旧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影响在广义上是反革命的,而波兰东部领土上的社会变革仅仅是一种局部现象。托洛茨基指出,与斯大林主义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败坏、对西班牙革命的叛卖以及他为希特勒的效劳相比,在西乌克兰(以及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夺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托洛茨基不断谈到斯大林主义的内外两方面的差别。他试图用下述事实来解释这一点,即在苏联内部,工人国家的因素(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革命传统)甚至可以穿透斯大林的官僚专制,限制斯大林的行动自由,而在"国际舞台"上,斯大林主义的行为却缺乏这类刹车装置,仅仅受自身狭隘利益所驱使,无所顾忌地遵从着自己的机会主义意愿。[2]

这个论断尽管有一定道理,却未能解决,或者说甚至掩盖了当时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碰到的困难,而由于最近10年里的各种事件,这些困难更是层出不穷。在实际生活中,托洛茨基

① 《捍卫马克思主义》。

② 《战争中的苏联》,载《新国际》1939年11月。

对斯大林主义的内部作用(局部还是进步的)与外部作用(整体上是反动的)所作的区别能有多少现实性呢?任何政府或统治集团能在同一时期内在国内具有一种特点,而在国外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特点吗?假如苏联的政治体制具有工人国家的性质,那为什么不能影响到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呢?工人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始终是反革命因素呢?

托洛茨基及其学生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者择其一:或者声称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政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具有反革命倾向的原因,因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捍卫苏联";或者假定,斯大林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继续起着双重(进步的与反动的)作用,而这与苏联体制的矛盾性相一致,与官僚专制下工人国家的存在相一致,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类矛盾时只能反对斯大林主义,但应该捍卫苏联。

托洛茨基的许多学生试图从这种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因为它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的新阶级。我们知道,这种思想在1921年曾流行一时,当时"工人反对派"首次在莫斯科表达过这种思想,尽管托洛茨基始终否定它,但它还是照旧吸引着他的一些追随者。1929年,拉柯夫斯基大大震动了他们,他指出,苏联已由一个被官僚畸形化的工人国家蜕化为一个官僚国家,仅剩下一点儿无产阶级因素的残余。[1] 托洛茨基详细引证了这个论点(作为《被叛卖的革命》部分论点的根据),但没有从中引出任何结论。托洛茨基的某些学生在深思,经过10年——这是怎样的10年——"无产阶级因素的残余"还剩下什么呢?他们问,现在再谈什么工人国家难道不愚蠢吗?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们就从托洛茨基的某些推测与暗示中

① 《反对派通报》1930年第15—16期。

寻找根据。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证实说，苏联经济部门的许多领导集团准备对工业实行非国有化并成为它的股票持有人，也就是说，斯大林的官僚们已蜕变为新的资本家阶级。几年过去了，仍没有这类演变的迹象。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社会的观念会不会是错的呢？他将斯大林官僚集团看做是形成新资产阶级和新资本主义的一股力量，这个官僚集团会不会是十月革命所产生而现在得到充分发展的新阶级呢？

就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意大利的前托洛茨基派成员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书《世界官僚制度》，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却很有分量。他在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正面回答。里齐是“管理者革命”思想的始作俑者，这个思想后来被伯纳姆、沙什曼、吉拉斯（Djilas）以及许多人以更为粗糙的形式发展了。他以托洛茨基《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的论据作为自己部分观点的基础，但仅仅是为了彻底否定后者的论据。里齐断言，苏联革命正像法国革命一样，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消灭不平等，但实际上只是以一种形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代替了另一种。托洛茨基惑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幽灵，未能认识到“官僚集体主义”已经作为新的阶级统治形式确立起来了。他拒绝将官僚集团看做是“新的阶级”，因为它不拥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积累利润。里齐的反驳是，但官僚集团确实拥有生产资料和积累利润，不过它是作为集体，而不是像昔日的有产阶级那样作为个人实现这一点的。“在苏联社会里，剥削者并非像资本家占有自己企业股息那样直接获得剩余价值。他们是通过国家间接地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先是汇聚了整个国民生产的剩余产品，然后再在自己的官员群中分配。”[①] 对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拥有取

① 布鲁诺·里齐：《世界官僚制度》。

代了资本主义的法律拥有，这种拥有是通过国家拥有并拥有国家本身实现的。这种新情况并非如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官僚主义过渡时期或者暂时的反动时期，而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正如随封建主义而来的并不是平等、自由与博爱而是资本主义一样，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也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雅各宾党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样。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受其鼓舞的工人阶级将失去自己的革命果实。

里齐继续说，既然官僚集体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及其经济，那么它的专制就意味着进步。因此它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斯大林体制中，而且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罗斯福的手中，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都同样会起到首要的作用。斯大林主义者、纳粹分子和“新政”的追随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注定蔓延全世界的新剥削制度的承载者。里齐的结论是，只要官僚集体主义还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无可非议的。工人阶级所能做的仅仅是他们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能做的事——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从新剥削者那里争取让步和改革。只有当新制度开始衰退、社会增长将要放慢并窒息时，他们才能重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这是比较遥远的前途，但并非是不现实的：官僚集体主义是人统治人的最后形式，而它距离无阶级社会又是这样近，因此，官僚集团作为最后的剥削阶级，是不肯承认自己是有产阶级的。[1]

当托洛茨基得知里齐表达的观点在托洛茨基派成员中间相当流行时，遂于 1939 年 9 月中旬写了《战争中的苏联》一文分析他的

---

① 布鲁诺·里齐：《世界官僚制度》。

论点。[1] 托洛茨基首先说："当我们在政治任务上还是一致的时候，若与那些在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识上与我们有分歧的同志决裂，那是一种荒谬愚蠢的举动。"至于对苏联是不是工人国家的论证，常常只是一种语言游戏——里齐起码有一个长处，即"将论证提升到历史普遍性的高度"。他认为，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新政"虽然面目不同，在实质上却是一回事。他在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划了等号（托洛茨基回答），在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的日子里，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不少人认为这个协定只不过表明了两种制度在统治方式上的极其明显的血缘关系；而且在里齐看来，以后纳粹与法西斯的政府（以及罗斯福政府）将合乎逻辑地完成自己对经济的监督，并将工业收归国有，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却断言，不管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在统治方式上怎样相似，两国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区别都是本质上的而不是数量上的。这是横亘在两种制度之间的鸿沟。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罗斯福，都不会也不可能比"部分国有化"走得更远，他们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附加一定的国家干涉而已。唯有斯大林对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了控制。当然，不同的国家与制度都会有官僚集团产生。然而官僚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如果说它存在的话，也只局限于个别国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产生的。

托洛茨基指出，因此，说有什么"普遍趋势"——官僚集体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这是很荒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甚至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或者某些这类国家）的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类似于斯大林体制的后果。里齐就是这样

① 《新国际》1939年11月；托洛茨基：《捍卫马克思主义》第8－11页。

认为的。对此,托洛茨基举出许多实际例子证明,主要是俄罗斯的落后、贫困与闭塞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抬头。俄国革命在环境的压力下走向了低谷,但没有任何理由推测,不论环境如何,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必然走向低谷。斯大林主义并非像里齐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只是历史中的畸形现象,不是革命的必然产物,而是对革命进程的偏离。苏联的官僚集团眼下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赘疣,赘疣有多么危险,这个官僚集团就有多么危险,但赘疣毕竟不是独立的器官。与里齐的观点相反,官僚集体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苏联的进步要用集体主义来解释,但不是官僚集团。当苏联还仅仅是借用、模仿和吸收优越的西方技术时,斯大林主义就可能存在。但只要越过这一阶段,社会生活需求就会愈益复杂,社会的首创精神就会复兴。官僚集团与社会首创精神之间的冲突将会日趋深化,因为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资本主义不同,官僚集团"不会成为"没有它就不能运行的"新经济制度的承载者"。相反,新经济制度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就必须摆脱官僚集团的束缚。

作为官僚集体主义全部理论基础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没有如马克思主义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然而,资本主义也没有表现出履行职责并长久生存的能力。因此某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形式必将替代它。但是,既然工人阶级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官僚集团能完成它,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将取代旧制度。托洛茨基同意这就是矛盾的焦点。[①] 苏联是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或者它的体制是否是官僚集体主义的体制,这只是次要问题。当他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想表明,它的潜力及各种因素就包含在苏联的社

① 托洛茨基:《捍卫马克思主义》。

会结构中。他从来就没有想到，就工人国家这个术语的通常的政治意义上，斯大林体制是工人国家。另一方面，也可以谈到"苏维埃的"官僚集体主义，并断定工人国家就潜在于其中。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既然工人阶级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官僚集体主义是不是就真能站住脚。

工人运动的道路充满挫折与失望，这是不争的事实。工人阶级未能切断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通向权力的道路。他们让人民阵线把他们领向失败，他们未能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应该怎样评价这些挫折？领导上的失误能够纠正吗？能否说工人阶级已经遭到历史的破产、已被证明没有能力去管理社会和改造社会？若是领导的错，那么只有一条途径——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新的国际领导。若是工人阶级本身的错，那么只好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宣称，社会主义要么是无产阶级实践的结果，要么什么也不是。那么马克思主义会不会只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或另一种形式的错误观念；它使被压迫阶级和政党确信，他们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时实际上捍卫的却是新的甚至老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当然与雅各宾党人的失败是同一类型的，是乌托邦与新社会秩序交锋的结果，而斯大林的胜利就是现实主义对幻想的胜利，历史进步的必然行动。

在自己的暮年，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苦苦反省着自己的一生与奋斗的目标和意义，当然也是几代战士、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奋斗的意义。整整100年的革命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他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个事实：无论在俄罗斯境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未能推翻资本主义。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革命失败的那苦涩长链的每一环节。他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这份清单上又增添新的重大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整个历

史前途就的确有问题了。为此,他作了一次极其夸张的声明,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大雄辩家与实干家身上,而他们的这类声明总是立即引起不尽的轰动。他声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最后的考验。这个考验将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战争没有在西方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取代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就的确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的官僚式与独裁式的剥削制度。如果西方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但又不能保持它,而是像俄国工人那样把它拱手让给特权官僚集团,那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寄予无产阶级的希望是错误的。那时就应以新的眼光看待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崛起:"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根源不在于国家的落后,也不在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就必须抛弃怀旧的观念,承认今日的苏联是普遍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这种前景……不管怎样令人沉重,……也应毫无保留地公开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纲领已成为一种乌托邦。"[①]

恐怕唯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充分理解托洛茨基这些话里的悲壮。当然,他是在激烈的辩论中说这番话的,但即使在激烈的辩论中,他也从未如此认真地考虑过社会主义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他以痛苦的精确性指出这种考验的条件,坚持认为最后的"考验"在近几年里到来。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那就需要新的最低纲领——捍卫处于独裁官僚制度下奴隶的利益。"这种声明对于托洛茨基是十分典型的:倘若未来为人类准备的依旧是官僚奴隶制度,那么他和他的学生们将站在奴隶一边,而不站在新的剥削者一边,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

① 《新国际》1939年11月;托洛茨基:《捍卫马克思主义》。

样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终其一生都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已被科学判定是不可避免的,坚信历史将站在为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的解放而战的战斗者的一边,如今他又号召自己的学生们继续站在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一边,哪怕历史和所有的科学结论都反对他们。不管怎样,他要站在斯巴达克斯们一边,而不是站在庞培们和凯撒们一边。

但是,在探讨这种阴暗的前景时,托洛茨基并没有与它妥协。他问道,关于工人阶级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并改造社会的观点,有充分的证据吗?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他的某些学生,从未见过革命中的工人阶级。他们只见过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或者只认识处于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不用说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只局限于失败与沮丧了。他们怀疑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这丝毫也不足为奇。但他已经见识过1917年的俄国工人,而且还领导过他们,他怎能怀疑他们的政治能力呢?"在世界普遍反动的这些年里,我们应该把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作为出发点。"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智慧与革命能力无疑也隐藏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身上。因此,十月革命对于未来仍然是"巨大的财富"和不可估量的保障。"最近一连串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工人阶级,而应归咎于他们的保守而又相当资产阶级化的领导人。""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俄国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推出了最有远见的、最英勇的领袖,同时,在大不列颠这个最古老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度,无产阶级甚至今日也只有思想贫乏的、奴颜婢膝的领袖。"但是,领袖来了又去了,而社会阶级却留存下来。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该努力去重新获得领导权,并依靠"劳动群众要从血腥的资本主义混沌中摆脱出来的有机的、深刻的、不可遏止的意愿……"。

他重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出于早年朝气蓬勃的

乐观主义,而是出于久经考验后更加坚定的忠诚:

> ……我们时代的基本任务并不因为还未实现而改变。……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丝毫权利(倘若不把绝望与颓唐也认为是权利的话)下结论说,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潜能,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当谈到经济与文化制度中最深刻的变革时,历史长河中的25年并不比人一生中的1小时更长。一个人怎么能因为在1个钟头或1天里碰到了一点儿挫折就放弃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呢?
>
> 如果这场战争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对此坚信不疑——那么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集团的垮台、苏维埃民主在远远高于1918年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复兴。到那时,关于斯大林官僚集团是"新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的问题就会解决了……每个人都会明白,在国际革命的广阔进程上,苏联官僚集团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倒退。

由于"偶然的倒退"就给苏联"打叉"并因此迷失整个历史前途,这是不可饶恕的。苏联,暂时只有它在自身中包含了复兴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一经济基础,因此就要保卫它。"我们保卫苏联什么呢?不是那些令人想起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是使它与之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不是特权与压迫,而是社会主义因素。这个立场"绝不意味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集团有什么接近、赞同它的政策、或者与斯大林的政治同盟者的政策和解。……我们不是执政党,我们是不屈的反对党。……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教育工人……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到底要捍卫什么和推

翻什么。”

托洛茨基又回头谈到斯大林在波兰东部的行动。他指出，假如斯大林在那里维持了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那么，就必须全面反思苏联国家的性质了。但是斯大林正像拿破仑一样行事，当他在国内驯服了革命以后，却又用刺刀把它输送到国外。（托洛茨基在这里默默地修正了关于斯大林国际政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性质的论点。）当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我们曾经并仍然反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新的领土扩张。我们主张苏维埃乌克兰与……苏维埃白俄罗斯的……独立。同时，在被苏联红军占领的波兰国土上，第四国际的追随者们应该积极剥夺地主与资本家、分配土地给农民、建立苏维埃和工人议会，等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应该为通过选举保证苏维埃及工厂委员会对官僚集团的完全独立性而斗争，应该本着不信任克里姆林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去进行自己的革命宣传。”

托洛茨基无法给自己在波兰与乌克兰的追随者们提出任何其他建议并同时保持忠于自己。不过，他们也毫无实现他的建议的任何机会。他们太弱了，丧失了阵地，同时格别乌在一刻不停地镇压着他们。他们也跟托洛茨基一样，被困在行动的必要性与不可能性这种怪圈里了。

※　※　※　※　※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5月底，也就是对托洛茨基住宅进行武装偷袭之前。詹姆斯·伯纳姆、马克斯·沙什曼等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也持与里齐相似的观点，但表述得不如他透彻。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斯大林—希特勒协议的

签订，这些观点很快成熟了。1939 年 9 月初，伯纳姆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民族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指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再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了。"[①] 月末，沙什曼提出一项议案，谴责苏联对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式"占领，否认占领具有任何托洛茨基所谓的进步后果，并要求党拒绝承担自己那一份保卫苏联的义务。伯纳姆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沙什曼则是党内很受大众欢迎的发言人，他们对托派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此之前，他们是从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去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是资产阶级政府——就算它们是民主的政府——发起的；而且他们保证捍卫苏联，不管它与哪个帝国主义阵营结盟。对于伯纳姆和沙什曼这样的人，战前从理论上宣传这类观点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苏联将会成为西方民主派的同盟。但在斯大林—希特勒协议签订和战事开始之后，许多事情就变了。即使在美国中立的那几年，美国的情绪也是倾向于对英国与法国审慎的同情和对德—苏协定的强烈厌恶。甚至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很难同这种情绪对抗。伯纳姆和沙什曼不能不察觉到，倘若他们继续"捍卫苏联"，就会引火烧身。然而，要放弃"捍卫苏联"，他们就必须沿用马克思主义的习惯方式宣称：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而不过是另一个拼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革命列强。倘若说里齐还论证了官僚集体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话，那么伯纳姆和沙什曼则否定了任何此类优越性。论证的逻辑将他们推得更远，苏联经济中任何进步的东西都被否定了。他们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反对工业全民所有制，反对国家计划经济，宣称这一切都是官僚集体

① 参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公报》与《新国际》1939 年 10－12 月。德·麦克唐纳：《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17－19 页。

主义和独裁奴隶制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基本纲领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指责，包括辩证法与伦理学。伯纳姆和沙什曼，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抛弃了纲领。这是不折不扣的“知识界逃跑”的继续，而他们不久前还以此为理由在《新国际》上撰文攻击过伊斯特曼、胡克等人。区别仅在于攻击者现在加入到逃跑者的行列里去了。

在批判里齐时，托洛茨基已说完了在这场争论中所能说的一切。与伯纳姆和沙什曼的争论是在相当低的政治思维与风格的水平上展开的。这场争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在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身上压抑已久的沮丧与悲观终于爆发出来，而托洛茨基对他们的反击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论战。①

未到1939年年末，当斯大林命令自己的军队进攻芬兰时，所有争论的问题一下子尖锐起来。在自己的评论中，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对芬兰进行的“愚蠢的外行”战争，说它不但使红军遭到了屈辱的失败，还招致了全世界的愤怒。② 然而托洛茨基却坚持一点，即斯大林在芬兰加强苏联薄弱的侧翼以抵御希特勒可能的进攻这种意图是合情合理的；任何苏联政府，只要处于斯大林当时的境况下都不得不靠芬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但是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咎由自取的）。工人国家的战略利益理应超过芬兰的自决权。③ 既然斯大林对芬兰的入侵导致了同盟国进行的“战争转换”和援助芬兰的武装干涉，因而托洛茨基更坚决地号召“捍卫苏联”。这在他昔日的学生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① 在这场论战中，托洛茨基最重要的那些声明都收集在他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② 托洛茨基关于芬兰战争的评论刊登在美英两国的许多报刊上，他在1940年3月写的《芬兰经历之后的斯大林》一文中对这些观点作了总结，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托洛茨基：《捍卫马克思主义》第56－59页。

"难道托洛茨基成了斯大林的辩护士？难道他想让我们也成为斯大林的代理人？"伯纳姆回答："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不想同格别乌共同战斗去拯救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①]

这一类的言论好似回声在重复着托洛茨基以前的声明，那时他谴责大清洗，号召"每一个诚实的人"揭露格别乌的歹毒阴谋并"用烧红的烙铁烫掉斯大林主义的毒瘤"，他痛斥苏联的那些"朋友"借口工人国家的神圣利益而对斯大林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即使在最激烈的辩论高潮中托洛茨基也一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他本人及其拥护者们都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反对它的外部敌人。然而他的不少拥护者起初只把这类声明看做是虚张声势，而当他们发现他是当真的时候，不禁大为气馁。他们谴责托洛茨基自相矛盾、耍两面派，甚至指责他是在叛卖。他们搜遍他的所有论据，寻找最薄弱的环节，从中引申出自己的理论。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关系"上仅仅是反动和反革命的因素，这难道不是托洛茨基说的吗？怎么他现在又大谈什么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扩张具有"进步的、革命的后果"？他曾谈到过苏联的"新阶级"和官僚集体主义，指责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声称，若认为在任何一个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国家里会有任何新形式的剥削，那是荒谬的。然而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声明说，倘若即将到来的几年里社会主义在西方遭到失败的话，官僚集体主义就将作为一种普遍的新剥削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吗？如果官僚集体主义可以作为普遍的新剥削制度，那么为什么它就不能作为苏联的公有制度呢？当他声明说，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人阶级还未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① 这场争论发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在它的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它在1939年12月发表了多数派的决议与少数派的决议），最后是在《新国际》上。

就将破产，难道他这不是对自己的所有拥护者最沉重的打击吗?[①] 他们曾亲自目睹托洛茨基的许多预言得到了证实，因此他们对他这个预言也不会等闲视之。在随后的那些年里，托洛茨基一些忠实的、天真的学生一直梦想着革命，搜寻着西方发生革命的迹象。而怀疑论者与犬儒主义者（当时或稍晚）却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的话应验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官僚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伯纳姆最先说出了这个结论。当他觉得自己驾驭着历史潮流的时候，他曾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最凶猛的敌人”。然而，托洛茨基无意中使他确信，管理者阶层将升上这个浪尖，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抛掉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压舱物，预言“管理者革命的到来”。[②] 沙什曼同意伯纳姆的这个预言，但由于更依恋马克思主义，他看待这种前途时与其说带着喜悦，毋宁说是悲哀，并试图将旧日信念的一点儿残余与之调和起来。[③]

伯纳姆和沙什曼用借自《被叛卖的革命》中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术语提出了相当坚决的论点；两人都宣称要捍卫托洛茨基主义而反对托洛茨基本人。老师套用马克思的话回答说：“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④] 但是，为了反驳他们的论据，他必须至少含蓄地拒绝为他论战中的夸张和过火负责。托洛茨基

---

① 托洛茨基评论道：“显然，当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谈到‘官僚集体主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时，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惊讶。他们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参见《捍卫马克思主义》第 30 页。

② 参见伯纳姆的文章《科学与风格（答托洛茨基同志）》（在托洛茨基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里作为附录）；《绝望的政治》一文，载《新国际》1940 年 3－4 月；以及他的《管理者革命》一书。

③ 沙什曼的文章《美国党的危机——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与《苏联与战争》，起初登在《国际通讯》上，然后在《新国际》上转载，1940 年 3－4 月。

④ 《捍卫马克思主义》第 168 页。

在一封信里写道："同志们对斯大林—希特勒协定感到愤怒，这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想报复斯大林，这很好。但是今天我们很弱小，我们还不能马上推翻克里姆林宫。于是有些同志就想在语言上得到发泄：他们要剥夺苏联的工人国家的称号，就像斯大林剥夺失宠官员的列宁勋章一样。亲爱的朋友，我认为这多少有点儿像儿戏。马克思主义与歇斯底里是水火不相容的。"① 尽管他本人深受斯大林的迫害，但没有什么比他看到自己的学生的评价也感染了憎斯大林症更让他痛心的了，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都在说服他们不要"陷入歇斯底里"，要坚持"客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分裂成了两派：由詹姆斯·P·坎农领导的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多数派"和追随伯纳姆与沙什曼的"少数派"。托洛茨基劝他们大家都要克制、要宽宏大量。他一方面鼓励坎农派积极与伯纳姆与沙什曼论战，但一方面他又警告说，斯大林的奸细将会在他们当中拼命煽风点火。他建议，可允许少数派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甚至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组织派别进行活动。他警告说："倘若有谁建议开除伯纳姆同志……我坚决反对。"② 即使少数派举行了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劝多数派不要把此事当做把他们开除出党的理由。

但是少数派仍然自行决定成立了新党，并掌握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月刊《新国际》。然而新党也几乎刚一成立就陷于分裂，因为伯纳姆与党决裂并发表声明说："凡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切重要思想流派——如改良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

---

① 《捍卫马克思主义》第23页。

② 同上，第97、101、148页。

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的变种，没有一个是我能在其传统形式上同意的。我认为这些流派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过时的，或者是无意义的。”这真是近几年里出自托洛茨基派一位重要人物之口的惊人坦白。才不过几星期之前，伯纳姆及其朋友还为托洛茨基对他们作出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式的评价而感到委屈。而此刻伯纳姆却声称：“如果考虑到我的信念与利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已经好几年没有我的合适位置了。”[1] 不管这是真是假，也不管未来的《管理者革命》的作者这种做法是为了使自己思想上 180 度的转变不要显得太突然，或是这些年来他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伪装的积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之，在托洛茨基驳斥伯纳姆的话里找不出任何有损他声誉之处，倒是他画的自画像糟踏了他自己。在此事之后，托洛茨基并没有为失去这样一位不光彩的“学生”而伤心。托洛茨基在私人通信里用了一些绰号来形容他，最温和的一个是——“智力上的势利眼”。[2] 托洛茨基等待着别人也步伯纳姆的后尘：“德怀特·麦克唐纳——不是势利眼，只是有点儿傻……他像伯纳姆一样抛弃了党，只是因为他有点儿懒，才落到了后面。”但是与沙什曼的决裂却深深刺伤了他的心，托洛茨基对他很有好感，尽管常常为他的“矫揉造作”、“肤浅”等等生气。他们的关系早在 1929 年初沙什曼访问王子群岛时就开始了。经过多次接触、信件往来以及沙什曼表现出来的热忱，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在当时的派别斗争中，托洛茨基当然是支持坎农的，但在私交上他感到自己与沙什曼更密切。在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给后者写信说：“倘若可以，我会即刻坐上飞机到纽约去，跟您谈上 48 小时或 72 小时。我很

---

① 《捍卫马克思主义》第 207－211 页。

② 同上，第 181 页。

遗憾，您没有感到这种必要……到这儿来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您会这样做吗？那我将十分高兴。”①

可以说，这场分裂葬送了第四国际，如果说这样一个虚幻的组织还能够被葬送掉的话。托洛茨基相信，“小资产阶级和名利之徒”离去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可以把根扎得更深。事实上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只剩下一个小工会，其成员虔信托洛茨基学说的每一个字，而后来则是对他的回忆，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从未能产生什么影响；而它的对头沙什曼派甚至连这些能使最弱小的派别维持几十年的优点都没有，遂愈益远离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直至其瓦解与消失。② 其他各国的托洛茨基派也受到影响，因为不管在哪儿，特别是在法国，都有大批成员同意伯纳姆与沙什曼的观点。

这样，托洛茨基在晚年最后一次目睹了他滚上险峻高山的巨石重新滚回了山下。

※　※　※　※　※

1940年2月27日，托洛茨基开始写自己的遗嘱。他原先已经拟过几个提纲，但只是为了从法律上确认娜塔利娅和廖瓦继承他的著作版权。现在起草的文件则是托洛茨基最后的真正意愿和遗嘱；文件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末日感。他写遗嘱的时候设想自己或者自然死亡，或者死于自杀——却没有想到会死于刺客之

① 《捍卫马克思主义》第64页。

② 沙什曼和他的派别从那时起就断然正式地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加入了诺尔曼·托马斯领导的社会民主派，这一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手。“我的血压高（而且还在上升）蒙蔽了周围的人对我实际状况的了解。我现在精力充沛，还能工作。但末日显然已经临近了。”在他注定还能活的6个月里，他的健康虽然像往常一样时好时坏，但还不至于坏到让他说出这种不祥的预言来。在注明日期为3月3日的信里，托洛茨基再次说：“此刻我感到由于血压高而精力旺盛。但这维持不了多久。”他怀疑他的动脉粥样硬化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怀疑医生对他隐瞒了真相。列宁临终前的病状及其长期瘫痪的情景显然不时地浮现在他眼前，因此他声明，为了免除濒死之前的痛苦，他将要自杀，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儿，“缩短……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但他又希望，死亡会借助脑溢血突然降临到他身上，“这是我能期待的最好结局”。[①]

托洛茨基无意中使自己的遗嘱与列宁的遗嘱有些相像。二者都是由正文和几天后增补的附录组成。但是在内容上，两份遗嘱却反映出环境与性格的鲜明对比。列宁的意愿绝对是非私人性质的。他将自己的意愿以信件的形式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而且，他只字未提甚至也没有暗示他是由于想到行将来临的死亡才动笔的。尽管他为严重的困难而焦虑，却无意将自己的遗嘱写成一份教义，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则与信仰将会不言而喻地被接受。列宁最忧虑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危机（他知道这将由他的死而引起）以及对之采取什么预防手段和方式。他把自己对党的每位高层领导人的优缺点的想法都告诉了党。他向党提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列宁都是伟大运动的领袖。而托洛茨基的遗嘱却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他扼要指出，他不需要反驳斯大林“愚蠢的恶意”诽谤，因为他的革命声誉“没有丝毫的污点”，新的“革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39－141页。

命一代"将为他和千百个其他牺牲者"恢复政治名誉"。他用一句话来感谢那些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仍然信任他的朋友们和拥护者们，但没有给他们任何建议——遗嘱里丝毫没有提到第四国际。文本几乎有一半是写给娜塔利娅的：

> 在作为社会主义斗士的幸福之上，命运又额外给予我作为她丈夫的幸福。在我们差不多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是爱、宽宏与温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她毕竟看到了幸福的日子。

他中断了对她的颂辞，开始表白信念：

>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我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却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写完这几行后，他向窗外望去。娜塔利娅正朝房间走来，她的身影触动了他的灵感，于是他用充满诗意的段落作为结束：

> 娜塔莎刚刚从院子里走到窗户跟前，她把窗户开得更大，以便空气能更自由地流入我的房间。我能看到墙边青草的那一抹翠绿，墙上方湛蓝的天空，洒向各处的

阳光。生活是美好的。让后来的人们把它里面的邪恶、压迫和暴力清除干净，尽情地享受它吧。

他在附录里把自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娜塔利娅，并用这样的话开始了另外一段："如果我们两个都死了……"；然而这一句没有写完，留下了一处空白。在3月3日的补充里，他又重新谈起自己的病情，叙述了他跟娜塔利娅不止一次同意的事：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让衰老把他们变成一具活尸。"我保留自己决定死亡时间的权利……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至死也不会动摇。对人类及其前途的这种信念，即使是现在也给了我坚强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都无法给予我的。"[1]

※　※　※　※　※

现在，斯大林决定再也不能让托洛茨基活下去了。这可真是怪事。人们要问，他到底还怕什么？他不是已经消灭了托洛茨基所有的后代甚至他们的家庭，以至再不会有复仇者了吗？茕茕孑立的托洛茨基从地球的另一端能把他怎么样呢？早几年斯大林还可能担心托洛茨基在国外领导一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现在，难道他还不知道第四国际已经消亡了吗？

问题就在于斯大林还不能放心。他无法使自己相信他用暴力与恐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所有欲望，老布尔什维克的阿特兰提斯洲的确消失了。他审视着那些向他欢呼的群众的面孔，猜测他们的谄媚中是否隐藏着刻骨的仇恨。毁灭了或摧残了这样多的生命，处于这样多的不满与绝望的包围之中，谁能说出会有什么样

---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流亡日记》第139－141页。

的不可预见的战争火山在等待着他？阿特兰提斯洲会不会又带着新的居民，然而又带着旧日的挑战重新冒出来呢？即使第四国际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但谁又能说战争的大洪水不会改变政治的地平线呢？什么样的山峰它不能削为平地，什么样的小丘它不能造成巍峨的峻岭？所有那些前景，在托洛茨基的愿望中是多么现实，在斯大林的恐惧中就多么现实；而活着的托洛茨基就是它们从不安分的最高代表。他还是阿特兰提斯洲的喉舌，仍然在喷发着它不息的全部激情与全部战斗的呐喊。当芬兰战事结束时，正值希特勒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法国投降，他的声音越过大洋，谴责着这些灾难的后果，谴责着斯大林造成这些灾难的罪愆，谴责着威胁苏联的道德堕落。不错，他的控诉、谴责与警告，苏联人民是听不到的；然而它们却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传播着；当战争向东方蔓延时，它们也必然能趁着军事上的失败和撤退的骚动与混乱而渗透到那儿去。

1940年4月底，托洛茨基发表了致“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一封信，标题为《你们受骗了》。据说印有这封信的一份传单被一位同情者水手夹带进了苏联；但此信到没到达目的地却很难说。[①] 信中句句都是炸弹。他告诉苏联的工人和水手：“出于该隐—斯大林和他的委员、书记及格别乌伙计们的利益，你们的报刊一直在向你们撒谎。”“你们的官僚在家里是嗜血的、残忍的，而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却是怯懦的。”斯大林的丑行使苏联在国外正日益失去同情，使它陷于孤立，加强了它的敌

① 我引述的文本标明日期为1940年4月23日；托洛茨基档案。大约在德国入侵挪威之前不久，一位德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瓦尔特·黑尔德离开该国，试图取道苏联与日本前往美国。但还在途中他就销声匿迹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在苏联被逮捕并处决了。可能——但不很确定——他想将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苏联人民。

人；这些丑行就是"苏联最主要的危险根源"。他号召工人和士兵们"永远不要向资产阶级投降，永远不要放弃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经济，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建设起一个更幸福的新社会"。"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誓死捍卫工人阶级争得的每一个阵地……民主权利、工资等级以及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样巨大的成果。"但若要使十月革命的这些成果有利于人民，他们唯有证明自己能像当年对付沙皇官僚一样去对付斯大林的官僚才行。不，斯大林绝不允许托洛茨基号召叛乱的声音继续这样响下去了。

几位前格别乌官员和外国共产党人后来讲述了对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偷袭的准备情况。[①] 在西班牙内战末期，格别乌的一些专门负责"消灭托洛茨基主义"的机构转移到了墨西哥。墨西哥的斯大林派不遗余力地煽动群众对"龟缩在科约阿坎的卖国贼"的歇斯底里情绪。他们一天到晚除了攻击他阴谋反对斯大林，还攻击他为了美国石油大王的利益阴谋反对卡德纳斯、在墨西哥策划总罢工和法西斯武装政变。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指斥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姑息态度"，并把他们都降了级。于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进一步升温；而托洛茨基本人所犯的一件小过失也帮了敌人的忙。就在1939年末，他同意去美国到众议院一个所谓戴斯委员会作证。这是一个开展"非美活动调查"的组织（它的行事方式正是后来麦卡锡参议员在50年代大肆"迫害异端"的先声）。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戴斯要求取缔美国共产党，理由是它是外国势力的代表。托洛茨基本想利用委员会作为一个讲坛，揭露格别乌针对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谋杀行动。但他在此之前明确表示，他将大声疾呼反对取缔美国共

① 参见布登兹：《这是我的故事》第257－263页；以及前引奥尔洛夫的证词。

产党，并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们起来把世界大战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此事未能实现，部分原因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表示坚决反对，特别是伯纳姆；部分原因是戴斯委员会预见到托洛茨基会这样做，因此不想听他讲话；美国政府也拒绝给他入境签证。但不管他在委员会面前想干什么，仅仅他愿意站在委员会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斯大林派指控他"勾结戴斯与美国石油大王反对墨西哥人民"。1940 年 5 月 1 日，两万名穿制服的共产党人在墨西哥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把托洛茨基赶出去"的口号。托洛茨基否认指控，发表了与戴斯委员会有关的信件，并请求墨西哥总统对事件进行调查。[①] 卡德纳斯总统驳回了斯大林派的指控；但是它们毕竟已经造成了效果；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开始嘀咕，他会不会失去庇护，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中卡德纳斯的党一旦失败的话。

※　※　※　※　※

这时，杀手已经站到了阿文尼达－维纳房子的大门口了。这就是 1938 年夏天对出席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阿奇洛芙（Syliva Agelof）自称是雅克斯·莫尔纳德、比利时外交家之子的那个人。他的真实姓名从未公开过，尽管可以相当肯定他叫做拉蒙·梅尔卡德尔（Ramon Mercader）。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卡里达·梅尔卡德尔（Caridad Mercader），在国内战争时期，她在本国相当出名，尤其是因为她与格别乌的密切关系。莫尔纳德在巴黎与西尔维娅·阿奇洛芙的

① 托洛茨基：《我为什么同意出席戴斯委员会作证？》，此文为托洛茨基在 1939 年 12 月 11－12 日对报界的声明。

相遇并不是巧合，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格别乌的间谍已经盯了西尔维娅和她的妹妹好长时间的梢了。她们两个都是托洛茨基派成员；西尔维娅的妹妹作为信使不定期地前往科约阿坎，并为托洛茨基做过秘书工作。至于西尔维娅，她曾师从西德尼·胡克研究哲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过心理学；她懂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对“老头子”特别有用，因为他老是抱怨由于没有俄语秘书而使“工作瘫痪”。她是一个毫无姿色的独身老姑娘，突然发现相貌英俊、衣冠楚楚的莫尔纳德殷勤追求着自己，便陷入了情网，和他在法国一同度过了神魂颠倒、如痴如醉的数月时光。他的行为不时使她感到惊诧：他表现得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就仿佛是一种精神的懒惰，这在一个受过教育的“外交家之子”身上是很奇怪的。他跟商界和报界有让人猜不透的神秘关系；甚至他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个谜。他跟她讲的有关自己的故事令人费解，甚至支离破碎；而且在饮宴与娱乐上他挥金如土，就像拿了一只丰饶角似的。[1]

1939年2月，西尔维娅回到美国。9月，他来纽约与她相聚。他的行为又一次让她感到难堪。他告诉她，他将作为比利时一家报纸驻美国记者到纽约来，然而他却拿着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来到这里，姓名填的是弗兰克·雅克松，并说这样做是为了逃避比利时兵役。他宣称他从未来过纽约，然而他在市里行动起来却不啻是很熟悉它的人。对所有疑问的回答他都像是强词夺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一个花花公子与大少爷的派头，在政治上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使她能够责备他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他举止轻浮、喜欢吹牛。她企图去改造他，引导他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兴

---

① M. 克雷波：《我所认识的刺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载《法国观察家》1960年5月19日

趣。但他对这一类努力一概报之以漠然与苦脸。因此，当他到纽约后不久告诉她，他要作为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推销商或经理去墨西哥时，她对此没有感到什么反常。当他恳求她与他在墨西哥相会时，她求之不得地答应了。

他在10月中旬之前到了墨西哥；她是1月到的。刚一抵达，她马上就去阿文尼达－维纳朝圣——无疑，她是去转交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的信件。她很快又重新担负起秘书工作。“雅克松”总是驾着他那辆豪华汽车送她去阿文尼达－维纳，然后在门外一直等到她工作结束。卫士们逐渐认识了他，还常常跟他聊天。但长达数月之久，他从未冒险进入过院子。（他一直假装对西尔维娅的政治活动只报以矜持的微笑，而且假装只是为了讨她的欢心才对它们多少流露出一点儿好奇。）他在大门口碰到了阿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他们是最近刚与这位“热心的年青人”，“西尔维娅的丈夫”混熟了的。他邀请他们到墨西哥城里吃饭，并带着他们去郊外兜风。

人们以为他在做推销商工作的时间，他却在与格别乌间谍联络，从他们那儿接受指示，大概也会见他的母亲，从各方面来看，她当时也来到了墨西哥。西尔维娅对他的这些关系一无所知；他从不让他的“妻子”跟他的母亲见面。他偶尔也有疏忽，只有这时才会引起西尔维娅短暂的警觉。他给西尔维娅他的办事处地址是假的。他为这个“错误”辩解，又给了她另外一个地址。西尔维娅记得在巴黎时他也曾犯过类似“错误”，不禁担心起来，她请聪明机警的玛格丽特·罗斯默帮她去调查这件事。但新地址看来是真的。罗斯默夫妇甚至十分肯定，即使在莫尔纳德－“雅克松”的事务中有点儿什么疵漏，那也无关政治，因此谁也没想到要去探究一下他的“商务”的性质。（只是很晚以后才发现，那个办公地点，当地斯大林派的各个大人物都使用过。）

西尔维娅十分小心，从不带“雅克松”到托洛茨基家里去——她甚至告诉托洛茨基，她丈夫到墨西哥来用的是假护照，没有必要让他的拜访打扰托洛茨基。3月她去纽约时还让“雅克松”郑重答应不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入阿文尼达-维纳的房子。

然而距此没多久他还是进去了。罗斯默病了，于是“雅克松”受托送他去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再带他回来，给他买药，等等。尽管这对于他的勾当是一次天赐良机，但他仍然十分谨慎，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歉意地解释他为什么“违背了他的诺言”。虽然那时他已与住在托洛茨基家里人越来越熟，但是又过了3个月他才见到托洛茨基本人。

看来，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给“雅克松”指派暗杀的任务。他的任务更像是对住宅进行侦察、摸清内部结构与防卫、查清楚托洛茨基每天的日程以及刺探对于一次将由别人去完成的大规模武装偷袭有用处的所有其他情况。

领导这次偷袭的是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是里维拉以前的朋友，一位著名的画家，共产党员，墨西哥矿工的领导。他从西班牙回来刚一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指挥过几个旅，离开战场时只带出来几十个幸存者。一位如此优秀，甚至英雄一般的艺术家同意或自愿充当谋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这件事很能说明斯大林主义这些年来的道义状况；但是手里拿着枪去清算政治账也是墨西哥的民族习惯。在西凯罗斯的艺术里，革命跟强盗行径是密不可分的——他自身就具有很多拉丁美洲海盗的习气。他在西班牙时跟格别乌关系密切，有些人说他跟梅尔卡德尔一家的关系也同样密切。但是，尽管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久前共产党还是因为他滥用党的基金的劣迹谴责了他。他感到很屈辱并一心想通过轰动的冒险行动表明忠诚以重新得宠。他制定了武装偷袭托洛茨基住宅的计划，然后召唤他在西班牙时麾下的伙伴以及墨西

哥矿工来执行它。[1]

阿文尼达-维纳的每一个人都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迎接这类偷袭。读着当地斯大林分子的报纸对他的咒骂，托洛茨基评论说：“只有当人们打算把笔换成机关枪时才能写得出这种东西。”的确，在他的美国追随者的坚持下，已对整幢房子进行了加固：重重上闩的门，电网和自动报警装置，还在每一条可能的偷袭路线上架设起了机关枪。警卫人数也增加了。10个墨西哥警察在外面及房子周围值勤。在里面，哨兵不分昼夜在大门口站岗，又有4至5个人在警卫室里待命。毫无疑问，有一些担任警卫的美国青年难以胜任他们的任务，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刚从学校毕业。但对此无法可想。托洛茨基派组织里的工人成员很少能做到放弃职业、抛家离子到科约阿坎来。人员经常变动——过不了几个月就有一次，这种单调的例行公事很容易使警卫人员厌倦懈怠，那时就必须换人。因此，入口处的哨兵难免常是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手。在西凯罗斯偷袭之夜，值班的罗伯特·谢尔顿就是4月7日才从纽约来的。他在阿文尼达-维纳的6个月里，他的同志们和托洛茨基发现，他很热心，也很听话，但却是个缺心眼儿、不中用的家伙。[2] 很久以后他的同志回忆起，他与莫尔纳德-“雅克松”很快就打得火热，他们经常看见他俩一块出去。很显然，托洛茨基现在的安全真是千钧一发。但这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他总的处境：悬殊的强弱对比，少得可怜的追随

---

① L.A.S. 萨拉扎尔将军：《墨西哥谋杀案》。（我很感谢一位在30年代与西凯罗斯很熟识的美国作家，他向我提供了关于西凯罗斯性格的一些细节及其背景。）

② 托洛茨基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谢尔顿来后不久，他看见他正在把房子正门的钥匙交给一个在里面干活的建筑工人。托洛茨基警告他不能这样，并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那么发生偷袭时你将是第一个牺牲者。”托洛茨基关于谢尔顿的陈述，1940年7月15日。托洛茨基档案。

者。

5月23日，托洛茨基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上床很晚。他久久无法入睡，直到服下安眠药。大约凌晨4点钟，一种好像机枪的嗒嗒声把他惊醒了。他又乏又困，起初他还以为是墨西哥人庆祝自己某个喧闹的宗教节日或民族节日而正在外面放焰火。但是，“那爆炸声近在咫尺，好像就在屋里，就在我身边和头顶上。火药味愈来愈呛人，四处弥漫……我们遭到了偷袭。”[1] 娜塔利娅已经跳下床，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他。片刻之后，在雨点般的子弹中，她把他拖到地板上，推进床与墙之间的角落里，她也被他拖着弯下身子，她又一次用自己身体挡住他。他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趴在黑暗里，这时整个房间已处于看不见的偷袭者从窗户和门口打进来密集的交叉火力下。大约发射了200发子弹，100发落在了床上及周围——后来在墙上和门上数到了70多个弹孔。娜塔利娅稍稍欠起身，他又把她拉下来；他们又重新一动不动地趴着，呼吸着火药味，一边在想外边那些警卫和警察怎么样了。

突然，从墙或门的后边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姥爷！”偷袭者冲进了谢瓦的房间。托洛茨基后来说：“孩子的声音是那天晚上最揪心的记忆。”娜塔利娅回忆说：“那声叫喊让我们毛骨悚然。”然后是一片沉寂。“他们绑架了他。”托洛茨基喃喃说。仿佛在梦中一样，娜塔利娅看见孩子房间里炸弹爆炸的火光映衬着一个男人侧影，“钢盔的曲线，反光的纽扣，长长的脸”。那个男人在托洛茨基的卧室与孩子的卧室之间的门槛前站住了，好像在查看是否还有生命的迹象。尽管一无所见，他还是向两边的床上

---

[1] 托洛茨基关于此事件的叙述写于1940年6月8日；在他死后，它冠以《斯大林要谋杀我》的标题发表在1941年8月的《第四国际》上。

又倾泄了一阵子弹，然后消失了。射击声又一次响彻院子，而孩子的房间被火焰吞没了。谢瓦不在里面——在火光中能看见一条细细的血痕通向天井。娜塔利娅回忆道："然后一切都沉寂下来……难以忍受的沉寂。'我把你藏到哪儿才保险呢?'（她在想——作者注）由于紧张和绝望，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结果他。"全家成员都在哪儿，罗斯默夫妇、秘书们、卫士们、警察们都在哪儿？他们都被杀死了吗？"在坟墓一般的夜的寂静中，我们感到了死亡本身的气息。……突然，又响起了同一个声音，我们外孙的声音；而这次它是从天井传来的，声调完全不同，就像是断断续续的音乐段落勇敢地、快乐地回旋着：'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它把我们唤醒了！"谢瓦藏在自己的床下，自己救了自己。射击停止之前他还以为外祖父母都死了，拖着受伤的脚出来找罗斯默夫妇。"[1]

几分钟内，院里的人都聚集在天井里。没有一个人被杀或受重伤。警卫们仍处在茫然中，甚至都没有去看看外边的警察们怎么样了。托洛茨基冲到街上，发现哨兵们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捆了起来。他们简短、急促而又激动地叙述道：约凌晨4点之前，有20多个穿着警察制服和士兵军服的人偷袭了他们，未发一弹就制服了他们。然后偷袭者们在一个"少校"带领下逼近了大门；其中一个跟当时正值勤的罗伯特·谢尔顿·哈特说话，后者立刻打开了大门。偷袭者们冲进院子，其他的警卫措手不及，只能乖乖就范。偷袭者们在正对托洛茨基卧室的各个方向的树后架起了机关枪，占据了其他有利位置，然后开火。他们显然只想杀死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对其他任何人未开一枪。袭击持续了20分钟。确信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他的妻子和外孙都难逃命后，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309-310页。

偷袭者们向屋子里扔了几个燃烧弹，向天井里扔了一个重磅炸弹（没有爆炸），然后撤走了。有几个人是乘着两辆汽车走的，车都是托洛茨基的，通常停放在院子里以备随时启动，点火钥匙就插在锁上。谢尔顿随同袭击者一道走了。看见他的警察们说，他未作任何反抗，但是有两个袭击者一边一个紧紧抓住他的两条胳膊。

最初的心情是“死里逃生”的庆幸与快乐；托洛茨基的幽默感又上来了。他目睹这一切，感到十分有趣：袭击如此猛烈，策划如此周密，却这样滑稽地失败了——仅仅是因为他、娜塔利娅和孩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滚到自己的床下！现在斯大林和他的间谍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尽揶揄！执行偷袭对谁有利、由谁挑唆、接受谁的命令，这些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兴奋与尽情嘲弄之中却又夹杂着几丝困惑。偷袭者对这个小城堡的结构和防卫怎么会这么熟悉——他们甚至都知道他们可以乘受害者的汽车逃跑！谢尔顿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放他们进来？他的确是个缺心眼儿、不中用的家伙，但他在开门之前肯定碰到了一个他信任的并熟悉其声音的人。这个人是谁呢？难道偷袭者能翻过高墙和电网爬进院子吗？他们后来为什么要劫走谢尔顿（他们肯定会杀了他）？

不到半小时，墨西哥秘密警察的首脑萨拉扎尔上校赶到了现场。他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①] “我求见托洛茨基，他很快在妻子的陪伴下来了……（他）穿着睡衣，外面又随便披了一件晨衣。他们和善地向我致意……但是保持着惊人的沉着，使人误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托洛茨基微笑着，他那在玳瑁色镜片后的眼睛明朗清澈，目光犀利、敏锐，他那一瞥更是锐利、洞察

①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6-10页。

秋毫，带着诙谐与讽刺，颇有几分梅菲斯特的风度。他的头发……几乎已灰白……多少有点儿凌乱，从前额向后梳去，一缕缕分向两边……。”托洛茨基与娜塔利娅的“对比十分鲜明”：“他精力旺盛，神态威严，面部特征仍然显得年轻、坚毅，而她却是温柔、恬静、几近顺从。”不过两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充分的自制力”却让这位警察首脑觉得很反常。当时他的心头掠过一丝疑问：“是当真存在谋害他们生命的企图，抑或仅仅是一场骗局？”当萨拉扎尔在书房里倾听着托洛茨基“不带任何情绪”、源源本本地向他讲述着刚刚经历的一切时，他再次暗忖：“这么多的袭击者，这么强的火力，还有炸弹，而他们却一点儿事儿也没有！真是咄咄怪事！”他们来到花园，花园里长着精心侍弄的仙人掌，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安静。长官问托洛茨基是否怀疑到谁是“策划者”。

> “当然啦！”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过来……。”
>
> 他将右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领着我慢慢地向兔笼走去。……他站住，环顾四周，（仿佛）要确定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然后他把右手放到嘴边，好像要吐露什么最深的秘密一样。他深信不疑地低声说：
>
> “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格别乌执行的。”

此刻，长官断定托洛茨基是在愚弄他。“我茫然地望着他。……我起初的怀疑变成了确信。我再次对自己说：‘这是一场骗局！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建议他去调查当地某些“最可疑的”斯大林分子，他一定可以从他们身上获知不少这次偷袭的有关情

况。萨拉扎尔断定"这位老革命家试图把我引入歧途"。他首先命令逮捕了3个佣人：一个厨师，一个起居室女佣，一个杂役；第二次又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奥托·舒斯勒（Otto Schussler）与查尔斯·康奈尔（Charles Cornell）。现在侦察的转向导致了许多最惊人的流言。一些流言说，迭戈·里维拉组织了这场偷袭，偷袭者高喊着"阿尔马扎尔万岁"冲进房子。（阿尔马扎尔是一位反动将军的名字，里维拉反对卡德纳斯而支持这个将军做总统竞选候选人。）另一些流言则说，是托洛茨基或是他的追随者导演了这场偷袭，目的在于将怀疑引向斯大林派成员、败坏他们的名誉。[①]

有意思的是，秘密警察首脑对托洛茨基既无敌意也别无用心。然而，对这位职业士兵与警察来说，由于他不熟悉全部问题、人物个性以及这场企图以偷袭结束的可怕斗争的环境，因此对整个事件就感到格外困惑。他只要数数托洛茨基床头墙上的73个弹孔，就会觉得"死里逃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望着镇定自若的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本能地想道：他这个墨西哥多次内战的老兵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刚刚经历了这种危险之后还能如此镇定。[②] 托洛茨基谈话时的严谨与幽默因其不合时宜而愈显得可疑。（只是在以后的数月中，他的职责使他与托洛茨基经常接触时，他才意识到，这位男人的"反常的"沉着、勇敢和幽默正是他的本性。）而在另一方面，偷袭规模之巨大，即使在墨西哥也是罕见的，以至萨拉扎尔很难相信是斯大林派成员——卡德纳

①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18－25页。不仅墨西哥的亲斯大林报纸，甚至纽约的《民族》杂志也登出过一篇报道，猜测是托洛茨基或者他的家人导演了偷袭。托洛茨基评论道："《民族》的'激进派'是一帮多么卑劣无耻的爬虫。"1940年6月18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同上，第10－11、100页。

斯的支持者（他本人并不是他们的朋友）所操纵的。托洛茨基卫士们的行为也令他生疑：为什么他们这样消极？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挨过一颗子弹？萨拉扎尔断定，谢尔顿是偷袭者的同谋，他是自愿随他们离去的。托洛茨基激烈地声明，谢尔顿是他们的受害者而非他们的同伙。然而他却提不出什么证据。萨拉扎尔的推理也有一些道理：若没有托洛茨基某位近侍或起码是与他的家人有密切接触的什么人的合作，偷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现在成为他们注意的焦点，引起了他们大家的警觉。

偷袭过去一星期后，托洛茨基因被指向他本人和里维拉的怀疑所激怒而就他的两位秘书被逮捕一事向卡德纳斯总统提出抗议。[①] 他引用自己所知道的格别乌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情况（尤其是赖斯和克利维茨基事件），要求治安长官或警察局传讯墨西哥共产党的现任及前任总书记，加上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与隆巴尔多·托莱达诺。总统命令立即释放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但是侦察走了一段弯路；而同时，托洛茨基忙于驳斥对他的诬蔑、为他的同事辩护、证实罗伯特·谢尔顿·哈特的清白。他说："如果哈特真是格别乌的间谍，他可以悄悄地干掉我，"用不着兴师动众、满城风雨地来偷袭。同时，警察也抓到了几个偷袭者，他们供认西凯罗斯是他们的头儿；而西凯罗斯本人则在逃。[②] 终于，6月25日，萨拉扎尔的手下在墨西哥郊外的一家小农场的地里挖出了谢尔顿·哈特的尸体——农场的房子曾被两位著名画家租用，他们都是斯大林派成员。

---

① 托洛茨基致卡德纳斯总统，1940年5月3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184页。1940年10月4日（托洛茨基被刺后），西凯罗斯被捕，他不否认参与了5月偷袭，但强调共产党与此事毫无关系；而且他的目的并非是杀死托洛茨基，而是制造"心理震撼"，抗议托洛茨基的存在。交保释放后，西凯罗斯有好几年没在墨西哥露面。

在偷袭发生一个月之后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凌晨4时，萨拉扎尔带着这个消息来到托洛茨基家。警卫不肯叫醒托洛茨基，因此他只好领着一个警卫去到那个农场认尸。

> 我们在黎明时分到达斜坡脚下。泥泞的地面使攀登格外吃力。那具尸体还躺在我留在原地的担架上，在房子外边……奥托……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同志。
>
> 我们到达桑－昂热已经是白天。尸体停放在院子里。努涅斯将军随后也到了，下令把尸体洗干净。然后他加强了警卫，因为消息已传遍了全镇，新闻记者蜂拥而至。例行公事结束后，治安长官就离开了。
>
> 突然，人群起了一阵骚动。
>
>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
>
> 的确是他。时钟正敲10点。这位俄国老流亡者走近尸体。他显得很悲哀萧索。他久久伫立，凝视着自己的前秘书；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这个男人曾领导过伟大的革命，在残酷的战争中出生入死，目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个地离开了人世，那场几乎不仅要夺去他的生命，甚至还要夺去他的妻子和外孙生命的偷袭也没能撼动他，此刻他却潸然泪下了。[1]

但是哈特的身份之谜依然没有解开。萨拉扎尔仍然认为，哈特是格别乌间谍，格别乌杀死他是因为害怕他落入警察之手会说出太多。这个猜测部分地被目击者所证实。他们说，他们曾看见哈特在农舍周围随意走动，外出散步，没有任何卫兵或押送者。

---

①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76－77页。

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持说，这是他的第八个遇害的秘书，而他和他的美国同志对哈特所了解的一切都与萨拉扎尔的说法不同。[1] 托洛茨基给受害者的父母写去一封动人的吊唁信，并做了一块匾纪念"鲍勃"——然而这块匾很快就要放在托洛茨基本人的墓碑上了。

5月24日之后，命运的阴云仍然笼罩窒息着阿文尼达-维纳的"小城堡"。每一周以至每一天，人们都为下一次偷袭提心吊胆。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还能活着真是命运的乖戾。早上起来他会对娜塔利娅说："你瞧，昨天晚上他们又没有杀死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一两次他又忧郁地补充说："是的，娜塔利娅，我们是缓期执行的死囚。"[2] 但他仍像以往一样充满活力，精力旺盛，参与警察局各阶段的调查工作，出庭作证，回击无穷无尽的诽谤，对诸如法国投降与莫洛托夫宣布支持第三帝国等事件进行评论，并继续辩论美国黑人的地位问题、革命失败主义的策略问题，等等。有一群美国朋友于6月中旬拜访他，恳求他"进入地下"、采取化装，并允诺帮他潜入美国、保证给他找到一处安全秘密的避难所。他对他们的恳求连听都不要听。他说，他不能为保命而躲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工作。他必须公开面对他的仇敌与朋友，要用他赤裸的头顶承接"地狱之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3] 只是在一件事上他对朋友们及墨西哥当局的催促作了勉强的让步：用更高的水泥墙、新的瞭望塔、装甲门

---

① 托洛茨基举出下列他的秘书和助手，他们都是斯大林报复的牺牲者：格拉兹曼、布托夫、布柳姆金、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克莱门特与沃尔夫。1940年6月25日声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娜塔利娅·谢多娃：《谋杀案真相》，载《第四国际》1941年5月。

③ 此事是提建议者之一告诉我的。

与钢栅窗来加强住宅的防卫。一开始，他还很负责地检查"城防工事"，提出这样那样的改进建议，但他很快就厌烦了。"它让我想起我进的第一所监狱，"他对自己的秘书约瑟夫·汉森评论说，"这些门都发出一样的噪音。……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汉森说：）"有一天，他碰到我正盯着那些新瞭望塔看。他眨着眼睛，脸上浮出他那温暖亲切的微笑……'高度发达的文明，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停地建造这些玩艺儿。'"[①] 他就像一个人在死刑囚室里等待着那命定一天的到来——只是他决心合理地利用每一小时，而且他固有的讽刺与幽默感从未离弃过他。

他最后一次乘车奔驰在乡间那泥泞颠簸的道路上，而他的思绪则又飞回到俄国内战年代的道路上。在这最后一次的远足中，"他睡得比平常多得多，仿佛精力已经耗尽，而这是他最后一次好好休息的机会了。他松弛地坐在我后面的座位上，从库埃纳瓦卡差不多一直睡到阿梅卡梅卡，那儿坐落着睡美人般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和伊克塔西豪特火山，在它们白色的峰顶上戴着如絮的云朵。……我们停在一座古代大庄园旁边，它有塔楼与坚固支撑的墙。老人饶有兴趣地望着墙：'多好的墙，可惜是中世纪的。就跟我们的监狱一样。'"[②] 这个常常挂在他嘴边的词"中世纪"，表达的不仅是他对自己被封闭的厌恶，还有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它本应是人类进步与胜利的时代，现在却倒退回野蛮残酷的"黑暗时代"；甚至他自己，被塔楼与加固墙所包围着，也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普遍的倒退中了。那次偷袭过后，朋友们送给他一件防弹衣。但即使在感谢他们时，他也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把它扔到一边，建议最好是让了望塔上的哨兵穿上。秘书们多次主张

① 约瑟夫·汉森：《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载《第四国际》1940年10月。

② 同上。

对来访者进行搜查以防带进暗藏武器，并且反对他单独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陌生人。“他不能容忍他的朋友遭受搜查，”汉森说，“他无疑觉得根本没用，反而会让我们产生虚假的安全感……随便哪个格别乌的间谍……都能想出办法躲过我们的搜查。”当他跟访问者谈话时，若是哪个警卫在场，他就会皱起眉头，因为有些访问者可能有“个人问题，警卫在场就不能畅所欲言”。[1]

※　※　※　※　※

5月28日，发生偷袭的几天之后，杀手第一次与托洛茨基会面了。这次会面再偶然不过了。罗斯默夫妇要离开墨西哥，打算去韦拉克鲁斯乘船，而“雅克松”自告奋勇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们去那儿，假装着他反正要去韦拉克鲁斯作一次例行的商务旅行。他一大早就来接他们，他们在作准备的功夫请他在院子里等候。他一进来就碰上了正在兔笼边喂兔子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只向来访者招手示意。“雅克松”表现出典型的规矩与可爱：他并没有盯着这位大人物看或试图跟他说话，也没有逡巡徘徊；他径直来到谢瓦的房间，送给他一架玩具滑翔机，并教给他怎样玩。尔后，在托洛茨基示意下，娜塔利娅邀请他与全家及罗斯默夫妇共进早餐。[2]

从韦拉克鲁斯回来后，“雅克松”有两个星期没在阿文尼达-维纳露面。6月12日他重新出现在那儿，用了几分钟时间说他要去纽约，当他不在的时候，汽车就留给卫士们用。一个月后，他回到墨西哥，足有3个星期没给阿文尼达-维纳打电话，

① 《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

② 同上。

直到托洛茨基邀请他和西尔维娅来跟他们一起喝茶。这是他最长的一次访问——有一个多小时之久。根据卫士们的详细记录，从5月28日到8月20日，他跨过大门只有10次，他见到托洛茨基只有2次或3次。但这已足够让他去摸清环境，估量受害人，给自己的计划添上最后一笔。他表现得再不能更谦逊、更热心、更清白了。他来时总是带给娜塔利娅不大不小的一束花或一盒糖果——“西尔维娅的礼物”。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他愿意陪托洛茨基爬山；但他从不固执自己的建议。在跟卫士们聊天时，他会张口吐出一串串人们很熟悉的各国著名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名字，给人的印象是他与这场运动关系很密切；其中不忘提到他对党的基金的捐赠。当着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的面，他则表现出一付羞涩模样，与一个刚转变为“同情者”的局外人十分适宜。当时正值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分裂时期。西尔维娅站在伯纳姆和沙什曼一边，但她在阿文尼达－维纳仍像以前一样受到欢迎——只是当她跟“雅克松”被邀来喝茶时，茶桌就会发生热烈的争论。“雅克松”没有参与，但他让人明显感到他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他同意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保卫它。跟秘书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则更少保留，把他跟西尔维娅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讲给他们听。但他很小心地不表现得过分热心——托洛茨基不是警告过自己的追随者，他们中间的奸细会表现得过分热心并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吗？好吧，“雅克松”不干这种事；他只是谨慎地试着使西尔维娅回到正确的观点上来。

但甚至这个高级伪君子（他在坐牢的20年里仍然尽力去迷惑所有试图搞清他的真正动机与其背景的侦探、法官、医生与心理学家）在接近死亡线时也开始失去勇气了。他从纽约回来时意气十分消沉，大概他在那里接受了最后的行刺指令。素来强健快活的他此刻却变得神经质、阴郁；他脸色灰白，面孔抽搐，双手

痉挛，一天大半都是躺在床上沉默不语，闭门不出，也不跟西尔维娅说话。有时他又突然变得亢奋与饶舌起来，让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大吃一惊。他夸耀自己的登山伟绩与巨大的力气，他“用一把冰镐只一下子就劈碎了一个大冰块”。吃饭时他表演自己那双手的“外科手术般的技巧”，以非同寻常的熟练割开了一只鸡。(数月以后那些见识过这个“表演”的人想起来，他还曾说过他与克莱门特很熟，而克莱门特被发现的尸体就是以这种“外科手术般的技巧”给肢解过的。) 他谈到他商业上“老板”的“经商天才”，提议利用“老板”对证券交易所的某些影响从财政上帮助第四国际。有一天他跟随托洛茨基和汉森视察阿文尼达-维纳的“城防工事”时指出，这些东西都毫无用处，因为“下一次格别乌的偷袭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问他可能会是什么方法，他却只耸耸肩。

只是在三四个月后家庭成员回忆起这一切及与之类似的细节时，他们才意识到它们是多么不祥。而当时他们从中看到的只是“雅克松”的乖张脾气而已。唯有托洛茨基一人对他有所警觉，尽管对他知之甚少。的确，当有人愤愤指出“雅克松”去纽约期间甚至都不给当地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总部打个电话时，他甚至有些违心地为“雅克松”辩护过，回答说：是的，是的，西尔维娅的丈夫的确是个轻浮的小伙子，若作为一个同志，他可能没有什么用，但他还可以进步——建立一个党需要各种人才。然而“雅克松”一谈到他的“老板”——那位“经商天才”以及他愿意为了“运动”去搞证券投机，却使托洛茨基怒不可遏。娜塔利娅说：“这些零零星星的谈话使我很不高兴；列夫·达维多维奇也很震惊。他对我说：‘这个很有钱的“老板”是谁？应该搞清楚。归根结底，他可能只是一个法西斯暴发户——我们最好别再接待西尔维娅的丈夫了……。’”托洛茨基曾与也有其“财政计划”的

莫利尼耶断绝了关系，但对莫利尼耶的政治忠诚却没有丝毫怀疑，而现在很愿意原谅他的过失。但在“雅克松”身上，托洛茨基却感到了一种凶险——说不定此人跟法西斯有联系？但尽管有这种朦胧的直觉，但在怀疑没有得到证实之前，托洛茨基不愿去冒犯他。①

8月17日，“雅克松”回来了，说他写了一篇反驳伯纳姆与沙什曼的文章（也涉及到被德军占领的法国的一些情况），他问托洛茨基能否浏览一遍手稿并提出修改建议。他狡猾地触动了自己的受害者身上那根敏感的弦——渴望去指导和提高同志们与追随者们。托洛茨基尽管有些勉强，还是客气地请“雅克松”随他来到书房。他们单独呆在里面讨论文章。刚过了10分钟，托洛茨基就出来了，心神不宁，忧虑重重。他的疑心突然加重了。他告诉娜塔利娅，他再也不想见“雅克松”了。惊骇他的倒不是那个男人所写的东西——有些笨拙和混乱的陈词滥调，而是他的行为。当他们在写字台边、托洛茨基读文稿时，“雅克松”坐到了写字台上，俯身在主人的头顶上方，并且将这种姿势一直保持到会见终了！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戴着他的帽子，紧紧抓着他的外套！托洛茨基不仅被客人的无礼所激怒，而且又一次觉察到了某种欺诈。他有一种感觉，这个人是个骗子。他谈到“雅克松”的举止时对娜塔利娅说，“雅克松”自称是在法国长大的比利时人——但他“根本不像一个法国人”。他到底是谁？他们必须搞清楚。娜塔利娅大吃一惊。她觉得托洛茨基“已经觉察到关于‘雅克松’的什么新情况，但还没有或还不急于得出任何结论”。然而他所说的那番话的含义却敲起了警钟：如果“雅克松”在自己的国籍上欺骗他们，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别的事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319页。

上是否也欺骗了他们？在什么事上？这些问题大概一直萦绕在托洛茨基的心头，因为两天以后他又向汉森谈了他的印象，或许想弄清他身边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疑惑。但是刺客的行动比受害者的直觉和自卫本能更快：就在托洛茨基刚向汉森吐露自己的朦胧怀疑的第二天，对他的谋杀就发生了。[①]

8月17日的会见是“雅克松”的一次彩排。他将托洛茨基诱入了书房——一个对一个，他使后者读了自己的手稿，并俯身在后者的头顶上。他是带着冰镐、匕首和手枪来彩排的，这些东西就藏在他紧紧抓在手里的衣服下面。他的口袋里预先放着一封解释其动机的信——那是早就打印好了的，只要在谋杀那一天签上日期并署上名字就可以了。他在信中谎称自己是托洛茨基的一位“幻灭的追随者”，曾准备为其献出“最后一滴血”，根据第四国际的指示来到墨西哥，托洛茨基的接见对于他将是“梦想的实现”。但是在墨西哥，“巨大的幻灭在等待着他”，他想象为国际工人阶级领袖的人暴露出了狰狞的反革命真面目，命令他“到俄国去组织对许多人的一系列的谋害，首当其冲的是斯大林”。他发现托洛茨基“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首脑”有勾结——“某个大国的领事经常拜访他”，而且他既阴谋反对苏联，也阴谋反对墨西哥。[②] 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甚至连托洛茨基的死都会证明斯大林派对他的指控，只除了一点：站在斯大林—希特勒协定的角度，他是希特勒的帮凶这种罪名被替换成了他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暗示。这位托洛茨基“幻灭的追随者”为能证明斯大林派的指控所运用的骗术甚至都不是新货色：正是这只手，不仅杀

---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以及《反对派通报》1941年第85期；《第四国际》1941年5月。

② “雅克松”的“供述”全文见艾伯特·戈德曼：《暗杀托洛茨基》第5－8页。

害了克莱门特，而且以克莱门特的名义写下了一模一样的“幻灭的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揭发”。更为卑鄙的是，“雅克松”又捏造说，托洛茨基逼他“离弃他的妻子”，因为她参加了沙什曼派；但是他，“雅克松”，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去俄国都不能没有西尔维娅。谎言编得很低劣，但还没有低劣到轻信者不会上当的地步；再说，在无数人的生存与这么多国家的根基都被剧烈摇撼着的当时，在法国投降与英国大空战的空隙，谁还有时间与耐心去细细琢磨它呢？

※ ※ ※ ※ ※

最后那一天，星期二，8 月 20 日，就这样来临了。不管什么人，当他回忆起这一天时，都会记得在命定时刻到来之时笼罩全家的那一片格外的宁静与安详。老人浑身充满了平静、自信与活力。早上 7 点起床后，迎接妻子的不是那个已成为习惯的残酷玩笑——“你瞧，昨天晚上他们没有杀死我们”，而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表示。“我已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振奋了，”他对她说；又说他服下的安眠药对他很有效。她回答说：“并不是药让你觉得振奋，而是踏实的睡眠和充分的休息。”“不错，”他满意地赞同说。他盼望“真正好好地工作一天”，于是赶紧起床，“步履轻快地走向天井去喂他的兔子”。他已有几点怠慢它们了，因为星期天他是遵照医嘱躺在床上度过的，所以现在他花了整整两个钟头去细心照料它们。早餐时他再次向娜塔利娅显示他良好的健康与心情。他急着回书房去写“我那可怜的书”——《斯大林》，自从 5 月偷袭事件后，为了拿出时间应付警察局的调查与当时的论战，他就把它搁在一边了。现在他已经说完了关于偷袭的一切，调查也已经正在走上正路，他希望这件事再也不要来打扰他了。

但在重新开始写《斯大林》之前，他还想写一篇"重要的文章"，不是给庞大的资产阶级报界，而是给托洛茨基派的小小的期刊。他颇为兴奋地谈着他这篇最后的文章走进了书房。

这天早上的邮件也令他惊喜。他终于给自己的档案找到了一个保险的地方。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通知收到的电报刚刚到达。但由于格别乌或联邦调查局的原因，这些档案在路上碰到了一些麻烦；就在两天以前，托洛茨基还指示他在美国的律师与同志艾伯特·戈德曼说，倘若联邦调查局试图染指他的文件，那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写道："我本人没有丝毫可隐瞒的，但在我的信里提到了许多第三者。"他将档案委托给哈佛大学时附带的条件是，其中一部分在1980年以前不得公开。[1] 不过途中麻烦显然不大，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妥善解决了。他用他特有的英语给美国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写了几封简短、温暖又幽默的信。[2] 他先问候一位在科约阿坎呆过但因病回家休假的秘书，感谢这位同志及其妻子送给他一本美国俚语辞典，并答应要刻苦学习以便在饭桌上能与他的卫士们聊天。他又向两位因罢工行动而坐牢、现在就要获释的同志表示祝贺。然后，他安心地用录音机开始录他的最后一篇文章。[3]

这篇文章的尝试探索反映出托洛茨基内心正经历着一种骚动。他想试着改变某种旧思想，或者说产生一种新思想。直到不久前，他还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告诉工人阶级，他们的目标不是保卫他们的帝国主义祖国

① 托洛茨基致戈德曼，1940年8月17日，托洛茨基档案保密部分。这部分档案包括了他与追随者们的通信。当时几乎整个欧洲不是被盖世太保控制着，就是被格别乌控制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以这种方式保护他的通信者。

② 参见《托洛茨基最后的信》，载《第四国际》1940年10月。

③ 《托洛茨基最后一篇文章》，载《第四国际》1940年10月。

——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法西斯的，而是将战争转变为革命。但是现在，纳粹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而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出反应，因此他感到简单地重复旧公式是没有用的。“当前的战争，正如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那样，是上一次战争的继续。但继续并非是重复，（而）是发展，是深化。”同样，继续实行列宁在 1914—1917 年的政策，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发展，是深化”。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使布尔什维克具有了抵抗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狂热的免疫力；然而，与普遍相信的相反，“它并没有赢得不要外国占领者的群众”。布尔什维克“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远不如他们进行正面的革命鼓动与革命行动更能获得普遍拥护。他总结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反对沙什曼派与托派中的和平主义者抗议美国的战时征兵制。在几天前写的一封信里他就民意测验显示 70% 的美国工人赞同征兵制一事指出：“我们要和 70% 的工人站在一边。（我们要说）你们，工人们，希望保卫……民主，而我们……则要走得更远。但是，我们仍然准备跟你们一道保卫民主，只有一个条件，它必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贝当式的叛卖。”在这篇文章里，他的思绪在由于“奸诈而衰朽的波拿巴主义”而蒙羞受辱的法国与跟它截然不同的美国之间徘徊。但是，他来不及去发展这些不成熟的思想了；他留在录音机里的声音注定只是他在新方向上最后一次无结果地摸索的足迹而已。

※　※　※　※　※

1 点钟的时候，他的墨西哥律师里戈来见他，劝他立即对托莱达诺的《人民报》的攻击作出回答，该报纸指控他诽谤墨西哥

商会。托洛茨基担心这又会将他拉回到与当地斯大林分子的无聊争吵中，但他还是同意马上回击《人民报》，把论革命失败主义的文章先放“几天”。他对娜塔利娅说：“我将自卫，并控告他们厚颜无耻的诽谤。”他无所畏惧而且心情振奋。他又一次告诉她自己的情况非常良好。娜塔利娅说：“他看上去很好，而且情绪总是很稳定。”刚才她看见他没戴帽子站在天井的烈日下，就催促他去拿他的白帽子戴上以保护自己的头部。她偶尔轻轻打开他书房的门，“害怕打扰他”，看见他“一切正常，正俯身在桌上，手里拿着笔”。这位现代的尼俄柏，踮着脚尖，从门背后将她最后痴爱的目光投向留给她的唯一所爱的人。

下午刚过5点，他来到兔笼边喂兔子。娜塔利娅站在阳台上，注意到他身后不远站着一个“陌生的身影”。身影走近了，脱下帽子，她认出是“雅克松”。“‘他又来了，’这个念头从我心头一掠而过。‘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勤?’我问自己。”他的出现加深了她的恐惧。他脸色青灰，动作慌乱急促，神经质地将外套紧紧裹在身上。她突然想起，他曾经向她夸耀他即使在冬天也从不戴帽子、不穿外套；于是她问他，怎么这么热的天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他的回答是“怕要下雨”；又说他“渴极了”，想喝一杯水。她给他倒了茶。“不，不。我吃饭太晚，觉得食物都顶到这儿了，”他指着自己的喉咙说，“噎死我了。”他心神恍惚，答非所问。她又问他，文章修改完了吗？他用一只手抓住外套，腾出另一只手给她看几页打印稿。他想请她的丈夫对这篇涂鸦之作费神过一下目，于是她同“雅克松”一起向兔笼走去。当他们走近时，托洛茨基转向娜塔利娅，用俄语说：“雅克松”在等西尔维娅来，因为他俩明天要到纽约去，娜塔利娅应该为他们饯行。娜塔利娅回答说：“雅克松”刚刚还拒绝喝茶，感到不舒服。“列夫·达维多维奇注意地望着他，用稍带责备的口吻说：‘您的健康

又糟糕了，您看起来病了。那可不妙，'"[1] 然后是刹那间一阵难堪的静默。刺客手里拿着打印稿站在那儿等着，而托洛茨基呢，尽管建议他重写一遍，但仍感到有责任看看他最新努力的结果。

"列夫·达维多维奇很不情愿地丢下兔子，他对文章根本不感兴趣，"娜塔利娅叙述说，"但是他还是说：'噢，您说什么，我们去看看您的文章?'他慢腾腾地锁好笼门，脱下套袖。……掸掸他的蓝色夹克，慢慢地、默默地跟我和'雅克松'向屋里走去。我陪着他们一直走到列·达·的书房门口；门关了，我进了隔壁的屋子。"当他们走进书房后，"这个男人会杀了我"的念头从托洛茨基脑海里一闪而过——至少，几分钟后他躺在地板的血泊里对娜塔利娅就是这样说的。不过，当单个或数个陌生人拜访他的时候，类似念头肯定不止一次在他心里闪过——只是没有引起重视。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生存被封闭在恐惧与厌世中，因此现在他抑制住了这种自卫本能的最后微弱的反射。他走向他的书桌，坐下，低下头来看打印稿。

他就要浏览完第一页的时候，头上挨了可怕的一击。"雅克松"在供述里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打在他的头上。"他本指望这一下沉重的打击能让受害者连哼都不哼一声就死去，而他本人则可以在凶杀被发现之前从从容容地溜掉。然而，受害者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喊"——"我一生都能听见这声叫喊，"刺客回忆说。[2] 托洛茨基的头盖骨被打破了，他满脸是血，但他跳起来用能抓到手的一切东西——书、墨水瓶、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然后向他扑去。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四分钟之内。那声尖锐的、悲惨

① 娜塔利亚·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 319 页。

② 同上，第 160 页。

的叫喊惊得娜塔利娅和卫士们跳了起来，但他们过了片刻才意识到它来自什么地方，并向那个方向跑去。而这时，书房里继续着激烈的搏斗，托洛茨基的最后搏斗。他像一只老虎一样在拼命。他抓住凶手，咬他的手，抢夺他的冰镐。凶手惊呆了，以至忘了打第二下，也没有使用手枪或匕首。后来，托洛茨基再也站不住了，他仍调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使自己不至扑倒在敌人脚下，他慢慢摇晃着向后退去。娜塔利娅冲进来时看见，他站在卧室与阳台之间的过道里，倚着门框，脸上全是血；透过鲜血，那双没戴眼镜的蓝色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峻地看着她；他的胳膊无力地垂着。"'出什么事儿了?'我问道。'出什么事儿了?'我用胳膊搂着他……他没有马上回答。瞬间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砸着了他——当时书房里正在装修——但他为什么站在这儿?没有愤怒，也没有沮丧或悲哀，他静静地说:'雅克松。'他这样说的样子仿佛是在说:'现在终于发生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在我的帮助下，他慢慢滑到地板的垫子上。"[①]

"'娜塔莎，我爱你。'他吐出这几个字时是那样突然、那样悲哀、那样吃力，内心的重创使我浑身无力，我倾倒在他身上。"她嗫嚅地对他说:"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未经搜查都绝对不许见你。"然后，她拿来一个枕头小心放在他被打破的头下，又用一个冰块敷在他的伤口上，并擦掉他前额与面颊上的血迹。他说:"一定不要让谢瓦看到这一切。"他说话十分困难，含糊不清，自己却好像意识不到。"你知道，在那儿"——他将眼睛转向书房的门——"我感到了……我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他想……再一次……我……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平静温和地"说了这番话，又以一种仿佛满意的口气重复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60页。

说："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娜塔利娅和汉森一边一个跪在他身边；他转向汉森，说起英语，而她则"绷紧全部注意力去捕捉他话里的意思，但是白费劲"。

"这就是终点，"他用英语对秘书说；他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深信"雅克松"向他开了枪，当汉森告诉他是用冰镐打的、伤并不重时，他不相信。"不，不，不，"他指着心口回答，"我能觉出这次他们得手了。"当再次向他肯定伤势并不危险后，他的眼睛里浮现出微弱的笑意，仿佛是看到别人这样极力安慰并对他隐瞒真相而感到有趣。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把娜塔利娅的手压在自己的唇上。他继续用英语说："照顾好娜塔利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您放心吧，"汉森答应说，"老人痉挛地抓住我们的手，泪水突然涌上他的眼睛。娜塔利娅俯在他身上，吻着他的伤口号啕大哭。"[1]

同一时间，在书房里，卫士们扑向凶手，用左轮枪柄痛打他；他的嚎叫与呻吟响彻了房间内外。"告诉孩子们不要杀了他，"托洛茨基挣扎着说，尽力把字吐得清楚，"不，不，绝不能杀死他——必须让他招供。"卫士们叙述了"雅克松"挨打时所说的话："他们威胁我，他们把我母亲抓了起来……西尔维娅跟此事没有关系……"；当要他说出是谁抓了他的母亲时，他否定是格别乌，说他"跟格别乌没有关系"。

医生赶到时，托洛茨基左边的胳膊和腿已经麻痹了。当担架手进来后——警察也和他们一块儿进来，娜塔利娅很害怕：她想起廖瓦就是死在医院里，因此不让人动她的丈夫。他也不想被送走。当汉森向他保证卫士们也将陪同他一道前去时，他才说"那么由你决定吧"，仿佛意识到"由他决定一切的日子已一去不复

① 约·汉森：《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载《第四国际》1940年10月。

返了"。他被抬上担架时又喃喃地说："我所有的一切都给娜塔利娅……你们要照顾好她。"[1]

在大门口，卫士们以迟到的警惕阻止住了担架。因为担心另一次袭击，他们不许把托洛茨基抬走，除非警察首脑努涅斯将军亲自负责护送。(一位救护人员叙述说)"我看到伤者的妻子用一块白色披肩盖住她的丈夫。这位夫人啜泣着，用双手捧着他血迹模糊的头。托洛茨基先生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呻吟。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有呼吸。"[2] 他们将他抬上了由两排警察团团围着的救护车上，当这辆车发动时，另一辆救护车又赶来运载凶手。

"紧急救护车穿过拥挤的车流，风驰电掣般行驶于灯红酒绿、喧闹的城市中，穿行在它那无谓的忙碌与噪音里；警笛声声哀鸣，警察的护送队也发出凄厉的警报。护送这位伤者，我们心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惊恐一分钟一分钟地增长。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他的右手在空中画着圆圈，仿佛找不到停放的地方；然后它在毛毯上方游移着，碰到了放在头旁边的水盆，最后找到娜塔利娅。她向他俯下身子，问他感觉怎么样。"现在好些了。"然后他示意汉森过来，用喃喃的低语指示他如何进行调查。"他是个政治杀手……格别乌间谍……或一个法西斯分子。更可能是格别乌。……但是也可能受盖世太保指使。"(几乎同时，在另一辆救护车上，凶手交给押送者一封信，信中解释了他的"动机"并澄清盖世太保与此罪行无关。)

托洛茨基被抬出救护车时，医院外面已聚集起了一大群人。娜塔利娅十分担心："说不定里面有敌人。我们的朋友在哪儿？

---

[1] 约·汉森：《陪伴托洛茨基到最后》，载《第四国际》1940年10月。

[2]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102－103页。

他们应该围住担架。”几分钟后，他已躺在医院里一张狭窄的病床上，由医生给他检查伤势。一名护士开始剪他的头发；而他则向立在床头的娜塔利娅莞尔一笑，想起就在一天前他们还曾想找理发师来给他理发：“你看，”他眨眨眼，“连理发师也来了。”然后，他的眼睛差不多全合上了，他向汉森提出了那个他曾提过许多次的问题：“乔，你……带……笔记本了吗?”他记起汉森不懂俄语，于是以最大的努力用英语口授内容。他的声音勉强听得见，他的话含糊不清。以下就是汉森声称记下的内容：“由于一个政治杀手的重击，我就要死了……他在我的书房里袭击了我。我同他搏斗……我们……走进……谈论有关法国统计资料……他袭击了我……请告诉我们的朋友……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前进。”他刚开始口授时显然是想尽可能详细地叙述对他的谋杀，还要口述一封政治文件。但他突然意识到生命正在逝去，于是缩短了叙述，急忙给予他的追随者最后的鼓励。

为了施行手术，护士们开始给他脱衣服，用手术剪剪开他的夹克、衬衫和内衣，并从他的手腕上褪下手表。就在她们要脱掉他最后一件内衣时，他“清晰但又悲伤、庄重地”对娜塔利娅说：“我不要她们给我脱衣服……我要你给我脱。”这是她听到的他最后的话。她给他脱完衣服，弯下腰把嘴唇贴在他的嘴唇上。“他回了吻。我再次吻他，他又一次回吻。然后又重复一次。这是我们最后的告别。”[1]

当晚7点半左右，他陷入了昏迷。5位外科医生对他施行了开颅手术。伤口有2/4或3/4英寸那么深。右颅骨打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脑；脑膜已经受损，部分脑体破裂并毁坏了。他“以惊人的顽强承受了手术”，但却再没有恢复清醒；而他同死亡的搏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

斗持续了22个多小时。娜塔利娅“哭干了眼睛，绞着双手”，日夜守着他，指望他还能清醒过来。下面是她对他最后的回忆：

> 他们将他抬起来。他的头垂在肩膀上。双臂下落的样子恰像提香的《卸下圣体》里的双臂一样。只是这垂死的人不是戴着荆冠，而是缠着绷带。他的面部特征仍保留着原有的纯洁与骄傲。仿佛他随时都能站起来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①]

死神于1940年8月21日晚7时25分降临。遗体解剖显示出大脑“巨大的体积”——有两磅零十三盎司重；而且“心脏也非常大”。[②]

※　※　※　※　※

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习惯，一个巨大的送葬行列缓慢地跟在装着托洛茨基遗体的灵柩后面，穿过城市的主要大街，也穿过工人阶层居住的郊区——在那里，衣衫褴褛、赤脚、沉默的人群塞满了道路。美国托洛茨基派成员想将托洛茨基的遗体送往美国；但是就连死人国务院也不肯发签证。遗体停放了5天供人们瞻仰；前来的人约有30万，同时大街上不断响起无名诗人创作的民谣《列夫·托洛茨基大斗牛》。[③]

---

① 娜塔利娅·谢多娃：《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

② 萨拉扎尔：《墨西哥谋杀案》第110页。

③ 同上，民谣中有几句充满着真正平民的对“奸诈怯懦的”凶手的轻蔑：

托洛茨基在夜里被杀死了，

有人要向他报仇。

8月27日，遗体火化了；骨灰就埋在科约阿坎那座“小城堡”的地下。一块白色长方形石碑竖立在墓前，一面红旗在上面飘扬。

娜塔利娅在这座房子里又住了20年；每天早晨一起床，她的目光就投向院子里的那方石碑。

不管黑夜白天，

悲剧注定要结束，

整个国家和首都都在发抖。

《真理报》只用了寥寥数行报道这个事件，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跋：

失败中的胜利

在俄国革命的整个历史中以及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比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最后几年更困难、更黯淡的了。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是“思想要抓住现实”，然而现实却不符合思想的时期——它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比以往更狭窄但又更深的深渊。世界充满了惊人的矛盾。资本主义从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与萧条中那样更接近于崩溃而又出现如此急剧的复苏。阶级斗争从未这样迅猛地驱向革命顶峰，而它达到这个顶峰的希望也从未如此渺茫。从未有过那样大批的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鼓舞，而他们也从未如此无助和无活力。在现代人类的全部经验中，没有任何事物像第一个工人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试验那样，既崇高又令人生厌。而且，恐怕也没有任何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其生活跟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如此息息相关而又如此孤独。

他工作的意义与他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

任何回答都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还缺乏历史远景；而我们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主要来自我们对苏联革命的判断。如果接受下述观点，即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茨基就像注定会失败的某位神的祭司长，又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但即使这样，他也应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和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算真是一个人命定要蹒跚于从失败到失败的痛苦与血泊中，而且挣脱一个轭绊只是将其脖颈伸向另一个轭绊——即使当他在那茫茫荒漠上跋涉而前面却没有应许给他的土地时，[①]他对另一种命运的渴望仍然像火炬一样在那黑暗与阴森中带来一线光明。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如此鲜明和无畏地表达出这些渴望。

然而，俄国革命真的只是用一种轭绊代替另一种轭绊加于人民吗？这真是最后的结局吗？在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那些探究斯大林主义的人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跟他们相反，托洛茨基却坚信，将来当苏联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斯大林主义就会仅仅被看做是“偶然的倒退”。他的乐观主义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看来都是没道理的。但是，差不多25年过去了，

---

① 此处化用圣经原义：被压迫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穿越西奈沙漠，向迦南（即巴勒斯坦）进发，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坚定信念：那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译注

他的预言听起来虽然仍是大胆的，但并不荒谬。很清楚，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社会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那些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分不开的进步又从内部瓦解着和侵蚀着斯大林主义。对这种发展作出对比，在托洛茨基时代实在是太早了——他想这样做，却不无失误；甚至1/4世纪之后，这种对比仍不十分清楚。但苏联社会显然一直在努力摆脱沉重的债务，并且不乏成功，它还努力发展了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财富。60年代初期与30年代中或50年代初期相比，苏联社会中更少贫困，更少不平等，更少压迫。这个反差如此惊人，因此谈什么“官僚集体主义建立的新的集权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托洛茨基在他最后的论战中与其弟子们争辩的那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但不是在小圈子里，而且是在全世界的听众面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苏联官僚集团是否是一个“新的阶级”，为了结束它的专制统治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但有几点是没有疑问的：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整个恐怖统治总有一天会显得只是“一种偶然的倒退”的看法还是激起了当代思想敏锐者的反感。而他则将巨大的历史尺度运用于具体事件与个人命运：“当问题涉及到经济与文化领域里最深刻的变化时，历史中的25年还比不上人一生中的1个钟头。”（他对自己时代的非正义与残暴的敏感并未因为这种长远历史观的倾向而变得迟钝起来——相反，它被磨砺得更加锐利了。正因为他从未忘记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前途，他才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败坏。）用他的历史尺度来衡量，苏联社会自他的时代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太微乎其微的开头。但哪怕是这样

的开头也足以为革命辩护，也可为他对革命所持的基本的乐观主义辩护，也能驱散幻灭与绝望的浓雾。

托洛茨基宏伟的一生与工作是俄国革命经验中的精华部分，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结构中的精华部分。他的独特命运和他的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如此卓越的智力、如此杰出的能力和如此高贵的殉道精神最终必将释放出其充溢的冲击力，否则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观念。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传奇都是由这样的材料造成，但唯有托洛茨基的传奇是完全由记录在案的事实与确定无误的真实构成的。其中并没有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神话；是现实本身上升到了神话的高度。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30岁或35岁时，即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他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及其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用以《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斯大林分子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极尽歪曲与诬蔑之能事给他抹黑，才从两代人的记忆里抹去他的这一形象。）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至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上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

他在身后也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是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注定永久湮没的；由于这份遗产，他的许多追随者高呼着他的名字慷慨就义；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愈来愈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探索自己的道路。

在本书所叙述的这一时期里，他的思想、著作、斗争与彷徨则是他一生的顶点。我们已经从批判的角度回顾了他的溃败、谬误和失算：他与第四国际的失败，他对西方革命前途的错误估计，他关于苏联改革与革命的盲目看法，以及他晚年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矛盾。我们也综述了他的那些现在已充分和无可争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行动：他洞悉到希特勒上台的致命危险，努力唤醒德国工人阶级、国际左派阵营和苏联对这一危险的警觉，尽管这努力只是一番徒劳；他执著地批判斯大林不仅在指挥经济事务方面，而且特别是在集体化方面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此外他还为反对大清洗进行了最后的伟大斗争。甚至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在处心积虑地清除托洛茨基的幽灵时也含蓄地承认，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斯大林之死又唤起了他们的勇气，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像可怜的回声一样，重复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抗议、控诉与批判。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归根结底，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

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去保卫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与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

这失败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挽回的呢？我们看到，只要托洛茨基还活着，斯大林就不认为他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斯大林的恐惧并非是偏执狂的执迷。政治舞台上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也有同感。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罗贝尔·库隆德（Robert Coulondre）对他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夕的会见所作的一番描述就是惊人的证明。希特勒夸耀他从刚刚跟斯大林签订的协定中捞到的好处，并沾沾自喜地瞻望着未来的军事胜利。大使在回答中试图让他"清醒"一下，就谈到在漫长可怕的战争之后社会动乱与革命可能会接踵而至并可能将交战国政府卷入其中。大使说："您认为您是胜利者……但是您是否想到另一种可能——胜利者可能是托洛茨基？"希特勒一听就跳了起来（仿佛"心窝上挨了一拳"），尖叫着说，这种可能（即托洛茨基胜利的威胁）是法国和英国最好不要跟第三帝国打仗的又一个原

因。这样，第三帝国的元首与第三共和国的使节在和平的最后时刻，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勾心斗角中为了互相恫吓而乞灵于被幽闭于地球另一头的一个孤独流亡者的名字。托洛茨基在读到这段对话时评论道："他们被革命的幽灵缠住了，并且给了它一个人的名字。"

希特勒与大使给了幽灵一个人的名字——托洛茨基，是否给错了呢？完全可以说，尽管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但他们可以给幽灵冠以斯大林的名字，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然而历史上常有这类情形，潜在的现实远比表面现象更让人难以捉摸。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掩盖了某种深刻的失败因素，而托洛茨基的失败则孕育着胜利。

他们之间根本的"意识形态"论争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即苏联应不应该或者能不能够在本国自给自足基础上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只有作为国际社会秩序才能够成功。事态发展所给予的答案远不如理论论争那样分明，但却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而不是斯大林的观点。早在苏联多少接近社会主义之前，革命就已传播到其他国家了。可以说，历史并没有单单给予苏联足够长的时间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试验推进到成熟阶段，更不用说完成它了。既然在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国际主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相冲突的，因此高举胜利旗帜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孤立主义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苏联的持久力也远比托洛茨基曾设想的要大得多；而且与他希望的相反，并不是西方无产阶级使俄国革命免除了孤立。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不管斯大林主义愿意不愿意，正是它自己冲破了它的国家甲壳。

在其最后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

个前途都押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上。他肯定战争必将导致革命——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时断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将被否定，社会主义就将遭到永远的失败，而官僚集体主义的时代就将到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轻率的、教条的和悲观的看法。历史现实又一次证明，它比理论家的进程表要复杂得多。战争确实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革命；但其进程并不符合经典模式。西方无产阶级又未能向旧制度的堡垒发起猛攻并征服它；而在东欧，旧制度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向易北河胜利挺进的俄国军队的冲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或者说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脱节——甚至更严重了。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一种趋势的延续，这种趋势的首次表现是在1920—1921年，当时红军进军华沙并占领了格鲁吉亚。[①]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启动的革命循环最终合拢了。在这循环的起点，布尔什维主义在真正的革命中登上了峰顶；而在其终点，布尔什维克却用军事占领来传播革命。然后，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漫长间隔，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发展。当革命的下一次循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触发时，它的开始处于第一次循环终结的地方——军事占领完成的革命。在军事史上，通常在上一次战争的终点与下一次战争的起点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上一次武装冲突结束时所发明的武器和形成的军事思想将支配下一次武装冲突的初期阶段。在革命的多次循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连续性。1920—1921年，布尔什维主义为了挣脱自身的孤立想尽一切办法在刺刀尖上将革命输往国外。20至30年后，斯大林主义被战争拖出了它的国家甲壳，它把革命输出到了整个东欧。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希望第二次革命循环以第一次的方式进行，即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崛起来进行，它的结果将主要依赖于各重要国家内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家革命的领导的质量。然而，新的循环并没有从上一次的起点开始，而是从它的终点开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依靠军事占领的革命。因为这是首先将其压力运用到自己边缘地带的列强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循环是从苏联的边缘地带开始的。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不是那些国家的工人和他们的党，而是红军。成功与失败并不依赖于该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主要依赖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依赖于外交协定、联盟和军事行动。各列强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将自身叠加于阶级斗争之上，因而改变并扭曲了它。马克思主义用以判断一个国家的革命"成熟"或"不成熟"的一切标准都完全失效了。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以及他们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了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社会动荡的起点。在整个波兰，在巴尔干各国以及在东德，革命是在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于德黑兰和雅尔塔完成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基础上实现的。凭借这种划分，并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西方列强运用其影响与势力镇压西欧（及希腊）的革命。若没有德黑兰与雅尔塔协定，很可能是西欧而不是东欧将成为革命的大舞台——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旧统治阶级的权威已经崩溃了，工人阶级已经起来造反，而且共产党领导着主要的武装抵抗力量。斯大林根据自己的外交义务去强压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作出让步，使其同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实际已经崩溃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在它的重建中与之携手合作。同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劝说东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屈从于俄国的优势并向革命投降。在这场大分配中，双方国际力量的平衡吞没了阶级斗争。正如在拿破仑时代一样，革命与反革命同样都是军事与外交的副产品。

至于这个巨大的事件链环，托洛茨基只看到了它的开头。他并未意识到它预兆着什么。他的思维习惯使他即使并非不可能，那么也很难想象：在整整一个时代里，3大列强居然能够通过其军事与外交将它们的意志施加于旧欧洲所有的社会阶级；因而，阶级斗争被降低到传统方式的水平之后会在另外一种水平上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即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冷战。

出于理论上的确信和政治上的直觉，托洛茨基对军事占领式的革命只感到厌恶。他曾反对1920—1921年对波兰和格鲁吉亚的入侵，而列宁却赞成这些冒险。作为军事人民委员，他坚决反对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将革命输出国外这种新拿破仑方式的早期拥护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20年他就曾严厉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的武装传教士，说“最好给他脖子上挂上一块磨盘，把他扔到海里去”。他在1940年时的立场与在1920年时的一样始终将军事占领式的革命看做是革命道路上最危险的迷误，始终坚信，西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自己的环境推动下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而苏联政府试图替他们包办革命将是犯罪行为，因为这可能直接损害他们的革命利益。他看到的始终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世界；始终相信革命的妊娠期不会太长，而又担心任何对它的干扰都会导致流产。他说得相当不错：斯大林对革命的武装介入产生了不少死胎——还有许多怪胎。

然而，面对军事占领式的革命，托洛茨基却再次陷入了严重的矛盾。他支持革命，反对军事占领；但是当革命导致军事占领或军事占领助长了革命时，他却不能坚持反对军事占领并与之公开彻底地决裂。1920—1921年在格鲁吉亚与波兰事件上他没有坚持反对，1939—1940年在波兰与芬兰事件上他同样没有坚持反对。倘若他能活到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他会发现他的两难处境恶化了，扩大了，更无出路了。我们不怀疑他会谴责斯大

林廉价出卖西方革命，也不怀疑他的立场将合乎逻辑地推动他接受东欧革命的现状并克服对斯大林手段的厌恶而承认"人民民主政体"是工人国家。这种立场，不管它如何善良正直，都丝毫无助于实际政治活动，因此，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在整个战后舞台上将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这一次的革命循环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循环正如上一次一样，也是以跟它的起点不同的方式结束的。它在中国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中国革命既不是从上面而来，也不是以外国的刺刀尖输入的。毛泽东和他的党不理睬斯大林（正像1925—1926年一样，后者在1945—1948年还寻求跟国民党和蒋介石搞交易），坚持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在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过渡阶段，而是遵循"不断革命"的逻辑又完成了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国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后的另一个胜利。

然而又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场激变的推动力。毛泽东的农民军队代替城市工人，将革命从乡村推向了城市。托洛茨基断言，如果这些军队长久地被限制在乡村地区，他们就会与农民同化，以至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并成为新反动派的基本力量。（中国过去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封建王朝不就是以一个新王朝取而代之吗?）这种分析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正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不仅要"代表"城市工人，而且要扎根于其中，并通过他们发挥作用——否则它的社会性质必将蜕化并表达异己阶级的利益。很有可能，如果这场革命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的社会结盟，那么在延安时期毛的游击队就将与农民高度同化，以至尽管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也仍无法跨越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但即使在中国，斗

争的进程也同样是取决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毛的党由于处于冷战之中并面临美国敌意的干涉，于是依附于苏联并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造得与它一致，以此稳固了它的统治。这样，苏联的革命霸权就做到了（尽管斯大林起初进行了阻挠）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到的事情——它将中国革命推到了反资产阶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几乎是分散的，在政治舞台上是无足轻重的，苏联的重力牵引就将毛的农民军队转变成了集体主义的推动者。

革命潮流自此以后就更远地向东方涌去，愈益远离“先进的”西方；它又一次在不发达的、贫穷的前工业社会里扎下了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对东方与西方的问题都愈益显得无力。但是，形势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同时起作用的多种过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由于迅猛的工业化，落后的东方慢慢地不再落后了。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的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为现代生活方式而奋斗，它的生活标准与群众教育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尽管还不平衡。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只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中的那些社会主义前提条件如今已在苏联社会中被创造出来并积累起来。在这样的社会新的要求面前，斯大林主义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与野蛮混杂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它的原始积累方式过于原始；它的反平均主义过于卑劣；它的专制是不合理的。一直蛰伏在冬眠状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传统仿佛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开始复活了，人们起而反对官僚特权，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迟钝，反对僵死沉重的教条。在强行使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同时，斯大林主义也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并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这种复兴是缓慢的，而且伴随着混乱与迷茫。斯大林主义或

其残余与复兴的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斯大林死后的头一个10年。倘若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布哈林主义者等反对派能幸存到50年代，那么非斯大林化的任务就会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完成它。然而他们早已随着老布尔什维克的阿特兰提斯洲一块儿沉没了，而且非斯大林化又是无可逃避的必然，于是不得不由斯大林的助手和帮凶来应付这件工作；但他们在应付过程中不可能不十分勉强，他们的心和手都在颤抖，因为他们从未忘记斯大林的罪恶里也有他们的份儿；而时刻焦急盼望着他们亲手发动的惊人揭露与甄别能够停顿下来。在追逐着他们的那些昔日亡灵中，再没有比他们的死敌托洛茨基的亡灵更让他们难堪和惊恐的了，他们的每一项揭露与甄别都是对他的颂辞。最让赫鲁晓夫提心吊胆的是，对斯大林恐怖时代不承担丝毫罪责的年轻的一代可能会对他的各种遁词与狡辩越来越不耐烦，会要求公开为托洛茨基平反。

平反无论如何是要到来的，尽管不大会在斯大林的那班老朽接班人下台之前。但它一旦来临，就绝不仅仅是迟来的纪念一位伟大人物的正义行动。工人国家将以此宣布它的成熟，它身上的官僚主义桎梏已被打碎，它又重新拥抱随托洛茨基一同消失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至于这一切对世界其他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一部传记的跋是无法容纳得下的。但完全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必将以消除“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方之间的旧日差别来抹掉托洛茨基的失败，他的失败正是植根于这种差别之中；而俄国革命的新生必将有助于最终消除这种差别。在西方，被俄罗斯母亲贬值成斯大林主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是厌恶与恐惧；而对清除了自己身上的野蛮赘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必将

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响应；对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将不得不最终承认它自己的创造及其关于人类命运的远见。只有到那时，历史才完成了圆满的循环：

> 直到希望用它自己的碎片
> 创造出它希望的东西。

托洛茨基曾将人类的进步比做朝觐者的赤足远征，他们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圣地前进，间或后退或绕道，但都是为了前进，然后又绕道或后退；他们始终这样曲折地但坚韧不拔地接近他们的目的地。托洛茨基把激励朝觐者前进看做是自己的使命。但是，在取得一定进步之后，人类就放纵和涣散起来，听任鞭策它的人受到诬蔑、诽谤，直到被践踏至死。只有当它重新向前走时，才悔恨地给予牺牲者补偿，珍重对他们的回忆，虔诚地搜集他们的遗物；那时，它会为他们所流的每一滴血而感谢他们——它知道，他们的鲜血滋育了未来的种子。

参考书目

（同见《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参考书目）

Avakum, Petrov（Авакум, Петров）, ***Жизнь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 Москва, 1960.

Brecht, B., ***Galileo Galilei***.

Breton, A., ***La clé des champs***. Paris, 1953.

Entretiens. Paris,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Budenz, L. F., ***This is My Story***. New York, 1947.

Bullock, A., ***Hitler——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53.

Burnham, J., articles and essays in ***New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Bulletin of the S. W. P. (the American Trotskyist organization).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Manage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41.

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 New York, 1950.

Cannon, J. P.,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New York, 1944.

Articles in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Bulletin*** of the S. W. P.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Céline, L. – F.,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Chen Tu – hsiu, unpublished memoranda, essays, a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Churchill, W. S., ***Great Contemporaries***. London, 1939.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51.

Ciliga, A., ***Au pays du grand mensonge***. Paris, 1937.

Articles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and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ий Вестник***

Coulondre, R., ***De Staline à Hitler, Souvenir de deux Ambassades***. Paris, 1950.

(Trotsky commented on Coulondre's report of his last meeting with Hitler on the basis of Coulondre's article in ***Paris – Soir***.)

M. Craipeau, 'J'ai connu l'assassin de Trotsky', ***France – Observateur***, 19 May 1960.

Dewey, John, 'Means and Ends', in ***New International***, 1938. (See also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and ***John Dewey,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Freedom, A symposium***, ed. S. Hook.

Draper, Th.,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 New York,

1960.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1957.

Eastman, Max, ***Since Lenin Died***. London, 1925.

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 London, 1937.

Marxism, is it Science? London, 1941.

Stalin's Russia and the Crisis in Socialism. London, 1940.

Great Companions. London, 1959.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Engels, F. and Marx, K., ***Briefwechsel***. Berlin, 1949 – 1950.

Fainsod, M.,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London, 1959.

Farrell, J. T., 'Dewey in Mexico' in ***John Dewey, A Symposium***, ed. Hook, S.

Freeman, J., ***An American Testament***. London, 1938.

Gide, André, ***Retour de l'U.R.S.S***. Paris, 1936.

Goldman, A., ***The Assassination of Leon Trotsky***. New York, n.d.

Gref, Ya., Contributions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Guérin, D., ***Jeunesse du Socialisme Libertaire***. Paris, 1959.

Fascisme et Grand Capital. Paris, 1936.

Hansen, J., Reminiscences about Trotsky in ***Fourth International***.

Hegel, G. W. F.,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Hernandez, J., ***La Grande Trahison***. Paris, 1953.

Hook, S., ***The Hero in History***. London, 1945.

Political Power and Personal Freedom. New York, 1955.

ed. ***John Dewey,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Freedom, A Symposium***. New York, 1950.

Les Humbles, Cahiers 5 – 6, ***À Leon Trotsky***. Paris, 1934.

Isa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reface by Trotsky). London, 1938.

Reports on China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Kaganovich, L., speeches in Reports of party congresses.

Karolyi, M., ***Memoirs***. London, 1956.

Kerensky, A., ***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London, 1934.

Khrushchev, N., ***The Dethronement of Stalin***. (***Manchester Guardian*** publication June 1956).

Speeches in 22 ***Съезд К.П.С.С.***, Москва, 1962.

Knudsen, K., Preface to Norwegian edition of Trotsky's ***My life***, Oslo.

Koht, H., ***Barricade to Barricade***. (Norwegian edition) Oslo.

Krog, H., ***Meninger***. Oslo, 1947.

Kun, Bela, (ed.) ***С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1919 – 1932. Москва, 1933.

Lenin, V.I. (Ленин, В.И.),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1941 – 1950.

Levine, I. Don, ***The Mind of an Assassin***. New York, 1959.

Lie, Trygve (On behalf of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Police), ***Storting Report***, nr. 19 (concerning Trotsky's internment and deportation from Norway), submitted on 18 February 1937.

Lunacharsky, A.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Силуэты***. Москва, 1923.

Macdonald, Dwight,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New York, 1958.

Malraux, A., ***La Condition Humaine***.

Manuilsky, D., ***The Communist Parties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Report at 11 Plenum of Comintern Executive, March – April 1931, London, n.d.

Other articles and speeches quoted from Reports of Party Congresses and ***С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

Marx, K., ***Das Kapital*** .

and Engels, F.,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

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

and Engels, F., ***Briefwechsel*** . Berlin, 1949 – 1950.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 (ed. by L. Trotsky and O. Rühle), London, 1946.

Mauriac, F., ***Mémoires Intérieures*** . Paris, 1959.

M. B. 'Троцкисты на Воркут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 1961. (An eyewitness's report on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Trotskyists at the Vorkuta concentration camp in 1938.)

Merleau – Ponty, M.,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 Paris, 1955.

Humanisme et terreur . Paris, 1947.

Miliukov, P. N. (Милюков, П. Н.),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Sofia, 1921.

Molinier, Raymond and Henri,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Leon Sedov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and Leon Sedov's Papers.

Molotov, V., speeches and reports in Reports of Party Congresses.

Nadeau, M., ***Histoire du Surréalisme*** . Paris, 1945.

Naville, P., ***Trotsky Vivant*** . Paris, 1962.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Nin, A.,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Orlov, A.,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 London, 1953.

Orwell, G., ***Homage to Catalonia*** .

1984.

Pablo, M., 'Vingt Ans de la Quartriéme Internationale' in ***Quatriéme Internationale, 1958 – 1959.***

Parijanine, M., 'Léon Trotsky ou la Revolution Bannie' in ***Les Humbles***. Paris, 1934.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Paz, Maurice and Magdeleine,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Pfemfert, Franz,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Plekhanov, G. (Плеханов, Г.),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ii. Москва, 1956.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London, 1940.

Popov, 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 P. S. U. (b)*** (vol. i – ii).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16th Russian edition. London, n. d.

Preobrazhensky, E.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E.),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т. 1, часть 1 – ая. Москва, 1926.

Essays and memoranda (including Manifesto 'Ко Всем Товарищам по Оппозиции') are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Pritt, D. N., ***The Zinoviev Trial***. London, 1936.

Radek, K., 'От Оппозиции в Клоаку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in ***Партия в Борьбе с Оппозициями***. Москва, 1936.

Articles in ***Извeстие*** and other Soviet newspapers. His 'Conffession' at his trial is in ***Судебный Очерк по Делу Анти – Советского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Москва. 1937.

Rahv, Ph.,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Rakovsky, Ch., Essays, articles, and Correspondence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and ***The Trotsky Archives*** .

Ramm, A.,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Reiss, I., 'Letter to Central Committee' and 'Записки'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1937.

R(izzi), Bruno,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 Paris, 1939.

Rosmer, A., ***Moscou sous Lénine*** . Paris, 1953.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in Trotsky's ***Ma Vie*** , Paris, 1953.

Articles in Trotskyist periodicals and ***La Révolution Proletarienne*** .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Rowse, A. L., ***End of an Epoch*** . London.

Rühle, O. (and L. Trotsky),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 . London, 1946.

Salazar, L. A. S., ***Murder in Mexico*** . London, 1950.

Sayers, M., and Kahn, A. E., ***The Great Conspiracy*** . New York, 1947.

Sedov, Leon, ***Livre Rouge sur le procés de Moscou*** . Paris, 1936. The Russian text of this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as a special issue of the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 Articles and essays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sometimes signed N. Markin), ***Manchester Guardian*** and other papers.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Natalya,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e Trotsky Archives*** , Closed Section.

L. Sedov papers transmitted to the author by Jeanne Martin des Paillères.

Sedova, Natalya, (with V. Serge), ***Vie et Mort de Trotsky*** .

Reminiscences about Trotsky and Lev Sedov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and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1.

Family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uthor.

Hommage à Natalya Sedova – Trotsky. (Funeral orations and reminiscences) Paris, 1962.

Serge, V., (and Natalya Sedova), ***Vie et Mort de Trotsky***. Paris, 1951.

Mémoires d'un Révolutionnaire. Paris, 1951.

Articles and letter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and other Trotskyist or near Trotskyist papers.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hachtman, M.; Articles and essays in ***New International***, ***Militant***, ***Internal Bulletin*** of S.W.P. etc.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haw, G.B., ***Saint Joan***.

To a Young Actress. London, 1960.

Correspondence quoted from the the Archives of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Leon Trotsky an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hirer, W.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0.

Smirnov, Ivan, Memoranda and correspondence quoted from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and ***The Trotsky Archives***.

Sobolevicius – Senin, alias Jack Soble, and his brother, Dr. Soblen (alias Robert Well),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Leon Sedov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okolovskaya, (Bronstein) Alexandra,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Leon Sedov,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ouvarine, B., ***Stalin***, London, 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Stalin, J., ***Сочинения***, т. 12 – 13. Москва, 1949 – 1951.

Tarov, A., Contributions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Togliatti (Ercoli), P., Speeches and articles in ***С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u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and Reports of Comintern Congresses and Conferences.

Thaelmann, E., Speeches, reports, and articles quoted from 11 – ***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12 – ***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Rote Fahne***, and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or the Russian edition of the latter).

Trotsky, L. (Троцкий, Л.), ***Что и Как Пройзошло***? Paris, 1929.

Моя Жизнь, т. 1 – 2. Berlin, 1930. (The English edition, ***My life***, London, 1930; the French, ***Ma Vie***,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by Alfred Rosmer, Paris, 1953; the German ***Mein Leben***, Berlin, 1929.)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s, i – iii.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London, 1932 – 1933.

Écrits, 1928 – 40. vols. i – iii, with Introduction by Pierre Frank. Paris, 1955 – 1959.

О Ленине. Москва, 1924. (French edition ***Lénine***. Paris, 1925), a collection of character sketches about Lenin, not be to confused with the biography of Lenin, of which Trotsky concluded only the first part and which has so far been published only in French as

Vie de Lénine, Jeunesse. Paris, 1936.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1936.

Немецкая Револющ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Berlin, 1932. (In German: ***Was Nun***? Berlin, 1932; in English ***What Next***? New York, 1932; French version ***Écrits***, vol. iii.)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Путь. (in German: ***Der einzige Weg***) Berlin, 1932.

Germany, the Key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London, 1931.

Où va la France? **and** ***Encore une Fois, Où va la France?*** Paris, 1936.

(Reproduced in ***Écrits***, vol. ii.)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London, 1937.

Permanent Revolution. Calcutta, 1947.

,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1932.

Trotsky's Diary in Exile. London, 1958.

Stalin's Verbrechen. Zürich, 1937.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London, n. d.

Сталинская Школа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Berlin, 1932.

(The American edition: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ew York, 1937.)

Between Red and White. London, 1922.

Stalin. New York, 1946.

Their Morals and Ours. New York, 1939.

Leon Sedov, Son, Friend, Fighter. New York, 1938.

Articles, essays, treatises, and theses in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929 – 1940. ***The New International***, and other Trotskyist periodicals.

The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A description of these was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y in ***The Prophet Armed***. Since then ***The Archives*** have been reorganized. The documents are no longer divided into Sections A, B, and C, but have been re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 Index, in two volumes, is available

to students of this (the 'Open') part of ***The Archives***. All references in ***The Prophet Armed*** and ***The Prophet Unarmed*** were to this part of ***The Archives***.

What was described in the Bibliography in ***The Prophet Armed*** as 'Section D' is now described as 'The Closed Section of ***The Archives***'. It covers only the years 1929 – 1940 and contains Trotsky's correspondence with groups and member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with other well – wishers and friends, his family correspondence, household papers, correspondence with publishers, documentation prepared for The Dewey Commission, paper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 According to Trotsky's wish, this Section of ***The Archives*** was not to be opened before the year 1980; but Harvard University gave the author access to it on the basis of a special authorization from Natalya Sedova, Trotsky's widow. (In references to ***The Trotsky Archives*** at large, the open section of ***The Archives*** is meant.)

The Closed Section of ***The Archives*** consists of forty – five boxes, containing 309 folders with documents and correspondence. Thus folders 1 – 16 contain Trotsky's family correspondence; folders 17 – 25, his household papers; folders 26 – 33, correspondence with publishers and literary agents; 34 – 35, documentation for the Mexican Counter-trial; while Fourth International papers are in folders 36 – 40. The rest of the material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countries, for instance, folders 65 – 70 contain Trotsky's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China; folders 90 – 121 refer to France; the German correspondence is in folders 122 – 126; the British 165 – 175; folders 214 – 286 contain correspondence with U.S.A.; folders 287 – 292 corre-

spondence with the U.S.S.R., and 293 - 309 letters to and from Soviet citizens exiled from the U.S.S.R. To this Section of ***The Archives*** some papers were added by Trotsky's widow in 1953.

See also: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London, 1937 (Trotsky's depositions and cross - examination before the Dewey Commission in Mexico).

Not Guilty. Report of the Dewey Commission. London, 1938.

Volkov, Zinaida (Zina, Trotsky's daught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London, 1944.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Well, Simone, ***Oppression et Liberté***. Paris, 1955.

Wilson, E., ***To the Finland Station***. London, 1941.

Wolfe, B., ***The Great Prince Died***. New York, 1959.

Wolfe, Bertram, D., Articles in ***Things we Want to Know***. Workers' Age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36, and ***The New Republic***, 1937.

Wollenberg, E., ***The Red Army***. London, 1940.

Yaroslavsky, E.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Партия в Борьбе с Оппозициами***, with contributions by K. Radek, A. Pankratova, and others. Москва, 1936.

О Новейшей Эволюции Троцкизма. Москва, 1930.

Вчерашний и Завтрашний День Троцкизма. Москва, 1929.

Zborowski, Mark, (Étienne)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his relationship with Leon Sedov ar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Closed Section.

The following are the official reports of the Moscow Trials:

Судебный Отчет по Делу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 Зиновьевског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Москва, 1936.

Судебный Отчет по Делу Анти – Советского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Москва, 1937.

Судебный Отчет по Делу Анти –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Право – Троцкис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Москва, 1938.

(Official English versions or ***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were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by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Justice in Moscow:)

The following official Protocols, Verbattim Reports, and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have been referred to:

16 – ый Съезд В.К.П.(б). Москва, 1931.

17 – ый Съезд В.К.П.(б). Москва, 1934.

20 – ый Съезд К.П.С.С. Москва, 1956.

22 – ой Съезд К.П.С.С. Москва, 1962.

11 – 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Москва, 1932.

12 – 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Москва, 1933.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Москва, 1933.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т. 1 – 2. Москва, 1953.

В.К.П.(б) о Профсоюзах. Москва, 1940.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9.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U.S. Senate (14 – 15 February 1957), part 51. Washington. 1957.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U. S. Senate* (21 November 1957), part 87. Washington, 1958.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e Press Korrespondenz*,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Rote Fahne*, *Roter Aufbau*, *Rundschau Unser Wort*, *Permanente Revolution*, *Arbeiterpolitik*, *Aktion*, *Berliner Börsenzeitung*, *Hamburger Nachrichten*, *Vossische Zeitung*.

Militant, *New International*, *Fourth International*, *Partisan Review*, *Internal Bulletin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The Times*, *Manchester Guardian*, *Daily Express*, *The Observer*, *Morning Post*,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American*,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The New York World Telegram*, *Life*, *The Nation*, *The New Republic*, *The New Leader*, *Soviet Russia To-day*.

New York Tag, and *Vorwärts* (*Yiddish - U. S. A.*)

Vérité Quatriéme Internationale France-Observateur, *Intransigeant*, *Paris-Soir*, *Le Matin*, *Le Journal*, *Le Temps*, *Humanité*, *Journal d'Orient*.

Politiken, *Berlingske Tidende*, *Information*, *Arbeiderbladet*, *Dagbladet*, *Arbeideren*, *Soerlandet*.

La Prensa, *Trinchera Aprista*.

Большевик,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Правда*,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Stencilled or handcopied periodicals circulated by Trotskyist deportees and prisoners in the U.S.S.R. ar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